

中国社会史的论战

1-2

合

中國社會史的人類學

中國社會史論

單位
拆書
案

第四五期合刊

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

王禮錫

一

關於中國經濟性質問題，現在已經逼着任何階級的學者要求答覆。任何階級的學者爲着要確定或辯護他自己的階級的前途，也非解答這問題不可。

普羅利塔利亞學者固然很早就注意這個問題，自第三國際的盲動政策碰頭以來，對於這個問題更迫切的要求解答。現在四分五裂的各派，正各自提出一個見解在各種公開

的或祕密的刊物上刀鎗相見。就像馬玉夫爲脫離幹部派加入反對派時發表的一封給他們全黨黨員的信就有這樣的話：“我和史大林派中央及其下級執行者所爭論的主要的是如下幾個問題：‘一，中國現在社會究竟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二，經過一九二七年失敗以後的中國革命究竟是資產階級革命，還是無產階級革命？……’”可見中國共產黨分裂的原因，主要的就在對於這個問題認識的不同。所以馬玉夫在所提出的七個爭論的問題中，首先便要求對於這個疑問的解答。

中國國民黨對於這個問題也有過很熱烈的辯爭，在前進與新生命上，很早就發表過陶希聖公孫愈之梅思平諸人的意見。

九月三日至九月七日的申報對於這個問題竟有長篇的時評，或許有人認爲是一個意外的奇蹟。其實這不過表示這問題的嚴重化與普遍化，使布爾喬亞代言的報紙，也感到對於這問題的重要，以爲在這‘根本問題未得解答之先’，其他‘幣制問題，金銀問題，關稅及各種稅收問題’皆如‘不附幹之枝葉，漫無歸宿，而其討論之結果，亦將終歸於蹈空，無補於中國經濟之前途’。並且向中國經濟學社提出了下面的六

個根本問題：

一，世界資本主義之現狀及其前途

二，資本主義之整個性

三，中國經濟在世界資本主義經濟中之地位及其關聯

四，中國經濟之變遷與現狀

五，中國經濟之特質

六，中國往何處去

這問題已經成爲如何的嚴重與普遍，老邁與遲鈍到申報都已經感到，而且感到得很深刻了！

本來，經濟的結構，是一切精神文化的最基礎的結構，要理解中國一切精神文化的結構，必須徹底的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所以，要理解中國的整個社會，決不能零碎的去理解，而必需先理解其基礎，然後能把握其整個。

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必須從流動的生成中去理解，而不能專作無機物的靜的分析。從流動中去理解中國經濟的結構，必須從中國歷史上的經濟的演變與世界經濟的聯系，闡明其規律性並擷住其特殊性。

爲什麼要理解中國的經濟的結構？‘要找出中國社會的前途’就是這個問題的解答。我們可以在‘中國社會的前途’

的總問題中，隨便拈出幾個問題來考察。

一，中國革命高潮是否到來？

二，中國革命的性質，是資本主義革命？抑是社會主義革命？

三，中國革命的對象是否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

.....

要解答第一個問題，就得了解革命的條件是否具備？

要解答第二個問題，就得了解中國現在是封建社會，抑是資本主義社會。

要解答第三個問題，就得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生的作用，與封建勢力是不是存在。

總之，我們要知道應當如何推動社會，就應當把握社會的動向；要把握社會的動向，就應當理解社會的結構，尤其是其基礎的結構。

這樣，就算很簡單的說明了這問題的重要性。

但這問題的重要性，是怎樣的被暴露呢？

世界的資本主義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而與資本主義恰恰相反的一個國家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的革命。自一個可怖的事實的礁石，打轉了這不可一世的理

想的潮頭，於是捲起了失望與懷疑的漩渦。‘我們的動向是錯誤了嗎’？這個問題便在一般革命的人們的腦子裏旋轉。‘帝國主義根本不足以阻礙中國的發展，中國根本就沒有封建勢力’。在革命時代噤若寒蟬的學者也就很武斷而有力地發表他的極端的反對的論調。這不能不使一般有思考工具——唯物史觀——的人，沉入於更深刻的思考，從行動動向的懷疑，而考察社會的動向；從社會的動向，而考察社會的本質；從社會的本質，而就流動中考察社會的史的生成。堅認其行動的絕無錯誤者，亦從這步驟與方法去作他們的辯護。

於是，中國社會史的問題，遂逼着各階級各黨派的學者爲着牠以鬥爭的姿態在思想的戰場上出現。

二

自帝國主義的外力在中國社會發生作用以來，中國思想界發生兩個激烈的戰爭——人生觀論戰，中國社會史論戰——一個是過去了，一個正在造着鎗林彈雨的混戰。

這兩個論戰的接踵而來，是表示中國社會的變革之迅疾。我們可以從下面的幾個不同之點，認識這兩個論戰在經

濟的變革上是什麼意義。

一，人生觀論戰，一方是科學，對手方是玄學；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這兩個對手方都不存在，因為到現在科學已成為常識的‘真’，玄學已成為常識的‘幻’。

二，在哲學觀點上，人生觀論戰，一方是極端的唯心，一方不是極端的唯物；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裏，都是唯物的內部的爭鬥，沒有唯心論者插足的餘地。

三，人生觀論戰是以普遍的真理為研究的對象，各有可根據的現成的理論；中國社會史論戰是以中國的實際的動的社會為研究的對象，沒有可抄襲的藍本。

四，在方法上，人生觀論戰一方面是以形式邏輯做武器，（雖然他們也以形式邏輯為不足，但終跳不出形式邏輯的圈子。）一方面是以玄想做武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各方都是以唯物的辯證法做武器。

根據上面的分析，我們可以了解，五四以後，中國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的武士——科學，自然披掛着全副武裝——形式邏輯——出現於思想的戰場，來掃盪封建的魂魄——玄學鬼。封建的屍體早已僅僅剩下些殘骸，而封建意識便成了無所依歸的野鬼，其脆弱自不禁科學的一擊。所以這

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一方是封建殘餘勢力，一方是新興資本主義勢力。

當着世界的資本主義國際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恰恰與資本主義國際相對立的國際亦正在依照牠的模型製造中國。中國社會本身的變革亦正在這車輪中旋轉，爲着兩個外力的加入，而這變革也就因而加速。各各爲要辯護自己階級的前途，便對於中國社會加以不同的分析。所以這一個戰鬥的後台指揮者，是存在於現在中國社會的各階級。而爲着各階級的畸左畸右，形成許多不同的意見。

因此，這個問題是由世界革命，中國革命而發生，其論定亦將影響於中國革命乃至於世界革命的前途，而其力量則不但調動廣大的各階級的鬥士，並且調動世界的革命理論家參加這個戰鬥。這是何等偉大的一個論戰！

但是，這個論戰是不像人生觀論戰的容易得着結論的。地球不是方而是圓的，不是日出於扶桑沒於若木，而是地球繞日，是已有科學的證明；輕二養一化合成水，這也是可以當面實證，誰都不會加以懷疑的。但是關於中國經濟的統計是缺乏得很。而所有的統計，又得估量他的可靠的成分；研究近代的東西幾乎要像研究古代的^事東西一樣去做一番辨偽

的考據工夫。即使是可靠，而對於材料所得到的認識又各行自不同。像任曙在他所著的中國經濟研究引了歷年輪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數字上告訴我們輪船多於帆船，並且輪船逐漸加多，帆船逐次減少。他的認識是‘帆船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帆船是封建的表徵，輪船是資本主義的表徵’，然後得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的結論。而嚴靈峯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中却對於這個統計得出不同的認識。他很俏皮地說：‘牛是商品呢？耕種工具呢？食品呢？看牠所處的條件如何而定。人是叛徒呢？反動派呢？革命家呢？看他所處的生活條件如何而定。不錯，帆船如果在封建制度下專門為領主們運輸自然品的貢稅，奴隸，兵士，牠當然代表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但是，在今天，中國的帆船的作用已經不是這樣，牠同樣是運輸資本主義制度下唯一生產對象的商品了。難道今天在帆船上所載的商品，便變為封建時代的領主和農民滿足自己的生產物嗎？……在目前中國商品經濟發達的條件下，把輪船和帆船的載量來比較，並不是把資本主義與封建經濟比較，倒是把資本主義與資本主義比較罷了。……其實，應該用作表示資本主義勢力

向上發展的趨勢，和生產集中的趨勢’。這是這論戰不容得着結論的第一個原因。

其次，中國歷史是大不容易明瞭，就歷史的開始已經把握不住端倪，有以為和歐洲的情形一樣，有以為‘與水門爭’應當寫在中國歷史的第一頁。其發展也很特異，長期間的停滯，不能依着歷史的律規發展到工業資本的階段。而這‘長期間’是封建時期？或者是商業資本時期？這‘停滯’，是為什麼原因？中國是不是可以不藉外力走上工業資本的階段，換句話說，中國是不是自己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發展？這些都是現在爭論着而不能解決的問題。馬克思對於這奇異的國度也不能十分理解，所以對於社會的形式，他特別舉出一個‘東方式’的名詞。‘東方式’這個謎的提示，現在正迷亂着多少人們。

此外還有許多麻煩：像歷史的浩繁與蕪雜，現在經濟的多層，不容易找出其領導的生產力等等，都是阻礙着這問題不容易得到結論的原因。

三

像這樣嚴重，繁雜的問題，一面應當從鬥爭中鼓動思想

界的研究熱，一面應作有組織的合作研究，以增加研究的效率。在這個大問題之下，分爲若干問題，每人或每組對於其中的一個問題或幾個問題負材料的搜集，材料的審查，以及對於這些材料的組織與問題的試解的責任，然後由大家加以細密的討論。這樣才可以免除‘流於空疏’的毛病。這樣思想研究的合作組織，到處可以有，尤其在學校裏面最方便於這樣的組織。

從前梁任公述他自己讀書的經驗，‘爲著作而讀書，則分外感到興趣’。爲究研問題而讀書，其興趣自然又更甚於爲著作而讀書。若爲着要解決個人行動的方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社會的動向問題，乃至於解決全世界的動向問題，那會更如何的迫切地緊張地實際地去讀書！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發展的研究是解決個人，全社會，全世界的動向的問題，像日暮途窮迷惘於深山大澤中的時候，對於問路是如何地迫切啊！在整個問題中得到一部分的光明，應當比天文家發現一顆星球還能獲得更高的歡欣。我們可以預料着將有一個更熱烈的研究空氣會爲這個論戰所誘發。

現在爲着研究的便利起見，有系統的爲這個研究的對象提出許多問題，也許可爲研究這問題者的一個幫助吧！

一，歷史上的幾個大關鍵：

1. 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

從史的常識來證明，中國歷史的第一頁，應當為原始共產制所佔據，但幾千年前是否曾遺留這樣的事實下來給我們有憑有據的寫在歷史上呢？郭沫若以為有很多史料：

“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羣婚的母系社會”（古代社會史研究第十頁）

‘二嫂使治朕棲’（孟子）‘眩弟並淫’（天問）明明表示‘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同上）

“我們在堯典中看那些‘四岳’‘十二牧’，……不是一些各姓的酋長軍長在開氏族會議，在推選新的酋長或軍長的嗎？”

.....

這些他都拿來作原始共產制度的證明，但對於這些材料的來源，一些也不加以考證。‘這些材料是靠得住的嗎’？解答了這個問題，才能夠引用而無弊。對於無史時代的史的敘述，自然只能根據傳說，而不能根據真的史實，不過就是傳

說亦必需證明其爲傳說，因爲還有‘托古改制’的故意造作史實，這樣的材料是還不及傳說之可靠。像關於舜聚堯二女的事，如果是民間的傳說，自然純粹民間文學的詩經應當有不少的可尋之跡。但是，一點也沒有。堯舜等等故事，若竟是儒家托古改制所造成的，用來作史前的根據，那未免太孟浪了。

他並且以爲“商代的社會必然還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而其根據是從甲骨文中看出，其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屨器或者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很幼稚的。

商代的社會是原始共產社會呢？是封建社會的初期呢？這也是需要加以詳細的研究的，因爲這是中國有史之始。

2. 中國的封建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崩潰？

郭沫若歷舉尚書中對殷民的賤稱，和左氏定四年傳：‘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門氏尾門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畸氏樊氏饑氏終葵氏’以證明周以殷爲奴，推定周代是奴隸社會。而以秦始皇爲‘在中國社會史上完成了封建的光勳’。直到最近百年內帝國主義

在中國發生作用，封建經濟才分解。

却同時陶希聖以及其他許多人，則承認周代的大封同姓和井田制度是封建的最盛時代，而春秋時封建制度便開始分解。他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毅然決然說‘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

對於中國同樣史實的考察生出這樣極端不同的見解，我們贊同那個見解，或者都不贊同？

歷史的史實是勝於雄辯的。周代的史實使我們知道，無論從土地制度看，或是從統治的形式看，毫無疑義是封建的黃金時代！秦代焚書坑儒，建立法治的專制統一的帝國，廢封建為郡縣，集中富豪於都市，這都明白的證明是商業資本的代表者。秦始皇的真父呂不韋就是用經商的方法把天下買來的。漢朝的大封諸侯，重農賤商等等史實，顯明是秦朝商業資本政權的反動，封建制度的回光返照。晉南渡以後，南方經濟漸次開發，到六朝時代，南朝的商業資本已占經濟的領導地位，這勢力漸次的侵入到北方，隋代開發運河，商業資本遂得到統一的統治。在歷史上展開這些史實，似乎是不容易加以否認的。但在這裏主要的是提出問題，所以用不

着多量的引證來證明自己的意見。

3. 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在共產黨的幹部派的理論是根本否認中國社會史上有商業資本主義的一個時期（前資本主義時期）。史實所詔示於我們的確是這樣呢？或者要辯護他們的行動然後造作這樣的理論呢？

商業資本主義在歷史上的作用也是很可研究的，牠在社會史上是不是可以發生領導作用？牠是否可以使社會變質？牠和土地資本結合是會發生怎樣的作用？牠在中國社會史上若沒有其他阻力是不是可以依着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達到工業資本的階段？這都是需要費力研究的問題。

不過我們研究商業資本的問題，首先要明瞭商業資本的性質，牠的性質不是建立在生產工具的變更，而是在生產關係的變更。這就是說，商業資本主義時代，生產的方法依然是和封建時代相差不多，蒸汽還未發明。其與封建經濟不同的地方，只是在‘封建生產的目的是在自給，商業資本是為商品而生產’。所以商業資本主義時代僅僅是封建與資本主義時代的橋梁。這橋梁時代何以在中國會這樣長？這却另外是一個問題。

4. 什麼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

拉狄克把這個原因歸之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郭沫若歸之於沒有發現蒸汽機。此外還有各種的歸咎。

我以為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固然是一個原因，但為什麼沒有得到海外殖民地呢？這原因是為中國在地理上是便利於統一，就是割據也是各以希求統一的目的去割據，這就是說，中國地理上不能形成幾個對立的獨立國家，所以競爭着向海外發展不是十分必要的。

又中國經過幾度低級文化民族的侵入，將商業資本主義所建立的文明踏得粉碎，雖然低族文化的民族始終會被高級文化民族所同化，但在經濟上又得走過一度回頭的路。每次恰好有發展到工業資本的希望，又給游牧民族打回頭了。

因為以上兩個原因，商業資本的累積便無其他出路，只是與土地資本結合，造成農村經濟的崩潰，造成間歇期的農民暴動。我們相信中國歷史上的商業資本主義是能按照歷史的規律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如果沒有外力的阻礙。決不會像郭沫若所說中國民族是天然的不能‘發明蒸汽

機’，沒有發明蒸汽機是各種外力阻礙的‘果’而不是‘因’。

關於這問題是非常重要的，應當加詳慎的研究，上舉的兩個理由不過是隨意拈出，作為關於這問題的研究的一點意見而已。

此外像關於中國歷史上的幾個農民暴動的問題，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所提出的亞洲地租形態問題等等，也是應當加以詳細的研究。

這些問題之中，就像陶希聖所提出的士大夫階級問題，因為各人的認識不同，而有種種不同的意見。

陶希聖提出這個問題時，表示對這問題特別的重視，中國社會結構的特色，陶先生完全歸之於這個階級。他說‘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於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

對於士大夫階級有許多人提出過相反的見解。我也覺得士大夫不能成爲一個有特殊經濟基礎的階級，牠只是做各階級鬥爭的工具而已。自然這不是三言兩語所能說明的。

二，現在中國經濟性質問題

這個問題是我們的論戰的目的。如果得到了解決，那我們的行動就有了極有力的根據。對於歷史上的研究，亦不過

爲着要使這個問題更容易得着結論而已。關於現代中國經濟性質，簡要的提出下列的幾個問題：

- 一，現在中國的社會有若干經濟層級？以何種經濟佔領導的地位？
- 二，帝國主義的外力對於中國經濟發生了什麼作用？將來還會發生什麼影響？
- 三，封建勢力是否還遺留於中國社會中？其作用如何？
- 四，中國農民問題與土地問題。
- 五，農民暴動的前途如何？
- 六，資本主義在中國是否有前途？
- 七，產業工人力量的估量。
- 八，中國需要什麼性質的革命？

要研究現在中國經濟的性質，其結果自然得涉及中國革命的性質，這個問題所以嚴重與普遍在此，所以能誘發思想界鬥爭的興趣與活氣亦在此，因爲這不僅是書獃子書齋中的事業。

三，中國歷史上意識形態之發展的研究

研究中國社會的史的發展，自然應當從生產力的轉變，生產關係的轉變研究其最基礎的經濟形式的發展，同時應

當從意識形態的上層文化的發展以證明其符合與否而使此分析得更堅確的信念。好像

一，中國政治形式的史的發展；

二，中國哲學思想史的發展；

三，中國文學的史的發展；

.....

.....

等等都應當分門別類作分工合作的研究。

四

最後將關於這問題的書籍和散在各雜誌中的論文，就手邊所能查考的寫下一個目錄，以爲研究這問題者之一助。

一，關於研究中國社會史的論戰的書籍

書名	作者	出版處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封建社會史	陶希聖	南強
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研究拾零	陶希聖	新生命

中國社會史研究	熊得山	崑崙
中國社會之結構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社會之變化	周谷城	新生命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新生命
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郭沫若	聯合書店
中國經濟的研究	任曙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不日出版文 見本誌本期)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朱新繁	聯合
中國產業革命概觀	李達	崑崙
中國社會組織	長野朗著 朱家清譯	光明
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馬札爾亞著 陳代青彭桂秋譯	神州國光社
中國革命運動史	拉狄克	光明
支那土地制度研究	長野朗著 謝友仁譯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農民戰爭的史的研究	龍山	神州國光社 即出版
中國經濟史概論	貫因	聯合書店
中國產業革命概況	李達	崑崙
中國產業組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	伊藤武雄著 黃逸羣譯	樂羣
民族革命原理(譯)	列甯	華興書局
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 (譯)	布哈林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反對派	史達林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與機會主義	陳獨秀等	布爾塞維克社
中國革命	李立三編	布爾塞維克社
我們的政治意見	陳獨秀等	無產者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彭述之	中共
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	瞿秋白	中共
中國革命與中共	瞿秋白	中共
中國經濟基礎現狀及危機	李麥麥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社會科學 研究社
物觀文學史叢稿！		
南北朝文藝與社會	王體錫	神州國光社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	神州國光社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	神州國光社

二,散見各雜誌中的論文

篇名	作者	冊	出版處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	動力第二期	神州國光社
中國經濟研究(一)	任曙	全一冊	滬濱書局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倬章	全一冊	社會科學 研究社
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	李立三	布爾塞維克 第三卷No 2/3	中國共產黨

反對派對中國問題的錯誤	吳良賦	全上	中國共產黨
反抗托洛斯基對列寧主義的進攻	問友	全上, No.6	中國共產黨
一九二九年之中國	潘東周	新思潮第一卷 No 2/3合刊	新思潮社
中國經濟問題專號	潘東周等	全上, No5.	新思潮社
中國國民經濟的改造問題	潘東周等	社會科學講座 No1.	光華書局
第三時期的中國經濟	沈澤民	布爾塞維克(?)期 1931.5月出版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的性質	伯虎	全上	中國共產黨
關於“金貴銀賤”問題	澤民	全上	中國共產黨
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問題	潘東周	世界月刊第一卷 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鐵路現狀	垂雲	全上, 第一卷 創刊號	世界學會
中國對外的貿易問題	潘東周	全上, 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航業現狀	垂雲	全上, 第二號	世界學會
中國工業問題	潘東周	全上, 第三號	世界學會
帝國主義與中國農村經濟	胡浪恆	大道月刊第一期	大道月刊社
陶希聖的商業資本的魔手	逸厂	社會科學戰綫 第一期	社會科學戰綫社
中國社會史的分析及中國革命的階級	丘旭	摩登青年第一/二期	摩登青年社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思雲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中國糧食問題	王道	世界月刊第二卷 第二期	世界月刊社
中國貨幣的考察	成信	全上	全上

中國經濟的性質是什麼	恩雲	讀者第一期	全上
關於中國古代史研究法	王洵	讀者第一期	讀者月刊社
論中國的封建制度	陶希聖譯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產業革命與中國農村經濟之崩潰	高鏗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政治思想底社會的基礎	莊心在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國民革命與社會階級	胡祥麟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失業問題之特殊性的探討	李宗文	社會科學季刊第一卷二期	社會科學研究會
中國社會發展的概略	梅恩平	新生命一卷十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	方岳	新生命二卷一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構造史的觀察	黎際濤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在世界經濟的地位和中國的危機	何思源	同上,二卷五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社會基礎	梁園東	同上,二卷六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之封建的勢力	葉兆英	同上,二卷七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階級之史的考察	維持福格爾	同上,二卷八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的家族制度及其崩潰	實君	同上二卷一〇號	新生命書局
中國社會之封建的考察	朱伯康	同上三卷一〇,一一,一二號	新生命書局

(新生命中所載陶希聖各文,因輯成專書,不錄)

前期封建社會之中國農村社會	剪伯贊	三民半月五卷七八九期	三民半月刊社
中國農村社會之本質及其史的階級發	剪伯贊	同上,六期	三民半月刊社

- | | | | |
|-----------|------------|--------|-------|
| 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 朱其莘
陶希聖 | 本誌第一期 | 神州國光社 |
| 中國宗法社會的將來 | 潘 菽 | 北新四卷七號 | 北新書店 |
| 中國社會之分析 | 朱伯康 | 本誌第二期 | 神州國光社 |

婦心三部曲

奧國顯尼支勒著
施 蟄 存 譯

本書包含這位老維也納戀愛作家的三種最有名的小說。顯氏的小說和戲曲都是描寫戀愛的，而且他的寫戀愛都是根據於性慾的。本書的第一部和第二部，便是他生平所描寫的婦女戀愛心理的最好的作品。倍爾達迦蘭夫人係作於一九〇〇年，寫一個美麗的青年寡婦和一位大音樂家的異樣的戀愛，寫她的戀愛心理，精細旖旎之至。第二部毗亞特麗思，也是寫一個美麗的青年寡婦，她怎樣的挽救她兒子和一位男爵夫人的關係，又怎樣的和她兒子的同學通奸了，又怎樣的和她兒子終於都沉在美麗的月光下的湖水裏。其中寫母愛，寫性慾衝動，都異常強銳。第三部愛爾賽小姐作於一九二五年，是被稱為二十世紀最有名的中篇小說的。書中寫個十九歲的少女為救父親而向一個資本家去借錢，這個資本家要求以一看她美麗的裸體為條件。在其中，寫她裸了體照鏡子，寫她發狂，寫她在大眾面前顯示出美麗的肉體來，都異常動人；而且就這篇的格式言，也是空前的珍品。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1) 文藝研究及介紹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霞村	四角	本書為徐霞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合「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兒司克派與皮藍得畫」「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七角	在這兒呈露於讀者諸君眼前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我們這本小書，凡代表了十三國，共八十三篇，都是現在文壇上極重要的消息，和良好的論文，而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的。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	七角	辛克萊是現在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不獨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攷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氏的專著。
中國文學論集	鈴木虎雄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著的。而譯著的選擇，也是有系統的選擇，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末附青木正兒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讀的。
物觀文學史叢稿 李長吉評傳	王禮錫	五角	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在這書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闢一條正確的新路。李長吉從來被人稱為鬼才，其詩被人稱為鬼語，作者就在這怪險的短命的鬼才詩人開始去嘗試遺新的方法。

關於中國社會之 封建性的討論

朱新繁

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社會，還是封建社會？中國封建制度何時開始崩潰？封建勢力在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佔何種作用？這些都是關於中國社會見解的爭論的焦點，而是我們解剖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所必須理解的。

首先我們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是否還存在？如果說已經破壞，那末破壞開始於何時？

現在差不多有很多人一致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周末秦初)已經破壞，尤其是陶希聖先生主張此說最力。

陶先生肯定地說：“我的答案：封建制度已不存在，封建勢力還存在着。”(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二六頁)至於封建制度在什麼時候就已不存在了呢？陶先生一再說：

“春秋戰國時代，是中國社會史的一個關鍵；中國社會在這個時候結束了封建制度。”(同上書第四頁)

“封建制度在春秋時已經崩潰，所以中國早已不是封建的國家。”(同上第二六一頁)

“貴族政治在春秋時代，起了動搖。三家據魯，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這些事實證明了舊貴族的權力逐漸移於官僚。至侯封與侯封之間，經過了許多的戰爭，戰爭的結果，一方面弱者被併於強者，他方面因為權力集中於治者而形成中央集權，破壞了舊日的封建制度。”(同上第五三——五四頁)

“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陶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九六頁)

“封建制度不過是現物地租及徭役勞動，人與人間之隸屬關係，及地主之政治支配，三個要素相與結合而成。三個要素自公元前六〇〇年後，開始分解。”（同上第一九七頁）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變革的實際，卻不過封建制度的分解。”（同上第二五五頁）

陶希聖先生上面的見解是不是正確的呢？我們要答覆這個問題，首先就要明白什麼是封建制度？

陶先生對於封建制度所下的定義是：

“現在我們先說一說封建制度是什麼？封建制度有兩個特徵：

“1. 封建制度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牠的基礎是農村。

“2. 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領主和掌握治權的封建貴族。因為有了這兩個特徵，所以：

“1. 封建制度的時候，資本主義的經濟不發達，因為基礎在農村，故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

“2. 封建制度的時候，沒有官僚，只有貴族，貴族掌握治權，同時，他們又掌握政權。”（中國社會之史的分

析第二五八頁)

以上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的兩個特徵，都是很曖昧的。所謂“封建制度是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這尤其是很空洞的。井田制度是一種土地制度，私有土地是一種土地制度，土地國有也是一種土地制度；大約陶先生的所謂土地制度，即指“沒有都市集中的現象，和發達的貨幣”的時候的任何一種土地制度。但無論如何，我總以為對封建制度下這樣的定義是不妥當的。

“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經濟結構中，係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決定了統治隸屬的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由生產過程中直接發生出來的……生產工具私有對於直接生產者的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就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秘……”

“雖然如此，但同一的經濟基礎——同一的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等，能以發生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似迷混本來面目，要了解牠，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的分

析。”(馬克思)

馬克思以爲當我們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時，要把主要的條件從次要的條件中分開，首先研究這種經濟結構的一般的經濟基礎，然後再來分析那決定某種經濟結構之變態的“當時實際環境”。我以爲這種研究方法是很對的。根據這種態度，當我們研究一種經濟制度時，首先要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剝削關係；必須如此，才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秘”。所以我們要研究封建制度時，首先要看封建制度的剝削關係。

馬克思對於封建的剝削關係作了如左的說明：

“在一切經濟結構之一，如果直接勞動者仍爲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則所有權關係，必進而爲統治與隸屬的直接關係，直接生產者必成爲不自由者。此種不自由是可以由徭役勞動的農奴制柔化爲簡單的納稅義務……名義地主只有用超經濟的壓迫，去榨取剩餘勞動。”(資本論第三卷)

馬克思指出這種剝削方法是在於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種剝削方法就是封建式的剝削，而維護這

種剝削方法的制度，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農奴式的農民。”（馬克思恩格斯文匯第一卷）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定義。

我們來看，在春秋戰國以後，這種剝削方法——即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的現象，是否還存在呢？當然還存在着。

更進一步說，陶希聖先生所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封建制度崩潰的時候，有下列五個特徵：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是等級關係的崩壞。在封建制度之社會，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僕，臺（左傳昭十年）的等級關係，力期於差別之明瞭及分割的固定。最良的政治社會組織是：

“其卿讓於善，其大夫不失守，其士競於教，其庶人力於農穡，商工阜隸不知遷等。（左傳襄九年秦子襄贊晉國之言）

“民不遷，農不移，工賈不變，士不濫，官不滔。（左傳昭二十六年晏子之言）

“春秋以後等級關係頗為紊亂。各國有因嚴守等級

而號召反抗的，例如鄭：

“‘子孔當國，爲戴書，以位序，聽政辭。大夫諸司門子弗順……乃焚書於倉門之外，衆而後定。’（左傳襄十年）

“有貴族降爲阜隸的，例如晉的貴族‘欒，卻，原，狐，續，慶，伯，降在阜隸。’（左傳昭三年）有阜隸解放爲自由民的，例如晉的裴豹，因助范宣子殺欒氏力臣督戎，而爲之焚丹書（左傳襄二十二年）。此外陪臣專政如魯之陽虎，外卿弑君，如齊之田桓，這些現象極爲驚心動目。

“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而爲集權國家。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以基礎論，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齊如越，卻是商業都市國。各種社會力，除土地資本與商業資本以外，尚有貴族的競爭，平民的分化，都在此時表現於政治紛擾。

“貴族受商業的刺戟，或增加對農奴制的剝削，或爲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爲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關。國內交關固使貴族階級分裂，國外戰爭亦集大權於少數軍事貴族，因此有貴族階級的分解。莊園破壞，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小規模土地經營爲有利，一方面軍事貴族

爲確定收入，以土地爲標準而課稅（稅畝），於是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他方面土地買賣自由，使農民有喪失土地的事實。於是農奴分解爲自由農民及無業而售身的奴隸。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社會紐帶的鬆懈。

“商人資本即 $M—C—M$ 及 $M—M$ ，一方面促進土地買賣的自由，欲使土地加入交換過程，他方面促進農民及地主的破產與土地的兼併。商人資本的作用是剝削獨立小生活者以取利潤，而不直接參加生產過程。所以，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

“所以封建制度的分解，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

“然而戰國時代封建制度的分解，是由於農業生產力之增加。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成立，可以供給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韓非子描寫得好：

“王登爲中牟令，上言於襄王曰：‘中牟有士曰中章胥己者；其身甚修，其學甚博，君何不舉之？’王登一日而見二中大夫，予之田宅。中牟之人棄其田耘，賣宅圃，而隨文學者半。（外儲說）

“所以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是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二五五——二五八頁）

爲了要對於這個問題加以詳細研究起見，不惜時間篇幅，引用了這一大段文章。現在我們來對於陶先生所指出的五個徵象，一一加以研究。

陶先生以爲“等級關係的崩潰”，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一個徵象。關於這點，我們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等級關係的崩壞，是不是封建制度崩壞的徵象？第二，在春秋戰國時代，等級關係是不是已經崩壞？

如前所說，我們對於一種社會制度的觀察，首先應着眼於這種社會制度的經濟基礎，而不應從社會制度之外表的某種形態爲研究對象，因爲這種外表的形態，並不是構成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主要條件。封建制度的主要特徵，在於這個時代是自然經濟佔優勢，而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是獨立

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剩餘勞動,而不是在於等級關係。我們只能從經濟基礎上,即是從剝削方法中,才能認識某種社會經濟制度之一般的特徵。等級關係誠然是封建社會中的一個現象,但是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中存在着,即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陶先生以為等級關係是封建制度的第一個特徵,就犯了忽視主要條件的錯誤。陶先生更具體的指出所謂等級關係是指:王,公,大夫,士,阜,輿,隸,僚,僕,臺等。但是像這種等級關係,不僅在封建社會,即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有時也還存在着,例如為資本主義之祖國的英國,也有皇,公,侯,伯等爵級,在爵級之下,還有種種等級。雖然這種等級的名稱,與陶先生所舉出的王,公,大夫,阜,輿,隸,僚,僕,臺等不同,而其為等級則一;名詞上的分別,自然不能視為原則上的不同。

至於第二點。如上所說,等級關係在一切有階級存在的社會中都存在着,春秋戰國以後的社會組織中,自然不能消滅等級關係。這種等級關係,無論在漢,在晉,在隋,在唐,宋,元,明,清,都很森嚴地存在着;雖然等級的名稱不一定與春秋戰國時代相同,但如前所述,這種名稱上的區別,決不能視為原則上的不同。所以陶先生認為春秋戰國時代是

封建制度崩潰的時期，其所舉的第一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絕不能存在。

陶先生認為封建制度崩潰的第二個徵象，是“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為集權國家”。這個理論較之第一個似乎要充分一點，但也決不能以此為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

關於這點，我們也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的併吞而成為集權國家，這並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而是封建諸侯為維持其所屬領土內的軍民的生活的滿足及擴大其統治的慾望而起的掠奪的戰爭；所以戰爭的結果，雖然封建領地逐漸兼併而成為集權國家，而社會的經濟基礎根本就沒有變動，所以當一個封建諸侯兼併其他封建領土而建立集權的王國時，他又必須分封其羣下為許多部落的諸侯；陶先生也不否認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這種現象的存在，例如：“在中國古代，分封諸侯的典禮，有由天子授與茅土於分封者的儀文，表示指定的土地今後歸受封者的領有。這種禮節到漢代還是照行。”（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三〇頁）第二，我們還該指出，所謂“戰爭的連續，封建領地漸併吞為集權國家”，這種現象，並不是開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遠在夏末商朝周初，都有這種現象。據一般歷史的

傳說，夏末列國三千餘，商朝列國千餘，到周武王建國的時候，還有“大小國凡八百”，可見兼併之風，決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

一般的錯誤，以為在中國歷史上，建立統一的王國，是始於秦始皇，其實周武王建國之初，何嘗不是集權的，統一的？而且秦始皇的統一的政權，維持不到一世紀就土崩瓦解了。陶先生以為“戰國的國家，都是由‘兼小’成立的”。是封建制度的徵象，其實這不是事實，即如前所述，兼併不是始於那時，而且戰國時代，如趙，韓，魏三國，誰都知道是三分晉國而成立的，這不是‘兼小’，而是‘分大’，這又作何解？

總之，這種戰爭與兼併，既不是生產力發展的結果，所以無論如何的結果，都不能改變社會之經濟基礎的構造。這是陶先生以為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二個徵象，在我們看來是不能存在的。

至於陶先生以為“當時的國家，如秦，三晉，楚，燕，都是基於土地資本。如越如齊，卻是商業都市國”（見上引用文）及“周的末期，中國國內各民族各侯封，很不平均的各途其發展。幾個侯封裏面，商業資本主義已發達起來，最顯著的是齊。首先稱霸的，便是這資本主義的齊國。”（中國革命之

史的分析第三四頁)稱春秋時代的齊國爲資本主義國家,固然是錯誤,而以爲如越如齊,都是商業都市國家,也是不妥。關於這點,放在後面等論到商業資本與封建制度的關係時再說。

陶先生以爲“社會紐帶的鬆懈”,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這也是極不妥當。在這裏陶先生所謂的社會紐帶的鬆懈,是指“貴族階級的分裂”及“工農上升爲自由農民”這兩點。其實所謂貴族階級的分裂,原是封建制度的特徵,在封建社會中,貴族決不是始終統一的。因而貴族的分裂,也決不是始於春秋戰國時代。陶先生所謂“貴族受商業的刺激,或增加對農奴的剝削,或爲增加富力而行兼併;爲行兼併,於是有國外戰爭與國內交鬭。”關於戰爭與兼併,在前面已經說過,此處可以不必再說。至於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這一點更不能指爲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因爲在封建社會,農民原本是自由的,在前面我們會引用過馬克思的說明:“封建式的所有權……憑之以建立的社會組織,其中與直接生產者相對立的,不是古代的奴隸,而是小農奴式的農民。”在資本論第三卷中,馬克思更具體的指出奴隸時代的剝削制度與此種封建的剝削制度之不同,他說:

“此種經濟結構（新按：係指封建制度），與奴隸經濟，游牧經濟，都截然不同；奴隸工作，須藉助於他人的生產工具，且不能獨立工作。”

而封建的剝削方法，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的剝削對象，不是沒有生產工具，不能獨立生產的奴隸，而是獨立生產者的農民。所以農奴分解為自由農民，不僅不是封建制度崩潰的徵象，却相反，這正是封建制度的特徵。——這是陶先生所謂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三個徵象是不能成立的。

陶先生以為封建制度分解的第四個徵象，是“個人及社會階級對於社會再建之無力”。如果單是看這句話，那是很費解的，好在陶先生已經說明了所謂“個人及社會階級對於社會再建之無力”，是指“商人資本只有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而不能促進新生產方法”。這也是不對的。陶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以為春秋戰國時代“商人資本分解了舊社會制度”，即是破壞了封建制度，而且他根本過視了商業資本的作用。商業資本不僅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而且也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馬克思說明了社會進化的定律是：

“社會關係和生產力有密切的關係。人類得着新的生產力的時候，同時改變他們的生產方法；改進他們的生

產方法和謀生式樣的時候，同時就改變他們的一切社會關係。”（哲學之貧困）

這就是說，一切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纔能改進；必須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適應於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永久在流通過程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所以陶先生以為商業資本分解舊社會制度的作用，是封建制度的分解的第四個徵象，其理由之不能存在，也是很顯然的。

陶先生以為“士人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是封建制度分解的第五個徵象，我以為也是不確的。所謂士人階級，我總覺得這根本就不能成爲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照陶先生的解說，“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一方面使國家經濟力增大，他方面促進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國家經濟力大，可以雇用官僚。自由地主階級的成立，可以供官僚的材料。自由地主入商業都市，可以變爲士人，士人干祿，可以加入官僚組織。”由此說來，則地主，官僚，士人，三者有密切的關

連，所以陶先生在別的地方又說：“士大夫身分和地主階級的關係……地主和官僚的關係，也有無限的連鎖。雖有非地主的士大夫，但士大夫一入官僚，便成地主。雖有非官僚的士大夫，但對於農村和城市小市民，仍有支配的力量。在朝爲官僚，在野爲紳士。在鄉爲地主，入學從仕則爲士大夫官僚。因此，官僚的治理是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中國社會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在這裏，陶先生明明指出了“官僚的治理是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可見官僚是地主階級的附庸，決不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其理至明；但是陶先生還一再說：“封建制度破壞而有官僚。”（同上第一〇七頁）“官僚政府和農民的統一戰線，顛覆了封建貴族和封建國家。這個過程，發生在戰國爭雄時期，而完成在強秦一統時期。秦不是什麼資本主義國家。秦乃是官僚和農民國家，所以能夠一舉而掃滅殘餘封建國家的六國。”（同上第九一頁）

關於陶先生著作中一再提到的所謂士大夫階級（我覺得這個名詞是不對的），在後面還要加以分析。這裏我們必須指出，官僚決不是封建制度破壞以後才有，尤其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關於這一點，在後面也還要詳論。

陶先生以爲“秦漢以後，中國已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但陶先生又說：“中國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的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的生存賴賦稅……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通的利益。”（同上第五九——六〇頁）

陶先生的根本錯誤，就在以爲地主階級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所以他一再說：“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同上第十五頁）他把地主階級和封建制度對立起來，自然要弄出許多奇怪的結論來了。其實地主階級不僅不是破壞封建制度的動力，而且他本身正是封建制度的柱石。我們曾經一再引用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法的說明，是在“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

至於陶先生所謂：“集合戰國時代各國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我們可以知道封建貴族階級已經崩壞而治權漸歸到新起的官僚。……便可以說春秋戰國時代，舊封建制度已經破壞。”（同上第六頁）其實起用庶人爲卿相的事實，起原很早，決不是起於春秋戰國時代；不僅春秋戰國時代的寧戚

百里奚都是由私人而為卿相，即伊尹太公，何嘗不都是起自庶人？庶人雖然可以僥倖而起為卿相，但他不過是封建貴族的附庸，為封建貴族做事，決不是取封建貴族而代之——更進一步說，即使有起自庶人的卿相，漸漸篡奪政權，但這個時候，他本身就形成為新的封建貴族，並不會建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是顯而易明的事。

以上是簡略的答覆了陶希聖先生的封建制度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說的錯誤。在另一方面，我們還可以從事實上理論上證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十九世紀四十年代開始）以前，中國依然是一個封建國家，封建制度並沒有破壞。為要說明這一點，必須先說明商業資本的性質，及其作用。

一般人對於中國社會封建制度的觀察的錯誤，由於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例如拉狄克，他因為不了解商業資本的性質，因而簡直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他說：

“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因為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為得黃金，裝飾

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拉狄克：中國革命史）

如前所述，我們對於一種社會經濟制度的研究，應該從其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着眼，拉狄克的錯誤，在於他不從剝削方法（生產方法）上立論而從剝削者的出身及其剝削的目的上立論，所以要着“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的奇妙的結論。

一般的錯誤，就在認為商業資本的發展，足以消滅封建剝削關係，甚至認為商業資本可以代替封建制度而建立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一切的社會制度——政治，宗教，道德，法律，都是建築在當時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生產方法又是因生產力的發展而改變；必須是生產力發展了，生產方法才能改進；必須是生產方法改進了，然後舊的社會制度才會發生動搖，而適應新的生產方法的社會制度才能建立起來。商業資本只是在永久在流通中——商品交換的媒介中活動，所以他與生產資本不同，他本身並不是代表一種生產方法。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曾指出：

“商業資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自

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與社會一般經濟的發展，是成反比例的。’

所以商業資本的發展，並不是表現着生產方法有了根本的改變（生產方法的改變，自然可以促進商業的發展），所以牠不能破壞舊的社會制度，自然更不能創造一種新的社會制度。馬克思關係於這點，說明如下：

“商業及商業資本發達，到處使生產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增加，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變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原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的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作用，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及其內部的構造如何為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為轉移的，而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為轉移的。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展，常常歸結到奴隸的經濟；又依照這種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為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轉變為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

的奴隸制度。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展，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展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態決定的。……

“在十六十七世紀之中，因地理上的新發見，諸大革命之出現於商業中，並且很迅速的增加商業資本的發達；此等革命在促進由封建生產方法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過渡中，構成一種主要的要素，這是沒有疑義的；但是因為這種事實而產生的種種完全錯誤的見解。世界市場的突然擴大，流通商品的種類增加，歐洲諸國民間，佔取亞洲生產物，和美洲財寶的競爭，以及殖民地制度，對於破壞生產的封建制度，是有重大的幫助的。然而近世生產方法在他的第一時期中——在手工工廠業中——只有在中古時代，已經造出自己發達的條件之處，才存在的，例如試將荷蘭和葡萄牙比較一下。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分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充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的崩潰，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而這却是在已經造成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

法的基礎。在另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事驅策世界市場不斷的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而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哲學的貧困）

在封建時代，自然經濟佔着主要的形式，但是決不能說，在封建時代，沒有商品交換及貨幣流通的現象發生。有許多生活必需品，例如鹽，鐵，木材，藥材等，不是每個地方都有出產的，這就是需要一種交換來輔助自然經濟。由這種交換的發展，因而引起城市的發生；這種城市一方面作交換市場的中心，另一方面，即作封建諸侯固守的堡壘。手工工業的發展，使交換的範圍也因之而擴大，即是商業日益發展。商業資本的發展，侵入農村，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但是牠不能使生產方法有進一步的發展，所以整個的社會制度沒有走出封建制度的範疇以外。而且商品經濟的發展，雖然使農村自然經濟漸次發生解體的作用，可是進展的程度，是非常緩慢，在中國，自春秋戰國時代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帝國主義最初侵入中國時），農村中自然經濟還是佔着優勢。

我們要說明在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中

國還是一個封建國家的理由，除了一個基本的原則，即封建的剝削方式——名義上的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剩餘勞動——而外，最好舉出自然經濟之絕對優勢這一點來作證明。

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曾一再指出封建制度之特徵之一，即是自然經濟之強大。所以在這裏，我們很可以看出在十九世紀中葉以前，中國封建制度的確沒有破壞。

關於春秋戰國以後，自然經濟強大的優勢這點，陶先生也不否認。他以爲“商人資本非獨不能開闢海外市場，非獨不能整理國內市場，非獨不能發達資本主義生產制，並且不能充分發達貨幣經濟以代替自然經濟。”（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五頁）所以他承認“貨幣經濟復返於自然經濟的情形，在中國是常見的。”（同上）

在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一直到十九世紀中葉，社會經濟依然是自然經濟佔着優勢；貨幣經濟的不發達，物物交換的盛行，都是顯例。陶先生舉出漢代鑄錢甚多，即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二百八十億萬餘”。可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

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晉朝沒有鑄錢，而：

“太始中，河西荒廢，遂不用錢，裂匹以爲段數。”（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其餘州郡，則雜以穀帛交易。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

（同上）

而同時北朝雖置有錢幣，亦不通行。

“後魏初置太和錢貨，無所用也。”（同上）

宣武帝永平三年，雖鑄五銖錢，但：

“京師及諸州境或不用，或有止用古錢，不行新錢。”

（同上）

“河北諸州舊少錢貨，猶以他物交易，錢略不入於市。”（同上）

至於北齊神武霸政之初：

“冀州之北，錢皆不行，交易者皆以絹布。”

陶先生雖然舉出“隋唐宋三朝以來，錢量增加，鈔幣發達，銀兩流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四七頁），但同時陶先生又舉出下面的幾個例子，例如唐代：

“儀鳳四年，以天下惡錢轉多，令東都出遠年糙米及粟於市，別納惡錢百文，其惡錢令少府司農相知，即令鑄破。”（文獻通考錢幣考一）

又如唐開元二十二年：

“其年十月六日，勅‘貨幣兼通，將以利用，而布帛爲本，錢刀是末，賤本貴末，爲弊則深。教法之間，宜有變革。自今以後，所有莊宅口馬交易，並先用絹布綾羅絲綿等，其餘市買至一千以上，亦令錢物兼用。’”（同上）

由此可見在唐代社會，還是物物交換佔優勢而貨幣流通受到很大的限制。此外，我們還可以在唐宋時末的民間傳說，傳奇，小說，詩歌等各方面，看出在當時是自然經濟佔着極端的優勢。

至於元朝，則：

“所在郡縣，皆以物物相貿易，公私所積之鈔，遂俱不行，人視之若敝楮。”（續文獻通考錢幣考）

明朝雖然代有鑄錢，但其數也是很少。

清朝鑄錢的數目，較明朝為多，然而以人口平均起來，其數目也不能算多。順治康熙雍正三朝的制錢鑄造額如下。

年 代	制錢鑄造額(文)
1643年(順治元年)	73,663,900
1644年	433,751,760
1645年	624,823,960
1646年	1,333,384,194
1647年	1,449,494,194
1648年	1,682,424,230
1649年	2,097,632,850
1650年	2,521,663,850
1651年	2,488,544,460
1654年	2,413,879,080
1659年	280,394,280
1660年	291,584,600
1665年(康熙四年)	295,879,800
1671年	290,475,830
1676年	231,365,260
1681年	231,398,600

1686年	289,936,700
1691年	289,925,400
1696年	237,063,050
1701年	238,065,800
1706年	238,075,800
1711年	374,933,400
1717年	399,167,300
1721年	437,325,800
1722年(雍正元年)	499,200
1725年	675,160
1726年	723,528,000
1727年	746,304,000
1729年	756,856,000
1730年	1,048,759,660

以上可以看出自十七世紀四十年代到十八世紀三十年代，這差不多一世紀中，制錢的鑄造額最多的也不過二十五萬萬文，而且自一六五四年以後，反而逐漸減少，至一七二九年以前，這七十餘年中，制錢鑄造最多的也只有七萬萬左右。當時人口即使以二五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即鑄錢

最多的年分，每人平均還不足三文。

自一八〇〇年起至一八三一年，這幾十年中的制錢鑄造數目，每年如下：

北京	899,156,000
直隸	60,666,000
江蘇	111,804,000
江西	41,928,000
浙江	129,600,000
湖北	84,000,000
陝西	87,360,000
陝西(附加)	43,204,000
四川	179,259,000
四川(附加)	14,868,000
廣東	34,560,000
廣西	24,000,000
雲南	94,860,000
雲南(附加)	84,924,000
貴州	94,860,000
山西	17,472,000

伊犁	1,122,000
合計	2,052,219,000

這個數目雖然較一六五四年以後，一七三〇年以前這七十餘年間較多，但反不若一六五四年以前幾年。當時人口即使以三〇〇,〇〇〇,〇〇〇人計算，每年所鑄的新錢，每人平均不足七文。

在這裏我們應該注意一點，即也許有人以為當時貨幣是以銀兩為本位，制錢不過是輔幣，所以制錢鑄造額雖少，不足以證明貨幣經濟之衰落。此說是似是而實非。因為當時雖然銀錢兩用（銀兩只有碎銀紋銀而沒有銀幣），可是一般通用的單位，是制錢而不是銀兩。舉例來說，當時貨物的價值是以制錢計算的；官吏的新俸，工農商人的薪水，都是以制錢計算，可見制錢實在是貨幣流通中的主要單位。所以制錢流通的數量之少，可以證明貨幣經濟之不發達，而自然經濟之強大。

至於當時主要的剝削形式，完全是如馬克思所說的“名義地主以超經濟的壓迫，榨取獨立生產者（農民）的剩餘勞動”。農民是生產工具和勞動方法的佔有者，但是地主則利用土地所有權，加農民以極殘忍的壓迫，即馬克思所謂“超

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所謂超經濟的壓迫，具體的事實如：

- 1• 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往往超過百分之五〇以上，乃至百分之七〇至百分之八〇；
- 2• 租額以外，還有其他各種農民對地主的必需的貢獻；
- 3• 徭役制度；
- 4• 地主對農民的統治特權；
- 5• 等級關係的森嚴。

關於第一點，雖然因為我手頭沒有材料，不能具體的指出春秋戰國以後，十九世紀中葉以前，這二千多年間的中國的租佃制度的詳細情形，但地主對農民殘酷的壓迫，“超經濟”的榨取，是無可否認的，這點陶先生也是承認。陶先生雖然不承認地主階級用“超經濟”的壓迫來榨取農民的剩餘勞動是一種封建的剝削，但他也承認“但在這種私有土地制度成立以後，兼併的現象實屬可驚。”（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一九頁）而且他曾舉出下列各例：

“至秦則不然，……小民……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前漢書董仲舒傳）

“秦為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兼併起，貪鄙生

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隸之市，與牛馬同欄，…漢氏減較田租，三十而稅一，…而豪民侵陵，分田劫假，厥名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王莽傳）

“今漢人田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富強人佔田踰侈，其賦大半官受百一之稅，而入輸豪強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東漢會要荀悅言）

“井田廢，田非耕者之所有而有田者不耕也。耕者之田資於富民，富民之家，地大兼廣，阡陌連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驅策，視為奴隸，……田主日累其半以至於富強，耕者日月秋收，以至窮餓而無告。”（文獻通考田賦考）

陶先生更進一步的說明：

“此外還有完全封建式的廣大的地租——押租，押租大抵是用現金的。正租還是用現物的多。我們要知道今日的中國，是自明代起通行銀兩以後的中國，是自清代起通用新式鑄貨以後的中國，而現物地租仍是通行的方式，則清明以前，遠至秦漢，是全用現物可知。”（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五一頁）

現物地租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在中國，現物地租一直到現在，還普遍盛行於各地，明清以前，自然更不用說了。

以上所引據的種種說明，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以來，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完全是“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因而完全是封建式的剝削。

陶先生不僅指出了現物地租，而且指出了徭役勞動及特殊的貢納義務，依然存在於春秋戰國以後。他說：

“地主與佃戶的關係，是現物交納的關係，當然與現金地租制度的主佃關係不同。佃戶所負擔者是現金，則其與地主的關係是純粹貨幣的契約關係。佃戶所負擔者是現物，則其與地主的關係，便沒有那樣單純。一定的徭役勞動，特殊的貢納義務，尚存在於主佃之間。因此，主佃之間尚保持有封建的意義。”（同上第二〇二——二〇三頁）

照以上主佃之間的關係看來，可以知道自春秋戰國以來，乃至最近，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完全是一種封建剝削方式，而擁護這種剝削方法的制度，當然是封建制度。陶先生的矛盾，就在一方面承認這種主佃之間的剝削關係，“尚

維持有封建的意義”，但另一方面，又否認封建制度已經分解於春秋戰國時代。

恩格斯更曾指出封建制度的主要形式之一，在都市有行會的存在（見“反杜林論”）。我們來看，中國在春秋戰國以後，還有沒有行會的存在？這是事實問題而不是玄妙高深的理論問題。如果我們不否認事實，就該承認自春秋戰國以後，一直到滿清末年，行會制度普遍地存在於中國。這也是可以作為封建制度沒有崩潰的明證。

陶希聖先生的錯誤，不僅在於否認春秋戰國時代封建制度已不存在，而且他很奇怪地把經濟上的與政治上的統治階級劃分開來。他說：

“但是封建國家破壞以後……在經濟上，地主階級是此後的統馭階級；在政治上，官僚是此後的治理階級；溝通這兩種人物的，是廣大的士大夫身分。”（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第九二頁）

陶先生把官僚也看成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而把他與地主階級對立起來。其實政治法律等等，都是建築在經濟基礎之上，決不能把政治制度與經濟基礎對立起來。官僚不過是統治階級的一種臣僕，決不是外族統治階級的另一種社

會階級。

陶先生不僅把官僚看成是一個階級，而且在官僚與地主之間，還有一個士大夫階級。陶先生的全部的理論，對於所謂士大夫階級特別重視。他又指出了所謂官僚政治的統治者是士大夫階級：

“秦漢以後，中國已經由封建制度進入官僚政治時期。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五九頁）

在這裏，與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話，顯然矛盾；在前面，陶先生把官僚與士大夫看做是兩個不同的但可以接近的社會階級；在這裏，他又把官僚與士大夫混合起來。但這些枝節問題，在此地我們可以不必深究；我們所要問的，是構成陶先生的中國社會觀的中心理論的所謂士大夫階級，究竟是什麼東西？

陶先生以為：

“中國的士大夫階級身分還不止於一個社會層。自封建貴族階級破壞以後，地主階級是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地主階級和士大夫官僚之和，恰與封建貴族階級相等（新按：這句話是十分費解，簡直不懂）。若包括地主

和官僚的兩端，則以士大夫身分爲中國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亦非錯誤。”（同上第一五頁）

照這樣說來地主階級是社會的一個基本階級，而士大夫階級亦可稱爲社會的基本階級；這是什麼說法的呢？這兩個社會的基本階級是不是對立的呢？照陶先生的說法，不是對立的，而且並立的。那末所謂士大夫階級的經濟基礎究竟是什麼呢？他與地主階級究竟有什麼分別呢？陶先生自己提出了一個問題來：“何以中國士大夫階級能夠自成一階級呢？”他的答覆是：

“第一，因爲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個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有門第的超越，有知識的優異，對於庶民擁着一種身分的信仰。

“第二，因爲這個階級的生存和封建貴族的生存是一樣的寄託在農民之上。（一）個人的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乃有餘暇以從事於知識的追求和政治的活動。（二）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爲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於勞苦農民之前。（三）階級的保存賴有身分的封鎖。門第不相當者不通婚，而門第相當者相結納。譜牒之學，便是封鎖身分的

武器。(四)階級的流通,又用科舉或選舉制度,以士大夫階級思想的定型,吸收庶民中優秀分子,使加入士大夫階級。”(同上第三六——三七頁)

我們知道,一個階級的存在,必然有牠的經濟基礎。所謂“門第的超越,知識的優異”,決不能成為構成一個階級的原因和基礎。陶先生所謂“這個階級是一種擴大的身分階級”這種抽象的定義,不待說,這並沒有把這個階級的基礎說出來,因為單靠身分,決不能形成一個階級。而且身分必然有其經濟的基礎。據陶先生的解說,又明明是“個人生活是地主的生活,向農民收取租課以自奉。”這明明是地主階級。但陶先生又偏偏要稱之謂士大夫階級,以其和地主階級分開,這實在是太把階級這個名詞濫用了。至於所謂“階級的活動是在政治地位的取得,向農民收取賦稅,以為俸祿,乃能運用政權,威臨于勞苦農民之前。”這又明明是馬克思所謂“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的封建剝削方式。陶先生一方面既認定這種剝削方式是封建的剝削:

“……所以士大夫階級這種觀念生活者便是經濟上的剝削者,在封建制度破壞以後,便自己去統治者——官

僚而現身。士大夫階級的剝削，即是封建的剝削。”（同上第一二頁）

可是另一方面，卻又肯定封建制度已經破壞。由這種奇妙的理論而生出的奇妙的結論，就是“政治的力量由貴族階級移到了士大夫階級”。士大夫明明是一種寄生分子，明明是封建地主階級的附庸，但是陶先生一定要把按上一個階級的定名，使牠和封建制度對立或並立起來。

陶先生既不能指出士大夫的獨立的經濟基礎（構成一個獨立的階級所必要的條件）——陶先生所指出的，完全是地主階級的附庸生活——而陶先生所說的士大夫的起源，也十分不妥。

陶先生這樣的說明了所謂士大夫階級的歷史的起源：

“……中國歷史便由此轉入七雄爭長的戰國時代。在這個過程中間，貴族階級相隨崩壞。到了戰國時代，庶人起而為卿相的事情很多。貴族要保持其地位，也相趨於養士，於是貴族中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成一個士大夫階級。這個階級在戰國末期，有突進的勢力，如信陵君的專魏，孟嘗君的振齊，燕太子刺秦，都是這個階級的浪漫的鬥爭史，而信陵平原的勾結，已目無魏趙兩君。

這個階級的成分是貴族，知識分子及遊俠。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維持這個階級地位。’（同上第三五頁）

照此說來，所謂士大夫階級者是由“貴族的進步者與庶人中的優秀者”混合而成的。這樣混合而可成爲一個階級，已經是奇談。所謂庶人中的優秀者，這優秀兩字，當然是指智識程度而不是指財產關係，所以這個階級的構成，簡直沒有經濟基礎，僅僅是“知識崇拜，英雄崇拜及身分崇拜”作爲階級構成的基礎。不待說，這種階級理論，在社會科學的領域中，是不能存在的。

總之，以爲在春秋戰國以來，封建制度已經破壞這種理論，固然是錯誤，而陶先生毫無根據地指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士大夫是一個獨立的社會階級，也是一個錯誤。這個錯誤不僅是名詞上的不同，而是因爲這種名詞上的錯誤，可以混亂一般對中國社會史的觀察的視線，最重要的是使人重視這僅爲封建地主階級之附庸的所謂士大夫階級，因而反忽視了地主階級的主要作用。所以這個名詞上的錯誤，我們必須要把牠弄清楚才行。

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說的錯誤，已

如上述。那末中國封建制度究竟於何時開始破壞的呢？

我的答覆是：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即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對中國開始商品侵略以後。在這裏我們必須注意，中國封建制度雖然在十九世紀下半期已經開始破壞，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主要的作用。

我們說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其理由與事實如下：

自從帝國主義勢力侵入中國以後，商品經濟的侵略，破壞了自然經濟佔優勢的農村經濟。在帝國主義沒有侵入以前，中國的商業資本雖已有相當發展，但是商品經濟不能壓倒自然經濟，這是一個事實。農村生活是一種自足自給的形態，農民的日常用品，除了鹽鐵木材藥材這幾項以外，差不多都是由農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舉幾種日常用品來說：米麥雜糧，幾乎是每個鄉村自己都有生產，因而不需要向外購買的。又如衣服的原料，最普遍通行的是棉布。但是因為中國土壤幾乎到處都適於種棉，所以棉花原料幾乎到處都有。例如在浙江，雖然不是著名的產棉區域，但是各縣各地都有棉花種植。原料既到處都有，而“男耕女織”，又是中國的古訓，

幾乎男女老幼都能紡織，所以棉布的生產各地都有。其次如綢緞，雖不如棉布之普遍，但在江浙閩粵川魯贛鄂各省，都有絲繭生產，因而都能製造綢緞。又如燃料肥料，以及一切日常用品，以前幾乎各地都能自給，所以能夠維持一種半獨立的狀態。總之，那時是自然經濟優於商品經濟。但是帝國主義商品侵入以後，農村中的經濟關係是轉變過來，成為商品經濟支配自然經濟：外國的棉紗棉布代替了農民自己生產的土布土紗；外國的煤油代替了農民自己製造的植物油燃料（菜油及豆油等）；外國的肥皂代替了農村到處都有的皂筴與農民自己製造的灰鹽；外國的火柴代替了原始的取火方法——火刀與火石；外國的琉璃器具代替了一切舊式的陶器磁器木器鐵器這些日常用品；外國的捲烟代替了農村中到處都可種植的粗烟；外國的‘洋紙’代替了原來的粗紙；外國的‘洋糖’代替了甘蔗汁；……總之，外國的商品代替了一切農民自己生產的東西，使農民不得不離開了這自給自足的半自然經濟的樂園，來依賴帝國主義國家的商品供給。

復次，因為帝國主義的侵入，使物質的生產方法也起了很大的變動，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在上海天津這些大都市開始出現。無論牠的基礎如何脆弱，但他總是一種資本主義

的生產方法。因為資本主義工業組織的出現，使社會上除了封建地主階級以外，有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的發生。資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革命運動的興起，給了封建地主階級一個打擊，而使社會起了很大的變動，更其主要的事實是無產階級勢力之形成與發展。農村的半自然經濟開始破壞以後，農村的階級分化日益明顯，因而階級鬥爭不僅在都市中，而且在農村中猛烈的發展。這些現狀都足以說明封建制度在這種極端的變革中，的確已經開始破壞。這不必從理論上加以說明，因為嚴酷的事實為我們證明：新式工廠的興起，工業都市的發展，有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意識形態的發展，彼此階級對立的森嚴，這些都是不可否認的不容掩飾的鐵證。所以以為中國封建制度在春秋戰國時代已經破壞，固然是絕大錯誤，而以為一直到現在，封建制度還是健全無恙，毫無變動，也是錯誤。

顧孟餘先生完全否認這些事實，他與布哈林所說的那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盲目的說：

“……自封建制度崩潰後直到現在，沒有改變。最奇怪的，就是雖然和西洋通商將近百年，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而中國的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

改變。”（前進第十四期上公孫愈之文——公孫愈之即顧的化名。顧先生也和陶先生一樣，是肯定中國封建制度是破壞於春秋戰國時代的。新註）

顧先生真不愧是“以彼之矛，刺彼之盾”的勇士！他一方面說“政治上經濟上受了很大的影響”，另一方面，又說“社會的經濟的構造，依然沒有根本變動”。這種自己打自己嘴巴的荒謬理論，實在可以不必加以批判。我們現在是要問：中國封建制度既已於帝國主義侵入時開始破壞，然則到現在已經破壞到任何程度呢？

蘇聯反對派的重要領袖之一的拉狄克，他根本否認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這在前面已經說過了。反對派的領袖托洛斯基，也和拉狄克一樣，以為封建殘餘在中國已經沒有何等意義。

在中國國內，機會主義的領袖陳獨秀先生，他雖然不完全否決中國“有所謂封建勢力”，可是他以為：

“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所以現在農村中主要的矛盾，已經不是反封建勢力的鬥爭，而是反各種各式的資本主義的鬥爭。”

又說：

“其實中國封建殘餘，經過了商業資本的長期的侵蝕，自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以後，資本主義的矛盾形態，伸入了農村，整個的農民社會之經濟的構造，都是為商品經濟所支配，封建階級和資產階級的根本矛盾，如領主農奴制，實質上已久不存在，因此剝削農民，久已成為他們在經濟上（奢侈生活或資本積壘）財政上（維持政權所必需的苛捐雜稅）的共同必要。……”

“而且中國一九二五年至一九二七年的革命，無論如何失敗，無論如何沒有完成其任務，終不失其歷史意義，因為他已經開始了中國歷史的一個大轉變時期；這一轉變時期的特徵，就是社會階級關係的轉變，主要的是資產階級得了勝利，在政治上對各階級取得了優勢的地位，取得了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增加了他的階級力量之比量；封建殘餘在這一轉變中，受了最後的打擊，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至少是在失去對立地位的過程之中，變成殘餘的殘餘；牠為自存計，勢不得不努力資本主義化，就是說，不得不以全力爭取城市工商業的經濟勢力，做他們各國區域內的統

治基礎。”(陳獨秀致中共中央的公開信——一九二九年)

關於陳獨秀先生文內的所謂“取得帝國主義的讓步與幫助”及“資產階級得了勝利”這兩點，當另外作文詳論，現在我們要就本文的範圍內，提出兩點來討論：

第一，陳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封建剝削已經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這究竟是不是事實！

第二，陳先生以為“封建殘餘……失了統治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殘餘的殘餘。”又究竟是不是事實！

其實陳獨秀先生所謂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不知是根據什麼理由？如果說一句開頑笑的話，我們還不如說“陳獨秀先生自己在努力資產階級化”，中國地主階級做夢也沒有想到要資本主義化，除非陳獨秀先生自己現在已經變成了一個地主階級。中國土地的分配，是中小地主佔優勢，這固是誰都知道的，但這不僅不足以說明“地主階級努力資本主義化”，而且地主愈小，對農民的剝削愈加殘酷，愈加是一種封建的剝削。這種殘酷的剝削，完全符合於馬克思對於封建剝削方式所下的定義。下面這些事實可為

明證：

第一，地主階級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〇到百分之七〇，從前歐洲封建地主徵收農民的數目，沒有這樣厲害。徵收農產品，就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歐洲封建時代，極普遍地採用，到了商品經濟發展，才有部分的變為以貨幣代表的形式，現在這種形式，在中國有些地方也發生了（即所謂折租），但還是很少，而是徵收農產品的佔主要形式。

第二，租額以外的貢獻，如廣東的田信鷄，田信米，湖南的年鷄年肉，江浙等處的節禮等，都是佃戶對於地主的不可或缺額外貢獻。遇有新產物收成，無論是黃豆青菜麥子瓜果等，佃戶都要無代價地送一些給地主。

第三，徭役制的殘留，如湖南的應工，江蘇的送工等。現在湖南湘潭的應工，每月八天，江蘇的送工，每月五天。至於四川雲南陝西等處，還有更長期的勞役，並且純粹封建的土司制度，都還存在。

第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也不亞於以前歐洲的形式；地主有民團，保衛團等武裝組織，無法庭，有監獄，可以自由審判，處罰，甚至屠殺農民。

第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各省通有的一句話，所謂“東佃父子”，把這個關係表現得非常清楚。一般的情形，地主與佃戶不通婚姻；地主有婚喪喜慶的事，農民全家都須去服役，不僅沒有絲毫報酬，而且還要送禮。甚至農民到了地主家裏，不能坐在凳上，只能屈坐在地下的情形，都還存在着。

這種現象都是地主利用土地所有權關係，對農作一種超經濟的剝削。這極顯明的是封建剝削方式；這種封建剝削方式現在在中國各處佔着主要的統治地位。這是不可否認的鐵一般的事實。可是不幸陳獨秀先生竟也墮落到與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而說“封建剝削已不是農村中的主要形式”。

再回轉來說，土地可以自由買賣，這固然是一個事實，但是單就土地可以自由買賣一點，決不能就肯定地說是“資本主義化”。土地可以自由買賣的結果，土地依然集中在地主階級手中，地主階級依然是利用他的土地所有權對農民加一種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這何嘗是資本主義化？即使有一部分兼併在商業資本家手中（這當然是一個事實），但他還不是一樣地從農民身上加一種超經濟的壓

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根據上述馬克思對於土地關係的解釋，即主要的是要看土地所有者採取何種剝削方式。現在中國土地雖然可以自由買賣，但是土地所有者對於農民所取的剝削方式，完全是一種封建的剝削方式，所以決不是如陳獨秀先生所說，“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

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在中國除了滿洲一部分地方外，可謂絕無僅有。滿洲的農業經濟比較進步，是由日本的經營，那是又當別論的。

從海關的報告中，可以看出自一九一三年到一九二八年這十幾年間，農業機械的進口，有如下表：

年 代	價值(單位海關兩)
1913年	112,700
1916年	204,520
1918年	164,188
1920年	1,004,277
1921年	1,192,404
1922年	695,732
192 年	304,233
1 24年	209,977

1925年	161,288
1926年	511,540
1927年	665,976
1928年	743,364

如果我們不按其內容，單照這個數目看來，每年農業機械的進口，也值數十萬兩，雖然在三萬幾千萬人從事於農業生活的中國，這是一個非常之少的數目，可是也不能說中國絕無資本主義的農業經營了。但是實際呢？

在這每年進口的農業機械中，有百分之六五乃至百分之七五是輸入滿洲的。如上所述，在日本經營下的滿洲，是當別論的。

剩下的百分之三五，乃至只有百分之二五，其中有一部分是殺牛機器。這些新式殺牛機器，只是在那些大都會中，例如上海天津漢口廣州汕頭青島及其他都市中才有，在農村中是沒有的。像這種只有供都市採用的殺牛機器，無論他每年的進口增加到如何可驚的數目，與整個的農業經濟毫無關係。有一部分是由大學的工科農科及農業工業專門學校買去參加使用的，只有一小部分，有少數幾個農業公司採用。

我們再來看看，這所謂幾家農業公司是怎樣的情形？

只有在江蘇，還有二三家農業公司。這幾個農業公司，在開始創辦的時候，的確是想應用機械生產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例如已故的張季直在南通海門等處所創辦的農業公司。但是他們這種企圖，已經由事實證明其失敗。因為在工業不發達，在市場為國際帝國主義所支配的經濟落後的國家，要使農業資本主義化，一定要遇着許多困難，甚至完全不可能。因為第一，要創辦一種以機器生產的大規模的農業事業，需要鉅額的資本，集中鉅大面積的土地。有中國，土地既分割得非常零碎，而資本的積聚的過程，又非常的緩慢；而且投資於農業，比投資於工業，更是沒有把握，誰也不願意以其財產冒險投資於農業經營，這是顯而易明的事。第二，新式的農業經營，其生產工具（新式機械），其技術人材，都必須依賴外國，耗費很大。第三，現在中國市場完全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農業生產品也是如此，例如在國際棉業市場蕭條的時候，中國的棉花生產就要受到極大的限制。中國本國的工業不能發展，農業原料的生產，主要的是依賴輸出外國，因而不能不受國際市場的支配，而使農業生產不能充分發展。第四，中國軍閥的橫暴，戰爭之不斷的發生，土匪的殘

酷的騷擾，使中國沒有一個地方能夠安寧，自然是農村中比都市中更危險。農村的安寧，在中國是沒有一點保障的。如果在農村中經營了一個廣大的農場，無論在什麼地方，無論在什麼時候，都有受戰爭，土匪，軍隊的蹂躪，以至完全破壞的危險。第五，因為中國目前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特別是農業勞動者；因而勞動力的代價非常低廉，用鉅額的貨幣去購買新式農業機械以從事生產，也不足與廉價勞動競爭，所以農業機械化就受了絕大的障礙。

因為這許多原因——自然還有其他比較次要的原因——使一般擁有財產的人，覺得與其投資於危險而不可靠的新式農業經營，反不如投資於收買土地，佃給農民，收取田租，及放高利貸之為有利而可穩妥。所以地主階級一有餘資，即用來收買土地，租給農民，或放高利貸，而不願意投資於提高農業生產。

理論與事實是完全符合的。上述的這些困難，使除了滿洲以外的中國少數幾家農業公司，均遭了慘酷的失敗。

第一是因為沒有集中的鉅大面積的土地，所以進行非常困難。張季直利用他的政治勢力，藉封建軍閥（如當時齊燮元孫傳芳）的掩護，很強暴的無理的強奪了許多民田。這

種方法已經完全是封建式的兼併，而不是資本主義的文明辦法了。又因為上述的種種困難，使這些農業公司不能發展起來，現在這些農業公司雖然沒有完全關閉，可是牠已經不是經營機械生產，而是把公司中的大部分的土地——甚至可說是全部的土地，分租給農民，從事一種幾千年傳留下來的舊式方法的生產，而公司從農民收取田租——依然是土地所有者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身上，加以超經濟的壓迫，而奪取其剩餘勞動。而且這個“公司地主”（這個名詞是非常之適當的）比個人地主更凶暴更殘酷的剝削農民。這個“公司地主”有自己的武裝，有自己的法庭與監獄，可以任意極殘酷的壓迫農民。這純然是一種封建剝削。所以這些農業公司的存在，其意義不過是一種集團的封建剝削，決不是一種資本主義化的農業生產組織。聽說江蘇海門的那家農業公司，在當時開辦時曾以鉅大的代價買了幾架農業機器，後來因為計劃失敗，土地分租給農民，於是這些偉大的機械有“英雄無用武之地”之苦，所以有的機械已經卸下來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有的因為不能改裝作別的工業機械，所以只得任其廢擱，現在都已生滿了鐵銹，絲毫不能轉動，勢將成為廢鐵了。

可見陳獨秀先生以爲中國地主階級已經努力資本主義化並不是事實——即使有極少數極少數的個人作這種勇敢的嘗試，也是早已失敗了。

至於第二點，即所謂封建殘餘失去了全國的中央政權形式，失去了與資產階級對立的地位，變成了殘餘的殘餘，同樣也不是事實。在這裏，我們不必舉出長篇的理論，只要問：現在的中央政權形式是資產階級的嗎？封建軍閥已經消滅了嗎？封建割據的局面已經打破了嗎？鄉村的政權已經由豪紳地主手中奪過來了嗎？當然不是的！

中國工業的發達，是不用說明就可以知道的。工業經濟的衰弱，就是表示封建勢力之強大。只要不和顧孟餘先生一樣，“以一塊黑布來包着眼睛”，就不能否認封建殘餘還是佔着強大的優勢。

在前面所引用的陶先生的著作中，他很明白地寫着“封建制度已經崩潰，封建勢力還存在着，”可是在陶先生最近給我的信上所說，他是更進一步的連封建勢力的存在，也加以否認了。關於這點，在上面答覆陳獨秀先生的見解中已經說過了。

在某種刊物上，我們還看到有人引伊里基爲護符，以爲

伊里基是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的。這真是絕大的荒謬！

伊里基決沒有否認中國有封建制度。正是相反，他在論中國土地關係的時候，指出這種土地關係是建立在封建剝削之上。例如他那篇有名的論文“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權主義”中，曾說：

“……在落後的農業經濟的與半封建的中國，在客觀條件上，數萬萬人民生活感受的只是歷史上一種固有形式的壓迫與剝削，就是封建制度。封建制度是建築在自然經濟與農業風俗統治的形式上；在某種形式上，使農民附屬於土地，即為中國封建制度剝削農民的源泉，所有的封建諸侯與君主，都是這種剝削制度的政治表現，而君主是為此種政治制度的一個首領。”（伊里基全集第二卷上册）

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目前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即是徹底的肅清這種封建殘餘。

〔近來與陶希聖先生討論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彼此信件往返，總覺得所談不甚詳細。而這個問題又是目前關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解剖中重要部分之一，故特抱病寫成此文，以求陶先生及讀者指教。〕

作者 一九三一年二月十六日深夜
寫於揚子江盡頭一病院中

華 僑 概 況

何 漢 文 編

編者是個專門研究經濟的人，以華僑關係中國經濟問題之前途，至為重大，故編著此書以作研究中國經濟問題之參考資料。本書分述各國華僑狀態，以現狀為經，歷史為緯，使讀者對華僑盛衰之跡瞭若指掌。資料豐富，論斷精確，末附圖表方案等二十餘篇。現已出版。

實價大洋一元

在“戰場”上 所發見的“行尸走肉”

嚴靈峯

——一些“小小”的常識問題，質之於朱其華先生。——

我在讀了國光社出版的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之後，在中間不僅發現了關於“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同時在那“戰場”上又發現了“行尸走肉”的理論。

素好文字論爭的我，對此有歷史意義的思想上公開討論，當然是躍躍欲試的；可是，這個“戰場”所交攻格鬥的卻

是歷史問題，而是十分複雜而又困難解決的“中國社會史”問題，“暫時”便不得不迫使我減少了奔赴“戰場”的勇氣。因為，我當前正在從事於研究和寫作“資本主義以前各時期的中國社會”一本小冊子的努力之中，在我個人未得肯定的結論之前是不願意輕率將事和隨便發表意見的；這樣，與其說，我要“養鋒蓄銳”，毋甯不客氣地說，我是由於“膽怯”！

因此，我只得提出一些於我所不能了解的“小小”問題，質之中國社會經濟研究家的朱其華先生：

聽朱先生說，他“根據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則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問題，可得如下結論：

- (1) 中國封建制度破壞於十九世紀中葉以降；
 - (2) 但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中，封建殘餘佔優勢；
 - (3) 因而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是徹底地破壞封建勢力；
 - (4) 封建制度之主要根源，在於農民附着於土地，而地主得從獨立生產者(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所以徹底的破壞封建勢力的主要方法，是土地革命。
- “這也就是我的見解。
- “另外還可以舉一個例子出來，即自然經濟的優勢是封

建制度的特徵，而中國在漢以降，自然經濟依然還佔着優勢。”（讀書雜誌第一卷第一期關於中國的封建制度 p. p. 3—4）。

這是“社會科學分析與估計”很難相信的一個“結論”！

然而，不幸朱先生的“論敵”陶希聖先生固然在他自己的方法上對朱先生有個很廣泛的指摘，但始終沒有看到朱先生這個“結論”的一塌糊塗；陶先生可說一拳只打到朱先生的“眉毛”，并不會打到他的“眼睛”！

我在此地不說，中國封建制度始於何時或開始崩潰於何時，因為，這個會關涉到歷史問題。我卻喜歡在朱先生認為“社會科學”的“結論”中拿些小問題來研究研究。

在朱先生的“結論”中我所發現的：

第一，朱先生承認中國封建制度在十九世紀便已“破壞”了；因為已經“破壞”了的，所以，剩下來的祇有“封建殘餘”；這是我們從朱先生的結論中在邏輯上與以歸納的結果。

第二，在現時中國，這個“封建殘餘”却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佔優勢”！

這個“優勢”是指“數量”而言呢？或是指“質量”而言呢？

抑是還指別的其他而言呢？我以為不管在“數量”上說，或在“質量”上說，或別有其他根據而說；“殘餘”可“佔優勢”，不但在事理上過不去，即在邏輯上也說不通。因世界上的一切事物，既可“佔”了“優勢”，那將不成爲“殘餘”的了！

第三，朱先生認定現時中國革命主要的任務是澈底地破壞封建勢力；若由他的前提，中國封建勢力，只是在十九世紀中葉以降便已破壞了的“封建殘餘”勢力，那也不外說，澈底地破壞“封建殘餘”勢力乃是“現時中國革命的主要任務”；破壞“殘餘”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那可說是聞所未聞！

第四，朱先生以封建制度主要的根源，是在於地主能夠從農民身上榨取“剩餘價值”。農民在封建制度下是附着於土地，所以，要澈底破壞封建勢力的方法，便是“土地革命”。

可惜，朱先生並沒有向我們明白指出，“土地革命”主要的目的到底是要農民離開於他們所附着的土地呢？抑是使地主再不能從農民身上榨取其所謂“剩餘價值”呢？或者還有其他作用呢？

這裏有個常識問題，即在封建制度之下有否“剩餘價

值”這個問題；假使，在封建制度下，地主對於農民所剝削的是“剩餘價值”，那麼這種“奇怪”的封建社會不但建立在商品生產的基礎上面，而且建立在“價值”和“剩餘價值”生產的基礎上面；那所謂“自然經濟的優勢”者甯非“自相矛盾”！

我們以為“價值”是個歷史的範疇，不是任何時代都有的；“剩餘價值”也是一樣，牠必需是資本主義制度下的產物；也只有資本主義制度下纔有發展這個“剩餘價值”的概念。朱先生是社會經濟專家，他所研究的經濟理論當然是很淵博，我想這個從封建制度下所榨取的“剩餘價值”，他一定有其理論上的根據(?)嗚呼，哀哉！

土地革命若果只限於解除農民脫離中世紀封建制度的束縛，這無疑義的，牠的主要任務是“破壞封建勢力”。假使，土地革命可以進到推翻“剩餘價值”的“榨取”制度，那怕，這種土地革命，就不會以“破壞封建殘餘勢力”為其“主要任務”了！

我自從在中國社會史論戰的“戰場”上，很不幸的發見了“行尸走肉”的理論之後，竟然欲作三日之嘔！這也是和陳仲子一樣，吃了醜醜之肉以後，又不得不出而一吐之。吐出來的東西僅僅是：

1. “殘餘”可“佔優勢”嗎？
2. “破壞殘餘勢力”可成爲“革命的主要任務”嗎？
3. 封建社會的基礎是建立在榨取農民身上的“剩餘價值”嗎？

這些從胃裏翻出來的髒東西，雖然帶些“酸”味，但我總希望高明的朱先生能夠舉以敏捷的化學分解，俾可以使一般人明白，這裏所含的酸素有多少是從“行戶走肉”所反應而來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三日於上海。

文 學 論

夏目漱石著

張我軍譯

作者夏目漱石爲日本第一流之文學家，以謹嚴的態度，科學的方法，統觀世界文學，求其共通之原則。立論精確，使讀者不但能明瞭文學究爲何物，其內容如何，且進而引起讀者對於文學作更進一步研究之興趣。此書實爲文學研究者及創作者必讀之書。書前有豈明先生及徐祖正先生之序文，對此書有真確之評贊。

中國經濟的分析

孫偉章

自序

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2. 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3. 中國農村經濟
4. 中國既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尚有封建勢力呢？
5. 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學批判

自序

中國過去革命的失敗，現在革命陷於沒有出路，此不是偶然的事情，乃必然的結果。革命的失敗，由於策略的失敗，

策略的失敗由於論理的錯誤。革命理論，基於經濟的分析，中國無產階級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大錯而特錯。或如新思潮派之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則陷於資產階級的意識，而不是無產階級和馬克思主義的意識。由此一錯誤，遂輕視無產階級革命的能力，不陷於擁護資產階級的右傾的機會主義，即陷於農民意識的左傾的冒險主義，由這一錯誤的結果，以前的革命，是失敗了，現在仍沒有出路。或則如托洛斯基派，把中國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視同帝國主義國家內的資本主義之同一的意義，忽略半殖民地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於是在經濟上的理論，固不免有錯誤，在政治上的理論，尤其大錯而特錯。由此一錯誤，遂不免陷於取消主義，右傾的機會主義，革命策略上找不着出路。

中國經濟問題中最大的問題，是帝國主義，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的最後階段，主張封建經濟者，排除帝國主義而後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此種理論，只算是不懂經濟問題，不懂馬克思列寧主義。不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與民族資產階級的生產一樣，仍完全由中國生產，由中國人消費，其矛盾點，惟在於分配

問題。可以說帝國主義在中國所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其特殊關係，在經濟上較少，（帝國主義的商業，在經濟上仍有重大的特殊關係）在政治上始有最大的差異。因此而排除帝國主義，以分析中國經濟，以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此不能不算是荒謬絕倫的理論。

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工業資本主義，在經濟上的特殊關係雖少，而在政治上的特殊關係，既然很大；倘分析中國經濟，只作統一的普遍的研究，對於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不加以對立的特殊的研究，在經濟上固不免有錯誤，而在政治上，則更不免有荒謬絕倫的錯誤。

著者近年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對於中國革命，常欲作一翻切實的研究，常覺中國工人政黨，對於中國經濟的分析，均不免錯誤，由此在革命上的理論和策路，幾乎完全錯誤。中國革命問題，本是一個重大的問題，以著者的學識和經驗，本夠不上研究這等重大問題。但所幸者，我是一個沒有黨派的人，只是革命中的一個戰士，完全站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從客觀上，作切實的徹底的研究，不拘束於系統和成見。因我具有這種資格，或可適當來研究這個問題；可以補學識和經驗之不足的缺點。另外，我常覺

得別人錯了，我自己常有與別人不同的意見，并覺得此種意見，對於革命上，是有相當的貢獻。因此，才大膽地費了兩三月的時間，寫了約近二十萬言的一本書，顏名“麼樣幹”又名“中國革命問題批判”，共計十四章。

第一章“導言”，第二章“世界帝國主義的總危機”，第三章“中國經濟的分析”，第四章“中國統治階級”，第五章“中國小資產階級”，第六章“中國無產階級”，第七章“中國農民和土地問題”，第八章“中國革命的性質及其前途”，第九章“怎樣估計革命高潮”，第十章“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第十一章“中國共產黨”，第十二章“中國共產黨反對派”，第十三章“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第十四章“結論”。

我寫的這十四章，差不多每章都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尤其對於“經濟分析”，“統治階級”，“農民和土地問題”，“怎樣估計革命高潮”，“武裝暴動與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中國革命與共產國際”，這幾個重大問題中，更與別人有不同的意見，更覺得對於中國革命有相當的貢獻。

此書脫稿已多日，惟一時籌不出印刷費，不能出版，只好暫時束之高閣，或如馬克思所說“讓蟲鼠去批判牠”，但完全放棄不理，不獨辜負了我自己研究的辛苦，且對於革命，

也不算忠實，只好先將“經濟的分析”這一章，提前發表，請讀者加以批判。

另外，還有一個聲明，我對於經濟分析這個問題，曾同有幾位富於學識和經驗的朋友，討論了幾次，使我更作深一層的研究，特提出土地問題的研究，他們也幾乎完全贊同我的意見。他們以前是主張封建經濟的，聽說現在將拋棄這種意見，同我研究的方向前進，這也算我的研究，得了一點效果。倘他們更進一步，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也能採取拙著的意見，那末，在革命的前途，或更有光明的道路。

一九三二，八，二，於上海。

1.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中國經濟分析這一問題。以前少有人作徹底的研究，現在始列入議事日程；這一問題，太複雜，太重大，本不是簡單的篇幅，可以研究這個問題的。但此問題，為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一切革命的理論和策略，都建基於此問題，不先將此問題作一個相當的決定，則一切理論問題的研究，均無由着手。且對於此問題的研究，倘稍有錯誤，則其他的一切理論問題，均歸於不正確。故對於此問題的研究，本應慎

重將事，不是簡短的時間和詞意，可以草率從事以研究此問題的。但我所欲研究的問題，必先從此基本問題着手，故不能不先在此作一簡短的研究，至於專門詳細的研究，則俟諸異日。

此問題在中國近一年始有人注意列入研究的範圍，此為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基本問題，故研究此問題者，必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中國現在對於此問題，已成立了兩個判若鴻溝的對立的營壘，即甲方主張中國現在是“封建制度的經濟”，乙方主張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經濟”。同處於中國之同一的客觀環境，對於此同一的問題，竟有如此殊異，如此對立的結論，此不能不令人發生疑問，不能不因疑問而從事於研究，以求正確的解決。中國現在對於無產階級的革命理論，有研究和注意的朋友，仍然對於此問題，抱一種懷疑和偏袒，或各持一是的態度，或謂中國現在當然是資本主義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絕對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或謂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和封建經濟的兩種混合，同時並立的經濟。除前兩派外，第三派似乎他們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徜徉不定，莫衷一是的樣子。可知中國一般人現時對於此問題，尚是一種待研究，而沒有決定的態度。此問題關於革命理論，

既如此重要，現尙待研究而沒有解決，那末，宜乎有不少的人，竭全力，用很多的努力，發表很多的意見，來討論此問題。乃自此問題列入議事日程以來，迄今雖已一年有餘，然而專門注意研究此問題者，兩方面都只有三數人，於此足見中國人對於革命理論，尙不努力，理論的程度，太幼稚。至於我個人，因革命的責任所在，常留心於此問題，現在根據馬克思列寧主義研究的結果，則決然立於資本主義的經濟一方面，認定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已有了相當的程度，中國現在，已經是一個資本主義的社會，差不多完全是資本主義在支配全社會的經濟。不過我從資本主義研究的結果，同“動力”的嚴靈峯和著“中國經濟研究”的任曙，他們兩人在資本主義上的理論，又迥然不同。

經濟問題，是一個事實問題，我們應拿事實來證明，由統計材料來證明，惜乎中國統計材料太缺乏，這是研究這個問題最大的困難，雖然缺乏，只要努力去搜集，亦未始無從着手，我此時尚沒有很多的工夫去搜集，只好憑我手中所有的書報等刊物，關於此問題的材料，以作我研究的憑藉。

起先，我仍如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那樣的辦法，將封建經濟和資本主義經濟對比，究竟看那一種的程度佔優勢，

我覺得此方法最好，可以使人一目瞭然，中國究竟是一種什麼經濟。

帆船足以代表封建經濟的交通工具，輪船足以代表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而中國歷年的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一八七五年，為八五與一五之比，至一九二六年，則為九八與二之比。(註一八)可見資本主義摧毀封建經濟之力甚速，交通方面的封建勢力，只殘留百分之二，幾已達於零點了。我們又以錢莊代表封建經濟，銀行代表資本主義，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錢莊與銀行投資本的百分數，一九一二年，為六八與三二之比，至一九二〇年，則為三七與六三之比。(註一九)相距僅八年，封建勢力幾零落了一半，而資本主義則增大一半，兩個勢力的互相消長，更為迅速。我們又以土絲代表封建經濟，以廠絲代表資本主義，而一九二八年，各口生絲出口的百分比，土絲僅佔百分之五，而廠絲和半廠絲則佔百分之九五。(註二〇)出口絲業中，仍為資本主義所全佔，封建經濟將陷於零落的地位。我們又以工廠產品，代表資本主義，手工業產品，代表封建經濟，根據近年四種重要工廠產品和手工業產品，經過全國各省區海關的國內貿易比較，一九二五年，為九十與一十之比，一九二

六年，爲九八與二之比，一九二七年，則爲九九與一之比。
(註二一)此於工業中，證明封建經濟的零替，如江河日下，僅二三年，由百分之十，下落而達於百分之一，即謂已達於消滅的地位，亦無不可。此外又可以驛站信行，代表封建經濟，以電報郵政，代表資本主義，現在驛站信行，已完全消滅，交通機關，已完全被資本主義佔領矣。

(註一八)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0.

(註一九)同上註，p. 141.

(註二〇)同上註，p. 143.

(註二一)同上註，p. 145.

我們又由各種經濟組織的統計材料，檢查一下，一九一九年，中國進出口有一二一五一隻輪船，載一〇三，八六三，五八一噸，有鐵路二七線，二萬一千二百餘華里。(註二二)在一九二〇年，有銀行二三七家，七九八個支行，二三六，八五二萬盧布資本。有四，三八一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註二三)鑛業中有資本一萬四千四百萬元，生產一千一百餘萬噸。(註二四)全國有大小工廠一九七五家。(註二五)紡績廠有一三二家，四〇二百萬資本，紗錠四〇三二千錠。(註二六)全國共有產業工人二，七五〇，〇〇〇人。(註二七)我們

把這些統計的數目看一下，雖不能說與資本主義最後階段的帝國主義，同日而語，然而亦可配稱資本主義的國家了。

(註二二)商務印書館編，中國年鑑。

(註二三)動力第二冊，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二四)新思潮第五冊，向省吾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註二五)工商部編全國工人生活狀況及工廠生產統計報告——此數恐不確——著者。

(註二六)同註二三。

(註二七)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以中國為封建制度，乃是一九一二年以前資產階級的革命黨，對滿清所呼的口號；推翻滿清以後，北洋軍閥，襲滿清的封建政權，於是民粹派又以此口號，稱呼北洋軍閥。但是我們現在，應該把現在的生產關係與二十年前的生產關係，拿來比較一下，究竟是怎樣，是否有不同的狀況呢，若果這兩個時期仍是一樣的，絲毫沒有變更，那末，我們很有理由，說中國現在，仍然是封建經濟的社會。倘現在的生產關係，已大起變化，工業已大有進步，那末，我們仍追隨民粹派的資產階級的尾巴，謂中國現在，仍是封建經濟，那末，無產階級，豈不是受了民粹派的欺騙，故意隱蔽資本主義，使無

產階級沒有立足的基礎嗎？所以這一個問題，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問題。

現在我且把一九一二年以前和最近年間，兩個時期的生產狀況，拿來比較一下，看究竟是怎樣，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工廠一〇一家，至一九二九年，上海共計有大小工廠一七八一家。(註二八)僅十八年間，上海的資本主義勢力，增大了十餘倍，幾乎每年增大一倍，這等突飛猛進，一般封建經濟學者，安能知道呢？一九一二年以前，上海僅有絲廠二〇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一〇七家，(註二九)僅十九年間，增加了八倍以上，幾乎每兩年增加十分之五。浙江在一九一二年以前，僅有絲廠一家，至一九三〇年，則增加到二五家，(註三〇)此十九年間，增加二四家，每年增加一倍以上。無錫在一九一三年以前，僅有絲廠六家，至一九二九年，則增加至四五家，(註三〇)此十七年間，增加三十八家，每年增加兩倍以上。由這樣看來，現在的資本主義勢力，比之於一九一二年以前，增加了十幾倍或幾十倍。以前猶可謂資本主義為薄弱，難道增加到十倍以後，仍可謂為薄弱嗎？二十年前的孩子，二十年後仍可稱他為孩子嗎？一九一二年的皇歷，怎能和今年的皇歷同一樣呢？一般機械論者流，固執着一個封

建形式，至死不變，不知道二十年前的封建形式，經過二十年的發展，已經起了絕大的變化，已由量的變化，達於質的變化，已在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壯大的資本主義了，一般封建經濟學者，苟稍留心考察一下，即可大覺大悟了。

(註二八)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312.

(註二九)同上註，p. 165.

(註三〇)同上註，p. 166.

(註三一)同上註，p. 167.

現在爭論中國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似若沒有一定的標準，我們既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即以馬克思的文件為標準，想來自稱為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必不致否認這個標準。

驚駭世界資本主義的第一聲，為共產黨宣言，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建基於共產黨宣言，資本主義的死刑，定案於共產黨宣言。所以列寧常說“我們應該重復的說，我們是馬克思主義者，以“共產黨宣言為基礎”。(註三二)可見共產黨宣言，在馬克思主義上的價值之重要了。我們現在，且根據共產黨宣言，判斷中國現在，是否資本主義的社會。共產黨宣言，本是以世界各資本主義國家為對象的，不是以某國的資本

主義爲對象的，至少，是指當時英法德美等國家，爲資本主義國家，英國自然是資本主義創始的國家，法國次之，德美又次之，我現在且根據中級的法國，與現在的中國，來比較一下，看中國現在究竟是否資本主義的國家。

(註三二)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p. 101。

共產黨宣言草於一八四七年，看當時法國的工業究竟是怎樣呢？我且引一段歷史來證明一下，“法國在一八一五年後，工業革命，始有明顯的跡象可尋，拿破崙雖有提倡工業及保護工業的舉動，然而成績不顯，等到他失敗的時候，全國不過亞爾薩斯地方，棉廠中有一付機器而已。至一八四七年，全國蒸汽機有五千具，棉花的消費，增至五倍，同時紡紗機有十萬多架，紡鏈有三百五十餘萬支。到了一八四八年，工業的大都市，已林立於法國，僅巴黎一城，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其餘里昂馬賽列里等，皆著名的工業都市。從此以後，工人逐漸地要組織工黨，什麼同盟罷工，要求增加工資，減少工作時間等問題，也依次發生了。(註三三)

(註三三)耶醒石等編譯：法國革命史下編，p. 31。

現在拏法國當時的經濟狀況，來同中國比較一下，法國在一八四七年，工業始發展，僅有蒸汽機器五千具，紡鏈三

百五十餘萬。中國此時，既不止五千具蒸汽機，而紡錠則已超過四百萬以上。一八四八年，法國最大的工業都市，如巴黎，僅有工人三十四萬二千人，而中國此時，在上海則有八十萬的工人，其他四十萬以上者，尚有幾省。（註三四）法國此時始有加薪減時，組織工黨和同盟罷工等運動。而中國則過去十年以前，即有此種運動。由此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的形態，無一不遠超過於一八四七年的法國。共產黨宣言已大聲急呼地，認定當時的法國，即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喚起法國無產階級，反對資本主義的國家，一八七一年，法國無產階級，果然根據共產黨宣言，起來反對法國的資產階級，成立巴黎公社。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程度，既已遠超過當時的法國，而猶謂為不是資本主義的國家，這還不算反馬克思主義嗎？故到了今日，猶謂中國是封建制度的經濟，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那就不客氣地說，這不是馬克思主義的理論，簡直是民粹派的小資產階級學者的欺騙。

（註三四）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

或謂一八四七年的法國，雖只有紡錠三百餘萬，而人口亦只三千餘萬。今中國雖有紡錠四百餘萬，而人口則有四萬萬，然則中國不能與法國相比，即中國尚沒有發展到資本主

義的國家。此是靜止的機械論的觀察，不是發展的辯證法的觀察。不知道技術因科學的進步而進步，現在的技術，比之於一八四七年的技術，至少必進步數十倍，今姑且以十倍計之，則中國現在四百萬的紡錠，可以當法國當時的四千萬。中國現在的人口，比當時的法國，雖多十倍，而技術的生產力，亦增進了十倍，兩相比較，恰恰相當。而當時的法國，馬克思既認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則現在的中國，凡馬克思主義者，亦應肯定地是資本主義的國家，倘反對此肯定，即算是反馬克思主義。且吾人爲革命理論，在階級的對比上，而測定資本主義，當時法國的資本主義，如紅日東升，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大，無產階級的力量小，現在的資本主義，如夕陽西下，即是資產階級的力量小無產階級的力量大，因這種關係，即使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超過於法國，只等於法國，或不及法國，亦不妨肯定是資本主義的國家。

並且當時的蒸汽力，大概用之於輕工業者多，用之於重工業者尙少，中國現在，重工業雖不發達，然比之於當時的法國，總算發達得多。況中國現在，交通方面，鐵路，輪船，電信，電話，飛機等，更要發達得多，或爲當時的的法國所沒有。由這一方面看來。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之

於當時的法國，更要充實完滿得多，更足以稱為資本主義的國家而無愧。

即單以輕工業來說，而現在同一的技術，在中國方面，比世界各國的生產力，要大四倍，我且找一個統計來證明。

一九二八年，世界各主要國家的紗錠與用花數量的比較：(註三五)

(註三五)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47.

國 別	錠子		每年用花數量	
	千錠	百分比	千包	百分比
英 國	57,136	35	2,909	11
美 國	35,542	22	5,770	27
德 國	11,153	7	1,585	6
法 國	9,770	6	1,180	5
印 度	8,709	5	2,094	8
蘇 聯	7,311	4	1,864	7
日 本	6,272	4	2,541	10
意 大 利	5,189	3	954	4
捷克斯拉夫	3,663	2	546	2
中 國	3,504	2	2,016	8

其	他	16,860	10	3,141	12
合	計	165,103	100	25,240	100

“這裏要根據整個統計，特別是後半截，每年用花的數量，來認識牠在世界方面的意義，我們看中國紡紗錠子，在全世界總錠數中，不過百分之二，而牠每年用花的數量，竟佔全世界用花總數量的百分之八，這就是說旁的國家，一份錠子，只用一份花，中國一份錠子，每年用四份花，比別人多四倍”。(註三六)由此看來，中國四百萬錠子，要當世界其他國家的一千六百萬錠子，要當一八四七年法國的一萬六千萬錠子，即是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單由輕工業說，比一八四七年的法國，要增高四倍以上，然則當時的法國，既已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中國現在，怎麼又不能算是一個資本主義的國家呢？我們不知封建經濟學者，有何種理由，要否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註三六)同註三五，頁148。

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掌握政權，不過百年的時期”，然則在一八四七年以前一百年，即十八世紀中葉，已是資本主義時代了。但蒸汽力用之於紡紗機，在一

七八五年，法國在拿破崙失敗時，尚只蒸汽機一架，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生產。因生產力的變化，包含有技術和勞動本身，勞動力組織的變化，即是生產力的變化；由手工業變為手工工廠，採用分工制度，即算是生產力的變化，資本生產的萌芽，故手工工廠的生產，在“資本論”和“共產黨宣言”上，亦佔有一個地位。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不開始於蒸汽機的發明，在蒸汽機的發明以前，已開始了資本主義的生產。所謂歐洲的資本主義時代，不開始於馬克思草共產黨宣言的時期，在發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我們在上面以發佈共產黨宣言的時期，作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標準，已算是退一步的標準了，已算是具有充分的理由和根據了。以中國來說，採用蒸汽機的生產，雖還不到一百年，然而手工工廠的生產，則在數千年以前，即算是數千年以前，已有資本主義生產的萌芽。不過手工工廠，雖能促進生產力的進化，但進化的程度，很有限度，終不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必待富於生產力的蒸汽機，普遍地用之於生產，始能戰勝經濟上的封建勢力，始算是勢力壯大的，規模完備的資本主義生產時期，故現在的中國，無論如何說，終不能不算是資本主義生產的時期，不能不算是一個資

本主義的國家了。

中國現在，無產階級革命的理論家，大概都自稱是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倘使對於現在的中國，他主張資本主義嗎？抑封建經濟呢？惜列寧不在世了，但他在一八九八年，因民粹派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註三七)乃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駁斥民粹派。我們現在以列寧著此書後的俄國生產狀況，同現在的中國來比較，又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得一個證明。“生產集中，就是俄國最近幾十年中，資本主義之重要的特徵，……據一九一二年的正式統計，僱用五百至一千工人的企業，佔工人全數之15.1%，僱用千人以上的企業，佔37.5%，不滿四百人的企業，只佔20%”，(註三八)“千人以下的企業，在中國紡織工業的數目中，是無足重輕的，中國的紡織工業，僱用千人以上的，約佔80%有多，而二千工人以上的企業，又比二千以內的企業，更佔優勢。這同上面俄國一九〇五年至一九一二年，戰前的狀況，很顯明地表示出生產的更集中”。(註三九)“論煤之採掘，中國現時的數量，比一九〇五年時的俄國，要高得多，五金製造工業的發生，還不久，可是已經發展到很複雜企業的程度了。例如造船事業，比戰

前的俄國，要發達得多，中國五十三個造船廠中，有幾個，……毫不讓於歐洲的造船業。軍械工業，亦佔很大的意義”。(註四〇)

(註三七)俄國十九世紀後半期的智識分子，因俄國是農業和農奴制度的國家，常有農民的暴動，因而偏重農民運動，忽視工人無產階級，故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請參觀包潑夫所著俄國黨史。p.9 至 128。

(註三八)萬譯：俄國大革命史，p. 13至 14。

(註三九)任著：中國經濟研究，p. 304。

(註四〇)盧實斯坦著：中國資本主義發展。見同上註p. 305。

上面這幾段文，已十足地證明中國現在，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比列甯反對民粹派之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程度，還要高得多。列甯當時尚且竭力證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反對民粹派之否認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中國現在的列甯主義者，乃欲主張封建經濟，而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不是顯明地在反對列甯主義，而自陷於民粹派的覆轍嗎？故在今日，資本主義已大發展了的中國，而猶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的確是不自覺地陷於反馬克思列甯主義而立於小資產階級的民粹派的位置了。

“電氣工業的數目，於一九一三年，爲十二個，到一九二五年，增加到100個（1927年增至231個——任注）每年平均增加33 $\frac{1}{3}$ 。……有兩個製電泡的工廠，（是電工業最精細之部門）不僅供給大部分國內需要，並且做出口品。

“在製造工業部門中，我們亦可看見許多企業，按其大小與技術的設置，並不讓於歐洲。……秦皇島所設的玻璃廠，用傅爾落的機械製法，製造玻璃，爲全世界最大而且最好裝置的工廠。上海電氣廠，亦算世界大電站之一。

“宏大的商務印書館，按其技術的設備，不讓於歐洲最好的印刷工廠，而規模且超過之。

“按照紡織業與其中設置看來，現時的中國，比戰前的俄國爲高，每個工廠內工人的數量，（約二千）比歐洲任何國家爲高。

“在大部分的大工廠裏面，機器都是由電轉動的，就在德國英國的紡織工業，還遠不能如此的普遍，這樣看來，中國的紡織工業，（棉織與絲織都是如此）就在國際範圍內，也已是赫赫的數量了。

“大部分工廠的設備，完全都是用新式英國機器的，而在最近幾年來，則紡織機器的輸入，美國差不多已執牛耳

了。”

“同樣的例子，亦可由別的生產部中引來，這些都是彰明較著的，表示出現代的技術，已將中國變成最新式的新工業化的國家，而驟然躍過許多過渡的時期”。（註四一）

（註四一）同上註四，p. 305——308

盧氏在前面所舉的幾種生產，不獨超過戰前的俄國，並可與歐洲先進國的工業並駕齊驅，或更超過之，自然中國不能與資本主義的新階段——帝國主義，同一程度，然而因原料和地理的關係，有幾種生產，進步較快，這也是國際經濟狀況中常有的現象。但因此，更足以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塞主張封建經濟的口了。

或以爲中國資本主義，是在城市工業，城市中已發展了資本主義，這是事實，無人否認，即主張封建經濟佔優勢者，亦承認城市中資本主義的發展，如潘東周君說：“中國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工業革命的過程，實已經開始，經過世界大戰的影響以及近幾年的變動，中國工業資本主義，在城市中，確已有相當的發展，並且在農村中，已經孕育了他的種子，就整個中國經濟關係來說，城市的資本主義，確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整個發展的趨勢，確已是走向資本主義的

過程”。(註四三)以潘君這一段話來說，差不多已完全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了，與他的全篇文意，完全矛盾，他的全文，是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偏在農村經濟方面，所以中國農村經濟是否受城市資本主義的領導，是否亦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是本問題的關鍵，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兩方面的爭點，完全在此，這個問題，稍複雜一點，且待後面去作詳細的研究。

(註四二)新思潮第五卷，潘東周著：中國經濟的性質。

2. 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

此外帝國主義與中國資本主義的關係，即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以及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的封建勢力？因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等問題，亦為中國現在經濟問題上發生極大爭論的問題，茲分次討論於下。

第一，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是否應該區分。

經濟無國界，自資本主義降世以來，即將各民族的銅牆

鐵壁，完全衝破，將整個世界，構成經濟界之有機的整個結合。任何一個地方，經濟問題，都可影響到全世界。所以資產階級先由一民族的結合，更進而為全世界的結合，如國際中各大托辣斯，就是這種結合，此為帝國主義的特徵。此時各個資本家，各國的資本家，各欲多爭剝削剩餘價值的關係，彼此常發生競爭和矛盾，然又因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性，將使世界經濟關係，成一整個的聯合。此乃資本主義發展中必然的矛盾。因此，無產階級為對抗資產階級，亦結合為整個的國際組織，所有世界上的無產階級，都是同一個階級的人，同一個團體的人，所有世界上的資產階級，都是無產階級的敵人，某一個地方資產階級，只是無產階級整個枷鎖的一環。所以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與民族資本主義，由無產階級看來，當然無優劣和主客的區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的資本主義，即中國的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的資本主義，即是中國的資本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即資本主義，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無產階級亦必發展若干成分，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資本主義，中國一切經濟關係，都要發生變化，與民族資本主義所發生的變化，無絕大的差異。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

主義，發展了若干成分，中國封建經濟，亦必摧毀到若干成分，外國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剝削勞動階級的方法，都是同一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所以無產階級對於牠們，無所用其區分，斤斤然區分外國資本家如何，本國資本家如何，此乃資產階級學者的事件，愛國主義學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革命者應有的責任。若無產階級革命者，完全把帝國主義除開來研究中國的經濟，此不啻爲資產階級在服務，故主張不分中外資本主義，作統一的研究，在原則上是對的。

不過不區分，只是相對的不區分，不是絕對的不應區分，在有些時候，亦有區分的必要。第一，資本家剝削的剩餘價值，照例分割爲蓄積或增殖資本，加入複生產，和個人消費的兩部分。若資本是外國人，必將剩餘價值的全部，拿到外國去；即或擴大再生產，將增殖資本的一部分，留在中國，加入再生產，然而個人消費的部分，則必定拿到倫敦，巴黎，柏林，紐約，東京等地方去消費，社會的總生產，分生產工具的生產和個人消費的生產兩部分，外國資本家，既在外國消費，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上，不無影響，與本國資本家要發生絕大不同的影響，此猶從經濟方面說的。若由

政治方面——階級的成分方面去看，因中外資本家的差異，在政治上，就要發生非常的差異，由這一差異，革命的理論和策略迥然不同了。

帝國主義在半殖民地的國家上，雖可以由外交的手段，掌握半殖民地國家經濟上和政治上的統治權；但因為半殖民地的國家，為半獨立半主權的國家，帝國主義只能間接地統治，外國資本家決不能直接加入半殖民地國家內去管理政治權，所以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雖已充分的發展，倘外國資本家佔重要和多數的成分，那末，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必異常薄弱，不能獨立管理政權，必與帝國主義妥協，聯合封建勢力，以統治國家。因此，我們在經濟的研究上，雖可不分土資本和洋資本，但在政治的觀察上，不能不注意外國資本和本國資本的區分。

必先將外國人投資於中國的數量，有一概括的觀察，和民族資本相比較，究竟孰強孰弱，然後根據這種結論，以分析中國階級，質言之，測量資產階級的能力，始不致發生錯誤。茲將帝國主義投資於中國的數量及種類，概括地分類地統計於下：——

(1) 列強在中國鐵道借款的數目如下：

國別	款項(百萬)
英國	123
法比	97
日本	59
德國	48
美國	19
荷蘭	13

若把割讓的鐵路加上來，則各帝國主義在中國鐵路方面的投資，實為：

1. 英國	$123 + \text{廣九路的價格} 16 = 139$
2. 日本	$59 + \text{南滿鐵路的價格} 220 = 279$
3. 法比	$97 + \text{滇越鐵路的價格} 24 = 121$
4. 德國	$48 + \dots\dots\dots = 48$
5. 美國	$15 + \dots\dots\dots = 15$
6. 荷蘭	$13 + \dots\dots\dots = 13$
總計	$= 615 \text{百萬元}$

(2) 中外銀行資本：

	額定資本	實在資本
外國銀行	910百萬元	682百萬元

中外合辦銀行	150百萬元	104百萬元
本國銀行	375百萬元	158百萬元

(註四三)新思潮第五冊向省吾著：帝國主義與中國經濟。

(3) 帝國主義投入電話電報的資本：

國別	經營數目	款項
日本	4	45.092
英國	3	210.548
德國	4	47(註四四)

(4) 帝國主義與中國經營礦業的比較：

國別	資本(百萬元)	每年產額(百萬噸)
中國	50	7
英國	22	7
日本	77.5	4.5(註四五)

(5) 帝國主義在中國關於重工業的工廠：

工廠種類	數目
造船廠	22
蒸氣機關	22
鋼鐵及鋼鐵細工	9

此外尚有許多輕工業尚未加入。

至於紡紗業，日本的投資爲200,000,000元，英國爲20,000,000磅(註四六)(中國130百萬元)

(註四四)動力第二冊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

(註四五)同上四三。

(註四六)同上四四。

我們把上面一切統計數目看一下，鐵路十之八九是外國資本建築的，現在仍大多數操於外國人的掌中，銀行資本，外國佔四分之三，中國只四分之一，(註四七)電政亦幾乎全屬外國資本，鑛業的外國資本，佔三分之二，中國只佔三分之一，重工業亦幾大半在外國人的掌中，輕工業最重要者爲紡織，亦是外國資本佔多數，中國只在三分之一。此外如交通方面的輪船，自然大多數是外國資本，而每年商品輸出入三十餘萬萬元，亦大多數是外國資本，總計的結果，除外國資本而外，中國資本究竟幾何，所以李立三也說：“因此中國工業多半在帝國主義手裏，如海外航業，完全爲帝國主義所壟斷，內河航業，帝國主義的資本，佔四分之三以上，鐵路純粹由外資直接建築者凡五條，此外多半由政府借外資來建築的，純粹由本國資本金家建築者，僅京綏路一條。”(註四八)這也證明外國資本佔最多數，民族資本僅佔一小部分，民族

資本既如此之少。民族資產階級的能力究有幾何呢？除大多數作帝國主義的買辦而外，中國獨立的資產階級，究有幾何呢？所以中國資本主義固然發展了，且已有初高度的發展了；無產階級與資本主義當然是同時同程度發展的，因此，中國無產階級亦發展了，且已有較高度的發展了。至於中國資產階級，在數量上和質量上，均極微弱，此其所以必須與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妥協，始克暫時苟且地統治中國，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發展了，而資產階級則未發展，這是中國資本主義的大矛盾，此種矛盾，即為半殖民地和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此種特徵，在階級分析上，定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四七）我們的政治意見書說：“並且全國一切形式的經濟之最高統治，都在本國的一萬五千萬元以上銀行資本，依賴外國的五十八萬萬元以上銀行資本的支配之下”。

（註四八）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p. 1.

第二，帝國主義，是否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原以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為目的，不願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發展資本主義，以減少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市場。帝國主義常將殖民地和半

殖民地關稅權握着，不使施行保護關稅，即爲牠阻礙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資本主義發展的手段。故謂帝國主義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爲無理由。不過資本主義的發展，爲資本主義生產的必然法則，常違背人類的意志而獨立進行，故馬克思說：“具有牠的生產交換，財產關係的近代有產階級社會，就是惹起這般大規模生產和交換手段的社會，好像一個術士似的，他念咒召來了魔鬼，現在却不能鎮服陰間的勢力，數十年的工商史，只是近代生產力，對於近代生產方法，對於有產階級所賴以生存和統治的財產關係，謀叛的歷史”。（註四九）所以資本主義的發展到了最後階段，不能完全受帝國主義的指揮，使之進而進，使之退而退，不欲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此帝國主義之意志也；然中國資本主義的大部分，均由帝國主義所發展，此則非帝國主義的意志也；這都是帝國主義發展的矛盾。帝國主義欲運輸商品和原料，不能不建設交通，建築鐵路，採煤及鐵路應需的材料等工業，即應時而起，所以李立三也說：“中國工業的發展，完全是受帝國主義侵略的結果，帝國主義要輸入他們的商品，所以竭力發展中國的交通工業，如鐵路輪船等，帝國主義要搜集中國的原料，所以投資鑛山，並製造原料的大工廠。”（註五十）這也

是說由帝國主義的侵入，發展了中國的資本主義。並以資本主義發展到帝國主義的階段，常以輸出資本為目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原料和工資，都比較低廉，投資開發工業，可以多剝削剩餘價值，資本家常爭先投資於殖民地，故金融資本主義的帝國主義，此時不惟不阻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乃反常欲助成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如現在各帝國主義，尤其美帝國主義，黃金滿庫，無地投放，常欲投資中國，開發實業，但牠們對於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稅制度，仍又不願放棄，這又算是帝國主義的一個大矛盾。

(註四九)共產黨宣言。

(註五十)李立三著：中國職工運動概論，p. 1.

第三，帝國主義是否維持中國封建勢力，以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封建勢力，藉以維持牠的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此乃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之一貫的政策。中國封建軍閥，常受帝國主義的維持，這是彰明較著的事實，中國軍閥的循環戰爭，為發展資本主義的最大阻礙，這尤其是的而且確的事實，故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雖不是直接有意地阻礙

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實間接無意地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至於帝國主義維持殖民地的封建勢力，法人德列易說的最詳，他說以前英法對於非洲等地，常以武力侵略，殊常經數年的戰爭，仍收不到美滿的效果，最後始採取和平侵略的手段，即維持本地的封建勢力，為最良的方法，現在各帝國主義，對於殖民地，都是採取的這種方法，茲將他的話錄一段在此，以作證明：

“在亞洲的國家裏面，沒有某種強有力的中央集權，然而只要不侵犯宗教的迷信，侵略是極易成功的。

“開始，歐洲人經營商業，以西方的珍奇的工業品，交換羊毛；其後，欲使之易於交易，乃建築道路和鐵路。設他們建議自己投資，則此種計劃，更易成功；每種借款或特許的成立，另外，對於大臣，官吏和有關係的人，應附以贈品，——包含於發行費內。

“自然應當支付利息，因此，歐洲人建議設立關稅，在他們自己的商品上，征收捐稅，將收入的盈餘，歸之於君主，所以他也樂於承諾此種制度。設關稅仍不足以支付利息，那末，就應該增加租稅，由氏族繳納；但是，總督經手征收，應留一部分作他的報酬。設氏族要抗稅或反叛，那末，歐洲人

就供給槍彈於君主，以鞏固君主的權力。至於蘇丹，只要他願意，人們將以大砲和開花砲，替他組織衛隊；并供給指揮官，指揮兵士，巧妙地使用槍械。設君主偶然表示了一點獨立的意志，那末，迅速的軍事的遠征，同宮內的陰謀相結合，即足以由他的兄弟或姪兒，即代替了他。君主在歐洲人的新組織裏面，不過爲一個副署畫諾的人罷了。

“於是歐洲人不知不覺地，即成爲財政，行政和政權的主人了。但他們在表面上，絲毫沒有改變舊有的組織，人民的風俗和習慣，以暴力侵略殖民地，常屬不可能，因而遂代替以和平的侵略”。(註五一)

(註五一)德列易著：兩個歐洲，p. 150—151

帝國主義維持中國封建勢力，原在於維持商品市場和原料地投資地的安全，在中國封建軍閥的混戰中，其結果反陷於不安全，這又是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的矛盾。

綜觀帝國主義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有阻礙的時候，亦有助長的時候。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固大部分爲帝國主義的資本所發展，但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自然程度，尙不止此，倘順其自然發展的程·度·，無所阻礙，必然比今日高得多。資本主義侵入中國，與日本同一個時代，然日本已發

展到極高的程度，最後階段的金融資本主義，能與歐美資本主義先進國，並駕齊驅，比之於中國，不啻有上下床之別，這是因爲日本推翻了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資本主義盡其自然的能力，向前發展之故。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開幕，與西歐資本主義先進國，同一個時代；然在一九一七年以前，其發展的程度，不及現在的中國，此由封建勢力阻礙之故。十月革命後，澈底肅清封建勢力，實行新經濟政策，和五年計劃，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爲任何資本主義先進國所不及。故欲使中國生產力盡量發展，必澈底推倒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質言之，必工農革命勝利後，中國的產力，始有任其自然的生產力盡量發展的可能。

3. 中國農村經濟

我們現在來討論農村經濟，此爲中國經濟問題爭論的中心點，主張資本主義者，謂城市資本主義可以支配農村經濟，故謂城市即發展了資本主義，則農村的生產關係，亦必定要發生變化。主張封建經濟者，則將中國與國際分開，將農村與城市分開，似若這兩方面，築的有萬里長城一道，彼此絕對地互不侵犯，互不發生關係；帝國主義雖已侵入了，

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城市資本主義雖已發展了，而農村的封建經濟如故。究竟事實上，是不是這樣呢？我們且請馬克思來證明，他說：“我們從此可以曉得，做資產階級基礎底生產和交換的手段，是萌芽在封建社會裏面的；這種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所由生產及交換的狀況，就是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的組織，簡括些說，就是財產的封建的關係，便不能和那已經發展的生產力相適合，牠們便變成了許多的障物，牠們便不得不崩壞，結局果然崩壞了。”（註五三）我們這裏應注意，是資本主義的生產和交換手段，發展到一定地步，封建社會的生產和交換狀況，即農業和手工業的封建組織，一定要崩壞，決不是城市資本主義發展了，農村的封建經濟，仍然可以保存。馬克思又說：“資產階級現急激的改良了生產手段，又不斷地開拓了交通的利器，於是把一切國民，連極野蠻的也盡數的牽入文明隊裏，牠那價廉物美的商品，便是猛烈的大砲，中國城壁，為牠所摧毀，極端排外的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為牠所降伏，世界各國，因為要免得滅亡，都被迫得採用資本家生產方法，而將所謂文明的輸入到牠們的社會，使自己也成了資產階級，要之資產階級按照自己的模型，造成了世界”。（註五四）我們在此地應注意

的，即是帝國主義的商品，是猛烈的大砲，中國的城壁，已被牠摧毀，牠努力於這種摧毀的工作，已過一世紀了，中國的封建經濟，仍安然無恙嗎？帝國主義侵入的地方，資本主義的文明，也要跟着侵入，也要變成資本主義的生產，中國資本主義是這樣發展了的，中國資本主義由這樣的發展，將近一世紀了，猶可說中國資本主義尚沒有發展嗎？

(註五三)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

(註五四)同上。

由上述的意思看來，凡資本主義發展的地方，就要摧毀封建經濟，凡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的地方，也要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在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生產，亦將近一世紀，現在資本主義的發展，又已到了較高的程度，而猶謂為封建經濟的社會，這當然不合於邏輯，但是，封建經濟與資本主義經濟，怎樣區別呢？我們必先知道了這種區別，然後就容易知道中國究竟是那樣的經濟了。

馬克思說：“區別經濟的各時代，不在於生產，而在於由甚麼勞動的工具，怎樣生產，勞動工具，不僅是人類勞動力發展的尺度，並且也是在那社會關係中間，完成勞動的指示器”。(註五五)由這樣看來，區別社會的尺度，在於勞動工

具，所以馬氏又說：“用手推的磨子，產生了封建主的社會，用蒸汽的磨子，就產生了工業資本家的社會”。(註五六)然則蒸汽力的發明，就算是一件劃時代的事件，未有蒸汽機以前，爲手工工場時代，尙未完全脫離封建社會的時代，自有蒸氣機以後，就是工業大革命的時代，即近代資本主義的時代。所以馬氏又說：“於是又有蒸氣及機器出來，演了一場工業生產的革命，從此大規模的(近代產業)，便取了手工業的地位，富豪的實業家，產業的總首領，近代的資產階級，便把產業界的中等階級降伏了”。(註五七)這更顯然以蒸氣機的大工業，爲資產階級的社會，手工業的中等階級，爲封建社會，自有了蒸氣機的大工業，即有了資產階級社會，有了蒸氣機的大工業，即代替了手工業，即是代替了封建經濟，有了有產階級，即降伏了中等階級，即降伏了封建經濟的生產者。中國現在蒸氣機的大工業，已達到如何程度，手工業消滅者幾何？幸存者幾何？能於此作一明瞭的觀察，中國究爲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即可容易判別了。

(註五五)資本論，第一卷，第三編。

(註五六)哲學之貧困。

(註五七)共產黨宣言。

封建社會的經濟，是自足自給的經濟，即是自然經濟，非商品經濟，所以恩格斯說：“中世紀社會，細碎的小生產，生產機關適於個人使用，因此，是原始的，細小的，效能有限的，但是，因此往往為生產者自己所佔有，生產是為供給生產者自己或其領主之直接消費，消費以外的剩餘生產品，才拿去交換。這個剩餘，用諸交換，就成了商品。不錯，工匠自來即以為交換而生產為職業，但他們大部分，也在直接供給其消費，他們都有一小塊土地，(田地和園圃)他們放家畜於公共的山林內，他們由此採伐供燃料和建築的木材。婦女則紡紗織布等等，可見為交換的生產，商品生產，還在幼稚時代，因此交換有限，市場狹小，生產形式，是停滯不變的。每個集團，在其內部，為着排除其他集團之生產品的生產，組織起來；鄉村中則為馬克，城市中則為行會”。(註五八)這段話的意思，是怎樣呢，謂封建社會的生產者，都是以供自己及領主的消費為目的，生產的東西，既不是商品，以供他人的消費，自己的消費，亦不是依賴他人的供給，必到了有剩餘的時候，才拿去交換，才是商品，但是，亦只很少的一部分，即手工業工匠，雖以交換為職業，然自己消費的東西，亦多由自己生產，所以由他生產的商品，也是很有限的，因此市

場狹小，有行會的限制，這就是封建社會的經濟組織。

(註五八)恩格斯著：宗教哲學社會主義。

現在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看一下，是否還是自然經濟，是否被商品經濟侵入，農村中所消費的商品，又是否是手工業的生產品呢？現在中國農村中，不獨火柴，煤油，縫衣針等，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尤其是衣著的東西，更差不多完全由資本主義的生產去供給，所以中國近年紡織的發達，有一日千里的速度；以四川而論，重慶萬縣是大商埠，此兩地均以棉紗商業為第一位。十年前，還可在農村中的農人中，見着種棉花來供自己紡和織的事件，近年則絕少見着這等事件，即或由自己織，而所用的棉紗，必係資本主義的生產品；而織布的工具，雖不免有用舊式的，然也有很多是採用受過資本主義洗禮的新式工具。人類的消費，為衣食住三大項，農人的衣著一項，可說已完全受資本主義的支配。食物自然是農人的來源，然有時也要由市場供給；住室雖常由農人同工匠建造，然也常要需用由機器生產的洋釘。然則資本主義的生產，對於農人的衣食住都侵入了，可謂在農村經濟中，無孔不入了。

除貧農而外，地主自然不消說，中農和富農的男女，都

要穿機器襪子，洗臉要用洋磁盆，洋手巾，肥皂牙粉，牙刷子。出門要用洋傘，有馬路的地方，要坐汽車；有疾病時，也有用西藥的。這一切的情形，尚不可以枚舉，總而言之，現在中國農村自給的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完全傾覆，完全由商品經濟代替，完全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故中國現在的農人，非與市場發生關係，即不能生活，不能再生產了。

據金陵大學調查江蘇山西等省，二千餘農家，平均每一家庭，由市場購買各種物品的百分比，(1922—25年)衣服為百分之八一·七；器具設備為百分之九五·一；雜項為百分之九九·二；個人嗜好為百分之九九·七；生活改進為百分之百；醫藥為百分之百；燃料為百分之一一·三；食物為百分之一六·八；總平均為百分之三四·一。(註五九)由此看來，農人的消費，三分之一以上，都是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除燃料食物兩項而外，十分之九的消費物品，都是由市場購買；所謂農村的自然經濟，尚殘存幾何呢？“中國各地農村，如上表的調查，總計由市場購買的份量，在百分之三十四點以上，比起歐美日本的現在，自然相差還遠。美國在一九二二至二四年的平均數，為五七·二%，日本在一九二四年，為五六%。但我們要知道美日是帝國主義，我們站在革命的立場來為

革命而測驗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應以帝國主義為標準，肯定我國目下還是一種自給的農業。只有資產階級的學者，才想使資本主義發達完全，才醉心於美日的前途；而事實上，在江浙等經濟中心區域，近年農村經濟生活，由市場購買的份量，亦已達到美日平均的程度，更可使我們認定中國農村生活，已發達到資本主義支配下的很高程度呢？”（註六〇）

（註五九）任曙著：中國經濟研究，p. 188。

（註六〇）全上，p. 191。

以上是由消費方面說的，現在再由生產方面看一下。農人的生活和再生產，都須由市場的商品來供給；但市場的商品，不但具有滿足人類需要的使用價值，牠同時又具有交換價值。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支付交換價值，質言之，必須支付一定的貨幣數量；然則農人欲取得商品，必先取得貨幣；欲取得貨幣，必先生產有使用價值的商品，與具有貨幣而欲取得此有使用價值的商品相交換。故農人此時，不獨消費方面，成了商品化，而生產方面，亦不得不商品化，以受資本主義的支配。於是農人生產的目的，大部分都不能不是為供給市場而生產，為滿足他人的需要而生產。他們每年牧畜很多的牛羊，種植很多的桐子，桑樹，茶樹，麥子，荳子，棉，麻

等等，都是爲供給帝國主義原料而生產，帝國主義在中國所取的原料，不下數百種，都是由中國農人，視其土之所宜而生產的。農人的此等生產，完全不是供給自己的消費，完全是供給市場的需要，質言之，完全是資本主義化的生產。

中國農村中，不獨自然經濟的基礎破壞，生產和消費都成了商品化。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日漸發展，中國有一一二八個農業公司，六五，九八五，三七六元資本，此固爲資本主義生產的標點。而農業機器的輸入，一九一三年，爲一二，〇〇〇兩；一九一六年，爲二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〇年，爲一，〇〇〇，〇〇〇兩；一九二一年，爲二，〇〇〇，〇〇〇兩。（註六一）此等數目，每年都有增加，即證明農村資本主義的生產，每年都有進步。

（註六一）動力，第一期，嚴靈峯著：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至於中國農業經濟中，很多地方，都用了新式的灌溉，例如江蘇浙江福建一帶，已實用蒸汽，甚至氣電摩托與電抽水機來灌溉了。在常州一帶，用電力灌溉的，在一九二六年，約有稻田四萬餘畝。

“安徽省另有通行的抽水機，以煤油和石油爲動力的抽

水機，此種抽水機，在五年前，已開始試用，一九二六年，僅在滬寧路一帶，已有一千具以上，上海有幾個工廠，差不多完全為此種抽水機而生產的。

“此外農業企業，亦日漸發展，舂米機器，多係英國產的。在揚子江一帶，尤為推行。產棉區的榨油廠，日益發展，產茶區製茶企業之普遍，沿海一帶，罐頭和煙草企業之日漸發達，都是不可置辯的事實。

“如販賣商人，經營農業的經濟，在產米區最為發達，蕪湖一縣，為中國米糧出入最豐富的區域，那裏有幾十個代辦的商號，在任何鄉村內，都有販米商人的足跡。在城內的穀物交易所內，有米多種，又有一定的價格，與上海及其他各地，互通聲氣，秋收時候，舂米公司，以新式機器舂米，運往上海，芝罘，寧波，廣州各地，轉為銷售。

“最後，荳，棉花，絲茶，桐油等等，銷售尤廣，大部都供應國際市場。

“中國農業經濟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一形式，便是外國資本，參加中國農產品的製造，如山東英美煙公司的經營，便是用這種形式投資於農業經濟。此外中國直接投資於農業生產的事情，我們也常可看見，廣州米廠和糖廠，中國

中部等處的棉田，都是列證。……”（註六十二）這更足以證明資本主義在農村中的發展，為根本消滅封建經濟的利器。

（註六十二）動力，第二冊，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40—41.

我們由上面看來，已證明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自然經濟，已傾覆了；農村不獨商品化了，且資本主義的生產，亦逐漸發展了。概括地說，農村已受城市資本主義的支配了，普遍情形，原是如此。不過由反面看來，中國邊遠的區域和交通不便的地方，殘留自然經濟，自然也還不少。但是，此種殘餘的現象，任何國家都不免，不過只有程度之差罷了。我們在巴黎城中，也常見着封建時代的手工工人，法國農村中，仍殘留有自然經濟不少。所以列寧將蘇俄的經濟，分為“(1)家長制的經濟，即大多數農民的自然經濟，(2)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賣穀物的農民，多屬於此類，)(3)私經濟的資本主義，(4)國家資本主義，(5)社會主義”五種後，他說：“然則那一種要素最為優勢呢？在小農之中，小資產階級的自然成長性，最為優勢，其中含有不能不優勢的理由，是很明顯的，農業家的多數，或大多數，是小商品的生產者。”（註六十三）於此使我們發生兩個注意點：第一，任何國家的經

濟，都不是一個生產方法，等二，以最新的生產方法爲領導。

(註六十三)列寧經濟學：從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的過渡時代，p. 5。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他又說：“我們將亞洲的，古代的，封建的，近代的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定爲社會經濟構成的如許多發展的階段。”由此我們就知道生產方法，經過各階段的進化，雖到了現代，仍有各階段的殘餘。中國現在，雖已進化到資本主義的時代，然資本主義是由封建的廢墟上發展起來的，當然尚有不少的封建殘餘；不但有此封建的殘餘，而苗民土司中，尚有古代共產社會的殘餘，然決不能因此即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

一個社會的生產方法，既不止一個，究竟以那一個爲領導呢？發展了新的生產力，才代替舊的生產力，新的生產力日漸擴張，舊的生產力日漸摧毀，舊生產力暫時的數量，雖或較大，而質量終屬較小，當然以新生產方法爲領導；故蘇俄的經濟，雖以小規模的商品生產者佔優勢，而以社會主義爲領導。中國現在的資本主義，不獨形式上佔了領導的地位，而實質上亦已佔了領導的地位，故一切經濟關係，都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馬克思說：“……在資產

階級的社會內，農業漸次成爲產業的一部門，並且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這樣。在一切社會形態中，凡土地所有權，處優越作用的地方，自然關係，便居支配的地位；在資本處優越地位的社會形態中，支配的作用，便轉移於社會的和歷史上所創造的要素。沒有資本，不能夠了解地租，但是，沒有地租，却完全能夠了解資本。資本便是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牠應當造成起點與終點，並且牠的概念，要比土地所有權的概念之先發展的。”……(註六四)由這樣看來，中國現在既是資本主義佔優越的地位，佔了領導的地位，統治了資產階級社會的一切經濟勢力；那末，一切經濟關係，都應受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經濟中如土地買賣，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等等，均應以資本主義的法則來說明，才算合於馬克思主義，否則即算是修正了馬克思主義。

(註六十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評導言。

4. 中國既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怎麼 尚有封建勢力呢

我們上面的結論是：中國農村的封建經濟基礎已傾覆，已受城市的資本主義支配。經濟問題，是一種事實，在同

一的事實之下，由同一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即應歸於同一的結論，不應發生對立的主張才合於邏輯；怎麼中國現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對於中國農村經濟，或絕對地主張封建經濟，或絕對地主張資本主義經濟，發生如此南轅北轍，極端相反的主張呢？且主張資本主義者，在統計上，學理上，舉出種種的證據，的確證明合於資本主義理論。而主張封建經濟者，亦列出種種的事實，證明新會上確有種種的封建事實。怎麼中國農村經濟問題，發生如此奇異的矛盾呢？我們不努力解決這種矛盾，中國經濟問題，無論如何都得不着一個澈底的解決。

中國的封建勢力，的確是一種事實，如李立三所舉地主的剝削：“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從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二，租額以外的貢獻；……三，徭役的殘留；……四，地主統治農民的特權；……五，在社會關係上地主完全是另外一個等級。”……另外，他又說：還有許多特殊情形，為西歐所沒有者，第一，土地的買賣，必得須宗族的同意；第二，中國特有豪紳等級，掌握鄉村政權。此係關於地主方面的封建剝削。另外，他又舉出封建軍閥的剝削：“一，強迫徵收農民極重的賦稅；……二，軍事勞役制的殘餘形式的存在；……

三，分區割據的形式；……四，在任何一個軍閥區域，都是極力保護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註六十五）所有這一切情形，都是中國農村中顯然的事實，亦是農民中最大的痛苦；設忽略這些事實，那末，在革命的理論和策略兩方面，都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註六十五）布爾塞維克，第三卷，第二三期合刊，李立三著：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p. 63—78。

因為封建勢力，是中國現在的確的事實，所以就是主張中國為資本主義社會的人，也未會完全否認這種事實，如杜洛斯基是站在資本主義一方面來研究中國革命問題的人，但他仍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封建與半封建的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的原因，一部分是由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分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等等而新形成的。”（註六十六）杜氏沒有完全抹殺中國封建勢力，比之於中國杜洛斯基派中有一些人，完全忽視封建勢力者，要超人一等。不過他把中國的封建勢力太小視了，所以他對於中國革命問題，遂不免完全陷於錯誤的結論。（此意不在此範圍內，應在後面去研究，）嚴靈峯君亦是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研究中國革命問

題的人，他亦沒有完全抹殺封建勢力，所以他說：“我們假如深入中國農村中去看一看，我們必定可以發現許多封建和半封建制度，遺留下來的陳跡；我不但可以找到最原始族長社會，純封建式的地主；並且還可以遇見中世紀的人口買賣，大家族之畜婢養奴。此種制度，不僅是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殘跡，並且有由商業和高利貸資本，以及帝國主義商品掃蕩了農村之後，使農民趨於極端貧困，不但要出賣自己的田宅家具財產，最後為償還債務，或履行宗族祭祀，還要出賣子女妻兒。許多地方，不但大家族，有不少地方上特權慣例；而今日軍閥制度的存在，苛捐雜稅，拉夫，勒餉，更是不可掩蔽的封建遺孽。鄉村中之一切風俗習慣，賽會迎神，械鬥，私刑，以至於雞租，脚米，人事，斛面，包三担等等，無疑地都是封建時代的殘餘。僧尼，道士，巫覡，神君，地保，鄉長，祭司，廟祝，舉，貢，生員，翰林，進士，隨處都可以找到。”……（註六十七）嚴氏這一段文，對於封建殘餘，還算形容盡致，他的結論，謂此種殘餘，在經濟上不關重要，不能阻礙資本主義的發展，反轉資本主義一天一天地要摧毀封建殘餘。他這種結論，在經濟學上，完全是對的；不過這種殘餘，多是封建社會的上層建築物，牠現在在中國政治上，尚有很大的關

係，忽視了這種關係，在政治問題上，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錯誤。

(註六十六)杜洛斯基著：中國革命問題第二集，p. 70。

(註六十七)動力第二期，嚴靈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333

主張封建經濟者，陳述出種種的封建事實，不能加以否認，主張資本主義者，亦承認封建殘餘，足見封建勢力，為中國現在最大的問題，我們究應怎樣來研究這個問題，才可得正當的解決呢？依我看來，第一，這是農村經濟中的問題，我們應從農村經濟方面去研究，第二，這是關於無產階級革命理論的問題，應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來研究這問題。

列甯說：“馬克思已經指出當資本出現於歷史的舞臺的時候，農業已經有了種種複雜的形態，——封建的，民族的，共同體的，國家的形態了；資本屈服了各種的農業形態，使牠模倣自己的姿容，要理解，要評價這個過程，而統計的表現之者，必須提出各種問題，又須從各種問題，變更其研究的方法，或應從過程的各種形態，而變更研究方法。”(註六十八)他又說：“在農業方面，資本主義的複雜的發展行程，惟有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然因為牠有許多特殊性，而就說農業決不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者，

完全是不正當的主張。”(註六十九)列甯說農業中有種種的形態，被資本屈服，我們研究農業問題時，須變更研究的方法，始能理解牠的過程；在農業中研究了農業的現實的各種特殊性之後，才能把握資本主義，在農業方面的複雜的發展行程。但農業仍然適用資本主義的發展法則；這是列甯指示我們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方法。

(註六十八)列甯著：農業的資本主義。

(註六十九)列甯著：十九世紀末葉的俄國農業問題，p. 71。

列甯稱考茨基的“農業問題”一書，為“在三卷資本論之後，算是最新經濟學著作中出色的一本。”(註七十)可見考氏對於農業問題的研究，有注意的必要。他說：“農業的運動，完全是特殊的，與工業資本及商業資本的運動，完全不同。”(註七十一)列甯與考茨基，均不外謂農業問題，要複雜些，要特殊些研究，牠的方法，不能與工業和商業，取同一樣的方法，所以我們應該對於中國農村經濟，作一種特別的複雜的研究——此處只研究封建勢力殘存的原因農村經濟的重大的土地問題留在本書第七章去研究——然後才能解決中國封建勢力的問題。

)列甯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一版序言。

(註七十一)考茨基著：農業問題，p. 1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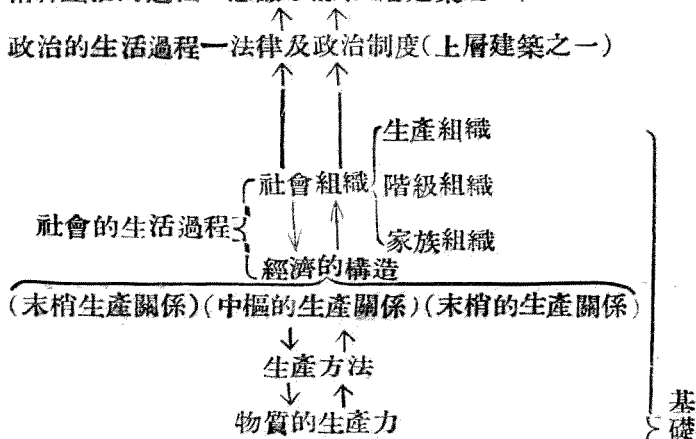
馬克思說：“這些生產關係底總和，構成社會底經濟構造，即發生法律的及政治的上層建築，並適應一定的社會的意識形態之現實基礎。”(註七十二)由此我們知道社會的經濟構造，與法律政治及意識形態等上層建築物，應各有區別；且經濟構造，是根本的，上層建築，是附屬的，現在我們把日人杉山榮對於此區別所製的表，(註七十三)列在下面，可使人容易明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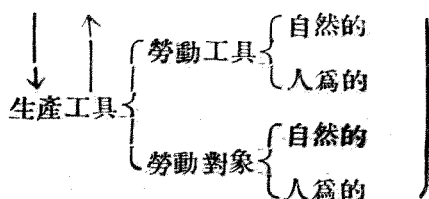
(註七十二)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註七十三)杉山榮著：社會科學十二講，p. 350。

精神生活的過程—意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

政治的生活過程—法律及政治制度(上層建築之一)





由此我們知道馬克思和馬克思主義者，對於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應該謹慎地作嚴密的區別。若忽略了這種區別，那就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所以馬氏又說：“在人類進化的一定階段中，社會底物質的生產力，與現存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或則與他們從在內經營所依據之財產關係，——這不過關於同一事物底一種法律的表現，——發生衝突。由於這些關係，變成了生產力底發展形態的桎梏，於是革命的時代就要到來。”（註七四）這一段意思，是馬氏指示我們，社會的下層基礎，生產力與生產關係，有發生衝突的時候，即生產力常在進化，生產力進化到與生產關係不相容，即生產關係桎梏了生產力的進化，此時就一定要發生革命，所以我們應知道社會不可避免地有革命的時代，這即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發生了變化的時代。馬氏又說：“因為經濟基礎底變化，全部無限的上層建築，也或遲或速地變化了”。（註七五）馬氏的這幾句話，是指示我們，凡社會的經濟

基礎變化了，那末，上層建築，自然也要隨着變化，不過我們在此處最宜注意的，上層建築的變化，不是同一個時候，牠的變化，自然在基礎變化之後，受基礎變化的影響而變化；但是，或則很快地隨着基礎的變化；或則很遲緩，雖下層基礎早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仍遲延殘存着，尚未變化，自然終不免要變化，但必須經過較長的時間，始全部變化，起先，只少數部分的變化。因此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常不一致，常成爲兩種各異的形態，經過長期衝突之後，始變化達到一致。馬氏又說：“在考查這些變化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的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化，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作嚴密地區別出來。”（註七六）這是馬氏教戒我們，應嚴密地用自然科學的精密方法，所能證明的，以區別上層建築與下層基礎，已算是十分注意地在叮嚀我們了，無如現在一般馬克思主義者，常把這個區別忽略了。

（註七四）馬克思著：政治經濟批判序言。

（註七五）同上。

（註七六）同上。

上面這些意思，即人人都知道的，所謂唯物史觀的定律，凡馬克思主義者，起碼即應該澈底了解的，本用不着這樣諄諄然來解釋。不過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者，在經濟學上，發生了封建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兩派的爭論，即由於沒有澈底了解這種定律，竟公然違背了這種定律，才發生這樣的矛盾，才發生這樣極端相反的結論。這由於他們，或則不知道下層基礎，——經濟基礎，常有變化；不知道此下層基礎的變化，與上層建築物的變化，應該有嚴密的區別。或則雖知道下層基礎有變化，且已變化了；但不知道上層建築物的變化，不是與下層基礎同時變化的，牠的變化，常要遲延一些時間。因此，他們或則認定上層建築沒有變化，以為下層基礎，亦沒有變化；遂按照上層建築物的形態，以解釋下層基礎的狀況。或則認定下層基礎既已變化，以為上層建築的形態，也必定同時變化；遂按照下層基礎變化的狀況，以解釋上層建築物之未變化的形態。於是當然不可避免地，要發生各走極端，絕對相反的結論。故我們欲分析他們在經濟問題上的這些爭論，不能不先把這個定律，作一個稍詳的說明。

中國數千年都處於黑暗的封建勢力之下，封建勢力當

然異常濃厚，數十年前，社會的上層和下層，當然都是封建的。在帝國主義未侵入以前，資本主義未發展以前，中國的經濟，當然是建築經濟，即自給的自然經濟，和家庭工業手工業的經濟佔優勢。下層基礎既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自不待說，自然亦是封建的。上層建築物之一的政治法律等制度，是封建的，而上層封建之二的宗教，美術，哲學等意識形態，亦必是封建的。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來，已一世紀以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封建的下層基礎，確已摧毀；我們在上面已作了詳細的研究，和事實的證明，已成爲不可辯駁，不可否認的事實。但是，上層建築物是怎樣呢？是封建的嗎？抑非封建的呢？這就是我們現在所研究的問題了。以唯物論的原則說，下層變化了，上層當然也要變化，但牠的變化總是在下層變化之後，決不能在下層變化之先。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封建經濟，變化的事實，人人都可以知道，隨時隨地都可以見到，所以這是不容否認或懷疑的事實。至於上層的建築物，那就不然了，我們逐處都見着是異常濃厚的封建勢力，雖因資本主義的發展，封建關係，雖不免有一部分的變化，然而保持封建的舊勢力未變化者，還要佔最大的一部分。所以凡說到中國有封建勢力，無

人敢加以否認，李立三的中國革命的根本問題，所說的那一切封建剝削，完全是社會的事實，任何人都不能否認。我們在前面摘錄嚴靈峯述敘封建的那段文字，也是社會上的事實，只有遺漏了的，沒有過於鋪張了的；所以就是杜洛斯基，以左傾自居的人，也不敢否認中國的封建勢力，足以證明中國封建勢力的存在，已成為鐵案。由此我們就可以說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即封建經濟已摧毀了；不過上層建築物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尚保存有很濃厚的封建勢力。所以中國現在，在政治上仍然是封建勢力在當權，這是客觀的事實，不能由主觀的願望去否認。

以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說，資本主義發展了，即是資產階級發展了，資產階級的社會，必有資產階級社會的上層建築物，以適合於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發展的政治法律制度，和一切意識形態，所以馬克思說：“於是自由競爭，便來代替了牠們的地位，適合這自由競爭的社會和政治組織，也就跟着出現，資產階級的經濟和政治權力，也就跟着到了。”（註七七）他又說：“資產階級發達一步，他們的政治上的權力，也便跟着發達一步。當初在封建時代，貴族掌權的時候，他們也是被壓迫的階級，在中世紀的自由都市裏，他們便是

個武裝的自治的團體；有的變成獨立的自由都市，（如德意）有的變成君主政治下納稅的‘第三階級。’（如法）以後到了手工業時代，他們被封建或專制的君主，用做抵抗貴族的工具；且是事實上大王國統一的柱石。最後，自從近代的產業和世界的市場成立了，他們就成為資產階級，一手把持了那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算辦理他們公共事務的一個委員會罷了。”（註七八）由這樣看來，封建時代的上層建築物，是貴族政治，資產階級當是被壓迫的階級；一到資本主義社會，資產階級就發展了，資產階級的政治權力，也跟着發展了，且把持近代代議制度國家的政權；近代國家的行政機關，只是替他們辦理事務的委員會，完全受他們的支配。試看中國現在是怎樣呢？資本主義誠然發展了，資產階級發展了沒有呢？沒有，牠的勢力微乎其微，尚在受封建勢力的支配。近代代議制度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國家的特徵，中國現在是否是代議制度的國家呢？中國的行政機關，是否受資產階級支配呢？只要稍有心肝的人，都不能說中國現在的國家，是資產階級式的國家，國家的政權，是由資產階級在支配。所以中國現在社會的下層基礎，雖已變化了，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而上層建築物，仍沒有完全變

化，所以中國現在仍沒有完全的資產階級政權，仍由封建勢力在支配政權；至多或由封建勢力和資產聯盟在支配政權罷了。

(註七七)馬克思和恩格斯著：共產黨宣言。

(註七八)同上。

馬氏又說：“從歷史上看來。資產階級也曾有過革命的功勞，資產階級得了權勢，那封建的，家長的，田園生活的種種關係，便到處被牠消滅了。結合人和牠的生來的上層的封建的線索，也被牠盡情地剪斷了。人和人中間，除了明目張膽的，自利刻簿寡情的，金錢主義外，再也找不出甚麼別的聯結關係，宗教的熱忱，義俠的血性，兒女的深情，早已在利害計較的冰水中淹死了；人的價值，變成了交換價值，無數永久特許的自由，換了單純的無理的自由，——自由貿易；總之，資產階級，是將從前戴着宗教和政治的假面具的掠奪，變成赤條條的，沒廉恥的，迫切的，殘忍的掠奪。”(註七九)馬氏這段話，證明資產階級社會由資產階級的意識形態，代替了封建社會的意識形態。中國現在，社會的上層建築的意識形態，是怎樣呢？是封建嗎？抑是資本的呢？自帝國主義侵入和資本主義發展以來，近代科學思想和資產階級意識，自然

也跟着侵入，以摧毀封建意識，以變化封建意識。但被摧毀被變化者，僅一小部分，而封建時代之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孔教的階級觀念，宗法思想，及封建社會的一切風俗習慣，仍然保存者，尙異常濃厚。除工業的大都市而外，不獨農村是這樣，即很多的城市，亦是這樣。這又證明中國的下層生產關係，雖已變化，而上層建築物的意識形態，仍沒有完全變化，仍受封建勢力的統治。

(註七九)共產黨宣言。

上層建築物自然是跟着下層基礎變化，但牠怎樣跟着變化呢？變化的次序是怎樣呢？只要我們把資產階級出世以來的歷史知道以後，就可以知道這種變化的次序了。自蒸氣發明和工業革命以來，資產階級就露頭角了；他們首一步摧毀城市的行會和手工業，農村的自然經濟，代以大工業和農村商品化。更進而奪取世界市場，使殖民地資本主義化。他們要達到這種目的，都須國家替他們去執行；此時國家政權，當在封建的貴族手中，貴族的經濟基礎，是農村的封建經濟；當然與資產階級立於利害衝突的地位。於是資產階級，或用暴力革命的手段，如法國；或由議會和平的手段，如英國；將政權奪取過來，使完全受他們的支配，務使適合於

資本主義的發展。資本主義不獨需要資本，並又需要科學；於是由國家在城市設立大學，專門學校，和勵行普及義務教育，人人都能讀能寫。新聞事業也異常發達，人人都能讀報，國家和社會的一切狀況，都載在新聞中。國家是資產階級的委員會，凡新聞中載有本國和世界關於他們的事件，都要責令國家負責去辦理，科學和教育，既發達了，於是神權的玄學的思想，就不相容了；所有封建時代的一切風俗習慣，和宗教觀念，都竭力摧毀，期其消滅無遺。

資本主義發達後，交通亦隨着發達，城市與農村的交通，密如蛛網，頃刻即可往返；農人的消費和生產，既已商品化，自然要隨時來往城市。城市工業發達，人口增加，農村生產品的交換價值，亦隨而增加。農業工業化，農人生產的額量，自然也要增加。於是農人的生活，異常充裕，既有資財，常需要到城市去實行交換，而又有閒暇，常需要到城市去圖娛樂。因此，常與城市資產階級周旋；城市資產階級，既常留心於國家政治，而又奧伏赫變了封建意識，農人亦因而亦留心於國家政治，——知道國家政治，密切地關係於他們的生活，——奧伏赫變了封建意識，且又常有工業資產階級，住於農村，或他們的親戚戚友，住於農村；於是他們遂常注

意增進農村文化，農人的經濟狀況，既已進步，他們也有資力增進文化，且需要增進文化。因此，農村中的學校，圖書館，博物館，遊戲場，體育場，亦如星羅棋布。由是農村中的文化，雖不及城市，然而亦未過於落後。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的國家，農業已工業化，農村已城市化；農業與工業，農村與城市，未曾判若鴻溝，未曾築有萬里長城。此其所以各帝國主義國家的封建勢力，消滅得異常迅速，下層基礎變化了，上層建築物亦隨着變化了，資本主義發展了，資產階級亦同時發展了，而資產階級的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亦跟着發展了，與殖民地和半殖民地的社會狀況，完全不同。我們若忽略了這個不同之點，那末，在經濟和政治上的觀察，就不免要發生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

中國受帝國主義的侵略，既已百餘年，資本主義的發展，亦將近一世紀，所以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變化了，而上層建築物，則尚沒有完全變化，尚殘留很濃厚的封建勢力，這是甚麼原因呢？此即由於中國係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之故。

中國封建經濟被摧毀的第一力量，為對外貿易，據海關報告，一九二九年，中國的進口貿易，為十二億六千五百餘

萬兩，出口貿易爲十億一千五百餘萬兩，合計對外貿易總額約爲二十二億八千一百餘萬兩，合銀幣三十四億二千餘萬元。以這樣巨大無比的力量，向着中國封建經濟，朝夕不斷地摧毀，那怕中國的封建經濟，有萬丈高和厚的銅城鐵壁，經過這百餘年的摧毀，也要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的毫無遺跡。何況帝國主義的商品，價廉物美，受一般人的歡迎，無所抵抗呢？此其所以自帝國主義的商品侵入以來，中國封建經濟的手工業，家庭工業農村自給經濟，遂如山崩地裂地，日趨於傾覆，迄今只餘一點殘餘，幾將達於完全消滅了。

中國的封建經濟，誠然被帝國主義的商品摧毀了，但是，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上，其影響如何呢？這是值得注意研究的，此十二萬萬餘萬兩的輸入，除極少的一部分原料和機器，是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的輸入外，其餘的大部分，都是外國工業製造品，且多係個人消費品，很少生產消費品，因此，只算是摧毀封建經濟的動力，不是發展資本主義的動力；故外國商品的輸入，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能說無影響，然而影響極少。至於輸出品，中國工業比較落後，製造品雖也有輸出的時候，然而極少，十之九以上，都是原料品；此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更少關係，只算對於摧

毀封建經濟有絕大的力量。中國農村，現在自然有很多的消費品，是由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自然是受了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是由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製造的，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農村中所生產的原料，也是供給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自然也是要受資本主義的支配；然而供給外國蒸汽機的大工業的製造，仍是受了外國資本主義的支配。（註八十）此兩方面，都只算是摧毀中國封建經濟的最大原因和動力；而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上，關係甚少，僅於交通運輸，擴大商業，擴大買辦階級方面，有相當的影響罷了。

（註八十）我的鄉村，是生產桐油的地方，近年因金價的關係，桐油滯銷，桐油商業的買辦破產，生產桐子的農人也破產，今年上海百餘家絲廠的破產，江浙兩省養蠶的農人，當然亦將破產。這是中國自然經濟摧毀後，受國際市傷和國際資本主義支配的明證。

第二，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未達到最後階段，然而亦有了相當的程度，這是我們在上面由統計數目證明過的；如此，則中國的資產階級，亦應有相當的發展，足以掌握政權，克服封建勢力。但我們又在上面，由統計數目，證明過中國資本主義的勢力，佔外國十之六七，中國只佔十之二三。所以中國資產階級的能力，異常薄弱，不能獨立掌政權；只

能投降於封建勢力，或與封建勢力聯盟，以維持他們的階級利益。他們的富力亦有限，不能供給較多的經費，擴張科學和教育，克服封建意識。任何國家，農村常受城市的領導，中國城市資產階級，既如此怯懦，如此委靡不振；農村資產階級，更不能有所作為，不能發達他們的階級意識，和階級責任，更奴顏婢膝地，曲服於封建勢力之下。此其所以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即封建經濟，早已摧毀，被資本主義代替，而上層建築物，即國家政權和意識形態，仍受封建勢力的支配。

這是什麼原因呢？這就是半殖民地和受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不明白這種特徵，對於中國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決不能有澈底的瞭解。斤斤然分別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的事件，不是無產階級的責任。無論中外資本主義，洋土資產階級，固然都是無產階級的同一的敵人，應加以同一的看待，無所用其區別。但是，我們欲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成份，不注意帝國主義，不將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資本主義的數量上，作一個測量，那末，決不能達到圓滿的目的，所得的結論，定將是絕大的不可恕的錯誤。因此，我們的區

分中外資本主義，不同於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者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他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爲他們的階級的利害，我們之區分中外資本主義，乃在於藉此使澈底了解中國資本主義的性質和資產階級的比量，以便爲我們無產階級的革命，建立正確的理論和策略，故我們對於中外資本主義，有時不應區分，應同一看待，有時則又不可不區分，以別真偽。若以區分中外資本主義，是資產階級學者和愛國主義的事件，我們遂因噎廢食，完全不許作此區分，那末，這又不免陷於教條式的機械唯物論，而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了。

第三，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不平衡，中國新式的資本主義的大工商業，皆偏於東南，而西北的大工商業極少，差不多等於沒有，如四川爲交通較便利，財產較豐富之區，輕工業發展如紡織的大工廠，亦沒有一個，西北工業之不發展，已就可以想見。故西北的下層基礎的封建殘餘，固較東南爲甚，而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更較東南爲甚。所以中國近年的革命運動及政治變遷，常由東南領導西北，而西北幾別爲一天地，大類於歐洲的東南。

現在我們看一下，中國農村的上層建築物，究竟是怎樣

情形，中國的農民，大概百分之五十以上，不識字，他們幸而受教育識字者，亦不過三字經，百家姓，孔孟四書，紳士的子弟，或多受一點五經罷了。這完全是封建教育，自然也有採取新式教科書的國民小學，但教員既沒有充分的常識，而家庭和社會的環境，復無處不是十二分濃厚的封建意識。故布爾喬亞的意識，很少侵入農村。所以農人富於神權思想和命運觀念，信仰一切的神怪，只希望神怪保佑他們，免災納福，他們不獨視貪官污吏，有很好的命運，羨慕他們；並視土豪劣紳，都有很好的命運，要羨慕他們，恭敬他們。至於大軍閥，更視爲天上的神仙下凡，故十之八九的農人，都希望再有皇帝出現，天下才得有太平。他們自身受土劣貪污，封建軍閥的剝削，和凶年天災的痛苦，都以爲是由於他們的命運，應該如此，上天注定了的厄運。這真是受了孔子不怨天，不尤人的封建教育。他們決不敢說一句反抗有權勢的人的話，不知道現在的政府，是幹的什麼事，不知道政府同他們發生了什麼關係。科學本可以破除他們這一切觀念，但他們很難有接受科學知識的機會，西北的農人，自然沒有見過鐵路，乃連輪船亦少有人見過，他們幾乎完全是無懷氏葛天氏的逸民。他們的政治觀念和意識形態，雖然如此，然而他們

的經濟生活，却又是資本主義化了，這種矛盾現象，就是中國的農村狀況。

我們在上面已將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轉變的事實，上層建築物，沒有轉變的原因，已有較詳的證明，想來讀者已可以明白這種意思了。本來這一切的事實，都是擺在我們面前的，人人都見着，都可以知道的，怎麼中國的科學社會主義底馬克思列甯主義者，有這樣極端相反的兩派，或主張封建制度經濟，或主張資本主義經濟呢？這種原因，我已在上面說明過一次，這就由於他們沒有徹底了解馬克思的經濟學的定律，第一，他們沒有注意將社會的下層基礎和上層建築物，嚴格的區別清楚。第二，他們沒有知道下層基礎物和上層建築物的轉變，不是同時進行的，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不同；所以下層基礎物雖已轉變了，而下層建築物常暫時沒有轉變。因為他們沒有注意這兩個定律，所以才發生兩派極端不同的主張。

我們把他們兩方面的理論，對照着一看，就覺得主張封建經濟的，在政治上的理論和策略，多合於中國的事實，而在經濟上的理論，就不免缺乏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根據，不合於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主張資本主義的，在經濟上的理

論，固然異常漂亮，富於馬克思主義的根據，不過依據他們的經濟理論，所發生出來的政治理論和革命策略，就不免不合於中國的事實，且亦不合於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了。這就由於他們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所以他們在上層建築物的理論，多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遂依據上層建築物以說明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或則認識了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所以他們對於下層基礎物的理論，不獨合於中國社會的事實，尤其合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遂根據下層基礎，以說明中國上層建築物；他們都只認識了中國社會的半截，都只了解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半截，他們都只算是半截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都不是整個的完全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主張資本主義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既是資本主義了，遂以為中國的上層建築物亦必是資本主義化。於是就由他們主觀地認定中國已有了強大而獨立的資產階級和由資產階級獨立支配的政權，似若中國無處不是資本主義了。主張封建制度經濟者，以為中國社會的上層建築物，既是封建勢力了，遂以為中國社會的下層基礎亦必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於是遂謂農村完全是自然經濟城市不是以支

配農村，似若中國全社會，無處不是封建化，他們兩方面，都太機械了，都只算是機械的唯物論，不是辯證法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

根據下層基礎說明上層建築物，這本是馬克思主義的原則，在通常資本主義的國家，本應遵守這個原則。不過他們沒有顧及上層建築物的轉變，有或遲或速的關係，只算是機械地應用了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陷於機械的唯物論，非辯證法的馬克思主義者。以上層建築物說明下層基礎，不獨是機械的，非辯證法的，且違背了馬克思說的“我們不能本着變革時代的意識，來判斷這個變革時代；反之，這個意識，毋寧從物質生活底矛盾，從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間現存的衝突來解釋。”（註八一）那個定律，這算是黑格爾倒立的辯證法，把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顛倒了。故他們除了是機械的非唯物辯證法的而外，更多了一層反馬克思主義的錯誤。至於著者證明中國的下層基礎轉變了，上層建築物尚沒有完全轉變，仍是由下層基礎去證明的，即由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關係去證明的，並不是截然分成兩段去證明的。不過機械的唯物論者，只知道機械地將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照通常帝國主義的資本主義的發展一樣地去解釋，不知道以唯物

辯證法地去解釋，他們只知道是——是和否——否，不知道是——否和否——是，才陷於他們那種的錯誤。

(註八一)政治經濟學批判序。

社會的下層基礎，已轉變到資本主義，而上層建築物尚滯留於封建勢力，中國的事實，既是如此，根據馬克思的學理，亦應如此去解釋，而世界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歷史，亦多是由如此的經過。二十世紀初期的俄國，列寧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然而他對於當時的俄國之上層建築物，仍認定是封建勢力，所以當時布爾塞維克，認定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是代表封建勢力的沙皇，(中國現在應認定代表封建勢力的軍閥，為工農民權革命的主要的敵人，方算是真正的布爾塞維克的理論和策略，)(列寧在一九〇五年，所著的“兩個策略”，中心問題，是臨時革命政府，因為要推翻封建勢力的沙皇，才能實現民權革命，故不能建立臨時革命政府，)不但俄國是如此，法國自一七八九年，即實現了土地革命建立共和國家，即算是資產階級的國家了。然而自拿破崙至波拿怕特，法國的上層建築物，又經過幾次的封建復辟。在十九世紀中葉，發表共產黨宣言以後，德國當然也是資本主義國家之一了。然而德國此時的上層建築物，不獨是

殘餘的封建勢力，並且是整個的封建制度。此時的英國，亦是貴族院佔優勢，即上層建築物仍是封建勢力佔優勢。但牠們此時的下層基礎，不能不說是資本主義的，可見中國現在的社會這種矛盾的發展不一定完全是例外或特殊的。

只有上層的封建建築物，沒有下層的封建基礎，(下層基礎既已轉變成資本主義，上層殘餘的封建勢力，不獨是矛盾的，且又是衝突的，)此等社會，必定隨時都是動搖的，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十九世紀上期的法德，是如此，廿世紀初期的俄國，亦是如此，近二十年的中國，更是如此。且現在不獨中國是如此，凡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以及歐洲東南各國，南美各國，都是如此。皆因帝國主義的商品，在此等地方，摧毀了下層基礎的封建經濟，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建勢力。於是這些國家，都是些沒有基礎的封建統治成爲空中樓閣的上層築物，當然隨時都在動搖，隨時都有政變，隨時都在發生革命，所以中國的革命，是必然的。中國的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國家的革命。是必然的。牠們的革命的勝利亦是必然的。

我們的結論是：中國的資本主義，(但是變態的資本主義)已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只殘留上層建築物的封

建勢力，此即爲半殖民的特徵，帝國主義統治的特徵，因我們已證明資本主義發展了，無產階級已發展了，所以我們應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推翻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不然，倘主張封建經濟，此不獨與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農民的民權革命是矛盾的，而與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由工農民主專政轉變到無產階級專政，向非資本主義發展更是矛盾的，沒有根據的。我們不能主張封建經濟者，同時復主張由民權革命轉變到社會革命，向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發展。以什麼作根據，得出如此矛盾的結論，如俄國由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幾個月的轉變，當幾十年，由八千餘的布爾塞維克，轉變到十餘萬的布爾塞維克，布爾塞維克在蘇維埃中，由少數轉變到多數，主觀的條件，由如此迅速的轉變，是可能的；但客觀的物質條件，不是幾個月可以轉變的。試問主張封建經濟者，有什麼魔力，可以由封建經濟，幾個月就由空中樓閣，轉變到非資本主義了呢？這樣的推理，實在令人百索不解，故中國現在，不獨事實上已證明是資本主義社會了，而革命的理論上，亦應證明是資本主義，一切革命的戰略和策

略，方才有根據，方合於無產階級現在和將來的歷史任務。

中國馬克思列寧主義經濟學的研究，已經過了辯證法的發展，譬如主張封建經濟者為肯定，主張資本主義者為否定，我的研究——變態的資本主義，即半殖民地的資本主義，則為否定的否定。這又譬如由黑格爾的辯證法唯心論，轉變為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由費爾巴哈的機械唯物論，再轉變為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唯物論，是一樣的情形。

5. 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學批判

中國是一個農民佔人口的多數的國家，故土地問題，亦為中國經濟問題中最重要問題。茲將拙著——怎樣幹——第七章土地問題中，摘錄一段，附在此章後發表，以補充此章中不足的意思，以下即是在土地問題中摘錄來的一段：

中國現在的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無論封建經濟派，無論資本主義派，都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主張封建經濟者，把資本主義完全抹殺，專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眼中只看見一個封建關係，於是凡中國社會中，無事無物，不是封建的，逐處都給以封建的口號，逐處都以封建的關係來解釋。殊不知到了資本主義的時代，封建經濟，只是一種殘餘，

一天一天地逐漸滅殺，逐漸消滅，惟反動的保守派，終日頑固地向後看，才斤斤不捨地，留戀於此種日漸消滅的殘餘。無產階級是進步的階級，應該向前看，無產階級是由資本主義產生的階級，所以無產階級的立場，毫不容懷疑地，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是無產階級革命的代表，所以馬克思主義，是站在無產階級的立場，向資本主義方面研究，凡馬克思主義者，無不竭力闡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凡馬克思主義者，唯一的目的，專在於說明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因此，凡離開資本主義，即等於離開無產階級的立場。離開資本主義來談經濟學，即等於非無產階級的經濟學者，非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

資本主義產生於封建的廢墟，在資本主義的時代，自然不免尚存留不少的封建殘餘，但馬克思主義者，絕不能，且不應因此種封建殘餘，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馬克思在共產黨宣言上說：“資產階級在掌握權力，不過百年的時期中，”然則在發表宣言的百年前，已是資本主義的時期了，我們現在姑且退一步，只認定發表宣言時為資本主義的時期，然而在此時期，歐洲的封建勢力，比中國現在還濃厚得多。我且舉出幾種事實，請讀者去看一

下。馬克思在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上說：“耕種自己的小塊土地的農民，形成法國人口的大多數。在全國中，他們生活，差不多在同一狀況中，但相互間很少發生關係。他們的生產方法，使他們隔離，使他們不能互相交通，這個隔離，因法國交通手段的惡劣，與農民的困窮而更厲害。他們的耕種極小，因之沒有應用分工勞動，科學耕種的機會，所以在農民中，不能有進化的層次，技術的差異。社會關係的財產，每一個農民家族，差不多都是自足自給的，大都分的需要品，生產於自己的土地上，就這樣使牠多半是與自然交換，而不由社會的交通機關，以取得生產的資料。所以在這裏有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家庭，在那裏有另一小塊土地，有一個農夫和他的妻與子，由幾十個這樣的家庭，集成一村，又由幾十村又集成一縣。”——圈是著者加的——（註一九八）這就是十九世紀中葉的法國的農村狀況，請問中國主張封建經濟的馬克思主義者，——我姑且這樣稱呼，其實站在封建經濟的立場，已經沒有絲毫馬克思主義的氣味了，——你們把中國現在的農村狀況，與法國當時的農村狀況，兩相比較一下，究竟那一個的封建勢力濃厚些呢？我看法國當時的農村，無論由經濟關係方面說，由上層建築物方面說，都比中

國現在的封建勢力，還要濃厚得多。然而馬克思絕不因法國的農村，尚殘留有封建關係，而即離開資本主義方面，趨向於封建經濟的地位，來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可見在資本主義的時代，即使尚殘留不少的農村封建經濟，仍無稍妨害於馬克思主義者，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去研究經濟問題。

(註一九八)馬克思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中譯本，p. 167—168

不但法國如此，德國的封建制度，在一七八九年八月四日才廢止，（但實質上尚沒有完全廢止）（註一九九）共產黨宣言，所指的資本主義的國家，德國當然也不在例外，然而在一八四八年，德國是怎樣的情形呢？我且把“德國共產黨的要求”關於農業政綱，摘錄兩項來作證明，“第六項，從來課於農民之上的一切封建的負擔，如租稅，力役，十分一稅等，均不須補償而即廢止之。第七項，君侯所有的，以及其他封建的領地，一切鑛山，鑛坑，都收歸國有。……（註二〇〇）請讀者看一下，發表共產黨宣言時的德國，不獨尚殘留有封建勢力，且尚殘留有整個的封建制度。然而馬克思此時，絕不因德國的封建制度，而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發揮封建經濟的關係，不，絕不，他完全是相反的，完全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竭力發揮資本主義和無產階級間相互的關係。可見即使

在封建制度的國家中，只要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的發展，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亦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不應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留戀於殘餘的封建關係。

(註一九九)見威廉·科因斯特著德國社會民主黨的農業問題。

(註二〇〇)馬克思著：德國共產黨的要求。

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者，即站在資本主義方面的，仍不免同站在封建經濟方面的一樣，陷於同一的錯誤，即同陷於機械唯物論的錯誤。他們以為既站在資本主義方面，逐處均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乃連農村經濟，也以為逐處都應由資本主義去解釋，逐處都是資本主義的關係，決沒有殘餘的封建經濟的關係了，遂硬說關於土地使用權的租佃關係，和地租關係，完全是資本主義的關係，絕對不是封建的關係。

試問站在馬克思主義的無產階級的革命家，是不是主張由無產階級領導的革命，應以農民為唯一的同盟者呢？無產階級對於農民的同盟者之唯一的目的，是不是在於幫助牠，謀經濟上的解放呢？欲為同盟者謀經濟上的解放，乃對於同盟者的經濟關係，沒有正確的認識，反為封建勢力作辯護，這也是無產階級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革命家，對於同盟

者應有的態度嗎？這也只有托洛斯基派，否認農民在革命運動上的作用，才有這樣違背事實的機械唯物論的經濟分析——我們應把本章中駁托派關於地租的錯誤，附錄一小段在後面，讀者始易了解上面這兩段的意思。

凡馬克思主義者，固然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作經濟的分析，但不能因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絕對不應說明封建經濟的關係，完全否認封建經濟的關係了，所以著“資本論”的馬克思，在著拿破崙第三政變記時，仍不妨描述法國農村中的封建經濟的關係，在作“德國共產黨的要求”時，仍必須替農民提出廢止封建制度的綱領。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在第三章中，仍不妨證明封建殘餘的工役制。(註二〇一) 列寧說：“擺在我們面前的，在歐洲的文明的近代資本主義的意義上，完全不是佃農，擺在我們面前的主要的，是半封建的，半奴隸的佃農。”(註二〇二) 列寧自是徹底的馬克思主義者，想來必不因他證明了封建經濟的關係，即否認他是馬克思主義者了，乃是相反的，反因此證明他是辯證法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大別於機械唯物論的馬克思主義者。

(註二〇一)參閱列寧著：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第三章，p. 207—228。

(註二〇二)列寧全集(第九卷,p. 192.

“生產品的地租，各種經濟，以及其落後地租的形式，在某種條件下，縱使在高度發展的資本主義國家中，亦可於殘廢了的生產方法之殘餘的性質中生長着。一九一〇年，在北美合衆國，曾有百萬以上的黑奴佃農。南美黑奴佃農的形式，是廢除農奴的結果發生的，但結果農奴並沒有完全廢除。此種黑奴佃農，‘曾是發展於俄國式的完工的制度，即所謂佃奴的基礎之上。’(註二〇三)可見在資本主義最高度的發展，即資本主義發展的最後階段的美國，仍殘留有封建經濟的殘餘，我們不能因為馬克思主義者，應站在資本主義方面，分析經濟，即應否認此殘餘的封建經濟，或用資本主義的法則，機械地去解釋此種殘餘的封建經濟，以主觀的人為的，證明牠是資本主義的；亦不應因殘留有此種封建經濟的殘餘，即站在封建經濟方面去否認資本主義的發展，主張由封建經濟支配社會經濟的全體。必如此立論方不失辯證唯物論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立場。

(註二〇三)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p. 305.

中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最可憐的莫過於他們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

係和政治關係，都要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死公式底範圍。主張封建經濟者，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力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底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封建的關係，也是封建的關係；不是封建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封建的關係。因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封建經濟的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主張資本主義者，亦預先規定一個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死公式，使中國社會中一切經濟關係和政治關係，都期必曲就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公式範圍，無論在經濟方面在政治方面，都必拿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去解釋；不管社會的事實是怎樣，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不是資本主義的關係，也要生拉活扯地硬說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因為不如此就不免不合於他們的機械的主觀的資本主義底死公式。至於社會的事實是否如此，是另一問題，是不關重要的事件，他們的死公

式才是唯一的主要的事件。所以他們這兩方面，由中國經濟上和政治上分析出來的理論和策略，大多數不是社會的事實，不合於社會的事實，只是他們的主觀的幻想和機械的公式。凡這一切，就是中國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發明出來的，妙盡天下的，唯一的，妙極無疆的革命理論。“倘警察不禁止人，在街市發笑”(列寧)，那末，俄國的無產階級聽着如此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定要在街市中發出幾天的大笑。

現在我們又把駁托洛斯基派關於地租的錯誤理論，附一小段在此：

在現在的中國，嚴靈峯和任曙兩君，算是馬克思主義經濟學者中的鳳毛麟角，他們兩人，對於中國的經濟問題，都有相當的貢獻，他們把帝國主義和民族資本主義，統一地研究，證明城市的資本主義，已足以支配農村經濟，這是對的，這算是抓着了經濟問題的重心。不過他們仍不免陷於機械的唯物論，只知道是——是和非——非，不能辯證法的研究問題。社會中任何問題，都有統一與對立，普遍與特殊等相互關係，我們研究問題時，從統一和普遍研究後，仍須從對立和特殊方面去研究，然後才知道牠們彼此相互的關係。他們知道注意統一和普遍，常忽略對立和特殊，遂不免發生

了極大的錯誤。嚴靈峯君對於地租問題，也由這種關係，發生了錯誤，他以為資本主義，既支配了農村，則農村中所有的一切經濟關係，都是資本主義了，無一不是資本主義的，——他與李立三一様，由封建經濟出發，遂覺得全中國，無地不是封建關係，逐處都由封建關係去解釋，他在他著的“職工運動概論”上，論工人待遇時，也屢說封建剝削，封建待遇，每一個人，得着了一個法寶，就以爲是萬應靈藥，逐處都拿去應用，——他由這一點出發，關於地租問題，亦由這樣去解釋。

所以他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50或%70%）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註一八七）我們已在上面，證明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嚴氏說的地租不是中國事實上的地租，只是嚴氏主觀上幻想的帝國主義國家內農業資本主義化的地租。嚴氏又說：“至於這地租，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所創造的一部分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須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註一八八）噫！中國的地租，既剝削到

農業總收入的百分之五十或七十，尚只是農民的剩餘生產物，由他的剩餘勞動造成的嗎？那末，我請問，農民工作比城市工人，加倍的勤勞，農民生活，比城市工人，加倍的惡劣，他還要受高利貸的剝削，因而破產失業，這是什麼原因呢？只有上帝才知道。嚴氏又說：“佃農如果不向地主租地，則任何地主絕沒有強迫農民佃地的可能，這種佃農與新式地主之間，無論如何，在名義上和法律上，是平等，是以雙方同意為前提。”（註一八九）嚴先生是深瞭解馬克思主義者，難道沒有瞭解馬克思說：“社會關係的綜合，構成所謂現在的私有制，超乎此關係，資產階級的私有制，便只是形而上學的，或法律的騙局，”這幾句話嗎？嚴先生在此地也不免太拘於形式了。

（註一八七）動力，嚴震峯著：再論中國經濟問題，p. 33.

（註一八八）同上註，p. 34.

（註一八九）同上註，p. 36.

嚴氏又說：“至於百分之五十或七十的地租，這並不足證明地主對農民的剝削，要比資本家對工人的剝削為重，資本家所剝削工人的剩餘價值，常超過百分之五十以上。”（註一九〇）嚴氏在此處，更有重大的錯誤，不知地租，是地主與

佃農的關係，佃農具有企業家的關係，他自有工具和資本。工人的工資，是資本家與勞動者的關係，單在於工資和剝削的關係；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百分之五十以上，只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只是剝削工人每日的勞動生產量百分之五十以上。地主對於佃農剝削到百分之五十或七十，那就大不同了，乃是剝削農業的總收入百分之五十或七十。此不單是對於可變資本的比例，乃是對於可變資本和不變資本以及利潤底比例。故資本家對於工人的剝削只剝削剩餘勞動的剩餘生產品，至多不過必須勞動的必須生產品底一部；而中國地主，現在對於佃農的剝削，不止剩餘生產品，常剝削及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且不止於必須生產品的一部，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家的利潤。有時并剝削到佃農的資本。這種區別如一個在天上，一個在地下；一個是十分之五，一個是百分之五。在質量上和數量上都迥然不同，怎能說是一樣的呢？嚴氏橫直機械地要替封建剝削辯護，要把資本主義的法則，普遍地應用到農村經濟方面去。才陷於融九州之鐵鑄不成的一個如此的大錯。

(註一九〇)同上註，p. 59.

上面這兩段摘錄的文字，讀者見了，一定覺得首尾不

貫，莫明其妙。但此種片段的摘錄，莫可如何，必俟將來將土地問題全章發表後，始能使讀者瞭解作者完全的意見。

科學的故事

法布爾J. H. Fabre原著

宋易譯

法布爾是近世第一流的昆蟲學者，同時也是個第一流的自然科學者。他生平最嫌惡艱深難解的學問，常說學問這東西，決不是道貌岸然名叫『學者』的那種人，關在名叫『研究室』那種地方所能解決的。在現世界的習慣，對於學問是過分尊視了，對於一般普通人是相隔得太遠了。大家都以為，對於無論何種研究，只要吃這一路裏飯的學者知道，別人不知道也無妨，或者是無知道的資格。這是非常錯誤的。除了非常專門非常困難的研究以外，一切普通的學問，無論是孩子大人都應該知道的。於是他以故事的體裁，寫了他的世界名著『昆蟲記』之外，又為法國的，不，為世界的孩子少年成人寫了十幾大卷的『科學知識全集』。這本科學的故事就是該全集的一個序論。茲由宋易先生根據英日兩種譯本譯出來了。宋易先生以翻譯童話之筆，而譯這部科學知識名著，其簡明流暢自無待言了。

(3)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中外貨幣政策	彭學沛	一元二角	這書上卷敘述批評戰前戰後的貨幣政策理論，并時時拿中國情形來比較參照。中卷歷述美，英，德，法；蘇俄各國的貨幣政策，下卷把中國貨幣政策沿革，貨幣制度現狀，加以極明晰的分析和解釋，并推論到中國貨幣政策的前途。
進化論證	William Berryman Scott	六角	自達爾文驚世名著物種原始刊行後，一切學術上都起了一個大變動，它的偉大的勢力，一直支配到現在，這本進化論證是 Scott 教授的名著，給進化論以切實的，充分的證據。無論研究那一門學問的人，不可不讀這本基本的書。
西洋哲學的發展	瞿世英	九角	這是瞿世英先生最近的傑作，敘述明顯，舉例詳晰，用為高中以上學校的課本或參考書，那是再好沒有。現在已有許多著名學校採用為參考書。
哲學概論	金子馬治 彭信威	八角	本書內容有兩大特點：(一)注重現代哲學，(二)詳述認識論，這是與一般哲學概論不同的地方。本書可作大學課本及課外參攷書。
各國財政史	小林丑三 鄒敬芳	一元二角	本書是財政史中的大名著，著者用統系地整個地述說世界各國財政，上起希臘羅馬，下迄大戰以後的現在，並附錄蘇俄的財政一文，遂成完璧。

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

鏡 園

中國經濟研究 任曙著 上海東明書社發行

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嚴靈峯著 新生命書局發行

這兩本書，都是想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來研究中國經濟問題，據著者的聲明，是他們將來的系統著作之“緒論”，或“發端”，他們都是歡迎人們的批評和指示的。本來，從馬克思主義的立場研究中國經濟，是十分迫切的工作，可惜這一工作在馬克思主義輸入中國十餘年之後，至最近二年始有人着手去做。“雖是遲些，比不做好些”，所以我們對於牠

應當歡迎，應當同情的與善意的指示出他們著作中之缺點與錯誤，希望他們能在將來的統系著作中有所改正。

任著的“中國經濟研究”之內容大意認“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八四頁)，“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一一三頁)。“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一四六頁)。“中國在世界範圍內已經發展到資本主義國家了”(一五〇頁)，換言之，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可與世界各國資本主義並駕齊驅，因此他認為說中國資本主義幼稚，落後的，是“非科學的錯誤見解”，(一四六頁)，不，而且是“資本主義的代言人，在盡其為資本主義掩護的任務”(同上頁)。他認為在國際的與本國的資產階級間，“一些小小的矛盾和區別”，我們不應管牠，而應“中外一視同仁”(一二六頁，一五二頁)。帝國主義並不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如果說中國資本主義受帝國主義的壓迫而衰敗，不振，進步微弱，那便是“資產階級的同情派”，“資產階級的擁護者”，“小夥計”(一五八——一五九頁)。“中國……非資本主義的物質基礎生長起了，並正在成長之中，大可以作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運動”(一五二頁)，在革命主張上……只叫

打倒帝國主義而不叫打倒中國資本主義……還不是很巧妙的掩護資產階級麼”？(一五一頁)。

以上是任君研究中國經濟的結論，或者在我看，這是他研究中國經濟的前提，於是他搜集許多材料以證明，或者適合於他的前提。

我以為任君在中國經濟研究中，雖然自己認為是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即唯物的辯證法，但實際他是很一偏的，只看見現象之一部份而未窺其全。辯證法即是說運動發生於矛盾。如果照任君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事實之陳述，則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發展是一直摧毀封建經濟，帝國主義亦不阻礙牠。如果是這樣，則我們只有問，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幾十年的結果這樣可憐，如在南京武昌等城市還沒有自來水的供給，像甘肅那樣的省份還沒有鐵路，像四川那樣的省份只有九五·六三基羅米突的鐵路，中國海關每年進口，為什麼仍以棉紗疋頭為大宗呢？因此，假如有人認為“在帝國主義壓迫之下，中國工業的發展是絕對的不可能”(二三〇頁)這是錯誤，但任君之走向另一極端，認為資本主義可以無阻礙的或阻礙很小的在中國發展，亦絕不是事實。實際的情形是：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經濟發展之一最重大

的因素。關稅(不幸任君在那本著作中無一字提及)的不自主是中國工業不發達的一最大原因。牠使中國每年入超平均四五萬萬，即是有幾十萬幾百萬中國的農民與手工業者破產(Expropriated)，而本國的工業發展所吸收的工人，遠不及失業的工農那樣多，所以他們流為兵匪，形成軍閥制度之基礎，年年內戰，以妨害全國範圍內之商品流通，使工業難以進步。至於帝國主義在華設廠，一方面固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一部份，因為牠集合中國工人於工廠，使中國工業化，但在另一方面，牠也含有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之成份，例如中國鐵和煤的出產有許多是運到日本去消費，而非供給本國工業。整個說來，帝國主義是阻礙中國工業之發展，試看去年進口，棉織品以外，甚至米麥棉花煤鐵均係仰賴國外供給，十九年度進口入超為四一四·九一四·一四八兩。不唯中國的工業因受了外貨的競爭，難以發展，甚至農業的危機亦到了可驚的程度了。

但我們絕不能因此得出結論，認中國工業絕對無發展之可能。中國的輕工業(紡織，麵粉，煙草)可以利用賤價之勞力，運費之節省等關係，相當的代替帝國主義輸入之商品，尤其金貴銀賤，關稅增加，能相當刺激本國工業之發展。其

他有些工廠亦可因營出口業(絲業,蛋業)而發達。此外帝國主義亦因避免關稅,減少運輸費,而移殖資本,在中國開設工廠。不過中國工業發展與衰落,常是受國際的因素所決定罷了。

照任君的意見,便是中國沒有民族問題,即沒有國家之獨立與統一問題,或者這只是資產階級的事,與工人階級無干。實在這是很錯誤的意見。中國資本主義不發展,中國平民所受的痛苦比資產階級還大得多。資產階級不開工廠,可以將資本放在銀行生息,或購買公債或作投機生意,資產階級是最怯懦,自私和沒有遠見的。但是中國工人因為失業者增加,找職業甚至要出運動費,於是抵抗力減弱,更容易為資本家摧殘,農民更易受高利貸者的剝削。所以他們爭國家之統一與獨立,與爭他們的生活之改良有密切的關係。

任君既然認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得與世界其他國家一樣了,那麼在中國之前的革命即是社會主義革命了,為什麼還是“非資本主義的革命”?非資本主義一名詞是列甯在俄國革命後,期望世界革命很快能夠實現,於是可以領導許多落後國家不經過資本主義而到社會主義。所以這是有條件的說法。如果任君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國家,則非資本主義前

途還有何意義？未必在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之間還有一非資本主義的過渡嗎？

任君對於將來中國革命性質的了解是不正確的。任君主張中國革命的民衆應當叫出打倒資本主義的口號。中國的經濟，對於封建關係說來，是資本主義關係佔優勢，但是對於純粹資本主義說來，牠還受着封建的剝削形式所束縛，不能自由的發展。就其客觀的任務說來，中國的革命還是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即是對外爭得獨立，對內實現土地革命，這二者乃是革命的主要內容，而不是推翻資本主義，廢止私有財產。但是什麼人能夠貫徹這種革命呢？我們知道中國資產階級在上面與世界財政資本有有機的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下面與封建的剝削形式也是密切的聯繫在一起，換言之，中國各派的資產階級都不能堅決地反對帝國主義和解放農民，只有工人才能這樣做，所以革命成功後將是一階級的政權，這一階級只是在取得政權後，才進行社會主義的改革。

記得馬克思在“法國的階級鬥爭”中說過，在法國，小資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大資產階級的任務，無產階級所完成的是小資產階級的任務（大意如此），法國無產階級本身的任

務，只有世界無產階級來完成。列甯亦說過，十月革命中俄國無產階級是小資產階級的代理人。列甯和托羅茨基有時稱十月革命是最澈底的民主革命，只是在以後史大林才把十月革命看做是在俄國有了足夠建設社會主義的基礎而進行的革命。至於列甯，他認十月革命之發生，是因為俄國的其他階級都不能肅清封建關係，給農民以土地，只有無產階級才能滿足這些要求。所以俄國革命以後，有一年的時期仍在民主階段。

任君以為中國各派，保守派，改良派，革命派都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實際是各派都抓着問題的中心，不過因階級的立場，而提出的解決方案不同。只有任君才沒有抓着問題的中心，否認帝國主義防礙中國工業發展，否認中國問題的中心是民族解放與土地革命，因此得出一些安那其的結論。任君在本書中搜集的材料很多，用力頗勤，我們以為假使他的觀點更正確些，他可以得到更豐富的結果。

*

*

*

嚴君的著作，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關係占統治地位和駁斥那種認封建關係佔統治地位的意見，其理論根據和事實分析都比任君進步。可是他的著作有兩個缺點：第一，他

不注意指出中國現有的封建剝削形式，如他在該書一一七頁所舉的種種，現在是由資產階級所保存。現在榨取農民，徵收農民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以及用苛捐雜稅，拉夫派餉掠奪農民的，不是封建勢力而是資產階級，他們提倡尊孔復古，甚至恢復科場的考試制，用中古時代的刑罰。除了資產階級用這些封建的剝削形式以外，沒有其他封建勢力。史大林派及其他資產階級各派提出封建勢力一名詞，無非是開脫資產階級之罪過。第二，嚴君亦不甚注重帝國主義妨礙中國生產力之發展。如他說：“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之排擠民族企業，……並不是證明國民經濟不能發展，反而更趨發展”(一二二頁)，又說：“在先進國的境內每多是發展重工業，在後進國發展輕工業，這種現象很類似各個國民經濟中某一企業生產生產工具，另一企業生產生存方法的現象一樣”(一二一頁)。關於前者，例如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了航業，鐵路，排擠民族企業，並不證明中國國民經濟更趨發展。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三省之鐵路政策，不許中國資產階級所建築的鐵路與牠的鐵路平行，正是保障東三省只做日本的殖民地，農民供給日帝國主義以原料，商人做日貨的經紀人，壓抑東三省的大工業不能發展。至於外國在華的航業，工

廠，銀行，鐵路投資，牠的發展正是中國國民經濟的損失。據楊先鈞在“帝國主義經濟侵略下之中國”(太平洋書店印行)的估計，以上數者連合入超，使中國每年約共損失九萬萬三千萬元，“至於政治方面之借款，賠款之本利等尚完全未列入估計之內”(見該書一一七頁)。這十餘萬萬元是中國人對財政資本之貢禮，正因為此，中國陷於貧窮，而帝國主義者在倫敦，東京，巴黎，紐約，便可以脫離生產職務，坐食利息，窮奢極慾。我們能片刻的想像帝國主義整個說來，現在中國是使中國國民經濟發展，而不是使他衰敗，在中國盡的是進步作用而非反動作用麼？至於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輕重工業之分工是極不自然的分工，是宗主國與殖民地的分工。假使殖民地要求獨立，必須先打破這種分工。因為我們不能想像，不能出產煤鐵，不能練鋼和製造機器的國家，能夠維持牠的獨立。正因為此，俄國現時賴國外貿易獨占之助，極力地發展牠的重工業。

此外嚴君不認識，帝國主義侵略中國，一方面相當地發展中國之工業，但在另一方面，牠保存着中國的落後關係。帝國主義在把持中國的財政(關鹽稅收)，航業，鐵路，和開發中國以後，一切重要收入和財源都在帝國主義者手中，於

是中國資產階級的生產投資範圍，變得極其狹隘，不得不用殘忍的手段，爲高利貸，商業資本，百分之七十的地租，地產投機等等，剝削人民，使中國人民日趨於貧困化。中國人民趨於貧困化，便是沒有國內的市場（何況還有帝國主義商品的競爭），所以上海的百餘家絲廠，在國際經濟危機發生，國外定貨減少以後，以及中國的蛋廠在美國提高關稅以後，都有停工的恐慌。假使戰前帝俄時代的資產階級在日俄戰爭失敗，即開闢國外市場的計劃失敗以後，知道用斯托里賓的政策，關於農民問題，實現某些改良，以提高農民的購買力，開闢國內市場；中國資產階級直到現在還沒有意志，而且也沒有方案去進行關於土地問題的改良。中國革命的延期，這樣看來，也是不會很長久的。

嚴君又說“不管地租的形式如何（自然品或貨幣，剝削的程度如何（五〇%或七〇%），其本質不外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罷了”（一〇三頁）。此地我們相當同意孫倬章先生（見其所著“中國經濟的分析”）的意見。孫先生說“中國多數地租不論形式或程度，都不只佔取農民的剩餘價值，並剝削了農民的工資，不但工資，並剝削及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之一部”（見“中國經濟之分析”一〇六頁）。孫先生應當是

說地主和高利貸者，將中國農民的一切都掠奪了(包含資本的利息和企業的利潤)，只留給他最少維持生活的生產品。這正是說明中國資產階級所用的是封建剝削形式，所以農民沒有改良生產的可能，所以資本主義的農業在中國不發達。

* * *

以上我將兩本在今年出版的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做了一個批評。我希望任君不致說這是資本主義擁護者或機會主義者的意見，因為研究經濟是在發現牠的客觀趨勢，而不是拿牠去適合先入的幾個教條。如果照這些教條，則現在是資本主義世界，社會革命已經成熟，我們更不必去費氣力研究半殖民地中國經濟發展的特別規律，發現其與先進國的一些不同的特點。其次，我認為關於中國經濟的研究，我們此後應當深入。現在可以不再爭論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抑封建制度經濟，而應研究資本主義在中國各種經濟生活中所發生的影響，及其前途的種種問題了。

九月十五日，上海。

(1) 類查調誌地，交外，際國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
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	楊開渠	六角五分	本書源溯本本地將日帝國主義者佔領台灣歷史，及其獨占方面之問題，如政治和經濟之事實，敘述無遺。復對於台灣各方面之問題，如教育土地等類問題，作統系之研究。最後凡欲了解番民此次反日之革命運動者，應儘先購讀。
印度獨立運動史略	袁學易	三角	印度革命運動開動了全世界，印度在英帝國中的地位，最為重要，英帝國決不願意其獨立，然而民族意識已經覺醒，印人是甘願服獨立運動的經過及現狀編著成書，凡欲了解印度革命情形的，應從先購讀。
廣州武漢革命外交文獻	高承元	一元	原名陳友仁外交文集。茲經增入武漢橋卷，比初版增加篇幅三分之一。陳友仁先生自我國有史以來，屈一節，外交家，富於外交手腕，與政治及公法上學識，書中關於杯葛、外交抗議、關稅會議及十六年一月廿二日宣言，諸篇，皆革命外交之精髓。所在未綴以陳友仁外交報告數篇，首弁以編者序文，皆為廣州武漢時代外交提綱，尤為絕世史料。
西北叢編	林競		林競先生足跡徧西北，舉凡目所見耳所聞，均筆之於書，而沿途景象，一一攝影，刊載於內。讀此書，不獨可當臥遊，實能明瞭該地政治社會及民族宗教風俗習慣情形，凡欲得知該方實地狀況及關心西北問題者，均宜人手一編。
海南島誌	陳銘		海南島遠處粵南，不獨缺乏地理一切情形之書籍，且國人竟對之而少注意，本書材料均實地調查所得，取中日法人關於該地著作之可信者。內分人民、地方、行政、礦務、教育等各章，極細靡遺。而對於土地交通經濟、林業、漁牧及其他生產專業，和之特詳。插畫多至八十五幅，調查表凡百餘種，尤稱詳者。

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

陳邦國

中國歷史的研究，是研究中國一切其他問題的前提。

雖然，這個研究，目前尙在幼稚時代，可是已經先後出版了幾本很可寶貴的小冊子——這裏，他們都一致的認爲中國社會並不是一個神祕不可解的“悶葫蘆”。

解剖歐洲社會的手術（這積有幾十年的工夫，已達到成功了），也同樣可以解剖中國社會。這，就是說明了中國社會歷史的發展，是與一般的歷史發展的定律相符合的。但是，當我們這樣說着的時候，必須注意，我們不能，也不應抹殺

一個國家由於某種特殊條件所決定的歷史發展的特點。所以，研究中國歷史，不能夠呆板的把西洋史譯成中文，而只嵌上一些堯，舜，湯等等人物的名稱，就可以塞責的。反之，他的發展是受着特殊的自然環境與社會條件所限制，與其他各國不盡相同。

因此，中國歷史發展的特徵，要求我們加以審慎的分析。

中國的古代社會——包括原始共產社會與氏族社會——因為沒有充分的材料，使我們不能提出確定的意見。但于封建制度的發展，我們是有足夠的史實可以做我們的論據的。

很明顯的，封建制度的發展，在中國存在着兩條道路。同時，資本主義的發展，因帝國主義的關係，也有其自己的特點。我們的注意力，將集中到這兩個問題：

——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與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

當然，這兩個問題，是不能單純的來研究的；因為研究前一問題，對於古代社會不能不作一簡單的說明，而後一個研究，又不能不把整個歷史發展的問題，作某種程度上的推斷。

因此，在我們論述這兩個中心問題時，將不時顧到前與後的因果關係。

這是在我們未開始正論前所應當說明的。

一 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

在歷史學上氏族社會的發現與在生物學上細胞的發現有同等重要的意義。當然，發現氏族社會的功勞，是不能不完全歸之於摩爾根的。自摩爾根發現了氏族社會之後，影響到唯物史觀的作者——馬克思與恩格爾思對於歷史發展的整個概念，在基本上有所變更。氏族社會是一個什麼樣的社會組織呢？給這個問題一個簡單的解答，在我們以後解決問題上有決定的意義。氏族社會研究專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說：氏族乃是聯繫於一個血統——有時也不是這樣——的人的集團，這些人共出於一祖，同敬一神，公一姓氏，對於民事與刑事共同負責；有時是公有或公共使用財產的家族之總合體。不過，我們必須指出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開的，是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與恩格爾思在家庭，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中的定義不同。如果不預先說

明這一點，考瓦列夫斯基在原始社會學中的定義，我們便不能利用。氏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一種社會組織，是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之後，生產經濟代替了採取經濟的一種新的社會形式。井田制度的神話，其實便是氏族社會的末期的一種生產形式，在歐洲歷史上也有過類似井田制度的生產形式的存在。

在一般的歷史發展上，氏族社會是到封建社會的先決條件，猶之乎在封建社會的廢墟上發生資本主義是一樣。這一個“轉變”——由氏族社會向着封建社會的轉變——的經濟形式是氏族社會本身生產力發展的結果，然而隨後他自己又被生產力的發展所結果了。氏族社會的崩潰，因為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使鄰居的聯繫加緊起來。這樣，已經接近了各自獨立經營的“大家庭”制度，並且開始使用公共的財產：住宅及牧場。

鄰居關係的奠定，將昔日氏族聯繫根本推翻，於是氏族公社就為鄰居的，或農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換於是偶然的發生。管理的選舉已經不按照氏族的單位。生產工具也由石器發達了金器。最初，首先便是用銅。

生產力的發展更向前進了一步，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

加起來，開始利用不自由的勞動，於是發生奴隸。奴隸的發生有兩個來源：第一，部落間的鬥爭中的俘擄，在昔日完全殺死，至現在已經使他活着，爲主人作工。因爲利用奴隸勞動，剩餘生產品又增加起來，因爲剩餘生產品的增加，在人類社會中構成了貧與富的分野。第二，社會經濟不平衡發展的結果，發生了借貸關係，在收穫不豐，牲畜病亡，或青黃不接之時，便有平時沒有積壘的向有積壘的借貸之事發生。如果沒有能力償還債主之債時就拿勞動去抵補，甚至成了終身大累，淪爲奴隸。

奴隸與農奴是不同的東西。後者是發生於大農業領有制度的時期，而奴隸經濟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過渡。郭沫若君沒有懂得這種過渡，他誤認封建社會是直接由奴隸制度推移來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鑄下了大錯。實在不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他在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與其思想上的反映一節之開端便說：“在易經和易傳的研究中我們發現出我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的時期：便是易經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爲奴隸制時的產物，易傳是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的產物。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是在東周以後。”並且，他在該文

中製成了一個社會進化表：“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他完全忽視了“氏族社會”一個發展階段，並且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由此可見他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觀點，仍舊是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前的馬克思與恩格爾思的觀點。然而，在古代社會出版之後，他倆已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而用摩爾根發現的氏族社會對於歷史發展的過程作了一個大的補充。郭沫若在現代研究中國歷史尚忘記了這一階段，怎麼不是大笑話呵，歸結郭沫若的錯誤如下：

第一，沒有正確的規定歷史發展的全部過程，誤把氏族社會一個階段忽略了；

第二，殷周之際是氏族社會向封建社會的轉變，他誤為是原始共產社會向奴隸社會的轉變；

第三，中國封建之形成是在西周，東周時代已在崩潰的過程中，然而他說封建社會是東周以後形成的。這幾點以後我們還要說到。

封建社會的先史條件另外一種形式是軍事部落的國家。中國封建社會在發展被否定之後，會又重新興起的原因，便是因為外族侵入，軍事部落國家構成後轉變而來的。

在生產力的發展達到了一定階段之後，國家形式在原始狀態上發生出來。這是因為社會分成了壓迫者與被壓迫者之後必定發生出來的。恩格爾思說：“只有在經濟發展的相當階段上，社會分成了階級，國家才有發生的必要。”

軍事部落的國家，有時領域也很廣闊，如蒙古人的成吉思汗帝國，日耳曼人的佛蘭克王國都是例子。五胡亂華時中國北部也有過大的軍事部落的國家。在這樣的國家中漸漸形成的軍事領袖，擁有多量的生產品，財寶及多量的土地。在這個範圍中，不用什麼人封他，他便是一個郡主。郡主的發生亦有兩個來源，第一，就是前面說過的由軍事領袖直接轉變，第二，游牧民族侵入農業民族之後，由於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相互結合形式而形成的。封與不封是很少經濟的意義的。

總上所述，我們知道了封建社會的發展有兩條道路，第一，是由氏族社會經過奴隸社會一個過渡，直接的封建社會發展；第二，由軍事部落的國家中軍事領袖或軍事領袖與農業領主的結合，構成了發展封建社會的經濟條件。

二

在實際上，中國封建社會的發展比了理論的敘述更為複雜。

在殷時期，已表示出氏族社會的完全崩潰，雖然在社會關係上尚有某種氏族社會的殘餘，但這是不能視為重要的，即在今日的英國，資本主義最發達的國家，在社會關係上還保持許多封建社會的遺跡。郭沫若認為殷仍是氏族社會，他的論證是：殷仍是兄弟相及。他說：“殷代都是兄弟相及的制度！這正是氏族社會的表現；因為是亞血族婚姻的關係，兄弟是整個的嫁來，兒子要整個的外出的，所以只能夠兄弟相承，所以氏族社會的制度在我國歷史上可以說直到殷代末年都還沒有消滅。”這當然是穿鑿附會。因為，殷時期，奴隸已存在，農業已成爲固定的了。商書盤庚上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文，汝共作我畜民。”

“商其淪喪，我國百臣僕。”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馬。”

如是相信這是可靠的話，在殷初期，便已成爲固定的農業民族，咸不願東遷西移了。郭沫若是相信的，但是他引證的與他證明的恰是兩件東西。

殷未期，已充分的具備了發展封建社會的條件，周只是作了歷史的槓桿，完成了這一個轉變。

周是黃河西北部的一個部落式的國家，還是在游牧的

狀態中生活。以郭沫若的意見，在生產力發展上周比殷進步，殷是比較落後的，所以，殷被高度生產力發展的周消滅了。其實不然，就各方面說，周不能高於殷，殷的末期，已有了固定的農業，具備了直接向封建社會轉變的先決條件，完成了那個過渡，奴隸制度已完成，然而，周在初——雖然不是同時——“還是母系的社會”。他引證大雅綿第一章：

“古公亶父陶後陶穴，未有家室。”

並且他又說：“文王……是亞血族婚姻。在文王的祖母一代還是女酋長制……。”我們相信這是對的，但是在結論上根本不合。郭沫若以為周比殷先進，我們以為周比殷落後。在周討殷時，處處表現對於殷之奢侈不滿亦足證明這一點。

在歷史上，落後的戰勝先進的，實不乏先例。希臘征服克里底，完全與周征服殷是一樣。在那時，希臘本是一個游牧民族，而克里底則已有高度的文明。

武王伐殷之後，把殷人當作自己的奴隸，發展了不自由的勞動，且承繼了殷的文明，所以結果比了殷的發展更快，直接完成了牧畜與農業聯合的封建經濟。郭沫若以為殷是用銅，周乃用錢，遂斷定周是比殷的文明高。其實這正是比較

低的文明的民族侵入比較高的文明的民族後，在整個歷史進化上更高發展之證明——這是辯證的發展。然而，郭沫若的發展則是機械的。實際的過程是：周滅殷之後，成了一個頂強大的民族，征服了四圍的小部落，於是形成了一種實際的土地的主人，這就是郡主，這種郡主在名義上是封的，其實是征服一個部落之後，那個軍事首領，便自立起來，各自為政。

另一方面，因為在經濟上廣大的利用不自由的勞動，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一般的土地領主與農民間的對抗亦隨着增加；手工業發展，成為商品的生產，但是大部分仍為自然經濟。

末了，封建社會之特點，便是沒有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在周時亦是如此的。不過，郭沫若以為周是大一統的皇帝，這也是一種浮淺的見解，其實，那些諸侯本不是大皇帝封的，是他們在征服了一個部落之後，自己立起來的，並且這些部落原來與周也無關係，是獨立的，在被征服之後，因為這些軍事領袖與周是同宗或其他親屬關係，所以名義上服從周的統治，尊周為天子而已。集權的君主國，如秦始皇，這已經不是代表封建，而是商業資本的政權形式了。

三

從經濟上——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與從政治上——沒有集中的中央政權，各地諸侯各自為政——這兩方面看來，西周之初便是封建社會了。我們現在再看西周之末及東周時生產力發展的情形并解答秦始皇的政權的實質這二個問題。

封建社會之崩潰的原因，第一，是諸侯之間不斷的戰爭。封建的諸侯爲了擴充他剝削的領域起見，舉行一種侵掠的戰爭，結果就有所謂大吞小的現象，西周時期，據中國古書說有一萬多國，至開始了戰爭之後，便一天一天的減少了。在春秋時期之初，已經是只剩三十多國了，最後到戰國竟只剩了七國。從一萬國到七國這一個戰爭的過程，使封建主與天子之間，封建主與封建主之間，末了，地主與農民之間的相互關係變更了。第二，貨幣經濟的發展，這是由手工業與商業發展的結果。在東周時期初，已不是“純粹的”封建社會了，在歷史上即所謂農奴制度的國家。關於這一點，郭沫若以爲是奴隸制向封建制的推移，其實是不對的。貨幣經濟發展，貴族——土地的領主——破產是接踵其後的，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高，正是封建社會末期，向着另一個過渡——

由封建社會向資本主義發展的過渡——即是向着城市手工業制度轉變的現象。他自己的引證，也只是證明這一點。

(一)“維維綈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其服”(曹風候人)。

(二)“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姻亞，則無撫仕”(小雅節彼南山)。

(三)“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洽比其隣，婚姻孔之。念我獨兮，憂心慙慙。似似彼有屋，蔌蔌方有穀，民合之無祿，天天是椽。嗚矣富人，哀此惻獨”(小雅正月)。

(四)“燂燂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騰，山冢萃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潛莫懲”，(小雅十月之交)。

(五)……………

以上的引證，就按照郭沫若的說明，也是證明了與他的結論相反的東西。貴族破產，有錢的人起來，土地被有錢人買去了，貴族成了窮光蛋，……所有這些現象，都是因爲高利貸及商人資本抬頭之後，在社會上表現出來的變革。

在經濟學上，我們知道，商品經濟是破壞封建經濟（自然的生產形式）的。在中國歷史上，自西周末年便已開始了商品生產的形式，這是不能牽強附合的，貨幣經濟乃是商品

交換達到相當程度才出現的事實。由這些事實，我們的結論說：

西周時期末，封建社會已開始崩潰。東周時期已發展到城市手工業制度的時代了。

城市手工業制度之特點是什麼呢？

生產的性質是商品的，在家庭需要的生產上仍保持有自然經濟的形式；在城市中有了手工業的作坊，分工相當的發展，這是經濟上的特點。在政治上是諸侯的崩潰。在土地關係上，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隨着客觀上發生了國家統一的要求。

秦始皇的統一，便應運而生，而絕非是集封建之大成。郭沫若以為秦的統一，是封建社會的完成，這是絕大的錯誤。在當時，因諸侯戰爭，相互吞併的結果，剩了七國。這七國因經濟上的要求都有統一國家的企圖，秦始皇只是完成了這個歷史的企圖而已。在歷史上，統一的集中政權之形成，是因為經濟的發展，商業資本侵蝕了封建貴族的土地。土地集中，造成了經濟的中心城市，他們與農業的比重已大大的超過了。在此時，中央政權集中才獲得了經濟上的基礎。同時，人口增加，貴族失了管理的能力，遂發生了官吏。

這也是中國官僚政治形成的原因之一。

秦的統一，是商業資本的統一。他是代表商業資本的政權。然則，爲什麼秦不能解決當時的社會矛盾，完成一個更高的轉變呢？就是說，商業資本統一了國家之後，爲什麼不能發展成爲工場手工業制度，而不久便崩潰了呢？

促成秦統一的原因是商業資本發展。但是待解決的社會矛盾則是土地集中，農民破產。這正是秦始皇不能解決的任務。即換言之，秦始皇不能解決土地問題。這是秦統一之後，不能向前發展的原因。而他的崩潰也正爲了不能解決這任務，致在四起的農民暴動中沒落了。

漢高祖是農民暴動的首領，他是相當的解決了土地問題的。

四

秦不能解決當時社會的矛盾，只是把一切社會矛盾集中起來，所以，他很快的又矛盾下去了。

漢高祖解決了當時的一個主要問題，然則漢不能完成那個歷史的過渡的原因又在什麼地方呢？這是中國商業資本發展的道路問題。

商業資本的發展沒有向工業上走，而向着另一條道路

走，這條道路便是土地投資，發展高利貸，於是工業的農業基礎亦沒有建立起來。同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很殘酷的破壞了農民生產，土地不斷地由農民手中失掉。他的發展與社會矛盾成正比例。所以結果，漢又走了秦的覆轍。拉狄克，稱中國這一歷史過程為“循環”，是有特別見解的。差不多每一個朝代之亡，都是亡於同一個原因，甚至，在元以後仍是這樣。

商業資本向土地上發展是在東周之末開始有的現象，不過在西漢時期，在土地重新分散之後，商業資本又向土地發展是值得注意的問題。這裏是在要求我們找尋中國社會“循環”的原因。

對於中國不能及時由商業資本時代轉變成為工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有很分歧的見解。最好笑的是郭沫若的見解。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說中國所以不能轉到商業資本時代的原因是因為中國沒有發明蒸汽機。關於這一個問題，拉狄克說的很好，他說：“中國之所以沒有發明蒸汽機，和英國以外的其他國家一樣。”在這一點上，我也以為不是中國社會的特點。為什麼意大利，荷蘭——當時最有發明蒸機的條件的二個國家——沒有發明蒸汽機呢？為什麼蒸汽機只發

明於英國呢？這一個問題有很多的原因。在這裏，我們無用重複拉狄克在中國革命運動史上已解決了的問題，因為這一個解決是比較很正確的。

現在，我們只來找一找這個原因吧。

中國沒有由商業資本轉變到工業資本的原因，首先便是地理的條件，以唯物史觀的觀點說，地理條件在歷史發展上有決定的作用。中國的河流是直接的流入於大洋的，商品的轉運只限於內河航行。自然，由內河的航行達到海洋的航行，在技術上相差很多，沒有若干發展的階段是不能完成的。所以，中國沒有完成這第二步。因為商品轉運上受了限制，所以阻止了市場的擴大。我們知道，市場之擴大對於生產量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同時，北有沙漠，西有大山也是阻止市場擴大的地理因素。

雖然商業資本很發展，有克服這些阻礙的動力，但是都未達到成功。漢的張騫，班超之通西域，明之鄭和下南洋，都是歷史上的企圖。但是都沒有成功，至於不成功的原因，底下還要說到的。

很多外國人，在中國找到了許多手工業很發達的事實，然而，市場是狹隘的，生產受着限制，而單是這樣的發達是

無補於事的。處在這種情形之下，資本的原始積累的出路，走上了我們在上面曾經提到的另外一條道路。於是，又開始了土地集中，農民破產，手工業破壞……。末了，農民又暴動起來。秦時的陳勝，吳廣，漢之赤眉，黃巾，以至黃巢，張獻忠，李自成的叛變，皆照明彰著的歷史事實。

農民暴動，如果在城市領導之下，可以轉變為資產階級的民主革命。但是，當時却沒有工業資產階級；而商業資產階級是農民底直接的敵人，所以，暴動總是淪於原始狀況之中，頂大是達到平分土地。農民是沒有獨立作用的，更談不上政治領導的作用。這在什麼時候都是如此。

五

中國因為地理的及社會條件的限制，不能走到工業資本，自秦以後沒有跳出那“循環”的圈以外，但是不是在一個很軌道的圈中循環呢？不但不是這樣，且有數次曾企圖倒退於封建社會去。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發展的道路，在後來走的第二條道路。這條道路最明顯的表現是蒙古人的侵入後中國的歷史所走的道路。

在晉末，所謂五胡亂華時期，在北方形成了一種很大的軍事部落式的國家。這些國家，在理論上說——如上述——

是封建社會發展的先史條件，在這時中國有重入封建社會的可能。

最後，到元時期。這一種可能竟成爲歷史事實了。就是說，理論上的，發展上的可能實現了。現在我們來分析元時中國封建社會恢復的過程。

當蒙古人未侵入時，在宋時，中國的經濟發展是很高的，手工業的精細，商業範圍有相當的寬大，貨幣經濟發展到極可觀的程度，一般市場上流通着鈔票；在工業生產上達到了工場手工業制度——固然不甚普通——的階段，很知道利用水力；農業上也有不少的克服自然的工具，如轆轤（水車）等已普遍的使用。總之，他的生產力發展的程度，簡直不是蒙古人所可比擬的。蒙古人，是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農業是與牧畜有關係的，尙不是獨立的固定的經濟形式。然而，高度發展的中國，被蒙人攻落了——由此中國開始了一個特殊時期的發展。這便是封建社會又得以發展的時期。

蒙古人到中國時，是憑依着武力的，就是所謂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這種軍隊中的首領，攻到中國之後霸佔着一個地方，握有那個地方的土地所有權及一切財富及人民。這樣形成了一種封主。他的實質就是封建諸侯。況且，在經濟上，

大地主既先存在，在軍事部落國家的軍隊侵入之後，直接變成了牧畜與農業結合的經濟形式，這是封建社會的經濟形式。

元時期初，封建社會是如此復興的。

但是，中國生產力發展本比元高，所以，元初時的封建經濟基礎，無有繼續存在的條件。因為牠不能克服已經高度發展的商業資本，反正在經濟上更發展起來，資本積疊更快，於是又使土地集中，農民破產，又陷入了“循環”的命運。

最後，我們當指出，西周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帶有進步的意義的，他的發展是向着更高的階段進行的。在元時期，封建社會之形成是退步的，是由貨幣經濟退到自然經濟。雖然，這一時期，為時很短，但終於是個退步的過程。

* * *

關於中國社會發展的道路一問題，除去作者知道郭沫若的意見之外，因為很少流覽其他作家的著作，他們的意見，我還不大清楚。不過，這個問題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關於封建社會二度復現的這一特別問題，是本文中提出的一個新的問題。這一個問題，是需要我們給以充分的研究的。現在，我只是提出來，而不敢武斷的說，這樣的結論是絕對

正當正確的。

以後我們來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道路。這個問題更是一個爭論不決的問題。有人說，中國是封建社會，又有人說，中國是資本主義社會，再次，還有人說，中國是半封建社會，未了，還有人不同意這三種說法，而有其他的說法。

我們的任務，當從歷史發展上來判斷中國社會的性質，而給各種錯誤意見以反駁。

——本段完——

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

劉夢雲

——評任曙君的“中國經濟研究”——

我很佩服任曙君，他能夠把他的時間，利用到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上，他能夠很有計劃的，很有次序地去研究這問題，企圖找到對於這一問題的正確的了解。但是在欽佩之餘，我總覺得任曙君的這本書，並沒有能夠完成他所要完成的使命。任曙君在他的這部著作中，同他所批評的許多著作家一樣，同樣的表示出了他缺乏政治經濟的常識，與正確的階級的立場。

任曙君這本書，祇是他整部“中國經濟研究”的大書的一部份，所以他定名為“中國經濟研究緒論”。內容方面，主要的是在批評各派對於這一問題的錯誤的見解，提出他自己的立場。所以這本書是任君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的出發點與方法論，也可以說是他的全部大著的理論的基礎。他以後的幾本書，大概不外乎把更多的具體材料來證明他這一立場的正確吧。

因此，我對於任君此書的批評也不能不帶有較多理論上的辯論性質，說明他的出發點，他的方法論與理論基礎的謬誤，說明他這樣並不能找到對於中國經濟問題的正確的了解。

這是在開始批評任君這一書時，所必須首先得到的一點。現在請言歸正傳。

一，把握着問題的中心？還是不了解問題的中心？

我想在任曙君大作出世以前，早已有有人說過，要了解中國經濟問題，必須了解帝國主義在中國的作用。說帝國主義，不但統治各帝國主義國家，而且也統治全世界（當然占全世界六分之一的蘇聯除外），我想這也不是什麼任曙君的發明，而已是公開到再不能公開的事實。但是我們對於帝國

主義本身的了解，對於帝國主義如何統治着中國的經濟，怎樣剝削着中國民衆的了解是同任君很不相同的。因此，我們互相間所得出的結論，當然也是不能一致的。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最大作用，是帝國主義商品的輸入，因此任君寫道：

“對外貿易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的中心，這是因為由於這一問題，我們可以解決中國整個經濟問題中，在過去的一切糾紛，在將來的一切疑案，特別是農村經濟的性質問題。不但這樣，根據我們研究的結果，關於失地失業，和農村的逃亡，目前最嚴重的糧食問題，以及農民運動不平衡的發展，農村中各種各式的鬥爭，我們都可以拿對外貿易爲出發點來作說明。”（中國經濟研究八九——九〇頁，著者加圈——夢雲）

在任君看來，帝國主義統治中國經濟的問題，實際上，不過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即所謂帝國主義的投資問題，在任君看來，也不過是一個投貨的問題，一個入超的問題，即是一堆對外貿易的問題。任君寫道：

“在投資問題中，亦不是簡單的投資而有輸入商品的問題在。輸入商品關係中亦不是簡單的輸入商品而

有投資問題在。很顯明的事實，關於前者，任何一個帝國主義向中國投資，必然附有購料的條件。例如航空借款之與飛機購買，軍事借款之與械彈進口，都是不可分離的——投資就是投貨。”（同書一〇八頁，夢雲加圈）

這樣從任君看來，所謂帝國主義，實不過是商品的輸入與輸出，除此之外，什麼也沒有了。這當然是簡單與明瞭的事！

因為任君有這樣簡單明瞭的帝國主義“理論”，所以他很容易的解決了被“各派”所鬧得烏烟瘴氣的中國經濟問題。只要把海關“華洋貿易冊”翻翻，問題就完了。一切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侵略，都被確確實實的記載在這幾本寶貴的海關冊中間了。你們還要些什麼呢！？

但是可惜這種帝國主義的“理論”，騙不了稍有政治經濟常識的人！普通的讀者，讀了任君大著之後，一定會問，這樣說來，不是帝國主義在幾百年以前早已存在了嗎？因為那時也有商品的輸出與輸入，也有對外貿易。這豈不是鬧天下之大笑話，豈不是使任君十分“科學的”，莊重的面孔，變成了滑稽可笑？！

謹告任君與讀者諸君：帝國主義是十九世紀之末，二十世紀之初的產物，是資本主義從自由競爭到壟斷的轉變，簡單的說，帝國主義就是壟斷的資本主義。它對於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同工業資本主義不相同。這種侵略，不單表現於商品的輸出與原料的輸入，而尤其表現於它的財政資本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統治，表現於為財政資本所控制的銀行，工廠，礦山，交通工具以及商業機關的統治，表現於勢力範圍的奪取，表現於利用並經過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地主軍閥，買辦資產階級等來剝削與奴役廣大的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工農羣衆。所以要研究帝國主義怎樣統治着中國的經濟，必須要從這許多問題着手。而任曙君在“把握着問題的中心”時，竟完全把這些問題，拋到九霄雲外！這未免太令人掃興了！

照任曙君的全書看來，他不但表示了他對於帝國主義的偉大的不了解，而且他是有意的要躲避開統治中國的帝國主義而不說。他是在企圖用各種各樣“左”的空談抹殺統治中國經濟與剝削中國民衆的帝國主義。

任曙君在中國經濟研究的第四章內一方面寫道：“中國資本主義問題，是要從帝國主義問題去求解決的”但他同時

說，我們用不到談什麼帝國主義。他說：

“我們爲什麼必欲這樣提出問題：帝國主義在中國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沒有發展。這只有資產階級學者，才去分別這些是他們的，那些是列強的。中國的工人是不應該這樣那樣替別的人劃分界限的。他們只曉得帝國主義和中國資產階級是不分開的好弟兄，打打夥夥的壓榨他們，剝削他們，使得他們衣食爲難，他們的農友失業失地。在緊急關頭，就是在平時在合股公司內，他們顯然沒有分別，誰勞你多事的‘唯物派’去替別人強分賓主，去當資產階級的應聲蟲！”（原書一二三頁）

橫豎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與中國本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同樣的壓迫中國的工農羣衆，那我們還用得着談什麼帝國主義？！研究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如何剝削中國羣衆，這在任君看來，都不過是“資產階級的應聲蟲”！

我想任君在這裏顯然是充當了帝國主義的辯護士，他顯然是想否認統治着中國全部經濟的帝國主義。他這樣做了之後，還說這是“把握問題的中心”，這真是天下之大滑稽！

任君根本沒有了解，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把帝國主義資產階級與民族資產階級分別開來，可以變成資產階級的應聲蟲，也可以變成工人階級的戰士；如若說，中國祇有帝國主義，而沒有民族資產階級，就是說，因為帝國主義壓迫着中國經濟，阻止了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所以應該擁護民族資產階級反對帝國主義，就因此勸告工人們參加造產運動：這是資產階級的奴才們所說的話。但是，當我們研究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民衆，是爲得要組織工農羣衆，打倒帝國主義，是爲得要沒有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財產，是爲得消滅與驅逐帝國主義在華的一切海陸空軍，是爲得要取消一切不平等條約：這就是工人階級的戰士所說的話。他們這樣做，不但不擁護資產階級，而且要反對資產階級的投降妥協，要揭破資產階級一切嘴上反對帝國主義的欺騙，要根本推翻投降帝國主義的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

祇有這些工人階級的戰士，才把握着了問題的中心，才能真正的動員廣大的工農羣衆，做打倒帝國主義在華統治的工作，把中國的勞苦羣衆從帝國主義的鐵蹄之下解放出來。任曙君雖是嘴上說得很“左”，似乎祇有他才掛記到工人

的利益，實際上也就是他投降了帝國主義，做了帝國主義在中國的辯護士的工作！

當然世界上有不少嘴上講得“蠻好”，而實際上所做的，完全是另一回事。任君不過是其中之一罷了。這實是不足為奇的吧！

二，只看見商品關係，而不看見剝削關係，這是任曙君這類人的基本錯誤

任曙君所以要把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經濟的作用問題，祇看做是一個對外貿易的問題，無非要經過這一橋樑，以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來證明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以發揮他所崇拜的“世界大革命家”托洛斯基所說的中國目前的革命不是民主資產階級的而是無產階級的革命的偉論。

實際上，對外貿易不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的中心，而是任曙君這本“中國經濟研究”的大著的中心的中心。任君這部書的全部理論是建築在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就是商品經濟的發展，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理論”上。既然如此，任君的成功，當然是無疑的。或者說，不會發生問題的。任君所以這樣容易地宣佈了他的對手的破產，與他自己錦勝利！

只要看那一社會中人與人的關係是經過或是不經過商品，我們就可以斷定那一社會是資本主義的或不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商品經濟就是資本主義的經濟，自足自給的自然經濟，就是封建的經濟，這就是任曙君所發現的新大陸。至於那一社會中剝削的方法，階級的關係，在任曙君看來，是對於那一社會經濟性質的決定絲毫無涉的。

任曙君引了關於中國經濟上是封建剝削占優勢，政治上封建勢力占統治等類的兩段話之後，寫道：

“上面兩個意見，都是從剝削方式來說明中國的經濟性質的。這很不對。我們只能用經濟性質去說明剝削方式，不能用剝削方式來說明經濟性質。並且從社會階級來分析經濟問題，我們上面曾經說過犯了倒果為因的錯誤，至於說富農是封建的，帝國主義維持封建殘餘，那更是荒謬絕倫。”（同書，四九頁，著者加圈——夢雲）

“至於以統治階級的性質及其剝削方式等等為出發來解決中國經濟的性質，毋乃太過滑稽。”（同書，八五頁）

這種把一個社會的經濟性質，看做完全同這一社會中的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離開，不去拿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

來決定經濟性質，而是什麼經濟性質，去決定剝削方式與階級關係，這實是完全離開了階級立場的資產階級的“理論”！

照任曙君的高論，讀者就會發出這樣的問題：在希臘羅馬時代，商品經濟有過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希臘羅馬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在中國歷史上，遠自秦朝以迄清朝，曾經有過不少時期，商品經濟得到了很大的發展，難道那時中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現在，商品經濟在蘇聯也還存在着，難道那裏也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只要發出這樣簡單的問題，我們就可看到商品經濟的本身還不能決定那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要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如若單單問這一社會有沒有商品經濟，我們還不能決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我們必須要問這一社會中有什麼階級，他們中間剝削的關係怎樣，祇有知道了這些，我們才能斷定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譬如我問你，羅馬帝國的經濟性質是什麼？你一定要回答我，那裏有奴隸主與奴隸，奴隸主不但壟斷了一切生產工具，而且壟斷了奴隸的身體自由。他除了奴隸的死亡的界限以外，可以無限制的剝削。那時不但農場上的大批生產品商品化，而且奴隸也變成了商品，同牛羊沒有任何的區別。我

根據你的回答，我才能說羅馬帝國經濟性質，是奴隸的經濟。但是如若根據任君的理論，那羅馬的經濟是商品的經濟，所以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我想普通中學校的學生，都會告訴任君，說這是在給人家開玩笑。

不過我覺得任君是一個很莊嚴的學者，他決不會同人開玩笑的。他祇是在他的莊嚴中間，表示出他對於工人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讀過初步政治經濟學的工人，一定會告訴任君！在階級的社會中，剝削的關係，也即是階級的關係，是每一社會的經濟基礎。封建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土地的諸侯與地主用地租與徭役來剝削農民與小手工業者。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基礎，是壟斷生產工具的資本家用資本來剝削工資勞動者。在有階級的社會中間，離開剝削關係與階級關係，就沒有法子了解這一社會的經濟性質。

祇有地主階級與資產階級的擁護者，才會離開這一中心問題而不談。他們可以給你講很多很多的東西，而且也許是會非常有趣的東西，但是對於這一問題總是要保守沉默的，因為這是剝削階級的祕密！世界上從沒有過，除了極少數之外，剝削者，承認自己剝削過任何人。資本家祇是把飯給工人吃，但決不剝削！地主祇是把土地給農民種，但決不

剝削！地主與資本家是工農的救命主！可不是嗎？！

替帝國主義做辯護士的任曙君，那裏再肯揭發出地主資產階級的祕密呢？！

當然，我並沒有說，商品經濟的社會，同資本主義的社會沒有任何關係。却正相反，凡是資本主義的社會必然是商品經濟的社會。譬如資本論的第一章，就開始於商品的分析，正是如此。但是商品經濟的社會，決不就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拿海關貿易冊上中國對外貿易的發展，決不能證明這就等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帝國主義列強拿它們的商品破壞中國的農村經濟，使中國農民的農產品商品化，甚至使中國農產品的種類依照世界市場上農產品的價格而變動，決不就等於帝國主義促進了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發展。

有了社會的分工，有了私有財產，就有商品的交換關係。這交換關係，可以發展到資本主義方向去，也可以更其增加地主對於農民的封建的剝削。

三，帝國主義的侵略，商品經濟的發展，與封建剝削的加緊

雖是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間，不斷的說人家是機械論者，而他是辯證法大家，然而要在世界上再找到一位比任君

再機械的機械論者，恐怕很難了吧。固然在他的對手方面，有不少機械論者，然而在這方面，他的確比他們要更加高明。

照任君的邏輯，帝國主義把商品輸入了中國，所以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假使誰以為帝國主義不但不幫助而且阻礙着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那他就是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樣一來，任君就會到中國年鑑一類書上抄下很多的表，表示出中國商品經濟的發展，以至中國工廠數目的增加，洋洋得意地來證明他所犯的“資產階級意識”的錯誤！於是他同阿Q一樣，又得到勝利了！

帝國主義侵略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目的，是爲了要投資，是爲了要推銷他們的商品，是爲了要取得原料的供給。要達到這些目的，它必須利用政治的，軍事的，與經濟的力量，奪取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經濟命脈與政治權力。在中國，它們利用政治的與經濟的借款以及軍事失敗後的賠款，壟斷了中國的經濟命脈，取得了它們的勢力範圍，使各地的地主軍閥，以至資本家，變成了它們手中的工具，爲了壟斷與控制中國的經濟命脈，它們在經濟上必須設立它們的銀

行，工廠，交通工具，商業機關。它們就依靠這些東西（非經濟的方法，我們這裏不說）推銷它們的商品，搜括中國的原料，與奴役中國的工農羣衆。這些東西的設立，無疑的，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且大大的擴張了商品經濟的領域。但正是因爲帝國主義的目的，是在把中國變成帝國主義經濟的附庸，變成它的原料出產地，它的商品的市場，與它的投資的所在，所以它不但不能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而且阻止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他不但不消滅鄉村中間的封建式的剝削，而且加緊了這種剝削。

這種議論對於任曙君當然是“荒謬絕倫”的。一方面說，帝國主義在中國造成了些資本主義的關係，擴大了商品經濟的領域，另一方面，它又在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加緊着鄉村中封建式的剝削。這對於任君，當然是天下之大矛盾，百思千思而不得其解的！

爲什麼？這是因爲任君對於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沒有絲毫的辯證法的了解。

帝國主義爲得要加緊對於中國經濟的統治與對於中國民衆的剝削，不能不相當的造成了資本主義的關係，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他們不能不建立他們的銀行，工廠，交通工具

與商業機關。但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是爲了要更其能控制中國的經濟，更其能使中國的經濟變成他們的附庸。

我們只要一看帝國主義的銀行，在中國的作用，我們就可明白這一點。這些銀行的“營業”，不是在幫助中國工業的發展，而是在舉行各種各樣政治的，軍事的以及名義上是實業的借款，借款利息之高，條件之苛刻，這是人所共知的事。它們更利用中國金銀比價的時時變動（其實變動的操縱者還是它們）。做賣出買進的投機事業，一舉手之勞，可以有數百萬以至千萬的收入。它們可以發行大批的紙幣吸收現金，再拿現金去投機，去放款。它們更利用它們所有的特權與帝國主義的政治軍事力量，吸收中國官僚軍閥的低利，無利以至賠利的現金。一切對外貿易，也完全在它們的掌握之中，它們更經過中國的錢莊，當舖，以及各種各樣的經紀人（地主，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用很高的利息，貸款給小商人以至貧苦的工農羣衆，用很低的代價去收買農民的農產品。它們就是這樣控制中國經濟的命脈，剝削中國的民衆。它們對於某一資本家的幫助與否，就會決定這一資本家的生死。照例，它們祇是對於它們本國的資本家給與助力與擁護。祇是

因為各帝國主義者在他們的背後，有這樣雄厚勢力的後台老板，他們才能在競爭中取得勝利。沒有這種銀行做後臺老板的中國資本家，自然祇有失敗之一途。

這些銀行，尤其是匯豐銀行，在中國營業的利息，往往高至百分之五十至百分之七十。這樣高的利息，在帝國主義國家內部是不會有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是證明財政資本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作用，是寄生蟲的，高利貸資本的作用。它祇破壞殖民地與半殖民地的生產力，而不能發展生產力。

不錯，帝國主義在中國除了銀行之外，還有工廠，還有交通工具與商業機關。但是工廠的建設，大部分限制於紡織工業，烟草工業等輕工業的部門。鐵路的建築，自一九一一年革命起後，差不多已經完全停頓。現在交通方面發展得比較快的，是汽車，輪船，電話，無線電以及航空等等。這些東西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絕對必要的。有了比較便利的交通，帝國主義者才能把他們的商品運入中國內地，才能把內地的原料運到外國。一切這些東西的設備，祇是爲了要更其控制中國的經濟，使中國走向殖民地的道路上。（軍事的目的，我們這裏不說。）

帝國主義所以在中國創造最小限度的資本主義的企業與資本主義的關係，並不是爲了要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使中國變成一個資本主義國家，而是爲了要使中國變成它的殖民地，變成它的附庸。爲了這一點，它不但不願發展中國的資本主義，而且盡量的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這一點東西，我想除了任曙君之外，不會有什麼異議吧，當然，單看到對外貿易的任曙君，決不能看到帝國主義如何的阻礙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却正相反，在任曙君看來，正是帝國主義幫助了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任曙君的所以變爲帝國主義辯護士者蓋以此。

其次，帝國主義這種殖民地政策，當然使商品經濟在中國農村中得到了急速的發展。帝國主義商品（不但是工業品，而且也包含農產品）輸入中國的農村，中國農產品以及原料輸出外國，自然會使中國農民出賣自己的農產品而購買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的商品。但是這種發展，祇是加緊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廣大農民羣衆的剝削，造成大批的破產失業與空前的大饑荒，正因爲生產力的不發展，所以數千百萬破產失業的農民，找不到生活，不能不成千成萬的餓死，數千百里肥沃野變成了一片荒涼的沙漠。正因爲生產力

的不發展，所以他們不能不去當兵，當匪，以至當人家的牛馬。同時，正因為在帝國主義高壓之下，生產力不能發展，所以中國的有些民族資本家不能不改弦易轍，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中去，對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就是農民分化過程中所產生出來的富農階層，因為他們的剩餘資本沒有發展的餘地，所以也樂於購買土地變成半地主與小地主。

雖是一切這些，在任曙君的腦筋中是“荒謬絕倫”，然而事實告訴我們的確是如此。在中國農村中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於中國農民的剝削，只要稍為知道一點政治經濟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那不是資本主義的剝削，而是封建式的剝削，因為這裏對立的不是在土地上投下資本取得平均利潤的資本家，與得到工資的工人，而是將土地出租給農民，向農民那裏收到地租的地主與農民。這種地租不論是生產品的或是金錢的，同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地租，含有完全不同的意義。至於這裏的商業資本與高利貸的作用，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與借貸資本也是性質上不相同的。

帝國主義利用它在中國經濟上的指揮地位，就是這樣經過中國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推銷它的商品，搜括農民

的財富。帝國主義祇是因為在鄉村中有它的同盟者，所以它不但能夠統治通商口岸，而且也能統治中國的鄉村。所以在鄉村中間，帝國主義維持着封建的剝削，也就是經過這種剝削，奴役着廣大的中國勞苦民衆。

至於帝國主義者怎樣擁護中國的軍閥，這些軍閥怎樣“非資本主義地”(就是說封建式地)剝削着中國的民衆，這是人所共見的事，我想這裏用不到加以說明了吧。

一切這些在任曙君看來，都不免是怪誕離奇的，然而現實常常比任君頭腦所想的，要更其複雜些，那有什麼辦法呢?!

四，死的數目字與活的解釋

現在我要研究一下在任君大作內所有一些數目字，看任君對於這些數目字的解釋是否正確。

任君最得意之作，即是引用海關冊上的中國對外貿易表。他就用這些表證明中國現在的經濟已經是資本主義經濟，甚至同戰前俄國與戰後蘇聯的經濟不相上下。但這些表所能證明的，祇是中國國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速度，而不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速度。正因為帝國主義，地主軍閥官僚，資本家對於中國農民的剝削一天一天加緊，所以農民把他們所

有的一切東西，甚至于老婆小孩子，都拿來出賣。很明顯的，這種農產品的出口是農村破產，生產力降低的結果，而不是資本主義農莊發展，即生產力發展的結果。（如像在美國與德國等）。這是一。第二，中國輸出品中，主要的還是原料，而不是工業品。這表明出中國主要是一個農業的國家；而不是工業的國家。第三，那些輸出輸入的工業生產品，不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而是表明中國資本主義的不發展。

我想只要我們把中國農村經濟加以絲毫的考察，就會看到中國農村中主要的生產方法，還是手工的而不是機器的，還是封建式的生產，而不是資本主義式的生產。主要生產者，是小佃農，小自耕農或半自耕農，而不是農業資本家與農村工人。他們因為受到軍閥，地主，高利貸者的剝削，因為要完納苛捐雜稅，地租利息等等，不能不盡量的並且廉價地出賣他們的生產品。這同農業資本家為了取得利潤，而耕種土地，而出賣農產品有根本不同的意義。中國的小農一年勞動的所得，養活一家人口還不夠，還說得上什麼利潤？！這些具體情形，是為任君所看不到的。他所看到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突飛猛進的發展”！

其次，只要看一下中國對外貿易的細目，就可以看出，

中國主要輸入品，是工業品，主要輸出品是農產品。我們現在也引用一下一九二九年海關冊上的表：

民國十八年海關外洋進口貨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棉貨	一三·七六%
棉衣	七·二〇%
麵粉等	五·〇六%
煤油	四·三六%
糖	七·八〇%
五金及礦物	五·六〇%
米	四·六六%
毛製品	三·五三%
化學產品	二·七一%
燭等	二·六二%
木材	二·二〇%
魚介海產	二·〇八%
糧食等	一·八二%
紙煙	一·六四%
人造氈	一·三六%

人造絲	一·二三%
絲貨	一·〇八%
汽車	〇·九一%
紙	二·七〇%
機器	二·三六%
菸	二·一二%
蔴貨	一·八四%
小麥	一·六九%
煤	一·五一%
染料顏色	一·二六%
棉紗	一·一三%
食品等	一·〇一%
其他貨物	一四·七六%

民國十八年海關出口往外洋貨品比較表

類別	百分數
豆及產品	二二·六二%
蛋及產品	五·〇九%
茶	四·〇六%
餅子,仁子	三·二六%

棉衣	二·九二%
綢緞	二·〇七%
棉貨(除棉紗)	一·七〇%
花生及產品	一·三六%
豬鬃	一·一八%
桐油	二·三二%
絲類	一六·二六%
皮貨,生皮,熟皮	四·四八%
五金等	三·三一%
煤	三·〇四%
糧食	二·五九%
髮毛,毛羽,絨毛	二·二三%
棉紗	一·八一%
木,木材	一·六七%
紙煙	一·二一%
鹽	一·〇九%

從這兩張表上，我們可以看出外國進口貨中日常工業用品占進口的一大半。出口貨中差不多大部分都是原料。同時在進口貨內，食品也占不少部分。這並不是表示因為中國

工業化了，所以需要從外國輸入食品，而是因為中國農民一方面因為要適應世界市場原料的需要，所以不能不少種稻麥，而多種其他農產品，如豆子之類，另一方面（這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因為農村經濟的破產，災荒區域的擴大與收成的減少，致使食品不敷應用，而依靠外國的輸入。但這種食糧輸入的增加在任曙君看來，都是中國資本急速發展的結果。同一事實，但所得結論却是完全相反的。

最後，在外國的輸入品中，機器的輸入，祇占全輸入百分之二·三六，共值二九，八八六，五〇三海關兩。同時中國又沒有洪大的製造生產工具的工廠。那中國是怎樣的一個資本主義國家，就可想而知了。在中國輸出品中，工業品輸出者，主要的為綢緞，棉紗與棉貨。除綢緞的輸出逐年減少外，棉紗與棉布的輸出是增加的，尤其是棉紗的輸出。關於這一點請看下表：

最近中國棉製品輸出表

年 代	棉 紗(担)	綿 織 品(海關兩)
一九二一年	二五,〇〇〇	五,八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三年	八八,〇〇〇	九,一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五年	六四,〇〇〇	一一,〇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七年	三二五,〇〇〇	一三,五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八年	三三〇,〇〇〇	一一,七〇〇,〇〇〇
一九二九年	三四五,〇〇〇	一七,三〇〇,〇〇〇

這類工業製造品輸出的增加是否如像任曙君所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表現呢？不是的。這是表示出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主要原因，即是國內市場的缺乏。祇有四百萬錠數的中國紡紗工業（其中二百三十萬是中國資本家的，一百六十四萬是外國資本家的）的生產品，不能完全銷售於有四萬萬人口的中國，而必須到南洋羣島，印度，以至日本等去找求市場，這表示中國民衆的購買力是如何的低微。但這在任曙君看來，這種輸出，當然是中國經濟繁榮的象徵！

此外，任君在論對外貿易時，大罵有位姓潘的朋友，說他把中國在國際貿易上的地位減低了，說“他爲要證實中國經濟落後這一主張，以便他說明中國還是封建經濟的理論，意識的引用過去五六年乃至十餘年的事實，而不引用在突飛猛進的中國對外貿易中關於近年的事實”（前書九十七頁——夢雲加圈）在另一處，他又說：“中國資本主義還在繼續發展中。它不因內戰，災荒，革命，以及所謂封建剝削的阻礙，而致停止其前進。”（同書一五七頁）

然而，在這裏我們也想拿一點小小的事實，證明任君的所謂近年來“突飛猛進的對外貿易”，實在是吹牛的。

根據海關的報告（這在任君是最可靠的報告），一九三〇年進出口總額爲二,二〇四,五九九,三三六海關兩（金銀不計在內）。較十八年度的進出總額二,二八一,四六六,〇三九兩減少七六,八六六,七〇三，即百分之三·三。但這祇是拿銀子來計算的時候是如此。如若拿金價來計算，則相差更甚。十八年度海關兩之換算率爲二先令七便士十六分之十三。則該年進口貨，應值英金一六七,七八一,六一七磅。十九年度海關兩平均換算率爲一先令十便士十六分之十一，該年進口貨祇值英金一二三,八一〇,一一九磅，計減英金四三,九七一,四九八磅，即百分之二六。

這就是任君所說的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的突飛猛進的發展。在不了解中國經濟恐慌深入的任君，當然這是不可思議的！這在任君看來，恐怕又是有意替資本家造謠，而不是事實。因爲祇有證明一切都在發展的數目字，才是任君的事實！……

現在，我再來同讀者研究一下，任君在“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中的一些數目字。

我想祇有傻子，才會和任君爭論，說中國資本主義沒有絲毫的發展，說今年沒有增加過一個工廠，或是二個工廠，增加過一個工人或是二個工人。我們所爭論的，是中國現在到底是什麼社會，是資本主義的剝削或是資本主義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還是封建的剝削或是封建的關係占統治的地位？所以任君的好些數目字，並不能夠幫助任君，證明他的主張的正確。

譬如他寫道：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時代的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列的記載：

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

年 代	輪船	帆船	合 計
一八七五年	八五	一五	一〇〇
一九〇五年	九一	九	一〇〇
一九一五年	九三	七	一〇〇。
一九二五年	九七	三	一〇〇
一九二六年	九八	二	一〇〇

(見同書一四①頁)

任君利用這樣的數目字證明他的結果，真不免令識者啞然失笑。即稍有常識者，而不是呆子，看到了任君這個像煞有介事的統計表之後，一定要問，難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國的交通工具已經有百分之八十五為輪船，百分之十五為帆船嗎？這真叫做白天見鬼！可笑的，是這位學者，把“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當做全國輪船與帆船的百分比。而且到底一八七五年中國有幾個海關？設在那裏？登記的是外洋船還是內河船？我想這位學者自己也莫明其妙。這位學者祇是為得要證明中國資本主義的急速發展，所以亂用數目字，把數目字的原意完全拋開，這也不免太難為情了。

然而這種亂用數目字，在任君的大作上差不多連篇累牘的都是如此。譬如接着這種有趣的證明之後，他又寫道：

“如果說由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亦可以相當的看出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那我們就介紹出如下的數目字來：

	錢莊	銀行	合計
一九一二年	六八	三二	一〇〇

一九二〇年 三七 六三 一〇〇

這一個小小統計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十年之間，銀行和錢莊表現了決定了新陳代謝的關係。銀行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這裏我們很明白的看到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人們再也不能拿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一語來比擬今日了！”（同書，一四一——一四二頁——夢雲加圈）

我們看了這一段話，不知道這一統計，是講上海的還是講全中國的？但是這一位科學家就可根據這類統計，說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這就是說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時代，這就是說，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的國家。中國資本主義，真是在任曙君的筆上突飛猛進的發展着。我們前面說過，帝國主義統治着中國的經濟，當然這同任君所要證明的，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帝國主義完全不同。我們說，帝國主義經過買辦階級，錢莊，地主，軍閥官僚，商業資本家高利貸者，來剝削與奴役中國的民衆，而任君說，中國的銀行已經大部分排除了錢莊，中國已經變成了財政資本（或金融資本）的國家！

這位任曙君在這一統計表的下一頁，又用了一張統計表，證明出中國資本主義是如何的發展。這是一張“一九二八年各種生絲出口的數量和貨價的比較”，其中：

土絲占百分之九·七(數量)百分之五(貨價)

半廠絲占百分之九(數量)百分之五·八(貨價)

廠絲占百分之八三·四(數量)百分之八九(貨價)

“這個統計表示了什麼呢？很顯然的告訴我們：中國農家原來生產的土絲在數量上不到百分之十，在貨價上不過百分之五，而廠絲半廠絲合計，無論在數量與貨價方面均在百分之九十以上。這表示：資本主義的生產將要奪去生產的全部領域，封建手工業的生產將要完全消滅。”(同書，一四三——一四四頁，——夢雲加圈)

拿生絲出口的比例，看做是中國全國內手工業的生產品與資本主義生產品的比例，這當然是最好不過的戲法！

任君就是這樣拿數目字來證明他的“理論”！這就是他應用數目字的“科學方法”！

讀者諸君，我們現今已經完全看破了任君所玩魔術的手法，爲了時間與精力的寶貴起見，想來沒有再看下去的必要了吧！

五，是中國經濟的繁榮？還是中國經濟的恐慌？

在任曙君的腦子中間，決不會有經濟恐慌的觀念存在：我想這是可以斷言的。

任曙君在論“中國資本主義問題”一章內，差不多到處都看到中國資本主義的突飛猛進的發展。照他看來，“經濟的繁榮”，現在是從美國轉到中國來了。

譬如關於絲業的發展問題，任君先引用了下列的表：

歷年上海絲廠發展概況表

——一九三〇年四月調查——

創辦時間	廠數
民元以前，時間未詳	二十
民元至民五(1 12—16)	一二
民六至民十(1917—21)	一一
民十一至民十五(1922—26)	二〇
民十六(1927)	一一
民十七(1928)	十三
民十八(1929)	二五
民十九三月(1930,3)	二
合計	一〇七

“這統計告訴我們——任曙君說——在一九二九年上海增加了二十五家廠，比以前任何年份都加得增多。本年三月止，亦增加二廠。”(同書，一六五頁)

除了上海之外，任君還引用浙江的無錫的絲廠的發展，結果自然是都有增加。於是任君勝利地說：

“由上面三個重要區域的統計，已經把小夥計們一切非科學的，空想的，布爾喬亞的反動理論的基礎擄毀無餘了。”

這位只看見樹身而不見樹林的任曙君，引了這些數目字之後，就洋洋得意，覺得又可以把人家大罵一頓了，也不問這些工廠現在還是開着，還是關着。這同他有什麼關係呢？工廠總還是工廠，不論是關着或是開着。

然而我們不能認關閉着的工廠爲工廠呵！照我們所知道的，中國絲業不但沒有繁榮的前途，而且正陷在嚴重的經濟恐慌的深溝中。我們也看看資產階級的學者所說的老實話吧。(很奇怪，有時候資產階級學者所說的比任君所說要靠得住些！)

“中國生絲產量，向來推測，應有四十萬担上下，年來逐漸減少。十九年度計祇二十七八萬担，較之十八年

度，約減少八九萬担。其減產之重要原因，不外乎蠶繭歉收及繭質不良，致出口欠佳，而成本反貴。同時復因世界市面衰落，各國絲織廠大半減工停業，生絲銷路大減。日本絲貶價出售，華絲無法競爭。故絲業之衰敗，為數十年所未見。上海絲廠百〇六家中，年終時停業者約達七十家，無錫絲廠七十家中停業者四十家，廣東絲廠情形之困難亦復相類。”（中國銀行民國十九年營業報告書）

這就是任曙君的中國絲業的發展！

除了絲業之外，任曙君講到中國航業的發展。雖是任君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並不受內戰，災慌等而受停頓，並且根據一九二九年海關報告上所載“上述英船噸數，較民國十三年最高之數，亦超過二百萬噸，實為空前紀錄之價值”而不禁狂喜，然而中國航業界的不景氣的事實，任君想來還是不能否認的。

據招商局的報告，該局最近幾年來的營業。差不多陷在完全衰落狀態。即以去年上半年而論，招商局輪船因應差與零星裝兵之損失，一月份計達二，五四三兩，二月份三，八三三兩，三月份一六〇，六三五兩，四月份一八〇，三二〇兩，

五月份一六〇，八一七兩，六月份一二三，四二五兩。至于應差各輪所應收入之租金，還不在內。合計招商局在去年半年之內，就損失了六十三萬一千三百七十三兩。其他各華商航業公司，也莫不受到大的損失。所以年來所謂華商的船業，也同樣處在嚴重的恐慌的情形之下。

至於鐵路工業又怎樣呢？任君說：

“一般布爾喬亞的份子認為最痛苦的莫過於內戰的延長，使鐵路的交通大受影響。但這裏我們應當知道在帝國主義干涉和監督之下（對於帝國主義應如何感恩不盡！——夢雲，）鐵路交通不但在內戰一停止即有恢復的可能，而且必然會有或多或少的進展。”（同書，一七〇頁）

任君的證明，當然又是那本寶貴的海關報告冊。他選出了如下的數目字：

近兩年鐵道車輛進口的比較

	民國十七年(兩)	民國十八年(兩)
鐵路機車煤小車	一,五六四,〇〇〇	三,五〇一,〇〇〇
鐵路客車貨車 (電車在內)	二,二八九,〇〇〇	二,九三五,〇〇〇
未列名鐵路電車路材料	三,九五—,〇〇〇	四,二五三,〇〇〇

合計 七,八〇四,〇〇〇 一〇,六八九,〇〇〇

不看中國鐵路工業的實際情形如何，而拿這點數目字來證明鐵路工業的發展，這是任君所說的形式主義者的最好的標本！

實際上，以一九三〇年而論，據國民政府鐵道部統計，全國鐵路除平漢隴海不計外（但這兩路所受的損失實最大）營業上的損失達三百六十萬元。但這還是不重要的部分。主要的，就是各鐵路，年來因不斷戰事的關係，都受到了很大的損失。現在預算各路車輛材料之補充，橋樑軌道的整理約需五千萬元。據美人滿台爾計算，則需七千七百萬元。恢復鐵路原狀需要五千萬元到八千萬元，而任君却想拿幾百萬元的進口貨當做鐵道工業發展的標準！對於這類中國資本主義贊美者的布爾喬亞的分子有什麼辦法呢？！

至於拿一九二四年北京農商部所發出的礦業執照，以證明中國重工業之發展，真是開闢“科學方法”的新紀元！外國機器輸入的略有增加使一九三〇年中國機器工業減少了百分之五十的事，對於任君當然是莫明其妙的！

除了上面所說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之外，尚有絲綢業，在民族工業中也占過重要的地位。然而近年來，這一工業竟

有一落千丈之勢。如杭州區，在民國十四十五兩年中間，絲綢業還比較發達。民國十六年底，杭州絲綢廠亦尚有五十二家，但到十八年已剩下十三家了。在湖州在最盛時期，城廂內外，共有絲織廠二十餘家，零機二千餘架，每年絲織物的產額有九十萬疋。但是到十八年底綢廠倒閉已過半數。十九年實存者，僅三十家，零機開工的，已不滿千架，全年出產額不滿五十萬疋了。

此外如像火柴業，糖業，麵粉業，製油業等，現在都處在嚴重的恐慌中（爲了節省篇幅，不再舉例，）除了任君的腦海之外，找不到任何出路。恐慌原因雖各有某種不同，但總括起來，不外沒有國內的市場（即廣大民衆的貧窮化），國外的市場（世界經濟恐慌），外貨的競爭（屯併政策包括在內），金價上漲使外來原料昂貴，本國原料的缺乏（惡化與歉收），國內戰爭與捐稅的繁重等等。這些原因不解決，中國民族工業的長期恐慌是不可免的。這就是說，在目前的情勢之下，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發展的前途，是沒有的。

但是各主要民族工業部門的長期恐慌，並不就是說，在任何民族工業部門中，都不能有某種程度的發展。最明顯的，即爲紡織業的發展。據華商紡廠聯合會最近的調查：

華商紗	錠線	錠布	機
前次調查	二,三二六,八七二	六八,九二〇	一五,九五五
最近調查	二,三九一,〇七四	八八,一四四	一七,〇一八

此外在一九三〇年內如橡膠業，化裝業，調味業，製帽業等都有相當的發展，但除紡織業外，這些企業都是新興的，規模很小的，因為特殊原因而發展的。正像在資本主義國家內，當機器工業消滅着手工業時，手工業者從這一工業部門逃到另一部門，以保持他們的運命，而且在有些特殊的企業上，如像製帽業，可以得到相當的發展一樣，在中國這些小規模工業所以能夠得到發展，祇是因為這裏的一些利潤並沒有引起帝國主義者的注意，或是因為特別的原因，帝國主義所製造的一時不合於中國人的口味。

所以這些工業的發展，決不能說這就是中國資本主義的獨立發展。它們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中的意義是非常微小的。而且這點發展也不過是短期間的，它們也將碰到其他工業部門所碰到的同樣的障礙。

到這裏，反對把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特別提出的任曙君，一定要站起來說，民族工業雖是不能發展，但是帝國主義工業是能夠發展的。如像在紡織工業方面在最近一年

內全國紗錠增加十八萬七千五百二十六枚，其中華商計增六萬四千二百零四枚，日商計增九萬九千四百十六枚。全國線錠增加九萬另三百六十四枚，其中華商計增一萬九千二百二十四枚，日商計增七萬一千一百四十枚。全國布機增加三千二百二十六台，其中華商計增一千〇六十三台，日商計增一千五百八十三台。（見紡織週報，一九三一年五月八日）

不錯，各國帝國主義者因為國內經濟恐慌的深入，因為銀價的跌落與工資原料的特別便宜，所以盡量的把他們的資本移植到中國來。只要有利潤可得的地方，當然他們沒有不來的。

在這裏我並不想很具體的說出帝國主義如何在經濟上控制了中國。因為關於這問題的材料比較的多，除了任曙君之外，一些明瞭的讀者中間，都比較的還有相當了解。但是我必須在這裏指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的投資主要的還在政治借款方面。他經過借款，控制中國國家的收入（最主要的如海關鹽稅，烟酒稅，）取得各種各樣的特權。經營這些借款的就是我們上面所說過的各帝國主義銀行。其次，投資之用於建設事業的，最主要者為鐵路借款。鐵路工業以及各種交通工業的“建設”，差不多是各帝國主義在中國的重要使

命之一。因為祇有這樣，才能輸出中國的原料，出賣他們的商品，在經濟上政治上以及軍事上更能統治中國。

當然除了交通工業之外，帝國主義在中國還開設了一些工廠（如紡織工廠），開採了些礦山，但這些企業的資本，在帝國主義全部對華投資中實是比較微弱的。尤其在煤鐵礦的開採方面。至於大的機器製造廠，簡直一個也找不到。帝國主義比較更願意投資的地方，却是那些土地，房屋，碼頭，旅館，棧房，信託，保險，遊戲場，貿易，橡皮，大都市的所謂公共事業各部門。即以上海地產公司而論，英籍的有十五家，法籍四家。在一九二八年收入資本已達一〇二，一三〇，二八六元。（見統計月報二卷五期，七十一頁）這些企業，都是取得極高度的利潤，但對於中國生產力的發展是沒有關係的。

帝國主義怎樣掠奪中國而不發展生產力的最好的例子，即為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常常說到在華的帝國主義銀行，祇是因為這些銀行是扼住中國經濟咽喉的魔手！）我手頭沒有去年各帝國主義銀行的營業報告，我祇能根據統計月報上劉大鈞所摘錄的一九二八年的情形。在這一年內，匯豐銀行的資本共為二千萬元，公積金為銀一千

四百萬元，及金鎊合銀五千九百三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三元。除公積金內大都作為外國存金或投資外國票據外，該行手內却有印度證券及殖民地證券達一萬一千七百萬元。匯豐銀行如此，其他銀行差不多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在那裏更寫道：

“麥加利銀行之資本及公積金共有七百萬鎊，持有政府證券及他種證券共九百二十萬鎊，又於大英銀行占有股本二百二十萬鎊。東方匯理銀行持有法國國防公債十五億九千三百萬法郎，又有國庫長期債票等一千六百七十萬法郎，而資本及公積金僅一億一千七百萬法郎也。大英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百七十萬鎊，而持有之英印兩政府證券共達二百九十萬鎊。華比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四千六百九十萬法郎，持有之政府公債及政府擔保證券四千六百七十萬法郎，於聯號銀行占有股本一億一千萬法郎。橫濱正金銀行共有資本及公積金二億零六百萬日金圓，持有政府證券及公債二億七千八百萬圓。”（同月報，二十一頁）

除銀行之外，再譬如外國資本家在中國設立之各種保險公司。這些保險公司的資本雖是專為中國業務募集，但大

部份仍投資外國證券，收入的保險費也是如此。劉大鈞先生說：

“據某公司報告，其款項五份之二，存於中國境內之銀行，五分之三投資於抵押及證券。而證券之中半為外國政府之債票及外國公司之股票。該公司之資本與盈餘，合併計之，猶不及上述款項總數之半，故其資本完全投於外國可斷言也。

“萬國中法兩儲蓄會及外國信託公司亦頗有上述情形，甚至中國政府設立之郵政儲金機關亦嘗以收入之存款購置外國證券，是真可謂中國對外之投資事實。”（三十五頁）

這些事實表示什麼呢？這表示出帝國主義盡量的利用各種方法剝削中國的民衆，盡量的破壞中國的手工業與農村經濟，盡量的吸收中國的財富，但這些財富他們並不用來發展中國的生產力，却用在保効本國的政府，用在發展自己母國的經濟。這在任君看來，又是荒謬絕倫的（凡是任君不了解的東西都是荒謬絕倫），然而在帝國主義，這是再自然沒有的。

但是當我們說，帝國主義，投資的主要部門，是在借款，

銀行業，交通工業等等，這並不是說帝國主義的資本完全不投於其他工業的部門。只要有高度利潤可得，帝國主義者當然是不會客氣，不會落人家之後的。在這一方面，近來表示特別積極的，即為日本帝國主義。最明顯的是在紡織工業，以及雜貨業方面。關於紡織工業方面，我們已略略說過，關於雜貨工業方面，據大坂市產業部調查自去年五月至本年一月，日資本家在上海設立的有：

廠名	預定資本 (日金)	製品種類
上海紙業工廠	五千元	包裝箱
泰山橡皮工廠	十五萬元	橡皮鞋
美芳工廠	四萬元	瑤瑯器
河野罐頭廠	二千元	罐頭
冠麗製帽廠	三萬元	帽子
金屬精煉廠	十五萬元	鉛製品
日華手染廠	三千元	手染
金水熱水瓶廠	三千元	熱水瓶
加藤電線廠	五千元	電線類
仁和瑤瑯廠	一萬元	瑤瑯器具
中華工廠	五千元	製鞋業

安川電機廠	十萬元	汽車類
大阪機器製作工廠	五萬元	紡織用品
東華織廠	一萬五千元	領帶類
泰昌機器廠	三千元	機器
自一月至五月；日人在 <u>天津</u> 設立的有：		
怡豐工廠	二萬元	橡皮鞋
泰山膠皮工廠	三萬五千元	橡鞋底
世戶工場	一萬元	肥皂
田中工場	五千元	橡皮管
清水工場	二萬元	煤油混爐
高橋工場	二千元	獸腸象皮製膜
宮崎洋行	三千元	日本酒
高橋洋行	二千元	領帶

(見五月底上海日日新聞)

我有意把這些廠名，資本額與產品排列出來，是為得要使讀者看到到底這些工廠是怎樣的工廠，他們在中國經濟上有怎樣的影響。如若我們仔細的把這些數目字研究一下，那我們就立刻可以看出，這些都是規模非常小的，主要的都是出產些日常用品的工廠。這些工廠的廠主，都是一些被日

本國內大資本家所排擠的小資本家，他們或是在國內為本國的大資本家所吞併，或是移植他們的資本到中國來，利用一些特殊的條件，發展他們的企業。這些小資本家同中國一些土着的資本家競爭起來却常常能夠得到勝利。但統治中國經濟的，自然不是這些小規模的企業。這些企業的資本同最近成立的歐亞航空公司德帝國主義的資本，中國航空公司的美國資本等比較起來，真是相差天地。（即中國航空公司，就有資本一千萬元。）

但是就是這些外國工業的發展，同樣的受着中國國內市場，即中國民衆購買力的支配。我想除了任君等這些人之外，誰也不會夢想在貧窮的沙漠裏，會生長出資本主義的薔薇花。這些資本主義的企業，一時因為特殊條件而產生的，將同樣遭到嚴重的經濟恐慌的影響。破壞中國經濟，使中國廣大的工農羣衆貧窮到無以為生的帝國主義，以中國經濟的破壞，與中國廣大民衆的貧窮化而為生的帝國主義，當然不能在中國造成資本主義的宮殿！

總結起來，現在不是中國經濟的繁榮，而是中國經濟的恐慌，帝國主義在中國的統治，祇能破壞中國經濟，而不能發展中國的經濟。它祇能使中國的經濟殖民地化，而不能使

中國的經濟獨立發展。祇有帝國主義的辯護士如像任曙君其人者，才會閉着眼睛夢想中國資本主義的繁榮時代！

六，中國農村經濟問題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以商品經濟的發展，為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任曙君，當然很容易拿海關冊上的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農村經濟的性質是資本主義的，而不是封建剝削占着統治的地位。關於這一點，我想現在不必再同這位中國資本主義的贊美者多費唇舌。我們在這一節中所要批評的是任君所說的：“我們就再指出那被人看作封建經濟之中心問題的土地問題來，證明牠的關鍵也是資本主義，而不是封建關係”。（原書，二〇一頁）

我們現在就同任君來談談土地問題。

一開頭，任君又表示了他玩弄數目字把戲的特別能力。他在他的大作二百零二頁上，引用了這樣的一張表：

	戶口的百分比	佔有土地面積的百分比
中	農(一〇至三〇畝)二四%	十三%
貧	農(一至一〇畝)四十四%	六%
富	農(三〇至五〇畝)十六%	十七%
	中小地主(五〇至一〇〇畝)九%	十九%

大地主(一〇〇畝以上) 五% 四十三%

這張表從什麼地方來的我們現在姑且不去管它。我們現在只要看任君如何解釋了這些數目字。

“表上土地之集中是顯然的事實。貧農戶口多而土地少，不待言是農村爭鬥的中心爲土地的表明。可是土地之集中，不僅建築在貧農之失地，而且建築在中農的失地。中農佔有土地之少，不是自足自給經濟破壞的證明嗎？所以土地之集中，與貧農與富農地主之對立，都完全由於封建生產之破壞，即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
(著者加圈——夢雲)

這裏任君所看到的，祇是中農佔有土地之少，自給自足經濟的破壞，所以完全是封建生產之破壞，即資本主義關係之形成。這就是任君從這張表上所能得到的唯一結論。但是土地集中到誰的手裏呢？這對於任君是沒有興趣的。

就是從任君所引用的表上，我們也可看到佔戶口數祇有百分之十四的中小大地主，却佔有百分之六十二的土地的面積。這就是中國的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不是很顯然的嗎？下面他又列舉中國佃農所占全體農民的百分數。他說，佃農在

“福建和浙江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六十一至八十之間；其次是江蘇，遼寧和湖北等省區，當全體農民百分之五十一至六十之間，又其次是河北，河南和黑龍江等省區……這是表現因封建剝削關係而土地集中嗎？抑或因資本主義關係而土地集中呢？問題亦是不待辯而自明的”。（原書二〇四頁）

接着他又拿廣東與江蘇佃農數目的增加證明：

“土地愈集中的地方，資本主義愈發達。反之資本主義愈發達的地方，土地愈集中，土地的集中與資本主義相依為命”。（原書二〇五頁，著者加圈——夢雲）這就是任曙君對於中國土地問題的全部“理論”！

從上面任君自己所引用的表看來，這些土地是集中在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誰是地主階級呢？任君除了肯定這一地主階級就是資產階級以外，似乎沒有什麼具體的說明。

我為得要說明這一問題，不能不從最近在新生命社出版的嚴靈峯先生的“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書上，找到一些說明。雖是在這一部書內嚴先生大發雷霆，大罵任君為“偵探員”，為“機會主義者”，然而任君與嚴先生的基本觀點，實際上並無兩致。（很抱歉，我的文章做到這裏，才拜讀了“有

特殊見解的”嚴先生的大作。“別開生命的動力雜誌”，我雖也見過一兩次，但總沒有拜讀過裏面諸位先生的大作)。

嚴先生對於中國今日的地主階級這樣的寫道：

“中國今日的地主們，對於農民的剝削，主要的目的，却不在於農民直接供給他們一切必需的消費品，而是要在地租的形式之下交給地主以近代資本主義社會最流行而時髦的商品——生產物或貨幣——至於這種地租，由地主看來，是他的耗費購買土地的資本上應有的利息；由農民看來就是他自己勞動力所創造的一部份剩餘生產物，不過這種剩餘生產物是他自己之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罷了”。

嚴先生更接着說：

“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商品侵入農村更急劇地促使廣大的農民破產，農民破產的給果脫離土地，農村生產更趨衰落，於是乎使舊時靠着農民爲生的封建的，半封建的領主，貴族，官僚，也因此站脚不住了。所以，不但一般因受商品經濟侵掠而結果之貧困的農民，要出賣自己的田地，即舊式的貴族宗室也要將自己的土地整批出賣的。其次，城市的資本主義工業雖然已開始

發展，但大部分還是操在帝國主義手中，民族工業以資本積累的薄弱，不能與帝國主義工業對抗，於是擁有一小數貨幣的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者，便趁土地上投資輕，本利厚的機會，出買其土地來了。這是新式地主發生的重要原因”。（中國經濟問題研究，一〇五——一〇六頁）

如若把嚴君的主要意見總括起來，那就是說，中國舊式的地主，因商品侵入已經同他們的農民一起破產了。現在的地主是民族資本家，商人，高利貸的地主，是新的地主，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

雖是嚴君在有些地方表現了罵人的特別才能，然而在骨子裏，嚴君同任君同樣的對於初步的政治經濟學沒有絲毫的了解。

任君難道會忘記，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前，中國商業資本已經得到不小的發展。遠在帝國主義侵入以前，商品經濟已經使某一部分地主破產，而出賣他們的土地，某一部分商人，高利貸者，或是官僚，因為貨幣的積累而購買了土地。或者因為某一部分地主，因為同時經營商業，經營高利

貸，而更擴大他們的土地。在那時，難道這些地主已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

我想我們研究中國的地主階級，不是在研究他們的出身，而是研究他們怎樣剝削中國的農民，祇有明白了這一點，我們才能判斷中國的地主還是資本主義化的，還是封建的。不然，你研究一輩子，還是研究不出一個結果來。因為誰也沒有法子專研究中國每一個地主的家世，考究他們的出身呵！

但是中國的地主，究竟怎樣剝削他們的農民呢？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同城市資本家剝削工人一樣的呢？當然不是的！

集中到地主階級手中的土地，實際上並不由地主拿來利用新式的機器，雇用勞動者來耕種，而是把它割成一小塊，一小塊的租佃給無地與地少的農民。所以在中國農村裏，土地的所有權雖是集中到地主階級的手裏，但是土地的使用權却是分散給千百萬農民的。這難道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所做的勾當？難道這同過去封建時代地主與農民的關係有什麼根本的區別？利用新式生產技術，雇用工資勞動者經營自己的土地：這是資本主義化的地主的唯一記號。然而

正是這種記號是中國地主所沒有的，這也說明，爲什麼任君嚴君等不能不從地主的出身去證明他們的“理論”的緣故！

至於這些耕種地主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田地上所生產出來的百分之五十到百分之七十奉獻給地主。如若屆時不能交納時，地主就能用武力強迫佃戶交納。這種不用任何工資的代價做掩庇欺騙的公開露骨的剝削形式，請問同封建時代封建地主對農民的剝削形式，有什麼區別？

在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工人，第一，必須在法律上是“自由的”；第二，必須對於一切生產工具是“自由的”，就是說，他必須沒有任何生產工具；第三，資本家付給他的工資是拿恢復他的勞動力的至少限度的商品的價值來決定的。但是中國佃農呢？第一，在法律沒有任何“自由”，就是這括弧中的自由。第二，他們自己還有一些原始的生產工具，他們就拿這類原始的生產工具耕種他們的土地。第三，他們把田租交納出去之後所剩下的經常的不夠他們最低限度的生活，而經常的利用高利貸度日。換句話說，田租不但取去了他們的一切剩餘生產品，而且也取去了他們工資的一部分。難道我們能稱這類的農民爲工人嗎？

至於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中國地主的一部分政治的特

權爲貨幣的權力所代替，使農民的田租，一部分（祇是一部分）從自然品的轉爲貨幣的，但是這對於剝削的本質，並沒有任何改變。中國的商人，資本家，高利貸者，軍閥，官僚，所以要購買或掠奪（掠奪的形式，現在還是很普遍）土地的目的，並不是爲了要實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正是爲了實行封建式的剝削。

在資本主義國家裏，資本家投資到土地中間，同投資到工業中一樣，爲的是要取得平均利潤。在中國農村中間，這種平均利潤是沒有的。可惜關於這種政治經濟學上的專門名詞，任君嚴君完全不懂，所以也祇馬馬虎虎說些什麼“由地主看來”，“由農民看來”是“資本上應有的利息”，是“他自己的社會必需的剩餘勞動所造成的剩餘生產物”這些似通非通的話。所以同這類人辯論，有時恐覺得有些對牛調琴的不快的感覺。

然而不必要怎樣豐富的科學知識，就是普通的一個稍有頭腦的人，也會明白，中國民族資本家不能在工業方面立足以至把資本拿來購買土地，收租過活，一定是因爲在鄉村中間他可以更利害的剝削農民。他現在不必像工業資本家那樣，要天天提心吊膽的去經營，他現在只要安安靜靜的坐

着吃就行了。當然土匪來的時候，農民起來搗亂的時候，他還是不能不用一些心思專同土匪與暴徒做鬥爭！他還是要設法組織團防與民團，來保護他自己，以繼續他對於農民的剝削。當然這不是資本家的“資本主義化”，而是資本家的封建地主化！

對於農民的剝削除了地主之外，還有商人與高利貸者。這些商人，他們利用農民的困難情形，廉價的收買農民的生產品，再轉賣給比較大的出口商或城市的商人。他們在這中間所賺的錢，同資本主義社會中商業資本家所分得的一部分利潤帶有完全不同的性質。他並不像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商業資本家那樣，因為他代替工業資本家，把商品從工廠傳達給消費者而分得利潤的一部分，而是由買價與賣價的相差中來的。這種商人，在封建社會中是常有的。至於利重至於每月二分以至十分的高利貸，同資本主義社會中的借貸資本完全不相同，那更不用多說了。

在中國農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時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正因為這樣，所以中國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真是無孔不入。農民今年如若交不出田租，那就當做農民對於地主的借款，拿高利貸的利息來計算。農民要出賣穀子或棉花時，

他在鄉村中所能碰到的主顧又是地主，又不能不廉價的出賣給他。不論在那一方面農民都受損失。這種各方面的剝削，當然使農民祇有破產，或者變為地主的奴隸，或者流為乞丐，土匪，以至凍死與餓死。

但是我們這種意見，當然是嚴君所反對的。嚴君說：

“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的性質，而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是一方面的城市大商店為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這種商業利潤，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取買辦形式專門為帝國主義即直接屬於外國資本家的買辦或本國工業資本家，由生產部門中抽取一部分資本向農村購買材料；這些都是直接或間接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這種商業資本已失去自力的‘獨立’和‘優勢’了”。（同書，一二九——一三〇頁）

嚴先生真是善於創作似是而非的文章的大匠！他的整本大著就是這類似是而非的理論的傑作！我們同他爭論，商業資本在中國鄉村中，怎樣剝削農民，他就會同你講許多

“城市的大商店”，許多變成工業資本家的商人，以及什麼“隸屬於生產部門的商業資本”等等牛頭不對馬嘴的話。然而他究竟怎樣證明中國商業資本是資本主義統治時代的商業資本呢？他說，一方面因為“中國現在有許多商業資本都是帶着買辦性質”，都是為“帝國主義或民族工業部門銷售商品”，另一方面又因為“取買辦形式專門為帝國主義……向農村購買材料”，所以它不是專門從事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高額利潤，而“只是從工業部門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

實際上，這樣曲曲折折的“絕妙好詞”，無非說，中國商業資本帶有給帝國主義和民族工業做出賣工業品與購買材料的買辦性質，所以它的利潤不是利用兩方孤立而隔絕的生產者從中壟斷用欺騙方法取得的，而只是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部分。

我現在要問一下嚴君與讀者，為什麼商業資本而一帶有買辦性質，就立刻會從封建時代的變為資本主義時代的商業資本呢？

這除了證明嚴君這一段議論，是在給中國的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做辨護士以外，不能證明任何論點！

研究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主要的不在問它給什麼人做買辦，給帝國主義者或是民族資本家，而是問它怎樣做買辦。如若嚴君少做些罵人的“鬥爭”，而肯虛心地專一研究這一問題，那對於嚴君關於中國經濟的了解一定有絕大的幫助，因為這問題的解答不但可以了解到中國商業資本的性質，而且也可以看到帝國主義如何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

同帝國主義有直接關係與間接關係的買辦，以及一切在中國鄉村中間來來往往的商人高利貸者，他們利用他們的貨幣，利用同國內國外市場不能直接發生關係的農民的困難與他們對於他們生產品市價的無知，尤其是他們對於貨幣的急迫需要，用壟斷，欺騙以及強迫的方法，廉價購買農民的生產品，這是人所共知的普通現象。我想這除了給中國買辦做辦護士的嚴君外，誰也不能否認的。譬如在我手頭所有的僅少的普通的關於中國農村經濟的書上，也可以找到不少這類普遍事實的敘述。

“中國農家常以經濟困難，又無合作的習慣和組織，遇着急需款項或物品的時候，往往賤售農產品或預售農產品或舉行賒欠，買賣均受莫大的損失。……分析研究，居間的商人固是一個剝削的拿手，而交通不便，

運輸困難，苛捐……也是同樣的損害農家。閱者如不相信，可以事實證明，下表便是烏江農家出售棉花的損益：

烏江農家出售棉花每包損益的比較

售價	改良棉花	普通棉花
在本地出售	三二，〇〇元	三〇，〇〇元
售與無錫紗廠	四二，〇〇元	三八，〇〇元
打包，運輸，保險 入棧等費	三，一六元	三，一六元
實收利益	三八，八四元	三四，八四元
由合作社代售 所得的利益	六，八四元	四，八四元

“觀察上表，可見由合作社代售的價格比較農家在本地出售價格，改良棉花每包可多得六，八四元，普通棉花每包也可多得四，八四元，……然此種售價，據報告所說，還是價格低廉，運輸困難時的標準，若在平常年份所得可以更多。由此足以證明農家所受的損失一定不小了。這種損失，必為居間人所剝削無疑”。（見中華書局最近出版，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古樸編著，二〇四頁）

同書作者，更引用了民十八年十月立法院統計處在各

鄉村調查的“上等粳米在鄉村和市鎮出售價格的比較”。表很長，我現在只摘取其中最能表示出這一相差的幾處吧。

地方	鄉村的價格	鄰近市價格	百分比
江蘇省句容縣土橋村	一三,〇元	一四,〇元	九二,八
全,揚中縣,三圩埭	一四,〇元	一五,五	九〇,三
安徽省宿松縣	九,八元	十四,五元	六七,五
全,秋浦縣占村	八,〇元	九,〇	八八,八
湖南省臨湘縣涇港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浙江,義烏,東郭聯合	一〇,〇	十二,〇	八三,三

……………(見全書,二〇五——二〇九頁)

但是這些統計還祇是一些市鎮價格與鄉村市價的比較,實際上商人高利貸者對於農民的剝削,還不止此。

我現在想從我手頭所有的一本關於東三省金融的書上,找一些普遍的例子,給嚴君與本文的讀者看看。當然,在嚴君等看來,東三省是全中國最富庶,資本主義最發達的省區吧。

侯樹形先生在他的東三省金融概論上講到錢莊與農民的關係時寫道:

“錢莊之貸款營業,恆限於接濟城市商民。中小各

錢莊，間亦有貸資於農人者，惟另以一種‘批糧’辦法行之。每年舊歷六七月頃，年景豐歉，大體分明，而時正青黃不接，農民需款孔亟。錢莊於此，常以現資接濟農人，預約俟秋成後，以糧豆抵償。實際本為一種貸款，而形式則為購買期糧。凡糧豆之價格，及交代之日期，皆預先議訂。其期限愈長者，糧價愈小。其期限愈短者，糧價愈昂。蓋此種‘現錢期貨’交易，糧價以內，須扣除貸款利息。故期限愈遠，所扣之利息愈多，糧價亦從而愈低賤也。此種貸款辦法，在錢莊名曰“批糧”，在農人名曰“賣青”，風行吉黑兩省，可謂農村金融中最主要之制度。錢莊而外，糧棧，燒鍋，當舖及雜貨商為之者，尤夥。所獲盈利，以月息計之，率在十分左右。就哈爾濱附近言，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每車（中東路貨車容糧七十石）大豆，平均行市約值哈大洋一千三百元，比至十月一日，新糧上市時候，最高行市曾至一千七百五十元。是以一千三百元本金，於三月期內，竟獲利四百五十元。約略言之，合月利一分五厘強，可謂駭人聽聞。然此猶非極端之例證也。瀋海路沿線，東豐西安各地帶（俗呼東山裏），十七年舊歷七月一日批糧行市，大豆賣

青，平均每斗價奉小洋二十二元。迨十一月一日新豆上市時，市價便爲每斗四十七元。計四閱月間，可獲純利，已超過母金，約合月利三十分弱。農人所受之剝削，可想見矣”。（東三省金融概論，一九四——一九五頁，夢雲加圈）

中國的錢莊，糧棧，燒鍋，當舖以及雜貨商等等當然是中國鄉村中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的標本代表者，他們對於農民的剝削是否像嚴君所說的，“只是從工業部分中抽取工業資本家平均利潤的一部分”？我想除了嚴君以及他的朋友之外，稍爲了解一點中國實際情形的人，都不會這樣說的。

帝國主義者在通都大邑，就經過那些大買辦取得高度的利潤，而這些大買辦又直接間接的經過這些統治鄉村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不論是三位一體，或二位一體，以至一位一體）來剝削中國的農民，譬如帝國主義者要把中國的大豆，運往外洋，帝國主義者，就把資本給中國的大買辦，而大買辦就經過這些居間人，到鄉村中去賤價收買。結果得到高度利潤的，不但是帝國主義者，而且也是中國的買辦，以至一切這些居間分子。帝國主義者，不必要想種種方法，

把資本投到中國土地中間，改良生產，以取得廉價的生產品。他們經過這一剝削的系統，就能夠在中國取得廉價的他們所需要的東西。

實際上，帝國主義除了利用買辦，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間接剝削中國的農民羣衆外，它還親自出馬，對於中國的農民實行高利貸的，封建地主的，以及奴隸式的剝削。最明顯的例子，是東洋拓植株式會社在滿洲所做的營業。這一組織在東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種種特權，用高利貸放款給貧苦的農民，強迫農民給它做苦工（實際上這與封建時代的徭役無異），使農民不能自由行動，把農民變為它的奴隸。

這當然不是帝國主義對於我們大中華民國，特別的賜與，這在非洲，在南美洲，以及亞洲的印度，南洋羣島等許多殖民地與半殖民地上，差不多是很普遍的現象。南洋羣島荷蘭資本家對於中國的“豬仔”的剝削，難道是資本家對“自由”的工人剝削，這是奴隸主對於奴隸的剝削！

所以，在我們看來，帝國主義在中國經過買辦，或是不經過，利用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中國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同這些鄉村中的封建勢力結成同盟，擁護他們的統治，同他們共同宰割中國的民衆，實是很普通的事。但是對於嚴

君這類人，這却是不可思議的。他們高叫着：

“我們知道帝國主義本身是代表高度的資本主義勢力，他對於封建的經濟制度，完全處於不可調和的矛盾地位”。（嚴著，一二四頁）

文明的進步的帝國主義，怎會同野蠻的落後的封建勢力聯合呢？這真是不可思議的“最反動的理論”！

當然揭破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與半殖民地奴役民衆的真相，在帝國主義者，以及帝國主義的辨護士看來，當然不能不是“最反動的理論”！

剝削中國農民羣衆的，除了上述的地主，商人，高利貸者以外，最出衆的，當然是中國的軍閥。至於帝國主義怎樣利用軍閥擴張它的勢力範圍，軍閥怎樣依靠帝國主義的幫助而存在，以至軍閥如何徵收苛捐雜稅，如何封馬封牛，如何舉行軍閥混戰，如何屠殺民衆與破壞中國經濟。這是人所共見的事，多在篇幅去描寫這許多事實，我想完全沒有必要吧。

但是嚴君在他的大著裏却說：

“中國從封建時代遺留下來的軍閥制度，不但帝國主義盡量想到利用去統治中國擴充自己經濟的勢力即

資本主義的勢力，而中國資產階級不管是獨立的，買辦的，半買辦的，也想利用來擴張自己的利益，然而，結果，不管帝國主義佔取全部統治也好，中國資產階級在刻苦可憐的掙扎中僥倖發展也好，總是使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同書，一二六頁，夢雲加圈）

對於這種違反任何事實的空洞的“理論”，我們當然是很佩服的。然而這是什麼樣的“理論”呢？

實際上，中國現存的軍閥制度，是在帝國主義侵入中國，把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後，依靠帝國主義，依靠封建剝削而存在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在每一軍閥統治的區域內，除了對於帝國主義絕對尊重外人生命財產，對於各種各樣體面商人資本家地主等須互相客氣之外，對於廣大的民衆，可以任意徵收苛捐雜稅，可以任意強迫他們做苦工，可以有完全生殺與奪之權。這同封建時代封建諸侯對於他們統治下的庶民有什麼根本的不同呢？所不同者，就是封建諸侯在他統治區域內自己是主人翁，而中國的軍閥則同時，是某一帝國主義的工具。

但軍閥對於中國民衆的這種剝削，這種特權，在嚴君等

看來，無非爲得要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看吧，在軍閥統治之下，中國民衆不是變成更其窮困，更其沒有出路，中國的經濟（不論是工業或農業）不是更其破產，災荒的區域不是更其擴大，軍隊土匪的數量不是更其增加嗎？但一切這些，說道都是爲得要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

有些人說，中國軍閥利用這種剝削方式取得來的錢財，等於資本主義開始發展時的原始資本的積累。這實際上完全是似是而非的論調。中國軍閥的金錢，除了一部分用於爲了擴張自己的地盤，而豢養大批的軍隊外，大部分都是儲蓄在外國的銀行裏，爲得預備一旦失敗後，能夠到租界上過他們優裕的歲月。同時，他們還購買地皮，購買股票等這些最靠得住的交易。他們並不願意把他們的貨幣變爲經營生產事業的資本。

當然，也有些軍閥，把他們一小部分的貨幣用在開設工廠，但這種百分比幾乎小到不能訴說的。這種生產的事業，對於軍閥們實不過是一種不關重要的副業。讀者試思，中國民族資本家尙且因爲民族工業發展的困難，而把他們的資本投到土地上或其他更有利的投機事業中去，何況軍閥。

至於中國軍閥同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關係的密

切是不成問題的。軍閥制度的存在就依靠這些封建的剝削者。不但這樣，每一軍閥，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買辦，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東三省的那些軍閥，他們不但給日帝國主義當買辦，而且自己還開設錢莊，發行各種各樣不兌現的奉票與軍用票，收買東三省各種特產，擁有千萬畝的良田沃野。所以每一軍閥，必然的是地主，買辦，商人與高利貸者的代表。

同外國帝國主義與封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有密切關係的中國民族資產階級，自然也同軍閥有密切的關係。因為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成許多勢力範圍，造成各個區域的市場，所以每一區域的民族資產階級，就同這一區域的軍閥有不可分離的政治上的與經濟上的關係。在保護當地的民族資產階級，不受他地的民族資產階級的競爭，尤其在保護他們不受到工人階級“搗亂”的損失這許多點上，軍閥當然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同時，民族資產階級，也常常提出一些統一中國，發展實業等空想的口號，提供給軍閥，做軍閥相互鬥爭的旗幟！但是不斷的軍閥混戰，與帝國主義的競爭，使民族資產階級的民族工業，沒有發展的可能，這不能不常常使民族資產階級表示些“不滿意”。然而有

什麼辦法呢？沒有軍閥，他們也就很難存在。而且民族資產階級不是呆子，他們也是善變的分子，他們難道不能利用他們的資本，做些有利的事業嗎？當然能夠的。這是說明，為什麼他們的資本，近來也逐漸投向股票，地產，錢莊，銀行等方向去的緣故。

* * *

廣大的中國農民羣衆，就是處在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軍閥官僚的重重壓迫之下，他們的不安分，他們的起來做反抗的革命鬪爭，實是這種壓迫必然產生的結果吧。然而這些政治問題，不是我在這裏所要說的。

我現在還要說的，就是在中國鄉村中間雖是封建的剝削統治的地位，然而這並不就是說，那裏完全沒有資本主義的關係。資本主義在中國的相當發展。以及商品經濟的侵入中國農村，當然使農民內部起了相當的分化，使農民階級內部產生了貧農、中農與富農的階層。但是正因為帝國主義的統治，封建勢力在農村中占着優勢，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獨立發展，以及長期的經濟恐慌，所以這種分化一方面使廣大的農民羣衆貧窮化，乞丐化，使他們不能到城市中變為無產階級，而去當兵，當匪，或者大批的凍死與餓死，使地主們

更加容易地利用他所集中的土地去加緊對於他們的剝削。另一方面，鄉村中因分化而產生出來的富農，也因為同一原因與其把他們所積累的資本投入土地，自己為資本主義的生產，還不如拿錢購買土地，把土地出租給無地或地少的農民，對農民實行地主的剝削，或是做投機事業與高利貸更為有利。正因為這原因，在中國農村中產生了任君所認為荒謬絕倫的半地主的富農，這是說明為什麼當廣大的農民羣衆起來消滅地主與平分他們的土地時，他們不能不而且必然要反對到富農的緣故。

當嚴靈峯君論到中國農村中資本主義的發展時，對於中國農民分化的這種特點沒有絲毫的了解。他從一百十一頁到一百十五頁差不多完全照抄了俄人華林先生的文章（見中國經濟的發展及其前途，李麥之譯，七一頁——八七頁），所不同的，就是華林以此來證明，中國農村中已經開始了初步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雖是主要的矛盾是封建地主與農民，而嚴君却以此來證明中國的農村經濟完全是資本主義的農村經濟。嚴君在這種地方，的確表示出了他的抄文章的特別能力！……

在帝國主義，軍閥，官僚，地主，商人，高利貸，資本家，

富農等重重剝削之下的中國農村經濟，現在無疑的，是處在一個長期的恐慌崩潰的時期。世界經濟恐慌，世界市場上農產品價格的跌落，祇是加速了這一過程。號稱數千年來以農立國的國家，現在不但要把工業品從外國輸入，而且主要的農業品，如像米，麥，棉花等等的輸入，也逐年增加。據一九三〇年海關報告冊的統計，去年米的輸入，竟達一九·九二一·九一八担，值一二一·四四二·〇五一關平兩。這不是駭人聽聞的事嗎？然而這是農村經濟崩潰過種中必然發生的現象。

農村經濟崩潰的最明顯的記號，莫如災荒區域的增加。所謂災荒，當然不只是水災與旱災，而且也是兵災與匪災等各種各樣的災害。這些災害，當然不是天意，而是人禍。祇是因為河道的經常不修，水利工程的不興，舊的灌溉事業與閘壩等的崩壞，農林的不事講求，所以雨水多些或少些，可成為水災或旱災。至於兵災與匪災，那更不用說是人禍了。此外，在重重剝削下的農民，不能不年年縮小他們的生產，以至完全拋棄不能給與他們任何東西的土地，而流為兵災，再進一步的來破壞農村經濟。在全中國現在差不多沒有一省沒有災荒區域。即以今年的一次大水災而論，受到重大

損失的已經有十六省之廣。今中國現在已經有一萬萬人口，變成了災民，等待着餓死，病死與凍死。

然而一切這些，在任君等看來，都是促進中國鄉村中生產力的發展的！

但是，在我們看來，要發展中國農村中的生產力，祇有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買辦，商人，高利貸，資本家與富農的統治，祇有消滅中國農村中佔着統治地位的封建的剝削。然而這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七、革命性質與非資本主義發展的前途

我們和任君等對於中國經濟性質不同的估計，當然會得出對於中國革命性質的不同了解。任君既然認為中國是資本主義的國家，自然中國的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的革命。然而任君也說中國的革命是土地革命！

綜觀任君的全部大作，任君對於中國土地革命到底是什麼一回事，實際上沒有絲毫的了解。他祇是把這許多名詞連接在一起，亂七八糟胡說一陣，把一些人的文章亂抄一下，甚至把俄國馬札亞爾的話抄上去當做是馬克思自己所說的話，說這就是“理論”，真不免令人肉麻不止！

土地革命的主要內容，是在打倒帝國主義與消滅封建剝削。現在任君既不主張打倒帝國主義，不主張消滅封建剝削（這些東西，在任君看來，都是人家在造的），那末還有什麼土地革命？老老實實說社會主義革命就完了，還講什麼土地革命？這是一。

一切少數派的“著作家”（客氣些，稱他們為著作家吧——夢雲）都認為假使這打倒帝國主義，消滅封建剝削的土地革命是民主資產階級的革命，那一定是資產階級的革命。反對資產階級的革命，必然是社會主義的革命。任君也就是這一類人。在任君頭腦中死也不會想出，除了在資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十八世紀的勾當”之外，還有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進行土地革命的二十世紀的勾當！

任君等根本不了解，中國土地革命的動力，不是資產階級，而是工人與農民。他們所要打倒的，是帝國主義，與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但是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不就等於打倒資本主義。却正相反，在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統治之後，資本主義反而能得到更快的發展。這一打倒地主資產階級的土地革命，所以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

無論任君與嚴君等怎樣亂七八糟說得天花亂墜，然而

在他們估計中國革命的動力時，他們從沒有把佔中國全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廣大的農民羣衆放在眼裏。他們除了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之外，看不到其他任何階級，雖是他們嘴上說些“革命的性質由於社會的階級相互關係來決定”（嚴著，一五〇頁）的空話。這原是不足爲奇的；因爲托洛斯基主義者對於這一“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是從來不能了解，而且也不肯了解的。

他們總是這樣的想：既然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反革命，既然中國的革命也要打倒資產階級，那當然沒有資產階級性的革命。他們根本不了解，需要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農民羣衆，他們參加革命的目的並不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而是爲了要肅清一切阻礙他們發展生產的封建殘餘。他們是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而不是社會主義者。他們有勇氣反對地主資本家的私有財產，向他們的私有財產進攻，以至主張，“土地的社會化”，以至擁護“土地國有”的口號，然而他們這樣做，並不是爲了要共產。他們這樣做的目的，正是爲了想取得他們自己的私產。

這種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的工農的革命，與他們的政權——工農民主專政——的建立的觀念，在任君等當然是

不可思議的。關於這一點，他們的“革命大師”托洛斯基先生最近還做了一篇很長的文章，詆為這是最反動的主張。最反動的，因為它主張領導這數千百萬的革命農民，先行取得農革命的勝利！拋棄對於這廣大農民羣衆的領導，坐在自己家裏，空喊無產階級革命：這就是“革命的”托洛斯基主義的精髓！

在以社會主義革命爲目的之中國無產階級，絕對不能跳過這一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誰想跳過這一階級，誰就會使中國目前的革命，遭到嚴重的失敗，誰也就不能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因為祇與有廣大的農民羣衆在一起，中國的無產階級，才能打倒帝國主義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才能組織廣大的貧農羣衆於自己的周圍，進一步的去實行社會主義的革命。

所以不但從客觀的任務上講，而且也從革命的動力上講，目前中國的革命還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這是第二點。

土地國有，是土地革命的最後的一句話，即是土地革命的最徹底的實行，因為這是消滅中國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的最徹底的辦法。但是土地國有的時候，必然是工農政權——工農民主專政——在主要的許多省份成立的時候，即

是無產階級能領導廣大的農民羣衆取得革命勝利的時候。所以這口號的實行在那時更將幫助工人階級進一步的取得社會主義革命的勝利。那時，土地國有將是趨向社會主義革命的第一步的開始。

根本沒有聞過李銀主義氣味的任君，在這裏引用了李氏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過的下面一段話：

“現在的時候，革命又使土地問題，比之一九〇五至〇七年成爲一個更大更深更緊張的問題了。……戰爭使參戰國落入向所未聞的痛苦，同時戰爭又非常迅速的促進了資本主義的發展，把壟斷的資本主義變成壟斷的國家資本主義，所以無產階級與革命的小資產階級的民主（即指廣大的農民羣衆——夢雲註）不能限止於資本主義範圍之內了。

“在這樣情形之下，土地政綱中的土地國有，必然要有另一個形勢了。就是土地國有已不是資本主義的最後一字，而是趨向社會主義第一步的開始。……組織模範式的經濟”。（俄國農民問題與土地政綱二八二頁）

任君想拿這一段話來證明土地國有是社會主義革命，而且引用了李氏的話，這真不免太滑稽了。想來任君從沒有

知道過，從二十世紀之初起一直到二月革命止，俄國社會民主工黨的土地政綱上明明寫着土地國有的主張，但是布爾塞維克並不以為那時俄國革命的性質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吧。却正相反，李銀等曾再三指出托洛斯基企圖跳過民主資產階級革命階段的主張，實是倒置的少數主義，是俄國革命的取消主義者。當然，關於這些是任君等所不願意講的。托洛斯基主義者，引用李銀的話，祇是為得要反對李銀主義！這是他們的祖宗托先生的慣技！

拿李銀在十月革命前夜所說的話，來反對李銀在二月革命以前所說的話，這除了有意曲解李銀主義，對李銀主義實行污蔑外，沒有其他的意義。明明是反李銀主義的托洛斯基主義，一定要利用一些李銀的話做遮掩，真是何等的卑劣！

更進一步說來，土地國有雖是土地革命的最後一句話，雖是沒有超過革命的民主資產階級性的範圍，然而這一政策，不一定在一切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級中所能實現的。在某種客觀條件之下，這一政策，可以在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範圍之內，實現出來，在另外一種條件之下，這一政策一定要在社會主義革命的範圍內，才得實現。所以很明顯的，革命的性質，並不以這一口號的實現與否而決定。這關於土

地國有的口號是如此，就是關於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口號，也何嘗不是如此。譬如俄國的二月革命不但沒有實現土地國有，而且也沒有沒收一切地主階級的土地。中國則不然，在中國有些工農民主專政已經成立的區域，地主的土地已經完全沒收，而且已經平均分配了一切土地。爲什麼？因爲革命所處的條件是不一樣的。

但這是不是等於說，因爲中國資產階級革命的任務沒有完成，所以中國革命已經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在任曙君等的“辯證法”看來，這也許是可能的吧。

我們前面已經說過，中國革命所以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不但是因爲客觀的任務沒有完成，而且也因爲革命的動力是工農的。中國現在所有的，是地主資產階級的政權，而不是資產階級的政權，中國革命現在所要建立的，是工農民主專政，而不是無產階級的專政！祇有中國目前革命的取消主義者，才會拿將來社會主義革命的空話，取消目前工農的革命！

說到這裏，我還很想告訴讀者，任君等對於他們所最歡喜用來做攻擊對方武器的二月革命的例子本身，同樣的表示了空前的不了解。

任曙嚴靈峯等，祇是利用李銀在二月革命後所說的，政權已經落到資產階級的手裏，所以民主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成了的話，以此來證明中國現在用不到任何工農民主專政，因此他們還公開的反對在目前的中國實行工農民主專政。他們完全不了解二月革命的特點，就是兩重政權：一方面是沒有任何權力的資產階級的臨時政府，一方面，是有大多數民衆擁護的工人與兵士代表蘇維埃。在“論兩個政權”中，李銀說：

“我們革命的奇特之點，大部分就是在他造成了兩個政權。這件事實首先就要認清，因不了解這問題，即不能前進。……

“兩個政權在什麼地方呢？他在這一點上，就是除臨時政府（資產階級政府）之外，還成立了現在很柔弱的處在萌芽時期，但實際上已是無疑地存在着和發展着的別一個政府：——工人兵士代表蘇維埃。

“這另一個政府的階級成份怎樣呢？無產階級與農民。這個政府的政治性質是怎樣呢？這是革命的專政，即直接依靠革命的奪取，不按集中的國家政權所頒布的法律，而由民衆直接從下創設起來的政權。這並不是

一種存在於國會主義的資產階級德謨克拉西國家裏面統治於歐美各先進國家的那種尋常形式的政權……”

(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二七——二八頁)

在“我們革命中無產階級的任務”一文中，李銀也同樣的伸說這一特點：

“我們革命中最主要的特徵，最足令人深思熟慮的特徵，即是在革命勝利後最初幾天內所形成的兩個政權。

“兩個政權，表現於存在兩個政府的事實上：主要的真正的實際的資產階級政府，即爾伏夫輩的臨時政府，在他掌握中，有全部的政權機關。此外還有補充的，附屬的，監督的政府，即彼得格勒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在他手中，沒有國家政權的機關，可是直接依靠於顯然的無疑的大多數人民，依靠於武裝的工人和兵士。

“兩個政權的階級來源及其意義，就是在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全部沙皇的帝制，不但把全部的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德謨克拉西專政。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地方的工兵代表蘇維埃，就是那種上述階級的專政”。(同書，五九——

六〇頁)

對於二月革命的這一特點，是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所不願意講的，因為這不免違反了“打倒沙皇，工人政府萬歲”的公式！一切不合於托洛斯基主義的東西，都應該削去或緘默不言，這樣才能把李銀主義曲解成爲托洛斯基主義。

“工農民主專政在二月革命中已經實現了”，這是任曙君等所不能了解，也是不願了解的。因此，他們也就不能了解二月革命，不能了解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的轉變，不能了解李銀主義的全部策略。以至托洛斯基不能不在十月革命之後，在“十月革命教訓”一文內，說到十月革命後，李銀主義的“重新武裝”了。（關於這些問題，將專文論及）

因爲二月革命有那種特點，所以李銀那時批評了加米尼夫的錯誤。加米尼夫的錯誤，正是和任曙君以及一切托洛斯基主義者一樣，在於不了解這一革命的特點。他們中間不同的，就是加米尼夫根本認爲那時還沒有工農民主專政，所以還要求有一個這樣的政權的實現，而任君等則根本不知道有什麼工農民主專政，而且根本不需要這樣的一個專政。

可見任曙君等，反對中國民主資產階級革命的階段，而想跳過這一階段的思想，實在不是偶然的。但這一錯誤實

際上等於去取消革命！

我重複說，中國現在所要建立的政權，是工農的政權，是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工農民主專政，當然同俄國十月革命中所實現的，一定不相同。中國不會有那樣自己握有政權，而又把政權交給資產階級政府的工農民主專政，這是很顯然的。中國的工農專政將實現很多在俄國二月革命中所不能實現的任務，這也是無疑的。事實已經告訴我們，這樣的不同是必然有的。

但是能夠因為中國的民主專政，能實現許多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任務，同俄國二月革命不相同，所以就說那是社會主義的革命嗎？

爲然不！這是我所要說的第三點。

最後，任君寫道：“中國的土地革命是反對資本主義的，而不是‘促進’資本主義的；是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而不是資本主義的前途”！（原書二〇六頁——著者加圈——夢雲）

我想這樣不通的文章，祇有任曙君做得出。既然是反對資本主義的革命，那還有什麼土地革命，還有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社會主義的革命，而還說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真是莫名其妙！

非資本主義的前途與土地革命，實際上對於任君這類人，是完全不存在的。他們所看到的，祇是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以及他們的社會主義革命！他們祇是爲得要使人家相信他們，他們也是主張非資本主義前途的，所以不能不拿這些名詞來亂用一頓，結果鬧出這樣的笑話！

中國的土地革命一直到平均分配一切沒收的土地，一直到土地國有，是民主資產階級性的。他不但不阻止資本主義的發展而且給資本主義的發展肅清道路。這土地革命，是反對大資產階級的，但對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却是有利的。

然而這土地革命成功後，並不將在中國開闢一個資本主義急速發展的前途，而是將開闢一個非資本主義的前途。因爲中國革命的領導者是無產階級。它在革命中，終不停止於工農民主專政，而將進一步的實現無產階級的專政。那時要實行的是社會主義，而不是什麼“非資本主義的前途”。

關於中國革命轉變的問題，我想這裏沒有多談的必要。然而祇有了解到中國革命轉變問題的人，才會了解非資本主義前途的問題，這是毫無疑義的。

很明顯的，革命的轉變問題，在任曙君等是不存在的，雖是他們嘴上吹着什麼“不斷革命論”。“不斷革命論”，落到

他們的手裏，就會變成“斷送革命論”！這雖是很可悲的事，然而這是事實！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五日，日本東京

物觀文學史叢稿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本書與李長吉評傳一樣，也是以物觀的方法來研究唐代女詩人及其詩的藝術。作者將唐代女詩人分爲四類：（一）宮廷婦女，（二）家庭婦女，（三）女冠，（四）娼妓；不獨闡女詩人的環境對其詩的影響，且說明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此四類女詩人之詩藝的徑路，並解釋唐代女詩人之詩具有特殊色彩的原因。

(3) 譯選著名與作創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浮士德與城	基斯爾卡那盛 石柔	一元	本書用劇曲的形式，敘述浮士德建設大城，生聚人民，而年老位尊，流于專制，人民又漸已覺醒，要求改革，但惡覽依然到處發威，且使浮士德之子雷死不棄王冠，壓制者被驅制者，生大衝突。後來浮士德悟澈大勢，放棄王位，自願為人民之一員，在大集會的歡呼中，終其天壽，而惡覽之策略，王子之迷亂，不過反而盡了解放民眾之一道脚色。
敗北	沈端先	五角五分	沈端先先生是最近譯書界裏一個很知名的，他的譯筆的通達瀟灑，深刻動人更為人人所深愛，這本小書內包含四個短篇，都是極有意味和含蓄的故事，令你看完之後，也會愛不釋手。
蘆管	趙景深	四角	凡代表俄法英美意大利愛爾蘭瑞典等七國，其中諸家作風各有不同，有王爾德和史特林堡漂亮的對話，康珊和樊達克神祕的描寫，卜西里和戴麗黛愛戀的抒情，莫泊桑和樊比亞簡直的文筆；閱之不但可陶冶性靈，兼可作為小說範本。
絕望女	徐霞村	六角	本書為世界諸名家的傑作集，含有「法郎士」，「高爾基」，「皮藍德婁」，「果戈理」，「托思退益夫司基」，「柴霍甫」，「布寧」，「阿左林」，「比爾路易」。諸人的作品，可為研究世界文學入門書。
西萬提斯的未婚妻	戴徐 望霞 舒村	六角五分	本書為阿左林的小說選集，阿左林為當代西班牙文壇巨子，作風瀟灑蘊藉，清鮮而雋永，使人如觀荷爾渾畫，讀唐人作品之感。譯者尤能時時將原著者之作風的長處充分地表出，故不但可供愛好現代文學者欣賞，且可作散文之模範。

中國農民

問題之史的敘述

熊得山

一

中國到現今，差不多都是一個憑天吃飯的國家，換一句說，多少還是一個受自然支配的國家。這樣，鬧起旱災來，幾乎是遍地赤土，連樹皮草根，都要吃個精光，鬧起水災來，幾乎是一片汪洋，那就只有檢浪滓，撈魚蝦了。幸而還是棲

在一個天惠的地帶，若不幸而位在非洲撒哈拉大沙漠，並低窪的荷蘭，所稱為四萬萬神明貴族的，眼看着一個個將化為蟲沙，將化為魚鼈，將不能再蛻化為人，以這樣的可憐的景象，居然還有人負起五千年來的道統，十六字的心傳（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欲以所謂東方文化來抵抗物質文明，且不僅抵抗之已也，直欲將所謂‘聲光化電’，置之於所謂‘道統’掌握中，讓道統來支配，大概這般人的來頭，非將四萬萬人化為蟲沙，化為魚鼈不止，尙有何說？

這次的水災，當是一個大災眚，受害的有的報五千萬人，有的報七千萬人，其實中國的災民，何止此數！水災之前有兵災，無兵災的區處又有剝削災，並其他種種，真是那裏說得盡！據我最低廉的估計，中國的災民之由於水災的，或者只打七千萬，其他災民，儘可說有七千萬之四倍乃至五倍，實在這並不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中國從洋大人闖關以來，中國人除為豪紳地主的隸屬民之外，就在開始一步一步地國際災民化，越至近年，災民化之速度，直與物體落下的速度為一正比例，加之大人先生們口談東方文化，五官百骸的享樂，頃刻都離不了西方文化，於是越加助紂為虐，越加

地皮剝到五丈以下，大家試平心靜氣地估算一估算，憑天吃飯的中國，除開天之驕子外，鮮有不成災民的。

誠然，爲了這次水災，全國都在奔走呼號，救災！救災！這種呼聲，大概已從國內傳到國外去了，聽說日本的天皇，已解囊捐了十萬，日本臣民，也正在募捐助賑，黃金王的美國，亦似乎有同樣的舉動，中國內地自不用說，其捐助的成績，當有若干萬，當局對於水災之熱心，當然是要超過其他一切，故有的則斟酌實在的底子，而發賑災公債一千萬，有的則斟酌災情，而要發八千萬公債，大概現在已決定八千萬了，合之公家，私家，國內，國外的捐款，打滿了說，或者可到一萬萬罷。惟這一萬萬元。即令只用之於水災災民，每人也才一元幾角錢耳，又那裏濟事？或者有深謀遠慮的先生們，覺得與其拿一萬萬元來買饅頭或餠餅替災民充飢，還不如同時兼籌並顧個治本的方法，即疏江，開支河，修閘，築堤等等，的確這是一個治本的方法，而以工代賑，且是一個標本兼治的方法，但是說到這裏，除去直接賑濟了以外，區區幾千萬元的工程，即令主其事者清白乃身，除拿夫馬和薪水之外，並不將賑款套入腰包，而又能容納幾許災民勞動者？其無工可做的災民，又將若何？此外不屬於水災，而由其他災

害來的災民又將若何？這却是一個最嚴重的問題。

中國的水災，何以這樣厲害？要解答這個問題，與所謂天者是毫不相干的，屬於公一方面的，自必是官吏怠荒水利，侵蝕隄款，未植森林，未興河工，甚至將隄款移作兵費，化作槍械，本來就未曾使‘水由地中行’，怎得不‘懷山襄陵’？再就私的一方面說來，農民早已一層層地被剝削到死綫下，他的直接生物的食慾且無由療治，當然說不上鑿池浚溝，因是種種，水災之在中國，遂成了別國的地震火山，簡直一籌莫展了。嗚乎！半殖民地的中國！

我現在並不想單就這一水災問題來探討，左右中國的問題，現在已屬極頂的問題，我且就中國農民問題，來算一算舊賬罷。

二

中國既然到現今都要受自然的支配，那末，在以前更無庸提了，左右中國並不是一個文化中落的國家。那末，中國何以老是落在這步田地？我且引一段話寫在下面：

‘由於以地租結合於生產物及生產自身之特定種類中之所謂物納地租的形態；由於爲此種地租不可缺

條件農業與家內工業之結合；由於農民家族之簡直完全自給；由於農民家族離開市場而獨立的那種事實，即由於農民家族離開所行於自己外部社會部分之生產上並歷史上運動而獨立之事實；簡單地說來，即由於現物經濟一般的特徵，此種地租形態，為完全適於如亞洲所見的靜止的社會狀態之基礎的一個形態。

……這種地租，且可達到這一範圍，即於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為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資本論第三卷下第四十七章）。

這一段話，顯然是歐洲中世紀物納地租的一個寫真，却也正適合於亞洲的中國。然則中國農民因貴族地主的剝削，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都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成為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時，將若何？換一句說，因此而遇到人為的饑荒，並促成自然的饑荒了，將若何？說到這裏，這正是中國史上王朝興亡的契機，即無量數的農民，遇着這個年頭了，不是

立即餓死，就得頻起暴動，於是舊的統治遂以坍塌，新的統治於以出現。然而再起的王朝如何？至多對於農民，亦只是輕減了王朝末年的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却是絲毫沒有增進農民的生產方法，因之農民的暴動，也是與王朝末年週期的無理的榨取與高壓（那由貴族人口的增加，與貴族分封必有的現象）為正比例的。

這樣一來，中國王朝縱有興亡，而社會之停滯不前仍如故，再就中國地租說來，從周末到明末，差不多都是物納地租，就是終有清一代，地租占現物的仍不少數，因此，知中國一方恰是靜止的社會狀態，一方農民們暴動的時候，就是他們‘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的時候，以下試徵引若干史事，以實此說。

三

在說明中國地租長期的為物納地租之先，還有一事足以相互證明的，就是中國官吏的薪俸，也是長期的實物報酬，領有金質貨幣的，很占少數。茲據史上所見的，如秦爵二十等，徹侯食縣，其次食邑，漢代以來，大侯食萬戶，小者約五六百戶，這當然就是領主與隸農的寫照，這裏暫且不提，

試述及其他的官吏薪俸。漢代大將軍及三公之俸，月三百五十斛，其他九卿，州牧，三輔尹等皆二千石。四百石至二百石為長吏，百石以下，則為佐史斗食等小吏。唐代的俸制，自正一品至從九品，凡十八級，其俸由七百石以至於五十二石。宋代的貨幣經濟，雖然已見盛行，迄未占唯一重要的地位，據端拱三年詔：‘……其諸州府募職州縣官料錢，舊三分之二，給以他物，自今半給緡錢，半給他物’，又景德四年：‘詔自今掌事文武官月俸給薪……每錢一千，給實錢六百，在外四百，願給他物者聽’，由此看來，宋代官吏的薪俸，乃係實物與貨幣各半。明代官吏的薪俸，也是貨幣雜以實物，正從一二三四品官，為千石至三百石，鈔皆三百貫，正五品二百二十石，從五品百七十石，鈔皆百五十貫，正六品百二十石，從六品百一十石，鈔皆百九十貫。有清一代，雖然在外的官員，沒有支給食物，然而京官則為正從一品俸米九十石，俸銀百八十兩，正從二品俸米七七·五石，俸銀一五五兩，正從三品俸米六五石，俸銀一三〇兩，正從四品俸米五二·五石，俸銀一〇五兩，正從五品俸米四〇石，俸銀八〇兩，正從六品俸米三〇石，俸銀六〇兩，正從七品俸米二二·五石，俸銀四五兩，正從八品俸米二〇石，俸銀四〇兩，正九品俸

米一六·五五七石，俸銀三三·一一兩，從九品俸米五·七五石，俸銀三一·五兩，由此，就可以看到中國產業發展的程度。

本來，貨幣不過是交換的工具，一個國度內若僅僅是社會的分業，而沒有技術的分業，那交換就不會頻繁，因之貨幣的用途，必比較實物的用途少，這或者就是憑天吃飯的特徵罷。

對於官吏的薪俸，既是多給食物，因之關於農民的貢賦，不用說，自然也是實物。

四

中國在農村公社(井田制)還存在的時候，完全為勞動地租(周禮〔小司徒〕乃會萬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為伍，五伍為兩，四兩為卒，五卒為旅，五旅為師，五師為軍，以師軍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貢賦)，自公社制完全崩潰之後，就已形成大土地所有者與隸農的關係，如秦代，則須納收穫物十分之五於地主，漢代除口稅田稅以外，亦須納收穫物十五分之一於地主(光武曾減到三十稅一)。兩晉則為丁男(課田五十畝)納粟一斛五斗，絹三匹，棉三斤，丁女(課田二

十畝)與次丁之男(課田二十五畝)減半。唐代受田百畝的,除力役外,則納粟二斛,又從其鄉土之所產,納絹綾各二丈,麻布二丈四尺。米則仿唐末的兩稅之法(夏稅從五月起,秋稅從九月或十月起),農民所納之物,分爲穀(石爲單位),帛(匹爲單位),金鐵(兩爲單位),物產(藁秸薪蒸,以園爲單位)。至明代亦沿用兩稅之法,分爲夏稅秋糧,其徵收之額,除力役外,官田則每畝五升五合三勺,民田減二升,租田八斗五合五勺,蘆地五合三勺四杪,草場地三合一勺,大概這些賦稅,至有明中葉以來(明英宗正統三年),已折徵金花銀,此後遂以爲常。不過所謂漕米的,都是徵收的實物,故有所謂漕運。考漕運,是由東南各省輸粟以供西北,實始於秦始皇,他爲要供給征伐匈奴的糧餉,遂使天下‘飛芻輓粟’,此制歷代都有,如清代還有漕運總督,管轄着山東河南江蘇安徽江西浙江湖北湖南八省漕政是。並且清代有的賦稅雖然改徵了銀兩,而各省的貢物仍不在少數,茲據蕭一山清代通史四百九十四——九十五頁,錄在下面:

【直隸】 榛栗 黃櫨木 芝麻 長蘆白鹽 磚鹽 五色土 寶砂

【江蘇】 銀硃 桐油 紅銅 明礬 黃熟銅 棉布

烏梅 燈草 白蠟 高錫 紗緞 綢綾 椴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正金磚 副金磚 魁藤 棕絲

【浙江】 黃茶 芽茶 黃蠟 黃熟銅 桐油 白棉

白絲 架木 桐皮槁 黃花竹 織造紗綾綢緞

【江西】 銀硃 桐油 五倍子 紫草 抬連紙 苧布

椴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福建】 紅銅 黑鉛 黃熟銅 抬連紙 錫

【湖北】 黃蠟 白蠟 黑鉛

【湖南】 黃蠟 白蠟 黑鉛 椴木 杉木 架木 桐皮槁

【山東】 闊白棉布 牛筋 黃蠟 黃丹

【山西】 毛頭紙 高錫 生素絹 農桑絹 呈文紙

大潞綢 小潞綢

【河南】 本色棉布 牛筋 黃蠟

【四川】 本色米 本色馬（金川）藏香 黎椒 菖蒲

茯苓

【廣東】 降香 紫榆 花梨木 高錫 靛花 白蠟

廣椒 臙黃 沉速香 點錫

【雲南】 天大青 石磺 松花 石碌

【貴州】 黃蠟

【外藩】 牛 羊 駝馬 毯 罽 藏香 延壽果 青
木香 氈氍

據上所述，這種物納地租的形態，在中國史上差不多是從周末到清代以來的地租形態，即此一端，即可了然於中國經濟狀態之謂何，同時在政治上，亦可知道中國的支配者，常是大地主的新陳代謝，他們相互間的代謝，僅是由於一種上空地帶的暴風，於社會經濟的根本要因的構造上，絕不發生何等影響，只是在同一形態上再生產出來，於是就構成了中國靜態的社會。迨他們敲骨吸髓，達到了‘勞動諸條件的再生產上，生產機關本身的再生產上，給與很大的危險，使生產的擴大，多少都成爲不可能，並且將直接生產者的生活資料，剝削到無從維持肉體上必要的最低限度’，於是在農民暴動中又颳起所謂政治的上空地帶的暴風來，這就是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

五

却說中國史上的改元易姓，雖然每次都是落在地主或地主代表者的手中，而搖旗吶喊的，不用說盡都是農民。他

們有時也有如近代的‘怠工’辦法，為消極的抵制，有時是抱着‘俟我后，后來其蘇’的態度，有時也有積極的自謀的態度，雖然歷史上不曾有過農民支配者的國家，然而那是他們被局限於歷史條件的原故，正如羅馬帝國的奴隸謀叛，不能成立奴隸共和國，歐洲中世紀的農民騷動，不能成立土地共有的農民國一樣，實際他們每次都是改元易姓的重要契機，茲試從史實上述及支配者對於農民的榨取和高壓，和農民的運動狀況。

(一)周末至戰國時代 農民在這一時期中，力役與物納地租兩者，都是他們致命的打擊，力役則為不生產的消費，或築城鑿池，或運糧從軍，得慶生還的已屬意外之幸，至奉納現物也被榨取到死綫上，茲試徵引數節於下：

關於力役方面 詩經齊風東方未明章：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東方未晞，顛倒裳衣，顛之倒之，自公令之。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不能辰夜，不風則莫’。

又魏風陟岵章：

‘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上

慎旃哉，猶來無止。

陟彼岵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上
慎旃哉，猶來無棄。

陟彼崗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借，上
慎旃哉，猶來無死。’

關於苛征方面 詩經魏風碩鼠章：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
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
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

又伐檀章：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廛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貍兮，彼君
子兮，不素餐兮。

坎坎伐輻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特兮，彼君
子兮，不素食兮。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滸兮，河水清且淪漪，不稼不穡，

：胡取禾三百困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懸鶉兮，彼君子兮，不素殮兮。

：此外關於這方面的記載，尙有更沉痛，更率直的，試如禮記檀號下：

‘孔子過秦山側，有婦人哭於墓者，而哀，夫子式而聽之，使子路問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憂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於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爲不去也，曰，無苛政。夫子曰，小子識之，苛政猛於虎也’。

：又孟子答梁惠王：

‘庖有肥肉，廄有肥馬，民有饑色，野有餓殍，此率獸而食人也。’

：又答齊宣王：

‘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

據以上所述，描寫農民的痛苦，已算盡致，然則農民當時反抗的情形如何？以史料缺乏的結果，關於周末至戰國的情形，約略只能舉出二三，亦不過消極的反抗罷了。

（一）春秋魯僖公二十九年左傳：

‘梁亡，不書其主，自取之也。初，梁伯好土功，亟城而弗處，民罷而弗堪，則曰某寇將至，乃溝公宮，曰秦將襲我，民懼而潰，秦遂取梁。’

(二)春秋魯文公三年左傳：

‘莊叔會諸侯之師伐沈，以其服於楚也，沈潰。’

(三)春秋魯僖公四年公羊傳：

‘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

在這當中，我們雖然沒有很明白的看出農民反抗的情形，然於這個潰字上就可窺見一般。考潰字據左氏的解釋，‘凡民逃其上曰潰’，據公羊氏的解釋，‘潰者何？下叛上也，’那末，所謂民變的情形，即可於此潰字中看出，雖然沒有什麼積極的行動。要之此刻的支配者還要他們來作箭垛，供扞衛，已屬不可能了。

(四)孟子上：

‘鄒與魯閔，穆公問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誅之則不可勝誅，不誅，則疾視其長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則可也。孟子對曰，凶年饑歲，君之民老弱轉乎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而君之倉廩實，府庫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殘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

之，出乎爾者反乎爾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無尤焉。

這一節把農民反抗的情形，就說得很清楚了。當然，至戰國以來，土地的兼併，以及攻取的戰爭，殆無日或息，因之農民死於鋒鏑或暴斂的，怕是史上很大的記錄，所以他們一遇着機會，總是要使其舊主人毀滅的。

再如痛惡現在，希望將來的，也是農民常有的態度，故當封建主的新陳代謝時，農民們對於新主人總是‘箠食壺漿，以迎王師，’以為將是拯救自己於水火之中的，而在這個當間，想登大寶的新主人，雖然對農民所說的，都是不兌現的支票，可是疲不堪命的農民們，一見他怎樣暴露舊主人的罪惡，怎樣宣布他將來對於農民的新猷，至少在精神上也是一個安慰，所以尚書的湯誓和泰誓，滿紙都是這些話頭。然而當他們互相角逐，尚未取得一國統治權時，亦還有許多實際策略。試看：

春秋魯昭公三年，晏平仲答叔向：

‘此季世也，吾弗知，齊其為陳氏矣。公棄其民而歸於陳氏。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為豆，各自其四，以登於釜，釜十則鍾。陳氏之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以家量

貨，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於山，魚鹽蜃蛤，弗加於海，民參其力，二入於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凍餒，國之諸市，屨賤（齊景公繁於刑，多刑足者，所以說屨賤）踊貴（刑足者之屨），民人痛疾，而或燠麻之，其愛之如父母，而歸之如流水。’

由這段話看來，在齊景公一方面，所聚集的東西儘管朽蠹，而凍餒者仍如故，還動輒殺人刑足，在齊陳氏一方面，則以大斗貸出，小斗收進，且還對於有疾痛的大加撫慰，對比起來，人民自必歸之如流水，然而終歸是一個陰謀，一個策略，換一句說，只是他們掣取寶座的一個工具，試看陳氏支配齊國以來，不又是‘今也制民之產，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樂歲終身苦，凶年不免於死亡’麼？

六

秦始皇統一六國之後，他打算在中國政治上開一個創局，即欲由封建變為郡縣。但是這件事，決不是一蹴而就的，牠自有牠的條件。所謂中央集權的，只是經濟集中的一個表現，以該時代的自給自足的經濟，事實上殆無集中的可能。經濟上既不能集中，表現於政治上的，適成為割據的形勢，

所以秦代雖然很當心的把天下的豪傑遷徙於函陽，雖然是銷毀了天下的兵器，然而亡秦的終是豪傑，縱無寸鐵，亦可揭竿斬木，由此即可參透當時的封建性，而所謂豪傑的，亦不過當時大地主，閥閱之流罷了。

豪傑亡秦的時候，搖旗吶喊的，自然是農民，這裏暫且不提，我所欲說的，乃在西漢所謂荆州的‘綠林’，和琅瑯的‘赤眉’之純粹農民的暴動。藉觀其暴動之所以發生與其失敗之由來。

當說明農民暴動之先，試先述其起兵的背景。

漢代勦滅羣雄之後，雖然發布了廢秦苛法的皇皇大詔，然而論死刑的時候，竟有流血十里的慘狀（漢武帝時），至於出塞的死屍枕藉，豪猾由‘買爵’，‘贖禁錮’，‘免贓罪’的條例等等，更加武斷鄉曲，加之因園囿而圈地，豪右肆其侵占，在在都是使農民無所措手足的，茲試將皇帝的圈地與豪右的侵占情形，略述於下。

（一）漢武帝欲圈地而築上林苑，東方朔諫曰：

‘夫南山，天下之阻，陸海之地也，百工所取給，萬民所仰足也，今規以為苑，絕陂池水澤之利，而取民膏腴之地，上乏國用，下乏農業，其不可一也。盛荆棘之林，大

虎狼之墟，壞人塚墓，發人室戶，其不可二也。

但漢武帝終於起了上林苑。

(二)豪右的侵占 董仲舒云：

‘秦用商鞅之法，除井田，民得買賣，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之地，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古井田雖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塞兼併之路，薄賦斂，省徭役，以寬民力，然後可善治也。’

至哀帝時，師丹亦云：

‘今屢世承平，豪富吏民，費數鉅萬，而貧弱愈困，宜略爲限。’

丞相孔光，大司空武亦奏：

‘請自諸侯王列侯公主名田各有限，關內侯吏名田，皆無過三十頃，奴婢無過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沒入官。’

由此看來，漢代土地兼併的情形，已到了這樣的地步，故當王莽攝政的時候，所下的詔令就是：

‘古者一夫田百畝，什一而稅，國給民富，而頌聲作。秦壞聖制，廢井田，是以兼併起，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

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居，又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謬於天地之性人爲貴之義，漢氏輕減田租，三十稅一，實什稅五也，今更命天下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買賣，其男口不盈八，而田過一井者。分餘田於九族，鄰里鄉黨，敢有非井田聖制，無法惑衆者，投諸四裔，以禦螻蟻。’

到居攝二年的時候，且又‘廢漢諸侯王爲民’，王莽的這種措置，不能不說是徹底的社會革命，尤其想到當時‘置奴婢之市，與牛馬同關’的，實足令人酸鼻，這當然是疲於大地主的搜括之下而奴隸化了的農民，王莽果真能解放這些奴隸，果真能使土地共有化，果真能使階級，閥閱，一筆勾消，而一切人民皆勞動平等化，當然是解決這時期的社會糾紛的唯一的方法，可惜王莽畏首畏尾，一方見好於農民的時候，就想作一番劃時期的事業，又見地主閥閱之終不可忤的時候，終於‘令民食王田者皆得買賣’，以此知買空賣空的投機家，終於要被兩方打倒，試看更始二年史上所書的‘衆兵上台，斬莽首，分莽身，卽解櫛分，爭相殺者數十人，傳莽首詣宛，縣於市，百姓共提擊之，或切食其舌，’就可知道。這當然多少也屬於東漢史官的惡宣傳，要之此亦王莽畏首畏尾的

當然的結果。

王莽的措置，既完全成了一個手段，其不能解決農民的倒懸可知。所以農民直接起兵的，幾有雨後春筍之概，試看天鳳四年（新莽年號），荊州新市人王匡王鳳等起兵，進攻隨縣，即史上所稱爲綠林兵者是。又同年琅玕樊崇等起兵於莒，一歲間即集合到萬餘人，因恐與莽兵混淆，乃皆赤其眉，即史上所稱爲赤眉賊者是。

這是兩大股農民兵，而且都有相當的勢力，若是團結一致，自厚其力，亦可與貴族兵相頡頏，可惜他們計不出此，竟爾各樹一幟，互爭長雄，這顯然就是農民小產者間不能超越地方利害的象徵，本來獨立小產者的代表，也沒有緊密的永久的紐帶，相互團結的可能，他們之不能結爲一致，正同獨立小生產者本身一樣，他們失敗的朕兆，即潛伏於此，茲且一述他們兩股起兵後的步驟。

他們兩股起兵以來，都似乎覺得自己來自田間，鄙陋不文，不足以資號召，於是在綠林兵方面，則抬出一個春陵戴侯的曾孫叫劉玄的爲人望，藉以冠冕一切，在赤眉方面，則又抬出什麼宗室叫劉盆子的爲上將軍，以資表率，這固然是幼稚的經濟所反映的幼稚思想，然而只此一點，也就農民

失敗的一個大關鍵。蓋一方既有了閥閱，他方面當然就是隸屬，不知當時的閥閱，就是大土地所有者的外衣，隸屬自然就是農民失掉土地的一個標識，既然以純農民而起兵，抑知農民所亟於要求的究在何處？所亟須剪除的究在何處？他們一開步走就錯了路向，循至兩股火併（綠林兵爲赤眉所勦滅），終爲新興的封建勢力（漢光武）所乘，可惜孰甚！

先是綠林兵與赤眉起兵的時候，所謂漢宗室的劉縯及其弟秀（即後來的光武）亦起兵春陵，其目的乃在興復帝室，故史上大書而特書‘縯性剛毅慷慨有大節’，劉秀且是‘隆準日角’，他們之興復帝室，當然要利用農民，尤其要利用農民的直接的隊伍，而況他兄弟二人，在春陵才有子弟兵八千，其聲勢遠遜於綠林兵，故他們開始，就極力與綠林兵相結納。已而劉秀的兄弟等亦有了相當的地盤和實力，因之關於領袖的問題，綠林兵與宗室兵（劉秀等）就起了絕大的爭執，即地主派欲擁立劉秀爲領袖，而農民派則嫌他閥閱性太重，則欲擁立劉玄爲領袖（史載玄即皇帝位，朝羣臣，羞愧流汗，或許劉玄已有幾分農民化了），終於綠林兵占了勝利，遂皆擁戴劉玄，改元‘更始’。但是地主派與農民派，終歸是水火不相容的，所以綠林諸將，連番敦促更始，要趁早剪除劉秀兄

弟，以一掃農民軍的障礙，在更始還猶豫未發的時候，却是劉秀的部將劉稷等正在打算誅戮更始，更始才將劉續劉稷殺掉，而劉秀以領兵在外，得免於難。

劉秀在史上，都稱他爲長厚者，其實‘他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這幾句話明明就是一個‘豪紳’的活寫，又何曾是長厚者？試看他已得看了乃兄和其部將的噩耗，還裝着心氣和平似的，向更始謝罪，且飲食言笑亦始終平常，這或許就是所謂英雄們成功的祕訣！？然而這一來，却已哄遍了一般樸魯無私，肝膽相照的農民軍。農民軍因此更拜劉秀爲破虜大將軍，且封以武信侯，以爲劉秀或者不至於叛變他們的。但是，

劉秀的聲勢既大，而一般貴族地主們就包圍更急，要他趁早勦滅農民軍，藉以帝制自爲，我們試看史上所載的：

‘南陽鄧禹杖策追秀，及於鄴，秀曰，我得專封拜，生遠來，寧欲仕乎？禹曰，不願也，但願明公威德加於四海，禹得效其尺寸，垂功名於竹帛耳。秀因留宿。禹進說曰，歷觀往古聖人之興，天時人事，二科而已。今以天時觀之，更始既立，而災變方興，以人事觀之，帝王大業非凡夫所任，分崩離析，形勢可見，况明公素有盛德大功，爲天

下所嚮服，爲今之計，莫如延攬英雄，務悅民心，立高祖之業，救萬民之命，以公而處，天下不足定也，秀大悅’。

又馮異對劉秀說：

‘更始政亂，民無所依戴，夫人久飢渴，易爲充飽，今公專命方面，宜分遣官署，循行郡縣，宣布惠澤，秀納之。’

果然，劉秀的勢力，一天大似一天，農民軍又似乎有了覺悟，試看更始‘遣使立秀爲蕭王，悉令罷兵’，這當然是一個明升暗降的辦法，然已遲了。劉秀則藉口河北未平，不能罷兵，已而則逕自做起皇帝來，而農民軍則一日衰弱一日，寢已瀕於解體的趨勢，加之與同一戰線的赤眉，又積不相能，遂於建武元年（光武年號）爲赤眉所勦平。而赤眉既失了有力的同盟軍，又豈能殘喘苟存，果然於建武三年，亦被漢室討平，由是，貴族地主的勢力，又重登政治舞台，而農民軍就此閉幕，而農民又佩上了舊來的鎖鍊。

七

黃巾賊的背景 東漢初期，也曾詔州郡檢覈過土地（光武十五年），然而這祇是一紙公文，土地是無從檢覈的。譬之當時河南南陽的土地，多係大臣所占，河南南鄉的土地，多爲

國戚所占，其他富豪助舊，在各處所占的土地，當亦不減於此，又從何處檢覈起？而且終東漢之世，弄權的不是外戚，就是閹官，例如外戚，試舉梁氏一門來看，則前後有七侯，三皇后，六貴人，二大將軍，尚公主者二人，其餘卿將尹校等亦達五十七人，真是炙手可熱！又如閹官，誠如時人說：‘中官近習，竊持國柄，運賞則使餓吏富於季孫，呼噏則令伊顏化為桀跖，’這是何等黑暗！要之當時政治如此，其影響於民間的，自可推想而知。

支配者在此時猶不知覆禍，而當‘田野空，朝廷空，倉庫空，兵戎未輯，四方離散’（陳蕃語）的時候，猶然校獵廣成，流連上林，倉庫既空，則賣官鬻爵，以償慾壑，例如當時公爵的價格為千萬，卿為五百萬，二千石為二千萬，四百石為四百萬（二千石的價格多於公卿的，想係能夠直接剝削農民之故），並且其價格，是隨縣缺的好歹而決定的。這些貪官污吏們在上任之前，既有這大的支出，而在上任之後，自必直接的，或間接的通過土豪劣紳，加倍的取償於農民，我們且試看當時農村中貧富的懸隔，並官吏的剝削。

‘王侯貴戚豪富，舉驕奢以作淫巧，高負千萬，不肯償債，小民守門號呼，曾無怵惕，慚怍，哀矜之意’（見王充

論衡斷訟篇)。

‘使餓狼守庖廚，虎飢牧牢豕，遂至熬天下之脂膏，斲生人之骨髓。……豪人之室，連棟數百，膏田滿野，奴婢千萬，徒附萬計，船車賈販，周於四方，廢居積貯，滿於都城，奇賂寶貨，巨室不能容，馬牛羊豕，山谷不能受，妖童美妾，填乎綺室，倡謳伎樂，列乎深堂’（見仲長統昌言理亂篇）。

‘井田之變，豪人貨殖館舍，布於州郡。田畝連於方國。……財賂自營，犯法不坐，刺客死士，爲之投命。至勢弱力少之子，被穿惟敗，寄死不斂，冤困不能自理（同上昌言損益篇）。

於是在這個氛圍氣中，就出現了農民叛變的所謂黃巾賊。查黃巾的來源，乃因鉅鹿人張角創立一種所謂‘太平道’宗教，分遣弟子傳布於四方，於是十餘年間聚衆至數十萬，凡入教的，皆著黃巾以爲標幟，故時人謂之黃巾賊。太平道的宗教之出現於此時，恰恰適合一般離開了土地的，與依附土地且不能謀生的農民，這猶之基督教在羅馬帝國之下，適爲奴隸，自由民，窮人，無權利的人以及被羅馬壓制或離散的人民的宗教一樣。不過基督教是在把這般被壓迫的人，解

放在世外，在死後，在天上，而太平道是要把當世被貴族地主壓迫之下的農民，解放在現實，在目前，在地上的，雖然他們的方法疎漏，組織鬆懈，態度猶豫，行動遲緩，却因此而失敗，要之較之基督教終歸積極些，扼要些。

却說張角成立了‘太平道’之後，那些不太平的，被貴族地主壓迫得聲息殆絕的農民們，自然相率而入於太平道，所以史上書着‘旬月之間，天下響應，京師震動’，其聲勢不可謂不大。這些帶黃巾的，差不多滿了青徐幽冀，荆揚袞豫八大州，而支持的時間，從靈帝中平元年起，至獻帝四年平息止，約略也是十餘年之久。他們也曾打過幾次勝仗，如中平元年，戰勝朱雋，獻帝三年，又誅袞州刺史劉岱，然而終於失敗的，一因他們自身的環境所釀成訓練，組織，意識等等皆足為失敗的原因，同時，如逐鹿中原的大地主之流亞——曹操，董卓，孫堅，劉備，劉表，袁紹，袁術等不僅器械精良，且組織比較嚴密，自然勝不過他們，而所謂黃巾賊的，遂僅於歷史上留名。

以上係對於漢以前的農民問題的敘述，以下將來再接再考察之。

(1) 著名史歷界世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法國大革命史	金特池魯克	劉鏡園	上下三元	克魯泡特金這一部傑作，根據無數的直接材料，把參加革命幾百萬民衆的情形描寫得如火如荼，使我們看了，彷彿自己直接參加過這一幕偉大的歷史劇，彷彿是處在那些真正的革命民衆中間，而了解了他們反抗壓迫的鬥爭，變成了不可抵禦的潮流，我們因此更了解看十八世紀的文明發達的最高點：這真是一本最有價值的名著。
社會鬥爭通史	Max Beer	葉啓芳	第一册 七角五分 第二册 三角 第三册 四角	站在鬥爭唯物論和革命的社會主義的立場上來分析自古代以至現代的社會鬥爭，這是唯一的權威著作！這部書中不但供給了許多歷史的材料，並且供給我們以分析歷史的方法。
國際運動史	伏雲張		一元二角	本書是張雲伏教授在上海各大學教授此課的結晶，幾經修正，然後完成。內容以四個國際爲綱。各國社會黨運動爲緯，舉凡歐美日本及各國所發生之各次運動，及其理論的基礎，靡不詳述，誠國內論社會主義者最完備最新穎之著作。
第一國際史	Slekloff	吳樹仁 張伯箴	二元	全書約二十萬言，材料豐富，說理清晰，論點正確，書尾附有第一國際的各種重要文獻，是一部研究革命史者不可不看的書。在俄文本序及英譯本序中均稱：『在所有第一國際的歷史中，這是最精確的一本』。
人類婚姻史	Westermark	王亞南	一元	衛司特馬克是全世界婚姻史的權威作家，所以這部書是婚姻史中的權威著作。其徵引的博洽，殊爲驚人，及至中國的『換妻』等等風俗。無不應有盡有。敘述又極握要精警的，寫爲二十萬言，其精采當可想見。

現代中國經濟的剖析

朱伯康

一 一個研究的方法問題

無疑的，現代中國經濟的發展是極不平均的，極盾矛的，而且是極畸形的！所以，現代中國經濟的性質極其複雜極其含糊。這些複雜而且含糊的現象充滿了中國經濟的全領域，譬如，我們自上海動身向內地任何地方旅行一次，我們立刻就發現有許許多多極不一致的經濟條件與事實存在着；即退一步講，就在帝國主義在華勢力最強盛的上海，在

這五卅烈士曾經流過血的南京路上，在這電車汽車摩托車許多交通利器的紛馳疾駛當中，我們又居然發現了最原始的最粗笨的獨輪車尚在推動着。呵呵，這是表示着什麼現象呢？這是在現代經濟領域內表示着什麼意義呢？這不得不使我們說一句慚愧的話，這是帝國主義侵略下半殖民地的經濟現象！

我們要是忽略了上述的現象，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的解剖，便摸不着頭腦。

假使只看見上海市場的資本主義化，只看見這紛馳疾駛的電車汽車，而不看見笨重的獨輪車；只看見商品交換之統治農村，而不深究這資本主義化的原動力；只看見中國商人資本與外國金融資本的活躍，而忘却了農村經濟的崩潰，而不深究是其所以然的原因，而不分柝這個資本主義化在中國整個社會經濟上的作用；便慢然地下了這樣的斷語說：中國社會已經是資本主義的社會，當前的中國革命是社會主義的革命。我想，凡是稍稍知道中國社會實際情形的人們，即使他們沒有充分的懂得經濟學，也必然地知道這種斷語是一種偏見而又無常識的蠢語。

反之，苟有人只看見自然經濟的存在，只知道亞細亞的

生產方式的存在，就以爲中國的社會還完全是封建制度的社會，一點也沒有資本主義的色彩，這也是錯誤的，這也是無形中陷入偶像的謬誤中所發出來的一種機械的論斷。

上面兩種的見解，都完全是些不正確的理論，都好像是只見到個個的樹木，而不曾看到全體森林的見解。

我們研究社會的任何現象，不能只看到一面，或是一部，或是一個表象。我們要以純科學的方法，去觀察，去分析，去研究；我想，只有科學的方法才能接近真理，或是把握着真理。同樣，在現代中國經濟的研究上也不能放棄了這個觀點。要知道，部分經濟與部分經濟之間，個別經濟與個別經濟之間，有一定的不同的程度，有一定的交互作用，有一定的密切的連繫；即所謂個別的經濟，或統一的經濟，也是由於各個經濟部分經濟聯合而成，但却不等於各個的部分的總和。所以，我們對於現代中國經濟要從各種的經濟現象中彼此相互的不能分開的關係上去研究，同時，我們更要從動的變化的方面去研究，這纔不致於錯誤，這纔對於中國經濟的解剖才能得到正確的理解。

二 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

說到中國，馬上就聯想到土地這樣的廣大，人口這樣的繁多，天然富源這樣的富饒，這在我們中國人老是可以驕傲的；可是一回想到我們自己的經濟生活，那就不行了。在邊疆如蒙古西藏青海等處不消說，到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單純的自給自足的經濟生活。他們自己生產，自己消費，即使有很幼稚的交換，也不過在同一經濟地域內完結。既不生產需要交換的物品，也不和其他經濟團體交換生產物來維持其物質生活。這幼稚的經濟生活，不問而知其為尚在獸獵或畜牧時代；然而，這時代的幼稚經濟也居然在現代的中國普遍地存在着。

即在內部十八省的各處，也有同樣情形的存在。如在雲南貴州四川等處的苗族，在廣西的獠民，廣東的黎民，都是在現在還是營着原始的幼稚生活。我還記得前年在瓊州的時候，親眼看見五指山上的生黎，用石子木棍等工具打着山鹿等物剝皮生食。在這些生活狀況之下，當然沒有交換的事實存在，更是談不到封建制度的種種經濟組織。這只能表示着歷史的一個階段而已。但這階段不是過去的階段，而是現實的階段，這一階段性之在目前的中國是一般地廣泛地存在着。

可是，廣汎只是廣汎而已，在事實上却不能包括中國全部經濟生活。但這個原始的經濟生活形態，在中國現社會的發展階段上却表示了很大的意義；這個意義之主要的性質是表現着中國經濟條件之不平均與其複雜性。

這是很顯然的，這種經濟生活，在原始的幼稚的牧畜方式和農業生產所形成的家族或氏族底血族團體內經營着；即一定的血族團體站在共有的土地或家畜財產之上，經營着自給自足的生活，生產自己需要的物質，消費自己勞動的利得，此外一點也不會夢想到尚有較高度的文化生活底存在。

上述的尚在原始共產制之下氏族社會的經濟生活底存在，雖為中國現代經濟說明上有些不便，但我們要了解中國經濟的整個事實，却不可不加以簡單的敘述；這因為與其他部分的經濟或整個的經濟都有相互關係的連繫着的原故。

三 單純商品再生產

在上面雖然敘述了中國現代的原始生活與自然經濟的狀況，但是，中國全部的經濟究竟是什麼經濟？這仍然是個不明瞭；是否是封建主義的經濟？或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這

個問題在中國全部革命論上占最重要的地位，必須加以正確的觀察。

除了新疆等處和內地的原始民族以外，最廣大的主要的經濟領域，自然是農村經濟。在目前表現於中國農村經濟而顯出其主要的生產方式的，只是單純的再生產。機器的應用，集益農場的經營，和墾殖公司等等的組織，在中國還是很少發現，雖然在東三省——尤其是大連有許多的這種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出現，但這請注意，並不是中國自己的，而是日帝國主義者在中國侵略的方式！所以，在大體上看來，中國農村的生產，還是單純的再生產。

在這種生產方式中所用的勞動手段，是最原始的，是最粗笨的；換句話說，它只能適合於小規模的生產；再簡言之，它只能適合於小農在一定限度內的單純經營與生產，除此以外便不適合了。這是很顯然的，一切最根本的改變，都是跟着生產技術而決定的。

其次所謂交換形式，大體上都已進行到貨幣交換這一個形態。雖然有不少的所在還是進行着物交換的方式，他們用自己所剩餘的生產品去和別人或另一生產集團去交換自己所沒有而為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例如，一個生產者假如拿

了一石米，恰好和另一多餘一疋布而需要一石米的生產者偶然相遇，於是就實行交換，只有在這一種場合之下，交換才能實現。所以，這種交換只是偶然的單純的交換，只是通行於交換尚屬稀少的時代，在現在已是很少的看見了，但我們却不能否認絕對的沒有。其次比較高度的完全（發達的）交換，譬如『貝』已具有了交換的共同性質，已成了一切生產品的價值的基準，此時‘貝’的生產，不僅爲了它的物質的特質，也不僅爲了滿足他自己的慾望，而且爲了它的交換價值。於是這貝便成了下列交換的方式。

$$\text{十個貝} = \left\{ \begin{array}{l} \text{一疋布} \\ \text{二個陶器} \\ \text{十枝箭} \\ \text{.....} \end{array} \right.$$

由上面的一個公式，我們便容易明白其他一切的貨物底價值開始由某種物件（例如貝）來測量，來表示了。

但是，我們看看現在的中國農村中尚行着這一個交換方式嗎？不是的，這種交換早已消滅了，但我們也同樣的不能否認是絕對的沒有。

我們再看看在內地的鄉村間的經濟，大體上仍然是以

自給自足爲原則，農家需要的物質的生活資料，由自家生產自家消費；至於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在多數農村間是成爲稀少的現象，不佔得重要的地位。然而，還有許多地方的農村生產，却已經成爲生產商品化了。所謂生產商品化，就是農民一面當作農業的副業，生產手工業的物品，運到鄰近的市場上去販賣；同時，把其所生產的糧米等農作物當作商品運往市鎮上去販賣。這種生產商品化的現象，在目前中國農村自然經濟崩潰之下，更加次第的擴大，而成爲全中國普遍的顯著的現象。而且，在市鎮之間，商品生產早有相當程度的發展，即手工業的商品生產，廣汎地一般地而成爲我們普通最常見的現象。這種商品生產，一面供給於鄰近的農村，同時又在都市內販賣，有時還要供給於較遠的地方，形成中國多數都市生產的形態，而這種形態便是單純商品再生產的有力的表現方式。這種生產方式，無論其在農村與都市，都是表示着前資本主義的或是半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我們在這種生產方式裏，只能看見舊的前資本主義的經濟形式。

我們觀察中國經濟，總不能像俗學式的先生們執一不化，很機械地去論斷；我們在大體上看來，中國的農村生產，

已經是很普遍地商品經濟化了。農民生產農作物不僅為自己消費目的而生產使用價值，更是為了交換的目的而產生交換價值。

在上述的單純商品生產的進程當中，一般的尤其是特別的與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發生了緊密的連繫。這裏所謂商業資本與高利貸資本是指小規模的農業與手工業的原始資本的積蓄。這種資本的積蓄，在現代農村經濟上或都市手工業的生產上，演着重重的剝削方式，使中國經濟很牢固的停留在前資本主義時代，或是更盡其崩潰作用，使中國經濟一直向後退。現在易於說明起見，先述商業資本在現代中國經濟上的作用。

四 現代的商業資本

商業資本在中國很早的時候便發達了。但為什麼中國到現在的經濟還不發達？這原因只是在商業資本之只有腐蝕的作用，而沒有生產方法的性能。因為商業資本只是歷史發展中的一個階段，它並不是代表社會的一種經濟制度，也不能獨立的自成爲一個經濟發展的範疇；它只是依着社會生產力改變而改變，它只是某種社會經濟制度的附屬物。

我們現在不來討論商業資本之在歷史發展的各階段的情形和在各種社會的狀況，只是討論商業資本之在現代中國經濟上之作用。

我們知道商業資本存在的先決條件有二：第一須有商品流通的事實存在，第二必須有貨幣交換的事實存在，有了這兩種條件，商業資本不論在某種生產行程上，詳言之，即不論在原始共同體的生產上，或是奴隸制度的生產上，或是小農和手工業的生產上，或是在資本主義的生產制上，都是可以依附着存在和發展的。商業資本祇因其依附着上述的兩個條件的存在而存在，發展而發展，所以，商業資本之性能，充其量不過只是一種交換過程中之媒介物而已。因為在各種生產過程中，生產者爲了某種貨物的餘剩，不得不經過一個交換過程，以換得別的貨物；在這種場合底下，商業資本就盡了媒介的作用，也只有這種作用而已，它對於生產方法是不能顧問的。究竟商業資本的範圍有好大，流入這交換過程中的貨物有好多，這些都是要由於生產方式的決定，它自身沒有權力去決定的。因爲這樣，所以馬克思也說：“此處不是商業不斷使產業革命，而倒是產業不斷使商業革命”（英譯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第十二章）同時他又說：“商業資

本的獨立及其優勢的發展，就是指資本的自身還沒有支配生產。因此，商業資本的獨立發展，和社會一般的經濟發達，是成爲反比例的。”（見博洽德通俗資本論第二十一章）這就是說生產方式能夠支配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却不能支配生產方式，同時，商業資本單獨的發展，不但不能促進資本主義的發達，而反成了資本主義發達的桎梏。明乎此，就可以知道商業資本之在中國現代經濟上的作用。

由上述的情形看來，可知中國的商業資本，它只能破壞舊生產方法而不能產生新生產方法；它只能破壞單純的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而却不能建立複雜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它只能剝削生產者和消費者，却不能直接支配生產過程；它只是從生產過程中分離而獨立的；它只是剝削生產而不參加生產的；所以，商業資本的蓄積愈多，却愈不能促進生產的發達，然而却巧相反。獨立發展的商業資本蓄積愈多，其所剝削的生產組織愈爲衰退！

在目前中國的經濟領域中，我們只看見商業資本的活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蓄積，只看見商業資本的單獨發展，而却没有看見產業的發達；又是相反的，只看見原有產業的衰退！最近關於這些現象的表白，在報章雜誌上幾乎日不絕

書。一個社會，一個廣大的社會，甚至只有商業資本在那裏演着重重的腐蝕的作用，而新的生產方法却不能起來代替，這是何等嚴重的一回事！

五 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

但是商業資本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表示着什麼作用呢？這，又有一述之必要。帝國主義之對中國經濟的侵略，中國的商業資本是否可以抵抗呢？它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是否可以緩和呢？並不，它只是增加帝國主義侵略的程度而已！

帝國主義底無組織的盲目的大量的商品生產，在它本國一面爲了競爭的激烈，引起商品價格的低廉，流通的停滯；一面又爲了大量盲目生產的結果，引起了經濟的恐慌，失業的增加；在這兩種嚴重情況之下，要維持它的生存，就不得不竭力向海外找尋殖民地。所以，帝國主義對殖民地的加重侵略是經濟上必然的結果，並不是由於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以及其他上的野心。雖然在事實上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政治上軍事上文化上等等的侵略。但這些都是帝國主義所要透過的手段，它的目的並不是整整的在於此處；它的

真正目的是在於原料的獲得，商品的暢銷，和投資區域的擴大。我們知道，資本主義的再生產過程，其主要的手段，是資本家的為獲得利潤的購買，詳言之，即在於低廉原料和勞動力的購買，這樣，資本家可以充分的掠奪剩餘價值而獲得大量的利潤。在如下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中：

$$G \text{ --- } W \left\{ \begin{array}{l} P \\ A \end{array} \right. W \dots\dots P \dots\dots W, \text{ --- } G,$$

包括了兩個交換過程，一個生產過程。因為資本家為榨取剩餘價值起見，自須進行生產過程；並且他為預備進行生產過程及實現從生產過程所獲得的剩餘價值起見，自須一個購買和販賣過程，換言之，他為了獲得較多利潤的目的起見，自須進行着兩個交換過程。經過兩個交換過程後，所獲得的大量利潤，再加上原來的資本，投入再生產，如是不已，不但使商品盲目的生產成為無政府的狀態，不但使商品的壘積引入恐怖的境界，而金融資本的大量過剩，已足夠使資本主義國家整個基礎發生動搖！它為它自己生命的維持與延續，它為了它的前途的穩定和發展，質言之，它為了解決這當前的最大矛盾，它於是不得不加緊向殖民地侵略，而中國的商業資本便是幫助這種侵略的最大有力的武器。

因為商業資本的機能，只是作了交換過程中的媒介物，

而却不能轉變生產方法；因其這樣，所以才能和帝國主義的商品經濟以及金融資本相勾結，共同向中國農村經濟進攻，其結果，造成目前中國經濟的畸形現象；一端有中國的商業資本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的高度壘積，他端有數百萬數千萬的農民的流亡和餓死！

六 金融資本統治下之農村經濟

中國的商業資本愈是表示着活躍，中國的農村經濟愈是表示着崩潰，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愈是表示着大量的發展，目前的事實給與我們證明了這個前提的十分正確。

商業資本幫助着帝國主義共同向着中國加緊經濟侵略的這一事實，無須乎我們拿高深的理論來證明，即膚淺如金貴銀賤之一例已足夠說明了。因為中國的商業資本在帝國主義金融資本卵翼之下，才能‘興波作浪’，才能‘榮繁發達’，才能‘百尺竿頭更進一步’！金價為什麼漲？銀價為什麼跌？這很簡單，因為外國的金融資本統治着中國的商業資本，而商業資本統治着農村經濟的原故。假使外國金融資本沒有中國商業資本的降附，還不能造成目前的現象，還不能造成當前的金貴銀賤大風潮，只是在商業資本與金融資本相結合

後才有可能。但是，金融資本發達的結果，仍不能轉變中國的生產方法，反而只加速農村經濟的破產；農村既加速地破產，而都市工業除操在外國資本家之手外仍不能發達，而且還有同樣的破產！於是，中國社會經濟整個的被帝國主義金融資本所征服所統治，而銀價問題之發生在這種統治關係之下是必然的結果。‘世界各國用金，而中國用銀，’‘金銀供需之不調’，只不過是一種導火線而已，原來中國的農民統治於倫敦與紐約！有人竟謂解決銀價問題最澈底的辦法，是在於籌開國際會議作共同的解決，這只是不明瞭實際情形所發出一種無識的虛妄之談，他簡直連這一句很普通的常識話都不懂得：‘中國之所利而帝國主義之所不利也’！國際會議云乎哉？！

本來，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範圍擴大，使生產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并且使貨幣成爲世界的貨幣，因此，中國的農村經濟不能不受商業資本的控制，而商業資本不得不與城市的買辦發生關係，城市買辦不得不與世界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家發生關係，即不能不受帝國主義金融資本的統治。

在事實上很顯然的，中國的農村經濟受着帝國主義的

長期剝削而日趨於崩潰了！崩潰的結果，造成目前大量農民的流亡與流寇的發展。這其中的原因，我們當然不能不說帝國主義的壓迫；然而沒有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幫助，還不能造成目前這樣的強度。因為商業資本事實上是帝國主義的買辦，高利貸資本是城市錢莊在鄉村的代理人，而錢莊又是帝國主義銀行的支配物，地主取得了農民的生產物以後，不得不向帝國主義的買辦消售，所以，中國農村不得不經過各市鎮和上海發生交換，各市鎮不得不經過上海和國際發生交換；金融資本，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往往又都是三位一體！都是農村經濟崩潰的促成者！！

然而，一切剝削的主動力却是帝國主義，而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只不過做了帝國主義侵略的手段罷了。

七 封建剝削關係

如上所述，我們很顯然的看出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的全領域中都有直接統治的能力，這統治的能力在表面上使我們易於看見的，是金融資本統治了都市，商品經濟統治了農村，其結果使農村不得不依賴於都市，都市不得不依賴於世界市場，於是中國經濟不能不為世界經濟之一環，與世界

經濟打成了一片。然而世界經濟之一環的中國，其經濟的複雜性是世界經濟之他環所沒有的，這種複雜性我們不用費力搜求，只消在農村中放眼一觀，我們即立刻發現有許多與資本主義相矛盾的關係，這些關係我們為敘述便利起見，都可以歸納在封建的剝削關係上。

封建的剝削在農村中表現得明顯的是地主對農民之高度的佃租關係。中國是小農經營的國家，農民在全人口上佔百分之八十乃至九十，其中除自耕農半自耕農外，佃農約佔總人口百分之六十，即根據極不完備的北京農商部的統計，全國農民二千四百三十二萬餘戶，其中佃農佔一千三百八十二萬餘戶，半自耕農一千零四十九萬餘戶，如每家以五人計，那麼實際上在佃租制度之下受剝削的農民人數至少在一萬五千萬人以上。這一萬五千萬人以上的農民受地主的高度剝削，構成中國目前生產關係之重要的樞紐。地主對農民的佃租恆高至百分之五十乃至七十，除繳納正額以外，佃戶還須受地主附加的剝削，例如，“江蘇灌雲等地之承攬約中規定佃戶須永遠服從田主指揮，並於暇時為田主服役，”（劉大鈞：我國佃農經濟狀況十二頁）這些關係完全是純封建主義時代的領主對農奴的剝削關係，像這樣的關係我不

相信僅是江蘇灌雲等地有之，在全國各地定有很普遍地廣泛的存在着。

我們再看地主對農民剝削所取的形式上有所謂契約制，口約制，包租制，永佃制中，佃農又何嘗有所謂意志的自由，決定的自由。佃租關係如何決定之權，完全操之於地主，地主在這種契約之中可以任便規定聽地主指揮，地主可以任意驅逐佃戶，佃戶不得隨意更換土地；在資本主義工銀勞動制之下尚有形式之自由，但在此種佃租制度之下連表面上形式上的自由都沒有了，所以，中國的佃租制度還是封建主義的。再，在納租制上看，也可以得出封建的意味來。納租制普通恆分為納租金法，納租穀法，糧食分種法，幫工佃種法四種。納租金法雖在於田地較肥價值較昂之區採取貨幣的形式以納租，但其中間却無資本家從中奪取剩餘價值的部份，其關係仍然是地主與農民的直接關係，不過在形式以貨幣來代替吧了。納租穀法中農民所繳納者盡係農業上直接的生產物如糙米，穀，麥，棉，黃荳，高粱，玉蜀黍，山芋等等，其性質仍與中世紀的農奴奉獻給領主的農產物一樣；而在糧食分種法幫工佃種法中，却更十足的表現着極濃厚的封建時代的農奴氣味。例如“南通瀘涇港沿岸的幫工佃戶，

不需資本，只供給勞力，所獲作物與地主按成分配，地主分四成，佃戶分六成。在宿縣俗名此種佃租制曰‘拔牛腿’。（金陵大學一九二六年之調查報告）由這‘拔牛腿’的名詞，也可以想見其意義了。除此四種納租制以外，更有一種很驚人的高利貸的榨取，例如：“崑山正儀等處，若莊稼不豐，佃戶可邀地主在田內察看，估計收成若干，以定減租標準。若地主始終不察，則佃戶不能自行收割，蓋一行收割，佃戶即需交全租也。故此種情形‘佃戶往往不收，以致莊稼盡毀，而租亦不交，若縣內賦稅不免，地主對於佃戶之地租，當然亦不肯免。就實際而言，多數佃戶實無力納租，故地主亦有允許緩交者，惟佃戶須寫一字據與地主，批明佃戶某某，會借地主某洋若干元，月息幾分，這何時交還，決不食言等情。此種字據，俗名‘期票’，蓋此種地主所許緩交之地租，至此時已變成借款，並須付息按期交還矣。”（全上）此例僅是由地租轉變而成高利貸之一種，其他種種高利貸名目繁多，也不能細舉了。像這樣的除正額的佃租以外，尚須有一種轉變為高利貸的嚴重剝削，這恐怕是中國農業經濟中的特色吧。在這種狀況之下，使中國土地構成高度的土地資本，於是生產農民的大部分資財都用在購買土地和建築物上面，只還剩着一

小部分的資財經營農業；因此，改良土壤，整理灌溉，添置農具，購買肥料等都沒有法子可以進行了，這樣，農業經濟不崩潰尚待何時！況且在事實上地主就是農民無上的政治統治者，使農民受到壓迫而不能自由經營農業，這兒就以金陵大學的調查報告作例吧：“江蘇吳江縣之震澤，農人幾全為佃戶，地主對於佃戶之苛刻，實不可以言喻者；觸目感懷，誠不得不令人投筆三嘆也。地主田業公會為佃戶無上之官廳，押佃所為征佃佃戶之地獄，顯然為中古奴隸之遺風。地主宛如貴族，佃戶即其奴隸！噫，農村社會中有如此之現象，欲求國家進步其可得乎？！”

其次，封建的剝削關係表示着較為顯明的是軍閥官僚士劣團防之一切苛捐雜稅等政治的剝削。稅捐之繁多與苛重，在中國本是家常便飯，已是令人道不勝道了。據張振之先生在其所著‘目前中國社會的病態’一書中舉出四川的苛捐雜稅，誠令人有毛髮悚然的感覺；他從重慶總商會的代表石榮廷李奎安二君所苦心調查得到的‘各路非法苛捐一覽表’中，舉出其三表作例，總計每表中所列苛捐雜稅的名目有多至一百餘種，其所征去之洋除正稅外已超過其成本之數目，但其所經過之地則不過六七縣耳。表中所列真五花八

門，看了簡直令人要頭痛眼花。（原表很長，不便舉出，閱者可參考該原書）即在十年前據調查所得在湖北的雜稅有：木稅，斗稅，漁稅，捕魚船稅，皮毛藥品花布等稅，洋灰公司的貨稅，紗麻絲布稅，膏鹽稅，商稅等；雜捐中最重要的有：竹木捐，串票捐，稅票捐，夫役捐，學捐，米捐，船渡捐，車捐，房鋪捐，輪渡捐，市慶捐等等。這些苛捐雜稅，各省均各異其名，每省至少都有數十種以上。全國厘金關卡凡百三十八處，最近江蘇浙江江西等省名義上雖已裁撤釐金，但仍舊代以特種消費稅，農民的稅捐負擔並沒有減輕絲毫。中國田賦在最近十年內由十倍增至七十四倍，廣西的田賦佔耕種費用金數百分之三十乃至四十。田賦除正額之外，其各種附加稅之多，連財政當局也記不清楚，浙江的嘉善在一九二八年有七種之多，每畝要征收一元三角，民十六年山東萊陽的田賦竟每畝達到七元四角！此外又有預征田賦之例，據一九二八年的調查，四川的郫縣預征到民國二十八年為止，而梓潼一縣則已預征到民國四十六年為止！再，此外，封建軍閥爲加重剝削增多收入起見，強制人民種植鴉片，現在中國境內種煙區域之廣，更是沒有法子統計。四川雲貴這些著名產煙之區，姑且不說，就是一向不產鴉片的地方，於今也有了鴉

片！河南的一百零八縣中有六十三縣是種鴉片的，在豫西各縣，更由當局規定每百畝土地中至少要以三十畝種鴉片。一種鴉片，則其苛捐便多至不可勝數，下種時有罰款，栽插時有窩捐，收煙時又有罰款，運煙上市又要交一筆保險費，如果抗令不種又要徵收一次懶捐！像這樣的情形，在拒毒會都有斑斑可攷的報告與統計，不由得我們不相信了。這些苛捐雜稅等等的剝削，都有其政治的基礎，對中國整個經濟生活上有非常嚴重的意義，而顯露着國家封建制度的殘餘，而為資本主義國家所無的。然而在中國的今日，却仍然是廣泛的存在着！這是什麼現象？

八 封建經濟歟？資本主義經濟歟？

我們在上面各節中的主要任務，都已指出了中國經濟的複雜性與特殊性；既指出了資本主義成分的經濟，又指出了封建成分的經濟；照這樣的敘述，恐怕又要使閱者有摸不着頭腦之嘆，中國經濟到底是封建經濟歟？抑資本主義經濟歟？此處不怕重復，再說一下。

劃分社會經濟的各階段誰都知道是生產方式。有某種的生產方式，必構成某種的生產關係，而這種生產關係才是

社會的基礎。“無論那個社會的形態，存在一個一定的生產，這個生產優越於其他生產，而其關係，對於其他的一切關係，有指出其地位與勢力之力。這是一個普通的亮光，其餘一切的色澤皆被這亮光所染着，皆由它而修正其特殊性。這一個特殊的以太（Ether）規定表現於其中的一切存在之比重。”（The author's Preface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By Karl Marx）“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種經濟結構中，便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決定了統治與隸屬關係，而此種關係亦即生產過程中直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動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動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是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祕奧……雖然如此，但同一經濟基礎（同一主要條件却因各種不同的實際環境）自然條件，種族關係，外來的歷史影響等，能發出無數的變態和差別相與迷混其本來面目，要瞭解他，只有藉助於當時實際環境之分析。”（Capital V. III）其實，我們對於這個問題，中國經濟已發展到了何種階段的問題是很容易解決的，只要分析當時的實際環境，只要看當時的生產方式就夠了。那麼，中國的生產方式是什麼呢？“中國的生產方式主要

的是農業手工業勞動，……故農業仍然是中國的主要生產，而對農民的剝削是中國主要的剝削制度，其中主要的方法是地租的收奪。”（陶希聖：中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這些農業手工業勞動的生產方式，無論數量上質量上都是佔着中國經濟的重要部分，我們雖然不否認中國城市資本主義的發展，雖不否認中國的產業革命有大量的進展，雖不否認城市經濟有領導農村經濟的作用，然而，在全國整個經濟的比重上，却不能不使我們不承認農業生產與手工業勞動佔優勢這一個事實。

實質上，中國經濟是封建主義經濟^或資本主義經濟^或的問題未免太機械了，這樣‘非此即彼’‘非彼即此’的簡單邏輯實在不能應用於中國經濟的剖析上；因為中國經濟根本便是很複雜很畸形的，封建與資本主義兩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若是丟掉此要素而專取彼要素，便不能把握着中國經濟整個的所在。如果有人竟因捨此而就彼或捨彼而就此的見解來爭論着中國經濟是封建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的問題，我相信即使爭論到一千零一夜也是爭論不了的。中國這樣複雜的經濟，須得有適當的名詞去概括它，才能把中國經濟的整個性形容出來；在我未想到更切當的名詞以

前，暫名這種經濟爲半殖民地的中國經濟。若再明白些說，也可以勉強的說是半殖民地之半封建的經濟。

九 經濟發展的前途

中國經濟發展到了目前的這一個階段已是矛盾重重再不能平安的發展下去了。它必須有突破目前的矛盾而後才有順利的進展，否則，它只有加深的矛盾，更向畸形的方面發展，這是一個很自然的趨勢。依這趨勢，中國經濟的發展便有下列兩個前途：

其一，是不能打破目前的現狀與矛盾，使中國經濟趨於完全殖民地化。於是，帝國主義的經濟在中國更有長足的進展，中國自己的民族工業則只有趨於衰落與破產，因此，中國在工業化的過程中便日漸接近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像英帝國主義統治下之印度，即其前例。

其二，是能夠突破目前經濟的束縛，領導中國經濟走向非資本主義之路，使中國經濟建設在平等的民生主義的原則上以達到爲民所享的目的。然而，這個前途須在打倒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雙重壓迫之後才有實現的可能。所以，中國經濟的發展是生產關係的問題，而不是生產技術的問題。

目前的事實給我們指出了：在都市，絲業綢緞業麵粉業火柴業等等一切民族工業受了帝國主義的壓迫而日就衰落與倒閉了；在鄉村，一切生產事業如農業手工業受了帝國主義與封建的剝削而日就崩潰與破產了；而在他一方面却指出帝國主義的金融資本與依附於帝國主義的商人資本有長足的進展！依照這個事實的線索，第一個前途有實現的可能。如果中國革命不能復興，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不能根本肅清，那麼，中國經濟發展的前途惟有悲觀！

十，二七，一九三〇。

所 思

張 申 府 著

張申府是為國內著名之大學教授，以研究羅素哲學為國人所稱道。其小品散文，能於極簡單之言詞中，包含至深之哲理，此種小品，張先生允推獨步，散見於各報章者，均為讀者所愛不忍釋。此書所選，極見精粹，係張先生親手編訂。凡愛讀張先生之哲理小品散文者，當以先睹為快。

實價大洋六角

中國社會史短論

王宜昌

一 研究的方法

中國社會史中，中國社會底現在階段是什麼，是解決今日中國社會經濟問題的理論的基礎問題，而亦為今日中國人們所爭論着的重要問題。中國社會發展史是經過如何的幾個階段？而各個階段，在中國底歷史時代上是如何劃分的？這為的是週到地批判現階段的中國社會，是不能不被注意着，因而也成為今日人們所爭論着的問題了。從一九二七

年中國大革命以來，這種爭論，便是開始。現在堆積的材料也不少了。我打算來鳥瞰一下這些爭論，從批判裏導去我底短短的一瞥的結論。

首先我們便來看關於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我們知道，在一切研究上，方法是很重要的。同一的對象，以方法不同，可以得出種種不同的研究結果。正確的方法應用到研究上，才容易而且也可以說才可能得到正確的結論。

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可曾提出這方法論底問題麼？在一九二七年以前，顧頡剛傅斯年底對於古史的研究，便應用着古書的攷據方法，和新滲進了些神話解說等等。而在一九二七年以來，人們都利用着歷史的唯物論研究所得的結論作為根本的指導原理，而將中國史實嵌進去。但同時是不瞭解清楚歷史的唯物論，或者有意滑頭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們的所謂歷史唯物論。熊得山底“中國社會史研究”，陶希聖底“中國社會史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周谷城底“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長野朗底“中國社會組織”，朱新繁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馬札亞爾“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任曙“中國

經濟研究”，拉狄克“中國革命運動史”，郭沫若“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等等著作中，和各種雜誌如“新生命”，“思想”，“新思潮”等中，多是依據歷史的唯物論這根本的指導原理來的。但他們一般只是應用這一根本原理，而沒有正確地敘述這一根本原理底在中國社會史上的如何適用。直可以說他們是沒有仔細底攷究方法論的問題。有些簡直是在糊亂的應用他底所謂歷史的唯物論，而有些如郭沫若任曙應用起歷史的唯物論來，也因沒有攷究方法，而不免失于不正確。

我們來攷究一回罷。

自然，一般地在科學研究上，我們在現在底智識的最高發展這限制下面，只有最高限度的利用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和其應在用人類社會上的歷史的唯物論。但我們所要攷究的方法論上的問題，是早已不是要不要用 Dialectical method 和歷史的唯物論的問題，而只是牠們更具體的更複雜化的如何應用于中國社會的問題。

我們知道：人體的解剖是猿體解剖的鑰匙。因為在猿體中還未發展的部分，在人體中十分發達起來，而在猿體中十分發達了的衰頹了的部分，在人體中還留下了痕跡。這種科學的研究方法，不但是在解剖學上應該如此，而且在研究人

類社會史的科學研究上，也應該如此。我們應該從最高階段的最發展的人類社會解剖起去，而漸次地達到最原始的社會階段。這樣，我們才可以從一事物的結果的存在，推求其原因與發展。反之，我們從原始的階段研究下來，我們將看不清事物之發生發展與消滅，而迷惑錯謬。這種由果到因的歷史研究，這種由當前現實的研究，這種研究最發展的最複雜的現象底全體與運動，正是科學的即 Dialectical method 的方法。——我們可以記着這句名言：“思索是從後至前的”。

由此，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史底研究方法，是從當前的現代社會研究起。

自然，我們上面所說的只是研究法。我們更須知道研究法是與敘述法不同的。研究的思索是由後至前，由複雜分析到簡單，由果推到因的。反之，敘述法却恰與上述的研究法相反，而是由前至後，由抽象的簡單綜合的到具體的複雜的，由因到果的。二者是不能相混的。我在此不指摘人們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研究，是否用上面我們所攷究的方法。我們願意人們反省一下，而且注意一下這個方法。

其次，我們知道，社會底基礎是經濟。在經濟中人的生產力和物的生產力底一定的結構關係，決定着政治的社會

的意識的上層建築物。我們不能從意識的或社會的或政治的上層建築物來說明經濟，以至說明社會自身。反之，我們却應從經濟這基礎以至從物的生產力上來說明社會，政治，和意識。這是歷史的唯物論底根本主張。——我們更須記住這句名言：“在考察這些變更的當中，我們應該常常將自然科學底精密所能證明底經濟的生產條件底物質的變更，和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美術的或哲學的諸形態，要之，即人類用以認識這種衝突並打破這種衝突底意識形態，區別出來。”

所以，我們要認識現在底中國社會，只有從牠底經濟基礎上去分析，而不能混淆了政治的社會的心理的種種因素在中間的。自然，我們也要分析現代中國社會底政治的社會的和一切意識形態的各方面。但這些分析，不是獨立的，而是要從經濟分析來修正牠底內容的。不幸人們常常忽略了這一點。

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底目的，在一方固然是在於學術真理的探討，但重要的却是爲的認識當前的社會，由理解當前社會底必然法則，從而變革社會。我們要週到地明白地批判當前的社會，我們是不只要求當前社會階段底發生發展

變化消滅的認識，而是又要理解過去種種的社會發展階段，即理解整個的歷史。“沒有沒有實踐目的的科學”。這是作為‘技術’的科學底本性，便是為的人類底積極的適應自然服務的。

簡短地敘述了中國社會史方法論底大綱。另外的節目，容後隨時敘述了。

二 現代社會的解剖

我們為表明自己主張的研究法，我們在這短文便抹去了敘述法這科學方法，而以研究法作為敘述法了。所以我先說現代社會的解剖。但在小段中，仍不能不用敘述法的。

我們怎樣解剖現代的中國社會呢？歷史的唯物論要求我們先從經濟着手，而同時，Dialectical method則要求我們觀察全體的運動，把握自身的運動。所以我們便要把握着中國社會自身的運動，而觀察中國經濟。在我們底感性的直觀之中，我們看見大量的商品之交換及其生產。從這商品底分析中，我們便可看見價值律底完成的發展，和商業欺詐底漸次衰頹。看見剩餘價值之直接由資本家榨取這種發展，和剩餘價值之由經濟外的強力剝削之漸次減少。看見平均利潤

率之漸次形成，和重利底漸次消滅。看見地租之貨幣的轉化。而在工藝學技術學或物的生產力方面，我們會看見火車輪船電信飛機的交通，我們會看見大機械鐵木機械的工具。在人的生產力上，我們會看見 Proletariat 底形成，和過剩人口，流氓底存在。自然，我們是不能否認資本主義的存在和正在長成了。

我們追跡這個長成的歷史，則大量的商品交換盛行于中國社會中時，是大約在鴉片戰爭前後開始的。此後中國經濟中有鉅大的勾結着資本主義的商業資本活動着，而又盛行着鉅大的經濟外的強力剝削如厘金，賠款等。這是外來的歷史作用于中國經濟之中，而構成了中國經濟中底一種因素，在中國傳染起資本主義來了。從軍用重工業到輕工業的發展，鐵路投資的發展，興起了許多地主性的資本家。到歐戰後，商業資本家多了，而在一九二七年革命後，充分的動盪了守舊的農村，產業資本家更抬頭起來。資本主義的洋華的對立在此是不須的。

在現代中國社會，從政治上來看時，則牠適應于經濟的發展。首先，在大量商品的流動時，動搖了農村，而暴發了無數的農民叛亂。同時國外資本主義國家從經濟侵略而武力

侵略以至文化侵略了來。工業的發展中，立憲的帝制在準備着了。而地主性的資本家的不滿，會推開了朽腐久了的滿清皇帝這天靈蓋。商業小資本家和其相應的軍閥政治，歐洲十八世紀君王式的軍閥政治，在歐戰中興起來了。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洋華資本主義的爭競才充分地表明了。統一的政治，將隨着交通技術的增進而漸次完成。

在一般社會生活中，則家庭生活，由家族主義的大家庭而轉變到個人主義的小家庭了。道德由家族的連帶的感情，而轉變成商品的金錢計較了。宗教則儒佛道糅雜的多神拜物教，轉化成無神的，和信仰超越的上帝底基督教了。教育是從保守治術的科舉，轉變成為教授專門智識，增進勞力這商品價值的學校了。

在社會心理上，現代中國社會中，是把過去的一切順天由命的感情打破，而代之以投機進取了。他們好似商品是流通着一樣，他們是活生生地活動着。隨着資本主義的發展，起初是有富國強兵的思想，繼着是商戰軍國民的思想，再後是國民革命的思想，而到現在是和平統一的思想。在學術上所表現的是，在戊戌以來的輸入資本主義文化，在五四以來

的對過去文化的懷疑和否定，在五卅以來的新文化的輸入，和現在底文化的批判。

從這種方面，可以看到現代中國社會的資本主義的發展過程。辛亥革命推翻了封建的專制，而却帶來了軍閥的過渡期的專制。五卅以來底國民革命，第一在統一資本主義的國內市場，而第二在于排斥國外的洋資本主義。但雖然在政治上在經濟上，不能用民族來排斥盡了國外的勢力。但在經濟結構上，中國是無分乎洋華資本主義的，而是以資本主義這生產關係統一了洋華的民族和政治的對立，中國底主要生產關係是資本主義（無分乎洋華的），中國經濟是資本主義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的統一。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的社會了。

單就中國本身說，中國底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其國內市場之統一，是幼稚的。但是資本主義是由國際貿易而來的。而且現在世界經濟，是早由國際貿易時期而進展到世界市場。中國資本主義已漸次地捲入世界市場之中，一切必需品，也要靠國際交換來維持，而且也輸出製造品了。世界資本主義之達于其最高階段的，停滯的，沒落的帝國主義。由此，也大有影響于中國資本主義的未來運命。

自然，我們不是說中國只有資本主義經濟，而沒有其他經濟之存在。我們知道，一個社會是歷史的產物，過去歷史的種種遺跡，是必然地存留于現在社會之中的。但牠不是以本來的形式而存在，而是受支配的生產關係底支配，變了形“染了光”的成爲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這種被支配的生產關係，是正在歷史的沒落過程中，無足輕重的。

中國現代社會中，因爲資本主義是正在完成，資本主義以前的封建制度自然是存在，而且是龐大地存在的。牠是龐大，但牠是腐朽了，是沒落了。牠底反動是必然有的。但是牠底物的生產力是終于要使牠沒落了。奴隸制度更是包含于封建制度中而存在着，如奴婢制等。而原始社會，則從宗族祠堂，從僧侶食堂而表現了。

“批判的感情是激情，批判的本質是摘發。”我們來看看人們的爭論好吧。

Dialectical method要求我們觀察事物底運動，觀察事物底不但由過去之發生到現在底存在，而且要觀察他未來底發展和沒落。即是不只要我們看着過去和現在，而且要緊的是把握着飛揚在空際的未來，把未來的結果拿來完成這事物底本體全體，同被觀察着。但可惜人們在爭論中國現代

社會底時候，只把握了已存在的，而未把握正生成的。只看見過去和現在，而沒有看見將來。例如陶希聖便只看見中國封建政治及上層建築底存在，新思潮派便只看見中國封建經濟底龐大的存在，而沒有看見牠底沒落，和資本主義底正在完成。這種將事物靜止化，凝固化。只不是觀察實際，而是在頭腦中虛構中國社會史了。

在純粹的經濟分析上，不能很隨便地混淆了上層建築物進來。所以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經濟結構中底生產關係時，只有從經濟上去看已存在的是否是資本制的，和其存在的數量的大小。而不能從中分別說：這是中國民族的資本，所以這是中國的資本主義。那是外國資本，所以不是中國的資本主義。我們只能從在中國地域內，在中國經濟中存在的生產關係來說。這生產關係當然不能分爲華人的和洋人的。然而在陶希聖，朱新繁，以及新思潮派等，都在經濟上劃分着洋華資本主義而忽視在中國底洋資本主義。這是謬誤的。

封建制度在中國是正在消滅，是變爲被支配的生產關係了。陶希聖說中國封建制度早消滅了，但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新思潮派以爲中國封建勢力佔優勢，佔支配地位。這無疑地是只把握了存在的封建制度。而且在其爲“生產力的束

縛”上，陶希聖誤解為封建“制度”消滅但“勢力”存在，新思潮派則誤解為優勢，為支配了。

人們好從帝國主義來把握中國現代社會。這在研究世界社會時是正當的。但就中國社會研究說，是要把握中國社會自身底運動才正當的。資本主義底外來的侵入，只是作用于生產力底一個外來的歷史作用。在歷史的唯物論中，是不能不看重這一外來歷史的作用的。這一作用，加入于中國社會中，而構成中國社會運動基礎生產力之一。所以我們不能從國際貿易來把握中國經濟，如任曙一樣。自然更不能從帝國主義從世界市場來把握中國。中國資本主義起源的答案，自然是外來的傳染。但我們更要注意去解釋為什麼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不是自發，而是外來的傳染？爭論的人們給我們怎樣的答案呢？

這個，和追跡在現存社會中正在沒落的封建制度一樣，我們要追跡過去的中國歷史的發展。但我們此處可以注意說的是：中國資本主義現社會的經濟中心，是轉移到東南沿海來，而不復是如過去之在于中原，在于西北了。

三 中國底封建社會

我們試看，在現代中國社會中還存在的封建制度，首先便會看見分散的孤立的落後的農村經濟吧。其次便會發見在農村和城市間，在城市和城市間買占着一個地域的商業資本吧，更由此會看見高利貸資本在作用着的吧。在這上面，還有商人行會的遺跡，在這下面，還有農村中的會黨，游徒，還有城市中的手工業行會。在一般的落後經濟中，儒釋道糅合的倫理與宗教，還龐大地存在着。家長，豪紳地主，官僚軍閥的政治統治，和經濟外的如苛捐雜稅重糧加租等的剝削，守分安命的心理，古典的文化等。這些還成爲一個制度體系，雖然是正在崩潰，正在改頭換面的。

這種制度是怎樣崩潰了呢？我們便只有從歷史上去追溯。在過去地方分散經濟時代的中國歷史上，我們很顯明的便要看到政治溶解于經濟中了的幾次社會大動亂，和幾次外來作用着的歷史影響。如清末明末元末宋末，唐末及五代，上溯至五胡十六國，三國及漢末，及秦末諸時代底擾亂，暨資本主義列強，滿族，蒙古族，金，遼，突厥，五胡等異族之侵入。在這種種動亂時期中，我們很容易地劃分出兩個階段來，一是由滿清末年到五胡十六國底異族之侵入。一是在漢以前底社會內部的動亂。從經濟史上的追溯，會看見中國封

建社會，是起始于五胡十六國的。

五胡十六國底異族擾亂中原，把當時中原的文物之邦的文化幾乎毀滅完了。第一他是打破了漢代遺來的貴族世家的統治制度，打破了以前的奴隸等級。而在擾亂之中，漢代以來的佛道兩教，便在鄉村中組織着農民，而宗教得了培養的地盤。鄉村中爲保衛自己而有莊園的組織，軍事地點加多，商業發源的城市加多。這不只北方是如此，而中原人民底遷移于南方，使南方也如此地變動着社會組織。在隋唐以來，中國統一，國內交通發展，南海海外貿易興起，文化中心漸移于長江下游，而開始了封建社會的發展。

從經濟上來分析中國封建社會時，初時農業上的主要組織，是地主貴族僧侶們的莊園。這在隋唐兩代底河北各大族可以看出來，而且是從關於唐宋元明各代的記載及小說中，也可以看見莊園這種制度的。在這下面的是農民與農奴的勞動。而在莊園中，又有賤奴僕婢的勞動，這是奴隸制度的遺跡。僧侶也是一種地主貴族了，而僧侶們底公共食堂，同當時底大家族一樣，是保存着氏族共產制度底遺跡的。

在城市中和在鄉村農業中一樣，存在有一種獨立的手工業者，由着交通底發展，和生產剩餘底加多，手工業者

商人更發達起來。于是城市發展了行會的工商業組織。這在唐宋以來，南方各海外通商城市，及洛陽，長安，夏口鎮，朱仙鎮，景德鎮等內地大城市可以看見的。這樣商工業底發達，增大了商業資本，和高利貸資本，而更多兼併的地主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這三位一體的東西，剝削着農民，加以地主貴族統治中的政治上的經濟外的強制剝削，造成了社會經濟的擾亂。農民失去了土地，逃亡出鄉村來。而商人和手工業者，在龐大的中國地域中，沒有養成新勢力的可能，而且又是爲國家抑制着的，這樣底封建經濟的內部的朽腐，沒有新的自長的生活出路，而只有由異族底侵入來重新灌注新生命，重新組織封建經濟了。

北魏復行古代的均田以來，中國土地制度便終結了牠底古代制度，而唐代便對於土地另取租庸調和自由賣買的政策了。宋代王安石底復古，無疑地是不可能。

明代以來更廣大的海外交通，有了更發展的城市工商業階級，因而形成民族思想，發展紙幣制度。但清代又重新把牠拉退後了。在清代末，資本主義底商品輸入，加緊了地主商業資本家和高利貸者的剝削，而又開始了農民叛亂。現在這新的海外通商，把中國過去的限于本國地勢底東南臨

大海，因而不能遠航以發展航海技術的落後保守的經濟打破了。技術是從交通到生產的有了新的器械，而商業資本，是從其封建中支配生產的性質，變為被資本主義生產所支配的一分支了。資本主義從商業到工業地在中國發展起來了：在手工業上，便加緊了由行會到手工工廠的進化，以至到機械工廠。在農業上呢？初時是把農業底自給自足的生產打破，而變之為原料的商品生產，漸次在其封建的小規模手工生產方法上，改變之為大規模的，機械的，化學肥料的，電氣的耕種了。莊園是早被商業破壞了，而行會又被資本主義的自由競爭破壞了。

從政治上來看中國的封建社會時，則從五胡十六國直到清代和民國軍閥，都只是地主貴族僧侶的政治。他們底統治，不只是從武力，而且是更進一步的由風俗道德來統治的（資本主義是再進一步用輿論文化來統治，中國還沒有完成的）。僧侶在封建經濟中有偉大的作用，不僅在其發生上，而且更在其發展和消滅上。武士的風習，在唐宋以來，不但是見于雜記小說，而且是見于官家史傳上。帝王，貴族地主僧侶，武士，農民四個身分，是十分顯明的。

在社會生活與思想上說，儒家底階級的折衷的倫理觀

念，是隨後才起的。佛老的宗教，前者是大平原的印度底出世的宗教，後者是大平原底中原的出世的宗教，他們都支配着五胡前後底在擾亂在末日恐懼中的人們底心靈。但在唐宋以來底和平發展，又要轉向于入世，而階級的折衷的儒家倫理，正合于需要。于是在宋代便和佛老糅合起來，成爲不可分的東西了。佛教底地獄輪迴階級之說，和儒家底尊卑家族之說，一樣地成爲道德信條。而小民的安分守命，也是被支配的奴隸道德了。在家族制度上，是承繼着過去底氏族宗族而來的，但在五代和宋以來，特別加重了家長制的家族制度，男女和身分等更嚴了。科舉的攷試制度與教育制度，吸收的是地主貴族和武士的子弟。而家族故舊的感情，地方狹隘的心理，和古典的官家文化，便只如此經濟如此社會的產物。

有人以爲封建社會，中國在秦以前便沒落了。這不過是從中國古代使用的“封建”二字，和現譯 feudalism 的“封建”相混之故。這種不究內容，只看字面的，不值一說。若陶希聖認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前沒落，而封建勢力還存在。這不僅是不懂什麼叫封建社會與封建勢力，而且是虛構中國社會史。認爲漢以來是商業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是地主社

會，或小農社會，這無疑地是不明白社會進化的階段的。

郭沫若以爲中國封建社會，在秦以後，即是始自秦代。這我不贊同的。這無疑地要爭論到封建制度底本質和起源問題。如山川均等一般是否認宗教與封建制度的重要的。但我們試看西歐封建制度底起源和其本質，却是宗教占着主要脚色。而一般又忽視外來的歷史作用底異族。但這不僅在歐洲封建制度是如此，在中國也是如此。這是因爲奴隸制度底崩潰，沒有自己的出路，而是要借異族的新生命來復活的，Engels講得很明。而在中國封建經濟底沒落和資本主義經濟底興起上，也是如此。因爲中國以經濟地理的限制，沒有內海可以發展航海的交通技術，而廣大的內地生產技術，也無由戟刺而發達。所以不能自發的轉變爲資本主義，而必須利用已經發展了的資本主義之侵入傳染了。秦代宗教不盛，沒有外族之侵入。封建制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構成的。而況秦漢制度，還可以證明是與封建制度不同的奴隸制度。五胡十六國之亂華和中原人民南遷，才把中國封建社會建立起來的。

在封建社會中底階級，陶希聖所謂士大夫階級，和流氓無產階級。在歷史事實上，不是如此的。陶希聖是要把人們

欺騙，因而把種種不同的階級糅合爲一。所謂士大夫，便是把武士，把優秀農民，把地主僧侶，把破落貴族聯合起來的治者，而流氓無產階級，便是聯合起來的被治者。這種是陶希聖所謂地主社會，梅思平所謂商業資本社會，方岳所謂(?)社會的X階級。不是現實的社會歷史的階級。陶希聖著得“中國封建社會史”，從“水滸傳”中研究得流氓無產者，但可惜陶希聖却不知道什麼是封建社會封建制度封建勢力，而不能從“水滸傳”中研究出真正的封建制度底莊園制度，武士階級。

所謂商業資本社會的主張者，他們是看不見社會的生產，而只看見社會的流通的。這是他們現實生活底反映。他們是遠隔了生產過程，他們又站在今日中國有鉅大的商業金融資本的社會裏，從這種視覺中，只能看出“商業資本”這一萬應如意藥膏的。因此，陶希聖對中國過去社會歷史，是沒有看見還有奴隸社會之存在，而忽視奴隸社會，像波格達諾夫一樣，將奴隸社會包含于封建之中，與封建糅合對立起來，而充分地說着“商業資本”了。

自然，奴隸社會也有其商業資本。但商業資本底社會的性質，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不同與封建社會，在封建社會不同

于奴隸社會的。這點兒是談“商業資本”的人們所應注意的。

在封建社會和奴隸社會一樣，是直接從氏族共產社會變化來的。這在西歐是如此，在中國也如此。不過前者在廣大的內地，後者在交通便利的地方和濱內海。前者時期遲，後者時期在先，因而前者又承繼後者的遺跡罷了。

四 中國底奴隸社會

從現代社會底奴婢制度的遺跡中，我們以上溯到古代的奴隸社會。封建社會中的農奴賤奴婢僕，同樣是奴隸社會底遺跡，但是，更明顯的遺跡而已。

奴隸社會在中國的發展是怎樣的呢？試看漢末三國到晉中間的擾亂吧。當時平民的衆多和窮困，使諸葛亮勸劉備要招收流散的人民來充當軍士了。西漢末年和秦末一樣，流散的人民蠶起做賊，而神鬼迷信之說開始支配人民。地主貴族和平民的爭鬥這主要的。再前底春秋戰國時代以及周代，則貴族自由民和奴隸，是很顯明的。這不僅是從秦漢兩代中廣大的奴隸存在可以證明秦漢之爲奴隸制度，從周代以至春秋戰國之奴隸城邑證明牠們爲奴隸制度。我們還可以從根本的分析中去說明的。

中國底奴隸經濟，其地域範圍，在秦漢兩代是以武力征服了長江及珠江兩流域了。而在秦以前，是只屬於黃河流域這黃土層的所謂中原的。在古代居于中原地區如今日所稱為渭水汾水洛水以及黃河新舊道附近的商種族，由甘肅陝西徙來的周種族把他征服了之後，隨着既發展了的淺耕農業，而建立起奴隸制度來。商種族是被周種族作為奴隸，而經營黃河流域的奴隸城市如洛邑等了。奴隸的佔有，和家族建立，土地私有于家族等等制度，在周代開始發展。而奴隸城邑間更發展着商業。古代中原黃河水道及其他水道，是與今日不同。而當時齊魯以扼黃河及濟水等的交叉點，并又為中原交通之交叉點，地又近渤海東海，故交通繁盛，商業發達。鄭衛近于是區，商業亦鼎盛了。

商業的發達，只是增加奴隸貿易，改變為貴族自給的奴隸生產到為商業的奴隸生產而已。齊田氏便是一由商業致富貴的奴隸主人。

秦代以強大的奴隸勞動，統一了中國，建築了萬里長城，阿房宮，巡行天下的大道。但所謂閭左貧民這些平民和奴隸，便斬木揭竿而成為奴隸大叛亂來了。

漢代重新恢復了奴隸的政治統治。漢武帝底遠征的威

力，是奴隸制度底偉大的犧牲。而漢代底商業發展，却加重了平民的土地兼併，和人身即奴隸的買賣。王莽底復井田，禁止奴隸買賣，是不得不失敗于既成的經濟進化。東漢以來，貴族的奴隸統治政治，一仍舊貫，但內部底朽腐不適于社會生產，却增加了社會的不安，而佛教便起初成爲貴族破落的安慰。魏晉底清談佛老，無非爲此了。

已朽腐的奴隸經濟制度，沒有出路，而只有五胡亂華來以異族的力量而復活，但不能復活成奴隸制度，依賴異族底氏族組織，而成爲封建制度了。

從政治上看中國奴隸社會，則周代的統一，只是種族聯盟的所謂天下之“共主”而已。西周末葉的周召共和，只是自由民的政治。而秦漢的統一，才加強了的武力統治。在奴隸制度下面，是從吃殺俘虜直接遺下來的武力統治奴隸。而不是封建社會之以風俗道德，資本社會之以文化輿論的。春秋底五霸和戰國底七雄爭長，便是“共主”周室到秦漢帝政統一的過渡。

在社會生活上，則中國奴隸社會中，家族制度，正在形成氏姓，而不嚴格。在一夫一妻或一夫多妻之下，賣淫制出現了。宗教是消滅在奴隸統治之下，而沒有力量，道德風

俗漸次地形成階級尊卑等差。而貴族，平民子弟，識字的便做官吏或治者了。

在學術思想上商周以來的思想，形成易經底辯證哲學，而後由老子承繼起來。再後，則齊魯商業繁盛的地方，沒落的貴族，寄生在奴隸勞動上，而發展了儒家的階級倫理和奴隸文化。隨着中原各地商業的發展，到了戰國，各國都有了哲人詭辯之士出來了。春秋戰國成爲文化很發達的一個時期，便是因爲奴隸制度極盛的一時期。漢代一方是在治術上發展，再一方又開闢了黃老方士的宗教，再後佛教也輸入來。但這宗教初時不過是貴族們的安慰品吧了。隨後才漸次侵入于一般人民心中的。

郭沫若尋出了中國奴隸社會之存在于中國古代所謂爲“封建”的周代。這是一個重要的研究。但他以爲中國奴隸社會，在秦便完了。這是誤解了。因爲郭沫若從文化革命來論斷中國社會變革，所以認爲儒墨道諸家是在春秋戰國時開始了封建制度的革命。這是把文化來誤解經濟社會的結果。實在，文化最發達的時期，只是經濟發達到最高點的時期。春秋戰國只是奴隸社會底最高點，而在其後還有秦漢魏晉幾代。這好似歐洲奴隸經濟在希臘以後還有古代羅馬一樣。

同樣，在希臘以前，還有波斯，希伯萊，亞述，巴比倫，埃及等奴隸社會。中國也有許多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奴隸國家的。

在漢代許多制度，和唐代對比起來，是十分不同，但和周代却近似的。再我們如果只唯物地承認思想是不能十分地玄構，而是社會生活的反映時，則我們對於古代歷史底材料，便要盡量利用漢代雜出各家之記載了。我們如果把周秦與漢同歸于奴隸社會來看，我們便可以解決許多無謂的記載真偽的問題。同時更容易從文字記載上去證明漢代之為奴隸制度了。

陶希聖和許多人，簡直沒有看到社會進化史上奴隸社會這一階段之存在。同時也忘記說中國還有奴隸社會。然而，他却根着波格達諾夫所說，將奴隸包含在封建之中，把奴隸和封建混雜起來。把春秋戰國的奴隸城邑看作莊園，而說春秋戰國是封建制度了。這真笑話。如果就班固漢書食貨志中所記載的來看，則當時所謂邑里等地方，都是奴隸居住的地方，早晚把他們放出來，有看守的人監視在門首。這是莊園麼？陶希聖不能從“水滸傳”中發現莊園，而却從“左傳”中發現了百雉之城為莊園，這不可不謂為中國社會史研究上可驚異的事情了。

五 中國底原始共產社會

最後，我們來追究存在于現代社會底家族和寺院中的共產制度的歷史。

現在中國大家庭中底共產制度，是已變形了的，只是不動產的共有制度。即宗族祠堂底共有財產，也是同樣。而僧侶們底共有財產之下，還更有共有的會食食堂。在封建社會中，這種共有的情形更明顯的。古代奴隸社會裏，則在宗族家族中底共有情形，遠較在封建時代的僧侶底共有為明顯。

家族制度，和宗族制度或氏族制度，是和共產制度有密切的關係的。共產制度底歷史，主要地是與氏族相連，而家族發展分裂了氏族，便把共產制度也破壞了。

中國原始共產社會的歷史，我們還不能用確切的材料來敘述出來。我們只好就神話傳說，以及古器物，和西歐歷史來綜合地說一說。

中國地勢，是處于北緯三十至六十度中間，正當北溫帶的。東南有太平洋的暖流，西北有高山大漠，而中央有黃河長江兩大河，東流入大洋。黃河流域中部，正當肥沃的黃土層，而西北又連接中央亞細亞草原的。人類最初在亞熱帶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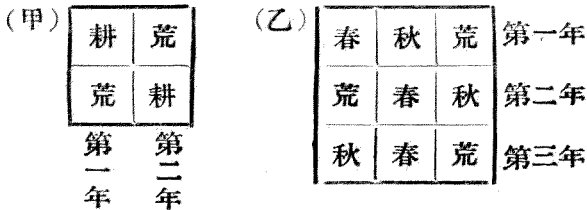
林發生起來，向平原的遷移，便由新疆而入于黃河流域了。黃河渭汾洛濟之交，地勢平坦肥沃，水陸交通便利，人類最初在這些繁殖起來。以前漁獵羣的稱爲 Horde 的人羣，現在是開始定居，而以母系爲中心的氏族制度組織起來了。以黃河流域的適宜的地利，男的牧畜，女的種植，安居生活着。但西北民族，以地利和天時的變換，從甘陝，從河北東南下，而種族與種族間的戰爭起來了。神農工共蚩尤黃帝等，在今日河北山西山東河南等地的爭戰的傳說，也是可有的事。而此後黃河底氾濫，成爲傳說的堯舜禹和盤庚時代底洪水。由定居到淺耕農業，和由戰爭到奴隸發生，以及剩餘生產品之種族間交換的發達，由動產的私有財產到不動產的私有財產發生，于是小家族分裂了氏族，父系代替了母系。而原始共產社會便崩壞了。

氏族制度中，姓從母系，弟兄及姊妹羣婚。這在中國傳說古代帝王是如此的，近日已確攷的商代帝王，便是如此制度的遺跡。在這制度中的神權是很大的，商代巫風甚盛，可以如此解說。

關於原始共產社會，中國有井田的傳說。大概是在夏代山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氏族的土地分配，和生產物的分

配，是“五十而貢”，商代河南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七十而助”，周代陝西地方的氏族共產社會，是“百畝而徹”。這一傳說，許多人以為是不可能的。我解說如下：

井田可以有兩種解說，第一，是指古代共產氏族分配土地與小家族時，應用輪耕方法，于是以土地的形式名田，兩年輪耕的土地形式如(甲)圖，稱為“田”，三年輪耕，如(乙)



圖的稱為“井”。第二是說古代耕田時，擇取水源，以水源為中心，而向四方擴張經界成井字形，水源在中心，故稱為井。至古代何如畫正方形？則是為謀分配平均，及古代幾何術劃分的便利。文字是正在原始共產社會中形成，第一說的井田解說，可以有根據，而西歐社會進化史上，也是此如的。

而助貢徹也可有其解說。原始氏族制度，氏族大家庭是共居的。在最初幼稚農業上，每小家族分配的土地很少，而且各小家族仍是共居的。所以執行分配的氏族長老，便取各小家族所“貢”的一部分以生活。而農業底進步，每一家族

耕地加廣，遂使小家族離開大共產家庭而居住起來。氏族長老不能勞動，于是各家公同耕種長老的田。這是所謂“惟‘助’爲有公田”了。更進一步的，則井田底共產性質已變，種族的權威統治興起，成立所謂國家。統治者不復要“助”的公田，而是從十抽一的“徹”法了。

郭沫若對於商代和周代的研究，是值得注意的。但直捷了當的否認井田，這是還值得攷慮的。

六 幾點結論

我們現在依據上面簡短的敘述，可以結論幾點：

第一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自然條件上去注意。我們知道歷史的唯物論，是 Dialectic 地綜合各種史觀的，自然，地理的因素也被看作一個重要的因素；而 Plehanoff 竟是充分地承認地理的條件的。黃土層，黃河水利及河道變遷，黃河長江底直入大洋，內海的缺乏，這些對於中國社會是有很大的影響。Morgan 及 Engels 以爲西大陸美洲，受動植物產及地勢影響而滯留于原始社會。我們可以說中國以缺乏內海，面臨大洋而停滯于封建社會了。資本主義不能自發這歷史的事實，只有由這自然條件而說明。

第二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人種條件和外來作用的歷史影響上去注意。這同樣是歷史的唯物論所看重的。中國封建社會之所以停滯而不成整個中國社會的衰亡，不絕地異族的侵入而加入新生命，是很重要的原因。而資本主義的侵入，是更值得注意的生產力底大變動。

第三點是我們研究中國社會史時，要從社會條件上去注意。中國社會中，以物產底豐富和種類底殊異，而發達了不同的技術，又中國以種種自然人種的差異，而表現差異的政治形態，表現差異的風俗習慣，以致差異的心理與學術。這些是要反作用于經濟的。牠們在前一時代為被經濟決定的東西，而在後一時代則是決定經濟的歷史的前提條件了。如奴隸政治，封建政治等之沒有出路而成為朽腐的統治便是。

現在爭論着中國社會史底人們，到底是從那些方面去注意中國社會呢？是單從一方面或幾方面，如像庸俗的社會科學家底偏面玄學的見解嗎？還是要本着歷史的唯物論的Dialectic地綜合全體的觀察呢？我想，假如是要把中國社會史弄成“科學”，而不弄成“假科學式”的“玄學”，我們不得不從作用于社會的種種因素去研究，而決定這些因素怎樣地作用？其作用程度為何如？是怎樣被經濟統治着的？

因此，我們不但要充分地了解人類積極適應自然底“生產力”的概念，而且要充分了解生產力底“變化的各種原因”，如自然，地理，人種，人口，技術，科學，生產關係等等。從中國社會這最具體的最複雜的現實，出發去思維牠底進化，我們是不能不達到這最抽象的最簡單的生產力的概念。

更進一步的，一切理論，都可還元于，而且在思維上必要還元于抽象的思維法則。于是我們不能不達到唯物的 Dialectical method 的思維。我們也不能不究心于這 Dialectical method 了。

假如我們只是隨便地應用庸俗的社會科學上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無疑地得不到結果，至多只有支節的而且是歪曲了的發現，如一般統計調查的人們，他們輕視理論，不了解理論，說要免去成見，然而却把他常識上的謬誤成見，溶合于他底研究之中去了。社會問題的研究專家們，便是如此。

假如我們只用一知半解的“自己的”歷史唯物論的方法來觀察中國社會，也無疑地得不到什麼結果。而在此歷史唯物論的假面具之下，是更容易養成一般人的謬誤觀念。這簡直是罪惡了。那些鼓吹中國沒有奴隸社會，封建社會在秦以

前便完了，秦至今封建制度消滅而封建勢力存在，和商業資本主義的人們，警醒些吧！

。歷史的唯物論，是無疑地要聯繫到Dialectical method的。牠底正確處，正在於其由全體的，由運動的方面，去觀察最複雜的現實，而將其中的種種因子，從其發生的因果關係上決定他們的作用程度。假如我們只是簡單地應用一兩個死公式，且不是把全體觀察破壞了嗎？又且不是把觀察運動破壞了嗎？

本文簡短地寫完了。我是大胆地如此寫下去，文中有許多地方字句也沒如何修正，只率直地提出意見來。錯誤之處，尚望讀者指正。好在現在還是“中國社會史論戰時期”，可以大家來討論的。

一九三一年六月十八日上海。

(1) 書叢究研題問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農業問題論	Kautsky 章子建	六角	考夫基的學說，對於目前的中國是比較其他任何販來的學說為適合，大概是誰都不會否認的。這一部攷茨基的名著，也是久經震動全世界的，本書後，更系以荷佛氏許多實際的辯證的說明，那更便於讀者的研究。
世界貨幣問題	加塞爾 王希夷	五角	這本書雖然是研究歐戰後世界各國的貨幣問題，但內戰連年的中國，有許多貨幣問題很像歐戰後之參戰各國。這本書很能夠給我們以良好的參攷。尤其是現在金價暴漲，我國金融紊亂的時候。
中國國民經濟概況	何漢文	一元五角	資本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上侵略的程度，究竟怎樣？內地經濟目前的實況，究竟怎樣？這些都是我們應該澈底明瞭的。這一本書的內容，把中國的工業狀況，農業狀況，貿易狀況，財政金融狀況，交通狀況，以及列強在中國經濟侵略實況，都很詳盡地指示出來。
農村問題與社會理想	日本那須浩 劉鈞	六角五分	因工業發達及資本主義的興起，農村衰落，都市繁盛，誠如著者所言，農村問題，不僅為社會問題，而為文明問題。本書分析農村問題之各種根據背景，極其詳盡，尤對於解決此問題之方法徑路，有新穎獨到之指示。
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	馬札爾亞爾 陳彭 代桂 青秋	二元二角	農民問題在今日已成為最重要的問題。雖然這本「中國農業經濟的研究」，是著名的中國土地問題的物觀的研究的一個有力的嘗試，而其中內容的豐富，實在是驚人。無論在約四十萬字，現已出版。

封建制度論

王亞南

一 引論	六 中國封建制度與日本歐洲封建制度之比較
二 封建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七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原因
三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其崩潰	八 論證今日中國尙爲封建社會之無根據
四 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	
五 中國封建制度之分解	

一 引論

在數年以前，中國學術界，曾軒然大波的，掀起玄科之戰。戰爭下來的結果，科學家固然說他勝了，但玄學家，也像

在說他勝了，至少是沒有敗。不過，自經過那次戰爭之後，玄學鬼確沒有以前那樣猖獗。固然革命勢力北張，他們不由得不能銷聲斂跡，但那次玄科之戰，多少總不免給他們一點懲創吧。

近年來，學術界又提起了一個爭論的問題，那就是：中國現在的社會，究係什麼性質。是封建社會呢？資本主義社會呢？抑是既封建化了，又資本主義化了的一種複合性質的社會呢？在過去一兩年間，國內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對於這個問題，很有一些爭論。不過，這時，參加論戰的人數還不多，而參戰者，也還未正式短兵相接，一種前哨的引戰罷了。到最近，據說，這論戰，將擴大範圍，並且，參戰學者諸君，將把讀書雜誌做戰場，各各大顯身手。論戰看看要白熱化了，我們觀戰者也感到有幾分緊張。

玄科之戰，是五四運動後，科學精神逐漸伸張起來必然的結果；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論戰，是近年來革命碰壁，致一般人懷疑革命，因而回頭探究革命對象之必然的結果。這兩種論戰，各有其時代背境，各有其獨特意義。不過，前者專屬於學術的範圍。而後者則不免因學理的論爭，而牽涉到實際政治方面，這是兩者性質上顯著不同的地方。再，玄科之

戰，學者們雖各擎旗幟，號於有衆，但在一般青年學子，究不甚關心，況玄學者離奇吊詭之談，所引愈博，所窮愈晦，而對於青年學子迷醉的力量却愈弱。若這次中國社會性質的論戰，其影響就兩樣了。目前政治上的紛擾，一般直接感到切膚之痛的學生，已在苦悶的摸索了，他們正切望有一種清新的理論出來，作他們思想的嚮導，作他們將來從事實際活動的指標。所以，在這次作戰當中，參戰者應特別小心慎重；爲了攻擊而攻擊，爲了作戰而作戰，那不獨沒有意義，且恐給予青年以不好的影響。

在我，一向對於中國社會性質這個問題，是頗爲隔膜的，至少，是沒有一種清晰的觀念，或正確的認識。我也和其他的青年學子一樣，正渴切等待着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的指示。所以，論到參戰，我是沒有資格的。我寫這篇論文，目的在泛論封建制度的性質。其中也許不免涉及中國社會的性質問題吧，但，那是附帶提到，頂多，是當作觀戰者的感言提到。我自信不是怯戰，但自信非鬥士，且無戰鬥力也。

二 封建制度之理論與實際

不拘什麼問題，在實際，儘管是非常明白的吧，一導入

理論領域，就異說紛拏，似乎不可究詰了。並且，實際上，彼此的意見，雖漠然無大出入，到了理論起來，却便硬像是尖銳的對立。名辭之眩惑學者，抑學者之捉弄名辭，姑且不問。在討論中國社會性質問題的時候，我覺得對於封建制度這個用語，是應當費一番研究的。

大英百科全書中解釋封建制度說：“封建制度之關係，以封土 (fief) 為基礎。所謂封土，通常皆屬土地，然亦有以他物為分封之資者，如職位也，金錢貨物之收入也，徵稅之權利也，開設磨坊之權利也等是。受封土者，隸身於其主人，而為其附庸。……附庸之能保有其封土而享其權利者，即在誠實履行其稱臣時所允負之義務。彼果能盡其義務，則彼及其子孫，永得以封土為其財產；而同時對於其所屬佃戶，又不啻為實際上之地主。稱臣受職之儀節，為封建制度契約之起點；兩方所負之義務，普通無特別規定，但就當地之慣例決定之。”(參照世界史綱譯本下冊五三九面)

由上面這段文字裏，我們可以看得出封建制度的幾個特徵。

第一，封建制度主要是以封土為基礎。

第二，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保有一種從屬關係，且負有

一種必須履行的義務：如爲主人謀利益，爲主人守祕密，爲主人防衛堡壘等。

第三，領受封土時，須經過一種稱臣受職的儀式。這種儀式，乃受封者對於其主人之服從關係的開始，同時也正是對於其領有關係的開始。

第四，受封者得以封土爲財產，永遠傳授於其子孫。

第五，封建制度最注重等級。首長之下有附庸，附庸之下又有從者。從者對於附庸的從屬關係，一如附庸對於其首長的從屬關係，其發展形式，如金字塔然。

以上這五個特徵，雖就歐洲封建制度之體制而言，但推之於中國所謂封建制度，表面上亦似無大出入。不過封建制度一辭，原係對於一系列事實所加之概括稱謂。換言之，不過理論上之方便說法耳。如必謂封建制度爲一種實際有秩序有系統之制度，却未免遠於事實。所以大英百科全書上說：‘吾人之用‘封建制度’一語，爲便利計耳，若謂其含有系統之意味，卽爲失當。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其爲物也，實一種略具組織之混亂耳。各地所流行者，頗不相同，故無怪各封土間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同上）

單就歐洲而言，各地所流行者既頗不相同，各封土間既

各有其特異之習慣，則封建制度一辭的實際含義，就頗費解釋了。在歐洲如此，在日本如此，在中國亦如此。吾人如欲執此因時因地而異其含義之抽象術語，以繩墨中國社會，自無怪主張中國社會尚為封建社會者，振振有詞，而力說中國社會為非封建社會者，亦言之鑿鑿也。因此，吾人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單在字面上解釋，必進一步考察該制度在各該社會所形成的實況。歐洲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知道了，然後返觀中國古代之封建制度，比較其異同，參驗其變遷演邇之跡象，庶可瞭然於封建制度之本質，而尚論中國現代社會。

三 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及其崩潰

歐洲之封建制度，係發生於西羅馬帝國之廢墟上，而以兩種不同的形式呈現出來。第一，當西羅馬帝國崩潰時，時局混亂，匪盜橫行。個人之生命財產，無保障。由是人皆迫而依附較己為強之人以自保。蠻夷之酋長，強大之主教，羅馬舊時之官吏，竊位攬權之奸人，擁有土地之地主及世家望族等，皆成為時人依附之中心。其他若自由民或墾地褊小之貴族，則選擇較若輩為強大者而附屬之。諸侯之附庸益衆，

則其保護之能力益強。保護者與隸屬者之自然結合，發達極速而成爲一種制度，是卽所謂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在蠻族侵入西羅馬帝國以前，此種制度已在高盧境內，頗有進步。不過，一種體制完備之封建制度，則是見於法蘭克人侵入高盧以後。

第二，當九世紀時代法蘭克人已成爲高盧的征服者，其王乃以征服地大部分劃歸自領，而將殘餘部分分給有功諸臣。其後阿剌伯人來侵，王權日趨衰落。時有執政大臣加爾·馬丁，鑑於阿剌伯人之侵擾不已，乃改革王國之政治組織及軍事組織，以王畿領地大部，分封功臣。受封者的義務，於平時則練兵養馬，戰時則爲王効忠。在當初裂地分封時，封土原非世襲，迨王權侵削，世襲遂由僭領而演爲慣例。王以國土分封國內大諸侯，結爲君臣關係，大諸侯又以封土分給其下級者，結爲隸屬關係，推而至於僧侶，亦依樣畫蘆，分割其寺領。於是封建制之範圍擴張，而其體制乃漸臻完備。

不過，在這裏，我們應知道：封建的體制，雖然是這樣秩然不亂的，組成了一個體系，但實際的情況，殊不如此。各諸侯間，各領主間，各僧侶間，排擠離合之狀，實司空見慣。小侯不能自存，以領土貢獻君主或大諸侯，而結爲君臣關係者

有之。僧侶不能自存，以寺領拱奉貴族，而結為隸屬關係者有之。加之，畜牧部落一經進入了原始封建國家，經濟的分化，便因領土的定住和私有制度的成立，而益加顯著。這時，因為地廣人稀，每個人尚不難由廣漠的未墾土地中，盡量取得他所必要，所願得，所能耕的數量。唯其如此，所以當時鬥爭也，分讓也，攘奪也，雖說是爲了土地，同時還更是爲了農民。農民粘附於土地之上，從事勞作，有了農民，領有者爭奪的目標即地租，纔可由土地生長出來。不過這所謂農民，不是自由取得土地，自耕而食的自由人，而是一般不能取得土地所有權的僕役奴隸，和擄掠回國來的無土地的農民。所以奧本海末爾說：“公侯帶領有僕役及奴隸……但是僕役奴隸們是沒有法律地位的……他們不能夠取得土地所有權。但因他們必需土地以爲生，他們的主人便替他們取得土地所有權，使他們定居於其上。其結果，游牧部落的公侯愈富，則他們所變成的土地領土愈有權力。”又說：“從此以後，封建國家的對外政策，不復趨向於取得土地與農民，甯趨向於取得無土地的農民，擄掠回國以爲農奴而重新移植之。”（見陶譯國家論一三八——九）農奴愈多，則所收地租愈多。地租愈多，則愈能畜養戰鬥的扈從，而增大其勢力，而兼併其他

的封領。總之，封建制度就是在推行甚廣，形式上極稱完備的時候，大役小，強凌弱，割讓兼併之事，猶層出不窮。無怪大英百科全書上說：“封建制度雖在極發達之時期，亦絕無系統之可言。”

這制度在歐洲，以第十世紀爲其極盛時代。法蘭克國開端於前，繼而行之者，有德意志，意大利，西班牙等大陸諸國。此後還推行於英吉利。然自十字軍興，社會經濟方面發生根本變動，而各國封建制度，亦遂因而崩潰。吾人夷考當時封建制度崩潰之原因，蓋不外下列各端。

第一，封建諸侯領主，跋扈專橫，入民不堪其剝削侵擾，正待乘機起而反抗。

第二，諸侯領主勢力日盛，國王時時感到威脅。爲要抑制領主，恢復王權計，國王遂利用當時國人嫉惡領主之心理，竭力扶植其勢力，使與領主對抗。凡以前給與領主們的種種特權利益，現在轉以給與有組織有力量的人民團體——特別是市民團體——由是領主之勢日蹙。

第三，十字軍興，一般流氓無賴，不重朝而變爲騎士，品類不齊，騎士之聲譽乃大減。加之，軍興不已，領有封土之諸侯騎士，乃不得不迫而出賣其封土於普通人民，結果，封建

之基礎，遂發生根本動搖。

第四，封建之支柱，爲具有戰鬥力。能捍衛封圍之騎士。自第十四世紀火藥銃炮發明，騎士遂頓失其在社會上之地位。從而封建制度就不免因騎士失勢，而益形薄弱其存在之基礎。

第五，十字軍就一方面言，雖爲破壞的，而在另一方面，却又爲建設的。因爲大規模的遠征軍，由西方一再運往東方，東西的交通，從而，東西的商業，乃際遇時會，而有捷足進步。富之蓄積增進，交通貿易發展，於是工商階級之勢力抬頭，而封建制度之弔鐘響矣。

歐洲封建制度發生發展及其崩潰之情形如此。現在且進而考察日本封建社會之實況。

四 日本封建制度之始末

日本之封建局面，始於源賴朝之開鎌倉幕府，而終於德川幕府之倒壞。前後蓋經歷七百餘年。不過，在德川時代以前，史家稱爲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而稱德川時代，爲集權的封建制度時代。

日本封建制度之確立，表面雖說起於源平二氏之政權

爭奪，究其實，要不外由於社會經濟狀況，已發生了根本變化；政治方面之動亂，不過指示經濟進路上又碰着障礙罷了。

日本古代施行氏族制度。皇族爲一最大而最尊貴之氏族，以天皇爲之長。全國佔有相當土地，擁有相當奴隸，而爲史家稱爲部落之大氏小氏，則均受治於天皇。往後，因時勢推移，各氏族利用奴隸，開拓新境，同時，大氏又兼併小氏，其勢益張。爲挽救此混亂局面，遂有大化新制之頒布。新制禁止土地私有，解放技術奴隸，並將身分與官職區別，簡派國司郡司治理地方政務，是即所謂郡縣制度。郡縣制度實行的結果，國司郡司因遠離朝廷，且乘國家多事，乃私自豢養奴隸，私自墾殖土地，一時地方豪強及中央權貴，尤而效之，卒乃開莊園之風氣。莊園有大有小，大者兼併小者，小者依附大者，私相割讓吞併，無有甯日。結局，朝中最有身分最有勢力之貴族藤原氏，乃得從容統一宮廷諸貴族之莊園。並憑其守衛武士，對於地方豪族大張撻伐，於是強者被鋤，弱者請附，天下莊園，儼然由藤原氏造成了一統一局面。而同時國司郡司輩在各地無情的榨取，人民生活不得，乃相率棄離鄉井，流歸那些以藤原氏爲中心之權門的莊園。就這樣，他們成爲自由勞働者了。一方面開墾荒地，一方面耕作熟田，

較之屈伏於國司或地方官吏之下，不知道要自由好多，舒服好多。這樣一來，國司支配的戶口，既日益減少，公田也就一天一天疲敝起來，由是，以奴隸為中心的經濟組織，完全解體，而以土地為中心的經濟組織，乃逐漸形成。不論是中央權貴，或地方豪族，他們再也不甘心沒有勞働者可用了，所慮的，是土地搶不到手。所以，從經濟的觀點說，氏族制度郡縣制度的基礎，是奴隸資本制度，而封建制度的基礎，則是土地資本制度。土地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既徐徐起而代替了奴隸資本制度的生產形式，而孕育於氏族制度郡縣制度母胎內的封建制度，也就必然要應時脫穎而出了。

不過，在土地資本制度發達的初期，封建制度的實體，也不見完固。所謂分權的封建制度時期，嚴格說來，不過郡縣制度轉到德川集權封建制度中的一個過渡時期耳。日本封建制度之完成，實始於德川時代。

德川氏封建制度下之支配階級，全為武家。就中如幕府，如大名，如旗本，御家人等，要皆為支配階級之中軸。此外，相當於歐洲騎士地位的，還有一般武士，或即所謂藩士。

德川幕府，實為此等支配者中之支配者。從社會的立場說，這幕府就算是日本邦土中的大國家，大盟主或霸者。從

經濟的立場說，牠又是大地主，大產業管理者。至若相當於諸侯地位的大名，牠亦有其特異的支配權，牠是次於幕府的國家，大地主或產業管理者。

就法律的觀點言，德川氏不過一官吏耳，其上尚戴有天皇。但考其實際，德川氏實全國唯一的支配者。關原大勝而後，全國大名，皆俯首唯命是聽。以前一萬石以上之大名二百一十四人，總石額爲一千八百七十二萬三千二百石，德川家康乘戰勝餘威，削去大名二十六人，併減少總石額一百四十五萬一千一百石，而幕府所領，則由二百五十五萬七千石，增加至五百萬石。幕府之勢益大，而諸侯浸削矣。計德川氏掌幕僅二百六十餘年，大名(舊有者及新封者)因種種口實失脚者，已有二百八十九家之多。可是，德川氏一方面雖發揮威力，使集權封建制度有很好的成就，無奈封建制度崩頹的徵候，却正在這“很好的成就”中，呈現出來了。這種徵候可得而言的，約有左述各點。

第一，在封建制度下，以土地爲唯一生產資本，以農業者爲唯一生產階級。農業者的運命如何，封建制度便直接蒙其影響。德川氏柄政以後，對於農事所採的是一種農業本位政策，而非農民本位政策。農民的大業，祇在耕田出賦。國

家財源既完全取自農業方面，所以使農家為盡此義務計，舉凡農事以外的一切知識，農民素朴生活以外之一切享受，皆非嚴厲禁絕不可。農民陷在這困苦壓制的境地，又益以不時的兵災水旱和過重的剝削，所以，不得不離鄉別井，或流為浪人，或成為城市的小工業者，結局，農村荒廢，封建制度乃受到致命打擊。

第二，在莊園發達期內，各莊園領有者，皆於適當地方，建築堡壘，以備敵侵攻。嗣後強吞弱，大兼小，領有之範圍愈擴，而領有者駐節所在，不獨為其勢力集中之地，且為一般經營小商業小工業者輻輳之所。積之以漸，而都市興焉。又，前述備受壓迫，以致離棄農村之農民，大都皆麇集於市鎮。市鎮人口增加，從而，小商業者小工業者需要的增加，一方而鄉村棄業者，固可得到出路，而同時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亦漸有發達機運矣。

第三，各城鎮各市集之商業增進，結局，勢必要擴大商業範圍，使各城市間交互進行貿易。特交通不便，和對於金錢剝奪的障礙，往往不免令一般商人裹足。為解除此困難，適應此需要計，於是國內金融匯兌制度發生。此匯兌資本制度，合前述商業資本制度，高利貸資本制度，而概稱為貨幣

經濟制度。貨幣經濟制度興，土地資本制度，乃不得不由變動而趨於崩潰。加之，

第四，封建制度之支柱，實爲武士階級。武士以義勇精神，爲幕府諸藩効力，幕府諸藩則贈給其生活，以資酬報。德川氏中世以後，藩府之財政，異常窮乏，益以農村凋敝，賦稅無着。於是武士輩之生計，乃因而發生問題。這時，農民窮，藩府窮，告貸無門，勢不得不低頭於他們素所賤視的町人階級之前。町人階級不獨是武士的債權者，且爲農民乃至藩府的債權者。他們生活闊綽，趾高氣揚，而一向尊貴，榮譽，莊嚴的武士豪貴，却反而相形見絀，暗然無光了。社會的視聽，都集注到了町人身上，從而，社會一般的傾向，也就無形離開了古舊的達官貴人，而竭力把自己變做此新興資產階級之一員了。

第五，到了德川幕府末造，內患外憂紛至沓來了。爲要安輯國內的災黎，爲要鞏固邊防的軍備，財政遂愈加不可收拾，而一般武士的生活，乃愈益陷於絕境了。要打開這當前的難局，一部分下級武士們已覺到非別圖發展不可。所以在勤王倒幕運動當中，他們一方面順應當時的大勢，一方面依着町人階級的支援，居然成就了那回天偉業了。

綜上五點，要不過說明了一件事實，即，在土地資本制度母腹裏，既逐漸孕育好了貨幣經濟制度——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匯兌資本制度之總稱——所以時機一到，建立在土地資本制度上的封建制度，就不免隨其下層建築——土地資本制度——的崩潰而倒塌下來。因為伴隨封建制度而發達起來的生產力，已與這種生產關係發生矛盾衝突了，換言之，原來促進此生產力的生產關係，現在已反過來成為其發展的桎梏了。當着這種關頭，要想生產力橫受桎梏是行不通的，唯一的出路，祇有讓那能夠容納而且促進此生產力的新生產關係——資本主義制度——來代替這舊生產關係——封建制度。

日本的封建制度，就是這樣依着必然的經濟法則而崩壞了的。

五 中國封建制度之分解

中國的封建制度，自何時始，至何時終，這個界線不劃分清楚，必無從把捉住中國封建制度的真相。但要劃分這個界線，又不免惹起許多爭論。因為有的人說，中國封建制，起於黃帝時代，周之封建，不過折衷夏殷諸代而定妥的吧了。

日本高桑駒吉云：“中國之封建制，據云起於黃帝之時。黃帝之爲天子也，大約一面令那些歸服了的各部君長使各安於其舊領土；一面對於那些有功勞的，各各分給以征服地。於此，我們纔認出了封建制度來。世言舜定羣后朝覲之制，又言夏禹王爲塗山之會時，執玉帛者萬國，又言武王伐紂時，諸侯之來會者八百，那麼，我們便可知道唐虞夏殷之世，也是在行封建制，所以中國的上世，封建制已行得很久。周之封建，是折衷夏殷遺制而定妥的。”（見李譯中國文化史第三五——六面）此說當否，容後再行論及。而在另一方面，現在又有人說，中國迄今還是行着封建制度。若是，中國自古至今，就澈頭澈尾是一個封建的國家了。爲避免理論的混淆，我關於這點，也暫不欲置辯。言中國封建制度，以見於周室者爲代表，更進，以周室施行的封建制爲標準，來衡定周以前是否有封建制存在，周以後是否尙爲封建社會，我想，這總該是可以的吧。而且，要把中國的封建制度，與歐洲和日本的封建制度比較，也非先提出一個標準的中國封建制度不可，換言之，說是非對於周之封建制度，加以檢討不可。

周武王伐紂成功，即位天子後，乃採用封建制，大封宗室功臣及前代帝王之後。其制，係將諸侯分爲公，侯，伯，子，

男五等的爵位。公侯與以方百里之地，稱大國，伯與以方七十里之地，稱中國，子男與以方五十里之地，稱小國，不滿五十里者稱附庸，使隸屬於大國。大國置三軍（每軍一萬二千五百人），中國置二軍，小國置一軍。又中央地方千里，是爲王畿，以充王官之采邑。計大國九，中國二十一，小國六十三，凡九十三國，而畿外五國爲屬，二屬爲連，三連爲卒，七卒爲州，天下共分九州，州有伯，卒有正，連有帥，屬有長，使之制馭地方，故周之初期，有謂諸侯之數，凡千八百國云。

周室把全國土地，依着這個制度分給大小諸侯。但各諸侯對於其所轄境內的人民，保有怎樣一種關係呢？申言之，人民是在那種形式上對於諸侯曲盡其課加的義務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周之田制及其稅法，窺知一個大概。

田制在夏殷以前，無可稽考。太古時，田野未闢，人民各自開拓其土地，故土地或係私有。此後不知在何年代，土地悉收入官，然後再轉貸與人民，於是納貢賦而班田收授之制以起。夏行貢法，以田五十畝爲一間，以十間爲一組而授之十家，使各各上納其五畝之收穫。殷採井田制，行助法，將一區七十畝之田九區卽六百三十畝，區劃成井字，以中央的一區爲公田，其餘皆作私田。凡八家，則與以一井之田，使共耕

公田，而以其收穫上納。至周，乃折衷夏殷之制，而行徹法。其法與殷大概相同，不過周之井田，每區爲百畝，每井爲九百畝。人民年二十，則受田百畝，至六十乃歸還其田，次子稱餘夫，年十六即受田二十五畝。田制之崖略如此，再看其稅法。

周之稅法，有種種名色。其由公田收穫納入的，稱爲粟米之征；別有令納絹布若干的，稱爲布縷之征；又每年使用人民爲夫役，則是力役之征。此外又有所謂山澤之征，漆林之征等等。這一切稅收，都是人民照例貢獻諸侯的。

中國歷代法制，以周爲最完備。其關於封建設施，若網在綱，秩然有序。吾人今日看來，猶不能不承認其嚴密而整秩。但制度之體制雖如此，實行起來究是怎樣呢？

西周盛時，王權大張，所謂封建制度，一時或曾如實施行。然武王封分之後不久，其親弟管叔蔡叔即輔紂子武庚以叛，弄得周公居東三年，方始蕩平。這是成王時事。成王之後爲康王，康王之世，海內尙稱乂安。可是一到昭王穆王，周室就開始衰微了。厲王爲國人所逐，幽王爲犬戎所弑，王權之失墜，已可見一斑。陵夷至於平王，竟因戎狄的威逼，而東遷洛陽了。不過，王室雖然一天微弱一天，有些諸侯，却正乘

着王室日微的機遇，一天一天的強大起來了。周之初期，諸侯差不多有一千八百之數，到了春秋時代，大併小，強兼弱，看看只剩下一百六十餘國了。往後，周室益加不振，諸侯就益加攘奪兼併得厲害。以子爵僭稱王者有之，以侯爵降爲男者有之，降及戰國之世，所餘者僅七強國及二三小諸侯而已。前此謹嚴之封建制度，早已完全破壞無餘了。

不過，周室之衰，雖不免予衆諸侯以兼併攘奪之機，致封建制度趨於崩壞，但周初千八百諸侯，至春秋時只剩百六十餘國，至戰國時更只剩七國的這個迅速遞減過程，就王室集權的封建制度說，雖在日益崩毀，可是就諸侯分權的封建制度說，却又無妨說是在長足的發展。由千八百國併合而爲七國，其勢力膨脹，該是何等雄厚。然而這種“成也毀也”的經過，都是表面的，限於政治方面的現象。若一探究當時社會經濟變遷之實況，我們就知道封建制度之不能維持，那是有牠必然的命運的。現在且就左列諸點，加以說明。

第一，周之封建制度，是以一種特殊的土地制即所謂井田制度爲基礎。井田制對於封建制度有幾種作用：一，土地公有，按人分配，農民乃不致因過富過貧，離去鄉井，使諸侯賴以生存享樂之稅收無着；二，獲取公田收穫，作爲粟米之

征，乃最省事之稅法。三，周之兵制，即以井田爲準。比如王畿地方千里，約可得井田六十四萬，即一萬甸（六十四井爲一甸）。而方里爲井（八家），四井爲邑（三十二家），四邑爲丘（一百二十八家），四丘爲甸（五百十三家）。當徵集時，以丘與甸爲基礎，則丘出戎馬一匹，牛三頭；甸出兵車一乘，戎馬四匹，牛十二頭，甲兵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人夫二十五人，總計凡百人，故天子有兵車萬乘，號稱萬乘之君。所謂千乘之國，百乘之家云云，要皆依此計算。總之，井田不獨爲封建諸侯所託命，且能在徵兵取稅上，給予封建諸侯以極大的便利。然自兼併攘奪之局面成，井田乃日趨破壞。下逮戰國，魏李悝昌言盡地之力，秦商鞅更乾脆的廢井田，開阡陌，各國尤而效之，於是井田之制蕩然，而封建之步調亂，封建之根基動矣。

第二，不過，井田制度對於封建諸侯之徵兵納稅，雖有不少的便利。但同時對於封建諸侯任意徵兵，任意收稅，却又似乎成了一個妨礙，所以他們也樂得把這種制度破壞完事。可是，井田制破壞之究竟的結果怎樣呢？其一是封建諸侯對於其被剝削者農民的直接榨取關係，開始隔離，在他們兩者中間，插入一個專以聚斂爲事的中間層，有如陪臣宰官

之類，往後，封建諸侯的兵力財力，就完全操在這般人手里了。他們一有機會，立刻就能夠把封建諸侯推翻。三家分晉，田氏篡齊，都是基於這種事實。此外，還有一種結果是：諸侯間無有止息的戰爭，固然怪不得他們對於布粟之征，力役之征，分外強制的苛求，但井田制既壞，那些陪臣宰官對於農民的苛求，就加倍厲害了。因為，他們一方面要多徵多收，以取悅於其主人——封建諸侯——同時又要多徵多收，以為自己中飽。這樣下來，農民除了死，就只好跑了。所以“壯者散之四方，老弱轉乎溝壑。到後來，諸侯輩的錢糧兵馬，也無出處，秦之得以兼吞六國，這當然是一部分原因。

第三，封建諸侯們的相互構怨，相互混戰，爲了什麼呢？很顯明的，“關土地”，或者“爭地以戰”，“爭城以戰”。“有土此有財”，這是他們的口號。不過，依我想，春秋時代的戰爭，主要雖是爲了土地，到了戰國之世，小國變成了大國，對於土地一層，似乎不甚急切。要緊的還是耕植土地的農民。當時載籍，雖不見“爭民以戰”之文字，但各國諸侯對於“民”的要求，却是非常緊迫。梁惠王問孟子說：“寡人之於國也，盡心焉耳矣，河內凶，則移其民於河東，河東凶亦然。察鄰國之政，無如寡人之用心者，鄰國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

多，何也？”由這一問，我們就知道他是在如何努力“爭取人民”。孟子是一個頂會觀風講話的人，他很了解各國國情和時君心理。他不論見了梁惠王，齊宣王或滕文公，總是大講其保民的仁政。並且鼓勵時君說，王欲行仁政，則“民之歸之也，如水之就下”，或者：“耕者皆欲耕於王之野，商賈皆欲立於王之市，行旅皆欲出於王之途，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愬於王”（大意如此，記不清原文——南）總之，當時諸侯，已十分感到無民之痛了。但他們欲固其封圉，或欲闢土地，又只有盡量搜括現在的農民。農民日益減少了，他們的搜括却並未減少，甚且要增加。結局，民益窮，財益匱，待到變法圖強，休養有年的秦兵一來，封建諸侯的命運，就於是乎終焉。

第四，封建諸侯們無止息的爭奪戰，對於農村雖破毀備至，但對於商業，却有不少的貢獻。這可以從幾方面來說。一，封建制度的社會，最重等級。左傳昭公十年，芋尹無宇說：“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皂，皂臣輿，輿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又管子云：“士之子恆爲士，農之

子恆爲農，工商之子恆爲工商。”這種階級制度，不僅決定了一個人本身的命運，並且連其子孫的命運也決定了。我們知道：封建社會是重農輕商的。商人的地位，當可想見。但自諸侯輩爭奪起來之後，存亡興替，就沒有定準了。昨日的公侯，今日說不定變成了窮光蛋，今日的窮光蛋，明日說不定要成爲大人物，餵牛的甯戚，賣作奴隸的百里奚，鄭國商人弦高，不都跳上了政治舞台麼？總之封建的階級，是漸漸打破了，一向被人輕視的商人，這才抬起頭來。不過，徒是這種心理的改變，還不夠促進商業。二，古代商業，都爲現物交換性質。迨封建之局面成，百里一大國，五十里一小國，國境的限制，又加以交通的障礙，所以商業只限於小的範圍內，頗難發達。自各國兼併起來。國境既經擴張，商業範圍，亦隨之拓展。而且軍事對於促進交通，甚有效力。交通便，範圍廣，商業游刃有餘地了。加之，三，當時農民被迫離鄉者，一部分死於溝壑，一部分變爲匪盜乞丐，還有一部分則麇集城市，借點小資本，經營小工業小商業。城市人口集多了，且爲浪費的統治者駐節之所，無怪商業很快的發達起來。商業資本的膨脹和高利貸資本的流通，那已經表示封建制度所由建立的土地資本，失其原來的作用了。結局，封建社會的解體，就

成了一種必然的現象。

上述四點，我看，已夠解說周代封建制度崩潰的原因了。在根究中國資本主義，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並確認中國現代社會，是否仍爲封建社會之前，我想先把中國的封建制度和歐洲日本的封建制度，一加比較。

六 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日本封建制度之比較

歐洲的封建制度，日本的封建制度，中國的封建制度，其成立，發展乃至崩潰的軌跡，我們已在前面分述其梗概了。現在要大略加以比較。怎樣比較呢？先抽出這三種封建制度的共同點，然後再看中國封建制與日本封建制，有什麼不同，又，中國封建制，與歐洲封建制有什麼不同。比較的結果決定了，再進而論中國資本主義制度，爲何不隨封建制度崩潰而發達起來的原因，這樣，我覺得是一個必應遵循的順序。

(1) 三種封建制度成立，發展及其崩潰之共同點。

A. 在體制上雖然完整，在實行上則非常混亂，這是三種封建制度大體相同的。

- B.三種封建制度，均建立於土地資本制度之上，而以土地資本爲其經濟的基礎。
- C.領有土地者，均圖擴張領地，增加收入。所以相互侵攻，演成混亂局面。（不過，德川柄政以後的日本封建局面，略有不同。）弱者受併於強者，強者又受併於最強者。
- D.戰亂不已，剝削榨取益甚，農民或農奴不堪其苦，乃相率離棄鄉井，結局，農村荒廢，剝削者亦慘遭打擊。
- E.封建制度成立之始，最重等級，以後戰亂相尋，興替日有，於是等級之制蕩然，而封建制之支柱又折了一個。
- F.在社會多事之秋，農業雖然破產，商業却緣以崛起，（原因均見前，茲不復贅）。默化潛移，貨幣資本制，已暗中代替了一向土地資本制的重要地位。封建制度於是乎告終。

（2）中國封建制度與日本制度之相異點。

- A.中國周代以前，如夏如殷的牧伯羣后，略與日本氏族制度下之氏族相當。但中國至秦廢封建而爲郡縣，日本則是由郡縣制改爲封建制，往後又廢藩置縣。

- B. 日本封建制之發展，是由分權的，趨於集權的，反之，中國則是由集權的趨於分權的。所以日本封建諸侯，漸爲幕府所削弱；中國封建諸侯，則因兼併而益大。
- C. 日本保衛封建諸侯的，有分地食祿的武士階級；中國封建諸侯之武力，則是由徵集而來的民兵。
- D. 日本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是稱爲大名，旗本等的武家，他們直接與農民發生關係；中國封建制度下剝削農民的，在前也是封建諸侯自己，往後井田制破壞，他們就不能不把這麻煩的職務，委託其代理人了。大約所謂‘宰’，所謂‘陪臣’，就是指着這些傢伙。
- E. 日本封建制破壞，外人勢力侵入，加了一番刺激或力量，中國封建制之崩潰，則純由於內戰變動的結果。
- F. 日本在封建制度發展中，不但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發達，匯業資本亦頗發達。但中國當時因貨幣尙極幼稚，故不聞有匯業資本存在，同時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亦因此大受限制。

(3) 中國封建制度與歐洲封建制度之相異點。

- A. 中國的封建諸侯，歐洲的封建領主，同樣是依存於土地，而吸取農人的勞働剩餘價值。但中國這般勞働

者，是計口受田的自由農民，在歐洲，却是原來的奴隸，和擄掠得來的敵人。因此，歐洲封建制度之經濟的基礎，就是土地制和農奴制。領主的收入，不是取決於其所領地的面積，而是取決於其農奴數。這與中國井田的封建制度，是絕不相類的。

B.歐洲封建制度下，有一個和日本武士地位相當的騎士階級；也同日本武士一樣，他們食祿受土，駕凌於農民之上，而為其寄生剝削者之又一個特殊羣。若中國，則沒有這個階級存在。諸侯們有必要時則徵農入伍為兵；公事畢，兵又返鄉為農。

C.歐洲封建制度之發生，是由於西羅馬崩潰，人民無法律保障，乃羣相依附豪強世家望族以自保，依附者多，保護之力益大，於是形成了一種新的局面，新的秩序，即所謂封建制。若中國之封建制，則是起於天下大定後之一種政治設施，所以歐洲初期的封建制，是分權的，中國周初的封建制是集權的。

D.十字軍戰爭的結果，歐洲的商業範圍擴張到亞洲了。中國封建諸侯不斷內鬪的結果，如前所述，商業是有發展。但在大體上，却仍不免是鎖國的。

.....

在上面，我已把中國，日本，歐洲之封建制度的相同和異點，大略比較過了。現在，我要進而根究：中國封建制度崩壞了，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何以不能接着發達起來？

七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達之 原因

歐洲封建制度崩潰後，接着就是重商主義的天下，商業資本之發達，那是無待細說的。往後重商主義之惡影響，雖曾引起重農學派的反對，但近代式的工業資本主義，却就在重商主義發展的基礎上發達起來了。

其在日本，那種發達是更為迅速的。日本封建制度隨着廢藩置縣而宣告終局以後，她那孕育乃至成就於封建制度下的貨幣經濟制度，不久，就讓渡其支配的地位於工業資本主義制度了。

歐洲由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過渡到工業資本，約計起來，不過一兩百年間事，在日本，這個轉變，竟在幾十年內完全成就了。中國怎樣呢？

如前面所講的，秦併六國，變封建而為郡縣以前，中國

的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不是已有相當的發達麼？固然，“由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所形成的貨幣資本，要轉化為工業資本，在鄉村，會受封建制度的妨阻，在城市，會受基爾特制度的妨阻。”（英譯資本論第一卷八二三面）但中國封建制度既經破壞，基爾特組織又無何等勢力，宜可早速轉化為工業資本國家。然秦後至中英鴉片戰爭以前，歷二千年，仍沈滯淹留於商業資本狀況下，而莫有起色。這原因，國內歷史學家社會學家，曾有種種說明。但我覺得，以次諸點，確是妨阻中國工業資本主義經濟發達的要因。

第一，缺乏外來有力的刺激 歐洲姑不具論，日本之迅速成為工業國家，主要是由於“黑船”之汽笛，驚醒了她的昏夢。她一方面受歐美物質勢力之威脅，一方面又為歐美物質文明所迷醉。所以，一經由衝動而企圖維新，歐美成法俱在，模仿就得了。封建破壞了幾十年，就有這樣的成果，她不能不歸功於西人。中國四境，向為一些游牧部落的民族。他們動不動侵擾進來，搶奪什物財寶。他們是野蠻的，與他們接觸一次，除了一些惡印象外，就是增大自己的傲慢，或者說，助長我們自己不求進步的暮氣。元代馬哥孛羅東來以後，至明時復有利瑪竇艾儒略等踵至，而中國東南海岸，且有葡萄

牙人之經商。不過，那時西洋的物質文明，尚未十分發達，雕蟲小技，實不夠折服我們。總之，中國所以長久停滯於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的狀態的，沒有外來有效的刺激，也算一個要因。

第二，傳統思想妨害自然科學發達 自漢武帝崇尚儒術，罷黜百家以後，中國學術界全以孔子之思想為思想，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固然，推崇孔道，既已是由於當時的客觀趨勢使然，但孔道推崇的結果，却把那種趨勢變得更僵了。孔子不言利，不講力，更瞧不起形下之器，尊孔者遂變本加厲，排斥一切物質文明了。謬種相傳，演為故智。直到明時，大儒紀曉嵐對於利瑪竇之二十五言猶說：“西方之教，惟有佛書，歐羅巴人取其意而幻變之，猶未能甚離其本。厥後習見儒書，則因緣假借，以文其說，乃漸至蔓衍支離，不可究詰。”又對於艾儒略之西學凡說：“其致力亦以格物窮理為本，以明體達用為功，與儒學次第略似。特所格之物，皆器數之末；而所窮之理，又支離神怪，不可究詰：是所以為異說耳。”對於這異說，這位先生又有幾句案語曰：“歐羅巴人天文推算之密，工匠製作之巧，實逾前古。其議論夸詐迂怪，亦為異端之尤。朝廷節取其技能，而禁傳其學術，具有深意。

……”曰‘異端’曰‘異說’曰‘器數之末’曰‘支離神怪’，所以‘禁傳其學術’。不過，我們應知道，這並不是紀先生個人的意思，中國的聖人之徒，全是如此想法。他們對於技術科學，既具有這樣的成見，誰個還肯冒大不韙去研究牠呢？科學技術不發達，工業方面當然難得有何等改進。

第三，沒有獎勵工業的政策 這一點，與前兩者是密切相關聯的。中國統治者的統治術，一向是請教儒者，儒者又老是那一套意見。加之，鎖國幾千年，從沒有一個有力刺激，使其向工業方面注意，所以工業政策這類字樣，從不會在統治者的治國大經中出現過，但發展實業，又非有政府的協助獎勵不可。日本工業發展之迅速，雖說有西洋為其仿效的榜樣，但政府督勵之功，實關重要。獎勵金補助金之設置，實業公債之發行，實業專門人材之造就，保護關稅之實施，銀行制度之改善，舉凡一切便利工商促進工商之事項，無不努力推行。日本之有今日，固非偶然也。

第四，土地投資之普遍化 井田制破壞後，土地之流動性異常之大。經商發財的，做官發財的，苦於錢無用處，只好買土地；農民因兵災水旱弄窮了的，貴族官僚因政變或浪費陷於困境的，若有了土地，就只好賣土地。土地買賣之風盛

行，對於實業發展，爲一個致命的打擊，因爲資本都向土地上，實業方面，就沒有發達的可能。可是一般人爲什麼不肯向工業上投資，却把資本購置土地呢？這因爲是：一，中國社會是常常發生動亂的，而中國戰爭的目標，又多半是在“取城”或“占領城市”，至若城市以外的地方，那不過經過一下罷了，攻者守者，都不在乎。小工業商業都在城市方面，而且工商業的財產，又沒有土地那樣穩妥確實，所以中國商人一發了財，他除了用以放債取息之外，就把大部分資本拿去購買土地，甚至連商業也不幹了。至若利得微薄的粗製造業，儒者固然恥之，商人亦不屑就也。二，土地可以裝飾門面，抬高自己的社會地位。縉紳先生是要土地的，因爲未達時，他可藉此過隱士生活，且可藉此武斷鄉曲。在朝的達官貴人也是要土地的，因爲一旦“致士”或下野，便非有莊田別墅無以保持身分。商人的地位，本不大高明，有了土地，他就可伍於儒林，威加有衆。三，中國土地的產出量非常之大，多半的土地，每年可以收穫兩度乃至三度。加之中國統治者對於農田水利，向頗注意。產額加大，地租必多。有利可圖，無怪人皆樂於投資土地。四，在中國，高利貸的風習，與購買土地的風習，同樣普遍。究其原因，這兩者實有相輔相成的關

係。因為購地收租，即可抽出高利貸的資本，高利貸的結果，借方——一般農民及少數窮貴族——愈益貧困，卒至以其土地作為抵償。達官貴人——中國達官貴人放債的事例頗多——商人，都是有錢出借的，所以他們結果都成了大小地主。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與土地投資資本紐結一團，對於工業發展遂成了一個有力的阻礙。

妨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原因，或不止此，但主要原因，總不外這幾點。

八 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 之無根據

要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論證者一定有所根據，申言之，他一定是把過去中國歐洲或日本實行封建制度時代的社會實況，來與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比較，比較的結果，他發現了：今日中國社會的實況，簡直與那時一般無二，至少是大同小異。於是他斷定，中國今日，尚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尚是一個封建社會。

我很盼望他的結論是這樣推論出來的，因為要這樣，我們才有話可說。如其他離開事實，於上述三種封建制度以

外，擬想一種與中國今日現狀相類的體制，而稱之曰封建制度，然後再用以確定今日中國爲一實行封建制度的封建社會：那方法，對於他當然是很有效果的，但對於學理沒有幫助。不幸得很，今日中國竟有許多歷史學家社會學家在採用這種方法，所以論來論去，總沒有抓住要領。

歐洲有歐洲特殊的封建制度，日本有日本特殊的封建制度，中國亦有中國特殊的封建制度，這，我在前面已比較過牠們的同異了。歐洲人日本人以他們各別的封建特型爲根據，來考察今日中國的社會，並指證今日中國尚有封建制度存在，那也許有他的理由，或者有他的必要，用不着管。但生而爲中國人，照理，總得把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來做根據吧。況且，即使抽扯東洋西洋所有封建制度的特徵，來比附中國現代社會的實況，那除了張冠李戴之外，也是一樣柄鑿不入的啊！

現在，姑且假定一切中國社會之尙論者（無論中國人或外國人），都於中國古代封建制度有相當認識，都是以中國古代封建制度爲根據。但推論下來的結果怎樣呢？在我想，他們總該承認：今日中國實沒有封建制度存在，今日中國的社會，並非封建社會。如其他們硬抽出了相反的結論，那，我

就只有驚怪，只有說他們沒有根據。

中國古代的封建制度，我在前面已論述其大概了。此刻，我還想就其主要特徵補述幾句。

孔子刪書。斷自唐虞，唐虞以前，是無可徵考的。但由唐虞以後至西周之初，那又是完全靠得住的麼？關於這點，現在正有許多學者在懷疑；從而，周初那個秩然有序的封建制度本身，究否存在過，實施過，也就發生問題了。不過，為避免理論支離起見，這裏無須談到此點，還是依着史籍，把那當作實有其事的好了。

前面講過，所謂封建制度，就是以土地資本制為基礎，申言之，就是以土地領有者對於其所隸屬之土地耕作者的榨取關係為基礎，而形成的一種政治組織。在這種意義上，無論是中國的，歐洲的，乃至日本的封建制度，都說得通。不過，中國封建制度，不同於其他封建制，特別是歐洲式的封建制的地方，却也正可從這裏看出。歐洲的封建制，是完全建立在土地制及附着於土地制之農奴制上面。農奴沒有自由，不能享有土地所有權，更不能離開土地：他簡直是定着於土地的一個特殊機能，而不像是人。農奴由土地收穫多少，都是屬於領主的。除了領主許與他的最低生活費之外，

他不能取得一點。所以，領主對於土地支配權的大小，不決於土地的面積，而決於農奴的頭數。像這樣一種制度，自始就是不人道的，不合理的，那能談到什麼均平。

反觀中國的封建制度，那却比較進步多了，合理多了。中國周代封建制有一種特色，就是：牠的基礎，乃建立在一種頗有理想頗有組織的井田制度上面。如前所述，井田制的神髓，雖然一方面在禁止人民私有土地，同時，並使統治者易收統治之效，但就在這當中，人民也不是全無利益。他們對於其統治者或地主應盡的義務，一是上租，一是當兵。依着井田制，人人對於這兩種義務，就會不偏不倚的平均分擔，而統治者對於享有這兩種權利，也就有所限制，而不能任意加租，任意拉差了。因為粟米之征，只限於公田，而徵集兵夫車馬，亦是按着井田攤派。這樣一來，我們雖不能否認統治者對於農民的剝削，但比較上，總算剝削得合理一點，公平一點。這是中國封建制度的一個大特色，抹視了這個特色，即無從認識中國的封建制度。簡單一句話：中國周代的封建制，是與當時的井田制相為始終的。當時那種封建制實施的範圍如何，實際究竟維持了多久，我們無從稽考，但有一點可以斷言的是：中國井田制開始破壞的那天，即是中國

封建制開始崩潰的那天。井田制破壞完事了，封建制也就隨之告終。至若對於此後漢之分封同姓諸侯，唐之分封藩鎮等等，亦抓住字面形式，稱為封建制度，那就牛頭不對馬嘴了。歷史上一切所謂制度，都有其特殊的經濟基礎。若不問經濟發展變遷之次第如何，只一味羅列比附表面相類似的政治形態，或政治用語，結果，必大遠於事實。固然，在另一方面，經濟條件或社會的經濟關係無大改變，亦不容以某種政治形態表面的更動而遽認其實際情況之變遷，但一種政治形態，如果完全建立在某種特殊經濟組織上，那種組織崩潰了，我們就無從斷定其上層建築的政治形態之依然健在。是的，周室分封諸侯，致釀起春秋戰國割據，兼併，混亂的局面，此後西漢分封諸侯，西晉分封宗室，唐代分封藩鎮，都會或大或小的演成頗相類似的混亂，迨至民國，因開國時各省置有都督，卒乃有今日這個場面，這分明是一貫的封建制度的作祟。不過，我們對於周以後這歷代的政治花樣，如果硬要稱牠是封建制度，那也不妨，因為人各有運用名辭的自由。可是在運用這名辭時，應當表明那是與周代封建制度截然兩樣的東西。周之封建制度有井田制做牠的經濟基礎，而周後歷代的分封，則只限於一種政治設施。周初受封的公侯伯

子男，對於其領地的農民，是統治者，亦是地主；若此後由歷代分封的王公藩屬，不獨沒有地主資格，有的且連政治統治者亦說不上。這原因，這區別，就是由於封建制度，是以土地制為基礎的。徒徒君臨於一定面積土地和一定數人口之上，而於土地人民不發生直接的緊密關係，換言之，他的生活，不是由其所領土地直接上租供給；他的兵力，不是由其所轄人民直接抽丁充當，那很顯明的，他頂多不過是統治人民的大官吏罷了。爲了擴大統治的範圍，爲了增進實際的支配，他也戰爭，掠奪，傾軋，但他勝利了，掠得的土地，却非他的私產，土地仍是人民的。他也向人民榨取，剝削，乃至壓迫，但人民對於他的孝敬，早變却方式了。不是上租，而是納稅。總之，我們討論封建制度時，當特別留意其經濟基礎；經濟的觀點拿準了，就知道周之封建制度，早隨井田制破壞無餘了。至遲，秦以後就全沒有封建制度存在。然而現在竟有人說，今日中國，尚是一種封建社會，並且，他們的根據，都是實際經濟問題上的事實。這是頗值得注意的。

原來這種意見之發生，並不始自今日。所謂‘封建軍閥’‘封建思想’一類術語，早就頗流行於一般文人學士口耳之間。不過，進一步根本的論證今日中國尚爲封建社會，那却

是近年來由蘇俄幹部派發端的。幹部派這種意見，頗為反對派即杜洛斯基派所反對，迄今兩派論爭猶烈。中國思想界受此影響，故對於中國今日社會性質的問題，亦有兩種正相反對的意見。贊成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者，所提出的論據，大抵得自外人，忘却了中國封建制度的特質。而且，即使依日本的或歐洲的封建制度來權衡，亦不免有冒為比附之嫌。茲先將他們指稱今日中國為封建社會之論據，分述於后。

一，就農業問題考察，現今中國農民中，有五成是租借土地。有一畝至二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占全體農民四成九五，總其所有土地，不過全體耕地一成五九。有二十畝至四十畝土地之小自耕農，居全體農戶之二成二七，有全體耕地之二成二八。合而言之，則此兩者占全體農戶之七成三，而其所有地，却祇三成八。

二，中國地主，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他們不獨持有經濟的權力，且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許多省份的農民收入，有百分之七十是屬於他們的。

三，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此種形式，是半封建的社會制度的遺制，與農村資本主義一定的

發展(抵押資本,高利貸資本及商業資本)相織而成。這在中世的歐洲也是特徵。

四,中國現在之軍閥,即屬一般封建諸侯。他們君臨於其所統轄的省份,常為大規模的大地主。為了徵收租稅,他們利用國家機關,及自己的一切權力,強征豪奪,誅求無厭。他們對於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土地不是他們祖宗的遺產,也不是他們的財產,但在實際,他們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為私財。

五,帝國主義商品侵入農村,使中國農村的半自然經濟漸漸破壞,廣大的農民羣衆急劇破產,其結果,一方面促進中國農村中階級之分化,極大多數之農民陷於貧苦深淵,同時發生極少數之富農份子。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維持中國之封建勢力,阻礙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因之,使中國農村經濟停滯於半封建關係之下,致資本主義之發展,極感困難。

上述這諸點,大體上雖屬蘇俄幹部派之主張,(參照新生命第三卷第五號方峻峯先生所著: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但中國主張此說之歷史社會學家,亦多特此為擁護其意見之有力根據。茲特依次逐一批難,以明究竟。

就第一點說，中國佃農對全體農民的比例；中國小自耕農所有地，對全體耕地的比例，實際是否如此，還大是疑問。現在我們就退一步認定這個統計數字是正確的，這於論證今日中國為封建社會有什麼幫助呢？封建制度下沒有‘自耕農’‘佃農’這些名色，耕地者在歐洲是全沒有自由的農奴，在中國却是計口受田的農夫，他們的統治者，同時就是他們的地主。即使更退一步漫然的說，封建制度係以土地制度，即領主對於其所屬農耕勞働者之榨取關係為基礎，一國土地既有百分之五十為地主所佔有，即全土地面積之一半，已結有這種地主對佃農的榨取關係，那末，這個國家就分明是一個封建國家，至少是一個半封建國家。然而要證實這似是而非之理論的不當，我們頂好看看大家公認的資本主義國家的農村實況，就以日本為例吧。根據一九二七年的農業調查統計，日本全國乾田水田總計起來，自耕地為五成四二，租借地為四成五八；又自耕農，佃農及自耕兼佃農對農家總戶數的比例，自耕農為三成一二，佃農為二成六九，自耕兼佃農為四成一九。就日本這個農民農地的統計數字看來，比之前面那個對於中國農民農地任意作成的（也許可以這樣說吧？）統計數字，相去也就有限了。然而我們仍不妨稱日本

爲資本主義國家。況且，其性質，其經濟基礎與領主或封建諸侯絕不相同的地主，就是再多一點，其土地就是再廣一點，我們也不能即此確定一個社會的封建性質。

就第二點說，中國的地主，確係由比較富裕之農民，官吏，商人及土豪所構成，但正惟其如此，就可證明中國土地的流動性；所謂“千年田地八百主”，那正是中國社會土地流動狀況的寫實。地主持有經濟權，那是十分明顯的，地主掌握有行政上法律上的權力，也有一部分是真實的，但即此就能與那既領有其土地，復統治或奴役其人民的封建領主混爲一談麼？

就第三點說，中國通行的地租形式，是現物支付，是佃租制。但資本主義國家日本，現今也還是行着‘米納’的佃租制。況且中國的佃租制，實具有投資的性質。蘇俄反幹部派拉狄克氏說：“中國農民之半數是佃農或半佃農。此種佃租制，不是半封建的佃租制，而是新的資本家的佃租制。大地主是投資農村之商業資本家，商人或官僚。他們以自己的錢，借貸於農村。……在中國投資於工業是很危險的，而投資於農村的事情却很簡單。政府在四年前預徵農民的賦稅，然而農民無處可逃。窮極之農民，不得不向商人借錢。這商

人做了地主，以地租的形式，從農民收取五分六分的利息。（見前托洛斯基派之中國社會論）由這段話，我們可以知道：中國的地租形式，已經不是什麼封建社會的遺制，而是結合高利貸資本商業資本而形成的一種投資形態。

就第四點說，君臨於各省的軍閥，有的確是大規模的大地主，但同時我們應知道，他們不但是大地主，且是大商人，大實業家呢？中國大點的新式公司，規模像樣的工廠，殆莫不有軍閥乃至他們御用屬僚的股份。他們投資土地的動機，與投資實業的動機一樣，牟利而已。他們已經不靠土地來維持他們的身分了。土地到現在也實在不能抬高其身分。況且，他們的土地，也還是購買得的，不是誰個分封給他的。其畝數雖再多，比起他所統治的面積來，那真是九牛之一毛呵！他戰爭，他企圖兼併，但他的目的，與其說是關土地，倒無寧說是奪城市。是的，他對於統治地方的土地，雖沒有合法的領有權，但在實際，他却在不斷把那從土地徵收的稅款，作為私財。不過，對自己購得的土地是收租，對人民自己的土地，畢竟祇能徵稅，收租徵稅在充實軍閥官吏腰包的作用上，雖沒有區別，然而一棍究其來源，那却是一個社會是否尚有封建制度存在的指標咧！

就第五點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後，中國社會確有了根本的變化。其一，以前商人投向農村購置土地的資本，現在轉而用在城市新式的工商業方面了，資本既由農村流向城市，於是舊式的商業資本高利貸資本周轉的形式破壞了，農村由經濟停滯緊縮而陷於困境，農村失業者乃因以加多；其次，因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大開工廠，大投資本發展中國工業，所以舊農村經濟關係破壞下形成的農村失業者，都有了出路，農村過剩的勞働，亦遂隨着資本向城市移動；再，都市工業發達的結果，農村一方面變成了都市工業品消費的場所，同時又是都市所需原料供給的場所。農村對於都市的關係，已經是被動的附屬的了，換言之，中國經濟的重心，已經置重在工商業發達的城市了，土地這種商品，再已沒有前此商業資本主義時代那樣令人垂青；最後，隨着都市工商業的發達，銀行資本勢力，也漸漸扶植起來，金融圓滑的活動，更使帝國主義資本容易向中國排洩，並與中國資產階級的資本，發生密切聯絡。在這種種情形下，我們並不否認帝國主義之侵略，造出了中國農村不少的失業羣，但同時我們也難否認農村失業者，由工業發展所得的救濟。帝國主義者延長中國軍閥的生命，致阻礙中國工業資本之發達，那是事實；

但牠破壞中國舊式商業資本，促進中國工業資本之發展，那也是事實。這誠然是一個矛盾現象，無奈帝國主義本身發展，就是一列矛盾現象的展開呵！

由上面討論的結果，我敢說：論證今日中國尚有封建制度存在，尚為封建社會，那實在沒有根據。中國近世工業資本主義的發展，雖然是被動的，殖民地的，但總不能不說是變相的資本主義；也許說，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頗不普遍的，畸形的，但大體上，全國確是為資本主義勢力所支配，這，我們可以由種種事實，種種可靠的統計材料來解說，不過這裏是討論封建制度，不能多講了。

論證今日中國尚為封建社會的中外學者，每喜歡把‘封建社會的遺制’，‘封建制度之殘餘’，以及‘半封建制度’等話頭，來撐持其意見，但，這已表示他們的自信不堅了。此外，有的學者主張：中國封建制度早崩壞了，但中國封建勢力還存在着。比起所謂‘遺制’，所謂‘殘餘’，所謂‘半’來，‘勢力’二字，當然更有躲閃餘地，但同時也就更有斟酌餘地。因為，如果有人詰問‘封建勢力’是什麼，那恐怕比‘遺制’‘殘餘’還要難得答覆些。而且嚴格的說，如果承認‘封建勢力’的存在，同時也就不得不承認維持此‘勢力’之封建社會的‘遺制’或‘殘餘’

的存在。這一來，反對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便和主張封建制度存在的學者，一鼻孔出氣了。

我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制度，我同樣不承認中國今日還存有封建勢力。

一九三一年，六，一，于東京。

新民法總則提要 蕭志鰲編

本書以淺顯文字，簡單文句，說明關於民法上一般系統諸重要問題，論述公平，絕無偏頗之弊，並依全部條文，次第敘述，在相當範圍內，儘量發揮。且於詳述之中，間多舉例引證，以求實際與理論相調和。

• 本書十萬餘言，誠研究法學者之絕好參考書籍也。

實價大洋八角

(3)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	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債票投機史 英國政府及政治	藍特摩	建光伍		摩特藍自謂，對債券投機，已有廿七年之閱歷，他說他考慮的一宗廣播本關於這個的見解，而著此書目的，在把人類是教讀之以巧的投機的手段，反而暴露歷代投機之事實，所以這是值得特別注意的奇書。
世界經濟概論	格阿	伏雲張		此書係美名政治學教授阿格一九二九年之最新權威著作。都五十萬言，詳述英政府及政治之源流及變遷，直迄去年為止。條分縷析，蹊徑獨闢，乃研究現代民主政治者必讀之書。
地租思想史	高島素之	南亞王		地租 (Rent) 問題不獨是馬克斯經濟學說中最艱深最困難的一部分；尤其是經濟政策，農業問題中，一個最複雜而對爭論最烈的問題。係著者對於日本勞動黨之農民政策表示反對的時候，此書想能給我們無限的意義與參考罷。
藝術社會學	佛里采 (V. Eritsche)	胡秋原		佛里采 (V. Eritsche) 是俄國帝政時代以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家，文學史家與批評家。革命後更以最大藝術學者為蘇俄學界之權威。藝術社會學是他晚年最大作，以其嚴的學風，廣博的知識，卓拔的創造與輝煌的敘述，建設馬克思主義藝術科學的體系，鞏然為斯界之世界的泰斗。

中國官僚政治的殞落

戴行軺

一 緒言

一種政治組織，祇能適應一種的經濟基礎。全時我們也可以說，當經濟的基礎搖動季節，舊的政治組織不得不破壞，當新的經濟基礎樹立之後，新的政治組織也接着成功。這幾句話，就是演繹馬克思的話：“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了社會的經濟的構造，而為真正的基礎；其上則有法制的，政治的上層建築（即上層建築之一），而一定的社會的意

識形態(上層建築之二)又適應于此。”這差不多是我們的至理定論。

在原始社會時代，所成下層的基礎的漁獵經濟，生活是不能安定，因此只能產生民族，代表執行政治的權力。在奴隸社會時代，生活略能安定，代之而興是自由民所有的國家。在原始時代沒有官僚，其執行政權的人們，是氏族集團內選出的負責者，他是對氏族全體負責，罷免之權也掌握着各個人手裏，所以執行政權的不是官僚。在奴隸社會時雖有執行政治的人，實際上就是自由民，是壓迫奴隸的自由民，所以也不是官僚。產生官僚却是在封建經濟崩壞之後。封建國家以農業為基礎的，是其政權的執行是在領主的貴族，他是自己上馬來治理農民的。封建組織搖動之後，貴族的權勢也一落千丈，可是封建階級為着延長生命，不得不借重民間的分子。這上進的民間分子，就是官僚的先身。可是一方面貴族勢力未全衰，還得有勾延的日子。以後的商業資本繼續發展，封建勢力侵蝕完了，貴族勢力也完全勢力，代之而興的過渡國家，稟承着專制君主的使命，官僚的氣燄才日漸高漲，有時專制君主還受他宰制呢！所以說過渡社會是中國官僚政治最發達的季節。直至資本主義上台，官僚才失了經

濟基礎，而漸趨沒落。

官僚爲什麼發生于過渡社會呢？自然有他的特殊背景。因爲“(一)中國的士大夫階級是封建貴族的擴大。其個人生活賴地租，其階級生存賴賦稅，其身分信仰由於階級的獨占。所以士大夫階級一方面和地主有共同的利益，一方面却與生產組織任何利益不同。(二)中國士大夫與庶人間流通性極大。選舉或科舉制度蒸發庶人中優秀分子加入士大夫。與士大夫通婚者及士大夫的近親，常取得士大夫的身分。曾有官階者，無論其由捐買或考試，都取得士大夫身分。士大夫的子孫常繼承父祖的光榮，所以庶人很容易化升爲士大夫。”(見陶希聖：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新生命一卷九號)於是士大夫——就是官僚成功了。別個的社會，多少些和這個經濟基礎不合，所以不易發生的。我們就可以下列各時期爲準則，從有史以來述到今朝的官僚發生及殘黨史蹟。

(一)原始社會時代 (自太古起至殷庚止)

(二)奴隸社會時代 (自殷庚起至周初止)

(三)封建社會時代 (自周初起至秦朝止)

(四)過渡社會時代 (自秦朝起至清鴉片之役止)

(五)資本主義社會時代（自鴉片戰役起）

二 原始社會時代

原始時代的社會是沒有政治組織的。有之不過是氏族，是圖騰。詳細些說，“國家是階級的產物，政治當然是國家的產物。在氏族社會之內，沒有什麼階級，都是各取所需，各任其能的工作着，沒有什麼私產制。因為沒有階級，所以隨着階級而起的政治制度，自然也沒有發生的必要。所以氏族制度社會的下面，決不會有國家的產生，更不會有具體的政治組織。商朝在盤庚以前，所有的情形，大概是政治與經濟組織的不分化，政的首領就是經濟的首領，其行使權力的範圍甚狹，祇限于在氏族之內。不過有武力，有文德的氏族首領，又常駕御好多的氏族，所以有人疑地是國家的帝皇，然按之實際，則相差尙很遠呢！”（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第三卷第九號）

在上面一段事實裏面，我們對於那時的官僚制度，可以作這樣的說明。氏族的分子大概不是衆多，其需要領帶，需要督察，需要分配，固是事實，可是分子的寡少，祇須一個酋長足矣，不必費多少的官僚啊！而政治組織與經濟組織不曾劃

分的原始社會，其組織的需要還在經濟方面，政治的需要薄弱，所以組織異常簡單，祇要一個人就能勝任愉快，用不着多數執政者。何況執政者終是分食階級，他們決不能再幹生產工作，在生產力薄弱的原始社會，怎能豢養衆多的分食階級？其執政者有時揀用老的，一方面是取他有威信，一方面也取他本是分食階級啊！

這種有文德或武力的氏族領袖，管理數個至數十個的氏族的時候，他的管轄的地方既大，管轄的人口既多，一個人的能力于是不配擔當，因此有用人協力的必要。不過這裏的協助統治者，和官僚大不相同。他們有評議會的組織，這裏不是現在的選舉出來的賺錢爲目的的官僚，乃是各民族的首領或族長兼領，沒有什麼公費的，更沒有薪俸的。由評議會所產生的大會長，大多數就是有文德或功武的酋長，是憑着義務，執行其政權，沒有什麼土地，更沒有那時候所沒有的金錢報酬。由大會長所委任的協助執政者，大多數是由酋長，或是有特殊才幹的充任，其報酬也一些兒也沒有，不過有權享受氏族間的分子的生產品。所以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居在“土階”之上，穿着“布衣”吃着“不和之羹”，並沒有什麼奢侈利慾呢！

因此那時候的執政者和協助執政者，都是清廉的，而人選也極其慎重，而協助執政者也極是寡少。所以我肯定的說，那時候沒有官僚的。

三 奴隸社會時代

自原始社會遞演而為奴隸社會，在中國是殷盤庚以後的事，那時候的政治制度，稍見萌芽，國家也已確立。這種奴隸發生于殷時，強大的人無緣的壓迫弱小者，當時國家就成強大者壓迫弱小者的工具。周民族不久由西方殺來，商民族因之結束了生命，外來的周民族自己站在自由民地位，對於原來的商民族，加以力竭的壓迫，因之政治的組織更形需要，國家的基礎方才完全打定了。那時“自由民是政治上的壓迫者，奴隸是政治上的被壓迫者；自由民是經濟上的非生產者，奴隸是經濟上的生產者。自由民因為是非生產者，不得不壓迫奴隸，奪他們的收穫，以供自己的用，由是政治就這樣的決定了。這真如恩格斯在他著作上說：‘在社會內部有了各種利害的分裂，社會自然就發生一種權力。這種權力，最初是以執行社會的事務為目的，隨着社會的內部階級成熟，就變成一種以人的支配為內容的權力。即這種權力

逐漸變化，應於階級對立的構成而為國家權力。跟着生產力之發展，在社會內部構成階級對立的過程，與最初以執行事務為目的的那種權力，逐漸變化成為國家權力的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就是說國家的形成過程與階級的形成過程是同一的過程。’”(前揭拙著)

基於上術的那時候國家的形態，我們可以窺見那時候的執政者與協助執政者的情形。國家起原既是為着階級對立的關係，所以自由民掌了政權壓迫奴隸，要是自由民採取過渡時代的制度，對於協助執政者的官僚不限資格與身分的話，那就是叫奴隸來做協助執政者，你想他願意麼？在這種他不但有損自己的威嚴，並且自己的目的完全背馳了。所以那時候協助執政者是十分的需要，在國土擴大，人民增多的時候，但絕對是不願任命奴隸為官僚。而願把一切都在他們羣中的掌握，一切大小官僚都是自由民。所以這種實是一個貴族政治的先聲哩！

總之：奴隸所有者的國家時代，政權是完全為奴隸所有者自由民的獨攬，對於奴隸取完全的壓迫態度，所以所有協助執政的全體人員，自然不允許奴隸的干政，也就是不允許除了自由民以外的人干政的意思。

四 封建社會時代

下層組織逐漸向農業社會移動了，以畜牧為基礎的奴隸社會便不得不倒塌，建設封建社會以適應經濟組織。這個時代的政治已不是自由民所擅權，而改為貴族所領有了，這就是貴族政體。一方面從政權的形態說是地方分權，是以地方分與諸侯成了封建制度。“在那時候，社會上一切的人員，除了貴族外，都是被壓的。就是他們附屬於他們的首長（小封建主）而有納貢的義務，君長在戰爭時候，須保護他們，在困難的時候須援救他們；而其代價，則為奪取其剩餘勞働，用了力役，或租稅的形式。小封建的諸侯。又是大領主的臣下，一面受其保護，一面則當納貢，有時且須用他的兵力，幫助大領主。有最高的主權，有支配大領主的力量的，便是王或者是皇帝。”（拙著前揭篇）

基於上述的那個國家形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代的平民，還和從前一樣的，是奴隸變態的農奴。國家是封建領主為着壓迫農奴而設立的，所以根本的原則，是不許農奴參加政治，否則農奴為了爭自己的地位，將有有利于農奴的政治設施，要破壞封建階級原來的慾望。所以那時候的政治完

全集在封建的領主上面。我們若再仔細的考察下去，我們將知道所謂封建領主，無論大的小的，公的男的，都代表帝皇的勢力，不是帝皇的子姪伯叔，便是帝皇的外戚，隨着帝皇發難的功臣，和歷代最大酋長的後裔却是絕少，所以那時候的權力雖是分散于諸個人的手裏，可是間接直接都與帝皇關係。封建的領主既是如此，那麼協助執政的官僚，自然不會引用別人家的勢力，祇知道叫別人家耕種，還有教他升官發財的企求麼？所以那時候的政治是貴族政治，其力量比奴隸社會時代高得多了。

那時候的協助執政者，我們總可以看出幾個顯易的事：第一：那時候的職官漸次增添，第二：大權差不多在幾個貴族職官的手裏，第一個我們可以明白那時候的社會漸趨複雜，壓迫階級的需要更屬需要。從前的職官是出為實際上的需要，譬如在舜典的上面，有司空以治洪水，有后稷以獎勵生產，有司徒以布廣道德，有執法的官，有分工的官，有山澤的官，有教樂的官，有說禮的官，有納言的官，這種九種協助執政的都是出於實際上的需要，其人員是絕少的。可是到了奴隸社會之後協助執政的多了，有六太曰：太宰，太宗，太史，太祝，太士，太卜以祀鬼神，有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

司土，司寇，以統治奴隸，有六府曰：司土，司木，司水，司草，司器，司貨以奉養自由民，有六工曰：土工，木工，石工，金工，獸工，草工，製造自由民居宅百物，可見那時候的執政者目的已不在人民身的上了。入了封建社會之後，這種制度還是大體的用着，中央政府設了天，地，春，夏，秋，冬六官，以治理農奴，每官底下用着六十個貴族，所以全組織就需用三百六十個貴族。六官之上，又有三公（大師，大傅，大保），三孤（少師，少傅，少保），這是不理政治的，不過是顧問官。在地方上的官制是這樣的，二十五爲閭，閭有閭胥，百家爲旅，旅有旅師，五百家爲黨，有黨正，二千五百家爲州，有州長，萬二千五百家爲鄉，有鄉大夫。那都是大小相屬，直到中央政府爲止。所以通典上記着唐堯時候祇有協助執政者六十，夏禹一百二十，殷二百四十，（這是依着鄭元的話）到了周代便有六萬三千六百七十五人！其中執政中央的有二千六百四十三人，外諸侯國官六萬一千零三十二人，這真的多呀！這些貴族階級這樣就有出路了。

第二個是協助執政者雖是這樣的衆多，但是政權爲了不至於分散起見，其權力仍是集中幾個有力的貴族。周朝初年其權力差不多都在周公旦，召公奭的手裏，以後周公旦

死了之後，畢公繼起，這都是貴族有力者啊！在這裏我們可以知道那個時候確是一個真正的貴族政治，其原因也是易于壓迫農奴而使之然呀！

自周室衰微以後，成了春秋時代。這個時代是諸侯目無法紀，力竭的攘奪大權。其結果使政治實權淪於貴族的手裏，自己却是東西奔波講究聯盟，締結約章。有時這種貴族得着諸侯的盛命奔波於外，因此結連外國勢力，以為後援。於是諸侯成了尾大不掉的样子。如宋的公族，魯的三桓，齊的陳氏（後改姓田氏），晉的六卿，勢力之大，一世莫能與之京。但宋雖有公族之亂，幸不至滅國，魯雖有三桓的橫暴，幸不至失國。齊國的田氏却是殺了君，執了大政；晉的六卿，也逐出了君，執了大政。在這個貴族勢力極長的時代，自然是有危於官僚的發展。

到了戰國的時代，官僚的命運到了。至于貴族執政却是來了一個大打擊。官僚在那時候大概是由下列數種構成：“（一）貴族鬥爭中的失敗者及其子孫；（二）由商人階級出身者——管仲，百里奚，寧戚；（三）由解放後的農奴出身者。”（梅思平：中國社會變遷的概略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這些分子是這樣的發他展的勢力了：“第一時期，大概都為大

貴族作家臣。……第二時期，大概作地方官吏。因為貴族互相併吞之結果，大貴族的土地非常廣大，不能直接統治，所以不得不派遣地方官吏統治。這種地方官吏，魯國叫做‘宰’，齊晉都叫‘大夫’，楚稱‘公’或稱為‘尹’。……第三時期，則為中央高級官吏。如管仲相齊，以官僚而為卿相，在春秋初年，實在還是少見。孔子以布衣而為魯司寇，在春秋末年也不多見。到戰國時代，則此風大盛。蘇秦張儀范雎蔡澤，乃是最著者。”(全上)可是那個時候的貴族勢力還沒有全衰，齊國的孟嘗，趙國的平原，魏國的信陵，楚國的春申，還是大權獨攬。不過他們為着鞏固勢力起見，不得不招致失意的人們，象養起來。食客數千人的事實，不是在我們的眼簾映着麼？可是他們也不能忘却官僚勢力了。

總之：在封建時代的社會，最初的執政的協助者，差不多完全是貴族。直到商業資本發達之後，貨幣經濟的增加，而形成官僚政治的萌芽。這實是時勢所造，不是人會造成的啊！

五 過渡社會時代

官僚的發達，是過渡社會事。官僚的命運，是隨着社會

過渡相終始。所以我們敘述一部官僚政治的破落，最該注意的是這個時代。我曾解釋那個時代的政治是“士大夫階級取得政權完全是靠他獻媚帝王的本領，最好是倚附新興的集團，替他們天子幫忙，事成之後，論功行賞起來，一定佔了極大的便宜。所以中國的政治，常在‘一治一亂’之下，而不能平平安安的過活。一方面士大夫階級爲着維持自身的利益，對於民衆多方的加以抑壓，民權根本是沒有的。一方面他是不勞而獲的階級，對於農民的剝削是異常利害，田賦徭役是多麼重而且繁，而農民永遠呻吟着。所以士大夫階級政治是一個武力政治，是一個專制政治，是一個階級政治。我們要推翻武力政治，專制政治，階級政治，勢非打倒士大夫階級不可！”（拙著中國政治的進化新生命三卷九號）這個士大夫階級就是官僚，這是從政治上說。所以我們要了解過渡社會政治，第一點就是明瞭官僚。

士大夫階級所以在那一個時代得佔着最大的勝利，也可以用我從前的話：“在封建時代，大小諸侯或是大小地主，就成了官僚，到了秦漢以後更發生了官僚階級。因爲中央政府看見封建諸侯，勢力太大，于自己不利；同時爲了報酬功臣，不得不採用封建制度，因此便設立官僚，以爲實際統治者

一方面又與諸侯以虛名，給以錢帛或少些土地，于是官僚或士大夫階級便應運而生。”（前著）要是詳細的分析起來，那個的原因有兩重，一是屬於統治階級需要官僚，一是屬於官僚需要統治階級：

（一）在封建制度崩壞以後，國家漸由地方分權，進而為中央集權，諸侯的競爭是多麼利害，在戰國春秋的史蹟上是充滿着戰爭的慘景。結果政權却淪落於擁有軍權實力的將領，于是“彼可取而代之”的將領們慾望達到之後，把殘留貴族殺盡了，恐他們的死灰復燃。一方面需要治理萬民，于是引用非貴族的戰士，和智識分子。他的勢力便這樣的存在了。因為官僚是幫助統治階級的功臣，有這樣多的人口，有這樣大的土地，統治階級不是三頭六臂，怎樣管天下之大萬民之衆呢！而官僚則大可以幫助他。如史記淮陰傳侯說：“人有言上曰：‘丞相何亡，如失左右手。’”如吳志周瑜傳說：“丈夫處世遇知己之主，外託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行計從，禍福共之。”如魏書任城王澄傳說：“沖對曰：‘臣既遭唐虞之君，敢不辭元凱之譽。’”又如元史明宗紀說：“天下國家譬如一人之身，中書則左手，樞密則右手也，左右手有病，治之以良醫，省院闕政，則以御史台治之可乎！？”所以官僚是統治

階級的左右手，是同有骨肉關係的。那麼，你想，統治階級有不利用官僚的麼？這是屬於統治階級的需要官僚。

(二)奧本海末爾論述人類求生存的方法，一爲勞働，一爲剝削。(見氏著國家論)官僚階級自然不是勞働階級，而是剝削階級呀！官僚好逸惡勞，人之常情，要是有不織而衣，不耕而食的可能，人家自然會樂於歸從的。史記上載着一個民謠：“倚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真的商人貿遷有無，是很可以給人羨慕的。農人的子弟，終歲勤勞，要是去歸附統治階級，做一個官僚，自然是轉易于剝削階級，這是多麼適意啊！如宋史王欽若傳說：“欽若嘗言：少時過圃田，夜起視天中，赤文成紫微字。”洪邁宏齋隨筆說：“李太白以布衣入翰林。”吳處厚青箱雜記說：“夏文莊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可見所謂官僚除了是世襲的游惰分子以外，大多數都是來於農村。他離開農村是爲着什麼呢？這是沒有什麼明文的記述，但是終是厭棄這個苦孤的生活，現在投諸統治階級可以“安坐而食”，這是多麼的喜悅啊！這是屬於官僚的需要統治階級。

在上面的事實看來，我們可以知道這兩個階級是有互相爲用的，就是統治階級少不了官僚，而官僚也是少不了統

治階級。需要既是這樣迫切，那末統治階級是怎樣求官僚？而官僚是怎樣獲得統治階級的青眼？這裏是很重要的。方岳曾說：“秦漢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帶有立體組織的‘豪族，強宗’。魏晉南北朝時代社會裏面的上級社會層，是由立體組織蛻化而為平面解剖的一個身分，所謂‘地望，名門’。唐宋以後，再蛻化成純平面解剖的士大夫層。此後士大夫身分取得與維持，已漸由與族姓勢力沒有關係。但族姓的勢力可以助長士大夫力量。”（見氏著關於士大夫身分幾個問題新生命二卷二號）其實我們就一般的看來，這不過是屬於一個社會的普遍現象，如重“地望，名門”的社會裏面，固是王謝兩家霸佔勢力，劉備三顧茅廬的事情也會發生，難道諸葛孔明有“地望，名門”麼？在重“豪族，強宗”的社會裏面，固是大族名家嚇然存在，如方岳所舉的例如前漢書游俠傳說：“郡國豪傑……冠蓋相望，亦古今之常道，莫足言者。”但是也會有廿二史劄記說：“漢制察舉孝廉茂才等歸尚書及光祿勳，選用者多循資格，其有德隆望重，由朝廷召用者，則布衣便可踐台輔之位，如……荀爽有盛名，董卓秉政，徵之，初拜平原相，途次又拜光祿勳，視事三日策拜司空，自布衣至三公，凡九十五日。”的現象。所以我說。官僚要得統治階級的

任用，就是統治階級任用官僚的標準是有奴隸的學術，有奴隸的行爲，且待我分別說來：

(一)奴隸的學術是很重要的，在這學術裏面告訴我們怎樣治國平天下的大道理，這種道理要是奴隸之極，才是可得而用，否則如反奴隸的，便該視做洪水猛獸。孔子的學說是極其奴隸，極含有統治階級意義，別的且不說，單就論語中的話：“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趨進，翼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說：“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這是多麼具着奴隸的行爲呀！他所想的學術自然也是極奴隸化。他固夢想着大同世界，可是他倒退一步想出小康世界，這小康世界，就是專制政體。所以歷來的帝王都是崇奉他的學說，就是漢高祖在未得天下時會溺於儒冠，得天下之後便興儒學了。有了這種奴隸學術的人，便會做起奴隸的事情。所以開科取士就是這個意義，得取的人，不消說對於奴隸學術有深養的人，使他們去做官僚，不消說是很得其當。因此唐太宗見了進士列隊歡迎，不禁與高采烈說：“天下英雄，已入吾彀中矣！”唐書賦這種詩的：“舊壘危巢泥已落，今年復向社前歸，人雲大廈無棲處，

更傍誰家門戶飛”的人，自然奴隸欠充分，於是落第了。歷代帝王所以用這類人的原因就在如此。在廿二史劄記東漢功臣多近儒條說：“如：鄧禹年十三能誦詩，受業長安，早與光武同游，學相親附，其後佐定天下，有子十三人，使各守一藝，修整閨門，教養子孫，皆可為後世法。（禹傳）寇恂性好學，守潁州時，修學校，教生徒，聘能為左氏春秋者，親受學焉。（恂傳）馮異好讀書，通左氏春秋孫子兵法。（異傳）賈復少好學，習尚書事，舞陰李生生奇之曰：‘賈君容貌志氣如此勤于學，將相之器也。’後佐定天下，知帝欲偃武修文，不欲武臣，乃與鄧禹去甲兵，敦儒學，帝遂罷左右將軍，使以列侯就第復闔門養威重。（復傳）……”不是我好證據麼？其用這批人原因，就在盡忠於君，你看該書裏面有元末殉難者多進士一條看：“如：余闕元統元年進士，守安慶死陳友諒之難；台哈布哈至順元年進士，死方國珍之難；李興元統元年進士，為高郵守，死張士誠之難；李黼泰定四年進士，守九引，死于賊；郭嘉泰定三年進士，守上都，死于賊；王十元泰定四年進士，知潯州死于賊；趙璉至治元年進士，守秦州，張士誠既降復叛，遂被害……”這也是一個證據，證明有奴隸學術的人，是統治階級所樂用，於是他們研究奴隸學術了。

(二)除了上述的一點以外，奴隸的行為是很重要的。本來統治階級需要這種的人物，才可以統治他們，督理他們；否則，官僚的勢力一長之後，統治階級的命運就要壽終正寢了。當他們攫奪大權的時候，便會喪失了的。所以他們需要這種人物，你看廿二史劄記的南朝當以寒人掌機要一條，不是說：“宋齊梁陳諸君，則無論賢否，皆威福自己，不肯假權于大臣，而其時高門大族，門戶已成，令僕三司可安流平，進不屑竭智盡心，以邀恩寵，且風流相尚，罕以物務關懷人主，遂不能藉以集事，于是不得不用寒人，人寒則希榮切，而宜力勤，便于驅策，不黨倚之爲心膂。南史謂宋孝武不任大臣，而腹心耳目，不能無所寄，于是戴法興巢尚之等，皆委任隆密。齊武帝亦曰：‘學士輩但讀書耳，不堪經國，經國一劉係宗足矣！’此當時朝局相延，位尊望重者，其任轉輕，而機要多任用此輩也。”這是統治階級明瞭用人的大道理者啊！劉備三顧諸葛亮於茅廬，也是個寒人，他不但能：“亮深謂備雄姿傑出，遂解帶寫誠厚相結納。”并且還能夠：“鞠躬盡粹，死而後已。”（俱見蜀志諸葛亮傳）這就是他們奴隸的精神哩！李白當布衣時求見韓荆州不是說：“而君侯亦一薦嚴協律入爲祕書郎……白每觀其銜恩撫躬，忠義奮發……倘急難有

用，敢効微軀。”所以統治階級喜歡極了，不久之後，他就當了大權。元史裏有拜住傳載着拜住當任官僚時，他對統治階級說：“陛下委臣以大任，臣有所畏者三，畏辱祖宗，畏天下事大，識見有所未盡；職年少不克荷負報上聖恩。”這真奴隸極了。所以凡是奴隸的行爲人們，統治階級必爲笑眼開了。

除了上述兩點以外，此外也有宗族或親戚的背景，因爲一個人上了大官，總該把他的子姪帶了上去，或者他的親戚也帶上去幾個。這種的制度在魏晉時代最可看出，那時因爲門第制度極盛，所以“上品無寒身，下品無勢族”的事情很明鮮在映着。以後的社會這種制度還是明鮮的，不過無此種的盛況吧了。如顧亭林日知錄北方門族條不是說：“今日中原地方，雖號甲族，無有至千丁者，戶口之寡，與江南相去蔓絕。其一登科第則爲一方之雄長，而同譜之人，至爲之僕役……自金元以來，陵夷至今，非一日矣！”可見這究竟是“登仕”的方法啊！不過沒有前述兩者的勢力，便會低減起來的。

官僚霸佔了政治之後，貴族與封建的勢力因此失了勢，官僚的行爲是怎樣呢？從一方面看官僚正如家奴，不過這是在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季節；要是在農村不安定，農產不豐收的季節，便有反抗朝廷，甚或降服新興勢力。這邊是爲

着他自己生活問題，不得不然啊！分析來說吧——這二點：

(一)官僚類似一家奴僕——在過渡社會的天下，正如孔子所說的家天下，就是說這許多江山，這許多子孫，是屬於帝皇一個人的。他們所用的官僚，正如看門的狗。在明夷的官制議說：“天官之庶使百職，乃無一治國事民事之人。合此庶司百職，皆以奉一君。甚且六卿中六大六少之職，皆以奉君事神事爲主。其餘百官，其專爲事君者尙多。自是古所謂設官以治民者，則皆爲設官以事君矣！今以周考之……凡此百有五之官職，皆于民治無關，于國事無預。又冬官闕六十職，則統周官所有，但地官，秋冬及夏官之半，百七十二官爲治國事民事者耳！……自蘇綽倣其制，而唐六典宋開寶禮因之，凡一切祭祀，朝賀，喪記，會同，皆使三省六官分任其事，遂至今爲定制。”（見新民叢報）啊！啊！官僚真是一家的奴隸啊！中央官僚固是成了家奴，但歷代的地方官，也是家奴，周谷城不是說：“中國歷史上的親民之官，概是站在統治階級的一方面，對統治階級負責任的，其出其管理軍政，民政，財政等等，也祇是替統治階級鎮壓民衆，剝削民衆，或指揮民衆，替統治階級預備生活資料，所以概是統治階級的家奴。”（見中國社會之結構）不過這個家奴却是有時世的不同。在

農村安定農產豐收的時候，政治能夠平安，而這般富有倚賴性的官僚們，會死心塌地的崇拜統治階級，替統治階級効勞。如唐玄宗不過一朝在農村安定的前幾年的姚崇宋璟是“崇善應變，以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此持天下之正。二人道不同，而同歸於治，此天之所以佐唐使中興也。”（唐書）如房玄齡杜如晦輔翼太宗，唐書稱爲：“方君臣明良，志叶議從，相資以成，固千載之遇，蕭曹之功不足進焉。”這種真是奴隸極了的官僚。尤其是東漢的名節，“蓋其時輕生尚死，已成習俗，故志節之士好爲苟難，務欲絕入流輩，以成卓特之行，而不自知其非也。然舉世以此相尚，故國家緩急之期，尚有可恃以撐拄傾危。”（見趙翼廿二史劄記東漢尚名節條）他們是成了統治階級孝子順孫了。

（二）官僚習近趨炎附勢——在過渡時代的國家，既成了家天下，官僚在死心塌地的奉承統治階級，固是可得着求食的門經，也足以仰事俯畜。可是一到某統治階級失了勢，他自然是淪落了，因爲敵人的看門狗，誰都不願意再行僱用。如李密之類究是少數。所以他們爲了求生存，他也學得趨炎附勢的習慣。在某一集團將作統治階級的時候，他們便會如蟻之附羶一樣，雲集而響應。某一階級將失勢的時候，

固是有忠臣即奴隸化官僚，可是大多數終不是降伏，便是退隱，在小學纂註註說：“忠臣不事二君，此千古入臣之大義，而後罕知者。漢世崇尚經術，而新莽之篡，祇一龔勝不食死。唐朝三百年養士，而賊溫之禪，止一孫供奉者不下拜。降而歷事五朝之徒，風益下矣！”可見忠臣即奴隸化的官僚究是一部分呀！南宋滅亡禍在秦檜，明祚淪落禍在李自成，呵！呵！這是趨炎附勢的彰人耳目者呵！其他如新興的集團，便會有多數官僚前來歸附，而和統治階級共定天下的，自然位更高望更重，引用他的機會更多，如齊書劉懷珍傳說：“太祖曰：‘我布衣時，懷珍便推懷投款，況在今日寧當有異！?’”可見他是重視共同平難的功臣。所以帝王常常慰藉功臣說：“國內平定，汝等之力爲多，我與汝猶車之有轅，身之有臂也，汝等切宜替此，勿替初心。”（元史木華黎傳）這樣官僚那有不忠心事統治階級呢！於是我們有這句話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道破官僚的真正精神而無遺！這種的習慣是官僚求活的好方法，不過這是偶而用之啊！

官僚的性質既是如此，我們可以知道官僚的統治階級的走狗，是幫助統治階級壓迫平民的人，于是成了一家奴隸。但全時却又生趨炎附勢的蝙蝠，于是政局常受他的操

縱，而這樣潔身自好之士，便不願出來幹事，因之政治更趨于腐敗。所以我說官僚不是個好東西，是害人的東西，分析的說，是有四點：

(一)政費增加——沒有不吃的人，當這個統治階級用了這一些人之後，便該支出多少的款項，大的官僚，薪俸自多，小的官僚，薪俸也不寡。國家政治的行政費便這樣的增加了。如趙翼廿二史劄記宋冗官冗費條不是說：“宋開國時，設官分職，尚有定數，其後薦辟之廣，恩蔭之濫，雜流之猥，祠祿之多，日增月益，遂至不可紀極。真宗延平四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不但如此，還有：“向方鎮有公私錢例私以自秦，去則盡入其餘，大臣罷退，則復以節度空名，待制以下，或亦滯留後刺史等銜，其應得之分例，亦與現任者同。”所以冗官之上更加着冗費呢！這固不是普遍的現象，但是這是自然的事，用了官僚，自然少不了支出的。如“後魏未有官祿之制，其廉者貧苦異常，如高允草屋數間，布被縵袍，府中惟鹽菜，常令諸子孫採樵自給是也。否則必取給于富豪，如崔寬鎮陝，與豪宗盜魁相交接，莫不感其意氣。時官無祿，力惟取給于人，寬以善于結納，大有受取而與之者，無恨。”（廿二史劄記後魏）

百官無祿條)或是如：“洪武十三年已定文武官祿米俸鈔之數。二十五年更定官祿，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從一品至正三遞減十三石，從三品二十六石，正四品二十四石，從四品二十一石，正五品十六石，從五品十四石，正六品十石，從六品八石，正七品至從九品遞減五斗至五石而止。自後為永制。”（全上書明官俸最薄條）但是官俸就是沒有，或者是低薄，但他們還有取入的方法，就是在于貪贓枉法。貪吏固是不可為，是少不了人家的揭發，但是他們是常常做的。看“先為武寧郡頗有資產，積錢于壁，壁為之倒，銅物皆鳴，人喜之曰：‘所謂銅山西傾，洛鐘東應者也！’”（南史江祿傳）“左手揮金，右手刊字，紙為銅落，筆由利染，故門同玉署，家號金穴，嬖媿侍女，燕秦蔡鄭之聲，璇池碧沼，魚龍雀馬之玩，莫不充物錦室照澈青雲。”（南史佞幸傳序）“德正妻出寶物滿四床，欲以寄人，帝奄至其宅。見而怒曰：‘我府藏猶無此物。’詰其所從，得其元賂是也。”（北史高德正傳）“性纖嗇，有所程作，雖碎鎖無所遺，官曹簞壞，吏將易之，芻取壞者付船坊，以鍼箬每燕饗輒錄其餘賣之，故芻家錢遍天下。”（唐書王芻傳）這種的事情在歷史上書不絕書，固是到天下太平，國君有為的時候，對於這種貪贓枉法的官吏，有所懲

戒，可是這不過是短時期而已！人民們在絕長的時期，不知受他們害了多少！？

※ 我們不必再說其他，單就簡單的事實看來，我們已可驚心了。官僚的數目，在統一的時代大概在萬人以上，如隋一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員，唐一萬八千八百零五員，元一萬六千四百二十五員，有時竟在二萬人以上，如宋二萬四千員，明二萬四千六百八十三員，如東漢竟達十三萬二千八百八十五員！到清代的數目大概也類此。倘如祇就一萬兩萬想來，也許說祇有這一些。但我們就每一個官僚所仰事俯畜的以及什麼妾，什麼僕之類看，我們一定覺得可驚！要是更從人口數目來比擬，更是不得了。例如西漢的十三萬餘官僚，每家以六個人計算，約有八十萬人是分利階級，可是人口那時祇有五千九百五十九萬四千九百七十八人，那就是每七十四個人民養着一個分利階級，這是多麼可驚啊！實際還不祇此！這樣的事情，小民是多麼可憐啊！那時候的生產既是微薄得很，而人民們半數是屬於不能生產者，生產與消費的原則不能適應的時候，小民惟有挺而走險了。

(二)政令苛刻——官僚們要是祇個溫飽，人民祇要豢養他得當好了，可是他的慾望是不能滿足的。所以他的政令

是多麼的繁苛，使人們個個感到痛苦。這自然尤其是親民之官的地方官，更容易壓迫，因為離民衆較近的緣故。他們的殘酷到什麼地方呢？後漢書酷吏列傳序說：“臨民之職，專事威斷，族滅姦軌，先行後聞。肆情剛烈，成其不撓之威；違衆用己，表其難測之智。至于重文橫入，爲窮怒之所遷及者，亦何可勝言。故乃積骸滿筵，漂血十里。”隋書酷吏傳序也說：“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蒞，莫不凜然，居其下者，視之如蛇虺，過其境者，視之如寇讎。與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極惡。其所笞箠，多在無辜，察其所爲，豺狼之不若也。無禁奸除猾之志，肆殘虐幼賤之心。”這裏我們可以知殘吏的凶狠了。其實他們的行爲不祇加民罪，而且還有強要民錢，強收民租，如：“趙王擅權，使卽縣爲買人權會，入多于國租稅以是趙王家多金錢。”（漢書趙王彭祖傳）又如“拜南陽太守，下車奮厲威猛……諸受藏二千萬以上不自守實者，盡入財物，若其隱伏使吏發屋伐樹，豪右大振。”（後漢書王暢傳）“侵虐百姓，黃魚一枚，收稻一斛，百姓怨叛。”（吳志薛綜傳）又如“素豪侈，在蜀殖財，廣第舍，田產。”（唐書李叔明傳）其他他們是主張用法令的，這法令自然不是正當法令，法令既繁，自然人民容易犯法了。如：“令公卿以下，郡縣黃綬

吏，皆報養軍馬吏，盡復以與民，民搖手觸禁，不得耕桑，徭役繁劇。”（漢書食貨志）又加：“細政苛慘，科防互設，增繳充蹊，阮穿塞路，舉手掛羅網，動足蹈機塔。”（後漢書袁紹傳）又如：“弄法徒文，傷人實甚。”（唐書韋嗣立傳）其殘暴的程度，不是我們能窺見的，因為離時代是遠了。柳宗元的捕蛇者說說得很徹底，他說：“自吾三世居是鄉，積于今，六十餘歲矣！而鄉鄰之生日蹙，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號呼而轉徙，饑渴而頓踣，觸風雨，犯寒暑，呼噓毒癘，往往而死者相藉也。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非死則徙耳，而吾以捕蛇者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駭，雖雞狗不得寧焉。”呵！呵！官僚是這樣的害于人民，是這樣的壓迫人民呢！我們回憶到此情此景，怎能不“不寒而慄”呢！呵！呵！

我們不要過於責難官僚。慾望是不能滿足的，老子所謂絕慾，是絕對做不到的呵！他們固已是秉了政，在地位的立場本可以壓迫人民，榨取其生產了。可是他的慾望怎能滿足呢！可見官僚清廉的不多，實有這個重要原因。但是我們要知道統治階階何曾忘記慾望呢！他們設官的目的，除了供養

自己以外，就在於剝削人民，來滿足他的獸慾。官僚一方面設統治階級設法，一方面替統治階級剝削。前者屬於知的，而後者屬於行。所以站在統治階級的立場上說，這種剝削人民的官僚，不是罪惡，倒是合法。聽史記酷吏列傳序的話吧！“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濁之源也！昔者，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姦僞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當是之時，吏治若救火揚沸，非武建嚴酷，惡能信其任而愉快乎！”這真是家天下的流弊喲！

(三)政權在握——官僚大多數是智識階級，統治階級大多數却是非智識階級，知的一方面，官僚既是勝了統治階級，而行的方面，却是在官僚而不在統治階級。這樣官僚不是可掌握大權麼？就是有的天生睿明的統治階級，也往往被他們所迫脅！何況有的是母后臨朝，祇是一歲二歲甚或祇有三月的幼主，他們一切都不知道，政權自然落在官僚的手裏。所以除了幾個，如梁啓超所說的：“有全權親裁萬機，毫不被掣肘於他人者，凡得二十二人，曰秦始皇，曰漢高祖，曰武帝，曰光武，曰照烈，曰吳大帝，曰秦苻堅，曰宋武帝，曰齊高帝，曰北魏孝文帝，曰北周孝武帝，曰唐太宗，曰周世宗，曰宋太祖，曰神宗，曰西夏李元昊，曰元世祖，曰明太祖，曰成祖，曰清朝

聖祖，世祖，高祖。”其次“其權力雖不如第一種之強盛，而承襲先業，繼體守文，亦不甚被掣肘于人者，凡得十二人，曰漢文帝，明帝，章帝，曰魏文帝，明帝，曰陳宣帝，曰宋太宗，真宗，仁宗，曰清朝仁宗，宣宗，文宗。”一千年時代，前前後後多少帝皇，而自己有統治權力的，祇有這少數！別的是怎樣呢？“不能自有其全權，或委政於母后，或委政於外戚，或委政於權臣僉任宦寺，雖其間安危異數，榮辱殊途，大抵危而辱者十之七八，安而榮者十之一二。要之其不能自有其專制權，則一也。”（見論君主政體有百害於君主而無一利）母后外戚在這裏是不能說，而這還在少數。最大害于統治階級的，是掌握政權的官僚。害處大的，統治階級至于身亡國亡，害處小的行動總多少受了阻礙。所以最簡單的說一句，官僚一方面看來固是統治階級的走狗，他方面看來，又何嘗不是剝削統治階級的蝨賊呢！

你看，統治階級是該統治官僚，而結果却是官僚統治統治階級！如宦官的禍在唐代所見的，是：“東漢及前明宦官之禍烈矣，然由竊主權以肆虐天下。至唐，則宦官之權，反在人主之上。立君，弑君，廢君有同兒戲。實古來未有之變也！推源禍始，實由于使掌禁兵，管樞密……其始猶假寵竊靈，挾主

勢以制下；其後積重難返，于肘腋之地，爲腹心之患。卽人主廢置，亦均在其掌握中。僖宗紀贊謂：‘自穆宗以來八世，而宦官所立者七君……穆宗之立，由陳宏志等之力也……文宗之立，由王守澄等之力也……武宗之立，由仇士良等之力也……宣宗之立，由馬元贇之力也……懿宗之立，由王宗實等之力也……僖宗之立，由劉行深等之力也……昭宗之立，由楊復恭之力也。統計六七代中，授立之權盡歸宦寺，宰相亦不得與知。……此可見下陵上替之極也！……卒至朝廷綱紀，爲所敗裂，國勢日弱，方鎮日強。宦寺雖握兵，轉不得不結外藩爲助。于是韓全誨等劫天子遷鳳翔依李茂貞；致朱全忠圍攻逾年，力窮勢迫。帝與茂貞乃殺全誨等四人，韋處廷等二十二人以求和。又殺小使李之彝等十人。城門旣開，又殺中官七十餘人。全忠又令京兆誅黨羽百餘。旣還京師遂盡殺第五可範以下八百餘人，哀號之聲聞于路。諸道監軍亦卽所在賜死。蓋不減東漢末之誅宦官，至有無鬚而誤死者。唐朝宦官之局，至始終結，而國亦亡矣！’（見廿二史劄記唐代宦官之禍條）啊！宦官的勢力竟有這樣的偉大！唐代亡國的原因，間接直接都有宦官關係。這是統治階級被官僚所操縱的一會事。

除了唐代宦官操縱統治階級以外，統治階級的生命站在官僚上頭的，又何可勝計！這裏我不殫煩，再舉了元代的例：“……憲宗之立，由烏蘭哈達等之力也……成宗之立，由伊實特穆爾之力也……武宗仁宗之相繼御極，皆哈刺哈斯之力也……泰定帝之立，由特克實之力也……文宗之立，由雅克達穆爾之力也。……此有元一代之大事也！按太祖崩後，無君者凡一年，定宗崩後，無君者且三年，成宗崩後，武宗仁宗皆在遠方亦年餘，始得立，凡此新舊絕續之際，未嘗無疎屬庶孽如額魯布格阿南達等從旁窺視。然一二大臣定議，卒歸應立之人。蓋開國之風氣淳，故宗親將帥推戴，咸于至公，故無悖常亂紀之事。迨特克實之弑立，雅克特穆爾之廢立，則全是權臣肆意妄行，大柄在手，莫取誰何，遂任意易置，此爲後世鑒也。”（廿二史記劄元諸帝多由大臣擁立條）從這裏我們不是替統治階級擔心麼！你叫他來幹事的官僚，現在却是被他們支配了。呵！統治階級真沒有能力呀！

唐之宦官，元之權臣都是亡國的直接人物！表皮上是盡忠報國的臣子，有的竟也至於亡國的罪人！“宋之南渡，秦檜主和議，以成偏安之局。當時議者無不以反顏事仇爲檜罪。而後知恢復者張德遠一出，而輒敗，韓侂胄再出，而又敗；卒

之仍以和議保疆，迨賈似道始求和，而後旋諱之，孟浪用兵，遂至亡國。⁹又如：“有明末造亦然……太宗既有許和意，崇禎帝亦未嘗不願議和，徒以朝論紛呶，是非蜂起，遂不敢定和，以致國力困極，宗社淪亡。”（俱見廿二史劄記明末書生誤國條）不過這類人物目的是在擁護統治階級，其實不明時勢，以致鑄成大錯，一失足成千古恨，未始不是官僚所作的罪惡！

總之，官僚並不是好東西，並不是完全是統治階級的走狗。祇要權柄淪落在他的手，他的慾望增長，而會高漲氣餒，說不定是會位在統治階級之上，統治階級成了個傀儡呀！

（四）政治黑暗——在官僚政治的下面，他的黑暗程度是極深，朋黨爲奸的事情，時常達生，僭越地位的事情，也時常出現。所以政治是極黑暗的，這已在上面略有敘及了。政治的黑暗結果，使潔身自好的人們，不敢入了官僚階級的隊伍，其結果使統治階級的行動，少了有力的助力。在國家危機四迫的季節，少了這種的人，是容易淪于滅亡，則國家昇平的季節，固是無關大體，可是少了他便會少做幾件有益的事。這是誰的造成啊？不消說是官僚啊！

你要做官僚麼，除非你一味向統治階級作乞憐的勾當，

如通考選舉考引用江陵項氏的話：“王公大人，巍然於上，以先達自居，不復求士。天下之士，什什伍伍。戴破帽，騎蹇騾，未到門百步，輒下馬奉幣刺，再拜以謁于典客者；投其所爲之文，以爲求知己；如是而不問，則再如前所爲者，名之曰溫卷；如是而又不問，則有執贄于馬前自贊曰：某人上謁者。”不但如此，他們尚有可恥的行爲呢。所以這潔身自好的人，不敢效這種無恥的舉動，於是退隱山野。政治因之更黑暗了。人民因此更痛苦了。

這四點就是官僚政治的弱點，官僚政治所以得以引用而不墜者，自然是經濟的原因，而有些奴性深的官僚，股肱統治階級，所以才生統治階級引用之心，不管什麼失敗不失败的。奴性的官僚是使統治階級挽回殘喘的一息，如：“呂后之亂，而有平勃；武后之亂，而有狄梁公；安史之亂，而有郭李，建中之亂，而有李西平，潼澗之役，而有寇萊公；土木之變，而有于忠肅；宸濠之亂，而有王文成；洪楊之亂，而有曾文正；庚子聯軍之禍，而有李文忠。至于關壯穆，張睢陽，宗留守，岳武穆，文信國，余忠宣，盧忠烈，史閣部，功雖不成，而正氣塞于兩間矣！”奴性的官僚，是爲護衛統治階級的，如：“朱雲折檻，張綱埋輪，張陵叱梁冀，申嘉圖折鄧通，禰

衡罵曹瞞，駱賓王檄討武曩，顏杲卿罵安祿山，顏真卿罵李希烈，段秀實笏擊吳泚，范承謨罵耿精忠，柳伉請誅程元振，陳東請誅蔡京六賊，胡銓請斬王倫秦檜，呂祖泰請誅韓侂胄，楊繼盛疏劾嚴嵩父子，楊連疏劾魏忠賢，郭秀疏劾明珠余國柱。莫非忠義激烈，足以懾服羣奸也。”奴性的官僚，是協贊統治階級的，如：“董子之策賈良，賈生之策治安，賈山之至言，劉向之封事，鮑宣之上哀帝書，蘇氏父子之上皇帝書，諸葛武侯之出師二表，魏徵之十漸十思，姚崇之十事要略，孫嘉淦之三習一弊，陸宣公之奏議，劉蕡之對策，杜牧之罪言，賈讓之策治河，趙充國之策屯田，江統之論徙戎，王朴之策平邊，韓退之之原佛骨表，歐陽廬陵之本論，顧亭林之論風俗政事。並為經世之文，有關於社稷大計，主德民風者也！”又如：“其運籌帷幄，言聽計從，如子房之于漢高，孔明之于昭烈，公瑾之于孫策，王猛之于苻堅，鄒侯之于肅代，青田之于明祖，雖功業不同，而知遇則一也！其身係天下安危，如霍子孟，郭汾陽，裴晉公，韓魏公，司馬溫公，千載曾無幾人！”這些的官僚誰是統治階級的股肱，但是不過是這些而已！大多數的官僚都是目中祇有自己，不管什麼統治階級不統治階級。因之中國的歷史上一治一亂，循環不已的表

現着。

這一治一亂，循環不已表現着的政治，是誰的罪惡？不消說就是官僚。官僚是造成過渡社會的功臣，却也是表現過渡社會醜態的人物，他的歷史和該社會相終始，是唯一值得敘述的事。

六 資本主義社會時代

鴉片戰爭是中國和外國以武力接觸的第一次，中國誇大的中國，抵不住外力的壓迫，外國資本主義就儘量的輸入，把中國也形資本主義化了，在過渡社會發展得很的官僚政治，到這個新的經濟基礎來到的時候，也不得不轉移方向。他的情形，有如陶希聖所謂：“其一爲鄉村經濟之破壞。因此士大夫個人賴以生存的地租不足供個人的生活，舊來門第遂不能長久維持，達官大吏的子孫易流爲流氓地痞。從前官吏俸所得常以土地爲投資的方法，自鄉村經濟日益破壞以後，土地漸不宜於投資，較富的官紳遂流爲商業資本家或買辦階級。其二爲自由競爭的激烈。在都市中，帝國主義資本的勢力，驅市民於商工業的自由競爭。在自由競爭中，過去士大夫維持一己生存的身分，沒有存留的餘地。所以士

大夫的社會地位逐漸淪落與商工業者等量齊觀。同時商工業者依其經濟地位之高，在平民眼光中，反嵌入士大夫的社會地位，把持行政，武斷鄉曲。其三為民族資本的不振。若資本主義能盡量發展，則士大夫將大量吸收於生產組織之中，不復全體集中于政治地位的爭奪。但帝國主義侵略下的中國資本主義沒有自由發展的可能。初則因關稅不能自主，外國商店侵佔本國的銷場。次則因外人設廠於國內，帝國主義在國內發展產業，妨礙中國產業的發展。末則外資輸入，一切產業非倚賴外資，即不能夠圖存。所以官僚資本家除了為外資經手者外，又多陷于破產之中。”（見氏著從中國社會史上觀察中國國民黨）官僚在那時候存在是還存在着，不過他的手段已由土地的主人而變為倚賴外資的人了，破產殞落的悲運，又時時的映在我的眼簾。這就是由上面的話裏，所得的結論。

從政治方面說，統治階級既是換了，新興的統治階級是倚賴外國資本家的買辦階級和軍閥。他們不需要這種有政治素養的官僚，常以引用私人為能事。所以官僚的一部不得不化為政客，在各大軍閥和買辦階級乞憐而搖尾，買得歡心，軍閥得勢的時候，也許可以做些大小官吏，擄劫一些民

脂民膏以肥私囊，失勢時候做海上的寓公，做一生適意人。一部分官僚却是沒有交了如此好運，淪入于農工羣衆及流氓社會之間，做搗亂社會的勾當。他們門第不必說了，連身分也不能成立，漸漸的消失他的特點。

不必說歿落于社會底下的官僚，單就政客說，他比爲人上人了，但他的痛苦却比從前高得許多。興伏無常的軍閥，使這般政客們爲自己担心，所以投機的衝動是十分的活現。又是智識普及的結果，使官僚們失了一種身分的倚據。和他競爭的更多，何況自資本主義侵入後失業的羣衆，是加得許多，也有趨向於官僚的路上。因此政客們的生機愈是迫切，而利用軍閥的心理更益高漲，一人如此，千萬如此，於是政治的局面不能安穩，人民生活更是痛苦了。

這次國民革命軍的勃興，他也許能夠打破這種局面吧！總理的民權主義，提倡政權治權的劃分，在握治權的人們，固有考試制度牽住這種無智識的人求進，監察制度監督貪贓枉法的官僚。但是莫過于政權中的直接選舉權，和直接罷免權，人民有了是項權力，那怕官僚的專橫呢！？所以正如陶希聖所說：‘如果，政府和一切官職，完全黨和民衆直接選舉和直接罷免之下，那末，這種環境中間，決沒有復活官僚和

官僚政治的可能。公職的任免在黨與民衆的自由，從事政治活動的人們決沒有瓜分公職的餘地，也決不會再有因瓜分地位而引起的政爭。中國數千年來，後封建時期的官僚國家，這樣才可以完全打破。」（氏著官僚政治及其摧毀新生命第一卷第十一號）

物觀文學史叢稿

唐代女詩人

陸晶清女士著

實價大洋四角五分

本書與李長吉評傳一樣，也是以物觀的方法來研究唐代女詩人及其詩的藝術。作者將唐代女詩人分爲四類：（一）宮廷婦女，（二）家庭婦女，（三）女冠，（四）娼妓；不獨闡女詩人的環境對其詩的影響，且說明當時的經濟制度產生此四類女詩人之詩藝的徑路，並解釋唐代女詩人之詩具有特殊色彩的原因。

(2)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馬克思的經濟學說	考茨基 汪馥泉	一元二角五分	本書是「馬克思底經濟學說」的「通俗的敘述及解說」，曾經由昂格思氏的校閱，是這一類書籍中的最好的一部，卷首附有一譯者序言。中載福本和夫氏「經濟學批判的體系與資本論的體系」很有助於馬氏經濟學說的把握。
經濟學入門	哈列夫斯幾 朱鏡我	上下册各七角五分	這是一本關於經濟學的最良的入門書，內分前後兩編。前編是關於實際的問題，引用馬克思資本論及其他名著，加以事實的說明，後編為理論之部，字字句句，皆為珍玉，凡欲研究經濟學者手此一卷，可得事半功倍之效。
經濟學及賦稅之原理	里嘉圖 郭王 郭亞南	一元二角	著者里嘉圖，是英國的大經濟學家。本書是他的學說之精粹所在，在本書內，他不但竭力而忠誠地為資本主義作辯護，同時亦顯出階級之不能融合的暗示，他的學說正可以說實為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過度度的橋梁，研究經濟學說者，此書實為必讀之書。
社會科學理論之體系	張栗原	八角五分	張君此編，略以日人杉山榮之社會科學為藍本，但內容則頗不相同，其最大之特色，即完全根據正統馬克思主義之言論構成一個體系，全不參雜己見。由淺入深，實為社會科學者所必讀之書也。
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上)	庫斯高 斯素明	八角五分	是書乃著名的教授庫斯高所著，書出以來，世界各國爭相傳譯，現已有十餘國譯本。關於各時代的政治，經濟，藝術，宗教，敘述甚詳，此外，作者以科學的眼光用地質學，考古學，古生物學，人種學，文字學闡明人類之起源及其發展，使讀者一見了然。全書凡五十萬言，第一册業已出版。

對於“詩書時代的 社會變革及其思想 的反映”的質疑

周紹濬

東方雜誌二十六卷，第八，九，十一，十二等號上，載有杜衍（即郭沫若之筆名）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一文，其要點係以中國生產的進展，去分析吾國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和其思想，這種研究的手腕，并非我懷疑的所在。但其研究的結果的解釋，實有不能使我無疑

者。杜先生以爲吾國古代社會的兩個變革時期：便是由原始共產制變爲奴隸制；和由奴隸制變成封建制。第一個變革是在殷周之際，達到完成。第二個變革的完成，在東周以後。再以其幾段重要的結論，介紹於左：

“農業在轟轟烈烈的發展起來，文明也就一天一天的燦爛起去，我們單就表面上看來，所以謂文武周公成康，真真可以讚美的了，然而這兒掩着一個很大的悲劇；農業的發展，就是奴隸制的完成。……”

又說：“周公這位老頭子，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一位角色，他是奴隸制的完成者，這是可以承認的。”

又說：“……古來的經學家講皇帝王霸，以中國古代歷史的推移，是由皇而帝，由帝而王，由王而霸，周室東遷，就是由王而霸的關鍵。其實這皇帝王霸，照我們現在的眼光看來，皇就是完全的神話時代，帝是原始共產社會，王是奴隸制的社會，霸是封建的社會。”

“……然而事實上西周完全奴隸制的國家，……而自秦以後的經濟組織，在農業方面是成了地主與農夫（雖然沒有農奴的稱號，然而事實是相等）的對立。秦以後的郡縣制實際上就是適應這種莊園式的農業生產，與行

幣制的工商業的真正的封建制度。”

照着他的結論看來，以為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奴隸制，霸道（即春秋戰國以後）的基礎為農奴制。故以為奴隸制發生於封建制之前；而農奴制發生于奴隸制之後。他的見解，適和我相反。我以為奴隸制，為封建制度搖動後之產品；而封建制度的發生，即在農奴制發生之際，所以說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農奴制；霸道之基礎，為奴隸制。至若我所解釋的，也是根據當時的社會環境的事實，而加以分析的。杜先生所說的，也有他所引的事實，和其解釋的理論。我對他的，也不敢句句加以致辯；我的目的，只以我所根據的事實；發表我個人意見，否認杜先生的根本觀念。究竟誰是誰非，尙希讀者諸君，予以誠懇的批評。

一 周之統一

周之封建

吾國的封建制度，開始於夏，到周代已為極盛的時期。因為由唐虞到夏，已由新石器時代，進入於銅器的時代。生產的技術，已表示相當的進步，也就是證明了生產物，已有發展的趨勢了。吾國係以農立國，當然以農業的發展為最早。農業的發展，必引起土地

和勞力二者的需要增加。但是農業區域的人民，最富有保守的思想；而經濟的狀態，爲自給自足的現象，因而封建勢力，也容易附着於其上。同時還有兩方面的理由，證明封建制度，已開幕於夏。

1. 以經濟史的發展說：最初經濟的發展，爲河面經濟的時期，例如埃及之尼羅河，美索不達米亞之幼發拉底河，印度之恆河，和吾國的黃河流域，這都是古代經濟發展的根據地。我國古代農業經濟之發展，確實首推黃河流域，故夏殷周的封建都城，多建築於這一個流域的附近。當時人民既藉着天然力的灌溉，而發展農業；那末必然發生很大的集團，出來料理河工，如築堤修閘等。但是擔任這種工作的人，又非普通的農民所能濟事；必須有真確的知道洪水的記錄，定期的氾濫，雨水的調節，以及架橋修閘等技術。還要知道天文數學之學，方可擔任這種工作。然而這樣說來，又非分工不可。即一面爲專事生產者；另一面爲完全脫離生產的領域，而專做技術和學識的修養。此即所謂勞心者與勞力者的分開。因而發生勞心者治人和勞力者治於人的關係。換句話說：就是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的形成。統治者既不事生產，則其生活費，必仰給于一般直接生產的勞働者——農

民。這就是封建制度的剝削的雛形。

2.再從統治者的系統看：自黃帝至唐虞年代既不易考，而系統也難明。並且夾着了什麼禪讓的問題。至若說到封建制度，自有其封建傳統的思想。所以君王的寶座，一到夏禹就毫不客氣的直接傳授己子。這就是封建傳統的象徵。由前說明，可知封建制度，確已起於夏了。夏到周時，統治者的特權，更王世襲的結果，而越加根深蒂固。同時在周初發生鐵器，生產的工具，又已由銅而鐵質了。鐵較銅更堅，於是生產方面，又放了新異的彩光。生產既有了特別的進步，那末經濟聯繫，也益為廣被。因之各地封藩和中央關係，亦就密切起來了。同時勞働者——農奴——的集團也會漸次擴大。勞働力增加，更為生產增加的源泉。

却是當日農民的生產的目的，完全為着消費。即自己的消費，和領主的贍養費。領主對於農民，一面行使指揮權，監督他們生產，以取得農奴勞力的結果，為其對上納貢稅的用，和自己的開支。同時還有力役之征，以加重農民的負擔。這就是封建制的農奴制由來。土地的領主，因有大塊的土地，和大量的勞働者，所以確立莊園制。周代的統一，不過各大小莊園，所形成的邦聯似的國家罷了。因為地理上和歷

史的關係，致使莊園的發展不一律，莊園既有大小的分別，則其實際的統治權，也會難得一致。對畿內大莊園，大概為直接統治之關係，對畿外各莊園，實為間接的關係。至若周之莊園土地的形成，大概有下列三方面的原因：

A. 王畿內的大莊園，其土地的領主，由二方面而來：

一，血族團體的代表，或軍事長官（即軍事貴族），利用世襲自己的特權，而使一般領民——農奴——負擔納貢稅的義務。又因掠奪而把土地移為己有，且占有那土地上的住民，以為農奴。

二，征服敵對的種族，把被征服地移為己有，並隸屬其住民。

B. 畿外的莊園土地的領主，也由二方面而來：

一，王的扈從之有功者，以恩賞而從王得着采邑和封地。

二，被征服者的場合，被征服的酋長或王，在統治的必要上，不奪其特權，并給他們以采邑和封地。或不奪其大地，而使其仍舊維持。

C. 其他莊園的領主：

一，非以征服的結果，實以沒有武力的，向着有武備的

求保護而服其支配；并且將其所有地讓渡於保護主，自己單是一個土地的佔有者，對於保護主，負貢稅及力役的義務。

二，已成的土地所有者，不但有土地，而且得有大批的勞働力——農奴，因而都紛紛開墾荒地而佔為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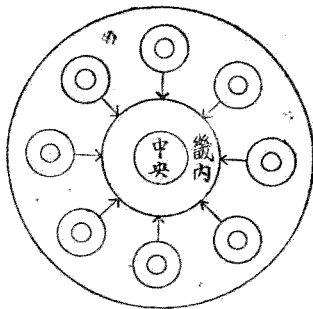
至若各莊園的領主和農奴的關係，為直接的關係，而農奴對於領主，須納貢物。小領主進貢於大領主，而大領主再納貢於較大的領主，最後貢於天子。即所謂庶人貢於卿大夫，而卿大夫貢於公侯，公侯則貢於天子。這是土地所有權與統治權，打成一片的特徵。但周代的交通，還是不便，故各莊園的經濟，為自足經濟的狀態。我們看下列老子所說復古的話，就可以證明當時的經濟狀態：

“小國寡民。使有什百之器而不用；使民重死不遠徙；雖有周輿，無所乘之；雖有甲兵無所陳之；使民結繩而用之；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樂其業；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

當時的莊園既為自足經濟狀態，則各莊園的領主，自兼有直接統治的特權。因而知道周天子之統一，也不過維繫各莊園的外表罷了。其形態即前面所說的邦聯政體似的，對外則用整個的名義，對內還是各自為政，不過發生納稅的關

係，其實際的統治權，爲各莊園的領主。中央政府也僅是名義的統治。再以圖解說明如下：

周之統一的形態



周王對各莊園的領主，爲間接關係，而各莊園的領主，對內爲直接的統治者。外圓的大圈，即周之統一的外表。對於各莊園的領主，不過予以名義上的封號。後世之傳古代封建有萬國，三千國，一千七百七十三國，實則爲各種的莊園耳。

周征服商以後，對於舊來諸侯，並沒有一律殘滅。左傳十一年：

“劉子單子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

周公及成王之世大封姬姓：

“兄弟之國，十有五入，姬姓之國，四十人”（昭廿八年）

分以殷之遺民。左傳定四年，襄弘說：

“昔武王克商，成王室之，選建明德以屏藩周。故周公

● 相王室以尹天下，於周爲陸，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而封於少墟。分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綺氏，樊氏，饑氏，終葵氏，……而封于殷墟。分唐以……懷姓九宗，……而封于夏墟。”

除姬姓之外，尚有很多異姓諸侯。單就魯襄公十一年蕭魚之會……已有“七姓十二國”。七姓者，姬，曹，子，姜，己，妘，任。而皇陶之後的六蓼；崇拜大皞的任，須，句，顓叟，滅盡漢上諸姬的楚；占領周墟的秦，春秋時代不與會盟的燕；斷髮文身的吳越；有的固然分過“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祝宗十史，官司彝器，大路少帛，積茂旂旌，”且有一定的禮儀授土授民；有的却只有“各撫其土”的命令。

周之王道
的真面目

以上係說明周之封建制，大概建築於各種莊園制度上。周王既知道各地莊園制的經濟狀態，爲自足經濟，中央政府不能直接指揮領主的農民，和耕種的事情；只好以一封號的名義，加委各莊園的領主，使其對中央負責。但是各地領主，因爲實際上操統治的權，同時有了許多土地和農奴，爲他們生產。所以得

有各自爲政的可能。此時的中央政府，一方因有軍事的開支，和其政務費；另一面因爲各貴族的消費很大，若只靠王畿內的收入——即王畿莊園上的貢稅——不足以供給。故對於畿外各地莊園的領主，不得不予以封號的美名，以圖他們的貢納。若欲貢稅之不發生問題，不得不以一種所謂“王道”的名義，以攬得畿外各莊園的信仰。即以其畿內而言，我們知道王所有的大地，有的用武力征服侵佔來的。如果不設法軟化，那末王畿的內部，也會發生危機。這是周之王道的動機。尤其應該注意的一般捧場的儒家——孔丘派，——替周室鼓吹得很，以籠絡一般民心。試看他們的言論如何？

孔丘說：“爲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說：“周監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

像這一類的恭維話，實在不勝枚舉，總而言之，孔子尊周攘夷，這是事實的。

至若周之所謂王道，實在是名不符實，不過借此名義以號召天下而已。所以他們的伐紂運動，也是用什麼人道主義的美名，興問罪之師。其實他們的本身，是人道主義的罪人，我們試看當日所施行的“仁政”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當時所謂“以九職任萬民”，即三農，園圃，虞衡，蠶牧，

百工，商賈，嬪婦，臣妾，間民等是。又有所謂“以九貢致邦國之用”，即祀貢，嬪貢，器貢，幣貢，材貢，貨貢，服貢，旂貢，物貢等是。有所謂以九賦斂財賄，即邦中之賦，四郊之賦，關市之賦，邦甸之賦，家削之賦，邦縣之賦，邦都之賦，山澤之賦，幣餘之賦等是。此外還有所謂力役之征。

第一種勞働即耕種方面，在領主監督之下實行：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峻至喜，攘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甫田之詩）

第二是宮內的勞働。豳風七月之詩說道：

“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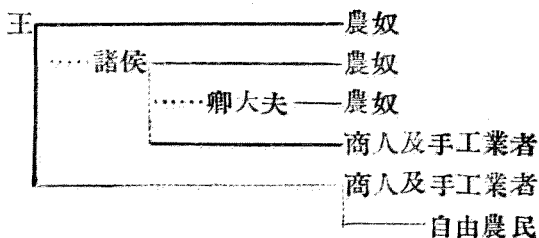
還有什麼狩獵和手工貢納的義務。

“一之曰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曰其同，載績武公，言私其縱，獻豝于公”。（七月之詩）

“爲公子裳……爲公子裘……烹葵及菽，……剝棗，……爲此春酒，以介眉壽，……曰殺羔羊，躋彼公堂，稱此兕觥”。（七月之詩）

除上述的農民負擔外，還有如歐洲的封建時代的新婚初夜權(Tus Primas Noctis)的無人道的事情，這同周的封建時代之對領民（即農奴），雖有式樣的不同，或程度的差異，而其對農奴的剝削則一。總之到了周代的封建制度，完全的變為一個榨取機關，只以上面的政績，完全是農奴奉公守法的寫真。

由是看來，即可證明周之講王道的真面目，僅為利用一種“王道”的名義，以欺騙一班無知識的農奴罷了。中央政府，則利用各地的封侯，以為剝削農奴的工具，而各地的封侯，也得借周天子的名義，及麻醉品似的周禮，以恐嚇一般農奴，而行使其直接統治的權利。此所謂上下交征利的政策，苦了一般農奴而已。再以新生命月刊二卷二號上方岳所著的中國封建制度的消滅(上)中的圖表，來證明春秋以前的封建制度：



在這表上看出：周之封建制，確實建築于各種莊園上面。莊園的主要生產者，即農奴。至若商人及手工業者，在當日還不算重要。商人僅僅是販賤賣貴，而手工業亦多為農奴的兼職。假使各地莊園的領主沒有大部分的農奴，那末不但對天子沒有納貢力量，即其自己集團的寄生物——公侯，卿大夫，士人等——也就沒生存的餘地。各種莊園，既然失了基本的骨幹——農奴，那末中央政府，也就沒有憑依。結果就是統一的名義，也無存在的根據了。這樣看來，周之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實建築於大集團的農奴身上。

王道之基礎的結論

由上述的看來，王道的基礎實建築於農奴制之上。而杜先生所著“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論文中，却是偏要說：吾國古代王道的基礎，為奴隸制，他是以歐洲羅馬時代的封建社會，來證實吾國古代的社會制度。他說：

“……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西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與希臘羅馬奴隸時代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時代。”

但是古代希臘羅馬的社會環境，和吾國古代的西周的環境是兩樣；希臘的文化發達最早，人民對於都市生活的認識，也較任何地方發展。羅馬也是因希臘的影響，而發生同樣的變遷。故希臘羅馬時代，因為都市生活的發展，結果形成商業的中心，和城市的國家。於是以都市的力量，征服外邊各部落。城裏的主要份子，即為商業貴族。商業貴族，因為發展商業的需要，不得不吸收許多很活動的游民——奴隸——以為其商業上的經營和運輸之用。因為當時交通不發展，警察事業，也沒有發展。所以商人欲到各地去營商，需要許多奴隸擔任運輸，及結隊以防盜之掠奪，同時商業須有商店，每商店裏頭，又需要奴隸為他經理。故商業愈發展，其所需的奴隸也愈多。至若吾國古代的封建社會，已由前面所說的證明，還是農業經濟自足的生活狀態。農業為固定的，所需要的勞働以農奴為最適合。這是吾國古代封建社會，和歐洲古代希臘羅馬以都市為中心的不同者一。而希臘羅馬因為商業經濟的關係，而人民的思想也較為活動。即以交通而論，也因受了商業資本的洗禮，較吾國古代為發展。所以他們的政治上統一，也有實在的可能性，得以名符其實。至若吾國古代，係以農為基礎的封建社會，限於地理方面的影

響，和生產的固定，故其政治上的統治，名雖爲統一，而實爲分權的政體。這也已由前面說明，用不着申言。此爲中國古代封建政治，與希臘羅馬不同者二。至若說到封建社會之演進方面，中國古代封建制，與希臘羅馬也爲根本上的不同：周由遊牧區域，而侵入農業區域。而希臘羅馬乃由商業區域侵入農業區域。故周的遊牧貴族所到之地，則開墾農區；或把原來已開墾的熟地，沒爲己有。而希臘羅馬遊牧貴族所到之地即開闢商埠，掠奪動產和奴隸。并且周代爲其經濟的固定，故其戰爭的原因，多爲農區而戰；而希臘羅馬經濟較爲流通，故其戰爭爲爭商業區而戰。這又是中國古代封建社會，與希臘羅馬不同的理由。總之希臘羅馬的農業經濟，其衰落較吾國爲早；而吾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希臘羅馬爲遲。在周代的封建制，實以農業爲基礎；與周同時的歐洲希臘羅馬，其封建制已經發生變化；實以商業爲基礎的。雙方的經濟之基礎，既各異，則社會制度的變革，和政治上的形態，當然不能一概而論。

這樣說來，尤其證明周之王道的基礎，實爲農奴制，故杜先生所說：西周時代爲奴隸制，是很錯誤的。

二 春秋戰國以後

春秋戰國
經濟之發
展及社會之
改革

由周末到春秋戰國時代，農業方面，因為生產技術的發展，尤為進步。在耕種方面也定很普遍地用鐵器，因為當時已用鐵鑄鼎了（左傳昭公二十九年）可以推知當時的犁器，也已鐵製。再看下面的兩段話，更為證明。

據越絕書云：“當世之時，作鐵兵，威服三軍，天下聞之，莫敢不服，此亦鐵兵之神。”

又江淹云：“古者以銅為兵，春秋迄於戰國，戰國迄於秦時，攻爭紛戰，兵革互興，銅既不克給，故以鐵足之。”

由此看來，當時是用鐵器耕田，已無疑義。生產的技術既用鐵器，則其影響於他方面，也必重大。同時灌溉的方法，也已發展。

新生命月刊二卷第五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下：

“春秋以後，中國農業又有一個特徵，這就是灌溉。灌溉從春秋以後，始逐漸推行于各地。史記河渠書載：‘西門豹引漳水灌鄴，以富魏之河內’秦之富，由于鄭國。河渠書載：‘韓……使水工鄭國問說秦，令鑿涇水，自中山西

抵瓠口爲渠，旁北山，東注洛，三百餘里，欲以溉田。……渠就，用注填淤之水，溉澤鹵之地四萬餘頃，收皆畝一鐘。於是關中爲沃野，無凶年，秦以富彊。”

他又說：

“灌溉農耕既須通河渠，所以嚴正明瞭的劃分土地爲獨立莊園，便不可能。這是與歐洲中世農業不同的一點。”

當時灌溉發展的結果，一方面打破舊日莊園制的一隅生活。另一方面愈促成農業經濟之發展。因爲農業的發展，生產品的增加，則各地供給之有餘者，必輸送供給較少的地方。因而引起交換的發展；由交換的發展，又產生錢幣制的交換。普通說：貨幣交換的發展，不外三個進程。

最初是現物交換的時期，例如：

一匹布 = 一石米，

這是單純的交換的經濟，由此時期進而第二個貨幣交換的時期，在這一期的交換，即爲現物交換的複雜化。如下列二表：

(一)一匹布 =		一石米
		一石二斗麥
		一支槍
		二柄斧
		三種陶器

但是交換之發展，還不止此，有剩餘的米，麥，槍，斧，或陶器者，不一定需要布。然而布可換得其牠東西。布就成了米，麥，槍，斧，或陶器等物的交換尺度，於是布就變成交換的貨幣，其形式由(一)圖而變成如下：

$$\begin{array}{l}
 \text{一石米}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二) 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一石米}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right\} = \text{一匹布}$$

此一匹布成了交換的媒介，這所謂貨幣的交換。然而以布為貨幣的交換，却有兩方面的不便。(一)布為貨幣的尺度，其本身難得耐久，易受腐化。(二)布的本身大而重，如果交換發展到了很高的程度。必感覺許多的不便。於是由貨幣交換的過程，進到錢幣交換的形式。如下圖：

$$\begin{array}{l}
 \text{一匹布}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left. \vphantom{\begin{array}{l} \text{一匹布} \\ \text{一石二斗麥} \\ \text{一支槍} \\ \text{二柄斧} \\ \text{三種陶器} \end{array}} \right\} = \text{錢幣十枚}$$

這是以錢幣爲交換的標準。在戰國時代以後以銅鑄幣的事情，必然發展，因爲戰國時代的著作的國語周語載有周景王鑄錢時單穆公的貨幣。(紀元前二四年)他說道：

“古者天災降戾，于是量資幣，權輕重以賑災民。民患輕則爲作重幣以行之。若不堪重則多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

這種貨幣論非戰國時人說不出，恐怕是託古的經濟哲學，而不必是春秋時代實在的議論。然而由此知道春秋戰國以後的錢幣的鑄造，必已發展了。再看新生命月刊四號方岳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中)說：

“漢代鑄錢甚多。即武帝至平帝數十年間，‘成錢已二百八十億萬餘。’但是：

王莽亂後，貨幣雜用布帛金粟(後漢書光武本紀)。後漢又鑄了許多錢，而：

魏文帝黃初二年，罷五銖錢，使百姓以穀帛爲市。至明帝世，廢錢用穀既久，人間巧僞漸多，競濕穀以要利，作薄絹以爲市(文獻通考錢幣考一)。梁初唯京師及三吳荆郢江襄梁益用錢……交廣之域，則全以金銀爲貨(通考載前涼索輔之言)。”

由此數節之證明，知道當日爲錢幣的交換，可不成問題了。並且看出當日封建勢力派因爲錢幣交換的發展，影響其本身的動搖；以致曾經下令廢錢，以圖恢復自然經濟的狀態。然而錢幣的交換既發展，更促進商業之擴大。同時高利貸的資本，也已發展。結果商業資本，侵入農業資本，而引起土地買賣的問題。土地成了商品後，則原來守土的農奴，也就隨之而變化。結果一部分的農奴，也同樣的成了商品。韓非子六反篇說：

“今家人之治產也，相忍以飢寒，相強以勞苦，雖犯軍旅之難，飢饉之患，溫衣美食者，必是家也。相憐以衣食，相惠以佚樂，天飢歲荒，嫁妻賣子者，必是家也。”

這是商人致富的結果。再看貨殖傳上說：

“范蠡治產，積居與時遂，……三致千金。”

左僖三十三有：

“鄭商人弦高，出其貨品以紓國難。”

左昭十六有：

“鄭商人與其國君，世有盟世。”

又如太史公的記載：

“昔先王之制，自天子公侯，卿大夫至皂隸，抱關擊柝

者，其爵祿奉養，官室車服，棺槨祭祀死生之事制，各有差別，小不得僭大，賤不得愈貴，夫然故上下遂而民志定，……及周室衰，禮樂墮，諸侯刻桶丹楹，大夫山節藻稅，八佾舞于庭，雍徹于堂，其流至於庶人，莫不離制而棄本，稼穡之民少，商旅之民多，穀不足而貨有餘。”

再看戰國時代的商人，更出風頭。例如以一個呂不韋之富而擢得卿相之職；以一個牛馬商人的段干木竟能煊耀於魏君。以上所說的，就是春秋戰國時的商人之抬頭。

春秋戰國後
奴隸經濟的
發展和政治
上的變遷

到了春秋戰國以後，商人資本的勢力，更是一天天的發展。以董仲舒上書中說：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亡立錐之地。又顯山澤之利，管山林之饒，荒淫制，渝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安得不困？或耕豪民之田，見稅十五，故貧民常衣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古井田法難卒行，宜少近古，限民名田，以贍不足，……去奴婢，除專殺之威。”

據董仲舒的這端話，可見當日商業化的大地主，簡直埒于君侯，其土地被剝奪的，則變為奴隸，地主簡直操他們的

生死權，奴隸莫敢誰何！

商業的資本，高利貸的資本，二者和奴隸，此外還有許多的記載，茲再一一錄列於后，以表明奴隸的發展，和商業資本之勢力。

“童手指千，……子貸金錢千貫。”（前漢書貨殖傳）

“白圭……與用事僮僕同苦樂。”

“卓氏富至童八百人”

“齊俗賤奴虜，而刁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唯刁間收取，使逐魚鹽商賈之利，……終得其力，起數千萬。”

文獻通考戶口考關於婢奴數量的記載如下：

“揚可告緡遍天下，乃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郎治郡國緡錢，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

官奴婢是有罪收沒為奴隸的。私奴婢是買賣而為奴婢的，當時奴婢太多了，所以哀帝時加以如左之限制，詔曰：

“諸侯王列侯公主吏二千石及豪富民，多蓄奴婢田宅亡限，其議限例。”

有司條奏：“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數百人，關內侯吏民三十人，年六十以上，十歲以下不在數中。”

再看秦漢之交，大規模的生產是使用奴隸勞働。礦業日

經興起，如蜀卓氏宛孔氏，邯鄲郭，曹，邴氏，諸多治鐵而致富的人。“與王業埒富。單氏家僮千人。其他富亦僮手指千。”至若關於商業的經營，也係使用奴隸。如白圭的“用事僮僕”，刁間的“豪奴”等是。所以當時的人說：“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萬則僕；物之理也。”（史記貨殖傳）

至于大土地的耕種也用奴隸，如任公之“力田蓄”，有家約以約束家人。“姚己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鐘計。”這都使用奴隸的事實，而小土地的耕種，則由自耕農民及佃農。

春秋戰國後奴隸制的盛行，僅僅由上述的事實，已足驚人。還要從家事奴隸的數目看：呂不韋家僮萬人，嫪毐家僮數千人（史記呂不韋傳）。張良家僮三百人（留侯世家）。

照着上面所舉的事實，可知當時社會制度的中心即為奴隸制。而奴隸制的發生，實因商業資本的發展。由商業經濟的發展，并打破以前限于一隅的莊園經濟。莊園制度的破壞，引起農民的游離農村生活，而集中于都市。同時舊日土地的大領主，也已為商業資本所融化。這就是舊日封建勢力之破壞。

方岳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語說：

“綜結三篇，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但是，便是這商人資本的發展，破壞國內市場，杜絕國外市場，促成大土地私有，於是有財政的掠奪組織在封建制度的廢墟上再建起來。”

由他的結論的解釋：也是說明舊日封建制的破壞，是由於春秋戰國後，商業資本發展的結果。由是杜先生却要承認吾國東周以後，是由奴隸而變為封建的社會，這種和我相反的解釋，實令我百思不解。不過還要預先申明者，我所說：吾國春秋戰國商業資本的勢力，却非歐洲的商業資本勢力；打破了封建的勢力，改為一個商人資本的政府，代理其統治權。中國春秋戰國後，商人資本雖有相當的發展，商人階級的地位，雖然也不差；然而終不如歐洲的商人，一樣的造成資本主義的社會。這個見解與方岳氏的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的結論，也是不約而同的。他說：

“……又向於商業資本及地租與租稅而競爭，構成封建軍事國家統一割據循環無端的歷史。若認定中國社會

是封建制度，必引起似是而非的主張。其實我們所覺的爲封建制度者，或是財政掠奪組織，或是前資本主義所保留之構成封建制度的個個條件。如大土地所有，半奴隸的佃農，現物地租等等。反之，因爲中國早有商人資本，遂認定中國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也是錯誤的。”

但是當日封建勢力雖經破壞，然新興的貴族，又把持政權。而新興的貴族，却以一班士人階級爲柱心。一般士人階級，因爲知識和才能的優越，得以彈冠相慶，被任於朝。及在朝握得政權後，那就一方利用新興的貴族的名義，以號召天下；也等於昔日莊園制度的領主，借天子的名義，以控制其領土上的農奴。同時一般士人，又利用那班在社會操縱經濟權的商人，以爲他們的後盾，而得把持朝政。至于商人階級的抬頭，不過盡了腐化封建的能事。換句話說：只是擾亂了封建社會的秩序；實際上却沒有力量掌握政權，改組一個商人政府，代理舊日封建的地位。這又是和歐洲封建社會變遷的不同。中國社會，自舊日封建勢力破壞後，因爲有這一班士大夫的身分階級，造成官僚的政府。以致弄得中國歷來的政體，瑕瑜互見。既沒有完全消滅封建的勢力，也沒有完全造成資產階級所支配的政府。只是士大夫階級，

操縱于舊勢力——封建——和新興的勢力——資本商人——之間。對於雙方，都表示好感，以致後來還是一個封建勢力和資產階級的勢力，混合并存的社會。士人的官僚政府，簡直是這兩個新舊勢力——封建思想的，資本階級的——的紐扣。假使沒有這班兩頭蛇似的份子，介乎其間，那末不是封建勢力，消滅新興資本家的勢力；便是新興的勢力，完全消滅舊日的封建勢力，并代理其統治的地位。這是說明中國社會的特徵，商人資本的新勢力，雖經猛進，而實際上封建勢力，猶沒有完全消失殆盡。

春秋戰
國後
霸的基
礎

由上面說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勢力，雖沒有完全剷除；却此時的封建勢力，已變其原形。同時新興的商業資本家之勢力，縱然說還沒有完全成熟，而其潛勢力，實能影響於政府。假使沒有商業的力量，政府也會發生動搖，這是無可諱言的事實。然而照着這樣說來，春秋戰國後政府之對商人資本勢力，也猶如周之統一時，中央政府之依賴各地領主。因為此時商人資本，已能使土地買賣，有錢不但有土地，并得有奴隸——農奴化身的。以前統治權與土地所有權，打成一片；到此時商業經濟權，和土地經濟權，漸次融合。以

前政府的收入，多為農業，此時政府的收入，則以商業經濟為最（因為農業經濟即商業經濟的特化）。由是可說：昔日政府的基礎，為莊園的農業；而此時政府的基礎——春秋戰國後的政府——為商業。但是前面已經說明，昔日莊園制的基礎，又是建築于農奴制之上。然則此時商業資本的基礎，又築於誰的身上呢？換言之，商人資本何以能如是發展呢？這一個問題，前面已經舉了很多的事實，很容易答復的。茲根據以前的事實，再略加解釋。

莊園制度破壞後，由土地的買賣，而引起農奴生活的恐慌。結果一部分的農奴，限于生活之不固定，只好游離農村的勞働，而集中於都市。同時一般資本商人，一方面收買土地之後，鑒於農奴制之不利，改用佃戶制；另一方面因為商業運輸的需要，於是採用奴隸制。同時集中於都市的農奴，為了生活問題，也恰好遇到了供求適合的機會，變為商人的奴隸，這是商業資本奴隸制的成立。奴隸制發生後，奴隸的工作時間，既可由主人自由增加，復不要什麼工資的報酬；而且對於奴隸的飼養費，也可任意節省，這樣一來，商人資本，安得不日增月勝呢！一班商人既大家發現這個搖錢樹，又怎麼不相率效尤呢！這就是上述奴隸制盛行的由來。

都市奴隸的需要愈多，而農村原有的勞働者愈減。同時奴隸的大集團愈發展，結果更促進商業之發展。商業資本愈發展，則商人向外謀銷路的慾望，也更發展。並且因為本國商品之多，致有農產品的減少，於是爲了救濟糧食的恐慌，迫不得已行其對外侵略的政策。在這時候中國的社會由商業區侵入農業。也就是中國商業經濟的發展較古代羅馬時代遲遲的證明。當日之官僚政府，爲了本身利益起見，不得不適合商人階級的心理，向外行武力的侵略。這種商業資本的勢力，侵佔農業經濟區的政策，卽爲霸道的本質。由霸道而引起國與國的戰爭，或民族與民族間的血戰，故當時周初所封之國五十，到春秋就只有二十餘國；及戰國時僅僅七國。而七國之最雄者，以商業最發展的秦國，結果吞併六國，而成最大的霸業。國與國之間，固然講霸道，同時本國之政府，對於人民也是行使霸道。并且人民中之有經濟勢力者——商人資本，和商品化的土地資本——也對於無產階級的奴隸，更以霸道壓迫他們。然則春秋戰國後的霸道的起點，固屬於奴隸制之發展；而霸道的歸宿點，也是奴隸制。因爲無論國和國之霸道，或國家政府對人民之霸道，翻來覆去，結果終於集中於奴隸的身上。我所以說：霸道的基礎，爲

奴隸制，而非杜先生所解釋的農奴制呵。

三 農奴制和奴隸制的比較

總結
論

由前述的一，二兩段說明，可得一個農奴制與奴隸制的比較的結論如下：

周之統一時代的封建社會，和春秋戰國以後，封建制剛要破壞的社會，是顯然兩樣。前者為農業經濟自足的狀態，而後者為商業經濟流通的狀態。但在農業經濟——莊園制——的社會，只有農奴制為適合的條件。因為莊園制的生活是固定的，領主對於生產的勞働階級，實為固定的顧主。而顧主欲保持其固定的生活，不得不給勞働者——農奴——以使用權，使其安於土着。同時農奴方面的心理，也因環境的閉塞，其思想和慾望也就有限。只要能夠織而衣，耕而食就罷了；用不着三心兩意的活動，以圖優裕或奢望的滿足。至若商業資本發展的社會，以前莊園制的固定生活，忽然瓦解。於是生產的所有者，和生產的勞働者也就不能固定其生活。商業經濟既屬活動的，則其生產的組織，也不得不因而變化。故此時的商人，因鑒於農奴制之不適合，乃採取奴隸制。同時在奴隸方面說：因為土着性之游離，感受失業

的痛苦，則不得不集中於都市，任一般商人階級之支配。

然而奴隸因受都市生活的陶冶；非若莊園的農奴的馴性之可比。并且天天尾隨主人，東奔西走，所見所聞，又較農奴爲廣；故其思想方面，也是較爲活動。一般資產階級，因恐其反抗，或設計圖逃，於是用一種強迫的壓力，以對待奴隸，使其屈服。這就是霸道之必然性。至若莊園領主對於農奴，因視破他們的心理，所以只要用一種溫情主義的假面具，以輓化一般農奴，就可達到其剝削的目的。這也就是王道之由來。即就實在的事實而論，而農奴的經濟上的地位，比較奴隸的，實際上也可是高一籌。熊得山氏著中國社會史研究中，有一段說：

“但奴隸與農奴，其經濟上的地位亦可略爲分析，奴隸的待遇同牛馬一樣，只是主人的工具，並沒視爲有人格的人，他工作之後，雖亦得着飲食，猶之牛馬雖得芻糧，究不能對自己勞働的成果——農作物有任何與問權，其他身上的桎梏與寢處的牢禁，同牛馬之不自由一般。……至若農奴則較奴隸又高一籌，他雖然忙於領主的貢獻，而在自己的田內所收穫的，他自己仍能自由處理，這就是遠勝於奴隸了。”（二二〇頁）

由這種領主與農奴，和主人與奴隸之比較；可知二者的各方面關係的底細，即推想到王道的基礎為農奴制；而霸道的基礎為奴隸制了。我因為是這樣的結論，所以引起我對於杜先生所著的：“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希望杜先生和讀者諸君的指教！

一九三〇，二，二十四，寫于上海江灣
國立勞働大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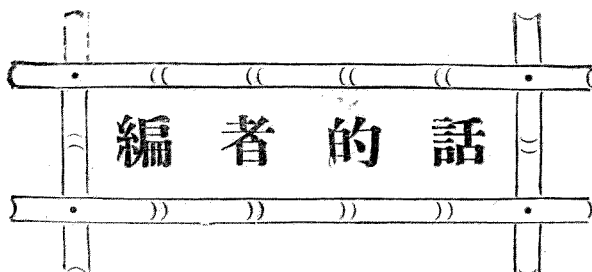
國際關係論

Buell 著 葉啓芳 合譯
曾豫生

作者是美國哈佛大學教授，又是外交政策協會的材料搜集部主任，以研究國際政治知名於世。本書為作者研究國際政治之結晶，內分三部：（一）民族主義與帝國主義間之問題，（二）帝國主義的問題，（三）國際爭端之解決。對於國際政治分析最精，立論最確者莫過於此書。不但研究國際政治者，宜人手一編，即一般欲瞭然國際大勢，亦不得不閱讀。譯文近百萬餘言，第一二卷已出版，第三卷亦已付印。

(1) 著名學科會社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史的唯物論概說	Forchardt	汪馥泉 四角	本書是通俗資本論的著者波哈特氏以純正的科學對社會主義的立場，說明史的唯物論的真著。先講解精神的史觀，次指摘經濟狀態說的謬誤。然後敘述社會的變革之概念，及史的唯物論如何說明社會的變革等。
社會主義社會學	藍維斯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從社會主義的立場，敘述社會學的起源及發達，與關於現在的位置的一般概念，敘述簡賅平明，採用中等學校社會學教本，最為適宜，坊間有兩本與本書名稱相同的著作，然而與本書却不同的。
財政學史	阿部賢一	鄒敬芳 八角	本唯物史觀的立場而研究財政學史的，阿部賢一算是東方絕無僅有的一個人。他是日本的財政學專家，著有財政學，租稅論等書，頂著名的，是他最近所著這一書。財政學史。將各家的學說，作本源的介紹。同時，并寓名觀的批評於介紹中。
戰鬥的唯物論	橫列寒諾夫	杜畏之 五角五分	這一本戰鬥的唯物論是俄國馬克思主義者最激烈的哲學論戰。在本書的前頁傑波林的序文中說，「橫列寒諾夫用其平白易懂又細緻的文筆，在其精巧透關中顯視了內容的豐富，實在論戰術中最光芒射人的模範」。
資本論概要	石川準十郎	洪壽八 八角	這一本書是日人的川準十郎根據考茨基所著的「馬克思的經濟學說」改編而成。不特把考茨基所遺漏的：通通補上進去，并有許多部份是直接引用資本論的原文來說明的，所以這本書是介紹馬氏資本論全三卷最完善的一本書。



編 者 的 話

王亞南的文章印出以後，忽然得他希望暫緩發表的信，因為他自己認為有見解不成熟的地方。不過已經印好，只好請他再來一篇更正的文字吧！

陳邦國的主張，是和王平伯討論一致的。邦國因母喪回籍，以後也許由王平伯繼續寫。

物觀文學史叢稿，寫了一篇關於戲劇的論文參加，可惜太長不能在本期發表。以後胡秋原打算努力參加這個工作，也許能比較快一點完成一個輪廓，愚夫婦則正努力於宋代

的部分。

關於參加中國社會史論戰者的一些消息：

陶希聖說：“豐富的材料才是犀利的戰具，現在誰都感到缺乏材料的毛病。”所以他打算以後少寫文章，多搜材料。現在他已經去北平擔任北大的教授，北平圖書館是真夠滿足他這個要求了。

嚴靈峯正準備寫一部中國經濟史，却一樣的忙於打仗，最近正在草一篇對布爾塞維克攻擊的答覆，和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批判。

郭沫若現在日本，專事潛心研究，不作其他活動。他最致力的是古代史乃至史前的部分，所以他說：“我近來很少注意書上的紀載，而專注意於地底的發掘”。

任曙的中國經濟的分析僅僅是其全部著作的序言，這真是洋洋大觀的研究了。“任曙是誰？”這是近來許多人見面必問的。嚴靈峯在他的駁辯的文中認作任卓宣，還有人疑是陳獨秀，其實任曙就是任曙，據說他曾參加過武漢中央農民部，搜集的材料不少，現在北平某大學教書。他和任卓宣同是四川人，也許是因此而誤會的吧？

靈峯寫信來問孫倬章是何許人，他也籍四川，新從四川

出來的。他對於這篇文章最後的一部分認為是誤會，本想刪去，而雜誌已印好所以沒有刪。靈峯兄的辯難且待他的聲明出來以後再着筆何如？孫倬章這篇論文已單印成冊，大概本刊發賣的時候，該書也可出版。

朱新繁尚有近代思想的分析一文，是一篇很費力的文章，可惜因為有些犯時諱的地方不克與讀者在本刊見面。

——編者——

(1) 類書考參科教校學門專及學大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版四 政治學綱要	涵一高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乃高先生幾經修改之作。內容極其豐富：凡關於國家主權，國權範圍，民權種類，議會制度，以及創制制，複決制，罷免制，內閣制，總統制，委員會制，監察制，考試制等均徵引中外名家著作，詳細討論。
再版 政治制度淺說	慈慰張	精裝二元 平裝一元五角	本書完全以敘述各國的實際政治為主，即有理論也是從實際的政治制度中抽出來的理論。絕不是不談理論的著作，也不是專談理論的著作。胡適之先生和高一涵先生看過本書後，都認為是最有價值的一本書。
國際政治概論	生鯁周	精裝一元 平裝一元	周鯁生先生這本概論裏面，所有關於近數十年國際政局的變遷。歐戰後國際政治的新發展，國際社會的新組織，如國際聯盟，及強制仲裁，國際裁軍，秘密外交，國際主義等項題目，日常見諸報章而不得要領者，都有系統的說明和批判。
政治科學概論	達公楊	八角	這是楊先生在各大學所授的課本，注重實際，介紹歐美學者的思想，並論及中國的政治思想，是專供給大學高中讀的一本好書。
國際法概論	原哲泉 沛學彭	一元二角	泉哲氏這本書別的不論，單在取材均勻，應有盡有，和章節分明各點，已具特色。其中譯者有關於中國國籍法，國際聯盟組織，領海港灣的概念，無害通過權，繼續航海主義的補充，務使讀者完全明確了解。

中國社會史論史

王宜昌

- 一 緒論
- 二 古代社會之中國社會史論
- 三 封建社會之中國社會史論
- 四 資本社會自我批判的開始
- 五 五卅前後之中國社會史論
- 六 回想時期之兩大派
 - A. 新生命派之中國社會史論
 - B. 新思潮派之中國社會史論
 - C. 問題底爭點
- 七 研究時期之四大著
 - A. 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 B. 馮札亞爾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 C. 嚴震峯底“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 D. 任曙底“中國經濟研究”
 - E. 問題底爭點
- 八 論戰時期底爭論與總結

一 論緒

“所謂歷史的發展，一般地是這樣成立的，便是最後的形態，把已往的都看成為是達到自己本身的階段，它總是片面的把握着，因為它很難而且只有完全決定了的諸種條件之下，才能作自我批判——在它崩潰時期已經到達了時的那種歷史的時期，自然是不在這兒的話下。……資本家的社會一經開始了自我批判時，才能夠了解得封建的，古代的，東洋的社會。”

現在，不僅是世界資本家的社會已經開始了自我批判將近百年，而中國資本家的社會也已開始了自我批判了。但我們還不曾了解得中國封建的，古代的，和原始的社會。

1927的革命，很快地從此一形式的完結，開始了另一形式。中國資本家社會自我批判的條件，不僅是“很難”而又是“完全”的決定了。社會關係的變動，和革命實踐的經驗，在客觀上是顯露出了社會的歷史過程，而在主觀上是提供了認識的真理基準。豐富的材料，和犀利的工具，應該得可以了解得中國現在社會，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原始社會了。

然而，自1927後“新生命”，“前進”，“雙十日刊”等雜誌

開始了大革命中的“回想”以來，直到1931年底“研究”和1931年底“論戰”，都還沒有給與我們以解決——相當的解決。

這難道是“社會內容”底不具備麼？上面所述的已給了一個否定的答覆。那又爲什麼原因呢？我底答案是：“理論形式”(theoretisch form)。因爲她沒有和“一切新學說一樣，把先存的思想資料，當作出發之點。”

那些開始中國社會史研究的人——指1925—27前後的人——他們是絕頂的新的。一切既存的理論，在他們底“理論”——指是國際的或自己腦子裏片面了解所謂獨創的理論——之前，都受了絕對的否定。一切過去的東西，都是過去了；一切外在的東西，都和我不相干。我自己的才是絕對的真理。

但是我們現在知道了，他們沒有對於中國現在社會，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原始社會，給與我們以相當的解決。他們底一切絕對的真理，都超不過他們底“回想”的時代，“研究”時代，和“論戰”時代。

我們要想來立足于“先存思想資料，當作出發點”，而作向前的研究，我們對於一切既存的中國社會史理論，不能不

作一個總的鳥瞰式的了解，和分的歷史式的追究。我在中國各社會史中，已曾附帶地批判了一下，現在更綜合攏來寫一篇“中國社會史論史”的論文，便是爲此。

一般智識的發展，是可以劃分的神學的，玄學的，和科學的三階段的。我們同樣可以劃分1925—27年前後底中國社會史論來屬於此三階段之中。1927以前是“從外方從上層來幫助”中國，而得到的神學的中國社會史論。1927以後底“回想”時期，是屬於玄學時期的。從“研究”期到“論戰”期，又是屬於科學時期中的神學和玄學兩小時期了。

而在這些時期之外，還有着兩大的神學和玄學時期。這一則是中國古代社會中底神話和迷信的社會史，二則是中國封建社會中的理學的玄學社會史。整個的資本家社會的自我批判底中國社會史論，都是屬於科學的社會史大時期以內的。但科學的中國社會史，正待我們去創作哩。

二 古代社會之中國社會史論

中國古代社會中，對於原始社會底社會史論，主要地是古代的神話，和後來底公羊家及讖緯之談。那些歷史家著書，如“國語”，“左傳”，“史記”之流是只有紀年紀事的“歷”，

而沒有什麼因果關聯的“史”的。這和封建社會中底一切史家一樣，以至和“古史辨”一流人物一樣，我們是不着重去理論他們的。雖然“古史辨”是一種科學的社會史底前提。

易繫辭傳上面，有一段記載原始社會的話是：“古者，庖犧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于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作結繩而爲罔罟，以佃以漁，蓋取諸離。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蓋取諸益。日中爲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退，各得其所，蓋取諸噬嗑。神農氏沒，黃帝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神而化之，使民宜之，易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蓋取諸乾坤。剡木爲舟，剡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渙。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蓋取諸隨。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取諸豫。斷木爲杵，掘地爲臼，臼杵之利，萬民以濟，蓋取諸小過。弦木爲弧，剡木爲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蓋取諸睽。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蓋取諸大壯。古工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喪期無數。後世聖人，

易之以棺槨，蓋取諸大過。上古結繩而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百官以治，萬民以察，蓋取諸夬。”

這段話，是古代社會中的神學的中國社會史。牠表明了三方面：第一，是社會史觀，或社會哲學；第二是社會構造論；第三是中國社會史。牠從原始的自然神明，從這神明底法則底八卦，來說明社會，這是牠底社會哲學。牠分別從卦中說明了經濟，社會宗教，和意識形態，這是牠底社會構造論。又劃分了庖犧，神農，和黃帝堯舜三個時代。這種時代，從現在底觀點來說，是記實的由漁獵，農業到文明的時代。然而，牠却以卦來解釋其變化。這只是彼時底神話傳說底哲學化的結果。

在論語裏，孔子說着：“堯曰咨爾舜，天之歷數在爾躬。允執其中，四海困窮，天祿永終。”這以“天之歷數”來貫穿歷史底進化了。在禮記禮運的記載裏有：“孔子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英。丘未之逮也，而有志焉。大道之行也，天下爲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故人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使老有所終，壯有所用，幼有所長，矜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男有分，有女歸。貨惡其棄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惡其不出于身也，不必爲己。是故謀閉而不興，盜竊亂賊而不作，

故外戶而不閉，是謂大同。今大道既隱，天下爲家，各親其親，各子其子。貨力爲己，大人世及以爲禮，城郭溝池以爲固，禮義以爲紀。以正君臣，以篤父子，以睦兄弟，以和夫婦，以設制度，以立田里，以賢勇智，以功爲己。故謀用是作，而兵由此起。禹湯文武成王周公，由此其選也。此六君子者，未有不謹于禮者也。以著其義，以考其信，著有過，刑仁講讓，示民有常。如有不由此者，在執者去，衆以爲殃。是謂小康”。

孔子於此明白地比較着原始社會和古代社會底差異，而劃分了“大同”和“小康”兩社會。然而他却沒有說明這個過渡爲如何。

孔子想理解“小康”社會，他是用實地去觀察牠底遺跡底辦法的。在禮運裏又記着：“我欲觀下道，是故之杞，而不足徵也，吾得夏時焉。我欲觀殷道，是故之宋，而不足徵也，吾得乾坤焉。坤乾之義，夏時之等，吾以是觀之。”在論語裏又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徵之矣。”這是可以見得出來的。然而孔子却從此得了“坤乾之義”和“夏時之等”底觀念。于是他在論語裏，又有意見是：“殷因于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頃百世，可知

也。”這是他底社會制度蛻變的觀念了。

由于孔子這“大同”“小康”，和社會蛻變的觀念，漢代底今文家公羊家學者，便據之而主張其“通三統”和“張三世”底社會哲學觀念。他們主張着夏殷周三代各不相同，所以當隨時改革。而天之歷數，有“據亂世”，“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不同，改革是愈改而愈進化的。

這種主張，在識緯兩種書裏，更加擴大了。春秋元命苞這緯書中，便主張着三統三世底主張。春秋命歷序則把從“開闢”以至魯哀公時“獲麟”這時期，劃分為十紀：一是九頭紀，二是五龍紀，三是捫提紀，四是合雉紀，五是連連紀，六是敍命紀，七是循蜚紀，八是因提紀，九是禪通紀，十是疏倫紀。各紀各為二十六萬七千年，共計二百六十七萬歲。論語摘衰聖承進識分歷史為帝，王，霸三時代，謂“帝不先義任道德，王不先力尚仁義，霸不先正向武力。”他們是把左傳，莊子，離騷，淮南子等所記“神話”，和孔子底“天之歷數”混合起來，劃分着他們所謂歷史時代了。

三國時徐整著的三五歷紀載的南方神話說：“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陽清為天，陰濁為地；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于地。天日高一丈，

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後乃有三皇。”五運歷年紀又載：“首生盤古，垂死化身，氣成風雲，聲爲雷霆。左眼爲日，右眼爲月，四肢五體爲四極五嶽，血液爲江河，筋脈爲地理，肌肉爲田土，髮髭爲星辰，皮毛爲草木，齒骨爲金玉，精髓爲珠石，汗流爲雨澤；身之諸蟲，因風所感，化爲黎甦。”這是把神話來完成了古代社會底中國社會起源論。而開拓了封建社會中底中國社會史的劃分階段。

綜上所述，中國古代社會中底中國社會史論，是以“天之歷數”來演成的。他們去原始社會未遠，所以還可以有原始社會中共有生活底記載。他們利用神話傳說，把牠化成正史而以歷數來劃分階段了。這是中國社會史論底神學階段。

三 封建社會之中國社會史論

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對於中國社會史底理論，關於佛老的宗教之談，我們且不理他。我們只舉宋代理學大盛時代底一個理論，便可以代表了全封建社會的理論。胡宏在所著皇王大紀序言上說：“天道保合而太極立，氤氳升降而二氣分。天成位乎上，地成位乎下，而人生于其中。故人也者，父

乾母坤，保茲天命，生生不窮者也。天始萬物，日月星辰施其性；地生萬物，水火金木運其氣；人立萬物，仁義禮智行其道。君長陪貳，由道以紀綱，人生而理其性，然後庶績熙，萬物遂。地平天成，而人道立。三皇五帝，三王五伯者，人之英傑，爲君爲長，率其陪貳，應時成物。如春之生，夏之長，秋之利，冬之貞也。自堯而上，六闕逢，無紀。堯之初，載甲辰；迄于赧王乙巳，二千有三年。天運盛衰一周，人事之治亂備矣。萬事不能易其道者也。”他底書共八十卷，上自三皇紀起，下迄周赧王止。第一卷三皇紀，記着：“盤古氏，天皇氏，地皇氏，人皇氏，有巢氏，燧人氏。”五帝紀，記着：“帝太昊庖犧氏，驪連氏，栗陸氏，中央氏，柏皇氏，大庭氏，赫胥氏，尊盧氏，啓統氏，吳英氏，朱襄氏，葛天氏，陰康氏，無懷氏，炎帝神農氏。”第二卷五帝紀，記着：“黃帝軒轅氏，青陽少昊氏，顓頊高陽氏，帝嚳高辛氏。”第三卷五帝紀，記着：“帝堯陶唐氏。”第四卷五帝紀，記着：“帝舜有虞氏”。

中國歷史，由胡宏才把盤古神話加上去，作了一個開端。在胡宏以後我們底中國歷史常識，便是“盤古開天地”，和“天地人三皇”了。但胡宏雖利用神話，他却不是用神話底記載，以爲盤古住在宇宙中，或化生爲宇宙。他把盤古玄學化

了。把盤古從古代底易底自然法則蛻變出來，成爲玄學的本體論和宇宙論。他和一切宋儒底理學一樣，從太極，從二氣，從陰陽來說盤古。就是他說天皇，地皇，人皇，有巢，和燧人，都是用的陰陽二氣底和合。在庖犧以後，才根據神話傳說；堯以後，才開始紀年。他對於歷史，只劃分着從盤古至于周赧王乙巳，爲“天運一周”，內面又劃分着三皇，五帝，三王，五霸這四個階段，兩個循環。這是玄學社會史。

這封建社會的人們，是沒有劃分古代社會的。如胡宏底劃分，是把周代全體包括在“天運一周”之內去了。而在周赧王滅亡以後，却未有劃分。這個從秦代起作爲上下兩個時代的劃分，至今還沿用着。這劃分底大的力量，是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引起來的。因爲在封建社會中，及漢代，以爲秦把古代書多燒完了，而漢以後是另一新進的文化。又一方面，是秦的統一六國，開始了以後的統一。人們底思維，只是局限于封建思維裏，主張着形式上普遍的統一，而不會瞭解這統一的內容是變化的，正如地域之漸由北而南底擴張一樣。統一底概念，在他們底思維裏獨立起來，會看不見差別的內容了。

康有爲重新恢復了漢代公羊家的社會進化論。而以爲

清代是“據亂世”，只能進于“小康”和“升平世”，而不能進于“大同”底“太平世”的。所以他底大同書竟自由着他自己底社會哲學的唯心體系而埋沒了。

後來底受了西歐和日本資本主義文化影響的人，如梁啓超，夏曾佑，劉師培等，便開始了資本社會底自我批判，要求解決中國歷史底時代和史實了。但夏曾佑底中國歷史教科書，却仍是以時期單純地劃分着中國歷史，以秦以前爲上古，秦至唐爲中古，自宋至清末爲近古。梁啓超多具備點社會學常識，所以多談了些什麼氏族，奴隸等等于先秦政治思想上面。民元以來的教科書派歷史，雖然不編年，不列傳，但也只是隨便地劃分時期，以秦以前爲上古，秦至唐末或五代末爲中古，而以自五代或宋迄明亡爲近古。以清代爲近世，辛亥爲現代。這個是了無意義的而且對於歷史底因果和聯繫有害的割裂。

四 資本社會自我批判的開始

中國資本家社會自我批判的開始，是五四運動前後開始的。在更前，太平天國改革了宗教。康有爲復興了社會進化論，不過證明封建的據亂世，應該進於資本家的小康的升

平世而已。而在五四運動中，如吳虞底打倒孔家店、胡適的先秦名學的哲學史，都是，積極主張着資本底“合理”和封建底“不合理”的資本家精神。這是“資本家的經濟，未盡神話地把自己和已往者完全一致化時，對於前幾期的它的批判，特別是對於它還在直接鬥爭着的封建的之批判。”他們“處理事物時，用種奇妙的方法，以為只有‘人爲的制度’和‘自然的制度’這兩樣制度。他們視封建制度爲人爲的制度，資本制度爲自然的制度。”固然，他們或許不會都是具有這種明瞭的意識來做他們階級的代辯者，但那些不理解歷史的，亦無能力理解歷史的人們，因為爲他們階級的自發意識所網，是跳不出這個圈子。所以不得不從“合理”“不合理”這種資本的人性上去和封建爭鬥了。

吳虞底爭鬥，是對於孔子和其禮教的非難，這是一個資本意識對於封建的正面爭鬥。胡適本着他在美國所受的資本主義的薰陶，從社會底病害來解釋古代哲學或名學，同時用社會病害來解釋五四時代底社會問題——封建社會崩潰中所興起的問題。這純粹是杜威底實用主義的觀點。胡適便用着這樣底觀點，——資本家的觀點，來解釋中國社會史，是時勢之變化，所使然了。梁啓超解釋中國社會史時，多用

着地理的觀點。胡漢民也曾應用過經濟的觀點。他們都“憑藉新知以商量舊學”。以資本家社會底理論，要求解釋中國底古代社會的思想以至政治了。

而從這種思想和政治的追求，必然要追求到古代的歷史。古史底研究，便必然地從這種“理論形式”的邏輯發生了。

顧頡剛，傅斯年，衛聚賢，疑古玄同，劉挾黎等都參加在這“古史辨”的工作之中。他們從歷史記載上和歷史底理論兩方面着手，或辯或駁地攷證古書底真假，攷證神話故事底傳說。把古代社會的社會史論，和封建社會的社會史論中，禹底前後的歷史都否定了。然而從理論解說和歷史記載兩方面，是不能建立起原始社會底歷史來的。這只有從發掘的實物遺跡，才可以作為實證。然而，利用實證材料，在資本家意識之下，只能做着歸納法底分類比較的初步工作，如王國維，羅振玉等所為。而不會有以“理論的思維”為媒介的，對於原始社會底“媒介的具體”的說明。

中國底古代社會，對於中國社會史底理論，會從直接遺傳下來的的神話傳說，和去古未遠的兩種迥然不同——公有和私有，大同和小康——社會的比較，而有着較合于實際的

記載。但“歷”的記載只是記載而已。而“史”的說明，則以其“社會內容”底限制，而只有繼承着原始的汎靈論 (Animism)，魔術迷信底神話的“理論形式”，以至於爲奴隸主人底哲學所曲解成“天之歷數”了。古代社會底社會的內容，是奴隸主人們把“天之歷數”來辯護他們底統治，其更露骨的表白，是孟子底“無君子若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底奴隸和貴族的自然分工論。他們同時又沒有歷史的比較。所以是不會正確地說明中國社會史的。

中國封建社會底中國社會史論，首先是承繼了古代社會底“天之歷數”底理論形式，以維持和辯護其封建貴族地主們的統治。這和這社會內容本身，只是一種階級的，私有財產的，和國家的社會底，從近代奴隸社會延長來的一樣。所不同的，封建社會多滲進了點風習宗教的統治，多滲進點制度的社會作用。所以在社會史理論上，從帝王底力量和偉人底力量上，多加入了理學底唯心的成份了。因爲這種繼承的原故，他們不會劃分古代社會和他們自身底封建社會而外，同時又把原始社會也從他們底“理”的觀點，修改了“同化于他們的封建社會”。封建社會底理論的形式，和社會的內容，同樣使其中國社會史論不會正確了。

資本主義社會，則世界的交通，構成牠底生產方法的基礎。而中國資本主義社會，則更有先進的資本主義社會爲其先導。這樣，他不僅具備了各民族社會的歷史可資比較，而其在民族社會中，各歷史階段底劃分，也要加以比較。不僅是具備了嚴密的理論思維的工具，而且又具備了便利的種種實踐的技術。資本家須要把過去底歷史完全同化于牠，由牠來支配，來渲染以彩色。那和牠這“生產之最進步而最複雜的歷史的組織”，完全不同的封建社會，古代社會，和原始社會，便首先不得被理解了。而又首先在可能了解他底物質條件具備之下，開始被了解，但是，資本家是只會片面底理解，而以爲已往的歷史，都是達到他自身的階段，把已往的一切歷史，除去其特徵，而發現普遍于其中的資本主義制度。把以往的歷史完全同化于資本主義。他們只會達到這一個“仍然是不理解中國社會史”的中國社會史底理解。

可以說，五四前後，直至于1927年以後底玄學期的回想時代，都是這樣的片面的理解。

我們於此轉入1925前後底中國社會史論這一科學階段的神學力階段吧。

五 五卅前後之中國社會史論

在五卅前後，對於中國社會史的理論，主要地是說明當時革命家們底“打倒軍閥”，和“打倒帝國主義”底社會根據的。他們是乘着資本家意識，從自然生長性到了目的意識性；他們努力地論證着中國爲封建制度的國家，和弱小民族的國家。這在某種有權威的思想上，我們且不去理論。在新青年前鋒等雜誌，和社會主義討論集上底文字，也是如此地證明。牠比前者，不過多證明一點，即是在弱小民族的封建的國家內也有階級爭鬥，和依着列寧底理論，在世界和國際底觀點上，東方——中國是資本主義最薄弱，和資產階級最卑鄙的國家，有建設社會主義可能和必要罷了。

這個國際的和世界的觀點，在今日仍然是普遍地印入於人們底腦子裏的。而這個觀點，如果不爲中國自身所修正，那不會理解中國實際，構成中國社會主義實踐底科學的基礎的。然而，在彼時，正沒有從中國社會史自身來修正，來決定牠底適用程度，牠遂不得不構成一種“先天”的理論。構成一種沒有物質，特別是沒有理論基礎的社會的“飛躍”。這只會構成一種神學的中國社會史。

我們可以將恩格思的話，略為更動幾個字，來解釋此時代底神學社會史論：“如果在五卅當時，那種從新社會制度上產生出來的矛盾，還正在開始產生，那麼，解決這個矛盾的手段，自然更說不上了。如果武漢和廣州的無產羣衆，在恐怖時期暫時的獲取了統治權，那麼這祇表示在那時的條件之下，這種統治，是如何的，不能保持。無產階級，這新的階級幹部，還祇從無產羣衆中分離出來，牠還完全不能作獨立的政治行動；大家還祇把牠看作受苦的被壓迫等級，牠（指無產階級）既無力幫助自己，所以最多祇能從外方從上層來幫助牠。”

“從外方從上層來幫助”中國1925—27的革命，便只是俄國式的理論，是外來的神學。

世界的國際的觀點，不是不適用於中國，而是應該依中國內在的社會史實如何，來修正來決定他底適用程度。所以解決中國社會史問題，固然要由國際和世界的影響，而根本的却仍在于中國本身。這可分開兩層來說：第一是，中國社會史的發展階段，應如實地就中國社會史來說明，而把國外的外來作用看作對於中國的一種外力，或參加進來的一種力。第二是，中國社會史論，須得在中國社會底實踐行動

上去認識，和理論研究上去構成，而不能單就他人所說的理論來嵌合，歷史記載的事實來羅列。主要地要找中國的實際材料。

中國社會史底科學研究，只有立足于無產階級和社會主義的觀點上才能完成的。要這樣，他才不會爲封建意識底普遍的統一所蒙蔽，又不像資本家意識，只看見樹木，不看見森林。他底階級利害，是如實地解放一切，理解一切，無所用其利害的顧忌。這樣，一切事實，才能從實證材料上，從歷史載上，從理論說明上，這三方面，得到如實的說明。

然而科學的說明，也不能不經過神學的和玄學的階段，即不能不由同一到差別，最後達質量互變底如實決定的。1927以前五卅前後底神學階段，便是這中國科學社會史論底理論的歷史過程之一。

這時期也曾劃分中國社會史階段的，這種劃分，便依賴于外來底理論形式。當時最通行的社會史理論，不是蔡和森底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底編譯本的社會進化史，而是廖划平底社會進化史及張伯簡底社會進化簡史和社會經濟結構原素表。這兩本書又是波格達諾夫底經濟科學大綱底節譯（後來不久便正式譯出了兩部來，一是施存

統底經濟科學大綱，二是周佛海底經濟科學概論)。所以他底劃分，和波氏一樣。在中國應用起來，爲着證明封建與弱小民族兩命題，略有變化。略舉武漢時代底工人子弟教材編輯計劃草案中一段如下：——

“甲，東方之部。一，中國內部。A. 中國古代部落的爭鬥；B. 秦代的橫霸，——秦代始皇與平民；C. 漢唐的橫霸——漢唐時代的平民——漢唐時代的弱小民族；D. 宋元明清各代的鬥爭，——各時代的平民；E. 中國革命——辛亥以前的革命——從辛亥以至於今日的革命。二，帝國主義的東侵。A. 印度的滅亡——英帝國主義的的東印度公司；B. 南洋羣島淪爲殖民地；C. 鴉片戰爭，和英法帝國主義壓迫中國；D. 帝國主義者與中國所訂的一切不平等條約；E. 安南緬甸的滅亡；F. 英帝國主義者侵略西藏；G. 日本帝國主義者滅朝鮮；H. 日本帝國主義者掠奪台灣及澎湖諸島；I. 中國與日本帝國主義戰爭；J. 義和團開中國第一次反帝的先聲；K. 日本帝國主義與舊俄帝國主義的戰爭。三，俄國。……”

你看他努力把秦以來劃分爲貴族與平民的爭鬥，卽封建社會。又把帝國主義東侵來努力證明中國之爲弱小民族。而封建一階段中，不免包含了波格達諾夫底奴隸與封建了。

漆樹芬著的“經濟侵略下之中國”或帝國主義鐵蹄下的中國，汪精衛底國際問題艸案，彭湃底海陸豐農民運動，以及中國農民，工人之路，中國工人等刊物，都是證明封建和弱小民族。

在國外此時期底有名的中國革命運動史由拉狄克講演了。拉狄克，和波格達諾夫一樣，把商業資本獨立起來，構成一個社會階段。他說：“中國商業資本主義已有幾千年的發展，歷史上的封主完全沒有了。土地可以自由買賣，因而集中到商業資產階級手中，他們剝削的目的，與封建地主不同，因為後者不知道貨幣經濟。他們的目的，不過是為得黃金，裝飾品，美女而已；因此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只有商業資本家。”他把春秋戰國以來底中國社會史，都歸入于商業資本家所支配的階段去了。拉狄克底書，在1927年後才翻譯到中國來。然而他在俄國，却種下了一些影響于中國的反對派的理論之中了。

這一階段的中國社會史論，拉狄克在中國是沒有影響的。所以只有波格達諾夫的影響和國民革命的封建與弱小民族的中國現社會論。而這便開始了回想時期中底玄學理論的基礎形式。

六 回想時期的兩大派

1925—1927的革命以後，因為社會階級關係的變革；理論上也不得不分化了。這樣，形成了兩大派別，一個是“新生命派”，如新生命，前進，雙十月刊，以及後來東方雜誌，教育雜誌，婦女雜誌，學生雜誌上關於中國社會的論文，和現在的社會與教育刊物都屬之。其理論的代表人物是陶希聖，又叫方岳。他底著作是中國社會史的分析，中國封建社會史，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編），中國社會現象拾零，西漢經濟史，辯士與游俠，及此外未收入的各刊物上的文字；另外的則周谷城著有農村社會新論，中國社會之結構，中國社會之變化；王志瑞底宋元經濟史；和散見于新生命上的梅思平，朱伯康，戴行軺，梁園東，黎際濤等的文字；散見于前進上的公孫愈之的文字，見于雙十月刊的熊子奇即熊得山底文字（他後來集成中國社會史研究）；和另外的刊物上的教育論者學者們的文字。

另外一個是“新思潮派”。最初的是武漢政府的土地問題，彭述之底中國革命中的根本問題，瞿秋白底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和布哈林底中國革命與中共的任務。其次是恩

想月刊上朱鏡我底中國社會底研究，郭沫若底中國社會發展階段（後來收集于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盧賓斯坦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最後是新思潮上的潘東周，王學文，吳黎平，李一氓，向省吾等的文字。新思潮第五期底中國經濟研究專號，集了他們底理論的大成。好似‘新生命派’可以陶希聖一人爲代表一樣，‘新思潮’派便可以這個專號來作代表。同時，世界月刊，摩登青年，以及後來的讀者，理論與批判，社會科學戰線都有同一思想的文字。另外的人物，是朱新繁和朱其華底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中國社會經濟及其結構各書。他也是代表‘新思潮派’底思想的一個人物。

此外的比較可以各自獨立的，是李達底中國產業革命概觀，郭真底中國資本主義史，李麥麥底中國經濟其發展其現狀及其危機，陳公博底中國歷史上的革命，鄧演達在革命行動上的文字，和吳貫因的中國經濟史，劉大鈞底我國農佃經濟狀況，陳達底中國勞工問題，唐道海底勞動問題，及其他各種問題專著與各種歷史問題專著等。

另外的關係於各政黨底秘密刊物，小冊子，議決案等很多。不過我們無從知道，又在武漢，在廣州，以及北平所出版

的刊物，和著書，我們也不能十分清楚，不列舉了。

而且，在同一時期中，“研究”時期的著作也出來了，第一本是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是散見于思想和東方雜誌上，後又搜集起來而加以補充的。最後出了動力上的嚴靈峯底文字，後來集成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和任曙底中國經濟研究，馬札亞爾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結束了回想期時代，而成爲研究時代了。

在回想時代中，還有些外國著作是要加以敘述的。卽如馬札亞爾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在新生命上已有介紹，其他日本著作，有長野朗底中國社會組織，支那土地制度研究，伊藤武雄底中國產業組織和資本主義的發展，馬克司，伊里奇等底民族革命論，田中忠夫的中國經濟論文（散見于北新，村治等上面），拉狄克底中國革命運動史，王純一底西史概要，金果仁等的西方革命史，上田荒樹的世界社會史（劉叔琴的民衆世界史，柳島生的世界史綱都據此編譯），陸一遠底社會形式發展史，塔爾海瑪底現代社會觀等底翻譯。其中有些全部是關係于中國，而有些是部分地關係于中國的。還有未譯的書，我知道的，一本是中國留美學生 P. S. Lee 著的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另外一本是田

中忠夫底中國經濟史研究。

上面把一些書和兩大派別列舉了。我們在此處主要地要敘述的，只是這兩大派底根本思想。其他的只是隨時可以談到時談及一點。

A. 新生命派底中國社會史論

新生命派底中國社會史論，誠如陶希聖在中國封建社會史中所說，是革命後的“回想”。假如我們掉一個哲學上的名詞來說，這是人類的悟性底“反省”。這種方法，正是玄學底根本的方法。新生命派便以這種方法，開始了玄學的，而亦是資本主義的，正式的中國社會史論。

由于回想，便只好承繼了五卅以來底封建和弱小民族論。但以模糊地自發地意識到1927來的階級社會的轉變，而又得不到正確的理論，只是用着他自己底意識以解釋過去，於是將過去底封建社會改變一些兒，成爲封建制度消滅，封建勢力存在底X社會了。

陶希聖自己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一書的開始，說着他應用什麼歸納法，統計法，抽象分析法。這只是從波格達諾夫底經濟科學概論和社會主義社會學（薩孟武譯的書名是這樣，陳望道等譯名社會意識學大綱）上抄來的所謂經驗

一元論（即經濟批判論）的玄學方法論。波格達諾夫雖然知道“歷”，然而不知道“史”；知道“抽象分析”，然而不知道“理論思維”，和“歷史具體”。在“歷史具體法”上完全，在“抽象分析法”上又不完全。而在綜合“歷史具體法”與“抽象分析法”的科學方法，即唯物辯證法，則是一點也不會知道的。因之，對於社會歷史法則，也會一點也不明瞭，而貿然地覺到封建社會是變更了一點子，但又存在得不多，所以便會成爲自春秋戰國以來底X社會了。他不知道制度（下層基礎）與勢力（上層建築）固然可有衝突，但不會長時期存在的。但他要維持他底X社會的存在，不得不造出兩個對立的階級，一是統治者的官僚貴族地主混合的“士大夫階級”，一是一切被統治被壓迫的“遊民無產階級”，來包羅一切的迥不相同的社會階級。“官僚政治”也是同樣底一個百寶囊，可以裝得下許多不同的政治。“羅馬底萬神廟”，好似陶希聖底X社會了。

這很顯明地，其理論形式是承繼五卅以來思想而略自改變的。波格達諾夫底毒害，更從他而深入于中國。其社會內容，則只是1927年來底資產階級的從自發到目的的意識。

1928年，陶希聖因爲要改變一下1927以前的理論形式，

對於科學的社會主義是“感覺”“恐怖”，但對於奧本海末爾底“武力征服”却“感覺”到可以利用一下，以“征服”科學的社會主義。他於是譸譯了奧本海末爾底國家論，而且從其中得到了種種的暗示。於是中國封建社會史和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兩書中，不少應用奧本海末爾底“海國”，“陸國”，“土地私有權”，和“商業資本”之點。尤其是“商業資本”，成了社會科學戰線所稱的“陶希聖底魔手”，構成了他所謂X社會的經濟基礎了。他底方法論，是明白地表示為“感覺”“現象”。真的，這正是道地的經驗一元論。

1930年來陶希聖只從事于中國種種複雜的社會現象，加以感覺，而零碎地記錄下來。成為他底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他在其唯一功績，搜集了許多材料這資產階級學者底歸納法的雜亂排列之中，不僅是懷疑到了以前的“制度消滅，勢力存在”底理論，而且懷疑到了1929年中底從“有史以來便是中國封建制度停滯遷延變化消滅”的意見。更根本懷疑到他自己所理解的什麼“封建制度是基于租佃制度”或“建基于農奴制度”之上底理論，誰是誰非。資本論第三卷上商人資本的史實一章他不得不從以前感覺到對於教授學者們的凌辱和恐怖中，嘗試去理解而把牠翻譯出來了。

這一派人物對於中國自秦代左右至今這一社會底理解，總以為是變化了的封建社會。不管是梅思平等稱為商業資本社會，陶希聖稱為地主階級社會，方岳（陶希聖）稱為X社會，戴行軺稱為過渡社會等等不同。但終於他們是認為一個特殊的社會。

他們完全忽視了從太平天國，辛亥革命，和1925—27年革命來底社會變化。又忘記了在西晉以前的社會與六朝以後不同。“商業資本底魔手”或者“大學教授底圖式”（盧森堡語）是可以虛構一切的。

他們以為秦代或春秋戰國以前，是封建社會。而在唐虞以前是原始社會。最初出版的熊得山底中國社會史研究，更把有巢，燧人，庖犧，神農等神話傳說，擬合于衣住底發明，火底發明，畜牧底發明，農植底發明等等。

他們是忘掉了社會進化史上，還有古代社會一個階段。而且他們太不究內容，只重形式了一點，輕輕地把feudalism與“封建”這習用名詞合一了。他們完全不究feudalism底歷史的實質，完全不究中國古代“封建”底生產關係，只是以玄學的理論形式——波格達諾夫底糅雜奴隸制與封建制的封建社會形式——來嵌合，那真太玄學了一點。

新生命派底中國社會史是謬誤的。這是有牠的歷史的必然。在理論形式方面，便是他們承繼五卅以來的思潮，而只能略加改變。他們本着經驗一元論的玄學方法，只能搜集一些材料，而雜亂地記下一些現象來。不能從橫面底從商業資本底交換關係底分析，而深入于社會勞動的生產關係；不能從縱面的由後至前，復由前至後的歷史追溯與敘述，而求出種種不同的社會階段和其關聯。其社會階級底限制，便是資產階級，只能有對於過去歷史的片面理解，將過去歷史看作達到他的階段；同時又在他直接地與封建爭鬥時，對於封建是有着無情的暴露的必要。他們爲着辯護自己，是不會歌頌1925—27年他們底興盛的。——有歌頌的人，那不是新生命派，而是另一些自然生長的性人物。目的意識性的人物是不會不自知辯護的。

前進，雙十月刊，先導，現代中國，革命評論等刊物上的文字，主要地證明1927左右底工，農，小資產階級應該同盟革命。他們底社會階級，沒有社會的性質，而只是自然的性質，所以不會有社會階段底劃分的嚴重問題的。他們却不能明瞭1925—1927的革命教訓。陳公博底中國歷史上的革命，也只證明這工，農，小資產階級革命這一點，而沒有了解19

25—27的革命教訓。

這也有其理論形式和社會內容的限制的。他們底反封建反帝國主義的國民革命的理論形式是保存的。而他們底爲資產階級的急進主義者，則很顯然的。他們在同階級與某一部分的妥協中不滿，然而他們又怎樣跳得過自己本性底限制呢？

鄧演達底觀點，是進一步地反對某些資產階級，即財閥等人物。然而他會只承繼五卅以來的理論，不了解1927革命已完結了一個階段。

新生命派底中國社會史論，及其附屬的各種理論，簡短地敘述完結了。牠是位置于玄學的中國社會史底前一階段的，歷史地和邏輯地都在“新思潮派”之先的。以下來敘述“新思潮派”底中國社會史論。

B. 新思潮派底中國社會史論

新思潮派底中國社會理論，最初便是否定五卅以來的理論開始的。土地問題中便深入于土地革命問題，而中國革命中之爭論問題和中國革命中的根本問題，便趨入于階級變化的理論。但在1927秋季的政治上的變動，他們突然地否定了以前的國際形勢的決定等神學理論，而一轉到“亞細亞

生產方法”底純粹國貨理論。他們構成了中國底“民粹派”，或如劉光所稱爲“新修正主義”（中國經濟研究後序）。他們認中國有一種獨特的社會制度，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限制着中國資本主義，而使資本主義爲他們的附屬物。由這種民粹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論，實際上是否認了帝國主義，而只承認中國社會本身是特殊的了。所以，此後雖然又否認了“亞細亞”這一題論，然而也只知道中國本身，而從事着土地革命，不知道帝國主義了。

他們既然要否認五卅以來的國民革命，即封建和弱小民族的理論，他們是不得不輸入理論經典來。其實這種輸入理論，已是表示大革命完結後底休息和理解時間。然而他們却不能了解，而只是趨向于1850年後的巴枯寧式的玄想。他們輸入底公式理論，“對於他們只是一固純粹的模型，用這個模型來構成一切的主題；又只是一個生字及用法的索隱，這個，除了備需要的時期的查考以外，沒有別的目的，而在這裏是沒有思想及積極的智識的。所以終于成了這樣的情形，像很多人們所說一樣，這些人什麼東西都不懂，但什麼東西都能寫。而這些先生們自己也似知道弱點所在，而避開了大問題。”

他們避開了1925—27革命底教訓不研究，他們也不顧忌1925—27底封建和弱小民族的理論，以至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理論，又提出個“半封建”的現代中國社會的理論來了。而在過去底社會階段劃分上，則李立三中國的封建勢力與封建制度中說是：“中國純粹封建制度雖然在幾千年前——周末秦初——因生產力的進步，商業資本的發展而破壞了，可是起而代替的集權統一的國家組織，是建築在封建剝削與手工廠生產方法的基礎上；……而他的主要的剝削形式——生產方法仍然是封建的方式。直到帝國主義侵入以後，……封建的剝削關係，仍然是占着優勢。”這和新生命派底X社會是大同小異的。不過新生命派還承認封建制度之崩壞，反之，新思潮派，則雖然主張“半”封建，實則直承認至今仍為封建而已。

新思潮第五期中國經濟研究專號，不過是努力想證明“半”封建底從秦至今的中國而已。他們主要地從農村經濟底“破壞”，“落後”，“數量大”上去積極證明封建之不僅于他們自己讓步的“半”，而是封建。他們又從帝國主義和軍閥之互相勾結，積極阻礙中國資本主義上面，去消極證明封建之維持其存在。在理論上，他們實在是比“新生命派”還落後于

封建之中，極力主張着封建之存在，而與之決鬥的。如潘東周底中國經濟發展中的根本問題，中國對外貿易問題，直是照抄資本家經濟學生馬寅初底馬寅初演講集上的理論。

這樣底理論，其與新生命派不同的，不過是各人運用的模型不同，而其爭論，也不過是模型上之爭論而已。

這理論底理論形式，便在于他們只知道繼承五卅來的封建理論，而不研究1925—27的革命教訓。他們只參攷外來的理論模型，而不究中國實際。一味的應用機械的玄學公式的論證。而且又不能發現新的材料，只能抄襲陳舊過時的材料。所以理論不得不落後了。而其社會內容，則只是小農民的意識。這小農民，列甯說他是小資產階級性和無產階級性難以分別的。他們對於封建地主的強烈的憤恨，和從1925—27年來灌入了革命的熱情，支持着他們底無政府主義的情緒。

朱新繁是這個派別底著述很多的人。然而他的著述，和陶希聖一樣，只是資本家學者式的搜集，歸納，排列材料而已。所不同的，陶希聖是搜集和排列各時代社會史的材料，而朱新繁特別是搜集和排列資本社會中的封建勢力及各種理論文獻而已。

中國革命與中國社會各階級一書中，不過是根據土地問題，及農民月刊上毛潤之底材料，證明農民之成爲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不分的一團而已。這和陳公博等等一樣，其工人，農人，是沒有社會內容的東西，而只是一個自然的範疇。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在書底開端便籠統地然而又非概要地敘述了整個抽象理論的資本主義之發展，這便是他搬來底玄學死公式。可惜這死公式也沒有運用在中國來，因而其所謂“發展”也者，也只是些不連貫的“問題”而已。中國農村經濟關係及其特質，只充分地證明中國農業之“破壞”，“落後”，“數量大”而外，又證明“富農之特殊性”。中國社會經濟的結構一書，則仍不過證明“半封建”而已。

就單以其對農村經濟而論，他們也只是應用“半”底死公式理論，而努力去證明“半”之“破壞”，“落後”，“數量大”，“富農特殊性”的。他們對於農村經濟，沒有“澈底的思考，不顧什麼利害相反的結果”（布哈林語），而只有死公式的玄學理論。

這從讀者，理論與批判等上面漸入于研究期中的理論，仍是承繼新思潮理論形式一點，可以看出來了。讀者上底理論，對於“生產諸關係”是完全沒有弄清，即牠和“生產方

法”或“方式”，和“生產力”，和“技術”底關係，也不清楚以致于把帝國主義和資本主義，各認為是一種根本不同的生產關係。理論與批判上底文字，則辯護着“半”封建，而把過去忘去了的“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重新提出來。而在1931年九一八事變以來，重新興起了他們底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的“特殊”理論。不過帝國主義和半殖民地，在中國社會上的解決，不屬於新思潮派底死公式理論，而是屬於從“經濟地理”和“經濟史”上去澈底思考的。

玄學死公式理論形式，常是扶得東來西又倒的，不是左便會是右，在觀念上無味的搖擺，是根據于其主觀感覺，所感覺到的表面社會現象而定的。所以1927後的“亞細亞生產方法是”突然政變的結果；後來底“半封建”，是農民戰爭底結果；而現在底半殖民地，不過九一八事變底結果而已。

他們底混雜一團的小農民社會層，分不開(!)小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階級層，是不會使他們更進一步的。

有些專門研究一種制度的書，如土地制度研究之流，是沒有一點理論常識的。他們只是從表面政治法令來研究，而不知道法律底經濟意義，不是一定的，而是無定的。于是他們也只成爲記載法令史的書，而不是有社會內容的研究。

如西史概要，西方革命史，世界社會史，民衆世界史，世界史綱，社會形式發展史，中國革命運動史之流，和波格達諾夫一樣，商業資本是獨立起來，而中國封建制度是從秦以前便完了的。這和新生命派是同一的理論。

The Economic History of China,除了以土地地力漸減律解決中國社會變亂史而外，又說中國歷史是治理農業的歷史。其他便是搜集了文獻材料。田中忠夫底中國經濟史研究，則不過茶業史，和貨幣史而已。

中國經濟其發展其現狀及其危機的思想，是蛻變了一點，就是他引了更多的更近的材料，以辯明中國資本主義數量的一點。和這對於現代社會研究相反的，是對於古代社會研究也蛻變出來了。這是郭沫若底中國社會發展階段一文，指出了回想期中普遍忘去了的“奴隸社會”在中國之存在，而且劃分了殷代至東周爲奴隸社會。這便開始了研究時期了。

C. 問題底爭點

回想時期底兩大派中國社會史論，是同由五卅以來理論形式的遺傳，不過是各人的理論的修改不同，一方是奧本海末爾，一方是馬克思而已。

他們在理論形式上的相同，并非偶然的只是文化遺傳的結果，而是又有社會的內容，這就是說新生命派是激進的產階級，而新思潮派則是小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難分的小農民。這兩階級底社會意識，其於反抗封建勢力則同，而其於未來的自己利益和社會前途之估計，和一己之目的意識的行動則大有差異。因此，在參加的亦即自己努力戰取的理論不同，而對於中國社會史論，便大有爭點存在了。

這個爭點，主要地在於“商業資本”的問題。由此而發生的，便是“X社會”或“商業資本社會”和“半封建”社會的問題，“士大夫階級”和“官僚政治”等問題，也不過是一個附屬產物而已。

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一樣，因為是對於封建的直接的反對，所以對於原始社會，古代社會，以至封建社會之起源，是不關心的。他們只究心于現在社會以前的直接連繫着的歷史，但他們却不是“從後至前”地思索，而偶然地從任何的歷史時期中，感覺那些他們所要感覺的現象。於是從種種不同社會關係中所形成的一種現象，被他們認為作用於歷史的獨立因素，構成了他們底“因素論”了。“商業資本”在歷史上許多時代作用過，但是牠具着種種不同的社會關係，即生

產關係，因而其作用也各各不同。但我們底“商業資本”因素論者——新生命派——却正如其抹視中國有史以來的社會階級劃分一樣，抹視了牠底社會關係。而由商業資本，可以構成一個獨特的社會。反對牠底新思潮派，也抹視了中國社會階級，與商業資本底社會關係，而固執着商業資本底不能變革生產關係的性質。但又不能充分說明商業資本底社會性質。於是新生命派以商業資本解體舊社會而能成立商業資本社會，而新思潮派則以商業資本不能變革社會，但以帝國主義之侵入，而形成了半封建社會。

他們底理論，都只是分析商業資本，即分析經濟中的交換關係和分配關係，社會中的上層建築而來的。他們沒有深入于生產關係的分析，所以不會有科學的分析。而他們底對於社會上層建築物的理解，只有使他們只把握落後的，破壞的，殘存的封建勢力了。

新思潮派只是供給了一個深刻地服從科學的社會理論的觀點，和參進了帝國主義的要素，使中國社會史論趨向于生產方面以求解決。然而牠是應用理論成爲機械，對於生產不充分的。

中國社會史底理論，由此，是必然地更深入于正確理論

之運用，和生產過程的分析的。“研究”時期便是注重于這一點。而且，只有從這一點才可以決解“商業資本”底爭論，開拓中國社會史論的科學前途。

七 研究時期之四大著

科學的理論，是有其社會性質，即階段性的。在靜態的形式論中，資產階級也可以達到整齊地羅列材料的程度；對於自然科學，是可以加以說明，但對於社會科學，則記述仍覺不足。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的中國社會史論，自然是沒有到說明的程度。即在敘述的程度上，亦欠充足。他們不僅是對於現在社會和過去社會，未加說明；即在材料上，對於現在社會，也只利用着1920年以前的陳舊材料和統計；對於過去社會，則只略記春秋以前，漢代，唐代，以及元代等某些事實，及各代法令——不論其有經濟意義與否；而對於東漢魏晉六朝直至清代中葉，沒有比較系統的記述。

對於社會科學底科學理論的說明，原不是資產階級或小農民底事。而只是無產階級底事。後者以其“集中社會一切敗壞”的立足點，是不顧利害，而以廣大深銳的眼光，從社會實際底運動變化，互相關聯，和質量突變中觀察實際，把

牠邏輯地羅列起來，而理論地加以說明的。所以中國社會史論底科學研究，不屬於資產階級，而只能屬於無產階級見地的“社會主義的智識份子”。新生命派自然是無份，而新思潮派也是無關了。

“研究”時期，是承繼“回想”時期而來的。他們是更深入於科學理論的應用，更明白地戰取無產階級的觀點，更堅固地立足于無產階級的立場的。他們所使用的材料，是在回想時期底陳舊材料之外，又加入了新近的材料，如1925至1930年的現社會材料，各地域各產業部門的個別材料，以至古代的發掘的材料等等。

歷史的材料，可以分爲三大部門，第一是物質的材料，即各代生產工具等實物遺跡；第二是記載的材料，即各時代的文獻所記的歷史；第三是理論的材料，這是一般的歷史結論的邏輯體系。這種材料的可靠性，是以物質的材料爲最，而理論的材料爲最次的。從理論的材料構成歷史理論的神學階段；從記載的材料構成歷史理論的玄學階段；而物質的材料，才會使歷史理論成爲實證的科學。

“研究”時期底材料大部是記載的，而漸次有小部入于物質材料的範圍。這在現代社會，則由于分析1925—1927大

革命的實踐經驗，和現狀而得，在古代社會，則由于考古學的發掘，和文藝復興中古代文字音韻的闡明而得來了。

A. 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

研究時期末第一鉅著，是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這本書是由五篇論文和一些追加附錄構成的。第一篇是發表于思想上的中國社會發展階段；第二篇和第三篇，是發表于東方雜誌上的易經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和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第四篇是卜辭中的古代社會，第五篇是周金中的古代社會，都是從發掘的古物古文來研究的。

郭沫若底中國社會史階段的劃分，是以西周為古代社會。西周以前為原始社會，在殷周之間，有奴隸制的革命，在文化上的反映，形成易經。東周以後，由古代奴隸社會，變成封建社會，易傳是此時形成，而詩書諸子也是此時的文化革命。東周以後的封建社會，到清末由資本主義的侵入而破壞；科學輸入和五四運動等，構成資本制的文化革命。

至於劃分階段的標準，很顯明地，郭沫若是以文化革命斷的。雖然他是應用着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一書上的理論，然而他只是在文化革命底標準之下，應

用這一理論。而沒有應用這一理論來理解文化革命。所以他說西周生產力很進步，是鐵的利用于農耕；說封建制革命是人民暴動逐周厲王；說中國沒有自發發展資本主義，是沒有蒸汽機關的發現，這些是附屬於文化革命底標準之下的。

然而以文化革命，或說文化興盛的時期，作為革命的時代，作為劃分社會階段的標準，那是錯誤的。因為文化變革，或文化興盛的時期，不是社會變革，或舊社會衰頹，新社會興的時期；恰恰相反，牠只是一社會發展到成熟的時期，未來社會正在萌芽。於是統一的社會內部的矛盾漸次分裂了，形成了對立。而其理論上的代表，即文化遂分成了保守的，辯護的，和激進的，攻擊的兩大派，以及介于其中的種種複雜的派別，“理論鬥爭”起來。這便是一個社會底文化興盛時期或文化革命時期。我們試以十九世紀的歐洲來看，歐洲文化的發揚，正是資本主義的成熟，和無產階級的初生。而古代希臘，正是奴隸社會成熟時，有極高的文化。同樣，中國現代社會中文化的興盛，正表示1916年來資本主義的盛熟，和1925來無產階級從其前身近代化的萌芽。於此，我們可以說古代社會中春秋戰國以來的文化興盛，正是古代奴隸社會成熟的時代。易經底時代，不過更古代的奴隸社會之興盛而

已。所以說，西周之始終，有着決定的奴隸革命和封建革命，那是錯誤的。

郭沫若初時只利用古代記載材料，如易經詩書等，後來又只利用着發掘材料，如卜辭周金等，這是不足的。我們必須利用多種多樣的古代記載的材料，如各種文學記載，神話傳說等。自然我們是不能利用後來增造的記載傳說，但我們却正可從科學方法去吸取種種的記載和傳說，加以理論的說明，尋出牠們在當時的實在形態，和以後的增改形態的不同。而此種當時的文學記載和神話傳說，便成爲我們的歷史材料了。即如關於“井田”制度的傳說記載，我們如果不是否認社會的思維是反映的社會物質，則我們必不能否認“井田”在古代社會有其傳說底物質的來源。這我們是要從種種方面去解說這種傳說才是正當的。我們的唯物科學，是不允許簡單地歸之於人們的理想之創造的。而我們要解決“井田”底問題，不只是從卜辭周金上可以解決，必定要從各種古代的記載中，用科學去解說，尋得材料，才可以解決的。

我們要應用科學理論，即理論的材料，像郭沫若底簡單地應用恩格斯和摩爾甘底研究成果，又是不足的。因爲理論，是簡單化了的複雜多樣性的具體，是以思維作媒介產生

的媒介的具體。因為理論底是簡單化，必定要由于物質的，即時間的，和空間的不同，而生出理論底不充分的性質。於是在某一場合應用起來，其不充分之點更加擴大，而使應用者至於抹視現實，強就理論了。我們可以說，中國社會史論研究中之所以謬誤，主要的都是由此而致誤。我們要補足這缺陷，便只好在理論說明底引用之外，更要將此理論說明所發生的歷史事實拿來比較。事實和事實的比較，一切本來的複雜性和多樣性才會顯露，在某時代理論所未充分注意到的地方，才會被充分的注意。從而理論的說明，才不會抹視物質的實際材料，而理論的材料自身，也得到驗證和修正引伸的發展。

關於古代社會，我們便不能只以摩爾甘恩格斯的結論為足，而更要以各地原始幼稚民族情形，中國古代及後來落後民族(如匈奴五胡等)情形；以及古希臘羅馬，和夏殷周秦漢等時代，作一比較。摩爾甘，恩格斯等所認為各社會階段的典型的東西，只是在他們所運用的材料中底典型中的東西。我們新加入的中國，以至東方(如印度或日本)的材料，或者會使他們所謂典型的東西變位的吧。我們不要為典型的理論所蔽，而忘去從實際事實中發現其本身的法則，發展新

理論。

郭沫若即在應用恩格斯和摩爾甘底結論時，也是不充分的。即他沒有充分地追究古代社會，或奴隸社會這一階段的發生，發展，變化和消滅各階段。特別是他不明白奴隸社會底“沒落”這一時期的情形。他只中了“起源”（恩格斯家族私有財產及國家之起源底“起源”）的影響，所以只研究中國古代社會底“起源”這一期，即是只研究了殷周底奴隸制度的發生和發展。而不看見後來秦漢底奴隸制度的變化和消滅了。於此，他却造出了一種新說，即所謂“封建制的革命”，周代平民把周厲王逐走了這一回事件，成為郭沫若底古代社會消滅論。

假如我們多注意一下中國歷史，與希臘羅馬的歷史，則周代平民“流王於彘”，比之羅馬平民據羅馬城外聖山，以威脅貴族，即為已足。還說不上斯巴達卡斯的偉大的奴隸暴動。而且，在社會史的理論材料上，也不會有“封建制的革命”之存在的。因為奴隸社會不是由革命而消滅，而是由異族侵入而消滅其腐朽的貴族統治的。因為封建社會，不是由革命而建立，而是由原始生產方法，加於奴隸制生產方法之上，統一而成的第三生產方法，即由氏族侵入奴隸社會，而

以新民族底血，新生舊日衰滅的社會的。奴隸社會自身，可以有種種不同的種族底兼併，和奴隸自由民平民們的叛亂，但這不會消滅奴隸社會自身，轉換到另一生產方法去，而只是變更着不同來源和形式的奴隸與奴隸主人。這只要一追溯奴隸種種來源的發生時期，和奴隸主人種種來源的發生時期便是證明了。

所以中國古代社會的歷史，郭沫若從卜辭等證明商代已有奴隸之起源，而西周爲奴隸社會，是對的。但說東周以後，開始了封建社會，那是錯的。我們會從秦漢社會生產的分析上來證明秦漢之爲奴隸制的古代社會，和從羅馬底比較上來證明秦漢是奴隸社會。中國奴隸社會的變化和消滅，即其沒落，是在秦漢以後的，而不是在秦漢以前底東周。

只有如此地劃分中國古代社會，才能正確地理解春秋戰國時代底哲學，和秦漢兩代底政治和法律。也只有這樣劃分，才可以劃出古代社會和後日封建社會的聯繫的必然。

郭沫若底功績，在於肯定地指出，而且研究了中國古代奴隸社會底起源這小階段。

B. 馬札亞爾底“中國農村經濟研究”

研究時期的第二鉅著，是蘇俄馬札亞爾著的：中國農村

經濟研究。這本書是許多的專門研究的論文合成，而又大概地構成一個體系的。即是先從水利，黃土層，墾殖區等地理條件研究起，然後及於土地分配形勢與性質的研究，農業和手工業的研究，最後及於帝國主義與農村階級。他底研究的範圍，是局限於農村經濟之內的。

他在導論裏，歷舉了馬克思恩格斯卜列哈諾夫等關於社會史階段劃分，及其應用於東方的“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理論，作為他的理論形式。他在文中又不時提及印度和日本的經濟史來作為“東方”底中國的旁證。

他不僅因為其局限於農村經濟之故，而又以其忽視研究和敘述方法之故，只看見中國經濟底地理條件限制下的靜，和農業經濟下底落後。他底敘述法和研究法同一了的，是從地理條件開始。然而，這是靜止的消極的受動的條件是不能作為充分說明社會進化之用的，而只是作為修正和補充社會進化底單純經濟的說明的。我們只有從運動的積極的，主動的人類勞動和技術上，才可以說明社會進化，才可以看見經濟底發展前進。我們底科學，不就是要羅列出中國農村的靜止現象，而又要說明出牠底發展變化來，這便只有從動的變化的一點開始，從本質的一點開始，漸次地參加種種的

靜的消極的旁生的材料，來補充，來修正，來決定本質的運動在具體中的形式。論究底述敘，不得不如此的。這樣底敘述，才一方會把握在歷史的縱面上，其發展的中心和原始，他方會把握在社會的橫面上，其組織的中心和支配力。

如馬札亞爾底敘述，却正相反，把歷史底中心和社會的中心放在旁邊，而把旁邊的東西，放在歷史和社會的中心了。於是遂不得不看見黃土層和水利，整個地支配了中國歷史了。

他又不僅因爲其局限於農村經濟之故，而又以其忽視理論的材料之時間性空間性及其適用範圍之故，只看見中國經濟之落後，和不可分的階段了。他應用着“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以觀察東方和中國社會，簡單地以他底不十分弄得清楚的理論死形式，來囊括中國有史以來的歷史，好似陶希聖說中國有史以來，便是封建制度的停滯迂延變化消滅一樣，有史以來，中國歷史便被囊括於“亞細亞生產方法”之內。他是不充分地研究中國有史以來的整個歷史，而簡單地隨便引用各種不同時代的種種經濟事實，參加於各種不同的題目研究中的。於此，他又抹視了中國歷史的現實。加上農村經濟和地理條件的把握及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理論形式，

馬札亞爾便只好認中國社會爲亞細亞式的東西了。

然而，“亞細亞生產方法”，不是在社會史階段上，成爲包括一切階段的東西，而只是屬於某一社會史階段的一種變異形式——由地理條件而變異的形式。馬克思在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所說的“亞細亞的”社會階段，和以後在資本論與通信上的“亞細亞式生產方法”。在馬恩兩氏自己已經說明是封建社會的一種變異形式。而牠和古代社會的關係，從1861年學者們開始了原始社會的研究以來，後來他們便變更了其前後聯繫的觀點，而由卜列哈諾夫指明了。但卜列哈諾夫却沒有否認“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封建性，和聯繫於古代社會之後的封建社會底必然的聯繫。所以，我們就使應用“亞細亞生產方法”底理論於中國社會史時，也應注意牠底應用範圍，只是在於封建社會。

假如我們說“亞細亞生產方法”，是指整個的東方社會史。那我們只是不理解這一理論出生底時間和空間的限制。馬恩等的這一理論，其材料是由東印度公司及後來的貿易者供給的。而其材料底範圍，正是限於封建社會。他們不會有材料和時間來研究印度或中國的全部歷史，當然他們不會有着對於中國社會階段的劃分或包括，而只能指示着他

們同時期中，世界上現存的可以代表諸社會階段的國家中，東方有着“亞細亞的”一種階段。

我們對於這東方歷史，是應該詳細地全部研究的。馬札亞爾以蘇聯的人民，也不會全部地研究東方歷史的。

我們可以從東方歷史底研究中，來決定“亞細亞生產方法”底意義，和決定東方歷史底社會階段。

佐野學底日本經濟史，已解決了日本底社會階段，不是可以亞細亞生產方法囊括的。他底日本社會史序論，也不會機械地應用亞細亞生產方法的理論。綜合經濟史（新生命版）內某人的日本經濟史，也不會機械應用亞細亞生產方法的。而在郭沫若已經證明了中國的古代社會之存在。我們又會發現封建社會在五胡亂華以後開始。中國自然也要跳出“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口袋。在印度，我們已可以略為敘述一下她的社會階段，以證明什麼是“亞細亞生產方法”。

印度文明的起源，是和中國，美索不達米亞，和埃及一樣，同時很古的。最初是在印度河恆河的兩源流附近處開始，而後來在印度河及恆河兩流域繁盛起來的。在古代原始社會裏，發展了吠陀的神話。優波尼沙士的哲學，和婆羅門教，是從原始社會初時分裂為階級社會時的產物。

歷史家從紀元前二千年計起，印度平原因地理形勢缺乏天然保障，如大山，沙漠，或大海等，被異族侵入了二十六次，有二十一次是成功了的。即上述吠陀的神話，也是中亞細亞奧克蘇斯河畔的亞里亞人種侵入而產生的。婆羅門教的婆羅門，刹希利，吠舍，首陀羅四階級的劃分，便開始了古代階級的社會。佛陀生於紀元前六七百年，大約和孔子同時。而其社會階級，也大概相同。佛陀死後佛教在恆河流域的繁盛，是奴隸社會的極盛期。而自紀元後四世紀以來，佛教便在印度衰落，而輸入於中國，構成中國封建社會中底宗教和哲學的理論形式了。佛教在印度的衰落，可以說是相當於印度底古代社會的衰落的。北方的異族和西方的回教徒的侵入，使印度入於封建社會的時代。

封建時代的印度，其地域已經從兩河流域，發展充分地到了各內地山地了。1526年蒙古族在印度建立了莫加兒帝國。和其他印度各部並立着。他們的統治，正是封建的統治，是用貴族和軍隊（武士）去統治的。而這些貴族和武士們，則從帝王處弄來一切的土地分給農民，把農民固定於土地上，徵取四分之三的農產物。而在十六世紀以來，西方的商業資本便侵入了。1509年，印度半島西岸有了葡萄牙防地，1679

年東岸有法蘭西領地。1757年的戰爭，英吉利東印度公司獨佔了印度。而其後三年的1760年，英吉利便入於產業革命時代。1833年東印度公司的獨佔取銷，公開的東方貿易，不僅是把印度充分的傳染了資本主義，而且把中國傳染了資本主義了。此後印度底封建制度，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中的農業和紡織手工業，在英吉利底政治強力之下，比中國是很快地破壞。而資本主義，由軍事和商業市場而很快建立起來了。歐戰中印度民族資本充分發展。1885年成立的國民會議，在1920年後開始了印度民族資本主義的政治爭鬥了。印度和中國相較，印度是更深地資本主義化了。但其獨立的爭鬥，則因其為英吉利獨自的屬地，是比中國落後了。

由上所述，我們很可知道，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生產方法，只是指的印度和東方底封建社會了。

馬札亞爾底功績，只在於他詳細地陳述了中國農村經濟的現狀，而或多或少地說明了其資本主義的發生和形式。

C. 嚴靈峯底“中國經濟問題研究”

研究時期的第三鉅著，是嚴靈峯底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書是從兩篇動力雜誌上的論文，構成了主要的內容。另外加

了一篇對於兩論文批評的批評在後面，和着前面的一篇關於中國經濟問題研究的簡單結論和方法論的序文。這本“研究”鉅著，和上述郭氏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馬氏中國農村經濟研究，同樣是由論文構成的。

嚴靈峯是研究的中國現代的社會，所以他底兩篇主要論文，第一是中國是封建經濟還是資本主義經濟“？”，第二是再論中國經濟問題，是以成爲爭論問題的現代經濟爲問題的。他底課題，只是就問題解答，所以只是一問題底橫面的理論上的爭辯，而沒有歷史上的追究的。

因爲缺乏歷史上的追究，便不得不弄出錯誤了。他底錯誤，和郭沫若相反。郭氏忘掉了一社會階段的後落，而嚴氏則忘掉了一社會階段的發生。他也會說及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但不是從實際歷史去尋求，而是從國際上的外來理論上去尋求的。所以他只是遵從他所謂“唯物史觀”來斷定中國資本主義是自發發展，而帝國主義——正確說，國外資本主義——是一個促進的力而已。他由此攻擊“外鑠論”。他不知道“唯物史觀”并不是先天的結論，并不是可以用理論來改變歷史的。反之，牠却是實際歷史的抽繹，是對於實際歷史研究的指導而已。唯物史觀并未承認，任何地域，任何

民族，都可有各種社會階段的發展，反之，牠却承認哀斯基摩族只能存留于原始社會，希臘羅馬會發達奴隸社會，北歐羅馬發達封建社會。北海岸發達資本社會。因此，我們就中國實際歷史說，可以說中國社會，是只發展了原始，古代，封建之階段，因地理限制，決不會發展成資本社會。假如對此有其他異議，我們不能就空論上來解決，而只能就實際歷史來解決的。

嚴靈峯底“先天式”的唯物史觀，不問中國底實際的地理條件，和其他實際歷史情形，而只依“先天”便承認中國資本主義爲自發。這只是回想時期底死理論遺傳下來的惡影響。

在論證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之中，因爲缺乏資本主義發生的歷史，對於農業經濟中中國資本主義所演的原始蓄積的形式，沒有研究；因而忽視了農業資本主義的詳細分析。他只有簡單地舉出農業上機械使用而已。嚴靈峯于此，缺乏理論的引用，即經濟學的應用。所以他在方法論底序言中，完全沒有說及資本主義的“地權”和“地租”。這樣地對於農業資本主義研究的缺乏，所以他論證中國資本主義，只有借重於商業，而以爲城市以商業支配鄉村，國際以商業支配

中國了。

所以“商業資本”，對於嚴靈峯又成了一個重要的理論工具了。嚴靈峯底商業資本，是具有獨立性，過渡性，而沒有社會性質即社會關係的。這和陶希聖的商業資本是同樣的“怪物”。新思潮派和新生命派的爭點，沒有由嚴靈峯加以解決，反之，却只承繼了兩派底抹視生產關係的觀點，更明白地把商業資本獨立起來，作成一個“因素”。這比陶希聖更進一步，但是，更謬誤一些而已。

新生命派底商業資本，是把封建社會破壞了，獨自構成一個社會的。新思潮派則是固然破壞封建社會，但仍包含于封建社會自身之中，而沒有更向前進展到另一社會階段。嚴靈峯底是封建社會到資本社會間之過渡，是有着獨立性的。他們同樣都只理解商業資本底一方面，而未理解他的全體。新生命派說商業資本破壞封建社會，是對的，但對的只此一點，即破壞只於破壞而已。誠如新思潮派所說，破壞封建的商業資本，仍是包含於封建之中。封建社會中之商業資本，是封建的否定，而不是否定之否定；這好似資本社會中的股份公司，是私有的否定一樣。牠有獨立性，但限於封建社會之否定底地位。牠有過渡性，但限於由封建後之發展資本主

義而已。商業資本，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會從屬於生產總資本而喪失其獨立性。只有其後，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過渡性才能成立；奴隸社會中的商業資本不會構成過渡性，因為其後不有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之故。而資本與封建間，則商業資本在封建中構成資本的原始蓄積。奴隸社會中商業資本也構成某種蓄積，但沒有發展後來資本制生產方法，所以不是資本的原始蓄積。嚴靈峯底沒有生產關係決定的獨立性和過渡性的商業資本，只有半面的真理。

商業資本，是不能由“商業資本”成為優勢，或“因素”時所可解決的問題。回想時期的理論形式，還限於商業資本底獨立的研究，而沒有研究社會生產總體，特別是沒有研究生產關係；嚴靈峯底承繼的理論形式，和國際理論的滲入，仍然是把商業資本獨立地研究。這在社會的內容上，不能不歸於他們底在社會生活的上層，只看見上層的商業資本。

嚴靈峯反駁新思潮派底封建的或半封建的中國現社會論，認為中國資本主義已自發發展，而且是佔了支配的地位。但他的論證是不足的。他以為資本主義的質是比封建制度良好的，所以資本主義便是優勢了的。但我們如果反問，資本主義剛在封建社會中萌芽時，資本主義便佔優勢了嗎？

假如我們不是唯“質”的偏面論者，而是“質量互變”論者，則一定給與否定的答覆。質的良好，不定就成優勢，只有是說，因質的良好，可以加大數量。必須以一定的數量，才可以得到質的優勢或支配。所以資本主義發展的不足，會成爲封建社會中的苦難。資本主義發展到決定地顛覆封建的時候，才會佔着優勢或支配。這時候資本主義自身的法則，必定完成起來。這種法則，和封建制度的法則，其差異是有如動物和植物自身法則的差異，很易看出來的。嚴靈峯沒有從這些法則上去論證，沒有充分地舉出新材料。而他只論證國內封建勢力，國外帝國主義，并未阻礙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即在方法論底序言上，所舉的工資等，也未足爲決定的資本主義範疇，只有平均利潤，資本集中，恐慌等才有決定的意義。我們要論證資本主義的優勢，我們不得不留意于此的。

嚴靈峯底功績，在於他反駁了“新思潮派”的封建或半封建論，和不主張“新生命派”的過渡社會，而主張着資本主義發展，資本主義優勢。但他却未能證明資本主義社會。

D. 任曙底“中國經濟研究”

任曙著底“中國經濟研究”，是研究時期底最後的一部鉅著。這是一部比較地有計劃的著作，是有着一個體系的。

但後面有各章的許多追加，這一方可以說是爲着出版的匆忙，沒有收入正文；他方可以說是爲着談“經濟研究”外的“政治研究”，所以特別增加這些“追加”。

他很有計劃地，把過去各種各派——自然主要是回想時期的——的對於中國現在社會的理論，分成保守，改良，修正三大派，而一一加以指摘。新生命派大概地歸入於“改良派”中，而新思潮派則是“修正派”。劉光的一篇序，和後半篇反修正主義論，主要地是批判新思潮派的。

這種底對於過去中國現代社會史的清總精算，是作爲中國經濟研究底起點的，而且也是正當的。因此清算，過去的理論形式，只有在無產階級觀點上被 *Aufheben* 了，而不能有着庸俗的繼承。任曙在研究中的每一個問題，都把過去的結算一下，加入新的統計與材料，而肯定地下着結論。我們且不論這結論是否正當，然而這種“研究”，是一種較好的方法。

就他全書內容來說，是努力地證明中國之爲資本主義社會的，特別是利用 1925—27大革命後到1930年的新材料來證明。由此，我們也可進一步說，假如嚴靈峯是研究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則任曙是研究1925年以來的中國資本

主義社會。

但他仍然不脫回想時期的商資本的遺毒的。他研究“中國”經濟，却先把握“國外”帝國主義。他更進而把握中國底對外貿易，認為是中國經濟問題的中心問題。這很顯明地，不是從生產方法來說明中國資本主義，而只是從交換形式來說明。沒有究心於生產方法中的諸種社會性質的系統的結構，而只是看見種種生產方法所結成的交換關係。他和嚴靈峯一樣，對於農業資本主義沒有仔細的分析，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的歷史沒有追究，沒有發生的理論，發展的理論也只好陷於片面的真理的。

而且，正由於沒有發生的理論，任曙和嚴靈峯對於中國資本主義的發生，在玄學思辨中爭論起來了。任曙是主張“外鑠論”，但沒有歷史的說明，也沒有說明中國為什麼不能自發發展資本主義，而只就國際帝國主義理論來說明。嚴靈峯主張“自發論”，也沒有歷史說明，而只求教於國際一般的商業資本的理論。假如理論不是“行動的指導”，在思辨上可以解決問題時，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不須再研究了。“研究”所表現的，應該是充分地提出實際材料，從歷史上去解決問題。

在製出和引用新統計新材料上，任曙底“研究”，是能充分表示研究精神的。回想時期所利用的材料和統計，多半來自抄襲，對於統計，既不能分析，又不能應用舊統計來編製恰合於各種質量表示的統計；對於材料則不加斟酌其確否，審慎其內容與時間空間的限制。例如，最重要的中國土地分配的統計，帝國主義侵略中國的文化機關東亞同文學會誤抄(?)中國年鑑上北京農商部統計數字以來，周佛海在三民主義之理論體系上首先引用，此後便濫用了幾十百次。雖然革命評論上有人指出過牠的錯誤。但那些抄統計的辯護式的學者，却正要便利地引用來證明他們的所謂理論。任曙充分地指明統計之必須精製，選擇，和審定，這是很對的。但任曙對於統計，有一缺點，是對於統計缺乏分析。農商部的統計，有些固然謬誤，但在其謬誤之中，仍然是含有許多正確的。我們只能從精密的審定和選擇之中，加以正確的說明，解釋出統計上許多表面上似乎對我們矛盾，而實際不矛盾的現象。例如關於農民土地分配底各省的詳細統計，我們可以從分析中見得地域的不同，有經濟情形底變異。而其說明，也不能不從地理條件使其發展不平衡上去說明的。

追加中的政治研究，嚴格地說來，也因為政治有些是作

爲經濟的緣故，是應參加於經濟研究中的，而他指出1911年的辛亥革命，和1925—27年的大革命，有着重要的意義，這是很正確的。假如我們承認政治作爲一種經濟力，承認1840年來德意志政府的改良，1861年來俄羅斯政府的改良，及日本明治維新，對於資本主義的發展，是有一種促進力的決定意義，則1911年的辛亥革命後的改良，是促進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的。同時1925—27年大革命的決定意義，不僅於此後底“內債”和“新式租稅”上實行中國資本的原始蓄積底政府和銀行交易所可以看出，而充分地動盪了農村的農民叛亂，和農民戰爭，也可以看出來了。因此，1925—27年以後底中國資本主義社會，成了一個決定的社會階段。而任曙底中國經濟研究，才有着更重要的“研究”意義。

然而任曙自身，對於1925—27大革命的中國社會史上的認識，是不充分的。他底研究政治，或者簡直說研究經濟，主要地是爲探究1925—27大革命後當前的形式，而求得適當的指導理論。但他對於大革命的估計，不從中國社會史本身，即中國資本主義本身上去認識；而是從國際的革命理論來估計，以1925—27以後的材料來非難1925左右的革命理論，這很錯誤的。因爲我們分析政治問題，主要地是“研究”

階級的力量底對比。而我們估量1925—27底無產階級的革命力量，我們便不能不充分地追究中國無產階級底發生和發展，以及無產階級友人的農民——或甚至於農村的各階級，——手工業工人，小商人，和手工業者底階級形式。我們知道，無產階級是從封建社會中底無產者，手工業工人，小農民等蛻變出來的。近世無產階級和封建社會中的無產階級底前身，是必須明白區別的。而且近世無產階級在經濟上成爲一階級，及在政治上成爲一階級底發展程度，也須加以明白的區別。我們從此種觀點來觀察1925—27時代底無產階級，則很明白地正是從其封建的前身蛻變出來，在參加資產階級革命中漸次地獲得政治意識的時候。他底幼稚的程度，不僅是由於其理論之錯誤與無力，和革命行動之錯誤與失敗而證明；而且又由於其由上面（國際和其他階級）來幫助上可以證明了。所以，只就理論形式上依邏輯的方式以非難1925—27中的理論是可以的，若就社會內容來說明1925—27的革命理論時，任曙是沒有充分認識當時的社會階級，不得不弄出錯誤。

任曙底功績，是總清算了一次關於中國現在社會的中國社會史論，而向前更進一步。研究了1925—27大革命以後

的中國資本主義，而且認定了她是發展。但他却未充分認識1925—27底革命。

E. 問題底爭點

這研究時期的中國社會史論，第一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第二部關於中國農村（或者我們假定說是大部分關於封建社會的）經濟的，是脫離了回想時期底理論形式的遺傳。但却是更加深了新思潮派底應用科學的理論的程度，而就為死理論所拘，未能充分研究中國歷史事實底全部了。第三部是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社會的，是比新思潮派更進步的，而又是承繼新生命派底理論形式而來的。嚴靈峯在其中的和新生命派沒有直接的爭鬥，不過是以資本主義的發展來證明新生命派的特異形勢。他和新思潮派却立于直接的理論爭鬥的敵對地位，而其爭點，却在於中國資本主義是否發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是否受帝國主義和軍閥的絕對阻礙？中國資本主義是否已佔支配的地位？他底解決，對於前兩者是對的，而對於後者則是不充分的。第四部關於1925—27以後的中國資本主義的研究，任曙才充分解答了後一問題，但仍然沒有說明1925—27。他和嚴靈峯是立于敵對地位的，這敵對底來源，是他清算了過去一切的理論，而從其上立脚；

嚴靈峯却是繼承過去新生命派某些理論而只和新思潮派對立而已。他們底爭點，不在於他們所研究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及其支配地位的建立，而在於他們所未研究的資本主義之“發生”。即嚴靈峯攻擊任曙底“外鑠論”，而承認“自發論”。然而他們同樣是沒有研究農業資本主義，沒有研究資本之原始蓄積和資本主義之發生。在理論上的爭辯是無由解決的，因為是玄學的無真理標準的爭辯。

“研究”時期，一般地是立於無產階級的見解，盡量應用國際上存在的科學理論的。但均應用得不充分，即不會應用到理論的全體，而只應用到一部分。於是其理論便形成了神學式的先天理論，如郭沫若的“封建制革命”，馬札亞爾的“亞細亞生產方法”，嚴靈峯的“商業資本”，任曙底“國外貿易”都是。假如我們應用科學理論的全部，便不能不反對一切理論的死公式的運用，而只能以之作爲“行動的指導”。我們應從中國歷史底實際材料中去研究中國資本主義的起源，以解決“外鑠論”與“自發論”的爭點。而從此乃得研究中國農業資本主義，和中國原始的資本蓄積。

“研究”時期底人們，還未深入於生產的分析，特別是沒有分析農業生產。換句話說，可說是對於生產力沒有分析。

因為沒有研究生產力，所以自然無法理解社會階級的發展。而郭沫若不會明白奴隸社會的沒落，馬札亞爾不會明白亞細亞生產方法底歷史階段，嚴靈峯和任曙不會明白資本主義的起源的。

深入於生產力的分析，和研究其相適應的生產關係，與相適應的過程，是此後研究的理論的課題。從此種理論的完全明白，才能正確地理解中國社會史。

八 論戰時期底爭論與總結

論戰時期，是從讀書雜誌第一卷第四五期合刊底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開始的。其中底爭論，主要地是對於“研究”時期底攻擊。但馬札亞爾，因為是蘇聯底人物，而且其研究局限於一產業部門，沒有明白地涉及社會階段，所以是避免了攻擊。但郭沫若底奴隸社會，和嚴靈峯任曙底資本主義社會，却成了攻擊的焦點。

王禮錫在中國社會史論戰序幕中提出成為問題的“歷史上的幾個大關鍵”，第一是“原始共產社會在歷史上的根據”，第二“中國封建制度從什麼時候開始？什麼時候開始崩潰？”第三“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及其在歷史上的作用”，

第四“什麼原因使中國不能自動的發展到工業資本主義時代”？很明白地是拘囿於回想時期底理論形式，而沒有入於研究時期的理論形式的。他簡直沒有提出“奴隸社會”底問題，同時却把原始社會的遺跡底郭沫若底研究，看為原始社會的論據。同時，更沒有提出整個地理解中國社會史各階段的問題。

陣邦國底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周紹涑底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兩文，是攻擊郭沫若底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然而他們在純理論上沒有充分的論證，以否認古代奴隸社會之為歷史的必然階段，又沒有充分事實證據，以證明中國社會沒有奴隸社會的發展，反之，他們却從回想時期中陶希聖的謬誤的論，分不清楚封建制度與奴隸制度的理論來否認郭沫若的奴隸制度理論。這是十分錯誤的。關於奴隸社會的爭論，必須明白分清楚奴隸社會與封建社會的差異：即一為沒有強固的教會的，奴隸依賴於社會的，手工業初發展的，牧畜還盛的等等；而他則為有強固的教會的，領主與農奴互相依賴的，手工業發展為行會制度的，農業鼎盛的等等。同時又從社會通史上，和中國社會史上由理論，記載，和實物材料來證明，才可解決。

朱新繁底關於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討論，是主張封建社會，在秦以後存在，而反駁陶希聖的。然而他自身仍是一貫新思潮派的主張。沒有弄清楚中國社會史底奴隸，封建，及資本社會的劃分，或者簡直不能劃分。而另一貫地主張其現社會之爲封建與半封建而已。關於中國封建社會這一社會階段，我們可以說，是沒有人正確地研究過，或是沒有人研究過的。雖然新生命派和新思潮派都直接地反對封建制度，因而加以研究的，但是只是由他們底意見染了色的研究。我們要解決中國封建社會底發生發展變化消滅的歷史，對於其前的奴隸社會和其後底資本社會都要明白區分，而後可以從理論上把握封建制度的特質，從理論，記載，和物質材料上證明中國封建社會底教會，莊園，武士，農奴，手工業者和小商人行會等制度的生滅的歷史。

劉夢雲底中國經濟之性質問題的研究，和鏡園底評兩本論中國經濟的著作兩文，是攻擊研究時期嚴靈峯和任曙底中國資本主義理論的。但他們只繼承新思潮派的理論，只看見農村，而不看到都市，只看見落後的，破壞的，被支配的封建關係，而不看見支配的建設的，進步的資本主義。劉夢雲只承認資本主義爲偶然的例外，而許多工廠的發展是偶

然的機緣使然。但恐慌却是必然的長期的。他主張“工農”的政權，主張從階級關係說明社會，但從不研究“工人”階級即無產階級底歷史，而在農村中建立着什麼“工農的政權”。大概他以為“工人”是可以由“人工”來粉飾出來，而不須乎中國的資本主義的。他以為地主和軍閥們“購買股票”是封建而不是資本主義，以為資本利用於“投機事業”是封建而不是資本主義。他以為恐慌和中國棉衣棉紗的輸出，是沒有國內市場。他更從1928年海關統計，原料品輸出證明中國之封建和殖民地半殖民地性，但不知道蘇聯是輸出原料，自然更看不見糧食之輸出與輸入，棉紗之輸出與輸入等為資本主義最高階段的世界市場。我們簡直可以說劉夢雲是不懂得什麼叫資本主義的。他說任嚴替帝國主義資本家辯護，而不知他自己才是故意蒙蔽中國資本主義之發展，成為資本家的代言人。

股份公司的股票，近代工廠，投機與恐慌，無產階級，很明顯地是資本主義中的重要特徵，然而劉夢雲也弄不清楚。聽說有人會在上海找出封建的優勢底理論，自然在紐約和倫敦的交易所中，也會找着劉夢雲所謂商業銀行，與交易所中的片時的獲利了。

恐慌，是資本主義本身法則的完成的表現。資本主義沒有成熟的發展，是沒有恐慌出現的。劉夢雲是不了解恐慌的“政治經濟學常識”的意義，而亂用恐慌一名詞；同時，却不追究中國資本主義恐慌的本身的歷史。——嚴靈峯和任曙都沒有追跡的——却把恐慌認為由封建軍閥造成的，或帝國主義造成的。這真笑話！劉夢雲又對於國內市場完全沒有理解，而認為恐慌是缺乏國內市場。這是把市場，和國內市場故意混淆。劉夢雲自己已經說明，中國棉紗因缺乏國內市場，可以輸出以求市場。所以恐慌不是由於國內市場之乏缺是很明白的。恐慌根本是由於消費力的減少，和帝國主義，中國資本家間及中國資本家相互間的無政府的大量生產。假如劉夢雲不是代中國資本家辯護的，為什麼會忘掉資本主義這一矛盾？而故意的混亂了國內市場和恐慌的理論？難道俄羅斯在1890年代的“民粹派”，不正是這樣地為俄羅斯資本家代辯嗎？

劉夢雲對於農村的研究也不足的。完全不理解農業資本主義，從他主張以“手工”和“機器”的生產方法來分別就明白表示了。而他另外使用着“中國資本主義‘獨立的’發展”一詞，來混亂“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更充分表現新

思潮派的最後唯一理論家，從小農民底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難分的意識，上升到民族資本家的意識，而成為純粹的“中國民粹派”，或如任曙所說的“修正派”。

解決中國資本社會的問題，留給我們的，是資本主義起源中的原始蓄積論與市場論，資義主本發展中的農業資本主義與地租論，工業資本主義與恐慌論，和革命史論等。這是“民粹派”的人物們所不能解決的，或者不敢解決的。

孫倬章底中國經濟的分析，是承認中國社會現階段，在經濟上資本主義佔優勢，佔支配地位，在政治上的封建勢力佔統治地位。因此衝突而成長期革命。這中間對於中國資本主義，仍是研究不足的。不僅是政治上的封建勢力，會從革命史研究上成為問題。即在經濟上，關於地租也是爭論的問題。

王宜昌底中國社會史短論，整個地提出了中國社會史各階段的劃分，和各社會階段的重要現象的研究。這特別重要的是中國封建社會的研究底創始。因此，對於過去一切理論，是要都加以批判，而由此又在每一處都引起爭點。

“論戰”時期是剛才開始的，而且在第一輯的中社國會史論戰中，沒有針鋒相對的論戰文字。所以論戰結果如何，

是不可知的，我對於這論戰時期，也只能如此地簡短地敘述一下。

“論戰”時期是如何地延長，是要看在論戰中底人們，是否能深刻地利用全部的新的理論的材料，記載的材料，和物質的材料而定的。如果很能夠向此方面盡力，則論戰將會縮短時期，而有着比較決定的中國社會史論出現，以開始科學的階段。如果對於過去的理論形式不澈底地加以批判，不盡量底應用新材料，不能把握堅固的社會內容即階級觀點；而從各自私黨利害上，作煩瑣哲學的論辯，甚而至於謾罵，則論戰時期，會延長着。“思想的混亂，是統治者的利益。”彼時統治的穩定局勢，會從這種“論戰”而反映出來了。

中國無產階級底成長程度，大概是從中國社會史論上看得出來的。未來的歷史，我們也可以從此來預測的。

中國社會史論，在未來是如何的呢？時間這後來的批判者會告訴我們什麼呢？這只在于我們底實踐底最後批判。中國社會史論史底繼續，只是從理論的批判到實踐的批判，而沒有其他了。

王宜昌1932,2月6日於上海砲火聲中。

(1) 文藝研究及介紹

書名	著者譯者	實價	內容說明
現代南歐文學概觀	徐震村	四角	本書為徐震村先生數年來心血之所聚。共合「現代意大利文學」「現代西班牙文學」「現代希臘文學」「現代葡萄牙文學」「古魯兒司克派與皮藍得婁」「阿左林」諸篇，為研究文學者不可不讀之書。
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	趙景深	七角	在這兒呈露於讀者諸君眼前的，一九二九年的世界文學。我們這本小書，凡代表了十三國，共八十三篇，都是現在文壇上極重要的消息，和良好的論文，而有介紹於國人的必要的。
辛克萊評傳	孫席珍	七角	辛克萊是現在的美國的最傑出的作家，不獨在大陸劃一新時代，即在全世界也佔極重要的地位。他的作品，最近已有了許多漢譯，但關於他的整個研究，卻還未曾有過。本書是孫先生根據戴爾氏的辛克萊評傳，再參攷好幾種書籍編譯而成，是國內第一本研究辛氏的專著。
中國文學論集	鈴木虎雄 汪馥泉	五角五分	本書是日本中國文學研究專家鈴木虎雄著的。而譯者的選擇，也是有系統的選譯，先是論騷賦，其次論五言詩及絕句，再次論詞，末附青木正兒氏論詞的一文。凡研究中國文學的人，是不可不讀的。
李長吉評傳 <small>唯物文學叢稿</small>	王禮錫	五角	用唯物史觀的眼光來分析中國的文學史，這是一個大膽的嘗試，在這書中為研究文學史的人開闢一條正確的新路。李長吉從來被人稱為鬼才，其詩被人稱為鬼語，作者就在這怪險的短命的鬼才詩人開始去嘗試這新的方法。

對於中國社會史 論戰的貢獻與批評

李 季

中國社會史論戰，在最近一年來的各種著作中，特別是在讀書雜誌一卷的四五期中，已達到短兵相接的階段，各位雄糾糾的戰士白刀子進，紅刀子出，殺得頭破血流，各不相下，其武勇與倔強，非常令人佩服！禮錫先生因我在神州刊佈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書，要求將其中關於先秦經濟分析的部分在該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二輯上披露，他大概是要引我來參戰罷。我這個未經訓練的新兵，看見

那樣兇猛的戰爭，實在有些膽怯；不過既已入伍，而敵人的炮彈又從我們的頭上飛過；也就不好藉不抵抗主義做護身符，躲在營中一聲不響。于是一面答應他的要求，一面再草此文以與一般老戰士相周旋。對不起各位，我要學蝦蟆打拳，向班門弄斧了。

季子附識

一 關於中國社會史上爭論的主要問題及其解決所必具的先決條件

印度的路易 (M. N. Roy) 說：“有些馬克思主義者以爲中國社會的發達缺少一個環。他們相信中國沒有封建制度。”（見路氏中國革命與反革命六一頁 —— Revolution und konterrevolution in China, 1930）這大概是指一般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馬克思主義者講的（如俄國的馬札亞爾等），至于在國內盈千盈萬的馬克思主義者中我從沒有聽見過這樣的議論，只有相反的聲調時時送入我的耳鼓。舉例來說：

- (一)周谷城君認中國“自遠古以至周初，爲封建之成長期；自秦以後至于清末爲封建之消滅期。自周初至於秦初，可以算是一個封建時代”。（見周著中國

社會之結構四六頁)

- (二)周紹濠君認“吾國的封建制度開始於夏”。(見讀書雜誌一卷四五期)
- (三)王亞南君認“周武王代紂成功，即位天子後，乃採用封建制”。(見讀書雜誌一卷四五期)
- (四)郭沫若君認“周室東遷以後，中國的社會才由奴隸制轉入真正的封建制度。……秦以後雖然號稱爲郡縣制，但漢有諸王，唐有藩鎮，明末有三藩，清初有年羹堯，就是一般的行省總督都號稱爲‘封疆天子’，並不是就不是封建制度”。(見郭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九至二〇頁)
- (五)王宜昌君認“中國封建社會是始於五胡十六國”。(見讀書雜誌一卷四五期)
- (六)陶希聖君認“中國的封建制度雖早破壞，但仍是在前資本主義時期，有巨大的封建勢力存在着”。(見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二頁)
- (七)朱其華君認“秦漢以後的社會現象，既然是以地主對農民的封建剝削佔統治形式，自然我也就無法否認其爲封建制度”。(見朱著中國社會的經濟結

構三三三頁)“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開始於十九世紀下半期，……可是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支配的作用。”(見同書三二二頁)

我們如將這些說法綜合起來，則中國自有史以來，不，自有史以前，一直到現在，只是封建成長，封建制度，封建勢力或封建殘餘所佔領的江山。封建，封建，你怎麼這樣愛上了中國，盤據了幾千年，仍不肯去，現在雖僅剩一點殘餘，“依然佔着支配的作用”，“有巨大的……勢力”?!這不是一個大謎麼?!

可是這個大謎中仍含有不少的小謎，因為各人對於封建制度的興起或消滅的時期既有不同的認識，自然要發生許多爭執。例如陶希聖君承認中國現在仍“有巨大的封建勢力存在着”，朱其華君也承認“一直到現在，封建殘餘在社會經濟結構中依然佔着支配的作用”，這不幾乎是五雀六燕，銖兩悉稱的說法麼?但他們却“彼此信件往返”，爭論不已，朱君且“覺得所談不甚詳細，……特抱病”作文。關於這一類的辯駁目前不獨沒有解決的希望，並且愈鬧愈糾紛，愈鬧愈枝節。雙方都徵引馬克思的學說做理論的根據，而各人所得

的結論却完全相反。這是一方面的爭論。

在另一方面，還有一種更大的爭論，而其問題為關於現時中國的。就是：

“中國社會是封建社會還是資本主義社會？”或：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

關於這個問題有各種各樣的答覆。有的說：“中國社會的封建制度還是整個的存在，沒有崩潰。”有的說：“中國近代社會是封建社會宗法社會之延長。”有的說：“中國經濟根本便是很複雜很畸形的。封建與資本主義兩者的要素都有很大的成分”，只可“勉強的說是半殖民地之半封建的經濟”。有的說：“中國社會絕對不是封建的社會，乃完全是一商業資本主義的社會。”有的說：“中國的經濟社會，……是一個帝國主義直接統治的小作農業社會。”有的說：“中國的社會的經濟構造……可以叫做一個為封建思想所支配的初期資本主義。”有的又說：“中國經濟已經發達到俄國戰前的狀態，亦即是有了‘十月革命’的經濟基礎。”“中國資本主義發展了；發展到壓倒封建經濟的程度。”像這樣各執一詞，漫無公認標準的說法，真是“爭論到一千零一夜，也是爭論不了的”！

我以為要能正確討論並解決這兩方面的問題，除掉必須具有充分的社會科學常識外，至少應先備具下列三個條件：

(一)深切了解馬克思主義，

(二)深切了解西洋的經濟發展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

(三)深切了解中國的經濟發展史和社會形態發展史。

如缺乏第一項知識，則一切觀點，方法，以及術語，都不會正確。如缺乏第二項知識，則無從獲得比較與參考的資料。如缺乏第三項知識，則對於本問題更無從着手。每個戰士必須先有這樣的準備，才配作戰，這好像是當然的事，用不着我在此處提出來的。但按之實際，大家在這幾方面的準備殊不充足，尤其是對於一二兩項，有些人表現“臨時抱佛脚”的現象，有些人表現簡直還沒有摸着門徑，也不求向這個方向進取。所以歷時兩三年，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並沒有呈出牠應有的進步，說來說去，總不免雜着大部分的廢話與笑話。此後的爭鬥如果要想較有意義，非先充分準備這三項軍實不可。

我是一個才疏學淺的人，對於上列三個先決條件，都只是淺嘗而沒有深入。不過我既首先提出來，應當鼓着勇氣嘗

試一下。我現在先介紹馬克思對於經濟史的發展怎樣劃分時代，然後從中國全部經濟史下手，分成各個時代，依據這種輪廓，以為立論的基礎。同時還要拿西洋全部經濟史作為參考的資料，庶幾有個比較，可以幫助解決我們的問題。

二 馬克思對於經濟發展分期的指示 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內容

關於經濟史上時代的劃分，西洋的經濟學者是有各種各樣說法的。就其中比較重要的講，布協（Karl Bücher）將經濟的發展分作三個時期：即自足的家庭經濟時期，城市經濟時期和國民經濟時期。桑姆巴特（Werner Sombart）也分作三個時期：即自足生產的私人經濟時期，低級的社會經濟時期和社會經濟時期。勒普來（Le Play）也分作三個時期：天然生產物的生產時期，人工生產物的生產時期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時期。喜爾得布藍（Bruno Hildebrand）也分作三個時期：即自然經濟時期，貨幣經濟時期和信用經濟時期。飛利坡衛芝（Philippovich von Philippsberg）則分作四個時期：即自足的家庭經濟時期，地方交通經濟時期，國家交通經濟時期和自由交通經濟時期。李斯特（Friedrich

List) 則分作五個時期：即漁獵時期，牧畜時期，農業時期，農工業時期和農工商業時期。

這些劃分都不足取，因為牠們不是過於籠統，就是過於呆板，不是只注意生產的技術方面，就是只注意生產物的流通方面，分來分去，總沒有找着要點。我們應當知道，在人類生活的社會生產中，不僅有技術的關係，而且有經濟的關係，這就是說，不僅是人對自然的關係，而且是因征服自然發生人對人的關係。如果要劃分經濟時期，必須着眼於這兩方面。這種工作需要馬克思來擔任了。

據馬氏看來，經濟史就是生產方法的發展史，所以他在一八五九年刊佈的政治經濟學批評（Zur Kritik der politischen Oekonomie）的序言上說：

“就大體講，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和近世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稱為經濟的社會結構相連續的時代。”（見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五六頁）

這句話值得我們詳細的研究。第一，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什麼？馬克思自己描寫得非常詳細，他說：

“例如印度極古的小公社——至今還有存在的——是建築在土地公有，農業和手工業的直接結合，和一

種固定的分工上，當創造新的公社時，這就是一種現成的計畫和圖案。此等公社構成一種自足的生產整體，所佔的生產區域從一百英畝至幾千英畝。生產物的主要部分是為供給公社直接的需要而生產，不是作為商品而生產，所以這種生產自身是不倚賴印度社會那種因商品交換而形成的分工的。只有剩餘的生產物才變成商品，然此中一部分又首先落入國家的手中，從不可記憶的時代起，即有一定數量的生產物作為自然地租，送給國家。印度各處有各種形態的公社。公社在簡單的形態中，是共同耕種土地，而分配生產物於各社員，同時每個家庭從事於紡紗，織布等等，作為家庭的副業。除掉這些從事於同樣勞動的羣衆外，有‘主要的居民’（Hauptinwohner, chief inhabitant），他一人兼任裁判者，警察和收稅員；有一會計員計算農作並登記關於農作的一切事項；有一官吏懲罰罪犯，保護外來的旅客，並且伴送至附近村落；有一守界人看守本公社對鄰近公社的疆界；有一看水人為着灌溉，從公共蓄水處分配水；有一婆羅門教徒執行宗教的職務；有一個教書先生在沙地上教公社的兒童寫讀；有一個懂歷數的婆羅

門教徒以星學家的資格報告播種收穫的時期，和一種特別農事的吉凶時日；有一個鍛工和一個木匠製造並修理一切農業工具；有一個陶工製造本鄉的一切陶器；有一個理髮匠，有一個洗衣人，有一個銀匠，並且闕或有一個詩人在某些公社中代替銀匠，在其他公社中又代替教書先生。這十幾個人是由全公社的費用供養的。當人口增加時，一個新的公社在未被佔領的土地上依照舊公社的模形組織起來。公社的機構表現有計畫的分工，但製造業的分工却不可能，因為鍛工和木匠等等的市場沒有變化，至多也不過按照鄉村的大小增至兩三個鍛工，陶工等等。支配公社中分工的定律具有一種自然律的不可抗拒的權威，同時每個特別的手工業者如鍛工之類，依照傳統的方法，在自己的工場中從事於他那一門專業的一切工作，他是獨立的，並不承認何種權力。這種自足公社的單純生產組織時常在同樣的形態中再行出現，即使偶然被毀滅，又在同一地方，以同一名稱再造起來，這種組織就是了解亞洲社會不變狀態的祕密的鎖鑰，而亞洲國家不斷的解體與新建，以及朝代的更迭對於這種不變狀態恰恰構成一種顯著的

對抗。社會的經濟基本元素的結構沒有為政治的風暴所搖動。”（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三〇四至三〇五頁——Das Kapital I. Berlin, 1928）

我為什麼要在此處徵引馬克思這樣長的一段話呢？因為好些討論中國問題的中西“學者”不是不懂得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什麼而妄相揣測，就是拘執字面，不究內容，而任意濫用這個名詞。例如郭沫若君和路易是屬於前一類，馬札亞爾便是屬於後一類。所以郭君說：“‘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見郭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七六頁）路易說：“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是古代的〔生產方法的〕前一步，必定等於原始共產主義。……可是我們後來發見馬克思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不獨是遠超過原始共產主義的一個社會步驟，並且還是一種比古代生產方法高得多的形態。……當馬氏作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時，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顯然另是一事。”（見路氏中國革命與反革命德文本一三至一四頁）而馬札亞爾則在他的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將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妄加曲解，使之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合而為一（兩者的分別詳後），因此認中國沒有經過封建制度一個階段，現在正是由亞細亞生產方法過渡到資本主義。

(參看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神州國光社譯本二六至三一頁，三四至四一頁及以後各章) 他們既這樣散佈謬說，我又怎能不請馬克思自己出來說話呢？

第二，所謂古代的生產方法又是什麼？就是希臘和羅馬奴隸制度的生產方法。關於牠的內容比較容易明白，不必加以說明。至於其牠兩種生產方法更無須在此處解釋。現在要問的是，馬克思所說的四種生產方法是一切國家必須經歷的階段麼？不然，大大地不然。蒲列漢諾夫 (Plechanow) 說：

“我們可以斷定，馬克思於讀過摩爾根 (Morgan) 古代社會 (Ancient Society) 的著作之後，改變了他對於古代生產方法對亞細亞生產方法關係的意見。在實際上，封建生產方法經濟發展的邏輯達到社會革命，這就指示資本主義的勝利。然像中國或古埃及經濟發展的邏輯並不發生古代的生產方法。在第一個例中是講兩個發展階段，其中的一個跟着另一個而出現，並且是由另一個引起來的。反之，在第二個例中，我們便看見兩種並存的經濟發展模型。古代社會的形態代氏族組織而起，這種組織也在亞細亞社會制度之前。這兩種

社會組織模型的每一種都是生產力在氏族組織懷中發展的結果，這種發展終必使氏族趨於滅亡。雖是這樣，然這兩種模型彼此大不相同。而其原因則由於牠們主要的差異點是在自然的地理的環境影響之下發生出來的。在一個場所，此等環境對於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的社會，支配一定的經濟結構，在另一個場所，便支配其牠的生產關係，這些關係是和第一場所完全不同的。”

（見蒲氏馬克思主義的根本問題五八至五九頁——
Die Grundprobleme des Marxismus, Stuttgart,
1920）

蒲列漢諾夫上面的說法是很對的，摩爾根的書的確大有助于馬克思的社會發達的學說，所以昂格思在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Der Ursprung der Familie, des Privateigentums und des Staats*）一八八四年的序言中滿口稱頌摩氏，說：

“摩爾根的大功勞是在歷史的主要特點中發見並恢復了我們寫定的歷史的前史基礎，並且在北美印第安人的性社聯合（*Geschlechtsverbänden*）中發見一個鎖鑰，可以折穿最古的希臘，羅馬和德意志歷史向來

不可解的最重要的謎。”(見同書序言第八至九頁)

由此可以想見馬克思一經知道摩氏對於希臘羅馬由氏族社會直接達到奴隸制的寫實，必定立即改變他那亞細亞生產方法與古代生產方法互相銜接的意見。我們對於他這種意見既認識清楚，當進而討論中國經濟發展的各時期。

三 中國經濟時期的劃分及其說明

所謂經濟時期就是一種生產方法單獨佔領，或與牠種生產方法共同佔領的一個歷史階段。當一種生產方法獨霸時，這便是牠的高度發達期。當一種生產方法與牠種生產方法並存而逐漸取得領導權時，這便是牠的崛起期或初期。當一種生產方法與牠種生產方法並存而逐漸崩潰時，這便是牠的崩潰期或末期。此外，當舊的生產方法大半崩潰而真正劃時代的新的生產方法正待形成之際，發生一種混雜的特殊生產方法，這是一個過渡時代。

我們現在試按照中國全部經濟發展的情形，以生產方法為準標，劃分各個時代如下：

- (一)自商以前至商末為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至紀元前一四〇二年止)

- (二)自殷至殷末爲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一四〇一年起至一一三五年止)
- (三)自周至周末爲封建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一一三四年起至二四七年止)
- (四)自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紀元前二四六年起至紀元後一八三九年止)
- (五)自鴉片戰爭至現在爲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時代。(一八四〇年起)

我這種主張恐怕會和現今最大部分談中國經濟問題的人相衝突，至少也要和上列各位戰士的意見相衝突。但我這樣劃分時代，是經過審慎的考慮，並具有充足的理由，今特分述於後：

一，所謂商以前，自然不能追溯到太平御覽所引：

“天地混沌如雞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天地開闢，盤古在其中，一日九變；神於天，聖於地。天日高一丈，地日厚一丈，盤古日長一丈，如此萬八千歲。天數極高，地數極深，盤古極長。”

那怕廣東等處至今還有盤古廟，我們總不好模模糊糊從他講起。休要說他，即所謂天皇，地皇，人皇也不是我們的

對象。就是下至什麼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和神農氏等，雖按照名字，有人類發達的層次可尋，並與摩爾根前史人類進化階段的圖表(見下文)完全相合，必有一點根據，然他們沒有確切可信的事實(舊史說伏羲是人首蛇身，神農是牛首人身，竟將人獸化了)供我們的參考，且諸人於短時期中連接在一起，終嫌其沒有傳出古代的真相，而近於後世的假託。在新的證據未出現以前，殊不便多所論列。至多恐怕只有神農是有這麼一個人，曾從事植種，一直相傳至戰國，遂有“有為神農之言者許行”出來表彰，可惜許行的書沒有遺傳下來，無從窺見所謂神農的，到底有些什麼事蹟。

神農之下有黃帝，即有熊氏，這可以完全相信實有其人，當係一個酋長，因為熊氏正是一種圖騰社(Totemgenossenschaft)。凡原始的人羣都相信自己是出於一種自然物，最大多數為禽獸，因以為本羣的標幟；不獨中國的原始人是如此，即其牠地方過去和現在的原始人莫不皆然。摩爾根研究美洲易洛魁人(Iroquois)的辛尼加部族(Senecas)，發見有狼氏，熊氏，鼈氏，海狸氏，鹿氏，鷓氏，鷺鷥氏和鷹氏，而他的古代社會中且充滿了這一類的氏族名稱，便是一些最有力的證據。

司馬遷作史記，始於黃帝，他是以黃帝，顓頊，帝嚳及堯舜爲五帝，而禮記月令篇則以太昊，神農，黃帝，少昊和顓頊爲五帝，帝王世紀又以少昊，顓頊，帝嚳及堯舜爲五帝。這樣各持一說，已經是糾紛不清，令人無所適從，而關於他們的事實復多附會與假託，不能完全據爲信史。種如史記五帝本紀稱黃帝“藝五穀”，“教熊，羆，貔，貅，羆，虎”，這大概不過是種植牧畜的影子，決沒有那樣“藝”與“教”的盛況。同篇又說：“舜耕歷山，漁雷澤，陶河濱，作什器於壽丘”，這雖未必完全可信，至少舜時是有種植業的。

關於唐虞時代，我們可以酌量採用尚書中的材料，得到一些史蹟。不過把“疑古”頂在頭上的玄同君不獨認虞書完全爲偽書，並且說：

“堯舜二人一定是‘無是公’，‘烏有先生’。堯，高也；舜借爲‘俊’，大也。……‘堯’‘舜’的意義就和‘聖人’，‘賢人’，‘英雄’，‘豪傑’一樣，只是理想的人格之名稱而已。”

（見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六七頁）

這種說法雖屬新奇可喜，然却不能解答梁啓超所說的一件事，就是：

“……尚書堯典所記中星，‘仲春日中星昴仲夏日

中星火’等，據日本天文學者所研究，西紀前二千四五百年時確是如此。”（見梁著中國歷史研究法一五九頁）可見虞書雖係後人所追記與粉飾，至少應有一部分真蹟，而玄同式的疑古直等於玄學式的疑古！

虞書舜典中有所謂四岳，羣牧，羣后，和“二十有二人”，一定就是薩爾根古代社會中所稱的世襲酋長（Sachem）和普通酋長（Chiefs），為氏族社會中的領袖人物，所謂朱，虎，熊，羆，夔，龍等數臣即是各氏族的酋長，所謂“棄，……播時百穀”，也是初步農業的證據。我們可以大膽主張，至少這幾點是真史蹟，決非後人所假託。

講到夏書禹貢篇却大有問題，其中所說的“厥貢璆鐵銀鏤磬磬熊羆狐狸織皮”中的鐵，銀，鏤不見得是禹時代的物，因為殷周出土的器具還只看見銅錫合製的青銅器（也許已有鐵器，尚未出土），禹時似乎不會有什麼鐵，有什麼鏤（剛鐵）。可是無論如何，我們決不能像顧頡剛君一樣，疑及禹的本身，以為

“禹，說文云，‘蟲也，從虺，象形’。虺，說文云，‘獸足蹂地也’。以蟲而有足蹂地，大約是蜥蜴之類。我以為禹或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當時鑄鼎象物，奇怪的形狀

一定很多，禹是鼎上動物的最有力者。”（見古史辨六三頁）或“西周中期禹爲山川之神；後來有了社祭，又爲社神（后土）”。（見同書一一四頁）

禹是蟲，正是一種民族的圖騰，而禹即爲這個圖騰社的酋長，他本是一個人，後來才被人“神化”了，顧君對於古代社會的研究，既沒有入過門，而又採用唯心論的實驗主義做方法，宜乎他說出禹是“九鼎上鑄的一種動物”和禹逐漸由神化爲人（參見同書同頁）的笑話來。其實禹只是一個經營初步農業的氏族中的酋長，一點也不奇怪神祕，所以魯頌閟宮篇說：“是生后稷，……續禹之緒。”論語泰伯篇說：“禹……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憲問篇說：“禹稷躬稼而有天下。”

不過考古家的顧君對於這些都是知道並說過的，他所以不認禹爲人，爲“一個耕稼的國王”，還有一篇大道理在：

“禹若果是在后稷之前的一個耕稼的國王，后稷之名也就不會有了；后稷之所以爲后稷，原是尊崇他倡始耕稼加上的名號，若他只有‘續緒’，也不應獨居此名了！我們再看，在西周時，古王任農事的惟有后稷；在東周的魯國，后稷之前又有禹；到戰國時烈山氏之子柱先做后稷了，舜也‘發於畎畝之中’了，倡始耕稼的尊號又給

神農奪去了。在西周時，原以進入農業社會不久，而耕稼的事又倡始於周民族，周民族既得了中國，要想竭力的推廣牠，所以有始祖后稷的尊崇，所以有‘純其藝黍稷’的告教（酒誥），所以有‘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場迺疆，迺積迺倉’（公劉）及‘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無逸）的稱美。若果有神農，柱，舜，禹的耕稼在前，則到周初已有一二千年了，農業的發達已久了，又何必這樣的鄭重鼓吹呢？”（見同書一〇八頁）

願君倘若讀過摩爾根的古代社會，而又肯拋棄他那實驗主義的法寶，即不會發出這樣淺薄和唯心的議論來。人類生存於世界上已經有了一二十萬年光景，農業自發生時起要發展到西周那樣的狀況，至少要好幾十個一二千年，中國不獨在神農，柱，舜，禹時應有耕稼，即在他們以前也應有耕稼，並且還是婦女擔任的（關於這些事的詳情見下文駁郭沫若君的各節）。中國這樣的歷史已經喪失不可考了，不過一切人類都要經過這種時期，我們不能獨異，也不能因事蹟不可考而加以否認。譬如摩爾根說：

希臘和拉丁氏族“在野蠻中級的歷史，除掉他們的各種藝術，制度，發明和言語的改良中還保存一點外，

是全部喪失了”。(見古代社會原文三五四頁)

然他却否認他們是曾經經過這個階段的。所以中國的古書有神農，柱，舜，禹耕稼的傳說，不是什麼“鄭重鼓吹”，而是實有其事，他們的人數與其說是過多，不如說是太少了。

至於顧君因在西周時任農事的“古王”只有后稷，在東周的魯國又加了禹，到戰國時又加了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而舜也發於吠畝之中，遂提出他那有名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的意見，被那位掛起招牌疑古的疑古玄同君許爲“精當絕倫，……惟有歡喜贊歎”。(見古史辨六七頁)其實在未經秦火前的春秋戰國時代，關於古史的材料，比現在何止多十百倍（古史材料的喪失與時代的久遠當然有很大的關係，不能完全歸咎於秦火），而西周人的著作既未能完全遺留下來，顧君怎能斷定西周時沒有何種著作提及過禹，“烈山氏之子柱做后稷”和“舜發於吠畝之中”這一類的事呢？他又怎能斷定後出現的史實一定是假的呢？拿前一個時代一部分殘缺不全的著作做標準去判斷後一個時代所出現的史實的真偽，其荒謬與郭沫若君拿一部分殘缺不全的甲骨文做標準去判斷殷代整個的社會性是一樣的，這樣的“精當絕

倫”正是玄同式(即玄學式)的精當絕倫啊!

我們現在不要停在此處多說，由禹之後再往下推，輪着商代。史記殷本紀說“自契至湯八遷”，盤庚篇又言自湯至盤庚五遷(不常厥邑，於今五遷)，這好像表現盤庚以前的商人猶是逐水草而居，從事牧畜，較前述的耕稼狀況更退轉去了，僅相當於摩爾根所謂野蠻的中級。但仔細攷究，卻又不然。商書的篇幅既多，材料也不少，不過就文體和事蹟看，除盤庚三篇外，類多後人粉飾竄改之詞，很難據為信史。例如湯誓說：

“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賚汝。爾無不信，朕不食言。爾不從誓言，予則孥戮汝，罔有攸赦。”

這樣儻罰操諸一人，完全是一個專制君主的口吻，就當時的產業發展情形看，國家還沒有成立，不應有此現象。但內中說：“舍我穡事而割正夏”，又仲虺之誥說：“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這不見得是經過粉飾或改竄的，因為後人大概只在什麼德，威，刑，賞，仁，義，禮，信等抽象名詞上做工夫(參看湯誓仲虺之誥等篇)；對於經濟狀況絕不措意，不會將牧畜改作農業，藉以誇示將來。

又最可靠的盤庚篇有些話足與上文相印證，就是：

“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

“惰農自安，不昏作勞，不服田畝，越其罔有黍稷。”

這種以農事作比喻的話，當然是要在田野農業已經出現，並且成爲經常的業務，積有經驗，才能說得出來的。考盤庚遷都並不是游牧性質，實因舊都圯於河水，不得不出此，而人民安土重遷，不肯從命一事，尤可反證盤庚以前已經進於固定的農業，否則游牧之民正好乘機另覓草場，用不着留戀故土了。

此外，周公因誥戒成王而作的無逸篇，內中歷數殷王中宗，高宗和祖甲怎樣勤勞，於是接着說道：

“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

由此又可反證中宗，高宗和祖甲是知道稼穡之艱難的。高宗（即武丁）和祖甲固在盤庚之後，但中宗（即大戊）的即位却在盤庚即位二百三十五年前，可見在商代的早期，田野農業早已出現，是無復疑義了。

統觀這些事實，則商代實已在摩爾根所謂野蠻的高級，直與文明爲鄰了。據摩氏的研究，在野蠻的中級有銅錫合製的青銅器，在野蠻的高級則有鐵器的發明。

“鐵的生產是人類經驗中最重要的事件，沒有能夠和牠相抗，沒有能夠和牠相等的，其他一切發明與發見在牠的旁邊是無足輕重，至少也是居於附屬的地位。舉凡槌，砧，斧，鑿，都由鐵製，還有犁要用鐵尖，並有鐵劍；總之，文明的基礎可以說是建築在這種金屬上面的。”（見古代社會原文四三頁）

又考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以前即開始使用鐵製的鐮刀，在三千五百年以前，即有耕犁，歐洲人在三千年以前即使用鐵製的鋤和武器。中國盤庚以前正是三千三百年前，論理應當已經發明熔鐵，已有鐵製的耕器。可是歷代出土的金屬古物，關於商代的只有青銅器，絕無鐵器。這不知道是當時的鐵器未曾遺留下來，還是已遺留而尚未出土，或確實沒有鐵器——這個問題只好暫時存而不論。

二，在另一方面，盤庚以前已經有文字，並已組織成文，否則不會有盤庚三篇的出現，而這種“佶屈聱牙”的作品也決非後人所能偽造。尤其是金石索中商癸父爵，父庚爵，父辛爵，雙册父乙卣，父乙旅車卣，大己卣，和父辛卣等上的刻文以及近人所拓印的殷代甲骨文是當時已有文字的鐵證。所以盤庚時代正是野蠻高級的結束和文明開端的時代，

也就是氏族社會崩潰和私產與國家起源的時代。

據摩爾根說：

“當野蠻後期的末葉，關於土地的擁有已經起了大變化，牠逐漸趨於兩種所有權的形態，即國有和私有。”

(見古代社會原文五五〇頁)

依照馬克思上面對於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描寫看來，所謂土地公有就是土地國有，所以人民要用“一定數量的生產物作為自然地租，送給國家”，這是取了摩氏所說的第一種所有權的形態，殷代的情形正與此相符。怎樣見得呢？

盤庚三篇明白告訴我們，當時的私有財產，階級制和國家都一一出現了。例如

“茲予有亂政，同位具乃貝玉。”(盤庚中)

“朕不肩好貨。”(盤庚下)

“無總于貨寶。”(盤庚下)

如果沒有私有財產的出現，則此處所謂貪貝玉，好貨和聚貨寶都毫無意義了。又王氏謂盤庚

“上篇告羣臣，中篇告庶民，下篇告百官族姓。”

也是實情，所以上篇說：

“凡爾衆其惟致告。自今至于日後，各恭爾事。齊乃

位，度乃口，罰及爾身弗可悔。”

中篇說：

“古我先后既勞乃祖乃父，汝其作我畜民。”

下篇說：

“嗚呼，邦伯師長執事之人尙皆隱哉！予其懋簡相爾，念敬我衆。”

如果沒有階級制和國家的存在，則盤庚之誥用不着分作三篇，而且每篇的口吻與對象也不致迥不相同。由此看來，氏族共產社會在盤庚時已經崩潰，是信而有徵了。

又一八九八至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四五年）河南安陽縣出土的大批龜甲獸骨，上面刊有殷王室占卜的紀錄，羅振玉據以編成殷虛書契前後編等書（此外他人尙有同類的作品），這當然是絕對可靠的文獻。書中表現殷代帝王有錫貝之事，又有奚奴臣僕，且有使“小臣令衆黍”的明文，可見殷代確是私有財產，階級制和國家成立的時代。

雖是這樣，不過我們又怎能斷定殷代所行的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而不是其他生產方法呢？所謂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的特點是土地國有，我們現在怎樣知道殷代是土地國有的呢？要答覆這個問題，的確非常困難，因為沒有一點材料可

以直接證明這一點。但我們借助于推論與間接的證據，是可以相當解決這個問題的。

盤庚既因舊都耿被河水毀壞，而遷于殷墟，則新都的土地與遷來的任何私人向來沒有發生關係，這是很顯明的。殷墟相傳係成湯故都，可見其附近一定已有人定居，決非一片荒涼，未曾開墾的土地可比，不過新都地方的文化程度當較舊都的為低，否則人民不會表現不肯遷居的心理，此處大概還沒有跳出氏族社會的範圍。在這種情形之下，已經組織國家的專制君主的盤庚（關於這一點以後還有說明）將氏族共有的土地轉變為國有的土地，這再順利再便當也沒有了。

以上是我們的推論。此外還有一些間接的證據。孟子說“殷人七十而助”，這雖未必是事實，然孟子去古未遠，其立論必有一點影子作根據，決非完全憑空捏造。這點影子就是殷代的土地非私人所有，乃國家所有。又詩經北山篇說：“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此詩作于西周末年，當時的土地已成封建貴族的私有物，無所謂王有，不過在封建之初，土地確為王有（在歐洲封建初期，土地只歸領主佔有，仍須奉還君主，但後來變成領主的所有物，不肯奉還了），至少在名義上是如此。我們可以斷定，周代的土地王有就是由土地國有轉變

過來的，因為古代王與國不分，路易十四(Louis XIV.)所謂“朕卽國家”，即是當時的狀況，所以土地由國有到王有不過是再進一步。

我們現在根據上述的一切理由，可以斷定自盤庚至殷末爲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時代。

三，與殷代同時並存而建立國家的，有周代的先人。大雅文王有聲篇張子註云：

“周家自后稷居郃，公劉居豳，太王邑岐，而文王則遷于豐，至武王又居于鎬。”

這段話在只顧字面，不究內容的人們看來，必定又要認“這是游牧民族所必有的現象”。然我們一加查考，便知道不是這樣。大雅生民篇追敘后稷小時候發明種植，實現農業道：

“誕實匍匐，克岐克嶷，以就口食。藝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穞遂，麻麥幪幪，瓜瓞嗶嗶。”

就西洋古代社會的史實和現在非洲等處原始人的情形看，發明農業都是婦女的事，而最初的農業勞動也由婦女擔任。中國古代農業的發明不會獨異，更不會出於後起的后稷。周代的農業託始於他，大概因這個氏族的男子開始經營農

業，是自他開端，所以就事論事，對於以前的神農，柱，舜，禹不提及，對於他們以前的婦女農業更因年代久遠，事實湮沒，而無從提及了。關於後一個問題可有兩個證據：一，中文男性的“男”字從田從力，可見在形成文字之時，婦女早已退出農業生產，而務農變成男子的專業。二，在希臘古代的神話中有好些女神，這正是去女性本位社會不遠，由其中有名的婦女轉變而來的證據，中國只有史記所稱的“煉五色石補天”的女媧可以稱爲一個女神（觀世音是印度傳來的），此外只留下嫫，嫫，娥，姜，姬，姑，羸，媯，姚，姪，姪等等姓名表現這種社會的殘影，可見神農 黃帝時去女性本位的社會已經很遠了。然我們却不能因此否認中國遠古的婦女發明並經營農業的事，更不能因生民篇說后稷發明農業，遂連帶將他以前的神農，柱，舜，禹，經營農業的事一筆抹殺。除掉這個道理以外，我們再來細心看一看這篇詩：

“誕后稷之有穡，有相之道。弗厥豐草，種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實稂，實發實秀，實堅實好，實穎實粟。卽有郇家室。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恆之秬秠，是稷是畝。恆之糜芑，是任是負。以歸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或揄，或簸或蹂。釋之叟叟，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以鞞，載燔載烈。以興嗣歲。”

生民第四章描寫后稷自小時候即發明農業，第五章說他耕種的得法，農產物的茂盛，第六章說他的農產物種類之多，和收穫之豐，第七章說他使農產物經過春，揄，簸，蹂，而弄成食品。這種過程在現代看來，沒有什麼稀奇，也並不感覺困難，但在知識淺薄的野蠻時代，非有幾百年甚至於幾千年的經驗是辦不到的。所以我們根據種種理由，可以斷定中國農業的發明是遠在后稷以前，即男子擔任農業勞動，使婦女退出這個生產部門，也不始於后稷的時代。

自后稷三傳至他的曾孫公劉，復在豳地經營農業，頗極一時之盛。大雅公劉篇說：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風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篤公劉，於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溯其過澗。止旅迺密，芮鞠之卽。”

這兩節詩表現公劉居豳，農業的興盛；所謂“取鍛”大概就是指冶鐵講。如果是這樣，則公劉時代正在野蠻的高級，而鐵器的發明也在此時，這便和摩爾根所說這個階段的條件完全相符了。

但現在又要問：公劉時代正相當於西歷紀元前多少年呢？此事已無可考。不過豳風的朱註有下列一段話：

“虞夏之際，棄爲后稷而封於郃。及夏之衰，棄稷不務，棄子不密失其官守，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密生鞠陶。鞠陶生公劉，復修后稷之業，民以富貴。乃相土地之宜，而立國於豳之谷焉。十世而太王徙居岐山之陽，十二世而文王始受天命，十三世而武王遂爲天子。”

照這種說法看，自棄至武王凡十五世。毛詩疏云：

“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歲，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數耳。命之短長，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許，載子必將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實難據信也。”

這種反駁頗有理由，不過牠只有消極的批評，而無積極的主張，問題沒有解決。郭沫若君引王國維的殷先公先王考及續考，證明“帝俊即帝嚳，亦即卜辭中的高祖夔”，又引郭

璞的山海經注，說“帝俊即帝舜”，於是說明帝舜的二妃娥皇女英也就是帝嚳的二妃姜嫄簡狄；而姜嫄生后稷爲周的始祖，簡狄生契，爲商的始祖，周商是同出一源。（參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一至二六七頁）這算是有了一種積極的主張，但和史實又不相合，因爲商頌的朱註說“契爲舜司徒而封於商，傳十四世而有天下”，自湯至紂又有二十八世，共計爲四十一世，而自后稷至文王（文王歿於紂王二十年）不過十四世，雖世代可以有久暫的不同，然不應相差三倍！所以我們可以相信王國維的說法，而不能相信郭璞的說法。因此郭君的主張也同樣沒有解決問題。

此外辭源的世界大事年表註明公劉遷豳在夏桀二十年，即紀元前一七九七年。我因手邊沒有參考書，無從查考其確定這種年代的根據，但其不足爲信史是一望而知的。因爲自公劉遷豳至文王薨，足有六百六十二年，其中十二世平均皆在位五十五年，且均於晚年生子，這也同樣“不近人情之甚”！既是這樣，我們便無法解決這個問題了。

不然，法子是有。國語的魯語說：

“昔烈山氏之有天下也，其子曰柱，能殖百穀百疏，夏之衰也，周棄繼之，故祀以爲稷。”

又左傳昭二十九年傳，說：

“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爲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爲稷，自商以來祀之。”

按烈山氏卽神農，而就此處柱爲稷和棄爲稷講，可見所謂后稷原有兩人，而“商以來祀之”的后稷，不可與“夏以上祀之”的后稷併爲一談。又“夏之衰也”應係指夏桀或稍前的時代，不能像朱子那樣指爲少康以前。我們根據這種證據，便可以知道棄的曾孫公劉應在商中宗卽位（一六三七年）時的前後，這是不會有什麼大差錯的。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商中宗時有田野農業出現，已在野蠻的高級，公劉時也有田野農業，甚至於還知道熔鐵，當然也在野蠻的高級。這兩大氏族在相距不遠的地方和相距不遠的年代而處於進化中的同一階段，這樁事不能算是偶然的了。

公劉之後六傳至太王，因被狄人之難，舉族而遷於岐周。這個太王就是大雅詩篇上的古公亶父，朱子所謂“追稱太王”的。不過這裏又發生一個問題，卽顧頡剛君明白反對古公亶父爲太王，並且確定此人是在公劉之前，他說：

“公亶父這人，自孟子以來都說是太王；我覺得不

對。公亶父在緜篇上看，是一個‘畢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國君；太王是文王的祖，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他們的時會是不同的。況且太王既已稱王諡太，何以於緜篇又稱公呼名？雅頌同爲西周詩作，不應當把稱號亂用如此。推其所以致誤之故，一由于公亶父‘至于岐下’，而太王亦‘居岐之陽’，二由于公亶父娶的是姜女，而文王之母亦‘思媚周姜’。但我以爲周國始終不會離過岐山，‘至岐’只有始遷的第一代，‘居岐’儘不妨沿着多少代，這二者不能強合爲一事。周與姜本係老親，看后稷母名姜姬可知，不能說太王娶的周姜即是緜篇上的姜女，而合太王于公亶父，使他們併作一人。又看緜篇以‘緜緜瓜瓞’發端，而首章言‘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末章言‘文王蹶厥生’，其爲原始要終之詩，言周民族自微而盛，自開國以至成大業，此意甚明。公亶父乃是初定國基之君，故詳言其始至之狀；若在太王時，便不容有這等事了。自從孟子言太王避狄，硬拿公亶父覓地的事做證據，又言太王好色，硬引緜篇‘爰及姜女’的話做證據，于是公亶父與太王合而爲一，反在公劉之後，有似乎中衰，而緜篇紀始的本義就失去了。”（見顧著古史辨一四

七頁)

顧君是極端佩服他的尊師胡適博士那種唯心的實驗主義的，所以他

“更敢于作歸納，立假設，搜集證成假設的證據而發表新主張。”(見古史辨序言九五頁)

可惜他中了實驗主義的毒，專在假設上做工夫，以致找不出真理來。他說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公劉之前的周國始祖，約有三種大理由：

(一)古公亶父是“一個‘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國君”，而太王“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

(二)緜篇是一篇“原始要終之詩，言周民族自微而盛，……公亶父乃是初定國基之君，故詳言其始至之狀，若在太王時便不容有這等事了”。

(三)“太王既已稱王諡太，何以于緜篇又稱公呼名？”

其實這些理由都是不能成立的。一，古公亶父自邠遷岐，一切都要從頭做起，的確表現“篳路藍縷，以啓山林”的狀況，但既經安居，農業的經營，蒸蒸日上，當然有一番盛況，顧君怎好斷定他一定不是太王呢？況且顧君說太王“已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這只是一句空話，沒有實據，“盛”到

什麼程度，顧君還在腦子裏面假設，又怎能斷定古公亶父與太王的時會不同呢？二，緜篇爲“原始要終之詩”固然不錯，但不能因此認古公亶父爲周國的始祖，因爲“民之初生，自土沮漆”，是指公劉居豳的情形，與古公亶父無涉，下文才說他因被狄難離豳，“來朝走馬……至於岐下”。這樣的文情是何等明白，顧君爲什麼要牽扯到“民之初生”等句是講他？如果說太王時不容有古公亶父那樣遷徙與開基的事，證據在那裏？三，至於這“太王既已稱王諡太”，緜篇不應稱公呼名，更不成其爲理由。因爲顧君既不能推翻朱子“追稱太王”的說法（記得孟子或其牠書上好像有“追王太王，王季文王一語），又怎能主張“太王既已稱王諡太”呢？因此又怎能說緜篇不應稱公呼名呢？由此可見顧君對於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公劉以前的周國始祖的假設是完全失敗了。

我們並不是絕對擁護孟子“太王居邠，狄入侵之”的說法，不過孟子距太王不過八百年的光景，他所說的話應有幾分可信，在顧君或其他疑古專家沒有舉出確切證據證明古公亶父不是太王的時候，我們不願意拋開兩千年前古人言之鑿鑿的話，而來相信兩千年後實驗主義的信徒腦袋中的假設。

還有一層，顧君如果說古公亶父不是太王，而是在太王之前公劉之後的人，我們也許有幾分相信，至於說古公亶父是在公劉之前，那簡直是實驗主義破產的表現，那他真正應當

“常常自己疑惑：科學方法是這般簡單的嗎？只消有幾個零碎的印象就不妨到處應用的嗎？”（見古史辨序言九五頁）

我們爲什麼要用這樣嚴厲的口吻來對付顧君呢？一因嘆息他受了胡適博士的騙，誤選一種唯心的實驗主義做方法，以致枉費氣力，二因他對於古公亶父的說法顛倒了事實，足以妨害我們立論的根據。現在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借助於唯物的辯證法，從縣篇所描寫的經濟以至政治狀況着手（我對於實驗主義與辯證法曾作一種比較的分析與綜合，共有七萬多字，足供讀者的參考，此文見拙著我的生平第十一章，亞東圖書館出版）。這一篇共有九章，今特擇其重要的四章介紹如下：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版

以載，作廟翼翼。

“迺立臯門，臯門有伉。迺立應門，應門將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

“肆不殄厥愠，亦不隕厥問。柞楫拔矣，行道兌矣。
混夷駟矣，維其喙矣。”

我們試將這篇詩和公劉篇比較一看，便知道其中有個不同之點。就是公劉篇只表現田野農業的經營，而緜篇則於這一點外，還表現有國家制度，並且威加昆夷了。公劉篇雖也有“徹田爲糧”，和“其軍三單”等語，然這還是野蠻高級中的情形。據摩爾根的研究，當野蠻的中級，“土地仍爲部族所共有；不過一部分此時特別提出來，作爲維持政府之用，另一部作爲宗教之用。……”（見古代社會原文五四五頁）野蠻中級既是如此，高級更不用說。所謂“徹田爲糧”，不外取這一部分土地的收入以供公共事務的用費；至於“其軍三單”不過是氏族社會末期所組織的軍隊，用以防禦外侮的。無論如何，我們在公劉篇找不出緜篇那些司空司徒的官制和臯門，應門，冢土的設施。所以公劉在前，古公亶父在後，專從這兩篇詩中經濟和政治的發展上去考究，便獲得鐵一般的證據，再也不勞任何實驗主義的信徒在腦袋中做假設了。

我們既費了一些氣力推倒古公亶父在公劉之前的臆說，並確切證明他是在“周民族很盛的時候”，有百分之九十九是太王，現在就要問這個太王是在什麼年代。據辭源世界大事表說他遷岐周是在殷武乙元年，即紀元前一一九八年。當時距文王薨僅六十三年，經過三代，這是絕不可信的。我以為從古公亶父遷岐周至文王薨，中間的經過至少應在一百年以上，因此前者的建國至遲距盤庚末年不過一百四十年。岐周本是姜姓氏族的公有土地，太王新來此建立國家，將這個氏族公有的土地收為國有，這是很容易辦到的。

太王建國在盤庚建國後一百多年（也許太王居翽時已建立了國家），這在時間上不能算是相差很遠。這兩個國家都因自然的，地理的環境關係，於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崩潰之後，同達到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再詳細些說，就是盤庚和太王所處的環境均適於農業的經營，而四圍又沒有強悍的游牧人，須企圖抵抗，從事戰爭，因此取得大批的俘虜，作為奴隸，形成一種奴隸制的生產方法。所以中國古代的氏族社會崩潰後，生產方法的發展，不取希臘羅馬式，而取亞細亞式，正是有原因的。

周代先人的建國雖似乎較殷代的盤庚稍後，但他們農

業的發展却是蒸蒸日上，而那些元首於治政之暇，都不肯從事遊樂，竟去督促農事，這便是周代的先人勝過殷末一般君主的地方。周書無逸篇說：

“嗚呼，厥亦惟我周太王，王季，克自抑畏。文王卑服，卽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懷保小民，惠鮮鰥寡。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萬民。文王不敢盤於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

最後這句話就是馬克思所謂“一定數量的生產物作為自然地租，送給國家”了。

四，這種農業的發展，使文王造成一個大國竟至“三分天下有其二”。武王繼位，於十三年剪滅殷紂，統一區宇。此舉就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告終和封建的生產方法開始的分界點。所謂封建的生產方法的內容又是怎樣的呢？馬克思談及“黑暗的歐洲中古中代”，說道：

“我們在此處所看見的，不是獨立的人，而是隸屬的人——即農奴與地主，奴僕與宗主，俗人與教士。個人的倚賴構成物質生產的社會關係的特點，恰和他構成那站在這種生產上的其他生活方面的特點一樣。可是個人的倚賴關係既構成社會的基礎，勞動和生產物

使用不着取一種異於自己實質的虛幻形態。牠們是以自然的勞務(Naturaldienste)和自然的報效(Naturalleistungen)而加入社會的行動中。勞動的自然形態，勞動的特別形態——不是商品生產的基礎上勞動的抽象形態——在此處就是牠的直接的社會形態。徭役勞動(Fronarbeit)是由時間來計算，恰和生產商品的勞動一樣，不過每一個農奴知道他個人一定分量的勞動力是要為着替主人服務而消耗。對牧師所納的什一稅比牧師的賜福更為明顯。因此無論大家對於此處各人相互間的特別形態怎樣評判，私人^在勞動中的社會關係恰恰表現為他們自己私人的關係，而不是隱藏在物的——即勞動生產物——社會關係中的。”（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四〇至四一頁）

然烏里耶諾夫對於封建的徭役經濟（Fronwirtschaft）更指出四個先決的條件：

“第一，自然經濟的獨霸。封建的地產必須構成一種自足自給的，與外界很少結合的總體。領主對於市場的五谷生產在農奴制的後期特別發達，然這已經是舊制度崩潰的先驅。第二，這種經濟要求直接生產者準備

生產工具，特別是經營土地；並附屬於土地，因為只有這樣，領主才有可靠的入工。此外，取得剩餘生產物的方法，在徭役經濟中完全和資本主義的經濟相反：第一種方法建築在生產者經營土地上，第二種方法則在乎使生產者從土地上解放出來。第三，這種經濟制度的前提是農民對領主的私人隸屬關係。地主對於農民如畜沒有這種直接的支配權，即不能強迫經營自己經濟的自耕農替他作工。因此像馬克思描寫這種制度所說的一樣，‘超經濟的壓迫’……是不可少的。這種強迫的形態與程度可以有多種，從農奴制起一直至農民的閹閹櫛利限制為止。第四，此處所描寫的經濟制度的條件和結果畢竟是技術的程度非常低劣停滯，因為這種經濟的經營是在小農的手中，他們為窮困所迫，個人的隸屬關係所制，在精神上是陷入黑暗之中。”（見烏里耶諾夫全集第三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一五—至一五二頁——W. I. Lenin, Sämtliche Werke, Band III, Die Entwicklung des Kapitalismus in Russland. Wien-Berlin)

我徵引馬烏兩氏上面兩段話，不是要拿來作教條，將牠

們硬套在中國的封建制度上面，此舉實有兩層用意：第一，中國人開口封建社會，閉口封建制度，但對於牠的內容多茫無所知，至少也是絕不注意，故特藉這個機會介紹一下；第二，中國的封建制度與歐洲的封建制度雖未必完全相同，但也不致有很大的差異，如將雙方的狀況並列起來比較一下，便可以幫助我們判斷自周至周末是否封建社會。我們現在來進行第二着。

詩經的七月篇所謂：

“七月鳴鵙，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二之日其同，載纘武功，言私其豸，獻豸于公。”

甫田篇所謂：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大田篇所謂：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靈臺篇所謂：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孟子所謂：

“有布縷之征，粟米之征，力役之征。”

左傳昭十年，芋君無宇所謂：

“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略之內，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下所以事上，上所以共神也。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阜，臣阜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

這一切的一切不是活畫出一幅徭役經濟和隸屬關係的圖形麼？西周是自然經濟時代，直至春秋戰國，商品的生產才發展（詳情見拙著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一五至一六頁），這正是封建制度的末期，如拿烏里耶諾夫的話來說，這種現象已是“舊制度崩潰的先驅”了。所以自周至周末為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時代，是絲毫沒有疑義的。

五，周朝開基之始，即進於封建制度，這當然是農業生產力發展和技術進步的結果。周初的農業技術到底達到一種什麼程度殊不易於查考。我們已經斷定公劉時的“取鍛”是治鐵，周初的農具中應當有鐵器。但詩經中既找不出牠的影子，現存的兩三千件周金中也沒有牠的分子。這個鐵器的問題如何解決呢？如果沒有材料，單憑空想，自然是沒有用

的。不過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埃及人在四千五百年前有鐵製的鐮刀，經過一千年才有耕犁，自公劉至周初僅五六百年光景，即使有鐵器，爲數一定甚少。要到春秋戰國的時候，農工業中鐵器的數量才增加，應用才普遍，如管子海王篇說：

“今鐵官之數曰：一女必有一鍼一刀，……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鋤，……行服連轆者必有一斤，一鋸，一錐，一鑿。”

輕重篇更說：

“一農之事，必有一耜，一鋤，一鐮，一耨，一椎，一銍，然後成爲農。一車必有一斤，一鋸，一釘，一鑽，一鑿，一銖，一軻，然後成爲車。一女必有一刀，一錐，一箴，一鋪，然後成爲女。”

春秋戰國之際正是封建的生產方法崩潰的時代，所以這種鐵器數量的增加和應用的普遍，我們只能認爲替舊經濟制度掘墳墓和新經濟制度披荆斬棘的工具：牠們因此葬送了封建的生產方法，而迎接了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

所謂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又是什麼？這是必須詳加解釋的，因爲我們（1）要知道牠和亞細亞的生產方法不同之點，（2）要藉牠做了解中國自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經濟

制度的鎖鑰，(3)要藉牠做了解資本主義的先決條件。馬克思說：

“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的諸生產方法的內部堅實，對於商業解體的作用所表現的障礙，可以從英國對印度和中國的通商明白表現出來。這些國家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在印度還要加上一種建築在土地公有的鄉村公社的形態，然這也是中國原始的形態。英國人為破滅此等小的經濟公社起見，特以統治者和地主的資格在印度同時使用他們直接的政治和經濟勢力。英國的商業對於這種生產方法所發生的革命影響，只在假手於牠的商品的低廉價格破壞紡織業——此業是這種農工業生產的統一中一個原始的整部分——並且打碎這種公社。雖是如此，這種解體的工作進行也很遲緩。英國人在中國沒有任何直接的政治勢力，故這種進程更為遲緩。此處因農工業的直接結合，而節省財力和時間，對於大工業的生產品——牠們的價格中含有流通進程的死費用——遂表現一種最後頑強的抵抗。然在另一方面，俄國的商業——不像英國的商業一樣——沒有震動亞洲生產的經

濟基礎。”(見德文資本論第三卷三一八頁)

就這一段話看來，好像馬克思所謂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就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因為他在此處所說的和我們在第二項所徵引的，好像沒有什麼區別。馬札亞爾把這兩種生產方法合而為一的大理由恐怕不外以此為根據罷。但我們細心研究一下，便知道其中大有區別。

第一，馬氏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說：“印度極古的小公社……是建築在土地公有，農業和手工業的直接結合，和一種固定的分工上，”而在第三卷則說：“這些國家生產方法廣大的基礎是由小農業與家庭工業聯合構成的，在印度還要加上一種建築在土地公有的公社形態，然這也是中國原始的形態。”前者以建築在土地公有的小公社為重要條件，即以土地國有為主要條件，而以農業和手工業的直接結合附之，後者以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直接結合為主要條件，而以建築在土地公有的鄉村公社形態附之，可見前者是正式的亞細亞生產方法，而後者只是牠的殘餘。

第二，馬氏所謂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原不止一種，所以他說：“前資本主義的民族的諸生產方法”，在同卷後面又說：

“重利盤剝在一切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發生革命的影響，只是由于牠對於那些財產形態——政治組織即建築在那些形態的堅固基礎和同一形態的永久再生產上——加以毀滅，使之解體。重利盤剝在亞細亞的形態之下可以經過一個長時期，除掉經濟的解體和政治的腐敗外，沒有產生任何事物。要等到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其他條件都已出現，重利盤剝在一方面因毀滅封建領主和小規模生產，在另一方面因集中生產條件作為資本，才變為幫助構成新生產方法的一種手段。”（見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冊一三六頁）

上面所謂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冠上“諸”和“一切”的形容詞，都是多數，不僅可以包括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殘餘，並且實在含有封建生產方法的殘餘，證以“重利盤剝……毀滅封建領主”一語，絕無疑義。關於這一點我們還可徵引烏里耶諾夫講俄國農村的話作一個補充。他說：

“前資本主義的農村構成地方小市場的一個網；此等市場形成一般小生產者的小集團的結合，這些人是因自己孤立的經濟，無數中古時代的障礙，和中古時代農奴狀況的殘餘而分散的。”（見烏里耶諾夫全集第三

卷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三四二頁)

這裏所謂前資本主義的農村也明明是指中古時代封建制度的殘餘現象。總括這兩段話的意旨，可知馬克思所稱的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絕不等于正式的亞細亞生產方法。

第三，我們在上面所徵引馬氏的一段話是出自資本論第三卷“前資本主義的狀況”(Vorkapitalistisches)一章，他這章說明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等等，尤多非正式的亞洲生產方法中所能出現，例如他說：

“取息資本——如就牠的古式形態說，可稱為盤利資本——和牠的孿生兄弟商人資本一樣，是資本最古的形態，遠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前，並且被發見于最不同的社會經濟結構中。

“盤利資本的存在所需的條件僅為生產物的一部分至少應當已經變成商品，而貨幣伴着商品的交易，應當已經在牠的各種職務中發達起來。

“盤利資本的發展附在商人資本的發展上面，特別是附在財政資本上面。在古代羅馬，從共和的後期起，製造業雖遠在古代平均發達之下，然商人資本，財政資本和盤利資本在古代形態中已經發達到最高點。

* * * *

“在奴隸經濟（非家長式的，係後期希臘與羅馬式的）作為斂財的手段的一切形態中，凡貨幣由購買奴隸和土地等等成為吸取他人勞動的方法之處，貨幣便變成有用，可作資本，產生利息，因為牠可以這樣去投資。

“盤利資本在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之前存在的最特別的形態有兩種。我故意說最特別的形態。此等形態重行出現于資本主義生產的基礎上，不過僅為附屬的形態罷了。牠們于是不復為決定取息資本的性質的形態。這兩種形態為：第一，出借貨幣給上等階級的奢侈人物，特別是給地主，盤剝重利；第二，出借貨幣給小生產者——他們有自己的勞動條件，並包括手藝工人在內——特別是給農民，盤剝重利，因為在前資本主義的狀況中，既容許有獨立的私人小生產者，則農民階級必定構成一種最大多數。”（見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二冊一三二至一三三頁）

第四，馬氏在下面所描寫的前資本主義的社會狀況，更非正式的亞洲生產方法所能達到，就是：

“在資本主義社會以前的階段中，是商業宰制工

業；在近代社會中則適得其反。商業對於牠所接觸的諸社會自然多少要發生一點反響；牠將使享樂和維持生活依賴出賣生產物較甚于依賴直接使用生產物，因此使生產愈趨于交換價值一途。所以牠使一切舊狀況解體。增進貨幣的流通。並且不僅攫得生產的剩餘，還要蠶食生產本身，使整個的生產部門都依賴牠。然這種解體的效用大半以生產社會的性質為轉移。”（見德文資本論第三卷第一冊三一四至三一五頁）

上列四項不獨明白告訴我們正式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和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大不相同，並且將後者的內容一一表現出來了。由此可以確切知道牠是一種過渡時代的生產方法，含有以前各種生產方法的殘餘，現在為提綱挈領起見，特標舉其重要的數點如下：

- (一)小農業與家庭工業的直接結合，構成一個地方小市場的網。
- (二)高利貸資本和商人資本很佔優勢。
- (三)商業宰制工業。
- (四)地主階級和其他上等階級的存在。
- (五)獨立生產者——手藝工人——的存在。

(六)向來各種生產方法殘餘的存在。

(七)農工的破產流為貧民和生產工具的集中。

我們既將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中的幾個要點弄清楚了，當進而考察自秦至清鴉片戰爭前的經濟制度。不過像上列六項的特點，不獨每個讀過中國歷史的人可以從這個時期找出來（即在封建末期的春秋戰國時也可找出來），並且自己親身的經驗更可保證這些都是鐵一般的事實，因為牠們的殘餘形態，甚至于完全形態猶彰彰在人耳目。所以我用不着按照上面的次序逐項舉出證據，只須徵引幾段話表現那些大關節就夠了。

史記貨殖傳說：

“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

又說：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代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遊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魯人俗儉嗇，而曹鄆氏尤甚。以鐵冶起，富至巨萬。……貫貨行賈偏國。”

前漢書王莽傳載：

“秦爲無道，厚賦稅以自供奉。……兼併起，貧鄙生，強者規田以千數，弱者曾無立錐之地。”

章太炎檢論通法篇引崔實的話如下：

“漢承秦弊，尊獎兼併。上家壘巨萬，厥食侔封君。行苞苴以亂執政，養劍客以威黔首。專殺不辜，號無市死之子。生死之奉，多擬人君。故下戶跼蹐，無所跼足。乃父子低首，奴事富人，窮率妻孥，爲之服役。故富者餘席而日熾，貧者躡短而歲蹶。歷代爲奴，猶不贍于衣食。歲小不登，流離溝壑；嫁妻賣子，傷心腐臧，不可勝陳。”

前漢書食貨志載：

“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勢，以利相傾。……此商人所以兼併農人，農人所以流亡也。”

我們只要看一看這五段話，就可以窺見秦漢之際，高利貸資本與商人資本的稱霸，金屬貨幣的流通，商業對工業的宰制，地主的橫行，農民的困苦，和無產者的出現等等。這不是正式的封建制度的生產方法中所應有的狀況，却爲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中必然的現象。自秦漢以至清鴉片戰爭

前，歷時二千零八十六年，雖朝代更易在二十以上，然這種生產方法始終沒有變化，至多不過是將牠的領域逐漸推廣罷了。所以我們稱這個時期為前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時代。

六，馬克思說：

“美洲金銀地的發見，土著人口在鑛山中的被殲滅，奴役和葬送，東印度的開始被征服和劫奪，非洲的被變作獵取黑奴貿易的場所，便指出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此等牧歌的進程是原始蓄積的主要關鍵。跟着出現的就是歐洲各民族以地球為舞台的商業戰爭。自尼德蘭(Niederlande)反叛西班牙開始，在英國反雅各賓戰爭(Anti-jacobin war)中取了廣大的範圍，在對中國鴉片戰爭這一類打劫的侵略中自然繼續表演下去。”

(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六七九至六八〇頁)

這段話是很有意思的，因為牠把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和鴉片戰爭聯繫起來，而自鴉片戰爭以後，又是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時代的曙光出現之時了。怎樣見得呢？在歐洲是“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于十六世紀開始近世資本的生命史”(見考氏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一〇四頁)，在中國便是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于一八四〇年代開始近世資本的生命史。

然單是世界商業和世界市場，而沒有馬克思所說的其他兩個條件，近世資本的生命史是不會于一八四〇年代在中國開始的。這兩個條件是什麼呢？我們再聽馬克思說罷：

“貨幣和商品最初不是資本，恰和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不是資本一樣。牠們可以轉變為資本。不過這種轉變自身只能在一定的狀況之下進行，而此等狀況總括如下：兩種極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須對立着，並互相接觸，即一方面是貨幣，生產工具和生活資料的所有者，假手於購買他人的勞動力去增殖自己所有的價值量；另一方面是自由勞動者，是出賣自己勞動力的人，因此也是出賣自己勞動的人。所謂自由勞動者有兩種意義，他們自己既不像奴隸和農奴等人一樣，直接構成生產工具的一部分，也不像自耕農等人一樣，自有生產工具，他們對於此等工具了無掛礙。資本主義的生產是因這種商品市場的分裂而出現的。資本的關係是以勞動者對於實現勞動的條件的所有權分離為前提。資本主義的生產一經站住了腳，不僅保持這種分離，並且以時常增大的規模再產生這種分離。所以創造資本關係的進程只能是使勞動者和自己勞動條件的所有權的分

離進程，牠在一方面使社會的生活資料和生產工具變成資本，在另一方面，使直接的生產者變成工資勞動者。”（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六四五至六四六頁）

所以要有資本主義的生產出現，必須先有一個壟斷生產工具與生活資料的階級——資產階級，和一個一無所有，專靠出賣勞動力維持生活的階級——無產階級，尤其是後者最為重要，故馬氏又說：

“當勞動者能夠替自己蓄積時——他如果是他的生產工具所有人，便可以這樣做——資本主義的蓄積和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是不可能的。因為缺少牠們所必需的工資勞動者階級。”（見同書同卷六九四頁）

中國在鴉片戰爭前即已備具這兩個條件，所以自五口通商，西洋的新技術輸入以後，我們的產業資本主義便馬上可以發軔了。由此可見任曙君所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不是內在的而是外鑠的，這一特性已久為談中國經濟問題者所公認，”（見任著中國經濟研究八四頁）等語，只是一種無稽之談，因為中國如果不具備發展資本主義的“內在的”條件，無論怎樣“外鑠”是“鑠”不來的，如果！信，就請任君

挾着資本主義的生產技術去鑠一鑠五指山的黎人和雲貴等處的苗子！

不過這裏也許有人要發生一種疑問，就是中國最初的機器工業明明開始於一八六〇年代，如江南造船廠創自一八六五年，福州船政局創自一八六六年，南京機器局，天津機器局和江南製造廠等都創自一八六七年，上面認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時代曙光出現於一八四〇年代豈不是過早麼？其實所謂資本主義的生產並不限定要是機器業，馬克思說：

“我們已經看見，當私人資本同時雇用比較多數的工人，勞動進程擴大牠的範圍，並產出比較多量的生產物時，資本主義的生產在事實上才算是開始了。一種比較多數的工人在同一時間，同一地方（或同一勞動領域），於同一資本家的指揮之下，生產同一種類的商品，這種行動在歷史上和邏輯上構成資本主義生產的出發點。至於生產方法自身，例如手工工廠業在初起時與行會手工業殆無區別，不過同一資本同時雇用的工人數目較多一些罷了。行會主人的工場在這種場所只是擴大了。”（見考茨基註釋的資本論第一卷二六九至二七〇頁）

由此看來，我們從鴉片戰爭後劃分中國資本主義開始發展的時期，與其說是過早，不如說是還嫌太遲，因為馬克思對於歐洲從十六世紀起即認為“資本主義的時代”（見同書同卷六四七頁），當時距機器工業的生產足有一世紀半之久。

中國資本主義的時代的開端既經確定，我們且將牠的發展情形略說一下。中國自一八六〇年代發生所謂“軍用工業”以後，至一八八〇年代又有官辦輕工業出現。迨甲午之役（一八九四年）大敗於日本，更成為促進新式產業的一種動力。除掉內河航行，已有輪船外，此後又競借外資，建築鐵路，資本主義的交通工具逐漸發展，而私人的大企業也應運而生。加以一八九六年的中日下關條約承認外人在通商口岸有工業企業權，於是外國資本家利用中國廉價的原料和勞動力，在上海等處創立工廠，且伸其巨靈之掌於內地各礦山中。資本主義在中國達到相當的展進，而資產階級的革命遂轟轟烈烈地於一九一一年出現並勝利了。

自此以後，資本主義的發展步驟甚緩，直至歐戰期間，本國的紡織業和其他輕工業乘機崛起，呈出顯著的進步，而銀行業也逐漸展開。不過歐戰告終，各帝國主義的國家競向

中國投資投貨，復挾其財政資本操縱中國的市場，國內遂成爲中外資產階級共同角逐之地。加以北洋軍閥站在資產階級的頭上時常加以防礙，於是有一九二五至一九二七年打倒帝國主義與軍閥的革命。這一次革命雖仍只有一部分的成功，然對於中國農村却發生了深刻的影響，因爲由此引起一種打倒土豪劣紳的運動，予封建和半家長式的農村經濟以一種重大的打擊（至少是在中南兩部）。我們現在考察中國全部經濟的狀況，就城市與鄉村講，是城市統治鄉村，就各帝國主義國家與中國講，是國際帝國主義統治中國，這種鐵的事實是無人能夠否認的。

基于上述的理由，我們不能不承認中國現在是資本主義的社會，或資本主義的經濟，這就是說：中國現在是在資本主義的初期，國中雖尚有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或其他生產方法的殘餘的存在，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却確確切切站在領導的地位上。

四 介紹並批評各種劃分中國經濟時期的說法

我們對於中國自古至今的經濟發展既有以上的一種圖

案，則於他人不同的主張自然要加以批評，今特擇要分述於後。

(一)關於陳邦國君的

陳君在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見讀書雜誌一卷四五期）
一文中說郭沫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

“製成了一個社會進化表：原始共產制——奴隸制——封建制——資本制。他完全忽視了氏族社會一個發展階段，並且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由此可見他的古代社會研究一書的觀點仍舊是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前的馬克思與昂格思的觀點。然而在古代社會出版之後，他倆已放棄了過去的觀點，而用摩爾根發現的氏族社會對於歷史的過程作了一個大的補充。郭沫若在現代研究中國歷史尚忘記了這一階段，怎麼不是大笑話啊？”

我對於這段話實在有些莫明其妙！第一，陳君說郭君“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仍舊是在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前的馬克思與昂格思的觀點”，這是牛頭不對馬嘴的話，馬昂兩氏絕對沒有具過這樣的一種意見，陳君如將本文第二項細閱一遍，當知他們對於社會的經濟發展，在摩氏古代

社會出版前持一種什麼意見，在該書出版後又怎樣改變他們的意見。

第二，他說郭君忽視了氏族社會這個階段，“鑄下了大錯，實在不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但他如果慢點笑，先細心看一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當發覺自己不免有點小錯，或鬧了個小笑話。因為不獨在他徵引那個“社會進化表：原始共產制”之下明明有“氏族社會”四個大字（見原書二三頁），並且書中關於唐虞和殷代的文字都是描寫氏族社會的情形，硬說郭君鑄了大錯，鬧了大笑話，未免太冤枉了罷！

第三，可是他斷章取義地引用郭君的“社會進化表”以相責難，也自有他的“理由”，試看他先抬出“氏族社會研究專家瓦列夫斯基”，對於氏族標舉一種定義，接着很鄭重地說道：

“氏族社會在本質上是以氏族為單位的一種社會組織，是原始共產社會崩潰之後，生產經濟代替了採取經濟的一種新的社會形式。”

陳君這種把氏族社會從原始共產社會劃分出來，視為性質完全不同的兩種東西的高見，無論是出自師承，或是自創新說，我們是斷然反對的。請分述其理由如下：

(甲)原始人的霍德(Horde即小羣的意思)的採取經濟固然是共產主義的，即氏族的生產經濟也是共產主義的，形態雖有不同，性質絕無差異，陳君今將原始共產社會與氏族社會對立起來，理由安在？還有一層，原始的霍德固然只是採取經濟，然氏族社會不僅是狹義的生產經濟，也還雜有採取經濟，所以有人稱之為混合經濟。以此去區分原始的霍德和氏族的組織，本來沒有什麼不可以，但以此去區分原始共產社會和氏族社會，便變成一種不通之論了。

(乙)就我所讀的中西書籍講，從沒有看過這樣奇怪的劃分。例如萊姆斯 (W. Reimes) 在他的社會經濟發展史 (Ein Gang Durch die Wirtschaftsgeschichte) 中說：

“最初的人類在無限長久的時期中，是生息於打獵的原始的霍德共產主義 (Hordenkommunismus) 裏面。他們後來由這種獵人生活更進一步，達到游牧生活，由此又再進而趨於農業與土著了。當他們成為比較進步的農民時，即構成永久的農民公社——例如馬克公社 (Markgenossenschaft) 之類 (但在自然條件不允許有這種步驟的地方是除外的)，——除掉打獵外，便以農業勞動維持自己的生活。在馬克裏面，原始共產

主義達到最完備的地步。”（見該書一九二二年原本五八至五九頁，又亞東圖書館譯本九七至九八頁）

萊氏認原始共產主義在馬克（即一定的土地的意思）經濟（生產經濟）中才“達到最完備的地步”，而陳君却認為在採取經濟之後即崩潰了，到底誰是誰非呢？我們請世界上一位鼎鼎大名的學者來解決罷。此人就是考茨基。他曾替薩爾衛阿里（Joseph Salvioli）的古代資本主義（Der Kapitalismus im Altertum）作一篇序言，內中有一段說：

“馬克思認原始共產主義（Urkommunismus）為原始的生產方法。人類共同生活於小羣中，就顯明的所有權關係的原始狀況講，每個人都共同耕種並據有土地——這是最重要的生產手段。這種勞動是依照社會的習慣，計劃，和同意進行的，生產物屬於社會，並同樣依照社會的規程和同意而分配於各員。”（見該書一九二二年德文譯本序言第九頁）

現在又要請教陳君，考茨基認這種場所的農業（即生產經濟）為原始共產主義還是不對麼？還不免是“大錯”或“大笑話”麼？

如果這種說法還不足以折服陳君，那我們只好再請摩

爾根和昂格思出來。摩氏在古代社會與昂氏在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中都視氏族社會為原始共產主義，不過他們沒有用過這個名詞，僅用共產主義字樣，這是無關重要的，因為所謂原始共產主義只是對後世的共產主義而言，至於在氏族社會中是沒有此等名詞出現的。陳君看了這種事實，以為如何？

其實指出陳君的錯誤還用不着驚動這些西洋學者，他只要肯花五角五分或七角大洋向崑崙書店買一本上田茂樹著的世界社會史或山川均著的唯物史觀經濟史上冊，把前面幾頁或十幾頁翻開看一下，就有“氏族共產主義時代”或“原始共產制最後的發展階段是農業共產體”等字樣映入他的眼簾，要使他自已大吃一驚！

(丙)陳君既將氏族社會屏諸原始共產社會之外，那麼，這到底是一個什麼社會呢？他自己沒有半句的解釋。如果勉強說有的話，那就是：

“井田制度的神話，其實便是氏族社會的末期的一種生產形式。”

拿“井田制度的神話”去說明“氏族社會的末期”，究竟是什麼意思，除掉他自己以外，恐怕只有天曉得！然在實際上

他自己也有些莫明其妙。因為他在一方面宣言“氏族社會的崩潰，因為生產力更高的發展，人口的增加，使鄰居的聯繫加緊起來。這樣，已經接近了各自獨立經營的‘大家庭’制度，並且開始使用公共的財產：住宅及牧場”。據這些語意不明的話推測起來，氏族社會好像是共產的。但在另一方面，他又埋怨郭沫若君“把奴隸制代替了氏族社會”，可見氏族社會又不是共產的，因為奴隸制明明站在私有財產和階級對抗上，奴隸制可以代替氏族社會，則氏族社會的性質更可想而知了。他自己還沒有懂清楚的東西，如何叫人好懂呢？

(丁) 陳君看到這裏，一定不服氣；因為他明明說過：

“〔農村公社〕生產力的發展更向前進了一步，剩餘生產品大大的增加起來，開始利用不自由的勞動，於是發生奴隸。……奴隸經濟是由氏族社會到封建社會的一個過渡。郭沫若君沒有懂得這個過渡，他誤認封建社會是直接由奴隸制度推移來的，所以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中鑄下了大錯。”

既名之曰“奴隸經濟”，而又否認其為“奴隸制度”，這就和一方面稱“封建經濟”而牠方面又否認其為“封建制度”一樣！現在即退一步，姑認陳君所謂“奴隸經濟”是屬於“農村

公社”的，然則郭君所忽視的乃是“奴隸經濟”，而不是什麼氏族社會了！

但陳君也許又要說，這種“奴隸經濟”是屬於氏族社會的末期，並不站在牠的外面，因為此時固早已有了奴隸啦。不過他人可以如此說，陳君是沒有資格說這句話的。因為他在一方面應用了“氏族社會專家考瓦列夫斯基”對於氏族的定義，並且說明牠“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開的，是與摩爾根在古代社會與昂格思在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中的定義不同”，在另一方面，他又說：

“鄰居關係的奠定，將昔日氏族關係根本推翻，於是氏族公社就為鄰居的或農村公社（井田制度）所代替。交換於是偶然的發生。管理的選舉已經不按照氏族的單位。生產工具也由石器發達了金器。最初便是用銅。”

我們看了他這種說法，真如墮五里霧中，不知道他所謂氏族社會到底是什麼？據摩爾根說：

“當家系轉入男性，甚至於還要早些的時候，氏族的動物名稱即被拋棄，而代以私人的名稱，這似乎是可能的。”（見古代社會原文三五六頁）

這裏所謂“氏族的動物名稱”，不用說，就是圖騰。陳君既說“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是沒有與圖騰形式分離的”，可見他所謂氏族以及氏族社會的範圍非常狹小，而他認野蠻中級應用銅器時氏族社會即已崩潰，尤足證明這一點（關於摩爾根所謂氏族社會的範圍，可查看下文我們駁郭沫若君所列的圖表）。這種界限的劃分與氏族發展的狀況完全不符，姑置不論，像他這樣的氏族社會自然不能和封建社會銜接，可見郭君所忽視的，不是他的氏族社會，而是他的農村公社，或井田制度！

總之，陳君對於氏族社會未曾懂得，對於郭君所謂氏族社會也未曾懂得，對於郭君的錯誤所在，更茫無所知，惟拿着幾個半生不熟的名詞搬來搬去，以致一般缺乏古代社會知識的人覺得非常神祕，莫測高深！

末了，我們當探討陳君錯誤的來源。要說他是完全不懂麼？他不獨知道摩爾根，馬克思，昂格思這些名字，不獨知道古代社會出版後，馬昂兩氏改變了自己的意見，並且還提出什麼“氏族社會研究專家考瓦列夫斯基的定義”來嚇人（其實他自己在定義後面的說法完全違反這種定義）。要說他完全懂麼？他的說法又不三不四，毫無理論上的根據。我想來想

去，總想不出一個所以然。後來忽然想起庫斯聶的社會形式發展史大綱（神州國光社出版）中不是有什麼“原始社會”，“氏族社會”，“採積經濟”，“生產經濟”等名詞麼？陳君也許就是從此中取出，自行製造一下罷！這雖不免有些臆斷，恐怕已經逼近真理了。

有人讀了我這四千字左右的批評文字，或者要認為小題大做，對於陳君這一點錯誤，值不得發這許多的議論。這話是有理由的。我最初的意思是要把批評陳君此文的話附在批評郭沫若君的大著裏面，並不想另闢一個子目。但後來看見讀書雜誌四五期第三版增刊的幾封批評社會史論戰各種作品的信，不獨無人注意及此，並且還有兩封信直接贊揚陳君的大文。其一為秋原君的，他說：

“‘破’的文章中，最使弟注意者，是劉夢雲，劉鏡園，及陳邦國三君的文章。因為有大部分意見為弟所共感，而且含有許多有價值的暗示之故。”

其二為郭全和君的，他說：

“陳邦國君中國歷史發展的道路和周紹濤君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等文對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作嚴正的批評，使我很歡喜！”

秋原君所共感的“含有許多有價值的暗示”的意見和郭君很歡喜的“嚴正的批評”，雖未必和我所指摘的恰為同一物，不過陳君的大作經他們兩位的贊賞後，對於青年學子的危險性更大，所以不能不加以詳盡的批評。

(二)關於郭沫若君的

郭君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是一部風行全國的大著，現在已經四版，快銷到七千部了，而他在序言中也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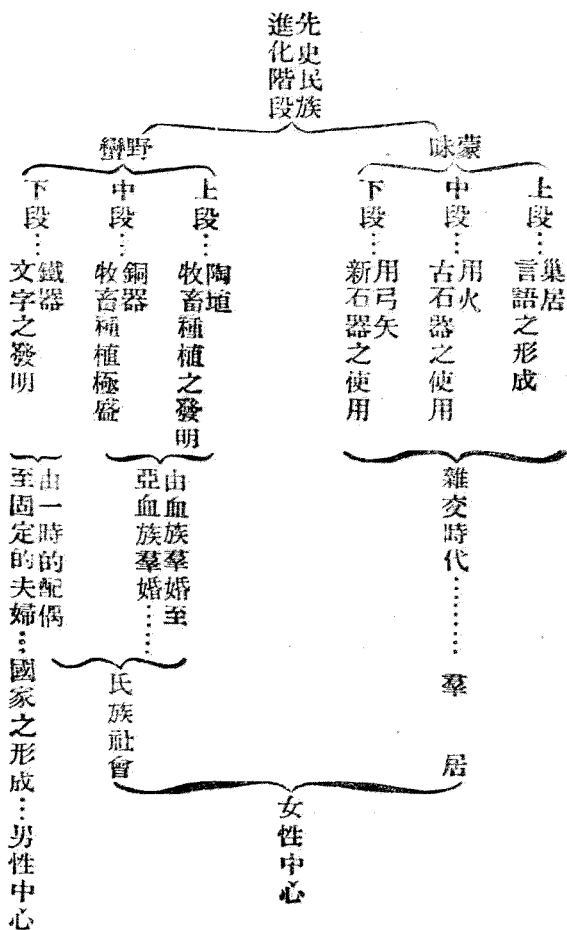
“本書的性質可以說就是昂格思的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

當我看到這裏時，心中起了無限的敬意，因為我老早就想望中國能有這樣的一個“續篇”出現，藉以一飽眼福。但我于一口氣讀完這部大著之後，不免大失所望，因為他這部書是從兩個大公式出發的：即摩爾根古代社會中前史時期進化階段的公式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批評序言中經濟發展的公式，他對於此等公式的了解極不充分，甚至于完全錯誤，以致沒有一點好結果。今特依次說明如下：

郭君在書中開口昂格思，閉口摩爾根，真是把他們倆人看做大宗師，可惜他完全不懂他們的學說，豈止不懂，簡直鬧了一個大笑話！他在講周易時代的社會結構時說，據摩爾

根“古代社會的研究，先史民族之進化階段可表列如次”：

(見原書四一至四二頁)



郭君這個表的上半截係根據摩氏古代社會第一篇一章第十二頁的表和第三章最初幾頁的說法製成，雖不完全，還算正確（不過所謂上段中段下段不能充分表見發展，應依原文改譯為低級中級高級），下半截乃根據全書各處的說法作成，便和摩氏的原意完全相反了。今就其中重要的數點來說一下。

一，摩爾根對於雜交（Promiscuous intercourse）的說法雖沒有否認，但却十分慎重地加以描寫（昂格思也是如此，參看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原文一二至一四頁），所以他說：

“雜交表現蒙昧最低的階段——牠代表一個起碼點。人類在這種狀況中，和環繞他們的不能言的動物迥沒有區別。他們不知道結婚，大概是生活於一個霍德中，不僅是一種蒙昧人，並且僅具有一種孱弱智能和一種更孱弱的道德意識。”（見古代社會原文五〇七頁）

他在後面又說：

“雜交在理論上可以推論為先于血緣家庭（Consanguine family）的一種必然的狀況；但牠是隱藏在人類矇矓的往昔，非正確的知識所能達到。”（見同書五〇

九頁)

這兩節話明白表現摩爾根所承認的雜交是在人和獸很少區別的朦朧的往古，係由推論而得，不獨蒙昧的中級和高級（即上表所謂中段和下段）不會有這種現象，即低級（即上表所謂上段）的後段也絕跡了。因為摩氏明明推論雜交是“先于血緣家庭的一種必然的狀況”，在同頁又承認這種家庭是“屬於蒙昧的低級”，而彭那魯亞家庭（Punaluan family）“也許是起于蒙昧的中級”。由此可見郭君所列的表與摩氏的說法相去足足有十萬八千里！

（註）摩爾根所謂血緣家庭是建築在嫡系和旁系的兄弟姊妹的羣婚

上面；彭那魯亞家庭是建築在嫡系和旁系的幾個姊妹對於各人的夫的羣婚，與嫡系和旁系的幾個兄弟對於各人的妻的羣婚上面；而此等丈夫或妻子却不限定各為親屬。由此又是證明郭君指彭那魯亞羣婚為什麼“亞血族羣婚”實在是不妥當的。

二，郭君既使雜交佔據蒙昧的全部領域，把屬於蒙昧三級的血緣集團婚與彭那魯亞集團婚列在野蠻的低級和中級（即上表所謂上段與中段），鑄成第一次大錯，便不能不繼續鑄造第二次，第三次，以至無數次的錯誤。據摩爾根說：

“當氏族出現時，對於兄弟和彼此的妻子的集團

婚，以及姊妹和彼此的丈夫的集團婚，是不加限制的。但牠力求排除兄弟姊妹已成的婚姻關係。……”（見古代社會原文七三至七四頁）

摩氏又說：

“氏族在起源上是古于一夫一妻家庭，是古于對偶家庭，實在與彭那魯亞家庭同時。”（見同書二三三頁）郭君不知道摩氏這些說法，竟妄將血族羣婚總括在氏族社會裏面，這便是第二個錯誤。

三，在一方面，氏族雖和彭那魯亞家庭同時出現，但牠並不建築在這種或任何種家庭上面，所以摩爾根說：

“每一種家庭無論其在早期或後期中，有一部分在氏族內，有一部分在氏族外，因為夫妻必須屬於不同的氏族。這種解釋是簡單而完全的；就是，家庭的興起不與氏族相干，牠能完全自由地從一種低級的形態發展至高級的形態，同時氏族是經常的，是社會制度的單位。氏族(gen)全體加入胞族(phratry)，胞族全體加入部族(tribe)，部族全體加入民族(nation)；但家庭不能全體加入氏族，因為夫和妻必須屬於不同的氏族。”（見同書同頁）

在另一方面，彭那魯亞羣婚並不限定產生氏族，牠初時是造成一種依性分級的社會，故摩爾根說：

“在考究政府觀念發展一問題時，以血族為基礎的氏族組織，自然是古代社會一種古的骨幹；但還有一種更古的組織，即依性分級的組織首先要求我們的注意。這並不是因為牠在人類經驗中是新奇的東西，而是有更大的理由，因為牠似乎含有氏族胚胎的原理。”（見同書四七頁）

“以性為基礎的分級組織和以血族為基礎的氏族初步組織，現在盛行于用卡米拉羅依（Kamilaroi）語的澳洲土人中。……只要從內部加以考察，便明白看出男女兩性的分級是較氏族為早：第一，因氏族組織較分級的組織為高；第二，因在卡米拉羅依種族中氏族的組織正在推翻男女兩性的分級組織。”（見同書四八頁）

郭君不知道摩氏這些說法，竟又妄將彭那魯亞羣婚（即他所謂“亞血族羣婚”）總括在氏族社會裏面，這便是第三個錯誤。

四，摩爾根說：

“當人類曾經從蒙昧進于野蠻的低級時，他們的狀

況大有進步。爲追求文明的爭鬥，有一大半是勝利的。一種使結婚人羣減少數目的傾向在蒙昧的末期必定已經開始表現，因爲對偶家庭（Syndyasmian family）變成野蠻低級中的經常現象。”（見同書五一〇頁）

這裏所謂對偶家庭是出于對偶婚，也就是郭君所謂“一時的配偶”，應當列入野蠻的低級（即上表所謂上段），而他却輕輕地遷下兩級，這是第四個錯誤。

五，氏族的起源本來甚古，摩氏說：

“要說明氏族起源的正確狀況自然是不可能的。……牠在起源上是屬於人類發達的一個低階段和社會很古的狀況中；在時間上稍後于彭那魯亞家庭的初次出現。牠顯然出于這種家庭，後者是由實質與氏族員相符的一羣人構成的。”（見同書四四三頁）

昂格思也說：

“氏族發生于蒙昧的中級，發展于蒙昧的高級，就我們的來源所能判斷的講，是在野蠻的低級達到全盛時期。”（見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原文一六三頁）

郭君對於這些說法又茫無所知，竟將彭那魯亞羣婚列在野蠻的中級，這是第五個錯誤。

六，對偶婚是屬於野蠻的低級和中級，而繼續至高級，舉例來說：

“當美洲土人被發見時，在野蠻低級中的一部分人已經達到對偶家庭。”（見古代社會原文四六二頁）“在中級的村落印第安人（Village Indians）中，這種家庭是很流行的形態，西班牙著作家的報告雖甚空泛，這是沒有疑義的。”（見同書四七一頁）

郭君對於這些事實也沒有聽見講過，所以把對偶婚（即他所謂“一時的配偶”）列在野蠻的高級，這是第六個錯誤。

七，一夫一妻制出現于野蠻的高級，是在氏族社會以內，郭君將牠置諸氏族社會之外，這是第七個錯誤。

（註）摩爾根所謂“對偶家庭”是建築在一對男女沒有固定結合的婚姻上面，所謂一夫一妻制是建築在一對男女固定結合的婚姻上面。郭君連這些術語都不知道用，竟由自己勉強作出什麼“一時的配偶”和“固定的夫婦”。

八，摩爾根所謂女性本位和男性本位原是指氏族社會以內講的，所以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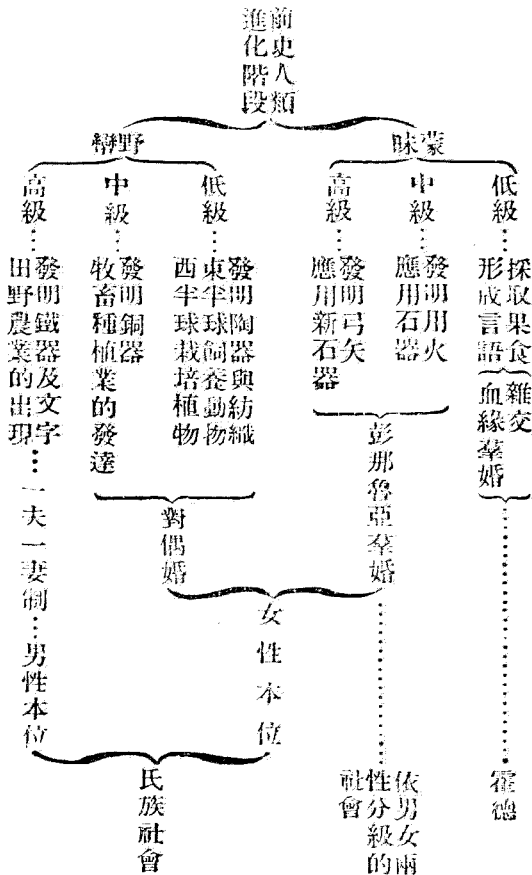
“在家系以女性為本位的地方，兒子不能當選承繼他的父親，因為他是屬於不同的氏族，沒有氏族要從其

牠氏族中選出一個普通酋長或世襲酋長。”（見同書七〇頁）

“家系以男性爲本位，則孩子們屬於他們父親的氏族。”（見同書一七〇頁）

郭君對於這些句子自然不知道，于是在一方面將女性中心牽扯到雜交時代，在另一方面將男性中心屏諸氏族社會之外，鑄成最後的大錯，即第八個錯誤。

郭君抱着天大的野心，要著一部書做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又懷有宏大的志願，要在這種“續篇”中列表傳播摩爾根的學說，不講先要細心研究古代社會，至少也應當看一遍。現在就他所犯的八大錯誤看來，我可以斷言，他是“急時抱佛脚”地在那部名著裏面亂翻幾頁，馬上抄錄下來，作爲立論的根據——像這樣無聊的舉動不獨對不住買了七千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讀者，並且也對不住自己啊!!!我們現在爲使郭君和讀者易于明瞭上面糾正的各節起見，特依照摩氏對於前史人類進化階段的學說，列表如下：



我們試將這個表和郭君上面的表對照一下，馬上就可以發見他那個表的下半截錯到什麼地步，而他在野蠻的高級中遺漏田野農業一項，也是一個絕大的缺點。不過這裏有

兩點是要特別聲明的：

(1)此表爲簡單明瞭起見，未能將摩爾根所說的複雜情形完全表現出來。例如他說：

“血緣家庭和彭那魯亞家庭是屬於蒙昧的階段——前者屬於牠的最低的狀況中，後者屬於牠的最高的狀況中——而彭那魯亞家庭則繼續至野蠻的低級；對偶家庭是屬於野蠻的低級和中級，繼續至高級；一夫一妻家庭是屬於野蠻的高級，繼續至文明時代，這是通常發見的情形。”（見古代社會原文四七一頁）

此處說彭那魯亞家庭繼續至野蠻的低級，對偶家庭繼續至野蠻的高級，我們的表上都沒有表現出來。

(2)此表只是寫出前史人類家庭進化順序的通常狀況，並不是沒有特殊情形的，摩氏曾說：

“將這幾種家庭形態在牠們相對的順序中這樣確切地說出來，實有被誤解的危險。我並不是說，一種形態在社會某個階段中完全發育起來，普遍地並唯一地繁榮于同一階段的人類種族中，於是消滅于另一個較高的形態中。彭那魯亞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現于血緣家庭之間，血緣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現於彭那魯亞家庭

之間；對偶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現于彭那魯亞家庭之間，彭那魯亞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現於對偶家庭之間；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現於對偶家庭之間，對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現於一夫一妻家庭之間。甚至於一夫一妻家庭的例外可以出現於彭那魯亞家庭時，而對偶家庭的例外也可以出現於血緣家庭時。還有一層，有些種族達到一種特別形態，較早於其他更進步的種族：例如易洛魁人在野蠻的低級中有對偶家庭，而布立吞人（Britons）在野蠻的中級，仍是彭那魯亞家庭。”（見同書四七〇至四七一頁）

人們要完全了解這段話，才能夠應用摩爾根的學說去考察中國的古代社會，而收得一點結果。

可是郭沫若君不獨談不到活用摩氏的學說，甚至于連字義都弄不清楚。例如他說：

“黃帝以來的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傳說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正表明是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或者血族羣婚的母系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〇頁）

我起初看見這段話，以為他不是為自己一個錯誤的圖案所

蒙蔽而不注意事實，就是對於古代社會發展的情形沒有初步的認識；因為黃帝為有熊氏，這是一種圖騰社的稱號，原始人一達到圖騰社，即禁止同一圖騰的男女發生性交，至於“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正是一個母系制的時代，無論如何，安不上“一個野合的雜交時代”九個大字。但後來仔細考究，才知道全不是這麼一回事。他的毛病是在不懂雜交這個名詞的意義。摩爾根所謂雜交，是指無年齡親屬之別的性交，舉凡父母子女，或祖父母孫兒孫女等都互相性交，他們是不知道婚姻的。然郭君則誤以為雜交是指一個婦女為許多男子的公妻，或一個男子為許多婦女的公夫，總之，他以為羣婚就是雜交，所以後來又重複地說：

“例如五帝和三王祖先的誕生都是感天而生，知有母而不知有父，那便是自然發生的現象，那暗射出一個雜交時代或者羣婚時代的影子。”（見同書二六一頁）

哎喲，郭君連摩爾根所謂雜交的相淺的意義（其實這並不是他私定的界說，是一般人都承認的，是每個有科學常識的人都懂得的），都不了解，還談什麼摩爾根的學說!!!

即令郭君偶然懂得摩氏術語的意義也是用不準確的，我們試聽他說：

“有虞氏尙陶’，有虞氏瓦棺’，這是說當時還僅僅是土石器時代。

“堯皇帝的兩個女兒同嫁給舜皇帝，舜皇帝和他的兄弟象，却又共妻這兩位姊妹。孟子上有象說的話，要‘二嫂使治朕棲’；楚詞的天問篇上竟直說是‘眩弟並淫’。所以舜與象是娥皇女英的公夫，娥皇女英也就是舜與象的公妻。他們或她們正是互為‘彭那魯亞’。”（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〇頁）

有虞氏既然尙陶，既然有瓦棺，這就是說明堯舜時代至少是在野蠻的低級中（其實是在野蠻的中級中，甚至於還要在後），此時已是對偶婚，而不是彭那魯亞羣婚。例外當然也是有的，不過不能在此處應用。因為舜與象既是娥皇女英的公夫，為什麼象對她們要稱“二嫂”呢？楚辭上為什麼又要說“眩弟並淫，危害厥兄”呢？這種場所如果說得上彭那魯亞羣婚，那“陳平盜嫂”也事同一律，不獨野蠻的低級或中級中有彭那魯亞羣婚，即文明時代也有這種羣婚了！

然郭君所謂彭那魯亞羣婚，不僅止於舜與象的時代，他以為“卜辭中……確有多父多母之徵跡”（見同書二六七頁），“商代末年實顯然猶有亞血族羣婚制存在”（見同書二

七〇頁)。並且說武王數紂王“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一句

“正道破殷代還保存着亞血族結婚的制度，因為王父母弟整個要出嫁，所以在敵人看來，就好像是‘昏棄不迪’了。”（見同書一一一頁）

而武王數紂王“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爲大夫卿士，俾暴虐百姓，以姦宄於商邑”等語是和上一條相同，

“因為本族的男子要出嫁，異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贅，所以便不能不以爲大夫卿士。”（見同書同頁）

郭君認舜與象對於娥皇女英爲彭那魯亞羣婚，係根據孟子上“二嫂使治朕棲”和楚辭上“眩弟並淫”二語，雖屬牽強附會，到底還有點影子，至於此處所說的“王父母弟整個要出嫁”，“異族的男子不能不入贅”，真是連一點影子的根據都沒有。郭君這樣任意挪扯，未免駭人聽聞！像這種無聊的挪扯論每個有知識的人都可從直覺上感到牠的荒謬，用不着我來駁斥了。

郭君的書中充滿了這一類的高見，我們爲節省篇幅起見，不再列舉了。他是崇拜摩爾根而又沒有讀過摩氏全書的，因此我們要介紹摩氏的一段話給他看，服服他的心，使

他知道我們上面的議論不獨有事實的根據，而且有理論的基礎：

“我們爲找出每個時期相對的長度起見，如果假定人類在地球上的生存期爲十萬年，——也許還要長些或短些——馬上便會看出，至少有六萬年必須劃歸蒙昧時期。依照這種分配，則人類種族最進步的部分的生活五分之三是花在蒙昧狀態中。至於其餘的年分，有二萬年，或五分之一，應當劃歸野蠻的初期。一萬五千年應當劃歸中期和晚期，所剩下的五千年是爲文明時期。”（見古代社會原文三八頁）

據現今各國考古學家對於各種被發見的遺跡和骨骼的研究，地球上在二十萬年前大概就有人類了。而德國套巴哈（Taubach）地方所發見的人類生活遺跡且表見他們在八萬年前就知道用火。由此可見摩爾根這裏所假定的人類生存期還是太短，這是第一點。又他對於期間的分配，未必完全可靠，自是意料中的事，這是第二點。不過他這種說法對於我們研究中國古代社會至少給了一個指標，使我們可以避去許多不應當有的錯誤。可惜郭君不知道這一點，以致他要在黃帝（據辭源世界大事表載黃帝元年係紀元前二二九

七年)至殷末(紀元前一一二三年紂王敗滅)的一千一百七十五年中表演一個九萬五千年甚至於十九萬五千年人類生活的全部過程,所以他說,在這個時期中,“雜交時代”也有,“羣婚時代”也有,“土石器時代”也有,“金石併用時代”也有,“鐵器時代”也有(他雖說“鐵器時代”是在周初,但紂王敗滅,已是武王即位第十三年了)。中國古代人的本領真大,能在最短的期間表演人類生活最長的全部過程,猗歟休哉,神明華胥的黃帝子孫啊!!!

笑話少來,言歸正傳。中國古代的書籍如虞書夏書等既係後人的追記,其間僞造粉飾,真跡甚少,不能據為信史,而地下掘發的工作又方在萌芽時代,不能供給我們以相當的材料,此時要來高談皇古,真是有些困難,啊,還不止此,幾乎不能開口。不過有兩點我們是可以推測得到的。

(1)有熊氏的祖先的生存期間總有若干萬年,太平御覽所引“天地混沌如鷄子,盤古生其中,萬八千歲”的話,雖屬荒唐,然至少可以表見這些祖先幾萬年的生活的影子。這個時期自然是屬於蒙昧的階段。

(2)自唐虞時代起,大概已經在野蠻中級的末葉,因為在婚姻上已經沒有表現真正的彭那魯亞羣婚,而證以男性

的舜的耕稼，和象所謂“牛羊，父母，倉廩，父母”，可見當時的牧畜種植業已經很發達了。小亞細亞和波斯的居民在七千年前即知道鍊銅，歐洲人四千五百年至五千年前也能製造銅器，被摩爾根稱為文明發達甚早的中國人（參看古代社會原文三七二頁）在距今僅四千二百年光景的唐虞時代應有銅器這個假定，總不算過于冒昧。不過此事只是虛懸一格，還有待于將來新材料的證明。

（註）據德國經濟學者西摩勒耳（Gustav Schmoller）說，鐵的製造

係于紀元前二千三百年由蒙古條耳諸族（Mongolisch-turanische Stämme）傳入中國；這是可以徵實的（見西氏國民經濟學綱要第一卷二〇五頁——Grundriss der allgemeinen Volkswirtschaftslehre）。紀元前二千三百年正當唐堯帝的時候，就在開始學習製鐵，似乎是辦不到，不過製銅器或有可能。

由以上的理論與事實總合起來看，唐虞時代是在野蠻的階段，決不像郭君所描寫的一樣，是在蒙昧階段，叫做什麼“土石器時代”。關於他所描寫的商代和商代以後的情形，當留在討論他應用馬克思的經濟發展公式以後去說，現在試回顧他應用本店偽造的摩爾根前史人類發展階段的公式于唐虞前後的古代社會，獲得什麼結果，除掉“雜交”，“亞血族

婚姻”，和“土石器時代”這些大錯誤以外可以說，一點成績也沒有！謬誤的前提演不出正確的結論，這不是當然的道理麼？

郭君應用走了樣的摩爾根的公式既有如此不幸的結果，而他應用已被廢棄的馬克思的公式更弄得一塌糊塗，不成樣子。現在試先看看他所標舉的“中國社會的歷史的發展階段”(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三頁)表：

(時代)	(社會形態)	(組織成分)	(階級性)
(1) 西周以前	原始共產制	………氏族社會	
(2) 西周時代	奴 隸 制	{ 王侯百姓 (貴族) 庶民臣僕 (奴隸)	} 身分的階級
(3) 春秋以後	封 建 制	{ 官僚—人民 地主—農夫 師傅—徒弟	
(4) 最近百年	資 本 制	{ 帝國主義—弱小民族 } 最後形態的 — 資本家—無產者 } 階級對立	

這種時代劃分的根據不是中國社會發展的實在情形，而是一種先入的成見，即馬克思的公式。郭君對於這個公式經過德文中文並列的鄭重手續(這是全書的命脈所關，宜其特別鄭重)後，即解釋道：

“他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

社會，‘古典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封建的’是指歐洲中世的經濟上的行幫制，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近世資產階級的’那不用說就是現在的資本制度了。

“這樣的進化的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着的。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度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的入了封建時代。”（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七六頁）

郭君本是一個多方面的人才，既懂得醫術，又嫻于文學，近來復在社會科學上大做其領導羣衆的工作，像他這樣的多才多藝，孜孜不倦，我們除掉欽佩外，本來不應當吹毛求疵。不過我們爲愛護真理起見，爲愛護知識青年防其中毒起見，不得不開罪郭君，再說一些實話。首先要說的是關於他對封建的解釋。

打開天窗說亮話，郭君對於歐洲的經濟發展史完全沒有入過門，以致鬧出一種令人不能原諒的大錯，我們還可借用陳邦國君對他的一句評話：“實在不特是大錯，簡直是個大笑話！”爲什麼呢？因爲他把封建的生產方法看做“歐洲中

世的經濟上的行幫制，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這真荒天下之大唐!!!

第一，這裏明明在講經濟，爲什麼要插入“政治表現上的封建諸侯”一語？難道這種封建諸侯只能在政治上表現，不能在經濟上表現麼？

第二，所謂行幫制不獨不隸屬於封建領主，並且是直接反抗他們的，如何能夠與封建諸侯聯合在一起，而構成封建制度？郭君對於這一點，自然是莫明其妙，因此我要略加解釋。

關於封建的生產方法，本文的第三項已詳細說過，此處不用提及。我們應注意的是：此係一種封建的農奴與工奴的經濟。內中有一批奴隸的手工業者具有高等的技能，他們本來只服役於封建地主的賦役農院和農民的家，但後來在城市中找着商人與縉紳做僱主，取得貨幣，逐漸富裕，於是開始脫離農院的隸屬關係，轉入城市中謀得獨立的生活。這人數既多，勢力日大，便組成行會（即郭君所謂行幫），在政治上幫助縉紳（這種人是農業城市的自由農民轉變來的），反抗封建地主。當中古時代，自九世紀起至十一世紀止是封建地主的全盛時期，自十二世紀起至十五世紀止則爲縉紳

與手工業者反抗地主而逐漸獲得勝利的時期。縉紳閥在十二三世紀攫得城市的統治權，行會在十四五世紀得參加城市的政權。（詳情可參看萊姆斯的社會經濟發展史原文一二八至一五五頁，亞東圖書館譯本二二九至二七八頁）

試問郭君，像這樣由反抗封建地主而發展出來的行會或行幫制怎能算作封建的生產方法中一個部分？！郭君無論怎樣善辯，恐怕不能用肯定的語氣來答覆這個問題罷！

現在再來考究他怎樣錯解馬克思的學說一點。馬氏於一八五九年提出四種生產方法做經濟發展連續的階段，至一八七七年摩爾根的古代社會出版後，便改變自己的意見，一方拿摩氏的氏族社會做一個補充，一方又改變他從前對於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與古代的生產方法的見解，這是我們在第二項提及過的。茲為簡單明瞭起見，特圖解於左：

原始共產主義 的生產方法	$\left\{ \begin{array}{l} \text{亞細亞的生產方法} \\ \text{古代的生產方法} \end{array} \right\}$	$\left. \begin{array}{l} \text{封建的生} \\ \text{產方法} \end{array} \right\}$	資產階級的
			生產方法

郭君不獨對於馬氏意見的改變毫無所知，並且認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等於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於是把這個死公式套在中國的經濟發展上，不管適合與否，他總要使出全副本領，來牽強附會，矯揉造作，藉以表現“這樣的進化的”

階段在中國的歷史上也是很正確的存在着的”！他真是用心良苦，不過所表演的成績僅是一幕滑稽戲！即此一端已足暴露他對中國經濟發展的分期是不正確的，沒有價值的。但我們爲使他自己心服和讀者愈加明瞭起見，不能這樣籠統說一句了事，必須加以詳細的分析。還有一層。我們在此處指出他的分期不正確，同時就是指出別人和他具有類似見解的或不合於我們上面分期的各種說法的錯誤，故不能不多說幾句。

一，郭君認亞細亞的生產方法爲原始共產主義的生產方法，這是顯而易見的錯誤，用不着再說。不過他把整個的殷代看做氏族社會，便是一種絕大的錯誤。他的錯誤的來源還是馬克思那個已經廢棄的經濟分期表。他既認西周時是奴隸社會，即不得不抱着殷代係氏族社會的成見，於是依照這種成見去找材料，將勉強可用的加以補綴，將超過他的標準的輕輕放過，或加以“這些或許是後來的史家所粉飾，我們不敢十分置信”等評語，一概打倒，而他所心願的社會終於居然出現於自己的眼前了。我們的現在的任務就在指出他這種截長補短的矯揉造作的頑意兒，藉以表現我們主張的完全正確。

(甲)郭君說殷代(他稱為商代)是一個原始共產制的氏族社會，具有三大理由，即：

“(1)中國的古物只出到商代，是石器，骨器，銅器，青銅器，在商代的末年還明明是金石併用的時期。

(2)商代已有文字，……但那文字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而且寫法的不一定，一字有至四十五種寫法的，於字的構成上或倒書或橫書，或左或右，或正或反，或數字合書，或一字析書。而文的構成上亦或橫行或直行，橫行亦或左讀或右讀，簡直是五花八門。可以知道那時文字的產生還不甚久，文字還在形成的途中。……

(3)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為主要的生產，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即其證據。農業雖已發明，但所有的耕器還顯然是屨器或者石器，……所以農業在當時是很幼稚的。”(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八頁)

他這種說法如果靠得住，則殷代的氏族社會還在野蠻的中級，因為銅器與牧畜是這個階段中的特徵，已如前表所示，而在野蠻中級的阿茲忒克 (The Aztecs) 部族也有繪畫文字 (Picture-writing 參看古代社會原文一九二及二〇

二頁)，所以殷代“極端的象形圖畫”的文字，當然和這種繪畫文字沒有什麼區別。他雖談及農業，却斷定爲“很幼稚”，這至多只能和他的表中所說野蠻中段的“種植極盛”相當。殷代末年既僅達到野蠻的中級，則西周，東周，秦，漢，甚至於下至唐，宋，元，明，清，及民國都應爲野蠻的高級，因爲據摩爾根說，人類進化中“有一萬五千年應當劃歸〔野蠻的〕中期和晚期”，而自殷末至今還不過三千零六十六年啦。我們自然不是死公式的崇拜者，死死咬定野蠻高級要經過三五千年才能達到文明期，但至少總也要幾百年，因此極端相信摩氏學說的郭君既這樣描寫殷代，在最低限度上也應當把西周和東周劃作野蠻的高級。可是他又明明告訴我們，西周時代是奴隸制，春秋以後是封建制，然則野蠻高級到那裏去了呢？難道是在周初的幾年或幾十年間溜跑了麼？這個疑問他是無法解答的。

當然，我們也用不着他來解答，並且還要分條反駁他那三大“理由”。

(1) 中國出土的殷代古物只有石器，骨器，銅器，和青銅器，當然是事實，不過我們的學術團體對於殷代版圖所及之地從來沒有過大規模的掘發，以致出土的器物寥寥無幾，郭

君怎能根據這少數器具，斷定殷代確實只有銅器而無鐵器呢？土裏面出來的器具沒有經過人們的粉飾和改竄，固然是硬憑據，但應用牠們作證據時，須十分謹慎，並須和古代的典籍互相參證，否則其不可靠的程度較經過粉飾和改竄的古代典籍還要高出千百倍。譬如胡適博士說：

“發見澠池石器時代文化的安特森 (I. A. Anderson) 近疑商代猶是石器時代的晚期(新石器時代)。我想他的假設頗近是。”(見顧頡剛編著的古史辨九九頁)這就是說，商代還在蒙昧時期。這種根據出土的器具的判斷，只有絲毫不懂中國古代典籍的安特森才作得出，也只有絲毫不懂古代社會一般的發展情形的胡博士才肯加以贊成！然郭君根據殷代已出土的少數銅器去決定當時的社會性，其見解和安特森的，只有程度上的差異，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之比罷了！

(2)中國的文字本來起於指事象形，殷代文字有“百分之八十以上是極端的象形圖畫”，這是當然的事，並且其中已有百分之二十或十幾不是極端的象形圖畫，可見正經過相當的發展期間。郭君怎能根據這種不完全的證據，斷定殷代是氏族社會，並且還在野蠻的中級呢？

(3)郭君說：

“得見甲骨文字以後，古代社會之真情實況，燦然如在目前。……我現在卽就諸家所已拓印之卜辭，以新興科學的觀點，來研究中國社會的古代。”（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二七頁）

這種說法在應用上如果加以限制，本來不算錯誤，不過他竟把卜辭當作一部完整的歷史，評判古代社會的狀況，完全以此爲標準，便大錯特錯了。他以爲“卜辭中用牲之數每每多至三百四百以上”，卽“商代的末年還是以牧畜爲主要的生產”的證據，這是何等武斷！用牲之數多至三四百以上，固足證明牧畜業的發達，然卜辭不是歷史，並且爲數有限，他又怎能因此反證殷代農業的“很幼稚”呢？難道在農業發展的階段中就沒有牧畜麼？難道卜辭或其他文獻所未嘗記載的東西就可以斷定當時一定沒有麼？例如犬是人類最先養的動物，稍具古代社會知識的人都會承認，然他在一部卜筮之書的易經中歷舉馬牛羊豕的句子作爲牧畜的證據，於是說道：

“但奇異的是尋不出犬字。”（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六至三七頁）

郭君爲什麼不按照對卜辭的辦法，斷定當時確實沒有犬，而反表示驚異呢？我們由此應當注意一條原則，就是：凡文獻或器物中已有的東西固不便隨意否認，但其中沒有的東西也就不好斷定其必無。

還有一層，商代中宗時即有田野農業的事，郭君並不是不知道，他在書中明白宣佈：

“周書的無逸，從周公的口中說出要‘先知稼穡之艱難’以後，歷數殷王中宗（大戊），高宗（武丁），祖甲，都稱讚了他們一番，繼後又說：‘自時厥後，立王生則逸，生則逸，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這好像殷王的大戊，武丁，祖甲都已經很知稼穡之艱難的樣子。”（見同書一一四至一一五頁）




周公去商代不遠，凡此所言，當係事實，決不止於“好像”。可是郭君連這“好像”兩字都不願加在大戊等身上，於是接着一轉，說道：

“不過這所說的稼穡或者就是起初的芻牧罷，從殷虛時代的文物逆推上去，殷代農業的發達不應該有那麼早。”（見同書一一五頁）

請大家注意啊：郭君的極力否認殷代的田野農業，並不是由

於事實上的考察，而其唯一的和最大的理由是在“殷代農業的發達不應該有那麼早”，以致不合他的死公式!!! 其實這是因他自己對於摩爾根的學說，太不了解，在那死公式的野蠻高級中不知道加入“田野農業”一項，遂鬧出這種笑話。否則他爲完成他的殷代爲氏族社會末期的說法起見，也應當承認這種農業，以便和他所謂西周的奴隸社會相銜接呀！

郭君既抱有“殷代農業的發達不應該有那麼早”的成見，於是就按照這種標準去找材料，說：

“農業尙未發達，此外還有一重要的證據，便是當時的耕具還是石器。此事於實物之外（如器物圖錄中之三石磬卽是犁鋤），於文字上亦可得到證明。此字卽農字所從之辰，蓋辰乃耕器。……卜辭中辰字變體頗多，然其最通用者爲或，農字所從者亦均是此形。𠂔卽石字，卜辭磬字作，從此作，象形𠂔卽磬形也。（王氏有此說，見‘說文’一八葉）磬爲石器，故知辰亦必石器。殷代文字還在創造的途中，其象形文所象之物必爲當時所實有。辰既像石器之形，則當時耕具猶用石刀，殊可斷論。”（見同書二四八頁）

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阿茲忒克部族在野蠻的中級卽

有繪畫文字，像上列簡單的象形文字在野蠻的中級即行出現，這是可能的。郭君因“殷代文字還在創造的途中”，遂認農字一定是創於當時，而不是創於前代，這是很武斷的，因為他既承認殷代的文字有百分之十幾或二十不是“極端的象形圖畫”，可見文字的發生已有當相的時日，必不始於殷代，至殷代猶在創造中，這只能視作繼續發展，不能誤為才開始創造。況且殷代已有青銅器出土，當時的人對於其他器具知道用銅製，獨於農具猶用石刀，無論如何，他們不會笨到這個樣子。至於三石磬的實物不知是否確為殷代物，即令如此，也不見得不是沿用前代的遺物，或已經廢棄不用的。總之，郭君的立論，始終是陷入形式邏輯的泥坑中，不能從全體去觀察，更不知道融會貫通，僅抓着一些似是而非的零星現象，加以穿鑿附會，以便形成他的曲說，此處斷定已有銅器（其實還應有鐵器，不過沒有證實）的殷人猶在應用石刀做農具，正是一個顯例。

郭君因抱了“殷代農業的發達不應該有那麼早”的成見，遂斷定當時的農夫是用石刀做耕器，這雖是一種無稽之談，到底殷代還有農業。他有時因這種成見的作用，竟致發生幻覺，把商殷兩代的農業一起看作牧畜。例如他於敘述契

至湯八遷，湯至盤庚五遷的事實後，便毫不遲疑地作出結論道：

“這個現象在前人是忽略了。但這正是遊牧民族所必有的現象。由這些史料來觀察，大抵商民族在盤庚以前都還是遷移無定的遊牧民族，到盤庚時才漸漸有定住的傾向。”（見同書二三〇頁）

郭君這種結論也同樣是武斷的。在一方面，遊牧人逐水草而居，固然時常有遷徙的必要，但在另一方面，農業人口因為外侮，水災和其他天災人禍也未嘗沒有遷徙的可能，盤庚遷般是由於舊都受水災，太王遷岐，是由於舊都受狄人的侵略，就是一些最顯明的例子。既是這樣，郭君怎能斷定商代的八遷和五遷一定是爲着牧畜而遷徙呢？郭君試仔細想一下，恐怕也無法自圓其說罷！

商代至盤庚時既“才漸漸有定住的傾向”，農業自然是不應當發達的，所以郭君對於盤庚篇“若農服田力穡，乃亦有秋”，“惰農自安，……越其罔有黍稷”等語，一概用一種外交手段來加以對付，說：

“這都是用來做譬語，表現着當時的農業好像已經有很高度的發達一樣，這些文字是不敢過於信認的。

大抵盤庚裏面只多少有一些史影，大部分是後世史家或孔門所潤色出來的東西。”（見同書二三一頁）

像盤庚篇這樣可信的文字，他因格於自己的死公式，還要說長說短，我們有什麼法子來引經據典折服他呢？這真是困難，……啊，有了！他是最相信“鋤頭考古學”的，是最相信甲骨文的，是最相信他自己的說法的，因此我們就拿他親口說出的和“鋤頭考古學”所掘發的甲骨文來做證據罷：

“卜辭中的農業如上舉已有以牧畜為對象的芻秣的種植之外，以人為對象的禾黍的種植也已經發現了。

“從種植一方面來說，於文字上有圃，有果，有樹，有桑，有栗。和種種相關連的工藝品則有絲，有帛，大約養蠶的方法在當時是已經發明了的。

“從耕稼一方面來說，則有田，有疇，有禾，有蕎，有黍，有粟，有米，有麥。和耕稼相關連的工藝品則有酒有鬯。……

“禾黍的種植在當時已很視為重要，有不少的‘卜受黍年’的紀錄，如

‘庚申卜貞我受黍年，三月’。……

‘乙未卜貞黍在龍圍，春受有年，二月’。……

‘己酉卜黍年有正’。……

‘戊戌貞我黍年’。……

“其卜風雨時也有特別書明是爲禾穡而卜的，但是爲數極少。

‘庚午卜貞禾之及雨，三月’。……

‘貞今其雨不佳穡’。……

“……殷室的帝王也有‘觀黍’的紀錄。‘相田’的紀錄。

‘觀黍’。……

‘丙辰卜永貞乎(呼)相田’。……”（見同書二四六至二四七頁）

在殘缺不全和爲數不多的龜甲文字中竟找出如許關於農業的證據，竟有爲禾穡而卜和帝王觀黍的明文，由此可證明殷代的田野農業是十分發達了。但郭君因爲自己所關的死公式上沒有此項農業，雖很忠實地列舉出來，總要設法減淡牠的顏色，于是對於帝王觀黍相田等事，就解作“大抵當時的禾稼還發明未久，故頗爲支配者所尊重”（見同書二四七頁），或“像這樣很簡單的紀錄，本來尋不出多麼重要的意義，但當時的農業生產和支配者還很親近，還是明白地可以

看出的”。(見同書二四八頁)

總觀郭君認殷代為氏族社會的三大理由，實不成其為理由，尤其是關於第三項，他舉出大批的證據，證實殷代的田野農業很有可觀，當然達到了亞細亞的生產方法，因此自己招致一個大失敗。

話雖這樣說，郭君也不是弱者，他既出了一種主張，便也有一副找旁證的本領，所以他說殷代是氏族社會，證據還多着呢。試看他說：

“(1)商代的王位是‘兄終弟及’，這是從來的歷史上已經有明文的。

“(2)據殷虛書契的研究，商人尊崇先妣，常常專為先妣特祭(自周以後，妣不特祭，須附于祖)。

“(3)殷虛書契據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

“從這些事實上看來，商代不明明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而且那時候的家庭不明明還是一種‘彭那魯亞家庭’嗎？”(見同書九頁)

(1) 郭君對於歷史是從來不大相信的，在這裏竟相信“從來的歷史”，拿來作證據，算是破例。然拿“兄終弟及”四

個大字來包括商殷所有的帝王相傳，直等於當面撒謊。就郭君書中所列的商殷帝王表（見同書二七三至二七四頁）計算，

殷本紀有三十一帝，內子十八，弟十三，

三代世表有三十一帝，內子十七，弟十四，

古今人表有三十一帝，內子十七，弟十四，

卜辭王氏考有十八帝，內子十四，弟四。

由此可見父傳子的數目較“兄終弟及”的為多，而三十一帝十七八世中直接傳子的也有十四世，當然不能以“兄終弟及”四字去總括商殷兩代的帝王。況且自湯開基即是子承父業（湯為主癸子），不是由兄傳弟，尤足為商的初時已經不是“母系中心的社會”的鐵證，因為在這種社會中，子不能留在本氏族內，無論如何，父的位置不能傳子，商自湯始即繼父業，復傳之於子，足證當時正是以男性為本位的社會，正為野蠻的高級。至於以後偶然傳弟，當係無子可傳，或雖有子因故不能傳，故沿着母系制時“兄終弟及”的習慣暫傳給弟。郭君後來對於此等事實也有所察覺，於是支吾其詞地說：

“殷代之兄終弟及制為歷來史家所承認，而於卜辭亦得到了實物上之證明。三十一帝十七世而直接傳子者僅十一二三〔按此數不正確〕，兄弟相及者在過半數

以上。前人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案此實即氏族社會所必有的現象。所謂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實的父子，諸父固可稱父，妻父亦可稱父，妻母之夫均可稱父。書無逸周公稱述殷之帝王曰‘其在高宗時舊勞於外，爰暨小人’，曰‘其在祖甲不義爲王，舊爲小人’，古時的小人就是庶民，如今人所謂‘小百姓’，與貴族的‘君子’是成對待的；則可知高宗（武丁）祖甲……都是外族入贅。其它的帝王也就可以類推。”（見同書二七四至二七五頁）

郭君挪扯的手段真是不弱，他這一段話說得天花亂墜，幾乎可令人信以爲真。但仔細考究一下，終久是魚目混珠。他以爲“所謂父子亦不必便是真實的父子”，諸父，妻父，和妻母之夫均可稱父。誠然誠然。但我們要反問郭君，有什麼證據可以斷定商殷兩代繼承父業的十四個兒子不是真正的子而是諸父，妻父或妻母之夫的子？他唯一的證據就是高宗，祖甲原爲庶民，後爲帝王的“外族入贅”一件事，好，讓我們來研究研究罷。

摩爾根說：

“當野蠻的晚期，一種新的元素——即貴族——有一種顯著的發展。個人的獨立化和私人大量財富的增

加，此時正構成個人勢力的基礎。一部分人民因不斷地被剝削，陷入奴隸狀況中，而這種狀況的傾向是在造成一種爲前此各人種時期所不知道的對照的情形。”（見古代社會原文五六〇頁）

在野蠻的高級中的確有貴族，庶民和奴隸，郭君指帝王爲貴族，一般人爲庶民，也的確有些相像。不過我們要注意，在這個階段中，家系已經是以男性爲本位（印第安部族在野蠻的中級即開始由女性本位轉變爲男性本位的家系），所謂‘母系中心的社會’已經消滅了，“皮之不存，毛將焉附”，這樣的社會已經不存在，“外族入贅”的事件又怎能實現啊？所以郭君上面一段話中實含有一個絕大的矛盾，就是：他如果要殷代解作母系制的社會，即不容有貴族與庶民的存在，如果要說殷代爲有貴族與庶民的存在，即不容有母系制的保留。“二者不可得兼”，不知道他怎樣來取捨？

可是郭君畢竟是個聰明絕頂的人，他的下意識中似乎也感覺到自己的說法有些勉強，於是接着說道：

“以上四項(1)亞血族羣婚，(2)先妣特祭，(3)帝王稱‘毓’，(4)兄終弟及，均係以母姓爲中心的氏族社會之現象或其子遺。”（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七五頁）

“或其子遺”這四個字就是一張後門，郭君對於殷代為母系制的信仰搖動了，他打算要從這張後門逃遁了。看啊，他真正逃了。他逃的證據在解釋“帝王稱‘毓’”一條內：

“毓卽后字。甲骨文酷肖產子之形，子爲倒子形，在母下或人下而有水液之點滴；卽毓字亦猶可見其遺痕。……余謂字乃母權時代之子遺，母權時代宗長爲王母，故以母之最高屬德之生育以尊稱之。字在古當卽讀后，父權逐漸成立，則此字逐漸廢棄，故假借爲先後之後。其讀育而固定爲毓，則當係後來之音變。然卜辭於今王稱爲王，僅於先王稱爲‘毓’，則女酋長之事似已退下了中國政治之舞台，而相距則當亦不甚遠。”（見同書二七〇至二七一頁）

殷代既是“父權逐漸成立”，卜辭既是“於今王稱王，僅於先王稱爲‘毓’”，則郭君對於不認殷代爲“母系中心的社會”一點，已經是不打自招，他還要在其他三項中搖唇鼓舌，嘵嘵不已，真是自討沒趣！

（2）第一項的理由既不過爾爾，第二項的理由更不充足。“商人尊崇先妣，常常專爲先妣特祭”，這只能視爲母權制的一種殘影，決不能作爲商代“還是母系中心的社會”的

證據。因為像這樣薄弱無比的事實如果可作母系中心社會的證據，則唐安祿山所謂“胡人先母而後父”，更可以作為當時的胡人還是母系中心社會的證據了。這話說得過去麼？

(3)至於“余所見在殷代末年都有多父多母的現象”一語尤不好拿作“彭那魯亞家庭”的證據，因為這種家庭是在蒙昧的中級和上級，商代如果還在這個階段，那我們此時正是野蠻低級的人，當然沒有文字，郭君固作不出“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我也更無從反駁。當然，例外是有的，如我們前面所舉，“布立吞人在野蠻的中級仍是彭那魯亞家庭”。但中國古代的情形不獨不會處處湊巧，碰到例外，並且在實際上全不是那麼一回事。待我來細說罷。

我們因對抗郭君，在前面所提出的圖表明明指出彭那魯亞家庭是在女性本位的時代，即郭君那個錯誤的圖表在這一點上也正相同，上面的一二兩項既已證明商代不是“母系中心的社會”，所謂彭那魯亞家庭便無從出現了。

殷代雖沒有什麼彭那魯亞家庭，然卜辭中確有多父多母的徵跡，這又何以自解呢？這是很容易的。殷代所謂多父並不是彭那魯亞羣婚中的多父，而是“諸父”，關於這一點，郭君自己是承認的，所以他於徵引“父甲一牡，父庚一牡，父

辛一牡”的龜片後，即解釋道：

“此父甲父庚父辛一片，羅王二氏以爲即陽甲，盤庚，小辛，辭當爲武丁所卜，因三人均爲武丁諸父，故均稱父。”（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六九頁）

不過同一“諸父”，郭君和我的解釋不同，他以爲這個“諸父”仍是彭那魯亞家庭中共妻的父，我以爲這是伯父叔父的通稱，僅係這種家庭遺留下來的一個殘影，而詩經上所謂“既有肥羜，以速諸父”，也正是一個旁證。但他說這是共妻的諸父，我說這是不共妻的諸父（即伯叔），那些做諸父的人既不能“返魂”來據實招供，專就本問題的本身着想，是得不到解決的，因此我們必須從多母方面打主意。茲先介紹郭君的一段話如下：

a. ‘祖乙之配曰妣己，……又曰妣庚。……

b. ‘祖丁之配曰妣己，……又曰妣癸。……

d. ‘武丁之配曰妣辛，……又曰妣癸，……又曰妣戊。……

“羅氏曰“諸帝皆一配，祖乙，祖丁，武丁三配者，猶少康之有二姚歟？抑先殂而後繼歟？不可知矣”。案實即多妻或多母之現象，即少康之有二姚亦多妻古制之一

例證。”(見同書二六八頁)

我們在反駁郭君的說法以前，對於 a. b. d. 三項須略加解釋。祖乙之配爲妣己，祖丁之配也是妣己，但前一妣己決不是後一妣己，她們是兩人而非一人，因爲祖丁是祖乙的孫，他決不會與祖父共妻。同樣，祖丁之另一配爲妣癸，而武丁之配也是妣癸，但前一妣癸決不是後一妣癸，她們是兩人而非一人，因爲武丁是祖丁的孫，他決不會與祖父共妻。這一點弄清楚了，我們就來談多母的問題。

郭君所謂“多妻或多母之現象”自然是指彭那魯亞家庭講的。這完全不是事實。因爲商殷兩代如果仍是這種家庭制度，則一切帝王應都是多妻，何以有“諸帝皆一配”，僅“祖乙，祖丁，武丁三配”的現象呢？郭君不從全體去考察，專拿一些單個的例子做證據，這是犯了以部分概全體的錯誤，他的說法是絕對不能成立的。

然多妻的事實在商殷兩代是存在的，我們怎樣來解釋牠呢？我以爲這不是彭那魯亞家庭的子遺而是家長制家庭(Patriarchal family)的子遺。摩爾根說：

“家長制家庭屬於野蠻的晚期，在文明開始後殘留一些時候。至少是一般家長度一種多妻的生活；不過這

不是家長制組織物質上的原則。一羣爲奴的和自由的人，爲着經營土地和從事牧畜的緣故，在父權之下組成家庭，便是這種家庭主要的特點。爲奴的人和被雇服役的人生活於婚姻的關係中，奉一個家長爲領袖，即構成家長制的家庭。對於家人和財產的支配權就是一種物質的事實。”（見古代社會原文四七四頁）

這種家庭的殘影一直到現在的中國仍是存在的，我們於圖解摩氏的學說時，所以未曾列入，是因爲他視此爲一個“例外的家庭階段”（見同書五〇六頁），非全體人類所必經，故特從略。現在就我們的問題來講。當祖乙和祖丁武丁之際，正是野蠻晚期告終和文明開端的時候，他們沿襲家長制家庭的習慣，實行多妻制，這沒有什麼奇怪的。我以爲這種解釋是最自然而又最切實情，不過羅振玉的“先殂而後繼”的說法也有相當的理由，因爲當時不是家長制的家庭，就是一夫一妻制的家庭。至於郭君所主張的彭那魯亞家庭，則完全不可通，除掉此項家庭實屬於蒙昧的中級與高級，不會出現於以男性爲本位的野蠻高級和文明開端的大道理外，單是“諸帝皆一配”五個字已足證其謬妄了。

統觀郭君因主張殷代是以牧畜爲主要生產的女性中心

(並且還是彭那魯亞羣婚)社會所舉的各種理由與證據，沒有一件不是虛偽的，錯誤的，因此也沒有一件不是空費氣力，徒勞無功的。他這一類虛偽的錯誤的理由與證據充滿了全書，幾令人駭不勝駭。我們爲節省篇幅起見，也不必對於一些小節多所指摘。現在只再舉一事終結殷代社會性的問題。他說：

“……氏族社會之民主的政治組織評議會，此在卜辭無可徵考，然於舊文獻中則猶有痕跡可尋，如盤庚篇中便包含有這項史實的殘影。

“(1) ‘盤庚遷於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咸出矢言。……王命衆悉至於庭。’——(盤庚上)

“(2) ‘盤庚作，惟涉河以民遷，乃話民之弗率。誕告用亶。其有衆咸造，勿喪在王庭。’——(盤庚中)

“(3) ‘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曰……今予其敷心腹腎腸，歷告爾百姓於朕志。’——(盤庚下)

“看這民衆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眾表示意見，這正是評議會的現象。”(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二七五至二七六頁)

這段話表見郭君作文時的心相氣浮，達到一種可驚的程度！他在起首說氏族社會的評議會在舊文獻中僅有“痕跡可尋”，而盤庚篇就是“這項史實的殘影”。但他於徵引盤庚篇的幾句話之後，忽然說“看這民衆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衆表示意見，這正是評議會的現象”。哈哈，剛才還說是評議會的“痕跡”或“殘影”，相隔不過七八行，即變成“評議會的現象”這不知道是郭君的疏忽，還是故意變戲法騙小孩子？（可惜讀這一類書的人不是小孩子。）

只懂形式邏輯的郭君遇事專看表面，不顧內容。

他奢談什麼氏族評議會，何嘗絲毫懂得牠的內容啊？摩爾根論及易洛魁氏族世襲酋長和普通酋長的罷免權，說：

“氏族的成員保有這種權利，其重要並不減於選舉權。酋長的職位在名義上雖是終身的，但因罷免權的結果，在實際上只有當行動善良的時期以內，才能繼續任職。……沒有價值的行爲，喪失大家的信任，就是罷免的充足理由。當一個世襲酋長或普通酋長經過氏族會議正當手續的罷免以後，即不復被認為酋長，而成爲一個平常的私人。部族會議不待氏族的行動，甚至於逆着氏族的意志，也有罷免世襲酋長和普通酋長的權力。因

爲這種權力的存在與不斷的行使，氏族便確定並保持牠對於世襲酋長和普通酋長的優越權。所以此舉表現氏族民主主義的組織”。（見古代社會原文七三頁）

在另一方面，摩氏論及易洛魁聯合的世襲酋長會議，復說：

“世襲酋長間的全場一致是決定一切公共問題所必需，是通過一切公共條例所必要。這是易洛魁聯合的根本法。他們確定議會各員的意見所採取的方法可以免去投票的必要。還有一層，他們在會議的行動中完全不知道多數與少數的原則。……他們如果同意，會議的決議即成立。他們如果意見參差，這種方法歸於失敗，會議即宣告閉幕。……”

“幾個部族藉助於這種獲取同意的的方法，得確定並保持平等與獨立。如果某個世襲酋長剛愎自用，或橫蠻無理，即以豐富的熱情去感動他，使之無從抗拒；所以他們遵守這種規則，很少發生不便或損害之處。如果費盡一切氣力，終不能獲得全场一致，則全部事業便擱置一邊，因爲其他行動是可不可能的。”（見古代社會一四二至一四四頁）

就摩氏上面的描寫看來，一個酋長如果違反氏族各員

的意志，獨斷獨行，即會為氏族會議或部族會議所罷免，而部族會議中如果有一酋長不同意於某種議案，此案即無法進行，應當擱置一邊。這是易洛魁氏族社會民主主義精神的表現。其牠氏族社會因發達的高下不同，處境的情形各異，一切措施雖未必完全如此，但民主主義的原則與氏族社會共生死，如果缺乏這一點，即不成其為氏族社會，所以在大體上總是相差不遠的。我們現在試回頭來看一看盤庚篇的內容是不是和這種條件相符。

(1)“其發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長之命。……無有遠邇，用罪伐厥死。”——(盤庚上)

(2)“乃有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我乃劓殄滅之，無遺育，無俾易種於茲新邑。”——(盤庚中)

(3)“嗚呼，邦伯師長百執事之人，尙皆隱哉！……

今我既羞告爾于朕志若否，罔有弗欽！”——(盤庚下)

我們統觀盤庚三篇的語氣，完全是亞細亞生產方法中一個專制君主對臣民的口吻，沒有絲毫民主主義的氣味在裏面，尤其是上列的各句表現得最為清楚。盤庚上篇是告羣臣，明言他——盤庚——對於他們操有生殺之權，如鼓動民衆，不肯遷徙，即以殺戮為懲罰。中篇是告庶民，威風更大，

對於他所視為“不吉不迪，顛越不恭，暫遇姦宄”的，小則要割去鼻子，大則要加以屠殺，一個也不留，免得新都中再看見這些種子！下篇是告百官族姓，他于百般恫嚇，甚至於實行殺戮不聽命的羣臣，實行割去不聽命的庶民的鼻子或加以屠殺之後，才改用一種和緩的政策（按上中兩篇作於未遷之前，下篇作於既遷之後），要其餘心中懷有隱痛，不敢表露出來的百官族姓務必隱忍，並且要敬信他的話。像這種專制君主的言行不獨萬非氏族社會的酋長所能夢及，即氏族社會崩潰後希臘羅馬所組織的半貴族和半民主主義的政府也不敢出此。這種言行是東方專制君主的特色，也是氏族公有的土地能轉變為國有土地的一個原因。郭君不獨對於氏族社會消滅後東西兩方國家制度的同異一無所知，即對於氏族社會的內容，甚至於盤庚篇的內容也弄不清楚，亂指“民衆聚集王庭”（其實只有中篇的對象是民衆，上下篇並不是什麼民衆，原文俱在，一按便知），受專制君主割鼻子，殺戮和屠殺的重刑的宣告，為氏族開“評議會的現象”。哎喲，郭君的腦子這樣糊塗昏亂，居然著書立說，天下滑稽的事甯有過於此麼？！

郭君對於殷代國家的形成和亞細亞生產方法的出現既

完全沒有領會着(就他的描寫看，殷代僅達到野蠻的中級)，對於周朝祖先時代的狀況，自然也是事同一律。他最弄不明白的是農業的起源，以致對於周代祖先后稷務農的了解完全不正確。我們現在且先聽一聽他的農業起源論：

“牧畜和農業的發明都是男子的事體。男子由漁獵中發明出牧畜的事業，由牧畜的芻秣中又發現出禾黍菽麥的種植，這是必然的經過。照原始的習慣，各人隨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漁獵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到牧畜種植一發明以後，男子也相沿地領有着六畜和五穀。這樣生產的力量愈見增加，女子的家庭生產便不能不降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為奴隸的地位，這在社會的表現上便是男權的抬頭，私有財產制的成立，奴隸的使用，階級的劃分，帝王和國家的出現。這兒是文明的開始，然而也就是人類榨取人類的悲劇的開始。”(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五頁)

郭君對於古代社會沒有絲毫的研究，而又好強作解人，他的頭腦昏亂，缺乏思考的能力，而又好亂發議論——這段話表現得最為明白，今試先簡單分析數點於下：

(1)“由牧畜的芻秣中又發現出禾黍菽麥的種植，這是

必然的經過。”可惜這只是他的腦袋中幻想的經過，而不是事實的經過。

(2)“照原始的習慣，各人隨身的工具便是各人的私有，男子有漁獵用的弓矢，女子便有家庭。”家庭是“隨身的工具”，為女子所私有，而她們除掉這種工具——家庭——外，並沒有別的工具，倒也別緻！

(3)“到牧畜種植一發明以後，男子也相沿地領有着六畜和五穀。……女子的家庭生產便不能不降為附庸，而女子也就由中心的地位一降而為奴隸的地位。”“家庭生產”是什麼，未蒙明示，真是遺憾。烹調總不能算是家庭生產罷？那麼就只有紡織是主要的家庭生產。可是紡織與動物的飼養，植物的栽培，大概同出現於野蠻的低級（參看前列的圖表），至早也只在蒙昧的高級，既是這樣，婦女在蒙昧階段的大部分時期中沒有家庭生產，靠誰養活呢？而且男子一發明牧畜種植，增加生產力量，就使她們的家庭生產降為附庸，使她們“中心的地位”降為“奴隸的地位”，這“中心地位”是幾時取得的呢？難道是在沒有家庭生產以前的蒙昧期取得的麼？她們不事生產，能取得中心地位，這也奇怪！據郭君自己的圖表說，牧畜種植的發明是在野蠻的上段（即低級），而他所謂

女性中心又包括野蠻的上段，中段，以至下段（參看他的圖表），和此處的說法不是一個小小的矛盾麼？

我們現在不能詳細駁斥他這段紛亂的文字，特再就農業的起源來講一下。萊姆斯說：

“婦女是果實與植物的採取者，她們勞動的結果，發現種子的生殖，她們特將種子散播在地面上，以便由自己種植營養料。她們用尖頭的木棍將地面挖鬆，將成熟的種子散布其間，這就是農業的起點。著名的印第安人民狀況的研究家卡爾斯台（Karl von Steinen）教授在他著的中部巴西的自然人（Unter den Naturvölkern Zentralbrasiliens）一書二〇六頁中說：‘男子從事於打獵，同時婦女則發明田園的農業。’”（見萊氏社會經濟發展史原文三九頁，亞東圖書館譯本六一頁）

婦女由採取果實而達到農業，以及男子由打獵而達到牧畜，這是每個研究古代社會的人所知道和承認的，並不是一二個人的私說，我們對於這一點用不着多講，現在要問的，是婦女發明農業之後，情形怎樣？請再看一看萊氏一段簡單明瞭的話罷：

“大家必須想到，男子到處因自然的狀況，使自己

的打獵不復成爲營養料最重要的泉源，此事或起於一處地方動物的減少，或起於被強暴的霍德驅至動物更少的地帶，或起於與文化較高的人羣接觸而受其影響。在此事發生之處，婦女的勞動——即田園的耕種——便開始奪取打獵的地位，成爲此等人中營養料的主要泉源。婦女是這種最重要的營養料源泉的主人。她們所造成的勞動方法——從此時起，社會的福利與疾苦即繫於這種方法上——可以使狹小的面積養活更多的人口。此時從散漫的舊霍德的狀況中發展一種有組織的堅固的社會形態，在此形態中，婦女是居領導地位的。這種改變的經濟關係的社會結果是母系時代的出現，子女依母親而命名，而母權亦復伸張，在這個時代中，婦女是兩性和氏族的領袖，她們是裁判官和牧師，當時被創造而受祈禱的神，也未嘗想像其爲男性，總是女性。”（見社會經濟發展史原文三九至四〇頁，亞東譯本六二頁）

所以婦女在發明並經營農業的時候，權力最爲伸張，要到農業中應用牛駕犁耕地，使生產力增加，並驅策俘虜從事耕種，使務農變成奴隸勞動的時候，她們才連帶被奴視，於

是母權消滅，而男子抬頭起來了（自然還有其他原因，參看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原文四〇至四二頁）。這就是昂格思所謂“女性世界史上的失敗”。（見同書四二頁）

郭君對於婦女發明農業及經營農業的事，心中既沒有一點影子，又誤認田野農業是文明開端時的現象，所以他便有一個一貫的錯誤：即（1）在他所謂“先史民族進化階段”表中不敢於野蠻的高級中列入田野農業，（2）對於商殷兩代的農業不敢承認，總說是以牧畜為主要的生產，（3）對於周代先人的經營農業，也同樣不敢承認，總要想法子開脫。他於徵引大雅生民篇的詩並加以解釋之後，即說道：

“這詩的全部把傳說的原始性是保存得很濃厚的，這不消說是不能作為信史。但在這兒可以看出周初的農業狀況，而且還可以看出一個原始社會的遠景。這兒所說的各種嘉稻，以及祭祀時的各種熱鬧，都是周初的狀況，與後舉的爾風爾雅相仿。”（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七頁）

這種無意識的說法，真有些令人噴飯！我們統觀郭君這部大著，可以發見一個通行的原則，就是：他所謂是非真偽完全不以客觀的事實為根據，僅以他的幻想和錯誤的圖表

爲根據，因此，凡合於他的標準的，就是是是和真的，凡不合於他的標準的，就是非的和僞的；甚至於同一東西，他因有時適用，有時不適用，所以在一處地方稱其可靠，在另一處地方，又稱其不可靠。例如他因盤庚篇所言的農業，不合於自己的幻想和錯誤的圖表，遂極力加以否認，不是說：

“這些或許是後來的史家所粉飾，我們不敢十分置信。”（見同書一一四頁）

就是說：

“這些文字是不敢過於信認的。”（見同書二三一頁）

但等到他要找氏族評議會的例子時候，便把這“後來的史家所粉飾”而“不敢過於信認的”盤庚篇當做唯一無二的和千真萬確的材料來使用，說：

“看這民衆都聚集在王庭，一族的元首向大衆表示意見，這正是評議會的現象。”（見同書二七六頁）

像他這樣出爾反爾沒有一貫主張的亂說，真值不得我們的反駁!!!

不過他這部書已經連印四版，銷去六七千部，不獨貽誤青年，並且作了某派牢不可破的理論的基礎，我們爲責任心

所驅策，又怎能不再接再厲地幹一下呢？現在再歸到后稷的問題上來。他在一方面既承認生民篇“把傳說的原始性……保存得很濃厚”，便應當有幾分可靠，但在另一方他馬上說“這……不能作為信史”，完全加以否認，惟一口咬定這是“周初的農業狀況”，甚至于連公劉篇和緜篇都是如此。有什麼證據呢？證據就在他的錯誤圖表的野蠻高級中沒有此項農業！證據就在他的昏亂的腦筋幻想周代“農業的發達不應該有那麼早”！而最後的和最大的證據就在此詩作於周初！凡作於某個時期的東西，就是某個時期的寫照，這是郭君的大理論之一，我們不可不替他表彰一下。他于說明盤庚召集民衆開“氏族評議會”之後，接着就說：

“這個現象剛好可用周禮的外朝之政來證明。

“‘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以致萬民而詢焉。一曰詢國危，二曰詢國遷，三曰詢立君。其位王南鄉，三公及州長百姓北面，羣臣西面，羣吏東面。小司寇擯以敍進而問焉。’——（周禮秋官）

* * * *

“周禮大約是纂成于周之中葉的文獻，在周之中葉猶有遺存之評議會制，在殷代當然存在。……”（見同書）

二七六頁)

凡後代對於前代的追記，因傳說或涉于模糊，以及其他關係，總不免雜有當時（指後代）的一些成分，這是我們所承認的。不過我們要指出這些成分，應有確切的證據，決不能像郭君一樣，完全抹殺追記的工作，簡單認定在周初所作的詩就是描寫“周初的農業狀況”，在周之中葉所纂成的文獻，就是描寫“周之中葉……遺存之評議會制”。這種說法完全是無聊的。然他對於這一點仍不能始終一貫。例如他說盤古，天，地，人三皇，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共工氏，神農氏等的傳說系統“顯然是周秦之際的學者們所擬議的”（見同書二六〇頁），却又不依照他上面那種大理由，主張這是描寫“周秦之際”的狀況！總之，他的一切說法完全是主觀的，沒有一點客觀性。他以爲后稷時代不應有農業，遂公然加以否認，殊不知在事實上不獨后稷時已有農業，即在后稷以前的禹，舜，柱，神農時也已有農業，即在這些人以前的女性中心社會也已有農業，否則農業便無從轉入這些男子的手中。郭君不懂農業起源的情形，僅一味強詞奪理地否認后稷時代的農業，真是作偽心勞了。

他否認了后稷時代的農業還不夠，又要對公劉篇來開

刀。他於徵引並解釋這篇詩後，接着說道：

“這詩就是這樣的六節，但這把原始時期的國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樣親切呢？這所託的雖然是公劉的傳說人物，但所說的却是周代初期的詩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見同書一二一頁）

凡屬郭君發議論的文字，幾乎無一段不奇怪，無一段不可笑，這裏又是一個例證。他說公劉篇“把原始時期的國家的形成，序述得是怎樣親切”，其實我們在這詩中看不出什麼國家的形態來，因為我們在前面已經說過，“其軍三單”與“徹田爲糧”都是野蠻高級中所應有的現象，這至多也只能指爲國家的萌芽，而不是什麼證據確鑿的“國家的形成”。他所以主張此說，自然不是分析詩句的結果，只因周初已由武王組織國家，這詩“是周代初期的詩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應有“國家的形成”的意識在裏面。至於他斷定這詩描寫“周初的農業狀況”的證據又不外他那錯誤的圖表，腦袋中的幻想，和此詩作於周初三項！

他對公劉篇開了刀還不夠，又要對縣篇行手術。據他說：

“這首也是一篇傳說詩，……那敘述一位穴居野處

僅僅只知道做土器的野蠻人古公，但他有些少的牧畜（在蒙昧的時期完畢，野蠻的時期開始，牧畜和陶埴是同時發明的），騎着馬兒逐水草而居的走到岐山之下來，來到這兒又做了姜女酋長的丈夫（我們請注意：周室原本姓姜，男子是從外族來的）。”（見同書一一七頁）

這位古公做了新郎之後又怎樣呢？郭君繼續告訴我們說：

“這首詩所給我們的啓示也和生民篇是一樣。牠告訴我們，周初離原始社會並不甚遠。在太王時都還是女酋長時代；到了太王，因農業的發達，才漸漸有國家政刑的發生，在短時期之內，周室吞併了四鄰，未幾便‘三分天下有其二’，又未幾公然‘實始剪商’了。”（見同書一一八頁）

我們在前面說過，郭君是“要在黃帝至殷末的一千一百七十五年中表演一個九萬五千年甚至十九萬五千年人類生活的全部過程”，其實我們的估計還不甚正確。看他這段話，竟要在古公一個人的身上實現這種過程！我們的眼福真是不淺，而我們的知識也便立時增長起來了！試看他說古公是“穴居野處”的，這和他的圖表蒙昧上段（即低級）所註明的

“巢居”應沒有什麼區別，自那個階段起一直至“國家政刑的發生”時止，這不明明包含摩爾根前史人類進化整個的時期麼？中國古代相傳“天皇氏兄弟十二人，立各一萬八千歲”，我們聽了甚覺驚異！但把他們和古公一比，不獨算不得什麼稀奇，並且還和小巫的見大巫一樣，因為古公能經歷這樣長的過程，大概至少應有十八萬歲！“人壽幾何”的感慨這位老者一定是不會有的！

我們現在不要再開頑笑，也不要拿他所說的“穴居野處”做標準，姑再退一步，從他的括符中所註明的蒙昧期與野蠻期的交界時算起，也足有三萬五千年以至七萬年光景。說句正經話，郭君要古公表演這樣長的過程，如何辦得到？他的解釋既不能令人滿意，還是讓我們來擔負這個責任罷。

古公是公劉的第六世孫，在豳經營農業，本來可以安居樂業，只因受不住狄人（這大概是一種牧畜人）的侵襲，才舉族遷至岐山。詩言他在豳時是“陶復陶穴”當係事實，不過不能像郭君一樣解作“穴居野處”，應從朱熹註，解作“土室”。原來“豳地近西戎而苦寒”，故有這種地中的土室，這不獨古公時是如此，一直到現在，河南等處猶有這種土室，在夏季則陰涼，在冬季則溫暖，所以當地的富人都樂居其中，這是

第一點。他騎着馬來到岐山，是遷徙中應有的現象，絕不能像郭君一樣，望文生義，指此爲牧畜業，爲“逐水草而居”，這是第二點。周國的家系至少是自后稷起，卽爲男性本位，古公娶了一個姜女做妻子，卽退一步，假定她是一個女酋長，也絕不能像郭君一樣，硬認“太王時都還是女酋長時代”，這是第三點，岐周地方既是女酋長制，文化程度當然比邠地爲低，古公一定是征服了岐周，而據有其土地，經營農業，絕不像郭君所說的一樣，自古公“安心地住在這兒，又才開始起農業的事情來。這是說，岐周已經有了農業，把他同化了的”，這是第四點。古公時已經渡過野蠻的高級，開始創造國家（也許還要早些，不過文獻上無可考），絕不像郭君所幻想的一樣，他是從野蠻低級或中級的牧畜業，經過野蠻高級的農業，而達到文明期，建設了國家，這是第五點。大家試將這五點綜合起來看，便會覺得我們的解釋是完全正確，而郭君的解釋是完全錯誤了。

還有一層，我們如將生民，公劉和緜篇三詩排列起來比較一下，也可看見牠們呈出一種自然發達的次序，絲毫沒有矛盾之處，卽：

(1) 生民篇講男子的后稷擔任農業勞動，使農業生產力

向上發展。

(2) 公劉 篤講 公劉 居鹵，經營農業，十分興盛，既是“其軍三單”，而又“徹田爲糧”，並且“取厲取鍛”。

(3) 縣篇講古公亶父雖受狄人侵逼，迫得舉族遷居岐周，然本其農業的經驗，在新都地方馬上即能夠“迺疆迺理，迺宣迺畝”，並且還有司空，司徒，臯門，應門，冢土等國家制度。

無論從那一方面看，我們找不出這三篇詩不是追敘事實，而只是表現“周代初期的詩人的感情，乃至一般人的感情”的證據。恰恰相反，這三首詩如果不過是周代初期農業狀況的現身說法，便完全自相矛盾，完全不可通，因為男性擔任農業勞動，發展農業生產力，從事熔鐵（此事應在野蠻的中級末和高級初），並創造國家制度等事，無論如何要有幾百年甚至於幾千年的經過期間，決不能在幾十年的短期中一齊出現。因此郭君此等主張的不能成立，是絕對沒有疑義的。

現在總括起來說，郭君對於商殷兩代和周國的祖先時代的描寫與批評，完全不正確，完全謬誤。照他的說法看，殷代終始只達到野蠻的中級，至多也不過達到高級的初步，周

代則於數十百年中(至多自太王起)急劇穿過野蠻的高級而達到文明期。倘若周初有一個文明國家與之並立,因受其影響,遂急轉直下,這原是可能的;不過當時既無此現象,即萬不能有那樣迅速的過程。還有一層,我們再往下看周代。武王克殷大封同姓和先王之後,這是周代封建制度的開端。但武王以前的周和殷如果沒有成立專制國家,就氏族社會公有的土地收歸國有,不獨封建(有些自然只是承認現成的勢力)無從着手,而且一剎那間由一個沒有國家的氏族社會變成一個體制大備的階級制國家,這種步驟,也未免過於突兀。所以我們基於種種理由,毅然宣佈:商代至少是從盤庚起,周代至少是從古公亶父起,已經成立了國家,實行亞細亞的生產方法,而自殷至殷末即為亞細亞生產方法的時代。此事既經弄清楚了,便告一段落,我們將進而考慮郭君對於西周的描寫與批評。

二,據郭君的估定,西周時代是奴隸制度的時代,他雖舉出不少似是而非的證據,然其主要的根源還是由於馬克思的一個公式,因此我們又要回轉去考察這個公式。

我們已經知道,氏族社會崩潰後,可以從亞細亞的生產方法達到封建制度,也可以從奴隸制度達倒封建制度。其實

各國經濟的發展並不是一定都要取這種途徑的。薩爾衛阿里說得對：

“經濟的發展不是直線的，並非一切民族都經過同樣的步驟，也不是同一的原因發生進步的衝擊。”（見古代資本主義德文本二七三頁）

這種見解是很正確的。例如德意志人就是由馬克經濟轉入奴農和奴工制（封建制度），既沒有經過亞細亞生產方法的階段，也沒有經過奴隸制度（參看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第八章和萊姆斯社會經濟發展史第二，三講的末尾和第四講）。所以考茨基雖明知馬克思對於經濟的發展有過四種生產方法的說法，却置若罔聞，自己特依照馬氏的意旨再擬定一種方式，為：

“社會的生產，單純的商品生產和資本主義的生產。”（見薩爾衛阿里 古代資本主義 考氏序言第十二頁）

考氏在同頁又加以說明道：

“這就是馬克思的經濟發展觀。他從沒有在何處這樣明白而總括地說過。不過將他對於這個問題的零星評判收集起來，並且運用此等評判所產生的方法於人

所共知的經濟史的事實上，便獲得剛才所述的思想途徑。”

大家要深切了解這些事實（不過我們對於考氏的公式並不贊成），才能活用馬克思的學說，否則必定滯礙不通。我們在第三項對於中國經濟的發展，所以採用馬氏的公式，是因為牠切合於中國的情形（同時我們又根據資本論的說法，補充一種前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特別是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我們於證據還不完全充分的時候。即毅然相信殷代曾經經過這樣的一個局面，並不是信教式地盲從馬克思，而是因為從氏族社會發展到土地國有，和農業與手工業的直接結合，是極自然的事，有了這一步，西周的封建制度才不嫌突如其來，而後世國有土地的遺跡也有一點線索可尋。不過將來如有新的史料發見，確切證明殷代沒有亞細亞的生產方法，我們會毫不遲疑馬上拋棄這種主張。馬克思常說“我不是馬克思主義者”，（“Ich bin kein Marxist.”）這種只認真理，不認教條的精神，是每個理論家和實行家所應當服膺的。

可是郭君的態度却不如此。他對於馬克思大有“孔趨亦趨，孔步亦步”之概，不管實際情形怎樣，總要用“削足適履”

的辦法，把牠套在馬氏的公式裏面。他看見馬氏於亞細亞生產方法之後有古代的生產方法的說法，於是把“亞細亞的”安在西周以前，把“古代的”安在西周時代，叫“我們不要爲文字所拘泥”，把“古時……號稱爲封建”的周室看做封建時代。他這種勸告對於我們是不生效力的，我們非先考查文字不可，君一看這個“古時……號稱爲封建”的周室到底有無封建制度的存在。

呂覽觀世篇稱“周之所封四百餘，服國八百餘”。史記十二諸侯年表稱“武王，成康所封數百，而同姓五十五國”。荀子儒效篇稱周公“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這種說法與事實雖未必絲毫不差，然決非完全向壁虛構，我們即“不……爲文字所拘泥”，拿牠打個對折，也可以窺見周初的封建制度是盛極一時。

現在即再退一步：拋開文字不講，專來考察西周的經濟情形，也可得出同樣的結論。因爲西周完全是一種自然經濟，工商業既不發達，真正的城市尚在萌芽時代，而“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封略之內，……人有十等，……以待百事”。這正是畫出一副封建制度的圖形，對於我們在上面所舉馬烏兩氏描寫的封建經濟，適相吻合。像這樣證據確鑿的制度無

論如何，是不能否認其爲封建經濟的。

郭君對於此等史實一概不管，僅舉一些沒有用的或恰爲封建制度特徵的反證去證明西周非封建制度。今試略舉數點如下：

(甲)他的最得意的反證恐怕要算證明“周金中無五等五服之制”，與盂和鐘及秦公敦的銘文“一則曰‘受天命’，再則曰‘受天命’，幾曾有一些兒受周室分封的氣息？”他由此所得的結論是：

“周初並不是封建時代，所有以前的典籍儼然有封建時代之規模者，乃出於晚周及其後的儒家的粉飾。”

(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〇九頁)

其實五等五服之制是一事，封建制度又是一事，封建制度固然是一種等級制，但不限定是五等五服，即四等四服，甚至於三等三服，也未嘗不可以，所以郭君證明“王公侯伯實乃國君之通稱”，五等諸侯爲東周以後儒者的捏造，並沒有因此推翻封建制度，更不能作出“事實上有小部分的國家如魯晉衛滕等是周人的殖民部落”的結論。至於秦公“一則曰”，“再則曰”，“受天命”，而不肯在“天”字下面加個“子”字，也許真是沒有“一些兒受周室分封的氣息”，但却不能舉

一以概其餘。梁啓超說得對：

“武王克殷，廣封先王之後，不過承認舊部落而已。及‘周公弔二叔之不咸，乃衆建親賢，以屏藩周’（左傳二十四年）。其新封之國蓋數十，而同姓子弟什居七八。蓋一面承認舊有之部落，而以新封諸國參錯其間。實際上舊部落多爲新建國之‘附庸’，間接以隸於天子。其諸國與中央之關係，大略分爲甸，侯，衛，荒四種。甸爲王畿內之采邑，侯卽諸侯，衛蓋舊部落之爲附庸者，荒則封建所不及之邊地也。”（見梁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六九頁）秦本“夷狄之邦”，在理當列入“荒”一類，秦沒有受封，豈能作爲西周沒有封建制度的反證。郭君對於梁氏這種考證，不能加以反駁，專在五等五服和“受天命”上做工夫，未免過於枝節了。

（乙）郭君的另一種企圖是引經據典，去成就他的曲說。例如他說：

“‘僕墉土田’當是附墉垣於土田周圍，或周圍附有墉垣之土田，故能成爲熟語。此可窺見周代之殖民制度，後世之城垣當卽起源於此。”（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附錄一八頁）

“詩序言封言建，左氏亦云‘封齊於楚丘’，‘諸侯城楚丘而封衛’，可知春秋初年之所謂封建，猶不過築城垣建宮室之移民運動而已。春秋之初年猶如是，則周代之初年更可知。故余始終相信，西周時代之社會斷然非封建制度。”（見同書附錄一九頁）

郭君拿這些話來證明西周“斷然非封建制度”，真會爲有識者所齒冷！我們首先要問，他根據什麼理由，可以斷定“殖民制度”和“移民運動”一定是等於奴隸制度，而不會成爲牠種制度？！當紀元前七世紀，希臘人開始他們的殖民運動，他們在斯巴達和雅典所建立的國家固然是奴隸制的國家；但當十世紀時印加人的殖民運動所建的祕魯的印加國（Das Peruanische Inkareich）却又不是奴隸制的，而是一個氏族團體支配另一個氏族團體。此外，郭君的大著既預備做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對於昂氏此書不講熟爛胸中，至少也應當看過一遍罷。如果真正看過的話，就不應當忘記下面一件事：

“德意志的野蠻人將羅馬人從他們自己的國家中解放出來，取了他們的全部土地三分之二，彼此分配起來。”（見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原文一五五頁）


這不是殖民制度和移民運動麼？然德意志人因此形成的國家不是奴隸制的國家而是封建制的國家，郭君對於這種事實作何感想？還有一層，他說：“春秋初年之所謂封建，猶不過築城垣，建宮室之移民運動”，這不獨不能作為“斷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證，並且恰恰是在描寫封建制度的狀況。如果不相信，我可引一段話給他作個比較：

“城市在政治上起初總是在一個課取徭役的地主統治之下，因為城市原是在他的保護之下建設起來的。城市最初的居民首先是由這種地主及其職員，僕役，和隸屬的手工業者，農民成立的，次則為那些保持着身體自由的定居農民，以及寄居經商的異鄉人。但後列這兩種人的數目起初是非常之少的。最初的城市大半不過是君主和教監督的莊院，與平野地方這一類大莊院大致相同，只是前者有一道牆壁圍繞着；就經濟上講，牠們大都為農業城市。市民的主要職業在很長久的時期中仍是農業與牧畜；他們的田地和草原就在城牆以內。”（見萊姆斯社會經濟發展史原文一二八頁，亞東圖書館譯本二二九至二三〇頁）

郭君看了這一段話又作何感想？高明的讀者看見我對於這

件小事，嘮叨不已，恐怕有些厭煩，但這是沒有辦法的，因為和郭君爭論，不能不將這種初步的智識介紹出來。現在總說一句：郭君上面那些引經據典的說法不獨不能作西周非封建的制度反證，倒把這種制度證實了。

(丙)郭君最後的努力是要從字面上去推倒西周的真實不虛的封建制度。他說：

“還有我們要了解封建的古義。古人所謂封是指封疆，字本作丰(古文作乃樹木之象形)，說文訓爲草盛丰丰者，其實就是原始時代的境界林，周禮地官‘封人掌詔王之社壇，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壇，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疆者亦如之’。畿封用樹，猶是上古時代的遺意(此意于今猶存)。建就是建立社稷。墨子明鬼篇云‘昔者虞夏商周三代之聖王，其始建國營都日，必擇國之正壇置以爲宗廟，必擇林木之修茂者立以爲叢社(本作敢社，據孫貽讓校改)’。這便是建的事體。所謂社稷也就是詩經上的‘田祖’，其遺意猶存於今之土地堂或‘泰山石敢當’之類，其實即是生殖器的崇拜。……故古人的所謂‘封建’，和我們現在所用的‘封建’，字義上正大有逕庭。這種字面上的混淆，極初步的錯誤，我們

是應該警戒的。”（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三〇九至三一〇頁）

郭君這樣“境界林”，“立社稷”，“土地堂”，“泰山石敢當”，“生殖器的崇拜”來一大篇，用意只在說明西周雖號封建，不過這一套把戲，要到春秋以後，才轉變為另一種意義的封建，即“歐洲中世的經濟上的行幫制，政治上表現的封建諸侯”。講到理由是非常之多的，而最主要的和骨子裏的是：不使西周讓出一個空位，則馬克思所指示的奴隸制度沒有地方安插！既是這樣，我們實在沒有反駁的必要。現在簡單地說幾句：我們不管什麼“境界林”不境界林，也不管什麼“立社稷”不立社稷，換句話說，我們不管什麼封建的古義，只知道從歷史上和經濟的發展上已經確切證明西周有真實不虛的封建制度的存在，而皇朝文獻通考封建考所說的：

“列爵曰封，分土曰建。”

就是牠的而且的確的定義。

三，我們對於郭君所舉“西周……斷然非封建制度”的反證既經駁斥，現在當進而討論他所舉的西周係奴隸制的事實。統觀他的說法不是誤解，就是牽強附會，甚至於連最顯明的農奴制的事實也拿來充數，今特擇其中比較重要的

加以指摘。

(甲)郭君爲着要說明周代的奴隸制，便極力描寫周初的農業是怎樣發達，而他的結論是：

“周代有那樣發達的農業，所以牠終竟把殷室吞滅了，而且完成了一個新的社會。”(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五頁)

他所謂新的社會不用說就是奴隸社會。其實他這種描寫首先挖空了奴隸制度的基礎，因爲就現在已經考證的事實講，

“奴隸制度多是在牧畜對於純農業比較的占着優勢，且是於對外貿易占着有利的地位的那些區域發達的。”(見山川均的唯物史觀經濟史崑崙譯本一一〇頁)
周代既沒有對外貿易，而又是農業比牧畜佔優勢，牠不能像希臘羅馬那樣發生殘酷的奴隸制，而于本來沒有使農民完全奴隸化的亞細亞生產方法之後，達到一種較奴隸制爲溫和的農奴制，這是再自然也沒有的事。郭君既不知道各國經濟發展史，又沒有弄清殷代的生產狀況，只按照預定的公式去找材料，宜其一開始就跌倒了。

(乙)然上述一事還比較渺茫，我們即拋開牠不講，專來

考察他的證據。他說：

“周書的十八篇中……有八篇是專門對付殷人說的話，……我們看那周公罵殷人是‘蠢殷’，‘戎殷’，‘庶殷’，或者說‘殷之頑民’，而且把那些‘庶殷’，徵發來作洛邑，用種種嚴厲的話去恫嚇他們，那不完全是表示着把被征服了的民族當成奴隸使用嗎？”（見中國古代社研究一五至一六頁）

這段話之後，接着又來一段後來補充的案語，我們因其可以代替他所謂“周金中的奴隸制度”的例子，故一併介紹如下：

“左氏定四年傳言‘分魯公以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長勺氏，尾勺氏。與康叔以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此明言以殷人為奴。此外，錫臣僕人民之事于古金中甚多，詳見第四篇。”（見同書一六頁）

這是郭君主張西周為奴隸制度的最重要的證據之一。然在事實上，“被征服了的民族當成奴隸使用”，“徵發來作洛邑”，以及“古金文中甚多”“錫臣僕人民之事”這兩點絕不能作為周代是奴隸制而非封建制的證據。其理由如下：

(1)所謂“當成奴隸使用”與“錫臣僕人民”，是否即為真正的奴隸，沒有徵實，無從臆斷，因為在現代資本主義的社會中，人民被“當成奴隸使用”的，所在都是，而封建社會更因臣僕人民附在土地上連同當作賞賜品，尤為當然的事。

(2)即退一步，承認他們都是真正的奴隸，也不能由此作出奴隸制度的結論，因為有奴隸制度固然要有奴隸的存在，但有奴隸的存在，不限定就形成奴隸制度。否則由史記商君鞅傳所謂

“僇力本業耕織致粟多者復其身；事未利及息而貧者舉以為奴孥。”

的話去推測秦國的社會也是奴隸制度，郭君為什麼又要說牠是封建制度呢？豈不是和此處的理論自相矛盾麼？

(3)封建制度中不獨有農奴，而且有工奴，有純粹的奴隸，郭君隨便買一本歐洲經濟史看一下，也可以知道。既是這樣，又怎能斷定這裏所謂奴隸（其實不盡是奴隸，大都為農奴）一定不是封建制度中的而是奴隸制度中的呢？

(丙)郭君主張西周為奴隸制度的另一種最重要的證據是七月，楚茨，甫田，大田諸詩。我們現在分別來研究。楚茨一篇雖詠農事，所講的是地主收得豐盈的農產物，忙于祭

祀，看不出什麼奴隸制或農奴制來。而七月和甫田兩篇則不然。內中有幾句話值得我們注意，就是：

“采荼薪樗，食我農人。”

‘倬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我農人。’

驟然看來，這種說法可作奴隸制度的證據。因為兩句“食我農人”表現奴隸為地主所豢養，不像農奴一樣營着半獨立的家庭生活。但仔細一看，却又不對。為什麼呢？所謂“歲取十千”，應當是田為農奴所耕種，地主于收穫時取得“十千”作為生產物地租 (Produktenrente, Rent in kind)；反之，田如果為奴隸所耕種，則一切的一切都為地主所有，用不着向誰去“取”（這個“取”字與所謂“吾欲二十而取一”的“取”字相同，是向農奴取，決不是從田中收穫），更用不着規定租額。至于“我取其陳，食我農人”，不外因當時係自然經濟，農產物不能作為商品售出，於是將陳腐的交給農人，去換取他們新鮮的農產物。“采荼薪樗，食我農人”，和上面“為公子裳”，“為公子裘”比較，只是優美的東西歸地主，惡劣的東西歸農奴的意思。尤其是“言私其豨，獻豨於公”兩語足為鐵證，因為只有農奴可以私有財物，奴隸是辦不到的。這種解釋絲毫不勉強。

然西周爲農奴制而非奴隸制，在大田篇所謂

“雨我公田，遂及我私。”

兩句話中表現得尤爲明白。不過我們在沒有說明理由時，先要聽一聽郭君的高論：

“這首詩的性質稍稍不同，這是一首小農生活的詩，他自己是‘曾孫’的農夫，但同時也有他的私田。所謂‘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我看並不是所謂‘其中爲公田，八家皆私百畝’的甚麼井田制。……當時的土地一切都是公田。農人只是食陳的奴隸；但當時未經開墾的土地，當然很多。那農人們利用自己的餘力去開墾了出來，當然就成爲自己的私地了。這兒是後來奴隸制破壞的一個伏機，我們是應該注意的。”（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三一頁）

我們如果細玩這段話，就可以看出郭君是費了多大的氣力才作出這種結論，然其中的紛亂也就要令人“歎爲觀止”了！我們首先要問所謂“小農”是一種什麼樣的農民？是自由農民，還是奴隸？如爲自由農民，何以是“‘曾孫’的農夫”，何以有“公田”，何以又爲“後來奴隸制破壞的一個伏機”？如爲奴隸，何以叫做“小農”，何以在對於自己身體都不

能自主的當兒，能有私田，何以又能於“土地一切是公田”的時候，而能開墾土地，作為“自己的私地”？我不相信郭君能明白答覆這些問題，因為他一開步走，就遇着矛盾。郭君與其這樣畫地自縛，動彈不得，不如把這種農民比作羅馬的大農業經營中一種有小屋和私地的特別奴隸，倒有些相像。可惜他不知道此事，平白失去一個比附的機會了。

可是我們把七月的“言私其縱，獻新於公”和大田的“兩我公田，遂及我私”對照一看，便知道這是一種普遍的現象，絕不能和羅馬的特別奴隸相較。所謂“公田”，就是君主或領主的田，即歐洲封建制度中的地主直屬的土地；所謂“私田”，就是分給農奴耕種，藉以收取農產物維持生活的田，即歐洲封建制度中的歸農奴使用的耕地。這兩者形成一種農莊制度，而並且是封建制度中一種初期的形態，因為此處所表現的是一種勞動地租（Arbeitsrente, Labor rent）。像這樣活畫出一副農奴制的圖形，郭君盲目不見，惟亂發“總之，當時的農民就是奴隸，已是可以斷言的”議論，真是錯得一塌糊塗！

（丁）郭君又說：

“這些奴隸在平時便做農；在有土木工事的時候便

供徭役，在征戰的時候，便不免要當兵或者是佚役了。”

(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三七至一三八頁)

他除掉徵引邶風的擊鼓和唐風的鴛羽作證據外，又提到周公東征的詩，並且總結道：

“總之平時的農人便是戰時的軍人，在這東山一詩裏也表現得異常明白。

“農人，工人，軍人，結果就是奴隸。像這樣的證據在詩經和書經裏面是舉不勝舉。所以我們可以斷定：奴隸制的社會組織是在周初才完成。”(見同書一四三頁)

郭君認農工兵就是奴隸制中的奴隸，在詩經和書經上有“舉不勝舉”的證據，其實他沒有舉出一個正確的證據給我們看。這也怪不得他，因為西周本來就是沒有這種制度，他怎能無中生有，找出真憑實據來呢？不過他因缺乏歷史的知識，在上面企圖證明軍人為奴隸時，又供給我們一個西周非奴隸制的反證。這是怎樣一回事呢？待我們說明出來。

奴隸的來源共有三種，一係犯罪人變為奴隸，二係負債的人變為奴隸，三則藉戰爭的力量使俘虜和被征服的人變為奴隸。後者是一個主要的來源，前兩者則當然有限，尤其是在周初不容易從前兩者取得多量的奴隸，於是不能不依

賴被征服的各族來供給。可是奴隸用來耕種或作土木工程都可以，却不能用去當兵打仗，因為他們一旦有兵器在手，馬上就會倒戈相向。所以像羅馬那樣奴隸制的國家，幾乎是事無大小（羅馬不僅在農工商業和私人的服役中使用奴隸，即公共事業如廟堂，法庭，甚至於警察都用奴隸擔任），都依賴奴隸去做，只有海陸軍就全靠國中的小地主和小農民（奴隸在海陸軍中做工人是有的，偶然充當兵士也是有的）作骨幹，無非是防備奴隸造反。同樣，周初如果真是奴隸制，周公豈能招募一些被征服的奴隸組成軍隊去東征，而且很勇敢地打仗三年，以致弄得斧破斨缺呢？單從這一點上看，我們也可以反證西周不是奴隸制。

現在總括起來說，郭君企圖證明西周為奴隸制所舉的種種證據，沒有一種是能夠成立的，不獨不能成立，並且時常舉出很顯明的封建制度的證據去作奴隸制的證據，直等於自己對自己開頑笑。此外，他又說，“由氏族社會轉移到奴隸制國家的這個關鍵，……用古代的話說來便是‘由帝而王’”，因此引出周紹濬君一篇對於“詩書時代的社會變革及其思想的反映”的質疑（見讀書雜誌四五期），說“王道（即周之統一）的基礎為農奴制；霸道的基礎為奴隸制”，他們兩人這

種奇異的說法正可以相映成趣了。

(註) 溧君的大文也和郭君的一樣從一個死公式——以農業為基礎的是封建制；以商業為基礎的是奴隸制——出發；而其立論的膚淺與幼稚且遠在郭君之上；故我們不願加以批評。

郭君除掉認西周時代為奴隸制外，還認春秋以後至最近百年為封建制，我們本應繼續加以反駁，不過他對於這個階段的說法僅有一段，遠不及朱其華君所說的詳盡，因此我們批評的對象便當由郭君而轉移到朱君了。但在我們結束之前，對於這部流行甚廣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要作一個總評。

此書本不是一種有系統的著作，係由幾篇論文雜湊而成，這一點作者在解題中也已經說過，沒有什麼奇怪。最奇怪的是此書內容的主旨恰和牠的形態相等，是由兩種東西雜湊而成：即經過偽造的摩爾根的“先史民族進化階段”表和已經廢棄的馬克思的經濟發展分期說。此書所根據的前提既經錯誤，則其結論必定錯誤，這是勢所必至的。我們在上面雖指出牠大批的錯誤，但那只是一部分，決非全體，因為我們的討論僅限於經濟方面，其牠都因溢出範圍而不能涉及。舉例來說，他以為：

“事實上春秋戰國時代的學者多是一些革命家——如老子，如管子，如楊子，如莊子，如韓非子，他們的思想多少都帶着革命性的，此外如墨子算是保守派，孔子算是折衷派。”（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七一頁）

他認代表貴族和封建地主階級的老子，楊子，莊子為革命家，代表農工階級的墨子為保守派，代表士和非封建地主階級的孔子為折衷派，真是錯得不成樣子，然我們却不能在此處予以糾正（不過拙著批評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正可暴露他這些錯誤）。又丹麥的古物學者所採用的“石器時代”，“銅器時代”和“鐵器時代”的術語，摩爾根雖認“知識的進步必須有別樣的更細密的分類”，然以為“在某些目的上是極有用的”（見古代社會原文第八頁），所以他在書中仍用作劃分時期的骨幹。不意此等術語一到郭君的手中就變了形態，他告訴我們的有什麼“土石器時代”（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〇頁。按石器時代可分為舊石器時代與新石器時代，但從沒有聽過“土石器時代”的名詞），又有什麼“金石併用時代”（見同書二五一頁），並且在這個時代下面註入“Eneolithic Age”字樣，查英中文並無這個名詞，Neolithic Age原來是“新石器時代”的意思，今在前面加個E字，即變成“金

石併用時代”，郭君真不愧為一個鍊金術士！當人類進到石器時代，則他們所用的土器，木器，竹器，骨器或革器當然包括在內，用不着列舉出來；當人類進到銅器時代，則他們所用的土器，木器，竹器，草器，骨器，石器，也當然包括在內，用不着列舉出來，否則將不勝其煩，不獨應稱為“土石器時代”，並且應稱為“土，革，木，竹，骨；……石器時代”，不獨應稱為“金石併用時代”，並且應稱為“土，革，木，竹，骨，石，……金，併用時代”。試問像這樣一一列舉，還成一個學術上的術語麼？總之，郭君雖用過一番苦工，收集了不少的材料，但他這部書是沒有絲毫科學價值的，誰要花錢購閱這個自命為昂格思家庭私產和國家的起源的“續篇”，誰就有中毒的危險，誰要倚賴牠作理論的根據，誰就是沒有腦子的糊塗蟲！

（本章完）

幾句後話

兩三年來，陸續看見許多關於中國社會史的作品，心中發生了不少的感想，可是從沒有意思要把牠發表出來，並且也不容易遇着這種機會。此次讀過讀書雜誌中國社會史論戰第一輯後，有些心癢難搔，躍躍欲試，特草此文，替一般老戰士湊湊趣。不過文中含有立的與

破的兩方面，非六七萬言所能完成，而雜誌因篇幅的關係，也不能盡量登載，故此告一段落。其餘關於批評朱其華，陳豹隱，陶希聖，孫倬章，任曙……諸君的大著的文字只好留待第三輯披露。又本文係倉卒草成，不免有疏漏錯誤之處，竭誠歡迎深刻的和從大處着眼的批評。

★ ★

怎樣幹中國革命問題批判出版預告

孫倬章先生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積十餘年之經驗及研究，去年夏間費數月時間著一書名‘怎樣幹’又名‘中國革命問題批判’。此書之優點在於脫離黨派拘束，立於客觀態度，完全根據唯物史觀之理論對於各黨派作同一公正的批判。引證異常豐富，批判異常正確，對於中國將來的革命策略更有正確的提案。凡欲研究中國革命問題者不可不讀此書。人人都知道過去革命的失敗，但不知道由於怎樣失敗；人人對於將來的革命都欲許，但不知道應該怎樣幹。倘欲正確地知道過去的失敗和將來怎樣幹，尤不可不讀此書。全書約念萬言準於五月十五以前出版。定價二元；預約壹元。預約期截止於出版以前。購者從速！預約券代售處：神州國光社，新生命書局，泰東書局，羣衆圖書公司，現代書局，未央書店。

社會科學研究社啓

★ ★

中國經濟的分析 及其前途之預測

劉鏡園

一 緒 言

一九三一年是中國浩劫的一年。空前的水災，普遍於十六省，流離失所者五六千萬人，因災而死者百餘萬人。中國的農業受此次水災的蕩洗，危機更深入，糧食原料更須仰賴於國外之供給。世界經濟恐慌，金貴銀賤，農產品跌價，已足

使中國畸形經濟的前途黯淡。專賴出口生存的絲業，大豆，或因滯銷而關廠，或因囤積而無法再生產。水災的影響，使全國人民賴以托命之農業受嚴重打擊，全國人民的失業與破產，如雪崩一樣的不可遏止。國內經濟危機之深刻化，已無可諱言了。

中國的政府對於這一普遍全國的危機，毫無救濟的辦法，而且自身方是促進這一危機之動力。寄生在國家上面的龐大軍隊，苛捐雜稅，十萬萬的國內公債都是促進危機的因素。一般的軍閥戰爭只是使人民相互屠戮，不算是恢復秩序與解決問題。農民的暴動是因為飢餓，缺乏土地，和在這種社會制度之下，無法生存。政府沒有減輕農民痛苦的方案，沒有解決土地問題的改良，只是靠殺戮來懾伏他們，社會的秩序（縱然牠是資產階級的），仍然不能安定。我們想像，即使江西的農民暴動，被鎮壓了，而農村的恐慌繼續着，農民們流為土匪，此伏彼起，中國的經濟恢復不是同從前一樣的遇着阻礙，發展的前途不仍是微乎其微嗎？

日本帝國主義乘中國的天災人禍，突然出兵佔領了東三省。由這種佔領所引起之戰爭與抵制，只是使中國的經濟狀況更加惡化。但問題還不在此，中國的政府在這次佔領

中所表現的鎮靜與忍耐，及軍隊的不抵抗，已令帝國主義者看出中國之積弱不堪。中國今日的國際地位一落千丈，甚於甲午戰爭之後。日本之佔領東三省，在中國近代史上是一劃時代的鉅變，中國此後將成爲帝國主義掠奪政策之積極的目標，列強爲了維持在華均勢，必以種種瓜分或共管的形式來處分中國，中國的現政府仍然是無抵抗地去承受一切。

中國一年以來受連續的打擊，政府的萎弱與因循，完全不能盡維持國民最低限度生存的責任。民國成立了二十年的今日，政府不能應付國外帝國主義的侵入，對於日軍進攻的抵禦，只有自動劃出一部份國土，將自己的軍隊撤退，請求帝國主義的軍隊屯駐的方法，美其名曰中立區域，這是堂堂中國出席國聯的代表施肇基在日軍進攻錦州時，對列強之提議。中國政府無力保衛自己的疆土，已喪失了獨立國家的資格，在這一提議中完全暴露。這樣，牠把中國幾萬萬的民衆引導到那裏去？

黨國的要人們爲了安慰國民，對於日帝國主義之侵略不要躁急，於是引勾踐十年生聚，十年教訓，和普法戰爭後，法國經過四十餘年，才能對德國復仇，收回亞爾薩斯羅倫的失地等先例，以“勉勵”國人。他們不知道現狀如果再這樣繼

續十年二十年，中國的整個民族在自己的領土之上沒有生存的可能。有人計算，中國失業人數，現有一萬六千餘萬，佔全國人口十分之四以上，農民的失業至少有一萬萬人。這還是在空前的水災以前的估計，現在失業的數目當更增加。第二次革命失敗以後，中國經濟的惡化，和人民失業之增加，比革命以前更厲害。民衆再不能任時勢之自然推移而不去干涉牠了。民衆必須自己去決定自己的命運。

民衆的窮苦與飢餓，今日可算是中國近代史上之登峯造極的時候。中國往那裏去的問題，他們再不能不回答了。“維持現狀”是許多偷惰的人所奉爲的金科玉律。可是現狀終於維持不住，各方面都用力去破壞這一現狀和均勢，民衆在這中間當然不是占在最後的地位。假使民衆不用自己的力量去回答這問題，便是別的力量犧牲他們來回答這一問題，更增加他們的痛苦。民衆對於這一問題之明瞭的回答，首先是理智的，科學的，其次是行動的，本篇亦是回答這一問題的嘗試。

二 中國資本主義之史的發展

我們在此不研究中國的社會結構與進化，也不去尋求

歐洲國家未與中國通商互市以前，中國資本主義不能發展的原因。我們只須說，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是由於外鑠，是資本主義的國家用長槍大砲打破了中國的閉關狀態以後移植進來的。關於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時期有種種的分劃：大約一八六二年至一八九四年為工業國營時期；一八九五年至一九〇三年為外人興業時期；一九〇三年以後則為國人興業時期。首先是清朝的開明的巨官顯督（李鴻章，曾國藩，左宗棠等），因為受了鴉片戰爭與英法聯軍之鉅創，而感覺軍器窳敗，以國家的力量發展軍用工業。請看以下的事實：

同治元年（一八六二）李鴻章設製礮局於上海。

一八六五年曾國藩設江南造船廠於上海。

一八六六年左宗棠設船政局於福州。

一八六七年李鴻章又在上海設江南製造局，同年，崇厚籌設機器局於天津。

繼軍用工業而起的是紡織業，最初亦為李鴻章，左宗棠，張之洞所創辦。光緒四年（一八七八）左宗棠在甘肅創設機器氈呢廠（一八八六年停閉）。光緒十六年，（一八九〇年）李鴻章奏設洋布局，於一八九三年被燬於火。同年，李鴻章所奏辦的機器紡織局成立。一八九一年，張之洞在漢陽創立

兵工廠與鐵廠，一八九三——九四年在武昌成立紗布絲麻四局，與二火柴廠。一八八二年至一八九四年，工業不僅為國家創辦，民間工廠亦漸興起。

一八九五年之馬關條約，許外人在華設廠，給中國產業之發展以新的推動。一八九五至九六年，上海共成立了七個紗廠，外商居其五。由光緒十九年至二十五年（一八九三——九九）合上海，武漢，無錫，甯波，杭州，蘇州，南通的華洋各廠為十五，紗錠為五十六萬五千。一八九六年英商在上海設立增裕麵粉公司，一九〇〇年俄國設立滿洲製粉公司於哈爾濱。英美煙公司成立於一九〇三年。

自外人在華設廠，和民營工業興起以來，國有的工業日就衰敗，政府以國有的工業成績不良，改歸人民經營，如漢陽鐵廠一八九八年由盛宣懷招商承辦；一八七一年成立之招商局亦於一八九八年改為商辦。江南造船廠於一九〇六年改為官督商辦。國有的工業，其資本比私人的工業為雄厚，但是因為官僚之腐敗，援引親戚與開支浩大，以致不得不過渡給私人經營。

在國人興業時期，大規模工業漸有建設，如一九〇六年盛宣懷創辦漢冶萍公司，一九〇七年南洋兄弟煙草公司

成立。中國的工業由官辦轉於私人經營之後，即受帝國主義之壓迫，仍是不能自由的進展，由軍用工業到紡織業，數十年來都是停滯在輕工業的階段，始終不能走向重工業。

歐戰期內是中國工業最發展之時期。當交戰國的工業作製造軍械之用，供給本國需要，無暇東顧之時（如棉貨價格因來貨減而日形昂貴），中國工業因無外來之競爭而逐步進展，新設工廠如雨後春筍。自一九一五年至一九二二年中國工業發展比較自由，顯然受了歐戰及抵制日貨的影響。自一九二三年以來各國商品又回到了東方，壓迫中國的工業，後者又衰殘下來了。茲將近年來較大工業狀況列表如下：

1, 中國紡織業之發展

年次	工廠數	錠子數	年次	工廠數	錠子數
1891 / 1911	32	831,106	1922	89	2,452,728
1916	41	1,145,136	1923	120	3,550,000
1918	49	1,473,926	1924	109	3,537,405
1919	54	1,650,000	1925	118	3,533,913
1920	63	1,650,641	1929	127	3,969,552

2, 中國各期麵粉工廠成立之分配

成立時期	廠數	成立時期	廠數
1896—1900	3	1916—1920	53
1901—1905	11	1921—1925	35
1906—1910	17	1926—1928	17
1911—1915	52	總數	193

3, 中國各省之電氣工廠, 在一九二四年爲二一九廠, 一九二七年爲二三一廠。

4, 最近各種工業狀況

年份	工業總類	廠數	資本
1928	棉織	120	297,400,000兩
1928	麵粉	193	60,000,000元(165廠)
1927	電氣	231	50,000,000元(102廠)
1928	火柴	189	9,500,000元(103廠)
1930	絲廠(上海)	107	2,500,000兩

5, 最近機器入口價額一覽(單位海關兩)

年份	農業機器	推進機器	織造機器	發電機器	他類	合計
1913	112,700	642,209	836,864		3,053,228	4,650,001
1919	521,022	1,589,405	3,744,011		8,246,001	14,100,439
1921	2,192,404	5,109,007	26,723,011		21,623,322	55,647,780

1923	301,716	1,474,349	12,316,485		12,585,245	26,677,796
1925	161,288	1,919,784	3,406,827	856,151	9,231,037	15,577,087
1926	511,540	1,901,407	4,057,796	831,606	9,435,181	16,737,530
1927	665,976	2,979,961	3,709,254	1,291,531	9,431,121	18,077,843
1928	743,364	2,565,988	4,105,157	1,315,912	10,741,745	19,471,896

我們就以上諸表觀察(尤其第五表),知道中國工業發展的過程,是很痛苦的。例如織造機器在一九二一年之進口為二千六百萬兩,在一九二三年為一千二百萬兩,以後數年均下落至不過三四百萬兩。一九二一年之機器進口總額為五千五百萬兩,自一九二五年以後均不能超過二百萬兩。以這樣廣大的國家,工業發展,如此停滯,我們能認為滿意嗎?

中國過去工業之發展,我們看見有二特點:(一)當後進國與先進國之工業競爭時,國家的作用最為重要如德國,日本,俄國,工業的發展都靠國家經營,津貼輔助,和採用保護稅則,尤其是重工業如鋼鐵,航業等,必須靠國家津貼才能發展。中國的工業則國營的只有衰敗(鐵路因有外債關係),獎勵私人工業只是不兌現的支票,保護稅則八十年來無從說起,直到最近只是一點微弱的作用。第二,數十年來各國均由輕工業過渡到重工業,由製造必需品,進而製造機器,

由輸入製成品進而輸出製成品。而中國積七八十年之進化，尚未發達到此一階級。日本利用歐戰，以建立自己的重工業，鋼鐵公司成立非常迅速，一九一七年，日本有二百〇九個鋼鐵公司，其中有兩百以上是在大戰中建立起來的。資本積累至還清了外債抵償了過去十萬萬元之入超以外，尚餘數萬萬元。至於中國在此時期不過發展了一點紡織，麵粉，電氣，火柴等輕微工業而已。

我們試比較各國與中國之生產狀況，以見中國是如何落後：

煤之生產，一九二九年美國為五萬萬三千萬噸，英國一九二七年為二萬萬五千九百萬噸，德國同年為一萬萬五千四百萬噸。中國為二千六百萬噸。美國於一八八〇年即產煤六千萬噸，五十年來增至九倍，中國今日之產煤還不及美國五十年以前之一半。而中國的人口四倍於美國，面積也大過美國四分之一。

鐵之生產額，中國每年為一百萬噸，一九二八年美國三鐵礦產量為三千八百萬噸，德國為一千二百萬噸，俄國為四百萬噸。中國每年消費的鋼鐵為六十萬噸，每人消費為一〇五斤(Kilogram)，而美國每人消費額為二五〇斤，英國和德

國每人爲一三〇尅，俄國每人三〇尅，日本十四尅。

中國現有鐵路爲一二，三三五英里（鐵道部統計），美國爲二十五萬英里，俄國爲四萬英里。

航業，據一九二九年統計，中國共有大小船舶五二八隻共四十二萬三千噸；而英國（愛爾蘭在內）則有船隻七八一〇，一千九百七十五萬四千噸；美國三千六百五十三隻，一千三百七十萬三千噸；日本二〇四八隻，四百一十八萬七千噸。在界世海運中，英占百分之三十，美占百分之二十二，五，蘇聯占百分之〇，五，中國則等於零。造船業：中國全國造船能力，每年不過一萬噸，而日本在一九二九年所造成之船爲十六萬七千噸。

棉織，中國在一九三〇年共有四百萬紗錠，日本則有七百萬紗錠，美國三千四百萬，英國五千五百萬。

我們以上所比較的是幾個大國的最主要工業的狀況，沒有比較那些中國完全沒有的製造業如汽車，機器工廠等。我們知日本的工業化比中開始得遲些，但是牠已由資本主義國家躍而爲帝國主義國家，中國仍停滯在農業國的階段，甚至農業國尙且維持不住，將變爲無業國。這是什麼原因呢？

三 中國經濟之特質

我們已在上而指示出中國經濟發展之遲滯，這是中國經濟之特色。我們怎樣解釋牠呢？我不能說中國民族比別民族特別不長進些，或者說這是應當的，是發展輕工業與帝國主義國家實行國際的分工。這樣的發展已在中國的各種社會生活中印下牠的痕跡，即是文化之落後與民衆之貧窮。這是中國連年政治混亂，不斷的軍閥戰爭之根源。

歐洲資本主義之侵入中國，其影響是辯證的，即一方面促進中國工業之發展，一方面又妨礙牠。如果我們一偏的了解了這一行程，認為牠是完全阻礙或完全促進，便不是合實際。帝國主義之在華投資，修築鐵路，輸入機器是幫助中國工業之一面，但牠從中國輸出原料，輸入製成品，壓抑着中國工業使其不能與之競爭，這是阻礙的另一面。當然後者的作用比前者要大得多。這就造成了帝國主義與殖民地間的不可調和的鬥爭之經濟基礎。這一鬥爭在中國表現得最無情與露骨。

中國產業發達之遲滯，主要的是因為牠是一半殖民地國家。關稅的不自主是中國發展產業之致命傷。在關稅不自

主的情況之下，不唯新的產業無從振興，即舊的產業亦無法維持。以下我們將各產業的情況大概的分析一下。

先說煤業。中國全國的煤每年產額，用機器開採的二千萬噸，用土法開採的六百萬噸。合撫順開灤的煤產，已占全國機器開採的產額之半。因為交通多阻，舊礦不能增加產額，即或產出亦不能運輸，且內地之煤尚不及國外輸入的煤價廉，因此人民憚於投資。一九二六年的海關貿易冊說：“近兩年來，外洋煤斤增加，大半歸咎於時局不靖，致礙中國煤斤出產及運輸”。中國的時局何以不靖？當然是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引起民衆廣大的失業，因廣大的失業，軍閥才有兵士可以役使當他們戰爭的炮灰。

二，鋼鐵業 國內各大鐵礦產額約一百萬噸至一百五十萬噸。由大冶，象鼻山，繁昌等處每年輸往日本之鐵礦約在六十萬噸以上。全國有八個製鐵公司，兩個製鋼公司，可是除了本溪湖，安山，漢陽，大冶，中日合辦之廠以外，正式國營之鋼鐵廠都停工了，眼看日人將大冶之鐵砂輸出鍊成鋼鐵，輸入中國，獲利數千萬元。中國鐵業不振之原因，一方面是受了漢冶萍所採的鐵必須供給日本的條約拘束和全國鐵礦百分之八十已入日人之手。另一方面便是中國沒有保護

稅則。大戰以後，全世界鐵價驟落，中國鍊鐵成本過（昂雖然鐵礦石及工資較歐美為低，然中國之焦煤價格及製造費則在歐美之上）以致不能與歐美之鐵競爭，鐵廠紛紛停工。

三，航業 根據一九一八，一九一九，一九二〇年的統計，中國船舶在本國貿易全體上所佔地位為百分之二七，二八，二六。外商在中國的船隻，太古有七十三輪，十六萬三千噸，怡和四十輪，十二萬噸，日清船與太古等。而合招商局，三北公司，政記公司之輪船不過六十五隻，十二萬噸。中國航業之不發達，最主要原因無疑是外人雄厚資本的壓迫。民國初年中國尚有遠洋航運的郵船三艘點綴於太平洋海上，數年以後，這一郵船司公以負債而倒閉，輪船也出賣了。

四，棉織 中國之紗廠業以錠子之數目論，固然是華廠占多數（總數百分之五十七），但是就投資之數額說，日廠占百分之七十（二萬萬兩），而中國廠只佔百分之二十八（八千四百萬兩）。外人在華設廠，資金充足易於流動，向外銀行借款利息較低，能以較賤的價格收買大宗原料，市面沉寂可以設法維持。外人購買原料（如日商之於棉花）不唯供給自己的紗廠，並進一步在市場上操縱價格使華商受抬高價格之痛苦。中國人的紗廠事事處在逆境，所以有些紗廠被歸併

於日人，有些爲日商債權所管理；改組，出租，出賣的事時有所聞。牠的發展常繫於對日貨之抵制。雖然中國紗廠年有發展，但中國的紗廠仍發展得很慢，如1922年共64廠，1923年55廠，1924年58廠，1925年爲65廠，1926年67廠，1927年64廠，1928年73廠。一九二二年與一九二八年之紗廠數同爲六十四，一九二八年華商紗廠之錠子僅增加了二十八萬隻。在由一九二二至二八年，六年之間中國錠子（包括中外紗廠）只增加了六十萬。在一九二六至一九二九，日本（本國）不過三年，却增加了一百二十四萬隻錠子。

五，麵粉業 民國十餘年以來，有只在歐戰的時候紗廠與麵粉業頗爲發達，在歐戰後即感覺異常之困難。美麥與麵粉對華輸入，中國與牠競爭當然失敗。又日本藉減少關稅以獎勵對華之麵粉輸出，價格亦比中國的麵粉要賤些，中國南部的麵粉因此不能在北洋銷售。去年因美國向東北輸出麵粉日多，使東北所產的麵粉每袋須賠累二角。民國元年至十一年中國小麥出口頗多，民國九年達八百餘萬担，在歐戰期內，中國麵粉一躍而爲大宗之輸出國；但是最近幾年小麥和麵粉只有入超，試看下表：

小麥入超	5,900,000担	4,860,000袋
麵粉入超	6,499,877担	11,908,548袋

這種入超可驚的增加，一方面是表示中國連年的天災人禍，使農作歉收，一方面表示出沒有保護稅則，中國的工業，甚至是輕工業，亦受帝國主義之摧殘。

六，其他 我們再舉兩例，一糖業：因入口稅輕，外糖輸入十數倍於本國所產，一九二八年值關平銀一萬萬兩，一九二九年占入口貨之第二位。中國開辦的製糖公司，因管理不善和遭外貨壓迫，有的開而覆閉者數次，有的停歇多時，難望復業。二，火柴業，因(1)原料來自國外，金貴銀賤，成本增加；(2)瑞典火柴跌價競爭，中國火柴每箱虧本四元；(3)瑞典火柴托拉斯復於各地設廠製造，行大規模之兼併；於是廣東三十餘家之火柴廠，不堪此種壓迫，倒閉得只剩十四家，江蘇八家，去年一年倒閉三家。

我們在上面指出中國重要工業之大概情形以表現由於不平等條約與關稅制度之束縛，中國工業不能發展。但這不是說，中國工業在此種情形下絕對不能發展。正如在封建時代，不顧封建的桎梏，近代工業仍有相當的發展，在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時代，輕工業仍有進步可言。在實

際上我們看上海的工業，假如以一九二九年爲一百，則一九三〇年之發展爲：

煙廠 130 紡織廠 120 製帽廠 130

橡皮廠 250 紙廠 110 肥皂廠 115 及其他

此外，中國現時也可以製造電氣馬達，電風扇，電燈泡，印刷機等。至於第二次革命後城市人口之增加，各城市中（尤其上海）建築業之活動，尤爲顯著之事實。正因爲此，我們才可以說資本主義之生產力與中國現社會的生產關係發生衝突，只有靠革命來解決。

但有人偏忽視了這種矛盾，即帝國主義主要藉關稅制度在中國生產力上所加的桎梏。他們忽視中國經濟之特質，即半殖民地的經濟，不看整個情形，將一二工業部門的狀況誇大做出離奇的結論，分明應當指出中國工業發展之遲滯的傾向，却大吹牠是“突飛猛進，令人驚詫”，“中國輕工業的發展，……無論在那一部門都是長足進步的趨勢”，“紡績工業的發達更是急劇”（均見嚴靈峯著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單就紡績機器說，一九二一年之進口固爲二千六百萬兩，但一九二一年以後每年都是下落的（見上表）。在戰時與戰後幾年繁榮起來的工業，如我們以上所述，在近幾年來都衰落

下去了！因此更尖銳地提出民族問題。帝國主義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作用是：絕對地阻礙和相對地促進中國生產力之發展。在中國的經濟生活上說，帝國主義是我們的主要敵人。

帝國主義在華設廠，在一方面說，是增加中國工業化的成份，但是牠妨礙中國工業化的作用更大。牠在中國所享的特權及其在工業中顯著的壓倒的優勢，使本國資本放棄與他競爭的意念（當然這是就多數的情形說），而投資於土地，公債，高利貸等等不生產的方面，無孔不入地吸取人民的血液，或者存放在外國銀行供帝國主義的利用。試看廣東的華僑每年由海外匯回故鄉六七千萬元，大部分是投資於土地，現在的黨國要人，也有在廣州，南京購買土地，待地價之漲以取利的。土地投資愈衆則競爭愈烈，競爭烈則地價愈漲。奉直戰後，奉票跌價，官吏商人均爭先恐後的購買土地，十年以內（一九一六——二六）南滿穀價漲四倍半，田價幾漲十倍。難道這些黨國要人，官僚，商人，不知道振興實業，提倡國貨嗎？這是因為他們不敢侵犯帝國主義，只知得過且過的苟且偷生。然而人民在這兩重剝削下之痛苦則更難忍受了。

帝國主義之侵略中國，已使中國無形中被劃分為幾個

勢力範圍，中國境內各部份之相互關係反不及牠們與各帝國主義間關係密切與依賴之深。例如，東三省對關內貿易爲一萬萬九千萬日金，對日貿易則爲三萬萬日金圓。日本在東三省的投資爲十五萬萬。廣州的交通與金融均依賴香港，雲南依賴法國。這是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是地方性的，依賴帝國主義的，即使張學良在東北不大服從日本帝國主義，也不過是改變得傾向美英帝國主義及德國而已。資產階級分裂爲地方的，相互衝突與公開戰爭，中國統一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沒有可能。一年以前我曾說過，中國資產階級不能舉行對外戰爭，所以不能統一中國（見拙譯恩格斯著“革命與反革命”之序言）。這次遼吉事變後之資產階級的態度，完全證實了這種預斷。

中國的不統一既是帝國主義侵略之直接結果，牠在中國經濟發展上的影響也很悲慘。政府在平時的苛稅雜捐，官僚勒索中飽，幣制與度量衡之不統一，以及在戰時之破壞交通，徵發車船，軍隊供應，無數生命財產之喪失，不僅使工業發展的前途狹隘，而且農業的破壞也是可驚。中國的小麥，上面已說過，從一九二三年起變爲入超且逐年增加。中國的米在一九二三年入口九千八百萬兩，一九二七年占入口之

第二位，一萬萬七百萬兩，其餘的年份亦常在六千萬兩以上。棉花自一九一九年以來，年年產額減少，盤旋於六七百萬担之間。一九三〇年進口美棉印棉為二百五十萬担，已為進口外棉之最高紀錄，但是一九三一年上半年的進口棉已達三百四十五萬担，值一萬萬三千二百萬兩，居入口貨之第二位，為歷年之最高紀錄，預料下半年進口棉必較上年為更多。水旱災荒與戰事年年摧毀農業，即毀壞工業發展之國內市場。工業之“長足進步”繫於社會秩序的安定，但是在第二次革命後的社會秩序安定了不過一年（一九二八——二九），馬上又被屢次的戰爭，“剿赤”，災荒與帝國主義的軍事佔領所破壞了。此外還有生絲，豆類，茶，桐油出口之銳減或停滯，影響到農民之失業與破產。

嚴靈峯君全然不了解中國經濟之特質。他指出在中國經濟中，是資本主義關係而不是封建制度佔統治地位，這是對的。但是他却走到與史大林派相反的另一極端。如他說：“帝國主義……促使殖民地或半殖民地更趨於資本主義道路的發展”（見上引書——九三頁），“中國整個國民經濟中的資本主義勢力擴大，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礎崩潰愈速，軍閥失去封建制度的根據而服從於資產階級的利益，為他們

所充分的役使”(一二六頁)。嚴君的錯誤便是不了解我們所處的時代，是帝國主義即死亡的資本主義之時代。在十八九世紀我們看見資本主義是向上發展，在各國的作用誠然是使“封建和半封建的基礎崩潰”，在帝國主義時代，資本主義的向上發展整個說來，是不可能了。牠不能提高工農生活，雖然有個別國家的經濟向上發展，這就犧牲別國的工業陷於衰敗。牠在殖民地的影響尤其是破壞多於建設。帝國主義統治了中國三十餘年，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恰恰發生在大戰期內其統治鬆懈之時，其餘的時候是受其箝制，這是我以上所述的事實對於嚴君理論之第一批駁。第二段話如果說是描寫中國現實的經濟行程，則顯然的不正確。第一，我們不能說中國現代的軍閥根根據於封建制度，因此牠亦無所謂失去此根據，此點留在後面再說。第二，中國的軍閥是妨礙資產階級的發展(戰爭，苛稅)，不是供牠“充分役使”，因此他們的衝突常是違反他們的意思給革命以爆發的機會(如一八四八年法國之二月革命)。如果嚴君的說法是對的，則帝國主義，軍閥，資產階級利害一致，只有對工農的矛盾，他們中間矛盾沒有或不重要了，中國革命當然不是在民族民主的基礎上而是在社會主義基礎之上爆發了。如果說，帝國主

義只是對於“社會主義的革命是反動的”(166頁),爲什麼小資產階級也高喊打倒帝國主義?無產階級與小資產階級成立聯盟,和領導後者的革命政綱是怎樣的?是說小資產階級應當擁護無產階級實現社會主義嗎?還是說無產階級應當聯合和領導小資產階級力爭國家之獨立與自由呢?照前一種說法,共產黨不足畏,“中國的產業落後,沒有具備實現社會主義的條件”,小資產階級的政黨說。無產階級自己的政綱不能激動小資產階級受其領導。這正是一八四八年二月革命後法國農民不擁護巴黎無產階級,以致革命失敗的情形。如果照後一種說法,這本是過去革命的道路(雖然領導錯誤),但必須推翻嚴君的理論:帝國主義和軍閥都不束縛而是“促使”“推動”,幫助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和供其“充分役使”。(雖然嚴君在該文中也說到中國工業不能痛快的發展,不能脫離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受到不斷地國內戰爭的破壞,然而他認爲在這些情形下,“中國社會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蒸蒸日上”,所以不改變他的基本觀點。)

我認爲帝國主義在中國是摧殘而不是幫助資本主義之發展,這在嚴君或者認爲是與史大林派一致,確實在這一點,我不僅與史大林派而且與資產階級的各派一致,因爲這

是客觀事實的認識，這完全不妨礙相互間鬥爭之不可調和。至於嚴君在這點上却與帝國主義者一致，因為後者常常誇他開發中國的功勞。

假使我們不是人道主義者而是物觀主義者，我們應當認識革命的爆發是生產力與生產關係的衝突。中國資本主義之不能發展，是因為沒有國內市場，因為帝國主義的侵略陷大多數民衆於異常貧困。國內市場狹小，連日本人在中國之紗業亦不發達，他們說“紡織業發展速而需要不相應”。又如武漢最雄厚的企業爲紗廠，因種種不良的特殊影響，確有欲罷不能之苦，其一原因是“本年（一九三〇年）因銷場各地既有匪共滋擾，而川湘又復多事，以致交通阻隔，即製成紗布又不能及時脫售，……復須向銀行抵押，重認息銀”。華商紗廠一九二七年的宣言說明紗業的困難是由於“內戰不已，人民生計已窮，購買力薄弱，銷路阻滯，苛稅繁興”。或者有人認爲沒有國內市場，大多數民衆失業貧困，這是全世界各國（除去蘇聯）的共同現象，何以中國的革命便與先進國家的革命不同？我的回答是：這只是說先進國家與落後國家在帝國主義的時代，革命的條件都成熟了。但是革命的直接任務都完全不同。先進國家的民衆失業是工人的失業，是生產

過剩以後的失業；工人階級取得政權，革命的直接任務是生產工具社會化，廢止私有財產，實行以社會主義的生產方法代替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落後國家的民衆破產與失業是農民與小手工業者，是由於生產不足，革命的直接任務是如何打破生產力發展之束縛，即撕毀不平等條約，分土地給農民。只有工人階級能夠堅決勇敢的這樣做，所以得到廣大的小資產階級羣衆之擁護而取得政權。所以先進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以後容易建設社會主義，落後國家的無產階級在取得政權後，建設社會主義十分困難，必須得到先進國家的國家幫助。倘若我們混亂了這種分別，不了解我們所處的環境與參加革命的各階級之要求與利益，而以爲只須用社會主義的口號登高一呼，四方響應，這種人只是唯心主義者，他的領導只是斷送革命到失敗的路上。

四 中國現在有沒有封建勢力？

我們承認主要的是國際帝國主義阻害中國的生產力和資產階級社會的發展。但是問題在此地還沒有完結。中國現有的社會結構：軍閥制度，官僚階級，土豪劣紳，商業資本，高利貸者，這些階層的結合，亦是阻滯社會進步的勢力。但

他們却與帝國主義沆瀣一氣，他們對帝國主義極力表示無抵抗，至多是“以夷制夷”的抵抗，帝國主義亦維持他們整個階層，不是破壞他們。這些是什麼勢力？大多數人說他是封建勢力，他們是封建勢力麼？

普通所了解的封建勢力是指與資產階級對立的特權階級——諸侯，貴族，領主等。可是中國因為土地買賣自由，這一階級早已不存在了（如革命前的俄國，領主的土地不是從賣買而是從世襲得來，所以顯然是封建勢力）。政治上的封建勢力在推翻滿清後即不存在。所以如曹錕，黎元洪等都可以做大總統。

照史大林派的意見，現在的地主階級是用的封建勢力的剝削形式，所以稱他們為封建勢力。不過史大林派的不能自圓其說。比方，劉夢雲君在本誌第四五期合刊上的一篇論文，是站在史大林派的立場，承認中國有封建勢力的。在他看來“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對中國農民實行封建式的剝削”，因此是“鄉村中的封建勢力”（見劉君論文六十一頁）。他又舉出“東洋拓殖株式會社……在東三省利用它所有的種種特權，用高利貸放款給貧民，強迫農民給它做苦工（實際上這與封建時代的徭役無異），使農民不能自由行動，把農

民變爲它的奴隸”(見同頁)。他又舉東三省的例，指出錢莊，糧棧，當舖及雜貨商對農民作種種形式的高利貸，所獲贏利以月計之爲十分至三十分”(見五十九——六十頁)。他又說“中國民族資本家不能在工業方面立足，以至把資本拿來購買土地，收租過活，一定是因爲在鄉村中間他可以更利害的剝削農民”(五十二頁)。照他的這樣說法，地主，商人，高利貸者，帝國主義者(東洋拓植株式會社)，錢莊，買辦，民族資產階級一律都是封建勢力。“在中國農村中，很多的地主，同時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五十三頁)，“每一軍閥，往往自己就是地主，就是買辦，就是商人與高利貸者”，這正表現地主之資產階級化，中國沒有與資產階級對立的領主，而劉君却認爲這是封建勢力，他理想中的資產階級究竟在什麼地方和是怎樣一副面孔？

雖然劉君在其論文中六十五——六十六頁盜取托羅斯基反對派政綱的意見，指出中國資產階級之地方性，“軍閥當然也是民族資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注意：却不是“封建地主，利益的代表者)，然而其整篇論文是指出封建勢力在中國占優勢。其實軍閥既已做了民族資產階級之代表者，便只有民族資產階級占優勢。劉君的本意是在指出封建勢力

與資產階級的對立，但是他一走進實際生活，所舉的例子，都是“封建勢力”到處附在資階級身上，失去其對立的意義。這是因為中國的資本之異常流動性，可以任意投於工業，商業，土地，高利貸；不像歐洲過去封建貴族之與資產階級是土地與流動資本之對峙。“封建勢力”只是各派系資產階級在爭鬥時互相對罵的一名詞，史大林派不去闡示真理，反從而和之，使民衆認為他們要反對的是“封建勢力”，對於資產階級都抱有幻想，更易受資產階級的欺騙。

我們認為中國現在不是一封建社會，而是一資產主義社會——落後的資本主義社會。正因其落後關係，所以“封建與半封建關係無疑的是強有力的，其發生原因，一部份是由於封建時代所遺留的，一部分乃由於生產力發展的停滯，農村人口過剩，商業高利貸資本的影響而新形成的”（托羅斯基）。這是說，資產階級承繼着封建時代的剝削形式，等於“南洋羣島荷蘭資本家對於中國豬仔的剝削”是採用的“奴隸主對於奴隸的剝削”形式一樣。這樣的剝削在落後國家豈僅限於農民與一般人民，資本家對於工人何嘗不是榨取超剩餘價值呢？

由此，史大林派的經濟分析重在闡明：“凡用封建剝削

形式的，均為封建勢力”教條。有一位伯虎，在他的“中國經濟性質”一文中有這樣一句話：“中國因為受帝國主義協同軍閥買辦豪紳地主的壓榨，現在全盤經濟，雖然各個別部門有些進展，但是的確處在停頓和破壞的狀態之下，農村裏尤其厲害”（布爾塞維克，第四卷第二期八八頁）。這句話言外之意即是說中國的資產階級是被壓榨者，不是壓榨者，其結論當然是說他與工農平民羣衆有共同的利害。一等資產階級間之對罵重新發生而且激烈化時，史大林派即在羣衆中為一派的資產階級做保人，說牠是進步的，反封建勢力的，反帝國主義的，主張與牠暫時的聯合，即是重演過去聯合戰線的歷史，重進資產階級所安排的圈套。這便是史大林派理論之邏輯的結論。

五 中國往那裏去？

日本自一八六八年明治維新以來，資本主義的發展，在國內沒有遇着何種障礙，故能有長足之進步。為資本主義發展所需要的改良，如像廢除藩禁，統一稅制，取消苛稅雜捐，丈量田地，日本在維新以後幾年即實現了。至於在中國，廢除釐金，丈量田地，統一幣制和度量衡，這些要求幾十年來

經朝野人士之熱烈提倡，至今仍然不能實行，所以我們的產業狀況在今日是可怕的落後。我們再看俄國，牠的歷史雖然表示牠是社會進化很遲滯的國家，但在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以後，開始國家經濟發展之一新的時期，其特色為“自由的”勞動之市場迅速的形或，鐵路網之狂熱的發展，海港之創立，不斷的吸收歐洲的資本，工業技術之歐洲化，信用貸款之息低和容易，股份公司數目之增加，採用金本位，劇烈的保護主義和國債額之大量增加。這樣，中國又不如十九世紀八十年代之俄國（鐵路網，信用貸款之息低和容易，不斷的吸收歐洲資本，金本位，保護主義等）。在俄國僅是土地問題妨礙資本主義之前提，在中國則土地問題以外，還有民族壓迫，比土地問題更為酷烈。

中國在資本主義侵入後的歷史充滿了戰爭與動亂。太平天國與義和團運動以後，中國經過了兩次革命，滿清因為不能適應歐洲的政治經濟以改造國家，被人民推翻，承繼牠的北洋軍閥以後也成為革命的對象，承繼北洋軍閥的“民族”資產階級政權對於建國任務也表現其無能。至於在清季與民國之間的南京政府，在北洋軍閥與今日南京政府之間的武漢政府，却可稱為小資產階級民主政權之開花時期，可

惜不能結出果實。牠表現得更沒有創造能力，只有動搖，妥協和終於將政權讓渡於大資產階級。

這樣中國的歷史已將其社會各階級（除去工農階級），都試驗過了，無論牠們主觀上如何努力於富國強兵，振興實業，牠們並不能表現成績，因此不能長久地掌握政權。因為牠們沒有一個能掃除那振興實業的障礙——帝國主義，恰恰相反，牠們都在帝國主義的前面屈服，同樣成爲發展實業的障礙了。中國的上層階級已爲長期的商業資本主義所腐化，極端的自私與個人主義，輕視理想，好貨貪財，沒有社會的監督。所以官僚的刮地皮，吞沒公款，已爲一般人所認爲當然，每一公共事業尙未開始，牠的款項早爲當事人所中飽（如川漢路）。中國的上層階級永遠沒有把國利民福爲前提，卽令有特出之士，清廉有爲，但是“好貨幣永爲劣貨幣所排斥”，他們或者被同化，或者被排斥，更表現出中國的改造不是幾個人的問題而是階級的問題。日本明治維新之能實行改良，能實現上層革命，便因爲那時的統治階級還有中古武士道的精神。至於中國的有產階級則已經腐爛了，沒有遠見，沒有創造能力，只是寄生於社會之上。對於工農之反叛，他們才表現是一整個階級，在其餘的問題上（對帝國主義問

題，對中國之建設問題)，他們中間沒有一致的意見。

中國往那裏去？這一問題將受決定於中國各階級的行動及其努力方向。在這次遼吉事變後我們更看出牠們的將來。在這次事變中，統治的軍人表示其不抵抗，“逆來順受”，求援於帝國主義之集團以抵制最橫暴的帝國主義，更進而準備將中國的土地部份的送給帝國主義共管，以圖一時之苟安。他們努力的方向是壓榨中國人民，不用說，是殺雞以取其蛋式的壓榨，毫無保育的方策。

正如統治的軍人之仰賴而又不滿於國際聯盟，中國的資產階級同樣是仰賴而又不滿於本國統治的軍人。資產階級對現政府之中日直接交涉的嘗試，錦州中立區域及國際共管天津之提議都是反對的，但是除了消極反對以外，還有甚麼更積極的——而且也不會有——主張呢？抵制日貨，此次因為資產階級所發動，但牠們因不能長期忍受不賣日貨之犧牲而時時有取消抵制的趨勢。對日宣戰也是資產階級能說而不能行的。我們再就這次抵制日煤聲中膠濟路運煤加價之事看來，一方面固然是現政府無意於保護本國工業，但另一方面，這一與資產階級切身利益悠關的問題，僅喚起上海資產階級（市商會，航業公會，華商紗廠聯合會，絲

廠業同業公會)之要求“將加價案暫行保留”，而非要求其根本取消，完全證明中國資產階級之地方性，不顧整個自己階級之利益。

地球繞日，月繞地球而行，中國的產資階級擁護現政府，現政府則視國聯及一般帝國主義（尤其美國）之意旨為從違。他們中間雖有矛盾，衝突，排拒，但無論如何不能逾越這一軌道。雖然資產階級將來有向左的盤旋和反帝國主義的姿式，但是到決定的時機仍會與現存的勢力妥協。今日的馬占山能與日本開戰似乎是一個例外，這因為他的社會背景比較簡單，非如關內各地階級矛盾之緊張。正如作者在本誌第七期所指出的，摩洛哥的酋長能與法國西班牙帝國主義決戰。至於印度的資產階級却只能對英實行不合作和非武力抵抗。如果中國的統治階級人人能如馬占山對日作戰，中國在產資階級之下即可以實現統一，走上立憲政治的軌道，取消軍事獨裁，開闢資產主義發展的道路。但是中國的資產階級做夢也沒有想到這樣做呢。

這一切指出，中國在資產階級統治之下，無力抗拒帝國主義的侵略，一天天的走上殖民地化的道路，即印度的道路。這當然不是說整個中國變成一國之殖民地，而是說，列強

將中國瓜分以後的經營。日本在這一道路上，已猛着先鞭。

中國除了資產階級以外，還有與之俱生的同伴——無產階級。他們受資本主義不發展的痛苦比資產階級所受的要大得多。他們能夠堅決勇敢的反對帝國主義，力爭中國之獨立與自由。無產階級，農民與城市中的小市民之能堅決反對帝國主義，即因其爲除了身上的鎖鍊以外，沒有別的可以損失的階級。他們反帝國主義勝利，即剷除了防阻生產發展之最重要的障礙——國家之不統一，苛稅雜捐，關稅不自主，高利貸與重租，等等。他們對外將實現國外貿易獨占，以防本國必需的原料輸出國外，和非必需之奢侈品輸入國內，對內將實行有計畫的經濟，將全國各部門的生產通盤籌算，互相調和，維持其間的平衡，不致因生產過多或過少引起經濟危機。如是國家經濟方有長足進步，追蹤先進國家之可能。這是社會主義的道路，亦即蘇聯的道路。

中國的前途，在這兩極——印度與蘇聯——之間，或者有人認爲有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之可能。這一計畫已提出了十餘年，在今日的中國，這一計畫之實現，仍是如提出時候那樣的遼遠。這不是無故的。國際共同發展中國實業，必須先假定各帝國主義間沒有衝突，這一假定在實際中

即不能成立。即使是帝國主義個別地投資開發中國實業，亦必須中國政治之安定。中國從過去到現在不能如俄國之不斷地吸收國外資本，便是缺乏這一條件。在不斷的內亂之狀況下，中國的經濟只有衰敗。在我們以上所述的兩極之間，我們還可以想像帝國主義借一筆鉅大外債給中國政府，以修築鐵路，或整理幣制；或者牠以資本直接開發中國。但我們重複的說，帝國主義這種投資的條件還不存在，中國太分裂了，還沒有一為全國資產階級所信任的政府。未必中國還需要一次失敗的革命，打破一些國內國外的矛盾，使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感受着他們有被革命滅亡的威脅，因而從事於建立一較有力量的中央政府，以接受國外的投資麼？

中國的經濟目前已陷於死路，如果需要革命的推動，才能前進，那麼這一革命有其自己的邏輯，尤其是我們全國的民衆不應忽視牠的邏輯。

中國的積病太深了，非用極猛烈的藥劑或手術不能醫治，零碎的改良是無効的。資產階級的因循萎靡，不唯沒有解決問題的方案，而且問題的本身，他們也不敢提出來。客觀的形勢已指出：無產階級值日換班的時候已經到了。

六 革命性質與政權問題

除了那些極少數的人，利於保持現狀以外，大多數羣衆都認爲革命是他們的出路。革命再也不是少數野心家煽動的結果，而是民衆爲了迫切要求改良自己的生活激起的直接行動。這是因爲當權的資產階級一點也不能改良。依過去歷史的經驗，革命雖然失敗，也可以引起改良。在中國，革命的威脅却不能使統治階級讓步。江西，湖南，湖北等省流了無數農民的血，關於土地問題，我們看見仍然是維持現狀。麻木癱瘓的資產階級似乎不願有任何動搖現狀的行動。他們之衰朽無能不能解決本身任務，與壓迫民衆之兇很是互相輝映的。

但是在革命運動中有一種幼稚意見，認中國現在是資產階級掌握政權，牠已成爲革命之對象，因此資產階級革命已經完結，下次革命一開始即是社會主義的革命。這樣機械的劃分上一次革命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下次革命是無產階級社會主義革命的意見，是很錯誤的，與實際行程全不相合。所謂資產階級革命即是肅清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雖然資產階級自身有時也變成了這樣的障礙，而在被肅清之列）

革命最初的爆發，仍不脫資產階級民主要求的範圍如反抗日本之佔領遼吉，反抗軍事獨裁，要求民主政治，農民要求土地與取消高利貸，工人要求改良自己之生活。在這些要求的基礎之上，發展資產階級政黨與無產階級政黨間之鬥爭；資產階級的代表者說，這些要求是民主主義的，應當由資產階級的政權來解決，但是無產階級的代表者列舉出過去資產階級背叛革命的歷史，而斷然拒絕擁護資產階級，主張獨立地完成民主任務（當然不限於這些任務）。但是無論如何，這不是資產階級代表資本主義，無產階級代表社會主義直接奪取政權的爭鬥。

如果單純以推翻君主專制或封建勢力為民主革命已經完結之標準，則從一九一一年以後已經沒有民主革命，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應當是社會主義革命了，因為依照我們的分析，北洋軍閥並非代表封建勢力，不過是資產階級中最反動的部份（代表土地，剝削國庫之銀行）。更就歷史上說，法國大革命已算澈底毀滅封建勢力了，但馬克思仍稱一八四八年二月的法國革命為民主革命。以推翻君主或封建勢力為民主革命完結，這是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標準，不是馬克思主義者的標準。馬克思主義者認民主革命的完結

是在資產階級能和平滿足其要求，勿須走到革命的陣營利用羣衆的時候。他們只是在一八七〇年以後才宣布歐洲的民族革命時期已經完結。這與那種機械論者說中國資產階級已取得政權，民主革命已經完結的意見毫無共同之點。

馬克思主義者是不斷革命之主張者。當革命起來，舊勢力傾覆，新政權起而代之之時，小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即宣告革命已經成功，已經完結，破壞時期已經過去，建設時期將到來。這樣的聲調在每一大革命之初期都可以聽到。不斷革命論者却回答說，革命沒有成功，沒有完結。資產階級的政權，雖是最急進的，亦不能解決中國的民族問題，土地問題，他們要求革命之繼續，認為只有無產階級取得政權，才能圓滿的解決這些問題。由此，無產階級革命是從未完結的民主革命中生長出來的。

中國今日的社會是資本主義關係佔統治地位。牠是什麼樣的資本主義？是買辦資本主義。繼之而起的應當是民族資本主義，可是中國的民族資產階級太不爭氣，太無出息了，打倒帝國主義的任務，牠不能領導下層民衆來完成，必有待於下層民衆自覺的獨立的努力。無產階級政治上比資產階級成熟得快，當資產階級目光尚不出地方的利益之外

時，無產階級已爲自己提出了全國的任務。這使我們有理由說，中國無須經過民族資本主義，可以由買辦資本主義走到社會主義。換言之，中國可以無須經過如歐洲各國那樣在經濟上資本主義獨立發展，在政治上資產階級的民主議會制度與之相適應之時期。國家之這種跳越資產階級民主主義的發展，必須有一條件，即是無產階級與下層民衆，脫離教條主義者的影響，爲民主主義進行勇猛堅決的爭鬥，才能走向政權。

革命的中心問題是政權的奪取。像過去那種“四階級的聯合政府”的謠言，在下一輪革命中已不能成立了，革命已經超過了這一階段。將來革命中爭鬥最劇烈的，當然是工農民主專政抑無產階級專政完成民主革命？讓我們重複的說，無產階級專政產生之直接原因，不是爲了建設社會主義，而是爲要徹底解決中國民族獨立，國家統一與土地問題。

“工農民主專政”這一公式在俄國實現於一九一七年由二月到十月的克倫斯基政府及兩重政權，這一實現充分表現其沒有力量解決人民的問題，而只是抵制無產階級革命爆發的一座堡壘。在中國的將來，他也不外這種作用：當無產階級對資產階級積極進攻時，作資產階級的救命圈。所以

改組派的份子革命情緒最高昂時也不反對這一口號，他們也提出“工農小資產階級民主專政”，也說中國實現社會主義之條件不成熟，先須經過民主專政然後能走向社會主義革命。

但是史大林派所謂的工農民主專政，他們所着重的是與農民的聯合政權，無產階級專政抑工農民主專政，這兩大傾向之爭鬥，無疑是由於兩派對農民獨立作用之估量不同。史大林派，認為中國是小資產階級的農民占大多數，不能實現一個階級的政權，或者說在最初一階段不能實現，而必須留待以後的轉變。他們的綱領中規定這需整備的時期。究竟農民是否能獨立領導自己的革命，我們姑且拿中國眼前的事實來證明。無論史大林派如何吹噓，說江西的農民戰爭是受無產階級的領導（這樣的吹噓不是現在開始，他們不是也空喊過上次的革命已在無產階級領導之下麼？），實際這是農民游擊隊脫離城市的領導，自己進行的戰爭。史大林派在城市寫標語說“擁護紅軍”，“擁護蘇維埃”，也就是間接承認這些城市的工人沒有領導着“紅軍”與“蘇維埃”。

劉夢雲君在我以上所引的論文中說“在中國有些工農民主專政已經成立的區域，地主的土地已經完全沒收，而且

已經平均分配一切土地”(七十五頁)。這樣承認現在“紅軍”區域是已實現了工農民主專政的區域，尤其值得我們去研究最近一次工農民主專政的內容與其施設。我說最近一次，因為上一次武漢政府亦被史大林宣布為走上工農民主專政的政權。他的成績已為眾所共見的了。

我所根據的是史大林派自己的報紙，在他們的報紙上關於紅軍區域的情形從去年到今年有以下的紀載：

“現在蘇維埃區域有不經過羣衆會議而僅由少數羣衆領袖或紅軍領袖委派的蘇維埃政府，和資產階級式的限制羣衆選舉等錯誤現象”，“只是閩西與贛西南徹底的實行了土地革命的政綱，此外，有些區域仍然實行得不充分，甚至於完全沒有實行，有些地方已經成立了蘇維埃政權，但是並不徹底的去分配土地與消滅地主階級”，“有人以為某處的地主並不反革命……又有人以為某處的地主是革命的，是蘇維埃的積極分子，所以不能沒收”。“富農階級在蘇維埃政權中把持”，“或者將地主驅逐出去而將土地歸上層領袖所得”。（以上均見去年上季（一九三〇年）出版之紅旗三日刊第九十七期）不經過羣衆會議選舉的蘇維埃，已不是蘇維埃，分

土地不澈底的流弊更足以證明農民不能完成自己的革命。我們再看閩西和贛西南土地革命已澈底施行了的區域的情形：

“閩西蘇維埃：農民很多武裝停留在地方性的赤衛隊手中，不能自由集中調度。客觀上需要籌集款項助軍事的擴大發展，亦因為怕農民誤會，不易執行……他們為要解決經濟上出入口商品的困難，常不免對商人帶濃厚的妥協傾向。他們不但公布保護商人，並且完全豁免商人捐稅的負擔（農民還要繳百分之十五的土地稅），自然更不會有派款或徵稅的事。他們對商人自由抬高物價亦沒有取締的辦法……甚至於有時候還做出要限制店員工人經濟鬥爭的事情”（紅旗三日刊第八十七期）

至於在贛西南區域的朱毛，與商人妥協，出示保護商人，也是事實。

我們在史大林派的刊物中常看見反對蘇維埃區域的腐化與右傾等字句，可是這種腐化與右傾從去年到今年並不減少。今年三月八日出版的“黨的建設”關於湘鄂西蘇維埃區域的情形說：

“赤區的同志，大多數腐化，官僚化和右傾了，他們

覺得政權已經取得，沒有什麼事做，整天裏只是找愛人打午火……等等。……蘇維埃政府負責同志多不能解決羣衆實際要求，同時富農佔三分之二，委員大多數官僚化，以致羣衆不信仰蘇維埃，并有呼委員爲老爺者。……因爲羣衆不認識蘇維埃，所以赤區以內還潛藏許多反動份子，而蘇維埃對此亦沒有辦法。……這些現象不僅鄂西蘇維埃區域內是如此，即在過去現在的贛西南也有同樣的現象。”

由此看來，所謂工農民主專政，在實際上變成富農，商人，官僚份子對貧農，店員，工人的專政，已由史大林派自己供出。本來這也是農民暴動不得城市援助之自然結果。太平天國的洪楊在最初發動時也是農民暴動，到長江後有游民無產份子混入，大殺大搶，爲人民所不滿和害怕，在到江浙後，對商人極妥協，爲江浙的商人所歌頌。李鴻章於攻下蘇州後曾發大財，因爲從前附太平天國的人，那時都因畏罪而向李鴻章送錢。在江西等處，我們看見，最初也是貧農等聯合，起來推翻了豪紳政權，沒收土地，與官軍抗戰，但是一等他做完這些工作以後，抬頭一看，他發現上面是富農騎着他，第二天又增加了商人，第三天自己的上層也變得官僚

化，做富農和商人的工具。農民政權即是這樣墮落與腐化的。假使朱毛等能佔領長江流域（實際上這是不可能，因為帝國主義的力量現時強大得多，又無城市工人的積極參加）也不過是於佔得大城市後即與商人妥協，蹈洪楊之覆轍。所謂工農民主專政的命運將如此可悲地終結。

實在工農民主專政之為一政權形式，在歷史上從來不會有過，列甯在參加俄國革命之前，提出了這樣一個假設，在一九一七年他自己就拋棄了。現在沒有出息的人，不去消化歷史事變之教訓，只去咀嚼列甯所認為已經陳舊的公式和章句。

他們所根據的，即是列甯說過，“兩個政權的階級來源及其意義……就是在於一九一七年俄國革命不但廢除了沙皇帝制，不但把政權轉給資產階級，並且還往前達到了工農民主專政”。不錯，列甯有時也說工農民主專政實現於兩個政權中，但我們能說他為了實現牠而奮鬥十數年的工農民主專政竟是如此可憐的，不能解決任何問題的，擁戴資產階級的一個兩重政權嗎？不是的，列甯從前為牠奮鬥的民主專政，是一種國家政治制度，不是這種不成形的兩重政權。他那時告訴他的反對者，彷彿說，我們所要的工農民主專

政，已經實現了，再沒有比這更高的民主專政的形式，我們應當丟掉這公式，進而為無產階級專政爭鬥吧。

記得劉蘆隱先生一九二八年在中央半月刊所作之“革命與反革命”一文中曾說過，中國第二次革命中，史大林所代表的是列寧的路線——工農民主專政，托羅斯基所代表的是馬克思的路線——無產階級專政。我們不能不說這是一誤解，雖然是一有卓見的誤解。史大林與托羅斯基在一九二七年對於中國革命所用的是同一政治口號——工農民主專政，但已有不同的內容，這在革命失敗後兩人所得的教訓完全分歧更可看出。史大林仍留戀於工農民主專政之公式，托羅斯基則進而抨擊此公式為反動，公開提出無產階級專政口號。實在列寧的路線與馬克思的路線沒有對立和衝突。列寧在俄國革命中，直到一九一七年四月，所用的是工農民主專政口號，雖然與馬克思的說法在字面上有出入，但列寧從來是以無產階級在民主革命中爭領導權和不可調和的反對自由主義資產階級之內容充實此一公式。列寧在一九一七年正式拋棄此一公式，無非是拋棄一個空殼。托羅斯基在俄國革命中之立場在字面與精神上都是符合於馬克思主義的，即是他預見到無產階級專政為資產階級民主革命之

前途。所以當列甯一九一七年拋棄他那舊的公式時，加米涅夫等人即說列甯變成了托羅斯基主義者。列甯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在其公開的演說和文章中常常說世界上只有兩種專政，或者是資產階級的專政，或者是無產階級的專政。他在一九一九年說：“當我們中間有人說起‘民主主義的專政’，企圖用這名詞代表好像更‘堅實’的東西時，這已是全無意識之舉。從歷史上我們異常明瞭的知道，民主資產階級的專政沒有別的意義，只是懲罰暴動的工人。”（全集，第十六卷，一四一頁）當越飛在一九一七年以後問起列甯，“一九〇五年，你和托羅斯基到底是誰的對？”列甯回答說：“是他對，而不是我”。不論在革命以前二人如何互相攻擊過，但是他們在一九一七年及以後的親密合作，對根本問題之完全一致，列甯之信任托羅斯基至死不變，向政治局推薦托羅斯基繼承他在蘇維埃政府中的職務，這些都是暴露史大林派偽造歷史——說有反列甯主義之托羅斯基主義存在——之罪惡與卑劣。劉蘆隱先生站在外面的猜測之錯誤是不足為奇。但是我們怎樣說那些史大林派——他們根本不願了解俄國革命的歷史與列甯的文字呢？

一年以前共產國際的領袖馬努易斯基發表一篇文章，

其中有一段說，“中國的革命民主專政必須堅決的沒收屬於外國和中國資本的企業。”沒收中國資本的企業？這樣，民主專政和無產階級專政還有什麼分別？爲什麼還用民主專政的口號來與無產階級專政相對立？這一口號被保留着不過是在人們腦中散佈混亂的種子，教人家莫明其妙而已。史大林派一時說，由民主專政到社會主義革命須經過許多準備階段，一時又將民主專政說得與無產階級專政幾乎沒有分別。像這樣自己就沒有一貫的理論，如何說得上領導革命？

中國只有靠無產階級專政的手段，沒收中外資本的企業，大工業國營，提高農村經濟，因而提高其購買力，實行有計畫的生產，維持農業與工業的均衡，使中國的經濟大踏步的往前進，以一洗中國落後之恥辱，以追蹤先進國家之發展。這是救中國的唯一道路。中國的生產愈衰敗，資產階級愈無能，則無產階級革命對於恢復全國經濟的任務愈重大，無產階級革命與民族民主的革命愈緊密的連繫在一起而不能分開。中國無產階級之奪取政權，不僅是解決一階級的任務的問題，而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之所繫了。

七 結 論

我在上面對於中國的經濟及其前途作了一種稍詳的分析。我的任務只是想根據客觀的事實指出中國經濟發展的趨勢及其出路。我只是想用科學的方法發現客觀的真理。但是在這充滿了成見的階級社會，從 Galileo 的地動說被羅馬教堂所仇視以致 Galileo 受壓迫摧殘，以身殉其學說以來，真理在最初常常是不容易被人承認的。但我們的責任是更要使真理通俗化，以推動社會的進步。“思想深入到羣衆中時，即變成權力”。革命雖然常是爲統治者所不滿，但是有明瞭政綱的革命常是縮短社會的痛苦，是有理智的人不應反對的。統治者既然把國家糟踏到如此田地，假如不抱“甯贈外人，勿與家奴”的心理，應當讓位給別的階級解決他所不能解決的問題，以救人民於水深火熱了。至於這篇文章不過是我們研究中國經濟之初步嘗試，極願讀者對牠怎給以指示和批評。

十二月十一日，上海。

古代中國研究批判引論

杜畏之

(一)各家論略

(二)社會發展階段問題檢論

(三)中國古史上的治水問題

我企圖在這本不滿十萬字的小冊中用歷史唯物論的解剖刀把紀元前的中國加以大略的剖析。

中國的古史自來是被濃霧遮着，民間生長的傳說與王家史官所編造的史書中都藏着恆河沙數的謊語；歐洲人對中國古史的揣測與眼前許多研究者的摸索也產生了不少的

謬論。然而正確的結論亦往往自這些謊語與謬論引出。至於我們能否從謬誤的荒山中找一條正確的出路呢？這要看努力如何了。

很多人想整理古史，而大多數的人都失敗了，這裏面包括了多種原因，因為這些整理者運用了各種不同的方法，因為他們操了各種不同的言語。

譬如有很多歐洲資產階級的學者，既沒有正確的方法，又不能深研中國的史料，却信口開河，寫了不少的著作，其作用只在賺銅錢與騙俗人，沒有什麼科學價值。這是古史整理者之最下乘，我們這裏不值得為他們多費唇舌，全書的批評也不大觸及他們。

還有一種老牌的中国歷史教科書的編著者，他們直接承繼了中國史家的系統，在方法論上既不能跳出舊的圈子，所以就不能對舊史書加以批判的整理，只能因襲老說，抄錄舊文，相炫以博聞，相誇以強記，這都是歷史科學之門外漢，其喧嚷咕噪一無可取，所異於前述之中國通者不過多讀幾句線裝書耳。

第三種古史的整理者為新漢學家，他們的代表為胡適之與顧頡剛。這些人除了校勘學以外又獲得了西方庸俗進

化論的歷史觀及社會史的膚淺常識，所以他們才能比前兩種人邁進了一步。然而漢學幫助了他們，漢學也限制了他們，他們的優越點適成了他們的終結點，他們止於校勘家了。他們拿着校勘學的鋤頭闖進了古代中國的荒原，企圖開闢他，然而他們只做了而且只能做些剷除蔓草斬刈荊棘的工作，最多不過砍破地皮而已；深深的犁耕，把下面的土翻到上面來，已非他們所能做到。因為他們的工具不是犁頭而是鋤頭。

因為他們是校勘家，所以雖然立志來整理古史，結果只是整理了古書，立志要‘建設信史’，而結果呢，顛來倒去只是些辨偽的工夫。

因為他們的批判只是技術的批判（校勘學），所以他們只能得到技術上的成績，因為他們只拿文字學來整理古史，所以只能辨別古書的真偽，却未能觸到‘古史’的邊際。他們所得到的零星的偶然性的關於古史的結論只不過辨偽的副產物。所以胡適之雖然立下了‘信史的骨幹’，顧頡剛已着手去‘建設信史’，而直到如今還未能以信史問世。這其間，許多後起的社會學家已經跑到他們前面去了。他們的歷史腳色已經演過，他們此後不但不能而且不想‘建設信史’了。因為

他們於校勘學所入愈深，則於古史邊際所去愈遠。他們只去懷疑歷史去了，那裏還會有‘信史’出現！

這一派校勘專家本是古史研究之最卓絕的開道者，因為他們很高明地做了些技術的準備。但是當他們不安於室要跳出校勘學的門牆而到歷史荒原中來旅行時，就做了不少的錯誤。誠如梁園東所言：偽書中也有真古史，而真書中却裝滿了假歷史，這一點被校勘家忽略了。所以他們愈辨愈疑，而真中藏偽，偽中隱真，真偽雜出遂使這些技術的批判家目迷五色，終於沒有方法來突破這些疑雲惑霧，而所謂信史也者倒是仰之彌高鑽之彌深，越發可望而不可即了。

總之，現代的古史研究者不應該上漢學家的當，不應該從辨偽中來‘建設信史’，文字學的道路不是古史研究之大路，我們應該從社會學入手，漢學家的成績只能作甄別文字史料的參攷。

然而我並不輕視他們的成績，他們在自己領域內的造詣還非其他研究者在其他領域內所能趕上——因為他們收集了數百年來中國學術的成果。

第四種中國古史的整理者為陶希聖一流的社會學家。這一流人在新生命月刊上發表了不少的討論古史的文章，

也出版了不少的著作。這一派人在文字攷據的工夫自然遠不如那些新漢學家，因此在社會科學的常識方面却遠勝後者。他們把握了歐洲資產階級社會學與經濟學的方法，涉獵了西方的社會史，轉以這些知識來攷察古代中國的社會，其所得自較校勘家為多。可是這一派人也和胡顧等人一樣，受了他們的方法論的限制。

一般地說來，這一派的地位應高過前三派研究者，可是其下流者亦往往與第一第二兩派接壤而以庸俗的方法與膚淺的常識來談古史——如梅思平周谷城之流。其佼佼者如陶希聖亦受其所運用之方法論及所含之階級性的捆綁而未能古代中國的大荒中自由馳驅。

因為這些人自西歐抄來的方法是資產階級社會學的方法，因為他們所代表的是參加革命而又叛變了革命的中國資產階級，所以他們對古代社會的研究也不能跳出這兩者的範圍，他們從頂至踵是有產者的舌人，是反動主義與反動政黨的辯士。

凡是蔽於實際的政治利害而不能或不敢對歷史真理正視，或是看到真理却懼於權勢而不敢向人宣佈的學者必然是些劣等的卑陋的學者，新生命派正是這類學者。

例如陶希聖。陶希聖也從見過些歷史唯物論者的著作，也曉得唯物的辯證法為解剖社會之最犀利的刀鋸，然而他受制於他的教育及他的階級，所以就不能也不願使用這個方法。結果是影射這種方法論而提出了三種觀點，即歷史的觀點，社會的觀點與唯物的觀點（見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的緒論）。這在外貌上很像歷史唯物論了，但是經不起剝開來看，因為這裏包着一個被資產階級反動性所毒殺了的歷史唯物論之死胎。

先看他的歷史觀點。他的歷史觀點是庸俗的進化見解，是‘慢慢’與‘逐漸’底歷史觀，這種觀點中沒有革命底地位。這是非辯證家研究歷史時所最常得到的結果。因為他不懂得否定之否定與‘逐漸’中斷之定律，所以他眼中‘二千四百年以來’的歷史都是‘逐漸’變成的——從原始社會‘逐漸’變成金融資本主義。這正是他背後的階級決定了他的方法論。

再看他的社會觀點。這觀點是極端籠統的，這裏沒有或很少解析的方法。這也是不懂辯證法或反對辯證法的人所必犯的錯誤。辯證法的精義在乎把一個統一的事物分解為相互對立的部份，然後從他們的相互關係中即相互鬥爭來認識他。陶希聖只能籠統地看到一個社會，所以他只能以

‘社會的觀點’來解釋社會史，却不能以階級與階級鬥爭的觀點來解釋他。他只拋棄了個人主義的觀點而抱持了社會的觀點（其實這還是變相的個人主義的觀點，因為他在這兒把社會人格化了），却未能更進一步將此社會剖開而把握階級的觀點。這又是他的階級阻止了他。他關於士大夫階級的理論以及其對於目前社會之斷案都是模糊的社會觀所結的果實。

再看他的唯物的觀點。單就這一點看來，他比二元歷史觀的翠亨鄉人自然進步一些，比物觀方法的陳公博也明確了一些。然而他的唯物觀點依然是模糊的，而且是自命的。他把地理，人種，生產技術，自然材料並列為決定社會發展過程之諸原素。這是若干地理學者與歷史學者之接近於唯物論的主張，而比起歷史唯物論來却實在過於孩童氣。陶希聖在這裏只看到了歷史之自然條件（地理，人種，自然材料）或人對自然之關係（技術），却未能看到他的社會條件，即是沒有看到人與人間之生產關係。所以他說‘中國的地理條件不獨決定民族的活動，並且決定國家的性質’。這種唯物論在解釋社會史時往往碰壁，所以就往往拉唯心論來作伴而讓後者跋扈，結果依然是二元論的或多元論的歷史觀。

以這種方法論來研究社會史自然要得到模糊的結論。所以這一派人所留下的成績只是滿書的混亂。然而他們的作用也是不可抹煞的，因為他們是第一批用社會學的眼光來研究古史的人，從一九二八到一九三〇年的古史論壇差不多全部在他們手裏。可是到了現在，日子已經不是他們的。從一九三〇年起很多無產階級的戰士脫離了刀火生活而轉移精力於理論鬥爭，遂使討論社會史的文字內容一新——從前是資產階級的言語，現在却是無產階級的，或模仿無產階級的議論了。

陶希聖諸人的時代已經過去了。這些‘新生命派’失去了他們的歷史生命。

郭沫若是此後興起的驕子，他手下有一羣左傾的作家，構成了所謂新思潮派。

新思潮派之注意力大半傾注於現代中國經濟之研究，其深入古代者只有郭沫若之‘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

郭氏以天無二日人無二王的態度自詡他的著作為‘家族私產國家的起源’之續篇，為批判地研究中國古代的果實。實際上他的著作只是古文字學與新社會學之拼湊。

郭氏是個百分之百的文學家，所以他在研究古代社會

時才能取得一個絕好的機緣，使他能夠左手拉到社會科學右手拉到古文字學而完成了他那妙不可言的作品。他那光彩射人的大作，他那流利的文筆，好像大烟突中送出的濃烟之流，裏面夾雜着警惕文句之火星，頗使許多人目炫心折了。

社會科學家敬而畏之，把他看作一個精滿的古文字學者，古文字學者敬而畏之，把他看作一個出色的社會科學家，一般人對這兩門學問都未曾過問，就把他看作一個至矣盡矣無復加矣的‘博士’。假若不幸而遇見不顧情面的人，剝去他那五彩的文學衣裳，戮穿他那炫目的江湖騙術時，能騰下的只不過一些謊言與謬論而已。

郭氏的研究古史的下手處爲羅振玉與王國維底甲骨金石文字學。他不但自己從此處下手，並且以此爲唯一無二的下手處，他說‘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不能不以羅王二家的業績爲出發點’。至於社會科學不過是輔助的工具而已。歐洲人常說：開始好，一半了，不幸郭沫若選擇了這個下手處，遂使他的全部著作都受了金石甲骨的束縛而不能自由開展。

郭氏自選定了出發點之後就開始寫東西了。原先他還

帶幾本社會科學的參攷書，所以就寫成了‘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以後跟着跳水的王國維之遊魂愈走愈遠了，乾脆地鎮起昂格斯的著作，丟開社會史的贅疣，專心致志於王羅事業，於是就寫了幾大本媲美‘觀林堂集’的名著。尚矣！然而福兮禍所倚，這位矗立於龜甲獸骨之丘積上的名人已是社會科學院被除名的學生，而且越是王忠愍公的高足時也就越不是昂格斯的弟子了。

郭沫若與顧頡剛在學術上有血緣關係，因顧頡剛是校勘家而郭沫若所鑽研的金石甲骨文也不過是校勘學之一枝，所以他讀到顧氏的古史辨時才大大地歎賞而未曾察覺到後者方法論之貧弱，所以他們的歸路也是一樣，丟開這麻煩的烏古史而在方塊字堆裏找到了學生的專業。

郭沫若是個社會科學的門外漢，所以他不能正確地理解社會發展之活的過程，所以他只會抄襲石化的表格，定做了有方格的箱子，然後把一些龜甲獸骨斷文殘字破鐵爛銅放入這些方格或填入這些表格，於是就得了妙絕人寰的結論：“大抵在西周以前就是所謂‘亞細亞的’原始共產社會，西周是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相當，東周以後，特別是秦以後，才真正地入了封建時代”，而這封建時代又延長了兩千餘年

直到郭先生的大著出版時候。假若郭沫若稍稍熟悉西歐社會的歷史，他還會發出這樣的武斷麼？

郭沫若自家以為是個出色的辯證唯物論者，其實他既非辯證家又不是唯物論者。因為他手中的辯證法被機械地生硬地運用了，而唯物論到了郭先生家裏就穿上了神祕論與拜物教的衣裳。他是個偉大的天才，他有熔爐一樣的人格，所以馬昂二氏的辯證法與唯物論一到他的肚裏就變了模樣，再發揮出來時就與原型沒有絲毫共同的地方了。

郭沫若關於中國社會史的著作完全失敗了。然而他有一點超越了前此各家，就是，他在中國人中是第一個同情於革命同情於工人階級的中國社會史研究者。這一點優越抬高了他的地位，使他能在風雨如晦的現在獲得了廣大的讀者，使他取得了額外的聲譽。可是他在古史研究中的風頭已經過去了，行看後來的社會史研究者都是他的批評者。

現在已經踏入了古史研究的第三時期，從資產階級研究者的第二時期走入歷史唯物論者研究者的第三時期時產生了一個郭沫若。郭沫若在各方面都是個轉形人物之標本，在古史研究中也一樣。其笨拙的方法與蕪亂的成績及模糊的傾向揭示了轉形人物之特點。責成郭沫若來作道地的

馬克思主義者自然是強人所難能，而慨然地呼他為馬克思主義者亦未免過於奉承。以上是對左派文學家郭沫若所給的粗略的定性與定量分析。

就此結束了他。

在談中國社會史時還不應當忘記一個天才的波蘭猶太人。這位猶太人運用冰雪一樣的聰明，使用熟練的唯物史觀，根據少許翻譯的材料，大胆地，像猜謎一樣地，闖進了渺茫的中國之古代，居然得到了頗不壞的結果，猜破了許多謎，摸得了他的邊際，畫出了他的輪廓；雖然也鑄造了不少偏見，而拿一個不懂中國文的人居然能達到這步田地，總算是難能可貴了。馬克思主義者方法論之鋒利於此證明了。拉狄克是我們所知道的歐人中之最能正確地描畫中國歷史者。

在方法論上我於拉狄克無所指摘了。然而他有幾條弱點，這些弱點是他過去生活所決定的，現在轉而限制了他對中國歷史的研究，使他只能對古代中國作一個大致不差的白描，而不能把古代中國之圖畫詳盡地真確地復現於世人之前。

第一條弱點是他不懂中國文字。這是一切研究中國歷

史的歐人之共有的弱點，也就是致命的弱點。因為不懂中國文字，所以不能廣泛地利用豐富的史料而只能很偏狹地拘限於歐文譯成的材料中，所以往往自陷於粗略偏謬而不自知。而且這一個弱點很定命地限制了他，使不能超過第一步研究工作而深入挺進。自從脫離孫逸仙大學之後，拉狄克就沒再發表關於中國歷史的文字了。

第二個弱點在乎他不是個深思的學者而是個天資卓越儀表輝煌的新聞記者。他並不藏身於研究室中，亦不埋頭於字紙堆裏，他只在煙餘酒後，或是講演之前，聽一聽那一羣祕書的陳述與報告，看一看別人代他搜集到或整理好的材料，略加思索便登台發揮，如雲出岫，如瓶瀉水，一部中國革命運動史就是如此產生的。這裏面自然夾雜着很多疎忽，疎忽中自然又免不了偏見與謬誤。更重要的是這種情形禁絕了他繼續研究的可能。自從在政治上失勢以後再也沒有成羣的技術助手了，於是這位天才的記者便拋棄了中國歷史底研究工作。

第三個弱點在乎他站在派別鬥爭的立場上來研究中國史。這種情形使他有時不自覺地為某種主張或成見而犧牲歷史的真理。例如為着要證明現代中國社會為資本主義社

會而強逼秦始皇來作商業資本的代表，爲着要糟踏瓦爾加的荒唐而自己根本忽視了水的作用。而更重要的是，這種立場使他在脫離了派別鬥爭時放棄了中國史的研究，使他從這一派轉入那一派時根本推翻了自己的意見——現在拉狄克的著作已經不屬於拉狄克了。

雖然如此，這曇花一現的中國史講演總還是一本研究中國歷史發展之名貴的文獻，還是每個中國歷史研究者之必讀的作品，不過要提防他的偏見與謬誤以免害了自己而已。

以上把研究中國史之各家及其方法論加以簡約的陳述與評價，底下我們將概括地把我們研究中國歷史底幾個麻煩問題大略談一下。

我們研究中國歷史的方法同研究世界史的方法一樣，只有一種，就是歷史唯物論。在這裏要想把歷史唯物論介紹一下自然沒有篇幅。我只能介紹幾本古典著作來代替他。

第一本必讀的書是馬克思‘經濟學批判引論’。

第二本自然是樸列寒諾夫的‘史的一元論’，還有他一本短小而而精幹的著作，‘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問題’，還有‘唯物論史綱’上關於馬克思的一章。

昂格斯的‘家族私產國家之起源’也要讀，雖然不是討論方法論的著作，然而那裏面有歷史唯物論之具體的應用。‘資本論’也是應當翻閱的，假若研究者有時間。

現在我們只挑出兩個題目來討論討論：第一個問題是社會形態發展之階段及其在中國社會史上的應用；第二個問題是自然條件對中國歷史之影響及治水工程在中國歷史上的作用。

馬克思並沒有關於社會史的專著，他的著作都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然而他在各種著作中却往往談到資本主義前之各種社會形態。

他在一八五九年給‘經濟學批判’所寫的序言中有下面一句話：

‘在大體上，亞細亞的，古代的，封建的及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定為社會經濟形態之相續的時代。’

馬克思對他自己的話沒有加上任何註解，因此使許多人能夠濫用他的論斷以做出社會史的結論。

以最蠢的方法來理解馬克思者就是郭沫若。他在‘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第一七六頁上曾有下面的一段話：

‘這兒所說的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

古典的（即我們稱作古代的）是指希臘羅馬的奴隸制，……。”

何等漂亮的註解者！

可是讀者不要忘記，前一句話是莫爾甘‘古代社會’發表之前十八年寫的，而郭氏的話却寫於‘古代社會’出版的五十一年之後。馬克思於不曉得氏族社會的時候把亞細亞的社會放在古代社會的前面原不足奇。可是中國的昂格斯在熟讀莫爾甘之後還硬要把亞細亞的放在古代的前頭就未免太愚不可及了。幸而郭先生自己也覺察了這一點，他知道古代世界也直接與氏族社會相續，所以他對於亞細亞的理解就大大地不同於馬克思，他大胆地，無常識地修正了馬克思，說亞細亞的是指古代的原始共產社會。這真是天字第一號的荒唐，空前的名辭混淆！結果是亞細亞的社會就是氏族社會！又是原始共產社會！（如中國古史上的殷及殷以前）

對社會發展階段之食古不化的刻板的了解鑄成了郭沫若氏之普天大錯，他的奴隸階段論把他的著作拖進了無法拯救的泥坑。

對馬克思這種分段法加以必要的修正者是樸列寒諾夫。他在‘馬克思主義之根本問題’的第九節上曾有下面一段

話：

‘據馬克思說來，東方的，古代的，封建的及我們現代資產階級的生產方法可以作為社會經濟發展之相續諸時代。但是應該說，當馬克思後來讀到了莫爾甘關於原始社會的著作時，他大概會改變他對古代生產方法與東方生產方法二者關係之見解。事實上，封建的生產方法之經濟發展之邏輯引向一個社會，其標識為資本主義的勝利。但是像中國或古時埃及之經濟發展之邏輯絕對不會引來古代生產方法之出現。在第一種情形之下，我們所說的兩個發展階段是一個跟隨一個，一個產生一個。在第二種情形之下，倒是經濟發展之兩個並存的典型。古代社會瓜代了氏族的社會組織，而東方社會組織之前也是這樣一個相同的組織。這兩個經濟構造之典型都是氏族組織內部生產力發展而到頭來不得不崩潰之結果。’

這個修正是有力的，必要的而且正確的。馬克思的理論不是憑空構造的教條而是從實踐中抽引出來的結論，所以當新的事實發現而需要新的說明時，我們就必須對舊說加以補充或修正——只要是在不違背根本原則的條件之下。

氏族社會底發現使我們不能再把東方社會與古代社會看成相續的兩個形態而要把他看作並存的兩個模型。

然而從馬克思到樸列塞諾夫（以及不大值得提及的瓦爾加與馬札亞爾及其同人）對於中國歷史的了解都是模糊的，因此是錯誤的。

他們忙於許多理論的與實踐的工作，所以對於中國的歷史不能加以充分的注意，因此在談到中國問題時就不能不取材於歐洲資產階級學者所編的，歪述的，塗改了的，真偽雜陳的中國史，結果是因襲舊說而把波濤洶湧，儀態萬方，綿延三千餘年的中國史毫不經意地裝進了‘東方社會’之神祕的魔術袋裏，以致使許多馬克思主義者直到如今還不敢打開他。拉狄克是個大胆而佻皮的學生，他第一次揭去了這魔術袋上的封條。以後中國的研究者應該隨在他後面，根本撕破‘東方社會’這個爛皮囊。

這所謂東方社會也者究竟有些什麼特點呢？

第一是土地國有，

第二是社會事業是中央政府的職務，

第三是全國分作很多農村公社，每個公社都是閉關的自足的小世界，

第四是由治水的官僚利用水的調節來統治這些互不相關的小世界，專制政府便由此形成，

第五是永佃制(據馬札亞爾說)，

第六是地租採取賦稅的形式。……

稍為深入地研究過中國史的人都能證明這些特點在中國歷史上都未曾存在過。然而馬克思與樸列寒諾夫都未曾深入地研究過中國史，所以他們依然把中國劃入‘東方的’範疇。米夫對這種辦法所提出的嚴重抗議是極其正確的，他說：

‘亞洲生產方法的分析顯然與中國的具體歷史事實相衝突，因為此種經濟範疇，在實際上是混沌的，陳死的，沒有實際性的，抽象的東西。’(見馬札亞爾著‘中國農村經濟研究’第十四頁)

確是如此。西人眼中的東方社會是個死板的不發展的範疇。所以他們談起中國時好像談起一個木乃伊，好像三千年來的中國直睡到鴉片戰爭之前都未曾動彈過一下。甚至有人把中國當作一個單純再生產之標本國。這種觀點與馬克思主義是不能相容的。所以使我們不能不作更進一步的修正。

樸列塞諾夫說，馬克思讀過莫爾甘的著作後必然會改變他的社會發展分段法，我們說，假若馬克思與樸列塞諾夫深刻地研究過中國史，他們還會對階段劃分法加以更多的改變。因為中國的歷史實際指出，在氏族社會的內部懷育了封建的生產方法，因此在氏族組織的廢墟上所建立的新制度既非東方的，又非古代的，而為道地的封建社會。同時在封建制度破壞後，失業失地的農民却日漸淪入奴隸的狀態；而奴隸勞動的使用又日擴月展，下迫兩漢，終逮魏晉已有浸然泛濫全國的趨勢。假若沒有農民暴動之颶風與蠻族侵入之冰河打斷了這個過程，誰敢武斷紀元後之中國不產生一個奴隸社會（即所謂古代社會）呢？我們從此可以得到一個結論：

氏族社會解體之後不一定產生東方社會，也不一定產生古代社會，在他的廢墟上亦有建立封建社會的可能——這要看氏族社會之內部發展與氏族間的關係如何而定。氏族社會可以生育一個亞細亞的社會，如在古代的近東，亦可生育一個古代社會，如在希臘與羅馬，又可以生育一個封建社會，如在紀元前十二三世紀之中國，還可以生育一個特殊的社會組織，如南美洲印加帝國下的社會系統。

同時，當封建社會已經破壞而產生資本主義社會的條件尚未俱備時，亦有倒行逆轉，走到奴隸社會的可能——這也要看前者之自發展與自運動如何而定。紀元前後的中國還發展了大規模的奴隸勞動，而‘文明的’十九世紀中，‘民主的’北美聯邦裏居然施行着古典的奴隸制度。

總之，歷史是個活的過程，誰機械地固執了一種死的成見或方式，誰就不能真切地了解他那活的實際。

中國的歷史實際告訴我們，中國沒有劃然的奴隸社會一階段，更無東方社會一階段。在氏族的丘墟上產生了封建社會，而封建社會被分解後則繼之以被歷史拉長的過渡階段——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之過渡。這過渡階段是個異常駁雜的社會合金。這裏面有封建關係，有奴隸勞動，有資本主義關係。同時他又是變化多端起伏疊見的，在每個時期中，每一種關係的比重都有增加或減少——直到最近二十年，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才取得了決定的優勢，中國社會才變成了資產階級社會。這是歷史的真理。誰想用削足適履的方法來改造這豐富而多方的中國史使合於乾燥而刻板的表格，誰就是科學的罪人了。

關於社會發展之階段問題我們只能加以如此概括的討

論，而且不能不在這裏結束，因為篇幅不允許我們多寫。下面將再談一個問題——治水問題——就要結束我們的引論了。

治水問題為歐人研究中國歷史者所最重視的問題。自來歐洲學者以人工灌溉為了解中國史之鎖鑰，雖馬克思學派亦所不免。其實治水問題不但沒有作了了解之鎖鑰，却反而作了誤解之鎖鑰。很多天才的學者被水所困，因而走上偏邪之途徑，引至糊塗之泥沼。因此我們在研究中國古史時不得不先做一番‘治水’的工作，把這歷史上的神祕之水排洩出去，等到‘九川滌源，九澤既陂’的時候，才能認識中國古史的真面目。

西方歷史家提起東方時，首先就想到埃及，所以他們往往以古代埃及的情形來概括一切東方的國家。在埃及河水問題與灌溉問題確為人民生活上之最大問題。不但古代如此，現代依然是如此。英國之所以急於取得埃及蘇丹，所以這樣急忙地兼併烏甘達及克尼亞，及阿比西尼亞之所以能脫離意大利之絆羈而成獨立國，德屬東非之所以託英國代管，都是為着水。蓋東部非洲，羣山蟠結，衆水聚積，匯為諸湖，溢為尼羅，而維克陶里，唐那數湖實為埃及農業所生死賴之的水庫。使德法諸國掩有尼羅之上游，必設閘留水，引之灌

田，是黑人之鄉將變爲膏腴富庶之區而英國之萬頃棉田必淪爲沙哈拉之附庸也。所以水的問題到現在還是埃及的中心問題而爲其別於他國之特點。西方學者不習東方歷史，隨便把這個特點普遍化，裝在一切東方國家的頭上，於是全盤歷史都被他們曲解得不成樣子。中國歷史也是其中之一。遠的更不必講了，我們從德國的資產階級社會學家馬可司維伯爾開始吧。這些先生們，關於中國國家之發生編造了何等可笑的新神話啊！

維伯爾在他的著作中承認：

‘灌溉種植對於東方經濟(中國，前亞細亞，埃及)據有決定的作用。’

承認：

‘灌溉及水之調節決定一個有組織有計劃的經濟。……由此，在這些國家中才產生了建設的和治水的官僚制度。’(經濟史第五十頁，據馬札亞爾引)

拉狄克在與維伯爾辯論時也引他的話說：

‘他說中國的政權是超階級的政權，有學問的官僚之政權，這政權並保護任何階級之利益。’

這上面幾點意見差不多可以代表這一種主張之各要

點。歸納起來有四點：

第一，灌溉對於東方經濟有決定的意義；

第二，東方經濟水的調節而成爲有組織有計劃的經濟；

第三，因治水要有組織，要有特殊技術，所以才產生了國家，產生了能治水有學問的官僚；

第四，這種國家是不保護任何特殊階級的利益，因此也不是榨取機關。

這四點意見以各種不同的形式出現在各家著作中，甚至馬克思主義者亦不能擺脫此種謬見。

俄國有一個地理學家梅奇尼攷夫寫了一本很好的著作叫做‘文化與歷史上的偉大河流’。他在這本書中用差不多四分之一的篇幅來討論中國的黃河與揚子江。可是，他也與其餘歐洲資產階級學者一樣（他是個無政府主義者）把中國與埃及一樣看待。他說：被歷史上的偉大河流（揚子江與黃河亦在其中）

‘所潤滋貫注的國家，依情形如何，可以變爲樂園，在這樂園中，人們以數日的勞動就能準備好全年必需的生活資料；又可變爲墓場，佈滿了洪水，飢饉與疫癘

之犧牲者，無量數的死屍。爲着要開發這些河流所造成的特殊環境，必需有嚴格紀律化的工人之總和的努力——這些工人都是沿岸居民招集來的，這些居民又往往是成份非常複雜的人口，其言語，種族，風俗習慣又往往各不相同。長江的溝渠與黃河的堤壩比起埃及之金字塔與廟宇來，實在是更多的無數年代之人工組織的集體勞動。（梅氏書第一八九頁）

此後他又說明治水工程怎樣作了這些國家專制主義之基礎。

天才的馬克思主義學者樸列寒諾夫對於這幾點是同意的。他對水的理論同一般人相差無幾（參閱樸氏全集第七卷第二十二頁）。其實這也怪不得樸列寒諾夫。因爲：‘現代科學對於古代東方之社會關係之發展與性質之各方面的研究所供給的材料實在太少了。’（樸氏全集第七卷第二十八頁）

世界聞名大經濟學家，馬克思主義者瓦爾加也爲水的理論所誤而抄襲了陳腐的老調，他說：

‘中國的中央政權與地方政權是由調節水道，防止水患及灌溉田畝等等需要而發生的……因此中國的國家政權完全帶有和平性質。因此在中國組織了一種特

殊的統治階級……士大夫階級。’（見拉狄克引）

這種完全錯誤的意見在許多所謂馬克思主義者的中國通中有很大的影響。中國人所熟悉的馬札亞爾就是瓦爾加一流的水之理論家。他在中國農村經濟研究中特闢一章用二萬四千字的長文來討論水的意義。馬書流行頗廣，其水的理論當為讀者所共見，我不再多嘴了。

這有一個維特福格爾也維持樣一個古典的見解。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八號上譯登了他的一篇文章。根據這位先生的意見：

‘黃河與揚子江……自古即促成河道工程官僚政治。但是這河道工程官吏並不是中國最古的支配階級。……據中國歷史家所言，在紀元前三十世紀末葉，中國已經有封建制度。……〔但是〕支配中國的自然力是大河巨川，所以隨著農作的發達，河道工程官吏的勢力不能不增加起來。名聲嘖嘖的禹，其最大功績即在於調制河流，整頓山川。……九河清其水源，九湖築以堤防……全國遂入於和平之中。……’

諸如此類的胡言亂語充塞全文，結論是秦始皇用水的力量聯合農民打倒封建主義！因果報應全是虛言，喜歡水的

學者反被水溺斃了。

資產階級的水的理論也波及於中國，並且馬上找到了聽名伶利的學舌人——社會史專家陶希聖君。雖然鼓行千里，已成強弩之末，而十足的古典味亦頗有可觀了。看他在新生命月刊上發表的文章吧！

‘春秋以後，中國農業又有一個特徵，這便是灌溉。……漢代以後，治河通渠成了中央與地方政府的要政。治河的工程當然是需要大量人口集合勞動的。……所以嚴正明瞭地劃分土地為獨立的莊園，便不可能。這與歐洲中世紀不同，歐洲中世紀為乾燥農耕。……由此可知，中國統治階級的掠奪為什麼不取歐洲封建制度的典型的方式。……因此我們可以說：灌溉農耕的通行，是封建制度所以崩壞的決定原因之一。’（新生命月刊第二卷第五號：中國封建制度之消滅）

陶希聖的許多根本意見都與水的問題有關係：他那糊塗的士大夫階級論，他那官僚政府與農民的統一戰線論，他那自秦至最近的水利農業經濟制度論。

所引來的‘水’似乎太多了。現在我們要‘纘禹之緒’了，——把這些水都收集來一古腦兒送到海裏去吧。還我乾淨

的古代中國！

現在我先拿埃及與中國作一比較解剖，等到比較解剖的結果出現時，這些高明的理論就要玉山自倒了。

埃及位於非洲之東北角。夏季的季風攜大量的水份由大西洋東岸登陸本可以沐浴赤道以北的非洲，然一阻於西部的高地，再疲於數千里的長途，待以極微弱的左翼輕颺尼羅河的下游時，已成強弩之末，無雨可致了。至於北半球夏季時由印度洋吹向無風帶的熱帶風又根本吹不到埃及，亦不能增加埃及的雨量。待至冬季由亞洲大陸吹來的乾燥的貿易風又通吹埃及，洗刷了空中的水份，以致終年乾燥，通計四時雨量不足半英尺。這樣同蒙古一樣的地帶那能不以水為最迫切的要求呢？

因為雨量過少，所以埃及全土都是沙漠。除了尼羅河的水所能直接滋潤的河谷以外，不論向東向西，都是真正的沙漠。假若沒有一條大河，恐怕連居民都不會有，那裏還能鬧起那燦爛的文文之花！正因為如此，所以埃及人眼中的尼羅才是‘百穀的創造者’能給埃及以生命。（尼羅頌中的文句）

中國的情形是這樣麼？

中國古代文化的搖籃是黃河腹部的沖積平原及陝西中

部的涇渭盆地。四月至九月的季風自東南洋面吹來，帶有豐富的水份，因無高山屏障，所以往往深入內地二千餘里。古代中國人遂沾其惠而獲得了二十英寸至三十英寸的雨量，而陳蔡宋魯之間，雨量且達四十英寸。所以田肥美，民殷富，農夫往往坐待天時而不甚關心於河渠。我們如細嚼普遍全國鐘磬之上的‘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八個大字的頌辭及‘南風之薰兮’的古謠就可想像其一二了。

至於陝西中部的雨量雖較黃河下游為少，然亦在二十英寸以上。據農學告訴我們，在蒸發輕微而土壤含水量大的地方有十英寸的雨量就可以種麥植豆了，在普通的地方有十五英寸就可以了。陝西正在黃土區，土壤鬆而多孔，再加上二十英寸的雨水，不是理想的農業區麼？況且涇渭之間，百川雜流，橋隴諸山之水又多來歸，其滋潤之功當亦不少。‘周原膺膺，薑荼如飴’之詩不是絕好耕地之明證麼？要拿這樣的地方來比那長帶形的奧西斯（Oasis）未免太不類了。

再就河流的作用來看：看埃及的尼羅河怎樣，看中國有無他自己的尼羅。

我們前面曾說到埃及雨水是如何地少，假若不從他部取得那神聖的水，則全部沃壤將變為流沙瀚海，歷史上就不

會有金字塔的時代了。埃及却僥倖獲得了水。原因是埃及的南邊，有一塊大高原，是世界雨量很多的地方之一，每年平均在四十英寸與八十英寸之間，有時且超過八十英寸。這些水匯集起來，結成很多湖泊。然而水太多了，非這些湖泊所能容納，所以不得不另找出路，結果是蜿蜒北行，穿過沙哈拉，沒入地中海。所以尼羅河實在是將愛發齊奧皮亞諸山之水搬運來給埃及人灌田的水夫——沒有尼羅，那有埃及！

同時尼羅河又是埃及唯一的河。而且自柏柏爾以下一千五百英里的河身沒有逢到一個支流。以上種種情形決定了埃及的地理特點。

雨水既少，使他們不能不利用那水量豐富的河流，而這棕樹一樣大河又挺挺一千五百英里沒有一個枝河，又使埃及人不得不用人工的方法來利用那肥美的水。於是埃及人便動起手來，在尼羅的兩岸掘起無數的溝渠，把他變作了一個千足蟲一樣的河流。這樣，到了河水汎濫的時候，他們就可以遠遠地注引，久久地留難，多多地吸收——這樣就準備了他們半年的糧食。由此看來，河渠工程與人工灌漑實為埃及人生活所寄託的地方。沒有尼羅及其溝渠，就沒有埃及了。這是其他國家所能比擬的麼？

反觀中國的古代，則雨水足用，農業不依河水；而河流的作用又不是搬運別處的水來溉本地的田，却是把本地的水輸送出去；同時河流交錯，川渠縱橫，而人口稀少，大都倚河而居，亦無渠工程之必要。所以直到戰國的時候，才伴着‘盡地力’的農學而發生水工於三晉高亢之區。秦人築渠在紀元前三世紀之五十年代，上距周人建國快一千年了。

而且這些河渠工程的範圍並不廣泛。秦築鄭國渠為歷史上大書特書的事蹟，是最大的水工，而計其所灌溉畝數不過四萬餘頃，所佔地面，方百里耳。這比起埃及的河渠工程真是小巫見大巫。何況大多數的平原居民還不知人工灌溉為何事呢？治水官僚從那裏產生起呢？

瓦爾加及陶希聖說歐洲是旱耕而中國古代則為灌溉農業，據說由此而產生了兩個封建社會底不同之點，未免是瞎三話四了。

人工灌溉問題大略地剖視了，現在還要談談與洪水鬥爭的問題。

各種口徑不同的水之理論家都承認中國有過洪水，或者常有洪水，因此與洪水鬥爭是政府之主要任務，甚至有人說，中國的政權是從‘水’中產生出來，因此是和平性的，是沒

有階級性的。在這個問題上，他們還是把中國與埃及同樣看待。

關於紀元前二十二世紀的洪水，及大禹如何治水，以及那時如何因水的工程而發生了國家，這一派胡言亂語，雖然還有很多西歐的蠢才相信他，而大多數研究中國社會史的人都把他視為無稽了（熊得山是個例外，他相信因為治水而形成了夏代的封建國家）。地質學家丁文江博士確定垣曲以上不能有河患，而江河又都是天然的水道，沒有絲毫人工疏導的痕迹，所以禹治水之談絕不可信。其實那時下游的水患也不是十分利害的水患，更不是普遍的水患。因為殷以前地曠人稀，而居民又始踏入農業階段遊動無常，所以當水患發生時，他們就不來治水，也不能治水，而只能逃水。殷人多次遷居，與黃河汎濫或不無關係。自盤庚居殷以後七百餘年未曾移動亦當是因為沒有水患而能在農業上邁進的緣故。同時，古代的河患一定沒有後世那樣厲害。殷周之際，人口稀少，墾地有限，叢林茂草覆蓋了當時的中國，大河所挾水量與沙量亦必遠遜後代，其為患自然要少。何況那時下游各地又佈滿了湖泊澤沼，足以調濟黃河之緩急，亦當為水患稀少的原因之一。所以那時一切文獻上都找不見關於水患的記載。

自從周室亡殷，西人東殖以後，情形稍變。那時黃河下流的農業日進月展，居民逐漸繁庶，河水的汎濫才成了問題，或者從春秋時起才有了防水的工程。然而那時的河患必然還是很少，因為減少河患的主要條件——山林與湖澤依然存在。是以有周一代的文獻中向無河決的記載，而下游之趙魏齊魯諸國為當代文化所萃，著作如林，亦罕言水患者。

就以上看來，殷以前實無河患（秋水汎濫與河患是兩回事），春秋以後因略加堤防，又有湖澤蓄水，所以水患當亦很少。建築在河患上的洪水說，建築在洪水上的大禹治水說，建築在治水說上的夏代政權或以後政權的發生說實在都是最廉價的謊言，不值得一談。

至於黃河的堤防自然是那時政府的事務之一，然而並不是主要任務之一。秦對魏的威嚇有‘決滎口，魏無大梁；決白馬之口，魏無齊陽；決宿骨之口，魏無虛頓丘’諸語，自可證明當時黃河兩岸已有相當堤防。然而河政既非國家要政，所以謀臣策士亦不談河事。我們決不可拿現在的河堤來比擬當時的河堤。蓋愈至後代，河患愈烈，河堤愈固，代代增修，遂成今日之大觀，紀元前中國恐未能逮其十一。在這種情形之下，而主張與水鬥爭為政權發生之原因，或是把他看

作破壞封建與促成統一之要因，就難免於信口雌黃之譏了。

至於埃及的情形，則與中國判然不同。第一，因為埃及每年必有汎濫，使防水的工作成為經常的工作，而且沒有汎濫，就沒有飯吃，所以使埃及人不得不希望他汎濫，又不得不設法駕駛這發怒的洪水，所以才起了大規模的河工。第二，尼羅河谷只有窄窄的一條，東西都是沙漠，南邊是荒山，北邊是海，僅一土腰可通亞洲大陸，而那裏却住着強悍的遊牧民族。這樣，凡是可耕的地方都有洪水，凡是沒有洪水的地方都無法謀生，這真像‘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一樣，使埃及人再也無法擺脫這可愛而又可畏的洪水，結果不得不以高度的技術，詳密的計劃，把沿尼羅河的一切居民都組織起來，以集體的勞動來防範洪水。或者是在這上面建立了統一的國家，或者是在這種紀律勞動的基礎上發生了專制主義。這與上述古代中國的情形那有一點共同的地方？所以，中國政權由治水產生（瓦爾加……），治水工程促成了封建的破壞及中國之統一（陶希聖），中國的河工產生了專制主義（梅奇尼攷夫及樸列塞諾夫……）等等之類的高見實為明白兩國歷史特點者所不屑駁斥的謬論。

我在上面幾頁中以極粗糙的筆墨反駁了水之理論，同

時所論列的問題又多是我所不甚熟悉的地理學上的問題，所以不敢相信必無錯誤。然而我確信水之理論始終是了解中國古史之障礙，水之理論必然幫助資產階級學生來曲解中國古史而抹煞古代國家之階級內容，所以我的論辯雖不必成功，然而我的結論却是不可動搖的。

我想就在這兒結束我的引論了。引論中對各家的評價都過於簡略，對社會史階段問題及治水問題的論列亦過於粗糙。然而一本小冊子底頁數却不允許我寫那過長的引論，使我不得不把許多可以寫成專書的題目勉強塞在這印不滿一張紙的論文中——因此我自己也原諒我的簡略與粗糙了。

★.....★

德國農民戰爭

恩格斯著 錢嘯秋譯

本書是辯證唯物論的大師——恩格斯用自己的方法，寫成一本世界馳名的傑構。他以銳利透闢的眼光，縱橫奔放的筆調，剖析德國歷史上最繁複的事變。關於農民戰爭的原因，過程，結果，以及當時各種黨派的主張與活動，都有詳細的論述。全書在十萬字以上（內有著者第二版長篇序文與俄國梁山諾夫一萬五千字左右的註譯）。現由錢嘯秋先生根據三種外國文字譯出，譯筆忠實流暢。可作世界史上重要文獻讀，可作研究歷史的方法論讀。全書在印刷中，不日出版。

★.....★

中國社會史研究上

之若干理論問題

——關於陶希聖，朱新繁，嚴靈峯——

田中忠夫

- I. 辯證法的問題
- II. 社會形態之發展階段
 - (1) 發展階段之決定目標
 - (2) 諸家之批判
- III. 支配底生產關係
 - (1) 支配底生產關係之意義
 - (2) 諸家之批判

I. 辯證法的問題

就是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上，我們爲求科學底地將中國社會之歷史底發展過程，正確地去把握去理解，也必須照在唯一科學的正確的方法論——唯物辯證法——之光下，加以觀察；這事，只要是想參加論戰的人們，立刻就應該會理解的。

所以，在中國社會史的論戰上，竟首先提出這方法論的問題，而就這問題作着論戰，我相信是很可喜的傾向。

在方法論的論戰上，嚴靈峯先生把所謂“新思潮派”徵求論文時所使用的論題：“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從辯證法的立場，當作論爭問題提了出來。因此，我現在想把這個問題做論戰的端緒。

嚴先生說：

“‘中國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的經濟？’我們知道，形式邏輯中有這一調最通用的方式：‘是——是和否——否’。在這一點上，便充分的證明了，新思潮社的根本精神沒有理解馬克思主義的‘辯證法’；因爲他們不會在具體的研究問題當中提出這樣的

公式：‘是——否和否——是’。”——動力第一卷第一期，112頁。

據嚴先生所論，則謂新思潮派之提出這種問題，單祇這問題的本身，就違反馬克斯主義的辯證法。然而，他之所論，究竟是正當的麼？這裏，我要把這點稍稍徹底地加以檢討。

我們現在當作研究之對象的中國社會，也是在運動着的東西。你們如果問：這種在運動着的中國社會，在所與的時候，在所與的階段上看得出來嗎？恐怕你們再怎樣誠心誠意些，依從形式論理學的公式：“是——是和否——否”，是不能夠解答的罷。這運動體固能在所與的場所看出，而同時在那裏又看不出來的。關於這，除非用辯證法的公式：“是——否和否——是”，則不能判斷。這樣去觀察時，嚴先生對“新思潮派”論題之非難——說是反辯證法底的非難——纔能看作是妥當的。

我說過：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對於運動是不能適用的。但是爲的不欲與這命題以誤解的理由，却須加以辯明。當我們遇到關於社會形態的發展過程，從一種別到另一種別——例如從封建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的問題時，我們仍須根據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去推論的。就是：

這發展的過程，是封建社會呢？是資本主義社會呢？還是什麼呢？因為縱令中國社會形態是變化着的，然而爲要變成質底東西，却不能不使其變化達到某種量底界限。忘却這事，就會喪失說明關於對象的性質之決定底判斷之可能性。

然而，如果是這樣的話，則形式論理學的根本法則，在某種限度上，對運動也能適用。但由此又可以歸結到：辯證法并不撤廢形式論理學，而祇是從它的法則上，把形而上學者所賦與它的絕對底意味剷除而已。

“新思潮派”的論題，是關於：對一個“現階段上的中國社會”的被給與的對象的，一個“封建底嗎？”的被給與的性質之依屬的，限定的問題，喪失說明對於這個限定的判斷之可能性的人們，纔是亂用辯證法的。

嚴先生對“新思潮派”之論題的攻擊，在這個意義上，不能不說是無的放矢。

如嚴先生所說的：沒有“單純”底資本主義經濟或“單純”底封建制度經濟的事，這只要略知方法論的人，誰都會曉得的；至如問“中國是資本主義經濟，還是封建制度經濟？”，這却可以提出這樣的問題：在由封建制度經濟到資本主義經濟之過渡期的中國社會，哪一種生產關係是或不是

支配底生產關係；而嚴先生自己論及中國經濟，也作着和這同樣的答覆：

“我們承認：中國社會經濟中是資本主義成分佔‘支配’或‘領導’的地位”——動力，第一期，第4頁。

II. 社會形態之發展階段

(1) 發展階段的決定目標

表示社會形態的諸種發展階段之決定的目標，據馬克斯主義看來，是生產方法及作為其結果的階級之根本關係，而不是剝削之現在的形態。

“物質生活的生產方法，規定社會的，政治的，及精神的生活過程一般。”——馬克斯著：經濟學批判序說社會底諸生產關係之總和的社會形態，也是為其經濟底基礎的生產方法之結果，是其上部構造。

然則，所謂封建底生產方法者，是什麼呢？首先，我們要來檢討士威得羅夫的見解。

他說：

“奴隸所有社會與立在大規模生產向上的經濟組織崩壞，并推移到封建制度，這是與生產方法的變化相

聯結的。這種變化，主要不發生在農村與農業方面；而發生在都會與手工業方面。故持有與手工業生產不分離關係的佔主位的手勞動，為封建社會的技術基礎”。

但是士威得羅夫的見解，太着重於技術。誠然，在封建社會，幫助手勞動的工具很進步，而能使生產力向上；並且技術作為生產力的構成要素，是表示生產力發展之一定的程度的，可是，有如不是生產力的本身一樣，它雖能表示生產方法之發達的一定程度，却不是生產方法的本身。生產方法，作為生產力的結合作用，纔表現得出來。一定的勞動力，一定的自然力，一定的技術，相結合以後，纔發現一定的生產方法。生產方法，原是勞動過程中所生起的人們的相互作用。那作用在反復地做下去時，纔能認為是一定的生產方法。所以，我們可以把一定之產業上產業之經營上生產者相互間所起的一定的作用，稱之為“生產方法”。

所以，士威得羅夫的生產方法論是過於偏面的。然則在如上所述的見解上的封建底生產方法，是什麼呢？據馬克斯說：那是勞動者直接占有生產手段及勞動諸條件，為求他自身之生活資料的生產方法（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更具體的說，是“由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統一而形成的”。（同上）

從這種封建底生產方法，遂發生一定的封建底生產關係，其總和復形成封建社會之經濟底基礎；可是封建生產關係上，和其他的生產關係上一樣，最基礎的關係，是生產手段所有的關係。而封建底生產方法上所謂生產手段者，是土地與工具；而其所有者是領主（地主）或主人。所以在那占有者的農民或職工之間，可以形成封建底剝削關係，即封建底階級關係。這就是我們所謂的“階級之根本關係”。

我們說過：表示社會形態之發展階段的決定底目標，不是剝削之現在的形態；那必須是現在的剝削關係。

馬克斯也這從點論及封建底剝削關係道：

“(這種)所有關係，同時必致表現為直接支配與隸屬的關係，因而直接生產者又必致表現為非自由者，這是明顯的事——這裏所謂之非自由，是包含從徭役勞動的農奴制到漸次低緩了的單祇貢賦義務——……他作為一個獨立的生產者，以經營其農業以及附屬它的農村家庭工業。……在這種條件之下，為的使他們替名義上的地主作剩餘勞動，無論是怎樣的形態，都不外是用超經濟的強制。”——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

因此，可以說：所謂封建底剝削關係者，是名義上的生

產手段所有者，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從獨立的生產手段占有者之直接的勞動者，榨取剩餘勞動的剝削關係。

所以農奴制，在封建社會誠然是極重要的特色，但其形式的廢止，決不是說這個社會的完全克服；而反之，農奴剝削者之領主制的形式的廢止，也決不能表示這個社會的完全克服。封建社會，和其他的社會形態同樣，有它的諸種的發展期和沒落期。我們決不能說：因為農奴制和領主制的本身既廢止，封建底生產方法及封建底生產關係，以及其政治上的支配底上層構造，就要隨之同時消滅。

其次，如將封建底農奴制度的經濟底體制之與資本主義底體制的異同，加以考察，我相信就可以明白封建底農奴制之本質底特徵。關於這點，伊里奇說的很詳細：

“封建底農奴制之經濟底體制，在一個關係上，是和資本主義底體制同一的。就是：無論在那一種體制上，勞動者只能得到自己之必要勞動的生產物，而剩餘勞動的生產物，却要無代價地讓給生產手段的所有者。然而農奴制的經濟底體制，則在三種關係上和資本主義底體制不同。就是：第一，封建經濟是一種自然經濟，反之，資本主義經濟則為以貨幣為基礎的經濟；第二，

封建經濟，置剝削之基礎於勞動者之隸屬於受自領主土地，反之，資本主義則將基礎置於所謂從土地解放勞動者的事上。領主＝地主，爲求取得所得（即剩餘勞動之生產物），須將土地的一部分及農具，家畜等等給與農民，而把他們束縛在土地之下。因爲沒有土地，家畜，農具的農民，對於領主，並不是好的剝削對象。反之，資本家爲取得所得（利潤），却無須土地和農具，但求能在自由勞動市場上盡量出賣自身勞動力的勞動者的存在。第三，領得了一部分土地的農民，必須個人底地隸屬於領主之下。因爲他們既有了土地，而若不加以強制，便不替領主勞動。經濟底體制，於是便生出農奴制的‘超經濟的強制’——即法律底隸屬，權利之不平等。反之，資本主義的理想，則是自由的市場上，所有者與無產者間的契約之完全的自由。”——全集第九卷。

這種生產諸條件的所有者們，和直接之生產者們對立的直接關係——封建底階級關係——，據馬克斯看來，其時時的形態，雖然作爲自然的順序，適應於勞動之方法及樣式的，以及勞動之社會底生產力的某種一定的發達階段，然而這個關係，正是顯示全社會底構造的，因而又是主權對隸屬

關係之政治底形態的，簡言之：是表示其時時之特殊國家形態的，最內部的祕密，穩祕的根底的（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

同一的——從主要諸條件上所見的同一的——經濟基礎，雖然也能替自然諸條件，八種事情，外部發生作用的歷史底諸影響，以及其他如無數相異的實驗底諸事情等等，在現象上顯示無限的變異和濃淡，然而與這事是沒有妨礙的。這些變異和濃淡，只有由於在實驗上所與的如上諸事情之分析下才能理解的。（同上）

（2）諸家的批判

我原是想從如上的觀點，來討究中國社會形態之發展階段的；所以這裏首先就想將“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場上的諸家的意見，略加檢討。

（A）陶希聖——

陶希聖先生說：

“封建制度不過是現物地租及徭役勞動，人與人間之隸屬關係及地主之政治支配，三個要素相結合而成。”——陶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第96頁。

這個見解，沒有觸到指示社會形態的發展階段的目標，和生產方法與作為其結果的階級之基本關係。而是只講到剝削形態的誤解。所謂“現物地租”，“徭役勞動”等等，都不過是封建社會上種種的剝削形態。

封建社會上根本底階級關係，是名義上的生產手段之所有者，與直接生產手段之占有者之間的超經濟的強制底剝削與被剝削關係。所以，并不是如陶先生所說的：

“1.封建制度建築在土地制度上面，他的基礎是農村。

“2.封建制度下面，土地的領主和掌握政權的封建貴族。”——陶著：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258頁。

的二大特徵，因而也不能拿如陶先生所說的：

“1.等級關係的崩壞；

“2.戰爭的連續；

“3.社會紐帶的鬆解；

“4.個人及社會階級對社會再建之無力；

“5.士大夫階級的勃興及官僚制度的成立。”

(同上書)

五個特徵，來作封建社會分解之徵象。因而，也不能如陶先

生所說，以爲這五個徵象既已表現於春秋戰國時代，就拿這春秋戰國時代，來作中國封建社會的分解期。

陶先生又說：

“春秋戰國時代，是社會變革的時期，社會變革的實際，卻不過封建制度的分解。”——陶著：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255頁。

春秋時代雖是重要的社會變革時期，但在那時，無論是中國的封建底生產方法，或封建底階級關係，均未改變它的本質，而只不過將剝削形態乃至政治上的支配底上層構造，稍形變革；所以不能用這變革來作中國封建社會的分解。封建社會在中國，也有許多的發展期和沒落期的。

在春秋戰國時代，如陶先生所說：

“有貴族階級的分解。莊園破壞，及農業技術的進步，使小規模土地經營爲有利，一方面軍事貴族爲確定收入，以土地爲標準而課稅（稅畝），於是農奴上升爲自由農民；他方土地買賣自由，使農民有喪失土地事實。於是農奴分解爲自由農民及無業而售身的奴隸。”

這樣，中國封建制之“歐羅巴”底形態的農奴制，自廢止以來到很久的今日，這事是說明什麼呢？小農業及家庭手工業，

與土地共有之最後的殘骸的統一，更是隨着農奴制的廢止，而成爲中國封建社會之經濟底基礎了。被解放了的獨立的自由農民，是剝削的根源；政治底權力，則握在安座在帝國底君主政治與軍事底專制政治中的那地主及官僚階級之手中。但是和那同時，却發生了只不過使農民增加了新負擔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這整個的發展，不是說明封建制廢止了的事，反之，却是表示：每當新的農業革命及政治底變革發生時，愈其要被再生產——然而是在破壞生產與農村的愈益尖銳的形態上被再生產。

(B) 朱新繁先生——

朱新繁先生，據嚴靈峯先生說，是陶先生的“論敵”（讀書雜誌第四，五期），然則朱新繁先生的見解究竟怎樣呢？

朱先生把他考察社會形態之發展過程時的觀點，約如下述：

“當我們研究社會的經濟結構時，要把主要的條件從次要的條件中分開，首先研究這種經濟結構的一般的經濟基礎，然後再分析那決定某種經濟結構的“當時實際環境”。……根據這種態度，當我們研究一種經濟

制度時，首先研究這種經濟制度的剝削關係。……所以我們要研究封建制度時，首先要看封建制度的剝削關係。”（9頁）

我以為這種研究方法是很對的。朱先生在他的研究方法上，我們不能不說是本質地要比陶先生強些。

所以朱先生主張：直到現在，中國有封建勢力存在——封建制度存在，以與抱其反對見解的陶先生及拉狄克論辯；而對於拉狄克，也從研究方法上，作着如下的攻擊：

“拉狄克的錯誤，在於他不從剝削方法上立論，而從剝削者的出身及其剝削的目的上立論，所以要看‘中國無所謂封建勢力’的奇妙的結論。”——（第19頁）

對於朱先生的這個結論，也可以不加躊躇的表示贊意，但是朱先生一面雖握有正確的研究方法，然而又有不能使其研究方法徹底的缺點。那缺點就在：朱先生不注意階級的根本關係，而只看現在的剝削形態。

朱先生說：

“現物地租是封建剝削的主要形式之一，而在中國，現物地租一直到現在，還是普遍盛行於各地，明清以前，自然更不用說了。

“以上所引據的種種說明，可以看出在春秋戰國以來，地主與農民的關係，完全是名義地主從獨立生產者的農民的身上，用超經濟的壓迫，以榨取其剩餘勞動。因而完全是封建式的榨取。”——32頁

這文章看起來，表面上到似乎并未囿於剝削形態，而其實際，仍未脫出剝削形態的看法。“現物地租”的本身，本非封建底剝削，而是因為名義上的地主，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以剝削獨立生產者農民的剩餘勞動之故，才成為封建底剝削。所以，只要具有這個本質，則無論是從農奴或自由農民，凡欲以役徭，現物，貨幣的形態來徵收者，都可以算是封建底剝削。

馬克斯說：

“貨幣地租——那雖然是行將崩潰——的基礎，與為其始點的現物地租之基礎是同一的。就是，直接生產者由於相續或其他的傳統，依然是土地的占有者；而須將強制底超過勞動，換言之，即須將不受相等的代價而須給付的無償勞動，以轉化成貨幣的剩餘生產物的形態，支付給為這最重要生產條件所有者的地主之手中。”——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

但如由這勞動地租轉化為現物地租或貨幣地租，雖然都是用超經濟的強制手段來剝削，但其強制的方式是有變化的。就是，在勞動地租上，是直接生產者的剩餘勞動，被地主或他的代理者，在直接的監督及壓制之下來剝削，而在現物地租或貨幣地租上，則非在用直接的壓迫或鞭笞的強制之下，而是為事情或法律上的規定所驅使，在自己的責任下，非償付其剩餘價值。

然而這依然是超經濟的強制；是在土地私有的情況下，并在地主之政治底權力的立法下，用超經濟的手段來強制的剩餘勞動之剝削；因而也是封建底剝削。所以，只要有名義上的地主，和直接占有者的獨立底農民生產者；只要有在其間有剩餘勞動之超經濟的強制底剝削，都可以說是封建底剝削關係或封建底階級關係。

朱先生舉示以下五項為超經濟的強制底剝削：

1. 地主徵收農民的農產品，往往超過百分之五〇以上，乃至百分之七〇至百分之八〇；
2. 租額以外，還有其他各種農民對地主的必需的貢獻；
3. 徭役制度；

4. 地主對農民的統治特權；

5. 等級關係的森嚴。”——30頁

以上五項內，(1)(2)(3)是表示剝削之量乃至形態的，而不是表示剝削之本質的。是否是封建底剝削，不在量和形態的問題，而在其剝削的本質。所以無論是地租將從現在的量數減少百分之二五，其形態將轉變為貨幣，或者是規定以外的惡規行將廢除，但只要有名義上的地主存在，而作超經濟之強制度剝削，那就是封建底剝削關係。

朱先生的見解，是如此的不徹底，所以臨到所謂布爾喬亞民主主義革命的實際問題時，就不免有和布爾喬亞改良主義妥協的可能性。

(C) 嚴靈峯先生：

我們因為是：不在其剝削形態上，而在其本質上來看封建底剝削關係乃至封建底階級關係之故，反對了陶朱兩先生；而由於這同樣的理由，只在這一點上，却反而贊成嚴先生的見解。

嚴先生說：

“最可笑的就是他們(新潮社——筆者附加)抱定

以中國農村的剝削形式來作說明農村經濟封建本質之唯一之論據。特別是以數量來決定一切問題（不是一切——筆者註）。

“他們認為封建剝削關係主要的論據：‘地主向農民徵收百分之五十至七十的地租’，‘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地主完全不參加生產’，‘自然品地租’等等。其實都不是主要的方法。我們以為地主自然要‘依靠着土地所有權來剝削農民’的，這正如資本家要依靠着資本權來剝削工人一樣。”——動力第二期第59頁。

他更論及封建底剝削關係時，一部分到還正確，一部分却犯着重大的錯誤。

“他們根本不了解封建的剝削與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上根本的不同不在於剝削數量之多少，而在於公開的強制性之如何。封建領主雖然公開強迫農奴的貢稅，但當天災水旱還幫助農民。資本主義的剝削是在形式上平等和名義上自由之下悲慘的剝削工人。”——同上，第60頁。

誠如嚴先生所說：封建底剝削關係之本質，不在其剝削形態，亦不在其剝削程度，而在其本質——即公開底強制

性。和這同樣，資本主義底剝削關係，也應該是不能由其剝削形態和剝削程度來決定的。然而嚴先生卻不留意地表明出將自己攻擊人的話來攻擊了自己。而說：“資本主義的剝削形式”。然則是說工資——姑無論本質如何——就是資本主義底剝削形態麼？這據我看來是一個錯誤。

且從馬克斯舉一個例證：

“現物地租之貨幣地租化，不僅更使爲貨幣而將己身給他人雇傭的無產日傭勞動者的一個階級必然地伴之成立，而且是依此而先行着的。所以，雖然在這新階級還不過說是開始在這裏那裏散佈的發生期，在居於較優良之地位的負有支付地租義務的農民們之間，就必然地發生出：用自己的計算從農村賃銀勞動者來剝削的習慣。這恰似在封建時代，富裕的隸農們，雇傭他們自身或奴隸一樣。”——資本論，第三卷，第二部。

在這場合，富裕的隸農們，對於雇傭的隸農之報酬，和資本家對勞動者的報酬相同，是取的勞賃之形態；但因此怎能就說它是資本主義底剝削呢？

嚴先生在前文中，又說着什麼“封建領主”之對“農奴”的“貢稅”，什麼“農民”，不過，剝削者令縱是“封建地主”，

“地主”，或者不是私底地主而是國家，只要剝削者是“名義上的地主”，就適於封建底剝削的一個條件。同樣，無論被剝削者是“農奴”，或是“農民”，但凡被剝削者是“獨立的農民生產者”，也適於封建底剝削的一個條件。並且，不管剝削形態是“貢稅”，“地租”，“現物地租”，或者是“貨幣地租”，只要其剝削是由於“超經濟的強制”之剩餘勞動的剝削，就與其形態無關係，而是封建底剝削。

III. 支配底生產關係

(1) 支配底生產關係之意義

社會是以諸生產關係的總和爲其經濟底基礎的，但那不是算術的總和，而是有機的總和。在這樣的社會裏，有支配底生產關係和被支配底生產關係；支配底生產關係，優越於被支配底生產關係，而由於支配底生產關係性質之如何，以決定特定的歷史社會形態之性質。

可是，何謂生產關係之支配性乃至被支配性呢？我們不能不把這點嚴密地規定一下。

關於這，我們也可以向馬克斯求正確的答覆。

“一切的社會形態上，都作着某種特定的生產，這

生產超過一切之上，因而這些關係又是在其他的一切關係內指示等級與勢力的。

‘這是一種普遍的照明，一切其他的色彩，都暉映在這之中，而能修正其特殊性。那是一個特殊的Aether（媒介），而規定在其中表現出的一切存在之比重。

“譬如拿遊牧民族來作例子（單單的狩獵民族或漁獵民族，是在現實發展之始點以外的）。在他們，生產為農業之一定形態的散在底農業。土地所有權則由此而決定。土地所有權是共有的。而這些民族，則以保守其傳統的程度為比例，而能維持這形態的多或少。例如斯拉夫民族內的土地所有權。有如在古代社會及封建社會似的，在農業占優勢的定住農業民族，——這所謂定住於土地的事，已是很大的進步，——工業與其組織，以至於適應工業的所有權之形態，也多少帶着土地所有權的形態；社會則像在古代羅馬，完全倚靠農業；或者像在中世，都市以及都市的諸關係，都做鄉村底組織。資本的自身——只限于非純粹的貨幣資本——在中世，也是作為傳統底手工業工具(?)等，帶着這土地所有權底性質的。

“在市民社會上，恰是相反。農業漸次成爲單單的一個產業部門，完全爲資本所支配。地租也是同樣。在土地所有權支配下的一切(社會)形態上，自然關係仍佔優勢。在資本支配下的形態上，則係社會底歷史底地所創造的要素佔優勢。不理解資本，便不能理解地租。可是不理解地租，則不能充分理解資本。資本是支配市民社會之一切的經濟力。它是出發點，同時也就是終點。……”經濟學批判，46—4 頁。

據馬克斯的見解，則所謂支配底生產關係者，是將在其他的生產關係裏或在自己的生產關係裏都有的生產方法乃至生產關係，加以彩飾的一種生產關係。在封建社會裏，是土地所有者，使獨立底農民生產者隸屬於土地，再作超經濟的強制底剝削，而係農業佔優勢；但在都市手工業以至于商業上，則是店主或商人，使獨立底職工或徒弟乃至店員，隸屬於工場乃至商店，由是以作超經濟的強制底剝削。所以這種農業生產關係，是支配商工業底生產關係的；農業生產關係，就是支配底生產關係；而這樣的封建的諸生產關係之總和，成爲經濟底基礎，而形成封建社會。

其次，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對於封建底生產關係，是

否是立於支配底生產關係上，據馬克斯說，應決定為如下的標準：

1. 農業是否是作着單單的一產業部門？
2. 農業是否完全為資本所支配？
3. 地租是否完全為資本所支配？
4. 諸生產形態上，是自然關係佔優勢，抑是社會的歷史上所創造的要素佔優勢？
5. 資本是否是支配一切的經濟力？

所以，我們為答覆：在現代中國，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對於封建底生產關係，是否是支配底生產關係之問題，不能不將這五個前提明確地從具體底現象形態及其本質，科學底地加以考察。

(2) 諸家之批判

(A) 陶希聖先生

陶先生在作結論說：中國社會今日是宗法封建社會，并且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對於封建底生產關係，不是支配底生產關係（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時，究竟是根據了怎樣的標準呢？

陶先生在這場合，并不注意及上述的那種正確的標準，而從這樣的問題出發：

“戰國時代，中國已有了商業資本，爲什麼直到現在中國資本主義始終不能得到進一步的發達呢？”——

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31頁

而分成三個問題來考察：

第一，中國資本主義何以不能有進一步的發達？

第二，封建思想是什麼勢力保存着的？

第三，西洋和中國是不是泛泛的通商？

作爲這些問題的回答，舉出了四條結論：

1. 資本主義發達的桎梏是封建勢力。
2. 封建思想因封建勢力而得保存。
3. 帝國主義的侵略，使中國的產業和資本階級發達。
4. 中國社會構造雖起變革，而看不見封建思想的破壞，與民主革命的成功。

引出以上的四項結論，或者是由於我對陶先生的見解不充分了解的原故也未可知，但在我，從陶先生之把問題提出乃至答覆的態度看來，相信引出如以上的結論，是很合乎

陶先生的見解的。如果我誤解了的話，還希望陶先生原諒并指教。

把陶先生立論的標準和馬克斯的比較一下，則陶先生僅祇是馬克斯的標準的第五項之不完全的答覆；并且可以說是對第五項之答覆的必要的理由和程度還不十分理解。

從陶先生的無意識的答案之內容，探求相當於對第五項之答覆者，有以下數端：

1. 資本似已能對商工業投資。
2. 由於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的商品，已與手工業商品相競爭。
3. 外國的資本輸入，在中國商埠內發生了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
4. 中國發生了產業資本家。
5. 中國產業資本家，附庸於外國資本。
6. 金錢的崇拜代替了身分的崇拜。

但是地主官僚對商業的貨幣資本之投資，——由於輸入外國商品的買賣之增加，——即所謂商業資本的發達，是意味生產還未隸屬資本的事。馬克斯說：

“資本作為商人資本，獨立優勢底地發達的事，和

不能使生產隸屬於資本之下，換言之，資本是在一個外來的，從它本身獨立的社會底生產形態之基礎上發達的事，是意義相同的。商人資本之獨立的發達，這樣一來，和社會之一般的經濟的發達，正是反比例。”——資本論第三卷第一部。

并且，金錢的崇拜代替了身分的崇拜，也并不是說：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之要求，發生了可以認為自明之自然律的階級。金錢的崇拜，是在商人階級裏面，或在商業資本發達的各國內及其他的階級裏面，都可以發見出來的；而金錢的崇拜，不一定就是資本的崇拜。

在樣，不能不說：陶先生的中國社會之資本主義化，論證得很不充分，并且在反面，中國社會之封建性的肯定，也肯定得很不充分。

(B) 朱新繁先生：

朱先生說：中國的封建制度從十九世紀末葉開始崩壞，舉其理由為以下數端（第 39 41 頁）：

1. 由於帝國主義商品之輸入，商品經濟優越於自然經濟。

2. 城市中資本主義底生產方法之發生。
3. 農村之階級分化。
4. 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之發生。
5. 資產階級意識形態之發生。
6. 革命運動（主要是資產階級民主革命——筆者註）的興起。

這六項，雖足以表示中國封建底生產關係之崩壞，以及其反面，中國資本主義底生產關係之發展；但僅以此，還不能決定中國現社會形態之爲封建社會抑爲資本主義社會。朱先生之所以未能把論證進而至此者，據我推測，是因爲不了解支配底生產關係和被支配底生產關係的原故。

（C）嚴靈峯先生：

嚴先生論及“經濟生活中的領導作用”，曾指摘過馬克斯的科學底論據（動力，第二期，第63—4頁），這是大可佩服的；可是對於自己所指摘過的馬克斯之決定“資本主義社會抑封建社會”的五個標準，並不充分了解，而祇作着：

“在從前（封建社會——筆者註），城市跟着鄉村後面模倣鄉村農業關係，在近代（資本主義社會——筆者

註)土地生產爲城市工業生產一個部門。”——同上,64頁。

的解釋,却是很可惜的。在嚴先生所指摘的部分上,決定是否是資本主義社會的標準,並不是如嚴先生所解釋的城市對農村的問題,而主要是“資本是支配一切的經濟力嗎?”的事。然而,因然嚴先生在這點上不着重馬克斯的論據而解釋了的原故,所以就大胆地作着下面的論證,竟詆其他的人爲“馬克斯主義隊伍內的不肖門徒”:

“在中國農業經濟中,很顯然一切經濟生活都是爲資本主義公律所支配,如在鄉村中所發生的資本主義最重要而最普遍的現象;商品生產,無政府狀態,定期的農業,農業人口中的階級分化,最基本的事實,農業經濟中假使沒有貨幣,嚴格的說假使沒有與都市交換不能進行農業再生產的,這難道不是城市‘領導’鄉村‘性質’的關係嗎?難道今日中國農村可以一天不和城市發生關係而可以走到他所要發展的‘方向’去嗎?這樣的發展,決然是沒有的,有的只是從馬克斯主義隊伍內發展了不肖門徒。”——動力,第二期,第56頁

就只這,就算是把馬克斯的標準全面底地具體底地考

察了麼？我決不能承認那是這樣。

——1931, 11, 27。——

(註)還有許多問題，須加討論，因為多忙，今回只能止此。

這小文因為是忙中忽忽執筆而作，自然有許多謬誤，尚希論戰上的先賢，嚴加批判與指正，并望他日再來討論其他多點。

(天白代譯——1932, 1。)

哲 學 大 綱

霍 金 著 瞿世英譯

實價大洋一元五角

著者是哈佛大學的教授，本書也就是哈佛大學用過許多年的教本，其中講述的十分詳明，親切，新穎。他很有組織和提要地將全部哲學，歸納為七大派別，而又能把各派別的真面目顯示與讀者，並且評衡各派別的道理，指點各派別所包含的真理，指點一種綜合的傾向——全書可認為是一活的辯證歷程。譯者瞿先生宿知名於國內哲學界，且曾親列霍氏門牆，特取原著最後定本，以忠實流利之筆墨譯出，極宜作大學課本之用。篇首尚有譯者及張崧年先生介紹文字，原著者亦為中文版作一序言。全書十餘萬言。

動力派的

中國社會觀的批判

——中國經濟現狀的估計——

朱其華

在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這部書的前五章，我以二十多萬字的篇幅敘述了中國經濟現狀之一般的危機。這都是根據實際的材料，而不是從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的辭典中所抄襲出來的“理論”。這些實際的材料把有產階級的使徒陳獨秀們（陳獨秀之所以是有產階級的使徒，請參閱拙作中國布爾喬亞意識形態之歷史的發展第五章，載日文滿鐵

支那月誌通刊五十四號)的“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照一般社會發展公律而發展的,並且現在還是繼續發展着。”(嚴靈峯: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序言第九頁)的謬論打得粉碎。所以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中國經濟在最近幾年來究竟是發展,還是衰落”?而是“中國經濟在最近的將來,有復興的可能,還是繼續衰落”?

雖然如此,那些自命為馬克思主義者的有產階級使徒們,却偏偏抹煞了事實,根本否認中國經濟的衰落,所以當他們估計中國經濟性質時,總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在現在及將來,都是繼續發展的趨勢。”;努力於罵人的“鬥爭”的嚴靈峯君,就是這一類“理論家”之典型的代表者。

本來,這種完全抹煞實際的謬論是不值得重視的,但在文化落後,一般政治水準低下的中國,連譚平山鄧演達那種不能自圓其說的“革命理論”(?),尙且可以欺騙一部分人(自然是極少數極少數的),像陳獨秀輩那樣到處頂着馬克思列寧的招牌,到處引據資本論帝國主義一類著作中的文句,儼然是“貨真價實”的馬克思主義者,不待說,這是比譚平山鄧演達那種只知道“國民革命”的“最左派”是更聰明,更能幹,更大膽的騙子,自然更容易欺騙一部分人。因為如

此，對於有產階級的使徒陳獨秀派的中國社會觀作簡略的批駁，決不是全無意義的事。

陳獨秀派的中國社會觀，可以歸結在下列幾點：

“1.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雖是複雜，但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和生產關係是居領導(亦即支配)的地位，整個社會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經濟部門之再生產行程的。中國社會內部主要的統治者是資產階級，他們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勢力為其後盾，換言之，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

“2. 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的經濟基礎，要推動中國整個社會向着資本主義過程發展和擴大，但在國際生產發展與民族界限發生衝突的條件之下，帝國主義要排擠中國的民族企業，操縱整個國民經濟命脈，使之走向殖民地化的道路。

“3. 因為，帝國主義是推動中國資本主義發展的一個直接因素，商業和高利貸資本有造成資本主義原始積累的主要條件與資本主義發展的前提，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一般社會發展公律而發展的，并

且現在還是繼續發展着。

“4. 中國農村階級的分化，係由於資本主義的商品輸入農村，不斷地瓦解和侵蝕自然經濟的結果。正確地說，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

“5. 中國的地主與城市資產階級是不能分離的。城市的資產階級與帝國主義的財政資本也是分不開的，所以，中國的土地革命，不但要推翻一般的地主，並且要推翻資產階級以至於帝國主義的統治。因此，這個革命必然要超出資產階級民權革命的範圍；革命的性質是由於社會階級的相互關係來決定的。”（嚴著：中國經濟問題研究序言第八至一〇頁）

現時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特徵，果如上述的五點嗎？如果是的，那末簡直沒法來說明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這部書中前五章所列舉的統計與文件中所指示的事實了。

不管嚴君及其“同志”如何開口馬克思主義，閉口辯證法；也不管嚴君及其“同志”怎樣更多的引用馬克思列寧的原著來“說明”，而嚴酷的事實證明了嚴君們這種愚蠢的企圖完全失敗。

第一，嚴君很武斷地說：“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嚴君爲要證明他的理論的“正確”，於是引徵了馬克思；特別列寧的著作。但是沒有用，即使嚴君能夠用起死回生的方法，把列寧從莫斯科紅場的玻璃棺材裏拉出來，他也決不會說中國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列寧不僅沒有直接說過中國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且在他的全部理論體系中，也找不出應用到中國經濟估量上可以得出“中國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的原則的指示。却相反，列寧在估量中國經濟問題的時候，很明白地指示出了目前中國的經濟結構是封建殘餘佔支配作用。他於一九一二年發表於列佛星報第十七期上的那篇有名的論文“中國的德謨克拉西與民族主義”中曾明白地寫着如下的一段：

“落後的農業的半封建的中國，其客觀條件，在四萬萬展轉就死的人民生活中，所提出的急待解決的問題，厥惟此種壓迫與剝削之一定的歷史上特具的形式，即封建制度。封建制度以農業生產與自然經濟之統治爲其基礎；中國農民所受的封建剝削之根源，則由於農民在某種形式之下，附著於土地，而成爲土地的附庸。”

看吧！列甯是如何明白地指出了中國經濟結構的特徵。

嚴君指與他的見解不同的人為“新修正派”，而加以無理性的謾罵，自命為馬克思主義之真正的信徒與理論家，可是他自己却毫不掩地改變了列甯對於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觀點，而得出“中國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結論。嚴君不僅是“修正，”而且是根本推翻了馬克思列甯主義的理論原則。

嚴君以“不懂得國民經濟”這句漂亮話罵倒了一切不同情於他的見解的人們；可是，“懂得國民經濟”的嚴靈峯君是怎樣地來估量中國社會經濟結構呢？他說：

“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我們在中國範圍以內質量的關係便可以決定的：譬如列甯說俄國小生產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社會主義成份的經濟佔領導地位。中國小生產一樣佔優勢，然而在境內却是資本主義成份經濟佔領導地位。舉個實例來說，中國很避遠的農村中都要購買洋油，火柴等等日常生活工業品，假使這種工業品在城市發生恐慌，馬上便引動到農村去的；然而，農村的農產品或米穀發生恐慌，城市一時還可得到國際市場的接濟避免。這便證明鄉村再生產行程不但依靠城市的再生產行程，並且依

賴於國際市場交換的順利進行。反之，我們可看到年來中國邊境不斷的災荒，不但不足以影響到倫敦，巴黎，紐約；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響。而一九二五年‘五卅’，上海，香港大罷工，不但影響到全國如大難將至，而影響到英國，日本等等國家。一旦世界大戰爆發，或美孚，亞細亞煤油公司倒閉，我們以為不但上海，漢口，廣州，天津，要發生問題，即極偏僻的農村都要引起騷動的。所以中國農村的農業經濟的再生產行程，要依賴城市工業的資本主義經濟再生產行程也是無可否認的事實。”（上引書第四五至四六頁）

可憐連文字也不通順的嚴靈峯君，心勞日拙地企圖以這個“實例”來證明“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而實際上，這個不爭氣的“實例”只證明了嚴君的淺薄無知而已。

不錯，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在中國市場上發生極大的影響；很僻遠的農村都要購買洋貨，這也是一個事實。但以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商品輸出就認為“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真是無識妄談！帝國主義的商品不僅輸入中國，而且輸入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

家，如果照嚴君說法，則一切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都成了資本主義社會，都是“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了。例如誰都知道，非洲摩洛哥的經濟狀況是落後的，需要從海外——特別是法蘭西和西班牙輸入大批商品；這些商品無疑在摩洛哥市場有重要的作用，但我們能因此就說“摩洛哥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或者“摩洛哥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嗎？當然不能，因為誰都知道摩洛哥的經濟還很落後，還停滯在自然經濟佔強大的勢優的階段。

誠然，我們也承認像煤油和火柴這類日用必需的商品如果發生恐慌，即使在僻遠的鄉村中也要感着非常不便的痛苦。但這就能拿來作為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地位的說明嗎？當然不能！不僅中國需要國際市場的供給，任何國家都是一樣，例如無產階級專政的蘇聯，也還是需要外國商品的輸入。帝國主義停止煤油火柴或其他工業品輸出中國，固然要引起中國市場的恐慌，然而如果美國英國，特別是德國等這些國家停止對蘇聯的機械的輸出（不管是農業機械工業機械或動力機械），則蘇聯不僅不能再來一個五年計劃，不僅現在打算四年內完成的五年計劃十年也不能完成，而且蘇

聯的全部經濟生活將發生絕大的影響，甚至要影響到蘇聯無產階級政權的生存。嚴君是到過蘇聯，熟悉蘇聯的情形的，當然不否認外國機械進口對於蘇聯經濟的重要意義。如果照嚴君的說法，則蘇聯也“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因而“蘇聯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了。這正和一切有產階級的庸俗的經濟學家一樣，他們看到了一九二一年宣布的新經濟政策，就說蘇聯“回到資本主義的原路”上去了；看到蘇聯聯絡外國工程師，就說外國工業（資本主義工業）領導蘇聯工業的說法，是一樣的滑稽與一樣的荒謬可笑！可惜我們這位“想”做中國馬克思的“理論家”嚴靈峯君從馬克思的門下跑到馬寅初的門下去了。

至於嚴君說“年來中國邊境不斷的災荒……即上海亦不至受重大的影響”，這完全是抹煞事實的謠言！

各省的可怕的災荒，使幾千萬人的生命在最短的時期內結束，使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人口沉淪到飢餓綫以下，因而使市場的購買力減低到最小限度。這不僅使各種新式工業部門因而衰落——在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的前五章，我們曾歷舉工商業衰落的狀況；工商業的衰落，固然有各方面的原因，而因可怕的災荒所引起的市場購買力之極端的

減弱，與因可怕的災荒所引起的社會秩序之極度的不安，是工商業衰落的主要原因；關於這點以後還要再說。——而且因為中國市場購買力的低弱，使國際市場蒙其影響。關於這點，我們不必像嚴君那樣心勞日拙地東抄西襲，弄些陳舊的統計來“說明”，只要睜開眼來看一看就可以知道。英國遠東經濟考察團很公開地說，英國受了中國市場購買力削弱的原因而致感到商業的衰頹。德國的中國考察團回國後的報告，承認中國農村大破產不僅是世界經濟衰落中的一個現象，而且是世界經濟衰落中的一個原因。美國的資本家總統胡佛，他也是明白這一點的，所以他很慷慨宣言（一九三一年三月間）美國將盡力幫助中國恢復經濟的破產。這些事實都是“懂得國民經濟”的嚴君所不能理解的。

誠如嚴君所說，一九二五年的中國大革命，不僅影響及於全國，而且及於全世界。但是可憐這位“懂得國民經濟”的“理論家”嚴君，完全不懂得五卅正是因為各省的飢荒而發生的全國騷亂中的一個必然產物。嚴君只看到五卅發生後的影響，而沒有知道五卅發生的原因，看到因五卅運動而全世界震動，於是欣然色喜，自以為這是證明他的妙論的“實例”了。

怎樣去解釋這些矛盾呢？“懂得國民經濟”的嚴君拿出他的擋箭盾牌來了！

“列甯靈位在此，百無禁忌！”

④ 不錯！我們承認帝國主義在中國政治經濟各方面佔統治的作用（見拙作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但我們決不像“懂得國民經濟”的嚴君那樣以為承認了帝國主義對中國的統治，就不能迴避地要承認“中國毫無疑義的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和“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如果照嚴君所說，凡是被帝國主義統治的，都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所以無論是印度，摩洛哥，敘利亞，以及那些非洲澳洲最落後的殖民地國家，都成了“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的資本主義國家了。

⑤ 帝國主義在中國佔統治作用，而中國却不是“資本主義關係佔領導的地位”的“資本主義社會”，就在帝國主義在中國已與封建殘餘聯結起來（嚴君是最反對這種見解的，關於此點，以後還要詳說）。嚴君並不是不知道帝國主義統治其他比中國更落後的其他殖民地的情形，而且也知道無論如何，不能把非洲澳洲這些落後國家邏輯在資本主義國家之列，於是嚴君弄得不能自圓其說了。好在嚴君還有這枝“不

懂得國民經濟”的漂亮的火箭，於是就拿這枝火箭來向所謂“新修正派”“不肖門徒”們掃射了。可惜現在已經是毒瓦斯綠氣砲戰事的時代了，嚴君的十五世紀的中國武器——這枝漂亮的火箭——已經沒有作用了。

既然“中國目前是個資本主義社會”，自然“中國社會內部主要的統治者是資產階級”了。可是嚴君寫到這裏，雖然有“不懂得國民經濟”的漂亮的火箭，也不能再為自己衛護了。

我們不僅不懂得國民經濟，而且不懂得嚴君筆下的資產階級是什麼東西。我們說帝國主義在政治經濟上統治中國，所以嚴君所說的資產階級，如果是指帝國主義資產階級，則我們多少也可以有點同情，但事實上，嚴君所說的，又明明是“他們或多或少的要依靠帝國主義資產階級經濟的政治的種種勢力為其後盾”的本國資產階級。自然，我們也不致荒謬到像陳公博鄧演達潭平山那樣否認中國有資產階級；但同時，我們也決不能荒謬到像陳公博那樣以為吳佩孚張作霖段祺瑞等都是資產階級或代表資產階級（“物觀”的“歷史派”的陳公博，是最善於以彼之矛刺彼之盾的勇將，他在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這本東抄西襲而出版後到處

“贈閱”的小冊子上，說張作霖等卻是大資產階級，另外在革命評論上，又說中國可憐得還沒有資產階級，至多，也只能在“資產階級”之上加上一個“小”字，就是說，至多只有小資產階級。這就是陳公博君的“社會科學”！)所以對於嚴君的意見，不能同意——如果關於這點，我們能同意嚴君的見解，則我們早已同意陳公博在中國國民黨所代表的是什麼？一書內的意見，因為這還不是嚴君自己所發明的“嚴記商標”，而是三四年以前陳公博早已“發明”了。“懂得國民經濟”的嚴靈峯君雖然捧着列甯的牌位到處招搖撞騙，而事實上不過成了陳公博的應聲蟲而已。可憐的罵人鬥爭家！

我們是不懂得國民經濟的——如嚴君所說。“國民經濟”的深奧，也只有“想”做中國馬克思的嚴君才能懂得——但是我們必須指出，在中國的社會經濟結構中，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封建的生產關係)是居支配的地位。雖然帝國主義的商品侵略在中國市場上起了很大的作用，雖然帝國主義在中國境內開設了幾個工廠，甚至民族工業也有了相當的萌芽，但是沒有用，支配全國最大部分人民生活的，還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新式工業不僅在數量上，而且在質量上，還是微弱得很！家庭手工業與工場手工業，完全人

工灌溉的半自然經濟的農業生產，就是中國經濟結構的主要基礎。誠然，我們決不荒謬到完全否認中國有新式工業，但是我們又不能不承認新式工業還是非常幼稚（參閱拙作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嚴君只看到煤油與火柴之重要，而完全忽視了家庭手工業與工場手工業，完全人工灌溉的半自然經濟的農業生產的重要作用。我們的責任必須在嚴君面前明白指示，這些農業手工業的生產，在全國生產總額中要佔到百分之八五，乃至百分之九〇！不必要嚴君到內地和鄉村去考察，只要嚴君肯留意，而又不硬否認事實的話，就在上海，天津，廣州，漢口這所謂四大商埠及首都南京考察一下，便可以知道新式機械工業之衰落與手工業之優勢發展。

以上海而論，上海的各种新式工業部門，本來的基礎就很薄弱，而這幾年來，一般的是衰落不振，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這本書中已經詳細說過的了。可是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看到一些手工業小工廠（工場手工業）之畸形的發展，特別是針織工業。上海的針織工業之多，頗可驚人！彷彿記得一九二九年上海市政府社會局曾作過一個調查，資本在一萬以下，三千元以上的針織工廠，全上海有六十多個（統計不在手頭，確數不知）；而資本在三千以下的小針織

廠，更是多不勝數。我們無論在公共租界法租界華界，幾乎到處可以看見每一個衙堂巷口總掛着橫的直的許多招牌。這些針織工廠的資本，最大部分是在由五百元到一千元左右，在那些房租不貴的小衙堂裏，租一間小小的房子，買了——大部分還是租來的——幾架簡陋的小機器，僱用由三個到十二個的男女工人（以女工為多），卜晝卜夜的做着工作——織襪子或縫汗衫。像這樣的手工業，只有嚴君纔稱之為“資本主義工業”！廣州漢口天津的情形是更其落後。廣州幾乎可說沒有一個新式製造工廠（兵工廠除外），社會的日常用品，除了舶來品以外，都是由手工業生產出來。再以南京來說，南京除了和記洋行以外，可以說沒有一家新式的製造工廠——緞廠總算是最進步的了，但最大部分的緞廠還是手工木機織的。在南京城內，到處——幾乎是每條街上，尤其是那些靜僻的街巷，都可以看到許多古式的紡紗機與織布機。這些古式的紡紗機與織布機，並不是陳列着來供我們研究參觀的，而是天天，時時，刻刻，有人在紡織着。這些紡織者為愛惜光陰起見，往往夜以繼日。不待說，這些人家是沒有裝電燈的，同時他們也不用煤油燈，而是點植物油（普通是菜油），因為煤油燈不僅煙煤太重，熏黑紗布，而且

也不經濟。嚴君想像中以爲美孚或亞細亞倒閉的第一天，人民就要在黑暗中生活的恐慌，在這些手工業的家中是絲毫也不成問題的。

上海，廣州，天津，漢口，南京，這些地方尚且如此，內地城市及鄉村是更不待說了。

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既是前資本主義的生產關係佔領導作用，所以社會內部的主要統治者決不是資產階級，而是代表封建殘餘與帝國主義互相結納的軍閥官僚豪紳地主買辦階級及變態的銀行資產階級（關於中國銀行資產階級之特殊性質，以後還要分析）。關於這點，如果嚴君像陳公博君一樣的硬要承認張作霖吳佩孚段祺瑞是資產階級，這正和吳稚暉君硬要指陳公博汪精衛輩爲“灰色”共產黨一樣，我們何必再來替張作霖吳佩孚段祺瑞陳公博汪精衛輩辯護呢？陳公博君的大作，不僅已經被嚴君所指爲“新修正派”“不肖門徒”們駁得體無完膚，而且嚴先生自己也曾經批評過，現在嚴君自己自覺地不自覺地跟到陳公博的尾巴後面去了。這就是馬克思的“肖徒”嚴君的辯證法！

“列甯靈位在此，百無禁忌！”

嚴君引據了許多先哲的名言，特別是大師列甯的著作；

另外，又東抄西襲的弄了一些陳舊的統計，來證明他的“中國目前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妙論。這種移花接木的頑意兒，原是庸俗的資產階級學者的拿手好戲，嚴君雖然背着列寧的靈位到處招搖撞騙，而事實證明了他正和這些庸俗的資產階級學者一樣，不過背誦經典，咬文嚼字，以這種鄉學究解釋“大學之道，在明明德”的態度來代替經濟的分析，以滿口胡罵來作他的“論戰”。這種可憐與狂妄的態度，表示他不僅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修正派，而是馬克思列寧主義之最可恥的叛徒！

第二點：嚴君以為帝國主義在中國是絕對地要破壞封建制度，所以肯定“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勢力，乃是無稽之談，和對於馬克思主義的荒謬修正！”（嚴書第一三頁）

在這裏，嚴君又巧妙地抄了馬克思列寧的著作來作為說明，首先是引用了馬克思恩格斯在一八四七年的宣言中的一段：

“資產階級既激急的改良了生產工具，又不斷的開拓了交通機關，於是把所有一切，甚至於野蠻的人民都推入於文明的道路上了。那價廉物美的射擊力，即中國

的城壁也被打破了；於是極端排外頑固的野蠻人，也只得降服了。世界各國爲着要免得滅亡的運命，也只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牠將所謂文明輸入他們的社會，就是要把自己也變成資本家。換句話說，資產階級將按照自己的模型改造了全世界。”（宣言第一章）

馬克思恩格斯這段話無疑是正確的。而嚴君概括出馬克思恩格斯這段話見解爲如下三點，大體也是正確的：

“第一，歐洲先進資本主義國家的發展，需要國外市場，造成了國際交換關係。

“第二，資本主義先進國的商品輸入野蠻民族的國家，將封建的城壁打破，並征服了封建勢力。

“第三，落後的民族要圖自己的生存，不得不採取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使落後國家資本主義生產照先進國的模型發展。”（嚴書第一二頁）

帝國主義的勢力侵入落後民族，而且征服了落後民族；對於被征服的落後民族之經濟基礎的破壞，也是必不可少的事實。可是帝國主義在侵入這些落後民族以後，爲要防止其民族工業的發展，爲要更多的更順利的掠奪這些落後民族廣大羣衆的血汗，與這些落後民族的統治者（代表封建勢

力的國王，王公，軍閥）相勾結，也就成了帝國主義侵略落後民族的必不可少的步驟與手段了。特別是在那些新興民族工業已有相當的萌芽，羣衆對於帝國主義的侵略掠奪已引起了反抗的革命運動的國家，例如中國，則帝國主義爲要維持其在中國的特殊利益，爲要阻礙民族工業的發展，特別是爲要鎮壓反帝國主義的革命運動，因而扶植封建勢力，作爲其侵略掠奪的助手與工具，尤其是必要了。

以中國來說，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降服了中國的封建貴族的統治階級，而且破壞了固有的經濟基礎，萌芽了資本主義的生產，但正因爲如馬克思恩格斯所說，中國也有了“爲要免滅亡的運命，也只得採用資本家的生產方法”的民族資產階級的出現，所以帝國主義立刻就利用封建勢力來阻礙牠們的發展。這不僅理論如此，事實也是如此。

庸俗的資產階級學者，在非難別人的時候，往往東偷西竊的抄襲一些先哲之言來表示他學問之“淵博”，表示他見解之正確，但可惜他們所抄襲的，往往只是某部著作，或是某篇論文中的一段，而把全部理論捨去不用。嚴君就是這類抄襲的能手！嚴君抄了列寧的這一段話：

“以前殖民地是商品貿易，但是尙無資本輸出，現

在帝國主義已經變更，而益以輸出資本；資本主義的生產，於是便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了。”（列甯：民族問題）

嚴君抄得了這一段文章，於是喜形於色，手舞足蹈的叫道：

“這樣便證明：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勢力乃是無稽之談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修正！”

其實這才真是“荒謬修正”！

即使我們把列甯的其他著作不提，只就這一段原意來說，也決不能“證明”嚴君見解之正確。

列甯說，資本的輸出，使資本主義的生產，極迅速地移植於殖民地，這樣的見解無疑是正確。而且，我們可以不必否認在中國已可以看到這種現象，資本主義的生產，在中國已由帝國主義的資本輸出而出現。但列甯並沒有說，由於資本輸出，使殖民地就變成資本主義社會；同樣，列甯也沒有說，資本的輸出，資本主義生產在殖民地的萌芽，是帝國主義決不能與封建勢力勾結的說明。

嚴君和其他庸俗的資產階級學者一樣，用掩耳盜鈴的方法，偷竊了一點而捨去了全部，以從全部中偷竊而來的一

點作為“說明”。

“證明”？證明了些什麼？證明自己的淺薄與無聊！

嚴君抄錄了列甯上面這一段話，而忘記了列甯同時指出資本輸出是帝國主義的一個矛盾的重要意義。列甯說明了殖民地是消費生產品和收買原料的市場；實行壓迫國家的資產階級極不願意在殖民地發展資本主義的生產，而欲使殖民地永久成為消費歐洲生產品和供給原料的地位。可是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由商品輸出而進至資本輸出。資本輸出開始在殖民地萌芽資本主義的生產。

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將資本輸出於殖民地和建設資本主義的生產，與他在殖民地的利益，如壟斷消費生產品和收買原料的市場發生了根本的矛盾。這種矛盾的發展，引起帝國主義開拓新市場的必要。但是在全世界已被帝國主義分割殆盡的情形之下，要爭奪新市場，只有帝國主義相互火併。這不僅是促成了帝國主義的世界大戰（一九一四至一八年大戰即其一例），而且使帝國主義必須加緊其對殖民地半殖民地一切落後國家的侵略榨取。而這種過度的掠奪與壓迫必然地引起廣大羣衆的反抗。加以這些殖民地半殖民地既有新式工業（資本主義生產）出現，則其對於帝國主義

的反抗力量，必定增加，主要的無產階級的團聚而躍上了政治舞台。帝國主義爲要維持其統治，除了以流血政策來鎮壓外，只有利用這些國家的封建勢力來作爲壓迫羣衆反抗的工具，和維持帝國主義統治的助手。

因此，因資本輸出而萌芽了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工業，更因殖民地落後國家工業的萌芽而帝國主義必需扶植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封建勢力以爲助手和工具。

這纔是馬克思列甯主義的正確觀點！

嚴君對於馬克思列甯主義作了荒謬的修正，還要把“新修正派”“不肖門徒”等等頭銜加到別人身上，這是嚴君的“理論鬥爭”(?)的武器！

嚴君是最懂得馬克思列甯主義的(?)，馬克思列甯的著作是他所熟讀的(?)而且最會運用的(?)。但是，當他得意洋洋的拿列甯的著作來“證明”(?)“新修正派”“不肖門徒”的“認帝國主義在殖民地扶植封建勢力，乃是無稽之談和對馬克思主義的荒謬修正”的時候，實際上早已把列甯的理論指示置之腦後了。

帝國主義在殖民地落後國家扶植封建勢力，這正合於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原則。列甯不僅沒有指此爲“對馬克思主

義的荒謬修正”，而且他自己加以說明，可惜，列甯這些正確的說明，被嚴靈峯君用掩耳盜鈴的方法隱藏起來了。

列甯在他爲國際起草的民族及殖民地問題綱領中，很明白的寫著：

“在一切落後的國家之勞動羣衆中間，應極力說明，揭破帝國主義國家的虛詐——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被壓迫國家中的特殊階級，表面上建設政治獨立的國家，而在實際上，在經濟財政與軍事方面，則全爲依賴帝國主義的國家。……”

列甯在這裏不是很明白的指出了“帝國主義國家利用被壓迫國家中的特權階級”嗎？被壓迫國家的特權階級是誰？當然是代表豪紳地主利益的封建貴族或封建軍閥。

嚴君把列甯說得很清楚的話拋棄在九霄雲外，而自己來加以“荒謬修正”！

如果照嚴君的理論，則帝國主義對於落後國家的反動的統治階級（封建貴族或封建軍閥），與對於工農下層羣衆一樣地予以殘酷的壓迫與榨取，則殖民地落後國家的革命，將成爲“整個”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全民”反抗帝國主義的革命了。於是，嚴君又成爲最反動的所謂“全民革命”派理論家

的門徒了。

列甯指出：全世界上分成兩個營壘，一邊是代表二萬五千萬人的統治階級，一邊是代表十二萬五千萬人的被統治階級。統治階級與被統治階級之間是絕無國界或民族的界限的；在被統治階級的營壘內，固然有帝國主義國內的無產階級，也有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工農勞苦羣衆；而在統治階級這一營壘中，不僅有帝國主義的資產階級，而且也有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封建貴族封建軍閥封建豪紳地主及民族資產階級。所以列甯說：

“資本家及地主非要將各民族工人相互隔離不可。但是現在世界上各國之最高當局者均作不可言的融洽，在一起彷彿如一個偉大‘公司的股東’一般（如同西伯利亞聯納金礦公司一般）所以正教的，回回教的，猶太人，俄國人，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凡是有資本的人，不分民族的共同來壓迫各民族工人。”（工人階級與民族問題）

“但是現在資產階級畏懼工人，故與保皇黨一類的潑列許開維恩區聯合，與反動勢力聯合，違反德謨克拉西主義，提倡壓迫民族，主張民族無平權，并且用民族

主義的口號來誘惑工人。”(同上)

列甯的這些著作，還不夠說明帝國主義扶植殖民地落後國家封建勢力的意義嗎？讓嚴君自己去答覆吧！

事實是理論的最好的說明。我們現在撇開了理論來看事實吧。

大英帝國主義統治印度的方法，除了用流血政策外，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勾結扶植印度的王公(封建貴族)。英帝國主義不僅利用王公來欺騙羣衆，而且利用來打倒幼稚的印度資產階級，至印度資產階級完全降服爲止。對印度的統治如此，對於緬甸，對於澳洲，對於菲洲，對於一切殖民地的統治都是如此。

這不僅是英帝國主義統治其殖民地如此，也是一切帝國主義統治殖民地慣用的法寶。法帝國主義之於敘利亞，於安南，於非洲的殖民地；荷蘭之於東印度羣島；意大利之於非洲殖民地；西班牙之於摩洛哥；美國之於南美各落後及東方的菲列濱；日本之於朝鮮台灣；無一不是一樣。

以中國來說，自然也不能例外。

帝國主義最初侵入中國時，曾對中國的封建勢力予以無情的破壞，鴉片戰爭，英法聯軍戰爭，中日戰爭，義和團戰

爭，都是最顯明的事實。但是一九〇〇年以後，帝國主義與中國的封建勢力不會有過直接的衝突。這原因是這樣的：在一方面，封建勢力不僅屈服於帝國主義猛烈的砲火攻擊，而且為國內革命勢力所驚嚇。代表封建勢力的統治階級不能像汪精衛那樣作“夾攻中之奮鬥”，於是不投降帝國主義，只有屈服於革命勢力。但封建勢力與革命勢力有根本的矛盾，決不能調和；而與帝國主義則因彼此同感受革命的威脅而有勾結的可能，所以封建勢力不能不立刻對帝國主義遞了降表。在另一方面，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當然是露骨的毫不顧惜的進行，可是下面的兩個事實使帝國主義的侵略方式受到或大或小的影響：第一，因資本輸出而誘發了中國境內新式工業的萌芽，民族資產階級的意識漸漸抬起頭來，民族工業的發展有妨礙帝國主義在中國經濟利用之積極作用的危險；第二，由於過度的榨取所引起的廣大羣衆的反抗，有根本推翻其在中國已得權利之危險。羣衆的革命運動雖然可以用流血的手段鎮壓一時，但愈是鎮壓，反抗愈劇烈。帝國主義是知道這一點的，所以帝國主義除了必要時施用直接的流血政策的壓迫外，主要的是利用封建勢力來打倒新興的資產階級與羣衆革命勢力。自一九〇〇年以來，整

整三十年中，帝國主義對華政策的主要點，一貫的是扶植封建勢力以阻礙一切新興勢力的發展，因為任何新興勢力的發展，無疑都是妨礙帝國主義的在華利益的。

特別重要的一點，就在中國並不是那一個帝國主義單獨統治的純粹殖民地，而是各帝國主義共同掠奪下的國際殖民地。各帝國主義誰都也想單獨佔據中國，可是事實上一時是不能做到。無論那一個帝國主義國家，既不能立刻單獨佔據中國，於是就盡力在中國擴張勢力。經濟侵略的發展，必須以政治勢力為其後盾；政治勢力不僅單靠軍艦，而且必須扶植當地的政治勢力為其助手，於是各帝國主義都在中國各自找其可供利用的工具。軍閥的封建割據，是最有利於帝國主義割據統治中國的局勢的，同時，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範圍的劃分，也成了軍閥割據的基礎條件之一（詳細參閱拙作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第三章）。帝國主義與封建軍閥的相互利用相互勾結，成了近代中國政治史之最主要的題材。

嚴君說：

“資本主義社會的發展，常常保持舊時代的一切殘存制度來適應資本主義自身的利益，但我們決不能說

資本主義因此反要去維持封建勢力使自身不能發展。”

(嚴書第一二五頁)

嚴君這段話簡直是比黎錦暉的毛毛雨，可憐的秋香，葡萄仙子這類作品更沒有價值！我們決不是說，帝國主義維持落後國家的封建勢力，是使帝國主義自身不能發展。却却相反，帝國主義要維持封建勢力，正是爲了自身的發展。這裏並沒有矛盾，只要嚴君能少做點罵人的“鬥爭”，而平心靜氣的仔細再去讀讀馬克思，特別是列寧的著作，當可有所覺悟。

嚴君完全以青紅幫吃講茶打架的態度，盛氣凌人的罵倒一切，以批駁不同見解的人，他以為：

“不肖門徒最反動的理論，便是武斷地斷定帝國主義在中國維持封建勢力使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甚至說最近中國封建勢力完全復活起來。”(上引書第一二三頁)

“忠實同志”，或者是“肖徒”嚴靈峯君，是怎樣地“文斷”帝國主義與中國封建勢力是絕對衝突呢？

嚴君自己知道不能掩飾帝國主義勾結中國軍閥，扶植中國軍閥的事實，於是又舉出一個巧妙(不！其實是蠢極！)

的例子來爲自己蓋魂：

“歷史上的事實可以數見不鮮，法國大革命中資產階級反利用一切破產貴族來推翻舊制度，即在現時進步的資產階級國家如英國，意大利，日本尚利用皇帝的統治形式來代表資本主義的利益。我們固然承認皇帝的存在是封建時代的遺物，但我們不能說，英國，日本，意大利的資產階級要維持封建勢力，所以，英國，日本，意大利，受此資產階級所維持的封建遺制的阻礙，資本主義便不能發展。”（同上第一二五頁）

這個舉例是充分地暴露了嚴靈峯君的淺薄，無知，荒謬，甚至沒有絲毫常識！

在這裏，嚴先生的荒謬可以分兩方面來說：第一，我們是指帝國主義扶植殖民地落後國家的封建勢力，而不是說帝國主義扶植其本國的封建勢力。嚴君的荒謬是以牛頭不對馬嘴的把戲，忽然舉帝國主義內部情形來作例，其荒謬滑稽，淺陋無知，使人作嘔，也使人捧腹！第二，嚴君拿英國日本等國皇來比中國的軍閥，更是滑稽到了極點！這種對於社會科學沒有一點初步常識的人，我們如果來罵他是修正或曲解了馬克思主義，那真是太抬舉了嚴君而太侮辱馬克思

主義了。

馬克思主義階級理論告訴我們，要估定統治階級的階級背景，不能從政治統治者個人的出身或政治統治者的官號名銜來決定的。這是一個初步的常識。英國或日本的國皇，不管他的出身是貴族，不管他的名號是天皇是皇帝，只要他的實行的政綱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那末他就是資本主義的代理人。麥克唐納爾或多姆斯，不管他們的出身是工人，不管他們口頭上是無產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只要他們實行的政綱是代表資產階級利益的，那末他就是資產階級的傭僕。同樣，在中國，不管軍閥的出身是破產的農民，或是資產階級的子弟，如果他所實行的政綱，是割據稱霸，苛捐雜稅的重重剝削，無理性的徵發，拉夫拉車，派糧派草，任意殺人，不顧法律，敢作敢為，破壞工商業的發展，這就是典型的封建諸侯的復活。

嚴君到了不能自圓其說的時候，只得又拿出他的最後的盾牌來了：

“你們不懂得國民經濟，你們是新修正派，你們是不肖門徒！”

等三，嚴君既然認為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只有無情

地破壞封建經濟，自然要以爲“中國的資本主義是必然會按一般社會經發展公律發展的，并且現在還是繼續發展着。”

嚴君爲要“證明”中國資本主義是在“發展”，於是抄了許多的統計。本來拿統計字數來說明經濟的發展是最可靠的材料，可惜嚴君雖然東抄西襲，然而抄來的統計，都是在一九二二年以前。這些陳舊的統計（差不多都是十年以前的）說明了些什麼呢？說明在一九二二年前數年間，中國資本主義生產有了相當的發展——也僅僅是相當的發展——而一九二二年以後是寂然無聞了，否則聰明多智的(?)嚴君所抄的統計決不就止於一九二二年。

一九二二年前數年間，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相當的發展，這是一個事實，我曾在別的論文中曾說這不僅是空前的，簡直是絕後的中國企業的“黃金時代”。但這黃金時代是表示什麼意義呢？

嚴君抄了這些一九二二年以前的舊統計，很得意的說：

“我們現在試舉一些數目字來證明，中國的資本主義經濟是否受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的障礙而不能發展呢？”(上引書第二〇頁)

嚴君以爲這些陳舊統計數字是：

“主要的在於證明，自帝國主義侵入中國以後，或更確切些指出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以後，雖然，中國受帝國主義的束縛日益堅固；雖然在有封建殘餘的條件之下，雖然，歷年不斷地國內戰爭的破壞。然而，中國社會經濟資本主義化的過程，還是有蒸蒸日上之勢。資產階級在社會上政治作用之擴大等等都是反映中國社會內部資本主義成分的增高。”（同上第二五至二六頁）

嚴君企圖以這些陳舊統計來說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沒有受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的束縛。可是事實却把嚴君這種“正統馬克思主義”理論完全推翻。

一九二二年前數年爲什麼成爲中國企業的黃金時代？正因爲這個時期帝國主義對中國的侵略因忙於世界大戰而減輕。世界大戰是發生於一九一四年，結束於一九一八年。在這幾年中間，帝國主義忙於火併，帝國主義國內的偉大工廠都臨時改爲從事軍事工業製造，成千成萬的工人從工廠調到火線上去，所以帝國主義已不能如平時向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輸出商品。這即是說，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所感受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比平時減輕了很多。大戰雖

然束結於一九一八年，可是在大戰結束的最初幾年，帝國主義國內的生產尚未完全恢復，所以對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的經濟侵略也不能立刻恢復戰前的水平。所以一般說來，自一九一五年到一九二二年（或一九二一年），是中國工業稀有的“黃金時代”。中國資本主義生產在這個時期得到了相當的發展，不僅不是如嚴君所說帝國主義不會扶植封建勢力，不會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成分的發展，而是證明了帝國主義扶植封建勢力，是阻礙中國資本主義生產發展的一大原因，一九一五——二二年之所以有相當的發展，就因為帝國主義無暇東顧。一九二二年以後，帝國主義生產已經恢復到戰前的水平，其殖民地半殖民地落後國家的經濟侵略又更加緊，所以中國的資本主義生產又受到阻礙而不能發展，而且一般的是衰落。可惜嚴君統計只舉到一九二二年，但橫直都是一樣，嚴君的移花接木的手段仍然不能掩飾其淺薄的謬見。

在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這本書的前五章，我不僅是例舉了農業經濟破產的情形，而且列舉了工商業衰落的情形。我在那本書中所抄下來的統計字數至少比嚴君所抄的要新鮮而可靠一點。我們並不否認某種輕工業部門（例如

紡織工業)年來或有某種程度的發展,但這種發展一般說來還是很微弱的,這在拙作中國社會的經濟發展與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這兩部書中已經有詳細的說明,已無需再為嚴君那般心勞日拙地去東張西羅抄那些陳舊統計來“證明”了。

嚴君很大膽地說:

“若以為中國資本主義經濟不能發展,或沒有發展,這只是‘新修正派’迂腐之談。”(同上第二六頁)

其實我們絕沒有說過中國資本主義經濟沒有發展,或者否認中國有資本主義生產;但我們堅決的否認目前中國資本主義是在繼續發展,如嚴君所想像的那樣順利。嚴君以為我們是“迂腐之談”,而他自己則簡直是荒謬絕倫!

在這裏,使我想到了另一種荒謬絕倫的見解,即是被嚴靈峯君大罵為“偵探員”的任曙君在他的“大作”中國經濟研究中也像嚴君那樣無聊地舉了許多荒謬可笑的例子,例如他說:

“如果我們說中國的帆船可以表現封建時代交通工具,輪船則代表資本主義時代的交通工具,那就請大家注意下列的紀載:

歷年輪船與帆船出入全國各海關噸數的百分比

年 代	輪 船	帆 船	合 計
1875年	85, %	15, %	100, %
1905年	91, %	9, %	100, %
1915年	93, %	7, %	100, %
1925年	97, %	3, %	100, %
1926年	98, %	2, %	100, %

(中國經濟研究—四〇頁)

任君在海關貿易冊上抄到了這份輪船帆船出入口比較表，於是喜形於色地表示他的理論的“勝利”。

其實，只要有點常識的人，就可以知道這是多麼荒謬可笑的一個比例！這個比例的本身已經是不通，至於說在一八七五年輪船就佔了百分之八五，帆船只佔百分之一五，這尤其是荒謬可笑！任君知不知道在一八七五年，中國已經有了幾個上海？——在任君的想像，中國內地，即使是偏僻的鄉村，也變成上海了。任君這些無聊的比喻，我們只能拿出來作為談笑的資料，根本沒有批判的價值。

任君又舉了別一個例：

“如果說由錢莊和銀行的興替，亦可以相當的看出

現代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程度，那我們就介紹出如下的數目字來：

一九一二年至一九二〇年中國銀行投資的百分比

年 代	錢莊	銀行	合計
1912年	68, %	32, %	100, %
1920年	37, %	63, %	100, %

“這一個小小統計是很有意義的。不過十年之間，銀行和錢莊表現了決定了新陳代謝的關係。銀行投資日多，錢莊投資日少，這裏我們很明白的看到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人們再也不能拿歷史上商業資本主義一語來比擬今日了。”（同上第一四一至一四二頁）

恭喜！恭喜！“中國同整個世界經濟的發展沒有兩樣；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主義統治時代”！如任君所說，中國已經是一個帝國主義國家了！無怪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像任曙嚴靈峯諸君要鼓舞雀躍了！

可是事實是怎樣呢？首先，我們對於任君這個統計不能不表示相當的懷疑，不知這個統計是根據何處而來？而統計中所表示的百分比是指上海一埠，還是指全國？但這些都不

重要，現在的問題是中國銀行資本的性質如何？這是值得我們注意的問題。

在中國經濟危機及其前途第四章，我曾指出這樣一個矛盾的現象：

“由於農業經濟的大破產，工商業的衰落，全國之極度的貧乏與極度的混亂，社會金融的危機是不待再說了，但是有一個矛盾的現象，就是銀行業之特殊的發展，與工商業農業經濟的衰落，正成了一個反比例。”

這個矛盾的現象是必須加以說明的。

銀行業的發展，在上海表現得特別清楚。上海是全國經濟的中心，當然也就是銀行業的中心。上海的外國銀行不必說，即是本國銀行，無論大小，這幾年來幾乎全是獲利。

最近三年來上海各本國銀行盈餘數如下：

行 名	1927年度	1928年度	1930年度 元
中央銀行	—	—	1,700,000.00
中國銀行	損 元	損 元	1,000,000.00
交通銀行	548,839.34	577,694.86	500,000.00
浙江興業 銀行	131,594.28	263,258.41	575,000.00
浙江實業 銀行	342,056.55	358,344.01	445,000.00

同儲蓄處	12,592.97	23,811.32	未詳
上海商業銀行	39,037.19	267,506.44	510,000.00
同儲蓄處	不詳	36,162.92	未詳
鹽業銀行	1,217,829.42	1,198,159.39	200,000.00
中孚銀行	131,414.97	159,319.03	75,000.00
四明銀行	424,446.13	649,798.87	未詳
聚興誠銀行	33,703.21	168,673.06	100,000.00
中華商業儲蓄銀行	13,751.08	81,230.91	未詳
廣東銀行	325,068.72	457,554.83	未詳
金城銀行	990,617.16	1,008,779.14	200,000.00
新華商業儲蓄銀行	183,036.73	47,237.79	30,000.00
東萊銀行	36,703.94	192,938.82	280,000.00
大陸銀行	451,779.31	461,375.31	160,000.00
東亞銀行	424,539.70	825,991.76	未詳
永亨銀行	20,815.40	87,094.56	未詳
中國實業銀行	301,812.76	290,231.05	170,000.00
同儲蓄處	未詳	37,897.75	未詳
中國通商銀行	105,994.13	206,891.99	未詳
中南銀行	796,269.15	829,922.87	600,000.00

農商銀行	64,978.04	未詳	未詳
工商銀行	不詳	損	110,000.00
和豐銀行	695,834.79	547,982.66	未詳
江蘇銀行	29,217.46	197,675.55	300,000.00
同儲蓄處	5,649.77	4,264.26	未詳
中華勸工 銀行	29,504.17	54,507.07	未詳
上海煤業 銀行	12,182.35	49,075.84	未詳
百匯商業 儲蓄銀行	23,081.67	25,134.84	未詳
信通商業 儲蓄銀行	50,537.25	52,284.90	未詳
同儲蓄處	未詳	824.61	未詳
香港國民商 業儲蓄銀行	269,727.76	181,431.32	未詳
正大商業 儲蓄銀行	25,279.74	26,411.65	未詳
上海通和 銀行	28,640.82	56,782.82	未詳
中國農工 銀行	135,115.14	141,268.56	110,000.00
松江典業 銀行	17,940.90	27,567.32	未詳
上海正義商 業儲蓄銀行	12,592.32	14,080.54	未詳
國華銀行	72,742.35	185,692.40	230,000.00
惇敘儲蓄 銀行	17,354.77	26,490.76	未詳
華新銀行	116,328.48	125,142.40	未詳

上海女子商業儲蓄銀行	25,950.96	28,899.32	未詳
勸業銀行	未詳	—	—
江南商業儲蓄銀行	未詳	783.34	未詳
通易銀行	未詳	26,632.31	未詳
中國興業銀行	未詳	損	12,000.00
漢口華豐銀行	未詳	—	—
道一銀行	未詳	—	—
明華銀行	未詳	—	—
華大銀行	未詳	—	—
日夜銀行	未詳	—	—
富滇銀行	未詳	—	—
濟東實業銀行	未詳	—	—
中國儲蓄銀行	未詳	—	—
美華銀行	未詳	—	—
安徽商業銀行	未詳	—	—
大生銀行	未詳	—	—
察哈爾興業銀行	未詳	—	—
上海國民儲蓄銀行	未詳	—	—
正元銀行	未詳	—	—

松江銀行 未詳

其他

上海各中國銀行業務的發達，於此可見一斑。

上海銀行資本之畸形的發展，這是什麼意義呢？可惜嚴君雖然抄襲了許多統計，而沒有抄到這份統計，否則，他自然更要興高彩烈的喊“中國經濟已經過渡到金融資本統治的時代”了。這固然是荒謬的見解，而一般人以為這是中國經濟復興之最具體的說明，無疑也是錯誤。

上海銀行資本的發展，其所以不能作為中國經濟發展或復興的說明，是因為中國的銀行資本包含有如下的幾個特質：

第一，中國的銀行界的最主要的業務，是投資於政治借款，而上海的銀行界更以投資公債買賣為唯一要務。外國銀行資本以投資工業，輔助工業資本的發展為要務，而中國的銀行資本却與工業資本隔離而以政治借款的投機買賣為要務。這一個特質是決定於中國社會之特殊的經濟結構。

中國工業之落後是不待再說明的，可是商業高利貸資本在中國却已有長期的發展。自從帝國主義侵入中國，商品的侵入與原料的掠奪，發生了大規模的國際貿易。在這種經

濟侵略的過程中，產生了買辦階級（洋貨進口與土貨出口的經紀人）；買辦階級的本身不是新興的工業家，而是原來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領袖。他們利用原來在市場上的優越地位，做了帝國主義商品侵略中國的中間人。

交換關係的發展，引起金融機關擴大的需要，這是中國新式金融機關產生的第一個條件，也就是中國銀行資產階級與買辦階級發生密切關聯的原因。

另一方面，由於財政的窮乏而引起借外債的需要。外債不足，再輔之以內債。由於內外債的發行，在政府方面需要適應於借款便利的金融機關，而同時經手借款的官僚也企圖從中取利，所以官僚投資於銀行，就成了中國銀行資本發達的特殊條件。所以中國的銀行資本一方面帶有買辦階級的成份，而另一方面是官僚的成份。買辦階級與銀行資產階級，銀行資產階級與官僚，牠們相互之間的密切關聯是不待說了，而官僚與買辦階級之間，也有同樣的密切關聯。因為官僚要借外債，固然在許多方面需要買辦階級為經紀人，而在對內借款方面，買辦階級也有很重要的作用，他們藉銀行或公司的資力來投資於政治借款。所以買辦階級，銀行資產階級，官僚，他們是三位一體。

買辦階級的利益是與帝國主義經濟侵略相一致的，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愈發展，買辦階級的利益也愈大。國內工業的發展，對於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是不利的，所以買辦階級與國內工業資產階級的利益是不一致的，而且是相反的。官僚的本身是封建地主豪紳政權的代表，他們是在帝國主義的扶植之下，作封建軍閥的工具而為其統治的助手，所以他們的利益也是與工業資產階級背道而馳的。以官僚買辦階級（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首領）為構成分子的銀行資產階級，與工業資產階級利益之不一致，也就可以想見了。這是中國銀行資本之特殊性質的決定條件。

銀行資本既不用於工業投資，於是傾其全力為政治借款的投機買賣。年來公債庫券等等的政治借款名目之多，凡數十種，額數之鉅，近十萬萬。銀行資產階級利用其經濟地位，操縱公債市場，其獲利之豐，可想而知。這是銀行資本——特別是上海的銀行資本之長足發展的第一個原因。因政治借款的投機買賣而所得的發達的結果，其無益於社會經濟——特別是工業經濟，是不待細說的。因為政府借到了借款以後，並不是去興辦實業（縱使名義上有實業公債絲業公債等），並不是去發展交通（縱使名義上有鐵道公債航業

公債等),並不是去救濟農村,而是用於軍政各費——特別是用於軍費。所以公債之發行愈多,一方面固然可以使以官僚買辦階級為構成分子的銀行資產階級獲利愈豐,而另一方面却因此使社會經濟的破壞尤甚。

上海這些銀行之所以能獲倍大利潤,大半是從事於政治借款的投資(主要的是公債的買賣)得來。舉中國交通兩行(上海的)作例,在一九二七——二八年中,他們除了公債買賣不計外,直投資於政治借款的資本,計有·

(一)中國銀行官廳發款表

年 份	定期放款 元	活期放款 元	合計 元
1927年	37,510,053.36	55,360,337.47	92,870,390.83
1928年	58,640,926.54	76,728,874.51	135,369,801.05

(二)交通銀行官廳放款表

	元
1927年	62,858,654.27
1928年	65,971,488.56

這是一個很有趣味的統計,中國銀行的資本總額僅只25,000,000元,而且還有289,000元的資本未繳,可是在1928年,這個銀行對政府借款的直接投資(買賣公債票不在內)却有135,369,801元之鉅。交通銀行的資本總額是10,00

0,000元,而且還有1,284,850元的資本未繳,而這個銀行直接投資於政治借款的,有65,971,488元之距。

其餘各銀行的直接投資於政治借款的,當然不在少數,可惜我們找不到這種統計。

除了直接的政治借款的投資以外,間接的政治借款的投資——公債買賣——為數更鉅。茲就1927——28年的統計,上海各大銀行資產類內有價證券的資額如下:

行 名	1927年度 元	1928年度 元
中國銀行	29,971,766.97	32,600,359.32
交通銀行	11,605,816.48	8,561,704.11
浙江興業 銀行	6,946,325.07	7,197,772.56
浙江實業 銀行	6,335,617.95	5,537,025.26
上海銀行	3,218,722.14	3,476,642.61
鹽業銀行	3,839,621.66	3,915,469.41
中孚銀行	2,374,910.53	2,532,047.33
四明銀行	1,392,989.46	2,163,029.88
聚興誠銀行	547,977.87	1,396,289.68
中華銀行	547,567.64	413,441.22
廣東銀行	37,344.40	未詳

金城銀行	4,439,595.25	8,007,237.15
新華銀行	3,117,104.65	2,980,630.91
東業銀行	1,734,093.77	796,094.41
大陸銀行	2,927,171.55	3,191,652.52
東亞銀行	97,725.47	269,482.94
永亨銀行	691,446.52	355,304.75
中國實業 銀行	2,068,479.98	2,758,433.69
中南銀行	4,825,671.88	5,906,124.18
農商銀行	341,231.20	未詳
工商銀行	358,753.57	486,444.17
和豐銀行	40,538.85	187,756.48
江蘇銀行	791,502.43	527,450.09
中國通商 銀行	未詳	未詳

(未入銀行公會者不列入)

所謂有價證券，本是包括公債庫券股票提單等等而言，但據熟悉上海銀行情形者言，上海各銀行所存之有價證券，什九爲公債庫券。銀行界對於公債投資之鉅，可見一斑。

中國銀行資產階級的第二個特徵，就是牠是高利貸資本的變相。如前所說，買辦階級是中國銀行資產階級構成的

主要成分，而買辦階級就是商業高利貸資本的領袖，所以中國銀行資本的基礎，根本就是建築在高利貸資本之上。

中國銀行利息之高，為各國銀行業界所無；所以中國的銀行資本不僅不能完成其輔助工業資本發展的主要任務，而且成了阻礙工業資本發展的桎梏。

中國銀行界放款利息之高，世界各國，無出其右。就上海各銀行所定之存款利率而論，活期的利息，普通是年息四五厘。定期存款期限一年的，年息普通為七厘；二年普通為八厘。存款利息既如此之高，則放款利息之高，自不待說。所以銀行放款利息，至少當在八九厘或一分以上，而且還要附於苛刻的條件，例如要可靠的抵押品等。

中國工業感受高利貸的壓迫，比比皆是，例如一九二七年華商紗廠聯合會的宣言中，指出

“……國內金融，貸款息重，廠商辛苦經營，謀償銀行錢莊欠款之子金，猶虞不足；日積月累，母子相乘，祇有出於售廠之一法。……”（見陳著：經濟改造中之中國工業問題第三〇頁）

紗業界鉅子聶其焜君，在吾國紡織業與日本之比較一文（見第五卷第十號上海總商會日報）中也說：

“……日廠在彼國銀行用款，祇付年息六七厘之子金……若我國金融界，適得其反，當民國八九年間，紗廠獲利之時，銀行錢莊，莫不以與紗廠往來為得，且其計息亦較輕。至近三年來，紗廠損耗愈鉅，而金融界之逼迫亦愈緊，向之憑信用往來者，今則以貨物廠基作抵矣；向之月息八九厘者，今則加之一分以上矣；其自命眼光遠到者，對於吾業放款，逕行拒絕。若稍肯通融者，則一方吸取重利，一方尚以維持實業之美名自居……”

在同上總商會月報中，陸伯鴻的那篇西雅圖歸客之感想中也說：

“……回顧我國實業不發達之原因：(一)由於無團結力，銀行家對於實業界之用款，必取厚利……”

銀行資產階級以高利貸的榨取所獲得的高度的利潤，正是工商界所流的血汗。所以這樣的利潤無論增加到如何程度，不僅不能作為測量經濟發展的尺度，而且正是工商業被高利貸榨取壓迫的說明。

第三個特徵，是土地及房產的投資。

因為內地混亂，所以內地人口漸漸集中到上海來，形成

了上海市場之畸形發展。上海的人口是一天天增加起來，同時內地的財富也漸漸集中於上海。因為人口增加，地皮日益騰貴，於是投資於地皮買賣與房產買賣，成了上海銀行界的主要業務之一。上海的人口愈多，地皮及房產就愈貴，地皮房產愈貴，投資於地皮房產買賣的人愈發財。上海各華商銀行所獲的鉅利，一大部分是由於政治借款之直接間接的投資，另一部分是由於地皮及房產買賣經營之所得。

據一九二八年的統計，是年上海各大銀行的地產投資總額如下：

行 名	地產投資 元
浙江興業銀行	2,028,463.87
浙江實業銀行	800,000.00
上海銀行	1,273,423.35
鹽業銀行	1,556,169.24
中孚銀行	506,873.46
四明銀行	500,000.00
聚興誠銀行	664,937.97
廣東銀行	1,777,110.03
金城銀行	2,435,987.81

東萊銀行	120,000.00
大陸銀行	1,059,305.68
東亞銀行	1,433,000.00
中國實業銀行	908,349.69
中南銀行	1,973,992.54
和豐銀行	1,107,691.22
江蘇銀行	283,718.42
又	46,010.53
又	44,516.88

(未入銀行公會者不列入)

銀行對於地皮房產的投資，無論其營業如何發展，至多只能造成幾個中國哈同，不待說，對於工商業的發展，簡直沒有絲毫意義。

中國銀行資本的第四個特徵，就是存款的來源是有特殊的社會背景。

中國銀行資本的微薄是不待說的，但是一般說來——從資本金的比例上說，外來的存款並不算很少。以一九二八年作例，上海各大銀行的存款數如下：

行名	定期活期及其他存款合計
----	-------------

中國銀行	387,688,788.03
交通銀行	128,959,969.35
浙江興業銀行	37,010,405.21
浙江實業銀行	22,849,082.82
又儲蓄處	6,584,830.38
上海銀行	44,241,039.55
鹽業銀行	43,059,393.79
中孚銀行	5,115,196.72
四明銀行	32,264,572.08
聚興誠銀行	9,609,821.29
中華銀行	2,597,634.70
廣東銀行	20,517,099.65
金城銀行	53,603,709.35
同儲蓄處	7,362,888.84
新華銀行	6,450,392.58
東萊銀行	8,744,495.11
大陸銀行	35,233,002.12
東亞銀行	10,763,101.75
永亨銀行	2,704,942.29

中國實業銀行	18,803,443.15
同儲蓄處	1,184,226.95
中國通商銀行	4,709,938.67
中南銀行	40,002,012.84
工商銀行	4,379,391.79
和豐銀行	15,287,891.36
江蘇銀行	6,609,987.79
同儲蓄處	1,483,152.96

(未入銀行公會者不列入)

以上二十三家華商銀行之存款總數爲九四七,八二〇,四〇七元一角二分,在民窮財盡的今日,這個數目當然不能算小。因此就有人以爲中國銀行裏的存款,尙且如此之多,外國銀行存款之多自然更不用說,因爲中國人有了錢是歡喜存到外國銀行去的。銀行裏既有這麼多的存款,可見中國社會並不貧乏。更由歷年銀行獲利之豐,可以證明中國經濟是向上發展。

這樣的見解當然是錯誤。

首先,我們要來調查這些存款的來源如何?

幾乎是誰都知道,存款的所有主,百分之七〇是大官僚

大軍官。無論社會經濟破產到如何程度，即使饑荒到了人自相食的可怖狀態（例如陝西與甘肅），官僚們還是一樣的有鉅大的進益，擁有鉅大的財富。官僚們固然歡喜把他的鉅大的財產存到外國銀行去，但是也有許多——特別是二等的官僚們——把款子存在本國銀行裏，因為第一，本國銀行存款的利息較為豐厚，財富之更大的積累，官僚們是決不會嫌多的；第二，如前所述，官僚與銀行資產階級本有密切的關聯；第三，這些軍政機關的存款大多是存在本國銀行，官僚們橫豎是把公款當作私產。轉劃過戶方便一些。有了這三個原因，官僚就成了本國銀行界的最大的存款所有主了。

中國的軍閥官僚金錢之多，是與社會之極度的貧乏與可怖的饑荒完全相反的。不管國內有一萬萬人以上災民，不管這些災民是以其同胞的屍體為其食糧，而官僚們討一個姨太太就得化上數十萬乃至數百萬元。但是官僚們的富有，即使到了娶一個女學生來做姨太太要化五百萬代價的奢侈豪富的程度，也不能作為中國經濟復興的說明的。却却相反，官僚們的財富愈增多，人民愈窮困，社會愈貧乏，經濟危機愈加嚴重。因為他們的財富都是剝削民間而來，而且他又不把資本投資於生產工業。

總之，銀行資本之畸形的發展，由上述種種特殊原因所造成；這不僅不能作為經濟向上發展，或經濟復興的說明，而且却相反，這正是表示經濟破產的形勢愈嚴重。這當然是嚴君及任君所不理解的。

第四，嚴君以為中國農村的階級分化是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的。”

毫無疑義的這是繼承以上的錯誤見解的結論。

資本主義生產在中國經濟結構中既還沒有佔領導地位（如前述），則自然還不足引起農村中之尖銳的階級分化。

中國農村中沒有尖銳的階級分化的現象嗎？

我們決不像動力派嚴君們那樣一味的抹煞事實，所以我們決不否認中國農村中現在已有尖銳的階級分化。可是這種分化決不是所謂“由於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發展，生產集中律的作用所造成。”而是由於農村中的嚴酷的封建剝削所造成。

我們決不像嚴君那樣用掩耳盜鈴，或移花接木的手段來“說明理論”。農村中嚴酷的封建剝削所引起的階級分化的情形，我們可以舉出許多事實來加以說明，一點也不是勉強。但這在中國社會的經濟結構一書及其他著作中（例如在

日文滿鐵支那日誌發表的一九二五——二七年中國大革命的農民運動等)，早已完成了這個任務，此次自可不必重複再述。

至於嚴君所提出的第五點(見前)，我將在別的著作答覆，而且在此處已沒有再詳說的必要。

總之，嚴君的中國社會觀的錯誤，已經很明白的暴露在讀者的面前，雖然嚴君頭上頂了列甯的靈位，身上穿了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口中唸唸有緒，但是不相干，誠如嚴君自己所說：

“人能委棄真理，然而，真理永遠不會消滅的！”

嚴君引用王學文君批評他們(動力派嚴君們)的話來回罵所謂新修正派，現在我仍舊借王君的大筆，來回敬嚴君，作為我對嚴君的總評：

“那種見解，我們不能不說他是盲目的，不能認識中國經濟現狀是甚麼。”

一九三一年八月五日寫於普陀山中

今年七八月間，我因為腦病在普陀叢山中靜養，新生命書局的朋友寄來嚴靈峯君的大作中國經濟問題研究，拜讀之後，覺得非常失望。當時因為腦病未愈，所以就草草寫成了這篇批評的文章。回到上海以後，不久

就看到讀書雜誌的廣告；知道嚴君又在大做其罵人的“鬥爭”，而且罵到我身上來了。讀書雜誌我沒有看過，不知他是怎樣罵我，而且也可以不必知道。但在此地，我不能不冒昧對嚴君進一點的忠告：批評別人的著作原不是一件壞事，但像嚴君這樣一味胡亂罵人，至多成了三家村的潑婦。例如他罵我“‘想’做中國列寧”，這簡直是無聊到了極點！我做夢也沒有“想”過要做中國列寧，而且我從來不曾拿列寧或列寧主義的名字來招搖過，因為我覺得我的名字和列寧或列寧主義這名詞是根本聯不起來的。如果說因為列寧做過俄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部書，而我做過一部中國資本主義的發展，就是“想”做中國列寧，這纔是荒謬絕倫！至於嚴君說他要打我的眼睛，可惜他自己就是一個瞎子；我的眼睛沒有打到，反而打了他自己的額角！我勸嚴君再多讀點書，再多翻翻辭典，纔後再來作罵人的“鬥爭”吧！一味亂罵別人，這只不過表示自己的無聊而已！

還須聲明的一點，我這文中的“我們”，實際上只是表示我個人的意見，不過“我們”這兩字，是我一向用慣了的句子。我是一個沒有黨籍的人，所以簡直可說我自己沒有立場，但像嚴君那種荒謬見解，實在有加以批評的必要。

作者，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日寫於上海西廡路

評陶希聖的歷史方法論

張 橫

陶希聖是現在國內有相當威信的歷史學者，他關於中國歷史發表了不少的著作，論文，他的言論在一般青年中無疑地有多少的影響，因此檢討他的歷史方法是一件必要的事情。當然在這樣狹小的篇幅中自不能把他的方法作一系統的介紹與批判，不過我覺得必須將他的方法要點扼要的敘述一下，使一般青年學者能夠知道陶希聖究竟是怎樣的一種貨色——這樣於讀者也許是有興趣的。

陶希聖的歷史方法與一般舊式史家不同的地方，就是

因為他自稱為一位唯物論者——並且似乎是‘辯證唯物論者(?)’——他不滿意於舊式方法，主張改變研究歷史的態度和立場，這一點是陶希聖足以自豪的。關於這種方法的特點，在他的著作中常常有論及，譬如‘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新生命版）的緒論中‘如何觀察中國社會’一章；有極扼要的說明。他認為觀察中國社會應該取三個觀點即歷史的觀點，社會的觀點，唯物的觀點；‘中國社會，照他的話，不是靜的，不是自然型成的；是動的，是幾千年歷史運動所造的’（見該書一頁）；‘歷史是一個繼續不斷的社會過程，中國史是從太古原住民族至今日的社會生活繼續不斷的發達。中國今日的社會現象有許多是和古代不同甚至相反的，但是要深知今日的社會現象，必須追溯那不同甚至相反的古代現象’（見該書一三〇頁）；中國社會，照他的話，不是個人物造成的，‘秦皇漢武，王莽，王安石各有功過。沒有他們則秦漢宋代的政治必不如史書所記載。但是人物是社會的創造物，大人物之所以大，是由於所縮領所代表的社會勢力之大，……所以觀察中國社會不取個人觀點而取社會的觀點’（見註書二頁）；‘中國歷史照他的話不是心的發展或觀念，不是天道或理氣的流行。中國歷史是地理，人種(?)及生產技術與自然材料(?)’

所造成的……我們雖不執着於歷史定命論，但若把歷史的成因詳加剖析，則今日社會的狀況却都是必然的結果。（見該書二，三頁）

這種方法如果用幾句話概括地表示出來便是：中國社會史是一種不斷發展的過程，這過程不是個人或觀念的結果而是生產技術的產物，牠不是偶然的現象而是必要的過程。起初從這幾句話看來陶希聖的確與一般舊式的歷史家不同，他標榜着唯物論(?)的旗幟，反對唯心史觀的統治——這正是他能夠迷惑一般青年學者底一種主要根據，可是進一步詳細的研究他的歷史觀底內容，把牠嚴格的解剖一番，結果完全不同。陶希聖的唯物論在本質上不是真正的唯物論，牠到真正的唯物論(或者明顯些說就是辯證唯物論)不知差幾千萬里，唯物論在他的歷史學中只是一種裝飾品，假面具，大家儘管平心靜氣去讀一讀他的作品便可以相信我的判斷不是過分的。

固然，陶希聖也口口聲聲談‘經濟’，‘產業’……他的分析差不多都具有這些色彩，然而談‘經濟’，談‘產業’不一定便是唯物論，不然唯物論者在社會上都要佔優勢了。讀者研究某一種作品不應該只看牠表面上運用的名詞口號，而應該進

一步嚴格的分析牠的運用，牠的內容和本質。我現在舉出幾個比較顯著的例證來說明一下。

首先我們來看陶希聖對於中國社會性質的了解。中國社會究竟是什麼社會？牠的本質是什麼？這是中國歷史的根本問題，陶希聖對於這個問題曾費盡了不少的精神去解釋，可是他的結論仍是一場糊塗，他對於這個問題的觀點不但與辯證唯物論沒有相同的地方而且簡直地相反。辯證唯物論者觀察某種社會性質首先就注意到該社會的生產方式和這生產方式表現的生產關係形態——這種現實的基礎便決定整個社會構造；關於這一點在有名的‘政治經濟批評’（中譯樂羣版）序言中就有說過，因為人類由社會的生產他們生活資料時，造成某種一定必然的離自己意志而獨立的關係，這個關係是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發展程度。互相適應的生產關係，這些生產關係的總和形成社會的經濟構造，這個經濟構造是法律的政治的上層構造所藉以存立的真實基礎，而一定的社會意識形態也是和這個真實基礎互相適應的。在‘資本論’中同樣的有說過，這種特殊的經濟結構——無償的剩餘勞動在這一經濟結構中，便由生產者身上壓榨而來——決定了統治與隸屬的關係，這種關係，亦即由生產過程中直

接關係——這種關係的一定形式，自然是適應於勞働方法發展的一定階段以及勞働方法的社會生產力的——正是在這一點上，我們常能發現一切社會制度玄妙基礎的奧妙。這是辯證唯物論者對於一切社會歷史研究的出發點而所謂‘唯物論者’陶希聖根本不懂這一點。

陶希聖在他的大著中長篇大論地分析中國社會性質，然而這社會的核心，他始終不曾把握着。他不能夠了解中國社會所以是封建制度的是因為牠建築於地主對於農民（經濟剝削基礎上，地主對農民的剝削關係是封建社會的核心，中國社會所以到現在是半封建式的，就是因為這種剝削關係仍舊佔着優勢。陶希聖不曾具有這種常識，所以他的言論常常表現異常幼稚，在他的作品中差不多每一篇一章中都脫不得這種幼稚的錯誤。例如在他的‘中國之商人資本及地主與農民’（見新生命第三卷二號）一文有下面的幾段話：

‘我說中國社會的支配勢力還是地主階級，但商人資本却成了中國經濟的重心，何以商人資本發達而地主階級仍然是支配的勢力呢？由這個邏輯看來，這是一個矛盾。’

‘……所以中國的政治支配與經濟剝削二者隨商人資本發展的程度隨土地私有完成的程度，而逐漸分離。經濟剝

削，歸於地主階級，政治支配歸於官僚。’

‘官僚爲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支配。却不是地主階級自己來支配。官僚買得土地而地主包辦官僚。却不是以其爲地主之故而爲官僚，不是以其爲地主之故而行支配。地主去做官僚，必須經由買爵或科舉或夤緣。官僚去做地主必須經由買收並稍加一些侵奪。官僚與地主是這樣地分離而又聯絡的。’

‘……然而我們沒有巧妙的邏輯可以證明中國地主階級是過襲的身分，證明中國政治不是官僚政治，證明中國的土地不是可以自由買賣的。巧妙的邏輯可以使我們得到簡易的觀念，却不能指出中國的社會性質。’

‘……封建制度是一種地主制度。地主制度却不即是封建制度。私有契約地主制度也是一種地主制度，私有契約地主制度由商人資本發達而後成立……。’

我所以引出這許多話，目的不過是使讀者自己去了解陶希聖的錯誤。陶希聖不會認識封建制度的本質，他因此把官僚制度與地主機械的分離，又把商業資本形成的契約地主制度與封建制度對立起來，他的眼光中只看見種種五花八門的現象，如地主制度，官僚制度，契約制度等等，而不能把

握這些現象的本質，換句話說，他簡直沒有能力去找出封建社會的核心。他不能夠以唯物論的觀點去了解社會現象，他不知道經濟剝削是整個社會制度的基礎，其他的現象如政治的制度不過是牠的上層建築的，因此地主與官僚並不互相對立，反之後者不過是前者的化身罷了。陶希聖因為不會了解這一點，所以中國社會對於他仍然是一個啞謎。

根據這種錯誤的立論便產生了陶希聖種種怪誕的判斷，差不多他的整個歷史學內容都是同樣的一場糊塗。陶希聖一個重要的錯誤便是他的‘中國封建制度崩壞論’，他說中國社會自春秋戰國以來老早就脫離了封建制度的階段，中國社會已經不是封建社會了，因為商業資本的發達破壞了舊式封建制度，促成了私有土地制的建立。這種判斷在他的作品中隨處都可以找得，例如在‘中國社會與中國革命’一書中的‘封建制度抑資本主義’一章結語上說‘綜結上述，中國自戰國以後，已沒有完整的封建制度，因為商人資本的發達灌溉農耕的普行，完整的封建制度，已沒有存在的餘地’（見該書九六頁）。在該書中又有說‘春秋戰國時期是封建制度分解的時期，其特色是土地私有制度的開始及商業都市的成立’（該書二四五頁）。又在他的‘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

(新生命版)一書中也有說‘中國封建制度的破壞是由於土地私有制和此制所促起的商業資本的發生，這是無疑的’(見註書一〇七頁)。‘在春秋戰國的時候有商業，有官僚，已足證明當時封建制度的崩壞了’(該書二五九頁)。此外在他的‘中國封建社會史’(南強版)的綜結一章中也說中國封建制度早已崩壞，並指出下面的四種理由即：(一)犁耕及灌溉農耕的發達，破壞獨立莊園制度；(二)農業生產力的增加，促進商人資本的發達；(三)商人資本又促進大土地私有與土地買賣自由，因此農民離村而走入奴隸的道路；(四)外國資本促進並結合商人資本於其下，使貨幣經濟破壞自然經濟，加速農業手工業的破壞’(見該書九一〇九一頁)。

陶希聖這種論調完全是反辯證唯物論的。陶希聖這裡所指出的種種破壞封建制度的證據沒有一點現實的基礎，他只注意於表面的現象而不會把握着社會的本質，這種論調顯然是他不了解封建社會性質的結果。陶希聖所列舉的種種證據中比較值得人們注意的便是商業資本這一項，因為商業資本的形成破壞了自然經濟，促進了土地私有制及土地買賣……等，某種程度上的確給封建制度一個打擊，因此這些現象遂把陶希聖的眼睛迷惑了，以為商業資本破

壞了封建制度。其實商業資本雖然破壞了自然經濟，給封建制度一個打擊，然而牠在本質上並不能破壞封建制度。陶希聖這種論調很值得大家注意的，因為這種立論不只是代表陶希聖個人的意見，而且許多中國問題研究者也同情於這種論調。例如自稱為中國問題的‘專家’拉狄克(Radek)也曾說中國古代秦始皇統一以後貨幣經濟代替了自然經濟，封建制度遂開始瓦解，並他曾肯定地說秦朝的政權是商業資產階級的政權(參照他的‘中國革命運動史’中譯，新宇宙版)。此外如陳獨秀彭述之等也認為商業資本的侵蝕使中國封建經濟日益破壞變成‘殘餘的殘餘’。所以關於這種論調我在這裏概括地說明一下。

要答覆商業資本能否破壞封建制度這一個問題，首先我須簡單的說明什麼是商業資本和牠的一般作用。商業資本的流通方式是G—W—G，即以貨幣購買商品，然後將這商品販賣得着比原有的貨幣更多的數目，這就是說商業資本的作用只是完成生產流通過程的一種媒介，牠只將現成的商品把牠轉運到旁的地方去販賣。商業資本的產生條件是商品的交換，更明顯些即貨幣經濟，那里只要有交換的過程，商業資本便要在那里發生作用。因此商業資本的自身並

不代表一定的生產關係，牠不過在原有的生產關係中完成一種媒介作用罷了。如果是這樣，那末商業資本的發展不能決定社會經濟，更說不上破壞舊式制度。在過去的歷史事實是這樣，商業資本在某個時代只是該時代的社會經濟的附庸，牠的作用完全由該社會的經濟制度來決定。

關於商業資本的形成和作用在‘資本論’的第三卷中曾有詳細的分析，譬如關於商業資本的作用問題在該處有說：

‘在古代世界中，商業的作用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常歸結到奴隸經濟，又依照出發點如何，一種以生產直接生活品為目的的家長的奴隸制度，有時僅變為一種以生產剩餘價值為目的的，反之在近代世界中，商業資本的發達，歸結到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由此所得的結論是：此等結果自身，不是由商業資本的發達決定的，但是由種種完全相異的狀況決定的。’

又有說：

‘商業資本的一切發達，使生產帶一種愈加趨於交換價值一途的性質，使生產物愈加變成商品，然商業資本的發達，就其自身講，尚不足以為一種生產方法過渡到別種生產方法的媒介與說明。’（旁點是我加上的——筆者）

當然商業資本對於舊制度能夠發生一種解體的作用，這種作用對於生產方法的改造無疑地有不少的影響，然而這種影響的程度是以該社會原有的生產方法底構造為轉移的。關於這一點在‘資本論’第三卷中有極明顯的說明如：

‘商業及商業資本的發達，到處使生產向交換價值一方面發展，使生產的範圍擴大，使生產的種類加多，使生產普遍化，並且使貨幣成世界的貨幣，因此，商業無論在何處，對於以生產使用價值為主要任務的種種形態的元來諸生產組織，多少發生一種使之解體作用，商業對於舊生產方法所加的解體究竟達到何種程度，這首先是以這種生產方法的堅固及其內部的構造的如何為轉移的。這種解體的進程究竟歸結到何處？就是那一種新的生產方法起來代替舊的生產方法，這不是以商業為轉移的，但是以舊生產方法自身的性質如何為轉移的。’

又在該書中曾舉十六十七世紀的商業資本作為例證說：

‘當十六世紀中以及十七世紀一部份時期中，商業突然的擴張和新世界市場的創造對於舊生產方法崩壞以及資本主義生產方法的興起，發生一種重大的影響，然這却已經是’

造成的資本主義的生產方法的基礎上出現的，世界市場自身構成這種生產方法的基礎。在另外一方面，以繼續擴大的規模而生產，這是資本主義生產方法固有的必然性，此是驅策世界市場不斷地擴大，所以此處不是商業不斷地使產業革命，而是產業不斷地使商業革命，現在商業的威權是結托在大產業諸條件或大或小的優勢上面的。（旁點是我加上的——筆者）

我所以引出這幾段話來麻煩我們的讀者目的，不過是希望大家能夠了解這幾句話的意思，這就是說商業資本並不代表一種生產關係，牠不能作為一種生產方法過度到另外一種方法的轉移底說明，因為這樣牠雖然帶有瓦解舊式生產制度的作用，可是不能破壞這種制度。現在更進一步來說明商業資本在中國社會史上曾否破壞封建制度問題。

說及中國商業資本的發展是起源於周末時期，貨幣即所謂‘錢’已在那時發現了，自然經濟因貨幣經濟的產生逐漸的崩潰，在各地形成了各種商業都市如洛陽，邯鄲，燕，南陽等，尤以邯鄲，燕為最繁。當時商業的狀況如齊國通貨獲財，富甲天下，衛文公通商惠工，遂成霸業，起用計然，范蠡的策劃，講求商業，遂吞強吳，並且當時商業的環境即號為

‘重本逐末’的儒家，亦不免爲之轉移，如子貢貨殖之後‘結駟連騎，束帛三幣，以聘諸侯，所至國君，無不與之分庭抗禮。’到戰國時代商品經濟更占重要，商業資產階級的作用更加顯著，如猗頓以販鹽起家，郭縱以鐵冶爲業與王者賭富，至魏之白圭，更以商人而兼政治家，魏文公且不惜以國家而拜倒於牛馬商人所謂駟的段干木門下，更足見當時商業資本的影響。這都是不可否認的事實。可是商業資本雖然在某種程度上破壞了自然經濟，腐蝕了封建社會，然而牠並沒有破壞封建制度，因爲所謂封建制度是建築於封建地主對於農民的剝削的生產關係上的一種體系，這種體系在本質上沒有絲毫的變更。事實上，再進一層，商業資本不但沒有破壞這種制度而且在更在原有制度的基礎上更加強了封建地主剝削的程度，以先在自然經濟時代，生產目的在滿足自己的要求，所以剝削的程度尚被限制着，可是在貨幣經濟發達以後，地主便提高他的奢侈的慾望，越發加重對於人民的剝削。其次再就當時社會政權方面來看也是這樣。我並不否認當時的商業資產階級的確在政權上具有相當的影響，然而主要的力量仍是在封建地主階級的手中，一直自秦朝以後到近代地主在各朝代中仍是統治階級。如果說商業資本

破壞了封建制度，那末商業資產階級就應該自己獨立的佔據政權，獨立地統治社會，爲什麼地主還是各朝代的主人翁？爲什麼各朝代一直到近代仍然是重農輕商呢？陶希聖對於這些問題不能給一個正確的答覆。

商業資本在現在中國社會仍舊是保留着那種原來的作用，自資本主義侵掠以來，牠更加在舊式的剝削關係上殘酷敲榨農民，對於舊式封建的生產關係原則上並沒有變更。所以中國封建制度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已經崩潰了的論調完全是虛偽的，牠與客觀的事實相矛盾着。

如果照陶希聖的判斷，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就已經不是封建社會了，那末歷代統治者究竟是誰呢？陶希聖對於這個問題的答覆便‘發明了’他的‘士大夫階級’的理論。這種理論的要點是說士大夫階級代替了封建地主的統治，牠不是處於某種階級，牠不偏護於某一個階級而是各階級的代表，對於各階級的利益兼顧并籌的，中國社會就是這種士大夫階級統治的社會。關於這一點在他的著作中曾有系統的闡明，例如在‘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底‘士大夫身分的發生，發展和變遷’一章中有說，‘在中國，本有超階級的社會羣，這便是過去的士大夫階級。唐代的牛李，宋朝的蜀洛，民國的研究

系，安福系，這都是士大夫做政治活動的集團。如果這些可以叫做黨，那確有超階級的性質。士大夫是超階級的，超出生產組織各階級以外，自有特殊的利益’（見該書七七頁）。又該書‘官僚的發生，發展及其在政治的地位’一文中也有說‘……但是士大夫身分，存在於生產組織中各階級的供奉之上。而官僚既是治理階級，則其生存，實在於生產組織中各階級繳納的租稅；且為維持並圓活其所掌握的政權計，常把生產組織中各階級的利益，兼顧并籌。所以官僚一方面雖常為地主階級的利益而治理，他方面又有時抑制地主，也有時恩惠及於農民’（見該書九三頁）。最後在該書附錄‘中國社會史的一個攷察’的結論中又有說‘中國是封建制度崩壞以後資本主義發達以前以士大夫身分及農民的身分關係為社會主要構造的社會’（見該書二六二頁）。這種士大夫階級，照陶希聖的意見，就是由知識份子構成的，牠的精神生活與物質生活完全脫離着，他這樣的說‘……國家的政權為人民，治權却被知識份子即“勞心”者所獨立這樣的人將構成士大夫官僚階級’（見該書一〇三頁）。又‘但是在歷史上，勞心的從來是富貴的，清高的，剝削的。勞力的從來是卑賤的，平凡的，被剝削的，所以把勞心和勞力分成的階級這是歷史的

事實……’（見該書二四一頁）。這樣的陶希聖式的‘士大夫階級’偉論!!（按這種論調常見於西歐學者例如德國社會學維貝爾〔Marx Beber〕在他的論著中曾說中國的政權統治者不是地主而是超階級的士大夫階級。此外世界經濟學家瓦爾加〔Varga〕的觀點也是這樣，如在他關於中國革命的著作中曾這樣的寫着說：‘……因此中國的政權——是為和平目的而發生，而並不是像歐洲那樣君權同諸侯及城市武裝資產階級爭鬥而發生的。因此疆土廣大的中國特別是自建築長城之後許多地方因為外戰的結果而變成荒蕪……結果中國組織了一種特殊形式的統治階級。這種特別形式在歐洲是沒有見過的叫做士大夫階級’。這種論調與陶希聖的可謂無獨有偶!!）

陶希聖這種理論根本是錯誤的。這種觀點是證明他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完全盲目。士大夫階級是兩千多年以來的統治階級而同時牠又是超階級的東西，牠又是代表各階級利益的人物——這真是荒謬絕論的神話!!陶希聖錯誤的來源首先就是因為他不曾正確的了解社會的本質和社會階級的結構。關於社會的本質在上面已簡單的說明，現在我對於社會階級的結構問題來說明一下。

階級是什麼？社會階級的基礎是什麼？這個問題首先要回答。一位偉大的辯證唯物論者曾說過：‘按其在歷史上一定的社會生產系統中的地位，按其對於生產手段的關係（大部份是在法律上固定了規定了的），按其在社會勞働組織中的作用，同時還須按其收入的方法，及其所能支配的財產之大小，按上面這許多不同情形而分成的“人羣”即叫做階級’，更簡單的說階級便是某種人類的集團，這集團的人類對於生產工具具有同一的關係，牠在生產過程中具有同一的作用，因此具有同一的利害性的。社會中有各種階級，如基本的階級，這種階級是維持並發展該社會的生產以及再生產過程的，如封建社會的地主及農民，資本主義社會的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除此以外更有一般的階級如過渡階級即資本主義社會的農民等，及中間份子如工程師，律師即智識份子。這就是說在階級社會的結構中存在着各種不同的階級，牠與該社會生產有直接與間接的聯繫，沒有超階級的份子，縱使一部份人以為自己是超脫離一切階級而存在，其實這完全是空想，因為社會的客觀條件使他們始終附屬於某一基本階級。

陶希聖所謂士大夫階級就是所謂中間份子即知識份

子，這種份子雖然是不會直接參加生產過程，然而牠必然反映着某種基本階級的利益，在過去的歷史的事實告訴我們智識份子只是該統治階級的擁護者，代言人，如封建社會的士大夫是擁護封建地主的利益，資本主義社會的知識份子則擁護資產階級。固然在某個時期一部份知識份子也曾起來反對統治階級，站在新興革命階級的立場，然而這種現象只有在舊式統治階級的地位開始動搖崩潰的候時才產生的。

在中國過去歷史上，士大夫階級的確會表現異常重要的作用，不過這種作用絕不如陶希聖所說是超階級並代表各階級利益的，反之，中國古代的士大夫階級只是當代封建地主貴族的代言者，牠的任務不過是鞏固地主的統治地位而已。這種傾向不論在那方面都可以看得出，即就士大夫的意識形態一項來說，牠的要點也是在維持統治階級，麻醉羣衆，把當代的社會制度描寫作為天然神聖的秩序，使一般羣衆永久變為封建地主，貴族的奴隸。說到中國士大夫的意識形態，我便即刻想及孔孟的學說，這正是封建地主意識的最好模型，孔子孟子的理論和他們的全部政治哲學也就是當時統治階級的精神工具。比方孔子說‘君子之德風，小人

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上好禮則民易使矣，上好禮則民莫敢不敬，上好義則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則民莫敢不用情。子師以正，孰敢不正？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又孟子說‘勞心者治人，勞力者治於人’（誰知陶希聖竟也不客氣擁護孟子的理論，真不愧為孔孟之後！！）這些論調完全是歌頌統治階級，欺騙，麻醉勞苦羣衆的無恥理論。

固然在某個時期士大夫的政策在表面上似乎與地主階級的利益不完全適合，例如王安石之變法及王莽的提倡井田等，這也是足以迷惑許多歷史家（陶希聖也在內）的事實，然而只要有些歷史眼光的人們，即刻就可以看出，這種計劃也不過站在封建地主的立場上來緩和農民的反抗運動底企圖罷了，正是因為這樣他們不是馬上破產，就是短期中便遭了失敗。

夠了！我不必去詳加論證，在這里也就極明顯地可以看出陶希聖的‘士大夫階級’學說是多麼虛偽，牠與歷史的事實是多麼矛盾着。

我一直到這里不過是指出陶希聖歷史學的幾個主要的錯誤，在這些敘述中也就顯示出他的歷史方法論底一般特徵，像這種方法論與唯物論沒有絲毫相同的地方，更說

不上有辯證唯物論的色彩。除此以外陶希聖的歷史學底全部結構都患了嚴重的錯誤，老實說一句話，這種論調並不是他個人的特點，而是他所代表的派別底整個傾向。不論那一位只要不具有成見的人們，把他的歷史著作翻閱一下，都可以看出我的判斷不是過分的。陶希聖的歷史著作有一個最令人感覺到的地方，便是牠的矛盾性，更明顯些說內容與形式的矛盾性，敘述與結論的矛盾性等等。他不否認歷史是一種不斷變化的過程，反之他自己就該應說運用唯物的方法去研究歷史，把牠作為一種過程看待，可是一提到現在的社會問題，他的觀點又變為形而上學的，歷史的過程在他的眼光中似乎停頓了似的；說到階級鬥爭他也不否認，反之他自己就說中國社會史是一部階級鬥爭史，可是一提及現在的階級鬥爭，他的觀點又變了。處處當他敘述客觀歷史事實的時候，他就突然地把這些事實去適用他的主觀要求，不管這要求有否現實的基礎。因為這樣，所以唯物論在他的歷史學中完全被曲解了，修改了，牠變為詭辯主義，唯心論的傀儡。

陶希聖這種歷史學方法當然不是偶然的，牠正反映他所代表的派別底社會背景，這種背景使他不能澈底的站在

